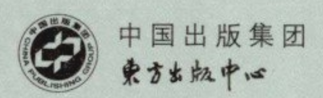
上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上册

墨西哥史

迈克尔·C.迈耶 威廉·H.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09－28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史／(美)迈耶，(美)毕兹利编；复旦人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4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81－5

Ⅰ. ①墨… Ⅱ. ①迈…②毕…③复… Ⅲ. ①墨西哥—历史 Ⅳ. ①K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9116号

责任编辑：欧阳明 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58
字 数：790千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1－5
定 价：80.00元(上下册)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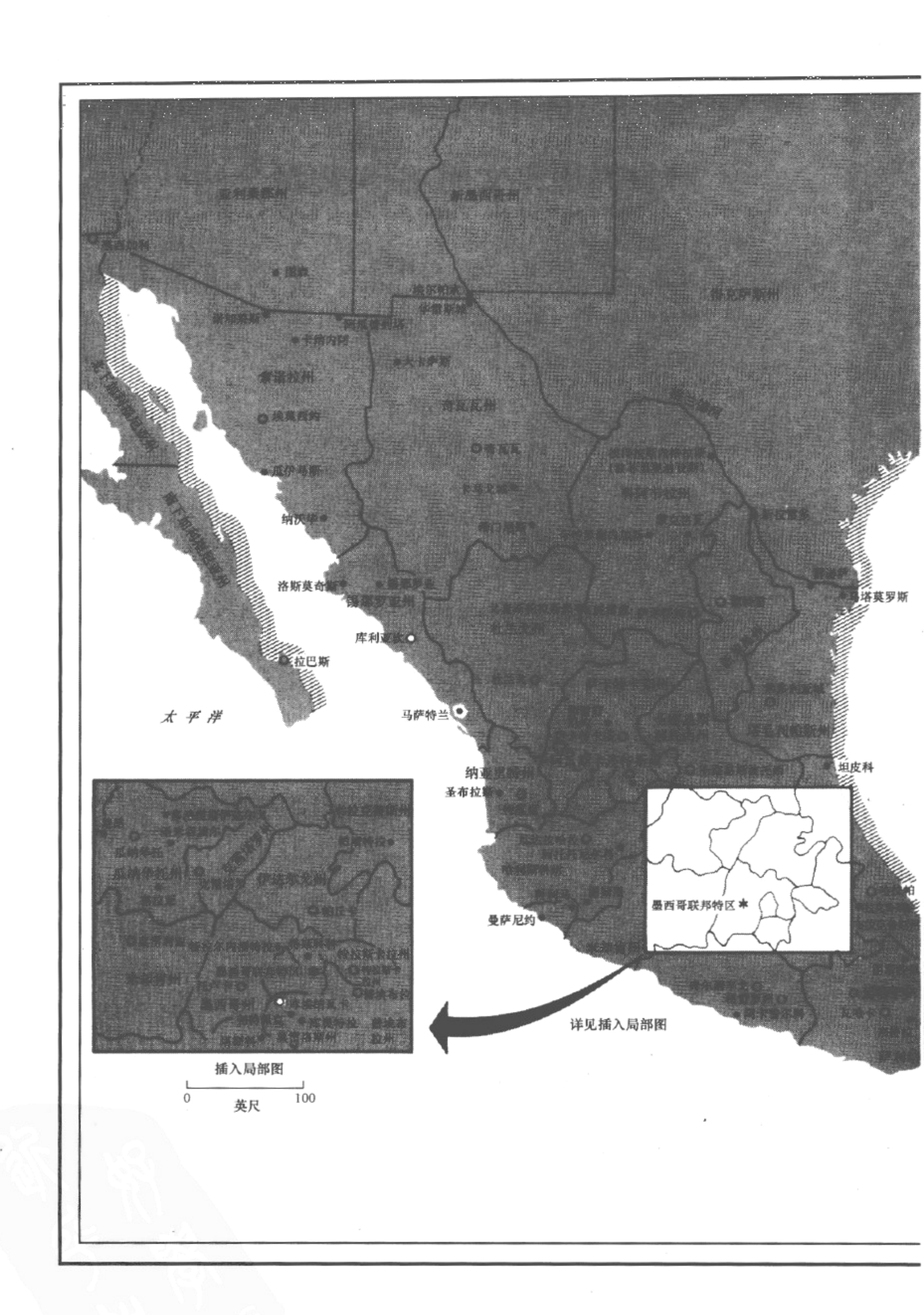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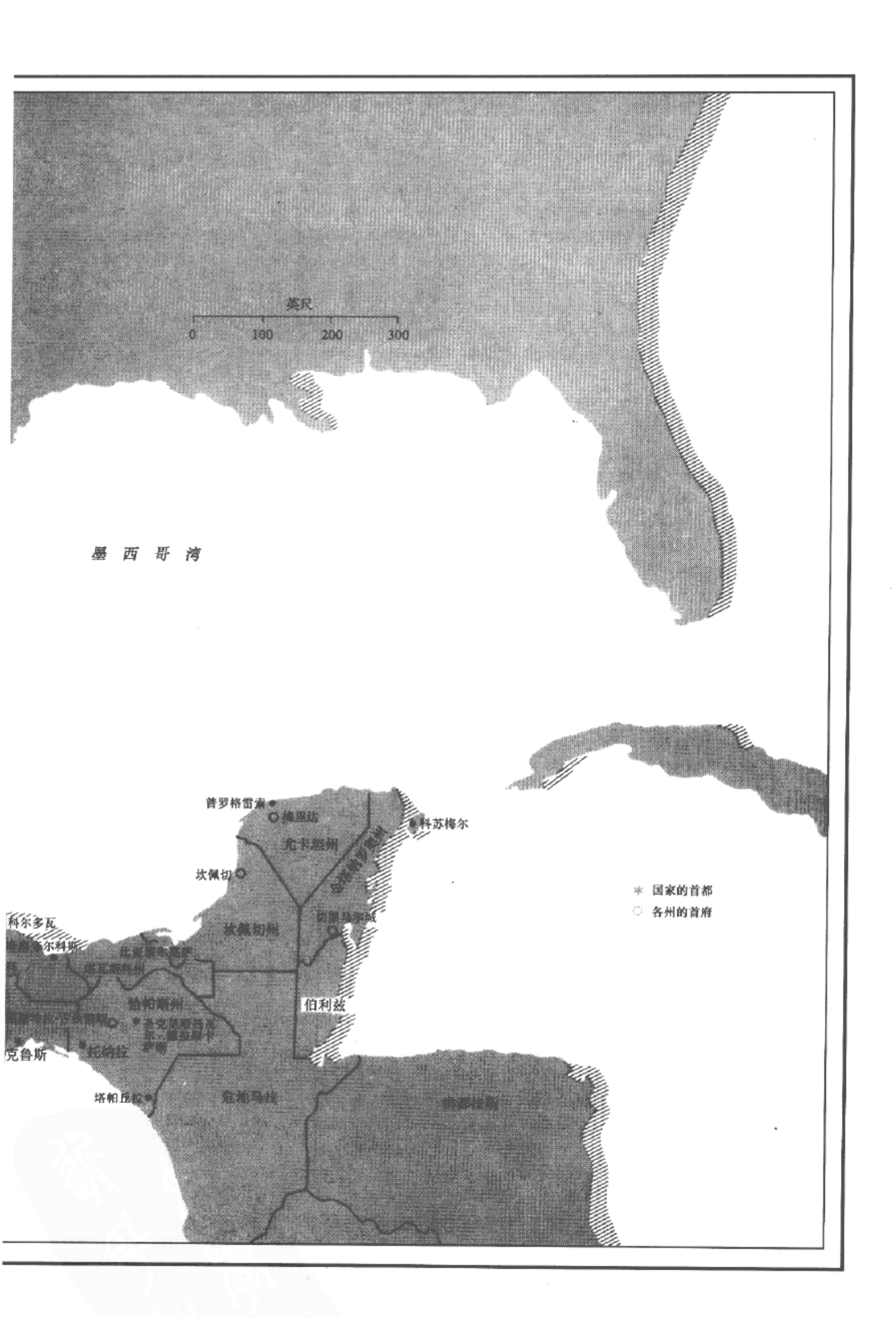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太平洋
洛斯莫奇斯
库利亚坎
拉巴斯
马萨特兰
纳亚里特州
圣布拉斯
曼萨尼约
坦皮科
马塔莫罗斯
墨西哥联邦特区
详见插入局部图
插入局部图
0
100
英尺



英尺
0
100
200
300
墨 西 哥 湾
普罗格雷索
尤卡坦州
坎佩切
科苏梅尔
坎佩切州
科尔多瓦
恰帕斯州
伯利兹
托纳拉
克鲁斯
塔帕丘拉
危地马拉
国家的首都
各州的首府

目录 Contents

引　论

> 世界上截然不同的种族往往日渐融合，直到形成某个新的人种。哪怕是最矛盾的混合也总是能够得到有益的化解，因为其中每个种族的精神因素起到了让整体升华的作用。
>
>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
>
> 《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

墨西哥是差异巨大的两个世界碰撞并最终融合的产物。在16世纪初，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误打误撞来到了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Watling Islands)[①]一代人的时间后，西班牙就在中美洲(Mesoamerica)遭遇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令其眼花缭乱。后来这一地区成为墨西哥的南部与中部。随着边界不断向北推进，再推进，西班牙人在之后数十年里发现了更多的文化。虽然西班牙人对人种和种族遭遇之后彼此的观念可能会相互调适、和解与混合的想法并不陌生，但他们却没有准备好与其遭遇的奇异文明进行这样的互动。美洲土著社群也因这场相遇而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在这次史诗般的会聚后，任何一方都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在最近描

① 即圣萨尔瓦多岛。——译者注

述埃尔南(费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án [Fernando] Cortés)与蒙特祖马(Moctezuma,亦可拼写为Moteuczoma或Montezuma)的第一次会面时,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历史时刻的精髓:“在他们相会的一刹那,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①。”

一旦有形的征服逐渐完成,打碎了现状,确定了历史上最后的胜利者和屈服者,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便开始测试彼此的容忍程度,设计接受和拒绝的策略。这个进程本身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已经展开了4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依然没有完成。在评估美洲土著文明时,西班牙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官僚不得不确定什么可以热情接受,什么可以无动于衷地加以容忍,而什么又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扼杀,因为它们如此有害于西班牙政体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一旦劝服失效,随之而来的就是胁迫。

美洲土著社群也遭遇了类似的抉择,无论他们身处南部的雨林还是北方的沙漠(后来这些地方被称为“新西班牙”)。虽然无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作为被奴役的民族,他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前享有的独立地位。在对其自身命运的掌控减弱的情况下,面对新事物,他们依然必须确定欢迎什么,适应什么(尽管毫无热情),而什么对其世界观来说如此相悖以至于他们设法逃避、嘲笑戏弄、竭力抵制,有时甚至是公开反抗,哪怕会招致惩罚性的报复。

2

即便在18世纪末,当西班牙对其墨西哥帝国的占有受到挑战而旧的殖民主义日渐消亡之际,接受与拒绝的中轴线依然在不断得以确定并合法化。那时新西班牙总督区已成为巨大的帝国系统的一部分,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在这里形成并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但殖民地社会依然在不断变化。虽然西班牙征服者、教士、小官吏和殖民者尽了最大努力,但事实证明美洲土著的势力过于牢固,无法完全消解。因此,墨西哥从来没有完全西班牙化。最终,根据墨西哥杰出但颇有争议性的饱学之士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说法,在墨西哥出现了“宇

① nationality,亦有国家之意。——译者注

宙种族”(raza cósmica),其中各个部分体现了整体的特色。

这个微妙的合成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作为墨西哥出现,随着更多的瓷片加入这个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种族马赛克里,它被赋予独特的形式、颜色和构造。这些碎片的组合逐步测试出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是否相容,渐渐塑造了阶级之间、男女之间、教会与政府之间、人类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略为晚近一些,还有墨西哥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幸运的是,把碎片粘在一起的黏合剂花了漫长的时间才凝结,使其有可能进行不断的调整:更换不相容的元素、中和过于夸张的风格,偶尔甚至推翻重构。

因为墨西哥在1821年作为独立国家出现时根本没什么时间做好实行自治的准备,所以“国家塑造”(*forjando patria*)的过程极其艰难。现在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初领导墨西哥独立的先驱们低估了未来任务的艰巨性。称颂自由和自决的原则是容易的,但事实证明,寻求将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难上加难。当初出茅庐的政治家试图用新的权力措施替代旧的一套,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下代价巨大的错误。就如何赋予新近赢得的独立以意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人士、联邦派与中央集权主义者不断斗争,在数十年间竞相许下了众多无法兑现的承诺。利益冲突加剧了教会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而妥协的努力受到轻视。各种试验、战略调整、财政管理重大失误造成一个虚弱而分裂的国家,这不仅招致外国侵略,而且使之缺乏抵抗力。

3

19世纪中叶,仅仅在从西班牙独立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与远比自己强大的美国开战。在那场战争结束时,已经因其政府管理不善而沮丧的墨西哥公民很快得知,墨西哥将其国土的一半和大量财富丧失给好战的贪图其领土的北方邻国。从墨西哥的角度看,结束这场战争的协约,即《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1848年)要求的不只是领土的割让,而是一次截肢。这次痛苦的外科手术仅仅旨在保留残余的肢体。虽然这场墨西哥战争本来很容易避免,但双方却都没有发生加以阻止的强烈声音。

在那次灾难性的惨败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认真

地重新评价墨西哥自成为独立国家以来的进步,或者说所缺乏的进步。以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为首的实证主义者(científicos,即科学家派)认为科学和科学方法应该主导公共话语。他们为墨西哥这个国家经历了30多年非理性的骚乱和暴力而哀叹。土匪看来是无法消灭的。墨西哥越来越落后于迅速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因为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受到使西欧和美国开始转型的19世纪技术创新的影响。

到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现代化的必要性开始弥漫于社会思想观念中。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1858－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是萨波特克印第安人①,他不仅成为美洲土著社会其他成员的榜样,而且依靠其诚实、坚定和稳重的性格为墨西哥确定了正确的道德基调。正是他启动了遏制骚乱和转变社会的双重进程。但是,虽然华雷斯政府启动了转型的重要阶段,但他并没有领导国家走进19世纪现代化的乐土。另一位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884－1911年任总统)此时正等在一旁,渴望在将来为墨西哥走向现代化保驾护航。

从1876至1911年,迪亚斯控制墨西哥命运长达35年,使其保持和平,而且实施了一系列改变该国面貌的结构性改革。在外国资本注入的情况下,铁路将墨西哥城与美国边境联系起来,而且开始逐步取代运货的木制拉车和人力车。在城市的干道上,有轨电车系统替代了马车。电话、电报、高效的邮政服务使通信业获得新生。新疏浚的港口和改良的码头首次迎来了外国大型商船,使墨西哥有可能融入全球经济。脱谷机和收割机的引进振兴了农业,而石油业的大发展使墨西哥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虽然1910年的墨西哥与1876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现代化并非免费午餐。在墨西哥落实其伟大计划的过程中,迪亚斯彻底禁绝了言论自由,流放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未经审判监禁反对派,践踏

---

① Zapotec Indian,居住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译者注

各项民主权利,却不受任何制裁。他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对,这抵消了他的大部分功绩。人们认为在他身边的科学家派越来越屈从于外国利益,而这些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实的。在 1910 年,墨西哥的大多数大型企业由外国人拥有,他们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公民。外国人还拥有墨西哥 20%的土地。

社会弊病的破坏性后果在工业化初期似乎总是传播迅速,墨西哥也不例外。虽然贫富差距在整个墨西哥历史上一直很显著,但当底层民众发现自己不受任何保护时,鸿沟进一步扩大。法律禁止工人结社或实施罢工。墨西哥大庄园(haciendas)的雇工(peones)发现自己服从的“法官”是住在庄园里的当地工头。[①] 农村和城市的贫民都发现其生活的重负毫无缓解,使其无望摆脱贫困:往好里说,他们被遗忘了,往坏里说,他们受到虐待。

评论家们一度为波菲里奥治下的墨西哥辩护,说它的许多过分举措是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波菲里奥·迪亚斯毕竟是一位不可替代的总统。但最终这种理论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仅仅根据他所树的敌人来判断,迪亚斯的声誉就好不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错误当然有可能比当时所认为的严重很多,但如果我们允许自己接受这种理论,我们就无从充分解释 1910 年 11 月 20 日爆发的墨西哥革命。

在 1910 年秋,反对独裁者的斗争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Ⅰ. Madero)已经因其政治信仰而进过监狱,此时又动员起一支平民队伍用武力推翻了迪亚斯。随后他试图发动墨西哥的民主力量构建新的政治基础,最终让无权无势的人发出声音。马德罗并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富。虽然他的议程狭隘地集中于政治,但即便在目标不大的情况下,他的成绩也乏善可陈,就像在其之后的历任总统一样。

---

① 这里作者对大庄园(haciendas)的注释是 landed estates,后者在英语中一般就是指地产,而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里指主建筑周围的田地(在美洲尤其指种植园),在汉语中无法区分,因此直接译为“大庄园”;而“司法”(justice)亦指审判,这句话说的是住在庄园的工头(经理)可以对雇工为所欲为(他们就是“法官”)。——译者注

虽然他对民主的墨西哥的设想最终会留存下来，但却已光华不再。

从1910年到1920年的整整1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一系列残暴的内部斗争，导致大批人员伤亡，造成数不胜数的损失，耗尽了墨西哥的力量。那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平民受到了恐怖的威胁，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或同情。多达100万墨西哥人牺牲了生命，而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往好里说，也只能算比较模糊不清的。随着矿井的废弃和工厂的倒闭，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从小学到大学，教室因缺乏教师而空空如也。虽然那是个难以保持任何信念的艰难阶段，但墨西哥人民仍然坚韧不拔。走出那次宏大的内战之后，墨西哥有一大批人成为真正的革命英雄，而另一些人则将遗臭万年。而在1920年，根本无从知道仅仅在10年之前靠这种理想主义所发起的那场运动给墨西哥带来的是福音还是诅咒。

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统一和安定再次来临，“墨西哥革命”（特加引号以将它与过去的许多次反抗加以区别）经历了惊人的变化，估计连马德罗本人看到也会认不出这竟是他发起的运动了。从政治改革到社会转型，它的愿景扩大了，它的目标改变了。作为各种观念相互竞争交融后的产物，这次革命不仅向墨西哥人灌输了进步的新观念，而且传播了新的紧迫感。

墨西哥第一次开始反对经济力量集中在私人手上。根据向墨西哥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安全网的理念，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让位于加强社会监管，工会参与公共事务，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由政府提供资金的集体农庄（ejido），政府展开了巨大的努力以改善墨西哥农民的生活。政府还制订计划，向墨西哥所有孩子提供教室和教师。这些深远的变化旨在最终能够实现墨西哥大众的生活更为富裕而美好的期望。虽然墨西哥城总是墨西哥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但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了这座首都。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雄心勃勃的政府事业伴随着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创造活力而迸发。当时独特的艺术美学强调艺术创造要拥护公认的革命信念。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加掩饰，公开谴责

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政府实际上扶持着这种艺术。虽然在其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对政府的批评,但它最多也只是相当温和的批评,旨在突出对革命目标的偏离。虽然旨在宣扬某一种社会信息的艺术(也就是墨西哥当时的艺术形式)并不总是好的艺术,但墨西哥壁画的这次繁荣在理念上有很大的突破创新,规模又如此宏伟壮丽,在其表现上如此优异卓著,以至于它让那些艺术家和墨西哥本身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作为对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济正统观念以及那一代政治家的明显挑战(一些人主张,这代政治家的唯一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政策规划者将其信念放在经济的更快发展上。工业化成为墨西哥生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至少社会的某些部门已可以享受墨西哥"经济奇迹"的成果。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强劲的墨西哥经济是短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系统充斥着种种弊端。这一时期墨西哥的高速发展如此依赖赤字开支,其后果不难预料。此外,哪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繁荣的泡沫彻底爆裂之前,这一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显然也没有惠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加速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流通,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纾缓墨西哥穷人的困境。 6

只有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墨西哥才能充分地重新评估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已使原子裂变,把人送上了月球,克隆了动物,用计算机网络将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联系起来,而且首先看到了苏联集团的解体,随后是苏联自身的解体。但墨西哥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还是从柏拉图到约翰·洛克再到卡尔·马克思这一代代哲学家所关切的普遍问题:如何使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正匹配,如何确保在选择领导人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很多国家在试图让繁荣惠及更多民众的过程中都遭遇了抵抗,在这个方面墨西哥的经历并不独特。但在使统治权威响应民众意愿这一项同样重大的努力上,墨西哥似乎比其他国家遭遇了更大的阻碍。在 20 世纪结束之际,墨西哥仍没有找到解决这些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的明确方法。

时间流逝这个因素对墨西哥而言比对其他大多数国家来得更重

要。在墨西哥,历史的传承给现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希腊和罗马留存的那些壮观景象一样,在墨西哥随处可见的古典时代的遗迹冲击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唤起时间流逝的生动印象。像埃及那样,墨西哥拥有古老的金字塔;像西班牙那样,它有古老的引水渠;像波斯那样,它有古老的象形文字;像中国那样,它有丰富的古代艺术藏品。大型壁画、湿壁画和雕像全都注重历史,全都在传达显而易见的信息,电台、电视台和电影的文化节目也是如此,增强了人们对这些墨西哥祖先流传下来的遗产的印象。集体记忆有力地反映了几千年来继承下来的传统。此外,它使个人能够美妙地体验墨西哥的历史。该国名称本身就取自阿兹特克部落最初的名称墨西卡(mexica),而它的典型象征——国旗,描绘的是一只鹰高踞在仙人掌(nopal cactus)上吞食一条蛇,再现了阿兹特克人关于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án,始建于1325年,1521年为西班牙人所毁)创建的传说。这个大都市就是如今墨西哥城的所在地。

当然,历史的类比往好里说是复杂的,往坏里说是靠不住的。因为远古的遗物是有惰性的,它们会掩盖历史的复杂进程。但正确地加以理解,它们也能够予人以启发。当然,过去能够被捏造,人类学和历史学可以被操纵,而混乱可以蜕变为虚假的秩序:此类行径对墨西哥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真正的历史意识使墨西哥公民有可能协调当代的现实与传统。这种理解显然有助于他们形成在日常话语中所应用的道德论点。哪怕他们现在似乎愿意原谅历代领导人先前的罪错,他们也不会轻易同意在未来重犯类似的罪行。总之,虽然在21世纪开始之际历史依然是墨西哥的沉重负担,但它无疑是其力量的来源之一。

7

本书各章先前均未曾付印,它们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墨西哥历史。这些作者全都有无懈可击的学术信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是声名卓著的专家。然而他们合作写就的这本书,哪怕放在10年或15年之前写,也会有非常不同的面貌,这是近年来历史知识激增所致。虽然最值得注意的创新有许多出现在社会史的领域中(例如,出现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研究之中),但众多值得关注的突破也改变了我们对墨西哥

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理解。利用先前无法接触的档案资源以及美国和墨西哥学者的新合作所产生的成果挑战了传统的历史时期划分，重新评价了墨西哥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探索了城市-乡村的二分法。一系列新的地区研究造成对先前归纳的质疑，现在看来这些归纳对作为整体的墨西哥来说太肤浅了。新的问题与老问题的新解答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微妙的对墨西哥历史经验的理解，形成了在各章中可以找到的那种演绎的基础。

就像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墨西哥历史的进程充分表明真诚和狡诈能够占据同一个舞台。墨西哥经验中有许多值得人们赞赏，使人类精神变得高尚的东西，哪怕偶尔它也可能导致人们义愤填膺。墨西哥经历的历史上的胜利因失望和挫折而落空的情况太多。但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们知道历史进步的路线总是曲折的。总之，它是一段独特而重要的历史的永恒记录，使人们有可能最佳地解释墨西哥的现在，而且也使人们在不滑入做无凭据的预言的情况下，设想墨西哥的未来，考虑墨西哥在其进入新千年之际的前景。

迈克尔·迈耶(Michael C. Meyer)

威廉·毕兹利(William H. Beezley)



第一部分

伟 大 的 相 遇

9

对于整个美洲来说，10 月 12 日标志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或写作 Cristóbal Colón)到达西半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为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寻找香料之岛。这个日期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意味着同一个事件即到达美洲，但对于西班牙来说，却不仅限于此。10 月 12 日对于西班牙的基督徒来说，是圣母马利亚在圣詹姆斯(Saint James，即圣雅各，西班牙语作圣迭戈[Santiago])面前显灵的纪念日，是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半岛传教的开始。因此，圣迭戈成为了西班牙诸王国的守护神。在整个殖民时期，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帝国政治都受到传教这一使命的影响。

哥伦布开启的这一相遇，和其他早期欧洲人和亚洲人到达美洲的航行有很大不同，因为其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并对新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些零散的亚洲航海者、勇敢的维京(Viking)水手、富有冒险精神的南太平洋水手等也曾航行到美洲，尽管这些航行也很重要，但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移民潮。

哥伦布的航行揭开了序幕，之后是西班牙冒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二世(Moctezuma II)在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的戏剧性会面。这次会面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人群由此汇聚在了一起。蒙特祖马是美洲最有权势的领导者，统治着几十个不同文化和语言的部落群体。他接待了欧洲冒险家科尔特斯以及他的远征队，其成员中至少有一个是非洲征服者，而亚洲则是作为一个梦想出现在这场会面中的。就像前一代的哥伦布一样，科尔特斯梦想到达富有香料的亚洲。他派出了几支远征队去寻找从墨西哥到远东的路线。

10

这次相遇也奠定了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舞台，欧洲人

和美洲人将在这一时期扮演重要角色,非洲的奴隶和自由人则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少许的亚洲人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墨西哥的白银将扭曲西班牙的经济,在较小程度上也扭曲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并将彻底地重塑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

科尔特斯和蒙特祖马的这次会面并未形成一个种族和文化的熔炉。西班牙王国和阿兹特克帝国代表着不同的生物、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混合体。将哥伦布之前或者他之后3个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族群和王国都称作西班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符号工具,但并不符合事实。这个地区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宗教,有北欧人、南欧人、北非人和西非人等不同族群,有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Catalán)、巴斯克语(Basque)和阿拉伯语等不同的语言,这就形成了一个多文化的复杂人口群体。

阿兹特克帝国的人民在文化上还更多样化些,尽管他们由于与世隔绝,在生物特征上更相像一些,例如骨骼结构、发质和血型等。阿兹特克帝国要求被征服的族群交纳贡赋,保持宗教上的一致性,但这些被征服的族群依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科尔特斯和蒙特祖马的相遇只是促进了这种文化和种族的混合模式,而这种混合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如此,这种种族和文化的混合一直持续和加速发展下去,最终导致了现代墨西哥民族的形成,所以本部分的标题为“伟大的相遇”。

第二章撰稿人苏珊·施罗德教授和第三章撰稿人罗斯·哈希格教授是纳瓦特尔语(Nahuatl)专家,纳瓦特尔语是阿兹特克人以及中部墨西哥的主要语言。为了忠实于纳瓦特尔语的语言学学术规范,他们翻译美洲土著语单词时,尽量不带西班牙语的重音符号、拼写,或者现代用法意义上的替代符号。为了让读者明白起见,当首次运用纳瓦特尔语单词和短语时,在括号里也提供了现代用法意义上的标识。

第一章 和墨西哥相遇时的西班牙

海伦·纳德(Helen Nader)

11 西班牙人刚开始遇到墨西哥人时，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西班牙征服者写的报告和回忆录里充满着对城市景色、商业和市场的描述。1519 年 8 月，当西班牙远征队开始从墨西哥湾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向墨西哥内陆进发时，队长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停下来描述他看到的首座墨西哥城市塞姆鲍拉(Cempoala)。在一封从该城写给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他估计每天来往塞姆鲍拉城进行买卖交易的人大约有 3 万之多。1492 年，斐迪南(Ferdinand)国王和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占领了格拉纳达城，结束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埃尔南·科尔特斯声称，在塞姆鲍拉城进行交易的宝石、食品、药品、衣服和鞋袜等产品要比那时格拉纳达城的物品更丰富。

科尔特斯大概有些夸张，但是他准确地知道查理五世皇帝(当时的西班牙国王，1516－1556)会对什么消息印象深刻。科尔特斯和他的探险队已经在皇帝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征服行动，他想劝说皇帝给他的探险队颁发皇家许可，并给予奖赏。科尔特斯的同伴抱有同样的热情，也同样关注印第安城市。科尔特斯最坚定的伙伴之一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1496－1584)这

样回忆他们1519年11月7日第一次看到蒙特祖马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时的兴奋之情："当我们看到这些建在水上的城市和村庄，建在旱地上的巨大村镇，以及笔直而平整地通向特诺奇蒂特兰的堤道时，我们惊呆了。"

迪亚斯和科尔特斯很喜欢所看到的墨西哥城市、乡镇和村庄的景色，还有石头的庙宇和建筑，为社区服务的水利设施等。迪亚斯在报告中写道："这些宏伟的城镇、庙宇和建筑都是石头造的，从水面上拔地而起，如同梦幻般的奇景……的确，我们有些士兵问这是不是在做梦。"最重要的是，这些西班牙征服者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宏伟的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货物，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摊位。

12

征服者们知道应该给皇帝汇报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们都抱有同一个目标：找到通向亚洲的航线，那里有传奇般的城市和繁荣的市场。墨西哥似乎很像几代欧洲商人和统治者梦想到达的地方：有类似欧洲旧大陆的城市。的确，这些类似性意味着亚洲似乎并不遥远了。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城市、集镇、村庄构成了文明的核心，因为商业和政治生活都是在广场(plazas)进行的。当迪亚斯一行作为蒙特祖马的客人隔天游览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他们爬上了神庙的最高处，眺望城中最大的市场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迪亚斯在报告中说，这个市场充满着冒险家商人们所梦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回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和熙熙攘攘的买卖人中。他们只需低声交谈，但汇成的声浪在3英里外都可以听得见。有些士兵曾经去过世界上许多城市，例如君士坦丁堡、罗马和意大利各地，也说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广大、物品如此丰富、秩序井然并且人口众多的市集"。尽管他们认为特拉特洛尔科市场比欧洲任何市场更大、更好和更拥挤，但它却让征服者们怀念起了家乡。科尔特斯认为特拉特洛尔科市场有他少年时代学习拉丁文时待过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市的最大市场的2倍大。迪亚斯承认特拉特洛尔科超过他的家乡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的市场(这是欧洲每年国际性的羊毛市场)。他写道："这里你可以看到新西班牙所有的商品，这些商品就像我家乡市场里那样摆放着，每一个摊位都有自己

独特的商品。这就是此宏伟市场的情况。”

迪亚斯感谢上帝，让他和 400 名同伴能够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这座宏伟的城市。但是这些首次到达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实际上也象征性地完成了另一次更长的旅程：卡斯蒂利亚王国自 14 世纪从废墟中重新振兴之旅的顶点，正是他们的这一实现了欧洲人梦想的发现。

这些征服者是再续了历史上的梦想，而不仅仅是在戏谑性的小说或者想象中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的历史记忆主要集中在中世纪，那时欧洲和亚洲定期进行长途贸易。和亚洲的贸易主要垄断在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商人集团手里。意大利商人用大帆船装载着欧洲商品向东航行，穿过地中海、爱琴海到达黑海。在那里，他们卖掉欧洲各地生产的粗羊毛衣服，然后用赚来的钱买进亚洲商人手里的香料、宝石、丝绸和奴隶。这些商品是亚洲商人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中国和印度用骆驼商队通过陆路运来的。

13



忽必烈汗给波罗兄弟颁发前往蒙古的通行证。虽然有关通往中国的传奇丝绸之路的各种传闻夸大了丝绸在欧洲商业中的重要性，但《马可·波罗游记》的风行还是说明，亚洲对欧洲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远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 14 世纪，政治动乱使得陆路贸易路线变得非常危险，亚洲和欧

洲之间的贸易开始减少。1347 年的鼠疫使得蒙古人确立的秩序崩溃，此前是这个秩序使得长距离的商队贸易变得很安全。奥斯曼人夺取了黑海沿岸的意大利商站。意大利商人只好退到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和他们在爱琴海中的岛屿上。15 世纪中期，奥斯曼人夺取了这些贸易飞地，1470 年，热那亚拥有的最后一个东地中海岛屿也陷落，欧洲人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而已。只有威尼斯共和国通过和东地中海的奥斯曼统治者谈判取得了继续和亚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

15 世纪中叶出生和长大的那一代欧洲人痛感他们失去了太多东西。这些人中包括阿拉贡(Aragon)王国的斐迪南(1452 — 1516)国王，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1451 — 1504)女王和热那亚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 — 1506)。他们热切地期望寻找到一条到达亚洲商业城市的商路。当他们出生时，没有几个欧洲人会预见甚至想象到西班牙会是找到新贸易商路的先行者之一，更不用说找到一块先前欧洲不知道的大陆了。但是，首次到达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的确就出现在这一代孩子们中间。

西班牙通过摆脱使中世纪欧洲和亚洲间贸易终结的各场灾难，成功实现了发现新航路的目标。这其中第一个灾难是气候变化，即小冰川期。自古罗马时代，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地方就一直种植耐旱的小麦，但是从 1315 年(被称为第一个灾荒年)起，大雨成灾，带来了粮食危机。小麦连续 3 年没有收成。几个世纪以来，西欧大部分地区第一次遭受谷物歉收和饥荒。当连绵的雨季来临时，为了满足粮食需求，意大利商人从黑海进口小麦，也带来了已感染瘟疫的老鼠。结果腺鼠疫席卷了欧洲，城市人口大量死亡，商业破产，大规模的动乱和内战发生了。

14

西班牙的中世纪社会结构主要是为了对抗半岛上的穆斯林城市王国，它此时在这些灾难的重压下崩溃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从声名远扬的“收复失地”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从穆斯林手里夺回的城市堡垒，开始大批地流失人口。民众都被吓坏了，纷纷逃离城市躲避传染病。他们在乡下组成一个个分散的定居点，自己种植粮食，自给自足。在中世纪为了战争而建立的城市废墟之外，西班牙建立了以生产和贸

易为中心的城镇和村庄。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和平目的而重建社会的经验,使得西班牙人形成了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稳定的社会,这有助于他们日后探索和定居美洲。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也遭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染病时代。1348 至 1350 年由腺鼠疫形成的黑死病导致了欧洲城市 40% 的人口死亡,小城市和村庄 60% 人口死亡。腺鼠疫(Yersinia pestis)是由一种跳蚤——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传播的细菌性传染病。当本地的褐家鼠(Rattus rattus)死于传染病,它们身上的跳蚤就会为寻找新的血液来源转到人身上,通过咬手腕和脚踝处暴露的皮肤传染病菌,形成一个坚硬的黑色肿块,这就是 1348 年最初的传染病得名"黑死病"的来历。通过跳蚤咬伤而传染的鼠疫杆菌快速繁殖,在毛细血管附近的淋巴结节点形成一个巨大而非常疼痛的脓疮,这就是"腺鼠疫"这个名字的来历。在抗生素发明以前,不论病人健康营养状况如何,60%的感染者都死掉了。14 世纪的鼠疫使得巴塞罗那这个大城市的人口、商业、制造业一直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卡斯蒂利亚也同样遭受了 1575 — 1577 年、1596 年、1610 — 1612 年和 1630 年鼠疫带来的巨大人口损失。

相比成年人,鼠疫和第二次传染使得儿童死亡率更高。但是其他年复一年发生的传染病同样是灾难性的。在非灾年,四分之一的儿童在 6 岁前死于猩红热、白喉、百日咳和腹泻。没有任何社会阶层的人能逃脱这些疾病。

15 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传染病斑疹伤寒(由类似细菌的立克次氏体而引起的)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斑疹伤寒流行病主要发生在拥挤的船上,在西地中海和奥斯曼的战争中,在大帆船舰队里进一步流行。1507 年,在塞维利亚城附近的洛斯帕拉西奥斯镇(Los Palacios),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Andrés Bernáldez)和他教区中的大部分人都受到这一新疾病的折磨,这种传染病横扫卡斯蒂利亚地区,影响所及的城镇和乡村中,大约 40% 的人口都死亡了。在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卡韦萨·德巴卡(Cabeza de Vaca)农场,没有几个人

在这场斑疹伤寒中幸存下来，于是他们宣称这个地方不卫生，推倒了房子，在地里撒上盐（给土地消毒，这样就不能继续耕种任何作物了），移居到其他的城镇去了。

15

记录显示：在16世纪60年代之前，在欧洲，包括西班牙，天花这种病毒大概危害不大，不过轻微的天花疾病还是很流行的。欧洲人天生对病菌和病毒免疫的这种现代流行观点从历史上和生物学上看都是不正确的。病毒性很强的天花在17世纪初进入西班牙，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疾病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整个贵族家庭的孩子们都死于天花，结果他们远房的堂兄弟们幸运地继承了贵族头衔和大量财产。每一个社会阶层，从国王到穷汉们，都受到了天花的影响。

1580年大面积爆发的流感类似1918年灾难性的流感，因为成年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特别地高。在1580年入侵葡萄牙的大规模战争中，成百的卡斯蒂利亚年轻男子死于流感，他们甚至还没看到战斗是怎么回事。大部分流感主要是给儿童和老人带来高死亡率，这场流感却主要杀死了大量年轻男子。这就减少了适育年龄成年男子的数量，使此后50年中没有人口增长来补充腺鼠疫和天花所带来的人口损失。17世纪，流行病和低生育率加起来导致西班牙的人口比前一个世纪减少了三分之一。

人口的损失为新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上台开辟了道路，但他们自己也面临着疾病和早亡的问题。极高的婴儿死亡率使得君主国的王位更替很不稳定。西班牙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王朝（1369－1516）的君主们感染上了肺结核，这使得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他们的继任者哈布斯堡王朝（1516－1700）的统治者，也忍受着关节结核和呼吸困难的疾病，十几名皇室子孙在未成年前就死去了。文艺复兴时期，早亡，以及精神错乱、国王断嗣、无能的男性继承人、王位继承战争困扰着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王室，这最终催生了新的统治家族。

15世纪，6个中世纪的君主国合并成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一个非正统分支——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将这6个王国统一起来。从1366年到1369年，在一场血腥的内战中，这个王朝的创建者亨利二世

(Henry Ⅱ, 1369－1379年在位)[①]获取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亨利是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Ⅺ)的第三个私生子,按照任何标准他都是非法的,并且他还杀死了同母异父兄弟彼得国王。因此他既是一个弑君者,也是一个手足相残者。1412年,当阿拉贡王室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死去时,卡斯蒂利亚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国王的兄弟斐迪南一世(1412－1416年在位)被选为阿拉贡、巴伦西亚的国王以及加泰罗尼亚的亲王。

1469年,当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公主嫁给阿拉贡的斐迪南王子时,他们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权利来继承各自的王国(伊莎贝拉在结婚5年后,才通过内战获得王国,而斐迪南则在此后5年继承了其王国)。16 尽管如此,他们一起将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统一起来,并在1492年进一步征服了穆斯林的格拉纳达王国。

1512年,斐迪南通过继承权征服了第六个君主国纳瓦拉王国。这个联合体里的每一个君主国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法律、习俗和语言,同时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得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君主能始终如一地追求向外扩张这一目标。

以前曾经折磨过许多统治家族的灾难现在降临到新的王朝——哈布斯堡家族身上,这使得西班牙陷入了欧洲北部的政治斗争中。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惟一的儿子18岁时死了,留下来一个怀孕的寡妇,她生下了一个死胎。悲痛欲绝的国王急忙从葡萄牙召回他们最钟爱的大女儿伊莎贝拉。她嫁给葡萄牙王储几星期后,丈夫就死了。她之后嫁给了另一个王储。作为女继承人宣誓几天后,她也在分娩时死了。她的儿子米格尔在2岁时也死了。

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落在了国王的第二个女儿胡安娜(Juana)身上。她嫁给了勃艮第的菲利普,即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儿子。因为他们有6个活着的孩子,胡安娜和菲利普这一系看起来可以安全获得继承权。但是胡安娜的行为却变得越来越乖张,现代作家

---

① 英文Henry对应西班牙文中的Enrique,亨利二世即西班牙文所称的恩里克二世。下文亦同——编者注

称她为"疯女胡安娜",她后来被永久监禁,显然患了精神分裂症。1518年,她的大儿子查理 18 岁时第一次来到西班牙。他在议会宣誓,成为国王。查理的祖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就为今后一系列新的扩张提供了可能。

西班牙诸王国中最成功地渡过这一系列危机的就是卡斯蒂利亚,它成为欧洲最有活力的国家。1530 年,卡斯蒂利亚的人口有 600 万,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只有 150 万。

卡斯蒂利亚能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法律事实:卡斯蒂利亚的男女都是自由人。卡斯蒂利亚从来没有存在过农奴制度,1485 年,斐迪南国王将这一制度扩展到阿拉贡,使所有农奴都成为自由民。到 15 世纪中叶,欧洲君主们达成了共识,即他们的臣民不再为奴。按照 1500 年的皇家敕令,伊莎贝拉女王保护卡斯蒂利亚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自由权利,除非他们曾造反反对过西班牙人,或者是食人族,或者已经是其他印第安人的奴隶。但是,对于其他非臣民,政策则截然相反。在欧洲的战争中,被俘获的非基督徒被当作奴隶,就像任何反对皇家主权的造反臣民一样。此外,欧洲君主们允许从葡萄牙购买非洲奴隶,而葡萄牙人拥有在撒哈拉南部从事奴隶贸易的特权。

西班牙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城镇和村庄里是自由公民(vecinos)。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每个公证文书都这样开头:我,约翰·多伊[1],某镇的公民,在此如何如何等;或者珍妮·史密斯,他的妻子,某镇的公民,在此如何如何等。这些公民通过民主的市镇会议和经选举产生的市镇议会和法官进行自治。每一个公民家庭都拥有一票选举权,但是只有已婚的男子拥有在市镇会议投票的权利以及担任公职的权利。妇女可以在市镇会议发言,寡妇拥有她们家庭的投票权,但是妇女不能参加投票和担任职位,寡妇如果要投票,必须找个男性代理人,通常是她们的儿子或者是镇上的法官。

17

不论是贵族还是自由民,教士还是农夫,西班牙人都居住在城市、城镇和村庄里。农夫们每天都从居住的地区步行到田地里,然后再走

① 意为"某某人"。——编者注

回来。孤立的乡村农舍是很少见的。少数人因其从事的职业,例如磨坊、路边小旅店的看门人和牧羊人等需要住在外面,这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的例外情况。通俗和高雅文学作品都将这些例外的人群描绘成好色、贪污和充满暴力。小说《堂吉诃德》在 1605 年首次出版,书里所描写的奇异冒险只是城市正常生活的特例。

15 世纪鼠疫时代最巨大的社会革新是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新城镇和村庄。普通民众发起并完成了西班牙社会内部最伟大的世纪扩张。1492 年,当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出发开始其伟大的远航时,这个小镇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这是卡斯蒂利亚典型的新居民点。帕洛斯最早出现在文献里是 1380 年,那时它只是莫格尔(Moguer)镇辖区内的一个棚户居民区。就在这一年,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一世国王正式将帕洛斯村从莫格尔镇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镇,然后将它卖给一个塞维利亚的贵族阿尔瓦尔·佩雷斯·德古斯曼(Alvar Pérez de Guzmán)。

阿尔瓦尔·佩雷斯作为帕洛斯的领主(señor)继续发展这个新镇的基础设施,以便吸引更多的家庭。首先,国王免除了迁入帕洛斯镇定居的前 5 户家庭的皇家税收。因为这里不适合种植小麦,阿尔瓦尔·佩雷斯种植橄榄树并且在海边修建了一个仓库,这样帕洛斯的渔民就可以在此拍卖他们的新鲜鱼。他起草了市政条例,派遣法官和行政官员代表他管理帕洛斯镇议会。镇议会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在领主或者其代表面前宣誓就职,并且从他手里接过象征司法权的权杖(varas)。1394 年阿尔瓦尔·佩雷斯去世后,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和胡安娜批准在镇内修建了方济各会的拉比达圣玛丽亚修道院(Santa María de La Ráibida)。

镇议会和其法官们继续发展这个新镇的经济。到 15 世纪中叶,帕洛斯有一个镇立造船场和一个盐场。这个盐场在涨潮时将海水存在一个浅池塘(即盐池)里,海水在夏天的高温下快速蒸发,留下一层厚厚的盐,帕洛斯人就可以收获这些盐了。利用这些收入,镇里建造了一个教区教堂,一个公用市场,市民们可以在此进行日常的交易。该镇对领主承担的惟一的经济义务是,在海边进行鱼的批发贸易时需缴纳 5%的销售税。

18

帕洛斯镇的繁荣吸引了新的定居者,尽管这些后来者并未享受到

先来者免税的待遇。镇子的大部分居民依靠打渔、从事进口贸易、造船或者做海盗维持生活。做海盗几乎是渔民社会的标准职业。鱼、橄榄油和盐——腌鱼业的三大原料，是这个镇的主要出口产品，小麦是重要的进口产品。到1478年，此镇的人口增加到600户。

1492年5月23日，帕洛斯的男子们响应王室的传唤，前往圣豪尔赫的教区教堂参加了镇议会的会议。在这里，镇公告员宣读了一封伊莎贝拉女王的信，命令帕洛斯镇贡献两艘平底船(一种浅底的船，可以安全地进入小港湾和沿海水域)，并为王室服务3个月。镇里的教士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z)记录了这则王室敕令。他证明有两个外地人在场：拉比达修道院的方济各会修士胡安·佩雷斯(Juan Pérez)，以及一个外国商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然还有镇上的法官和3个镇议会成员。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大部分市镇议会宣誓遵守皇家敕令，但是并不马上执行，而是先讨价还价得到更优惠的条件后再执行。但是这一次帕洛斯镇不得不马上遵行，因为镇上的渔民由于非法进入葡萄牙水域而被起诉，西班牙君主为此付了很大一笔罚款。现在帕洛斯镇不得不要么向皇家国库缴纳罚款，要么让自己的公民待在监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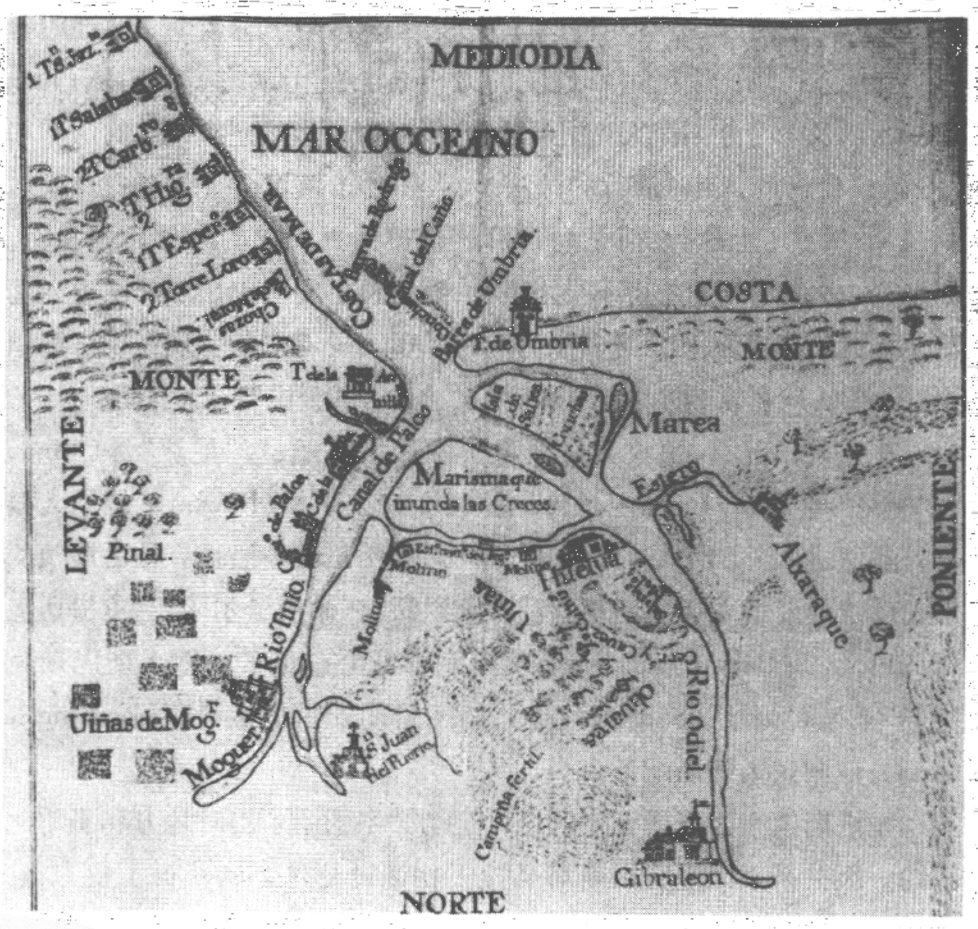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镇议会付钱租了两艘平底船："尼尼亚"号(Niña)和"平塔"号(Pinta)。船主是当地的经商家族平松(Pinzón)(他们大概就是非法进入外国水域的人)，他们同意为两船配备船员。帕洛斯镇的船员就这样开辟了历史新篇章。几天以后，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港(Sanlúcar de Barrameda)，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租了一艘大型巴斯克货船"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船主是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他同意为该船配备海员。

帕洛斯镇和西班牙王室的这种互动关系揭示了当时地方和王室之间的一般关系。因为特拉斯塔马拉王朝通过特殊方式获得了权力，它不得不花样翻新地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非法性迫使它极力通过非传统渠道获得支持：而当时城市衰败，小城镇和村庄却很繁荣。任何快速发展的村镇如果发现自己和城市管理法规相冲突，一般都欢迎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政策，即授予这些村镇自治权，并

把它们作为封建领主所属(seigneurial)镇交给贵族进行管理。

领主和国王将城镇的行政管理交给镇议会,几乎很少进行干预,这就导致城镇享有几乎和城市一样多的自治权。例如,镇上的治安警察逮捕了一个嫌疑犯,交给镇上的法官,法官进行审讯,然后宣布判决,进行罚款或者判刑入狱。镇上的法官对全镇范围内所有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有司法管理权,可以行使死刑的权力。镇议会拥有和管理所有公共财产,例如帕洛斯镇的盐矿。为了这些自治权,封建领主所属镇的公民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君主们合作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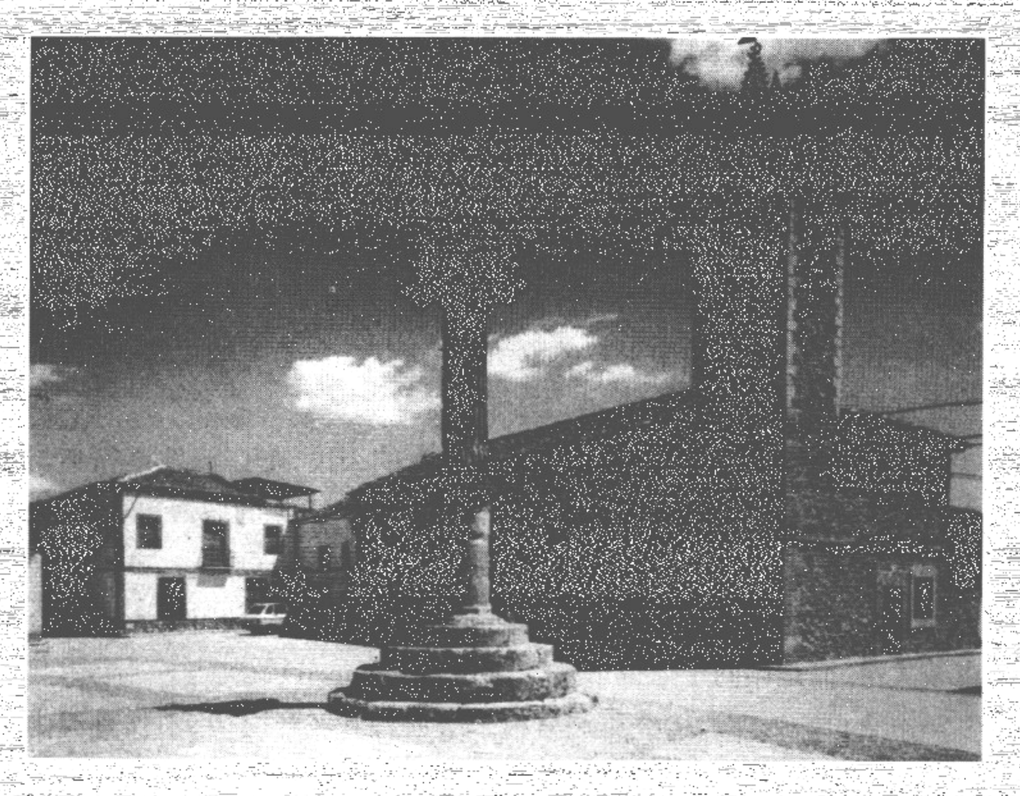
19



奥德尔河河口地区河道经常发生改变,这幅16世纪的地图是这一地区的导航图。绘图者突出描绘了沿岸的标志性建筑。帕洛斯镇上最高的两座建筑,一是环绕木屋居民区的瞭望塔,它始建于14世纪;一是拉比达修道院,进入河口的船只应该都可以看到它。图上,瞭望塔标注的名字是"帕洛斯堡",处于中部偏左的位置;修道院在瞭望塔上方,标注的名字是"拉比达修道院"。

为了防止被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邻居们推翻，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干脆不断吞并周围的边境地区。特拉斯塔马拉王朝获取的这些地方形成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结构。西班牙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大的区域政府，直到19世纪，省级地方政府才建立。国王们主要依靠直接联系市镇政府来执行王室法令和收税。当市镇议会代表王室进行行政管理或者要求王室给予相应回报时，他们一般直接给国王或者女王写信。这些小市镇和王室间的通信给我们留下来大量关于当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细节的宝贵资料。

20



西班牙比利亚拉尔的市集中的正义之柱，伫立在图右边的市政厅的前方。市镇议会的议员们会轮流站在柱子(称为 picota 或 rollo)底部的台阶上，在那里监控整个市场：检查称重和度量衡的情况，为签订合同做见证，设定最高限价并调解纠纷。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认为市镇是西班牙社会最基本和不可或缺的文明单位，这些细胞构成了整体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细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许多部分和事项，共同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整

体。公民、领主、君主和教士都清楚地知道(一般心照不宣地)市镇行政机制及其自然发展过程。他们都信任市镇议会的内部工作和政治能力。他们知道这个系统的法律局限性,但是知道如何绕过这些障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班牙这个16世纪欧洲最强大的专制君主国,通过国王和几千个小城镇之间的直接联系进行统治。

每一个城市和城镇都有自己的市政法(fuero,福埃罗)来界定其和国王、领主之间的关系,其中还包括管理商业、合同和继承等事宜的地方法规。尽管各地法律千差万别,西班牙王国的继承法大都遵循众子平等的理念。唯一遵循长子继承制的是君主的继承。

幼子们移民到西印度的原因是因为继承不到遗产,这种常见的说法在西班牙是没有法律和传统根据的。通常所有的婚生子,不论男女,都有权平等地继承其父母的财产。父母不可以排斥任何一个孩子,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一个孩子试图谋杀父母。15世纪时,父母立遗嘱是很少见的,因为法律早有规定,而镇上的法官负责依照法律分割遗产。但在墨西哥,即使析产继承法则仍有效,立遗嘱却更普遍些,因为家庭成员分住在大西洋两岸,距离遥远。

21

西班牙人从国王一直到最小城镇务农的公民,都广泛地遵循参与市政管理的传统。在卡斯蒂利亚,平均有150户人家的城镇和乡村,经常举行城镇集会。但是一旦城镇家庭数发展到300户左右,市镇集会上的分歧就很大了,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大的城镇和城市就不再依靠市镇集会,而是倾向于通过市镇议会(town council)做决定。

市政自治管理的传统深深植根于卡斯蒂利亚社会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因为它们已成为自发的。最传统的东西往往最难变化,并且经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西班牙人喜欢打官司,的确是这样。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城镇发起了绝大多数诉讼,并且每一次诉讼都是从市镇会议开始的,在会议上公民们一致投票将案件代理权授予一名指定的律师。卡斯蒂利亚社会的市政民主传统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人们已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西班牙人发现只有通过参与市政管理才能获得管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权利。卡斯蒂利亚的公民奋起反抗任何试图剥夺他们基本权利的人。在梅德林镇(Medellín),传统上由骑士和市镇民兵里不拿薪金的军官等公民来选举镇上的法官和镇议员。但是1488年,领主梅德林伯爵开始自己挑选这些官员。1488年,这些传统的选举人对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向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抗议。在这26个抗议书签署人中,有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埃尔南·科尔特斯的父亲马丁·科尔特斯(Martín Cortés)和8名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几乎都站在公民们一边而反对领主,就像在这个案例中一样。

西班牙人渴望得到土地和水,这也使得他们倾向于在城镇生活。到1500年,西班牙所有的土地都合并成3.2万多个城市、城镇和村庄。农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花园等私有财产,但是未耕种的公地(montes)和其资源属于市镇社区(común)所有,镇议会控制着所有静止的和流动的水源、森林、草场、野兽、野果、草药和采石场。镇议会拥有公共财产,所以法官和镇议员不但管理地方法律事务,而且还经营城镇领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

镇议会还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例如在市场里规定价格、检查度量衡,以及聘用镇上的学校教师,修建桥梁、喷泉、洗衣店和教堂等。议会修建和管理农业基础设施,例如建造水坝和灌溉系统,修建山坡上的梯田,清理公共土地来开辟更多的农田等。

22

当西班牙的人口增长时,其农业和商业也在扩张,其实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西班牙的农民有自己的农田,在农闲时他们就当手艺人、搬运工和小商贩。城市的批发商和官僚也拥有农田。随着对食物和葡萄酒需求的上升,卡斯蒂利亚农民开始增加产量和多样化生产。他们通过在山坡上种植多年生作物,特别是葡萄和橄榄树,增加了农田数量。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对纺织品、绳索、纸张的需求,农民们种植亚麻和大麻,增加了放养(transhumant)羊群的数量。农业镇建造了加工设备,将这些农作物加工成商品。最典型的情况就是由镇议会建设脱粒的场地、洗羊毛站点、浸泡亚麻和大麻的池塘和漂洗磨坊。

有些西班牙人从羊毛业、国际贸易和土地中获取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从15世纪早期开始白手起家，那时卡斯蒂利亚刚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人口水平，并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内发展期。伴随着财富增长，向上的社会流动开始出现。成功的农民成为富有的商人，他们利用耕地的骡子和公牛运输他们的产品到城市里卖，再利用利润购买城市的货物，将它们带回他们的家乡出售。

大城市和小农庄的公民都认为城镇生活是值得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并认为这对商品化的农业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城镇都认真地向其公民(不论是个人还是社区)提供商业基础设施，例如市场、道路、桥梁、码头、医院、供旅行商人用的路边小旅店等。和今天的现代社会不同，当时区分乡村和城市，农业和商业的界线并不存在，他们也不这样来区分城市和乡村。

西班牙是一个由城市和城镇组成的君主国家，贵族的领地也是一些城镇的集合体。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君主们将治理城镇的权利作为世袭财产给予那些帮助他们在内战中获得王位的军队领导人。为了保证这些领主所属城镇控制在君主手里，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君主们要求对这些城镇实行托管制(mayorazgos)[①]，君主为受托人，而新的领主是受益人。

1400年后，国王推行了一个新的办法，将世袭的贵族头衔授予这些城镇领主们。1400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只有不到12个贵族头衔，而且都不是世袭的，到15世纪末，则已经有100多个世袭贵族头衔了。

这些头衔并未将领主权从国王转给领主，相反，每一次授予贵族头衔都是为了结束某个领主的直系继承人死亡后导致的法律纷争和内乱。因此，每一个贵族头衔都是那个领主权正处在多个继承人的争夺中的镇子的名字。第一个世袭头衔是阿尔发伯爵(Count of Alba)，由约翰二世国王在1439年授予。1465年，亨利四世国王将其升为阿尔发公爵(Duke of Alba)。1520年，查理五世对有头衔的贵族进行排名，并将最富有的封为大贵族(Grandees)。下面的表格说明了这些世袭贵

23

① 原义为“长子继承制”，或译“有限继承制”。——编者注

族头衔授予的时间,1520 年时年收入多少。它也说明了 15 世纪卡斯蒂利亚的贵族阶层变化有多么快,其收入相差有多大。

1520 年,查理五世皇帝册封的卡斯蒂利亚排名前列的大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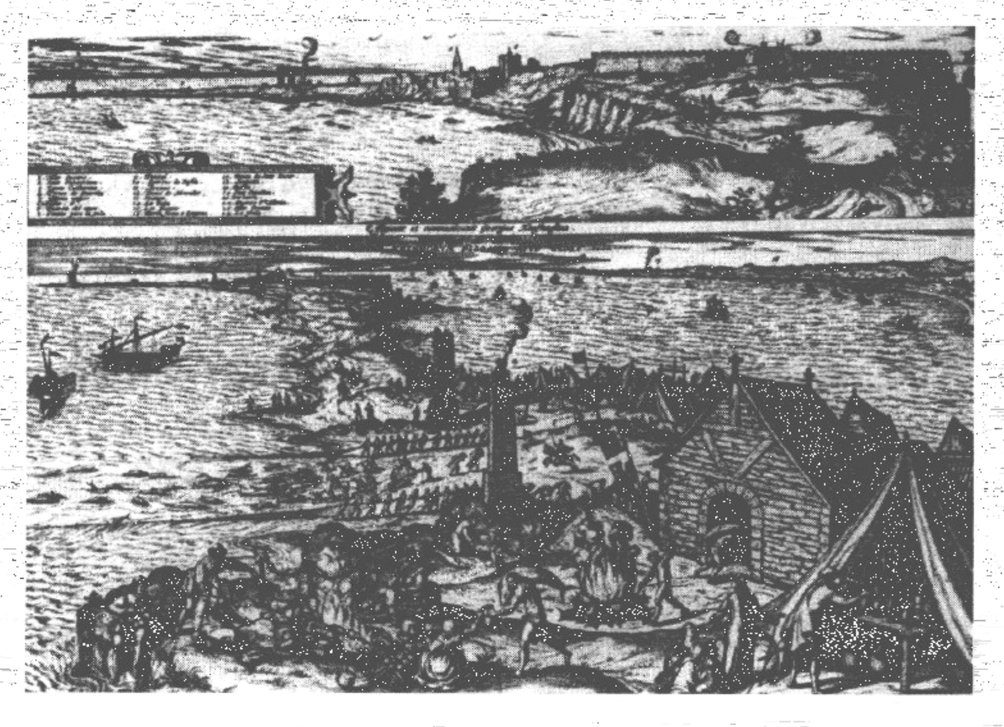
头　衔	授予时间	家　族	年收入(以杜卡特计算)
卡斯蒂利亚骑士统帅(Constable of Castile)	1492	贝拉斯科(Velasco)	50 000
卡斯蒂利亚舰队总帅(Admiral of Castile)	1405	恩里克斯(Enriquez)	32 000
阿尔发公爵(Duke of Alba)	1465	托莱多(Toledo)	30 000
因方塔多公爵(Duke of Infantado)	1475	门多萨(Mendoza)	30 000
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	1445	古斯曼(Guzmán)	50 000
贝哈尔公爵(Duke of Béjar)	1485	祖尼加(Zúñiga)	24 000
梅迪纳塞利公爵(Duke of Medinaceli)	1479	拉塞尔达(La Cerda)	16 000
阿尔布克尔克公爵(Duke of Alburquerque)	1464	拉奎瓦(La Cueva)	24 000
阿尔科斯公爵(Duke of Arcos)	1493	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ón)	30 000
埃斯卡洛纳公爵(Duke of Escalona)	1472	帕切科(Pacheco)	24 000

大部分贵族住在城市里,他们试图通过在城中从事其他职业来增加他们的财富,例如做国际贸易商。这些领主有剩余的货物要卖,因为他们所拥有的镇子每年付给他们的贡物中,一半是现金,一半是实物,例如小麦、大麦、葡萄酒、橄榄油、奶酪、牛奶和蜂蜜等。贵族们并不会因为从事批发和国际贸易而声誉受到玷污(尽管在 18 世纪的波旁王朝时代情况有所改变,至少理论上会如此)。他们大多数人试图利用收入进行投资,于是在其生活的城市建立了多种多样的设施。第二任滕迪利亚(Tendilla)伯爵(1442 — 1515)是新征服的格拉纳达王国的总督,他在这个城市进行投资,例如购买市中心的建筑,将底楼作为商铺租出去,而楼上作为公寓出租。他在这个城市的两条河上买了 4 个磨坊,在城中两条商业街的交叉口买了一个货运商旅馆,在主城门比夫兰夫拉(Bibrambla)外买了一个旅店。他买了一艘大帆船来运输自己繁殖的

马匹，卖给卡斯蒂利亚的北非驻军。但是他没想到买海运保险，当他的船在直布罗陀附近遭海盗袭击而沉没时，其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24

最著名的卡斯蒂利亚国际船运巨头是梅迪纳塞利公爵和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他们将拥有的军事和商业力量合而为一来为自身及君主谋利。这两个拥有头衔的贵族获得了在西班牙的大西洋西南部海岸捕捞金枪鱼的皇家特许权。在那里的海岸边，他们建造了包装和加工厂，并购买船队将这些腌制好的金枪鱼运输到欧洲各地。但是非洲和西班牙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一带，经常有来自北非和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海盗，他们对出口贸易形成了很大威胁。



一年一度的金枪鱼捕捞季(almadraba)是加的斯地区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们的主要收入来源。画面中，两列男人正在慢慢把一网的金枪鱼往岸上拉，其他人则用渔叉捕杀金枪鱼。在画面最前端，女人们正在煮食刚捕捞上来的鱼，一个男人正在把一条大金枪鱼扛到仓库里去。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公爵们会把处理好的金枪鱼浸在盐或橄榄油里，运往意大利、法国和北欧的市场。

1462 年，为了对付这些威胁，第二任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出钱建立并领导了一支军队，征服了直布罗陀。1496 年，第三任公爵胡

安·德古斯曼(Juan de Guzmán, 1466 — 1507)出资建立了舰队和军队,从特莱姆森的穆斯林国王(Tlemcén)手里夺取了梅利利亚(Melilla)。以这个北非贸易点作为自己的领地,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就拥有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航行优势。同时,梅迪纳塞利公爵决定在自己与加的斯隔着海湾相望的领地圣玛丽亚港 (Puerto de Santa María)建造仓库和港口设施。在此发展时期,他雇佣了一位热那亚商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做出口贸易。15 世纪,通过这群人的投资和努力,西班牙的权势和财富迅速增长,形成了一个渴望从事陆地和海上国际贸易的农业商人和贵族商人社群。卡斯蒂利亚的大贵族成为积极从事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新贵族。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拒绝授予美洲人(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印第安人)世袭的贵族头衔,主要是为了保持从新大陆的封建领主那里取得国库收入。他们的外孙查理五世,授予美洲的征服者对印第安城镇的终身领主监护权(encomienda)。他也在特殊的情况下对有些政策进行变通,赐封给美洲两个世袭的贵族头衔。1529 年,他封墨西哥的征服者科尔特斯为瓦哈卡河谷(valley of Oaxaca)的世袭领主,头衔是河谷侯爵。1537 年,他任命哥伦布的孙子为贝拉瓜(Veragua,位于美洲中部)公爵,以此来换取其放弃洋海舰队统帅(Admiral of Ocean Sea)的职位,以及放弃其祖父得到的其他一些优惠条件。

25

有头衔的贵族只占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小部分,免税的贵族被称为伊达尔哥(hidalgos)。他们通过为君主个人利益,而不是团体利益服务获得这种地位。大部分伊达尔哥在国王的宫廷或机构部门、司法机关服务。另外很多免税的人群通过为王室军队服役,而不是为国家或地方军队服役获得了这种地位。贵族、他们的家人以及仆役们作为王室的臣属都有服役的义务。只有少量伊达尔哥通过购买,或为王室服役得到了世袭的免税特权地位。

为王室服役的范围很广。一个农民仅仅因为有 11 个活着的孩子就成为了伊达尔哥。西班牙北部海岸的人民在战争期间对西班牙王室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渔民或者造船工人,或者为船只提供

后勤服务,他们也成为了伊达尔哥。而且,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授予所有定居美洲的西班牙人免税的资格。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们长时间地陷入欧洲战争造成的财政困境中,于是有时候出卖伊达尔哥的地位来快速获得现金。

教士们不需要公民或者伊达尔哥的身份。进行宗教宣誓后,他们就成为教会的成员,免除所有王室和地方的税负。他们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管理,而不受镇议会的管理,他们遵守教会法规而不受世俗法律和法官的约束。每位教士都在教会终身任职,并以此拥有相应的财产并获取收入。教士形成一个独特的社群,住在城市的核心区,但分属不同的教士团体。

在任何情况下,非基督徒都没有公民身份。犹太人和穆斯林是王室的臣民,但不是城镇的公民。在12和13世纪,当犹太人从法国和英格兰被赶出来时,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新的生活,大约200多个西班牙最古老的城市和城镇有大型的犹太人社区。这些犹太社区处在基督徒的城镇里,但是按照犹太法律由他们自己的拉比进行管理。每一个地方的犹太社区都直接向国王纳税,但谈判该交多少税、收税事宜,以及向王室国库缴税的工作都由犹太首领来做,而不是通过市镇政府来完成。

大部分人从社区福利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中获取了利益和机会,但是最穷困的人群没有获益。最穷困潦倒的人,例如寡妇、孤儿、贫苦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就需要其所在的城镇和乡村议会的照顾了。整个16世纪,无地的男子数量增加很快。同庄园主签订一年期工作合同而成为有固定薪水雇员(soldados)的人很少,他们只好每天在镇上的市场做些早晨的临时工作。这些农场工人(jornaleros)经常只能找些临时工作并且工作越来越少,因为16世纪的人口增长使得劳动力越来越多。最潦倒绝望的人只好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外一个城市,希望在船厂和建筑工地上找到做“日工”(peones)的机会。根据司法记录,在城市生活的最底层中,接受施舍的无名穷人往往堕落成一个个罪犯。和大多数人生活不断好转相比,无地穷人的生活几乎毫无例外地每况愈下。

26

1517年后，其他欧洲国家由于新教改革而饱受宗教战争的蹂躏，相比之下卡斯蒂利亚将自己的国家看作是和平与宗教宽容的天堂。1575年，菲利普二世在卡斯蒂利亚全境发了些调查问卷，王室法庭收到了大约500多个城镇和村庄的回复。在这些问卷里，社区的耆老们描绘了乡村人民自信和宗教祥和的景象。

这些情形缘自于西班牙大部分小城镇的宗教状况。因为西班牙80%的人口居住在小镇和村庄里，它们大部分建立于特拉斯塔马拉王朝时期，而且人口构成很单一。居民们都是逃避瘟疫的难民以及想寻找更好机会的雄心勃勃的人。当他们一起工作，建立市政基础设施时，社区精神也同时建立起来了。他们一起清除杂草进行耕种，建造家园和教区教堂。

地方上的宗教习俗也加强了每一个社区的集体认同感。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个宗教兄弟会，该会提供葬礼服务。在发生自然灾害，例如发生蝗虫灾害时，镇上将开会向圣阿古斯丁做新祭礼来抗灾，或者在瘟疫时向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做祭礼。在宗教活动中，教区的教士们起的作用很小，因为就像赫塔菲(Getafe)村的村民解释的那样，教士们来来去去，但“只要镇子存在，镇议会就不会消失”。每年夏初，镇议会都会雇一个剧团来进行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剧目的表演，同时分发慈善品，管理为祭奠死者做弥撒而捐献的资金。镇议会不让宗教分歧干扰商业活动。梅迪纳-德尔坎波城在周三和周日按规定开放市集，在周六遵守安息日的规定。镇议会制定这种日程是为了和其他镇上的市场竞争，吸引非基督徒的商人。

与此相比，城市则陷入了宗教争端之中。尽管这些纷争都以宗教和思想争论的形式出现，但大多要归因于权力斗争。15世纪中期，很多犹太人归化为基督徒。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君主们通过授予王室和教会职位来鼓励这种宗教归化。这些新的宗教归化者要求和其他基督徒一样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包括公民权利和担任市政公职。原来的精英阶层和老基督徒们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针对这种获得平等权利的期望，他们设立了重重障碍。

27

市政公职是大部分人获得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最佳途径。1449年,当托莱多市议会通过法律禁止那些祖先是犹太人的公民担任政府公职时,争夺城市公职任职资格的冲突在一场税收纷争中爆发了。议会声称该法令是他们采取的保护基督信仰的措施之一,因为那些归化者有可能重新改变信仰。当时,托莱多市的许多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税收员,都是归化者。教皇和国王也不赞成这种"血统纯洁"法案。但是在15世纪下半叶,此法案在市里通过了几次。到1566年,国王也开始赞成了。这个法案并未能够完全禁止归化者远离市议会,只是让这些职位更贵,更难以购买。那些通常被认为或者被怀疑有犹太血统的人仍可以继续购买市议会的议员席位,以及从王室市政机构获取税收豁免权。这种豁免权被称作"伊达尔吉亚斯"(hidalguías)。

当各地大教堂牧师会与当地主教或者大教堂教士长展开权力斗争时,托莱多以及其他城市的宗教紧张情形加剧了。例如对宗教归化者以及下层社会成员的歧视经常影响到托莱多等地大教堂的教规牧师(canon priests)的态度。15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君主开始窃取牧师会提名主教的权力,为避免只从贵族家庭提名高级教士而使其权势过于强大的问题,开始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中提名主教人选。16世纪中期,大教堂教士团中许多成员都是宗教归化精英家族的成员,他们痛恨新大主教胡安·马丁内斯·德西利塞奥(Juan Martínez de Silíceo)粗鲁和强硬的风格,他们将此归咎于其非贵族的出身和外国教育背景。这个不受欢迎的大主教和那些不妥协的教士们就一项新候选人的任命资格上开始了漫长的争吵,并互相蔑视。大主教想剔除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最后,他们互相妥协,将与对方背景相同的人都开除了。新的大教堂条例规定,将来只有上层社会和老基督徒出身的人才能担任大教堂职位。

无论修士们在何处布道,紧张局势都在酝酿。14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宗教归化随着城市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而来,而方济各会修士号召让犹太人全部归化,更使暴力行为加剧。15世纪,游方的多

明我会修士引发了袭击新的宗教归化者的骚乱。于是在 1478 年，国王为了消除针对新宗教归化者的暴力行为，成立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这种宗教法庭到达一个城市或镇子后，要求基督徒忏悔他们的过失，强迫苦修，然后利用从这些自愿的忏悔中得来的信息逮捕和审问其他人。从 1540 年(西班牙全境相关情况有文献的最早时间)到 1700 年，宗教裁判所共裁决了 4.4 万件案子，平均每年 275 件。从 1560 年到 1614 年，宗教裁判所在其活动的高峰期共裁决了 2.2 万件案子。在缺席或已死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由画像代其接受惩处的案犯占受审人的 2%，实际受罚的案犯占 2.3%。阿拉贡王国的宗教裁判所执行惩处的比例最高，占到总执行人数的 29%。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宗教裁判所的庭长，他说服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于 1492 年将犹太人驱逐出了西班牙。

28

宗教裁判所努力捍卫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的信仰和实践。当时，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穿梭于各座城市之间，成功地使他们誓使所有西班牙人归化基督教的宗旨深入人心。但宗教裁判所从未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托克马达还根据宗教裁判所进行审判时搜集的资料得出结论：没有归化的犹太人在积极鼓励归化者再次改宗。于是两位君主决定，保护归化者的唯一方法就是驱逐犹太人。因此，他们于 1492 年 1 月颁布王室敕令，勒令所有犹太人要么归化基督教，要么在 1492 年 7 月底之前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大约有一半犹太人很快就归化了，但还有一半(约 5 万人)却选择离开，经由海路或陆路前往葡萄牙、西法边境处的纳瓦拉(Navarre)，或者北非。此后，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不再满足于仅在西班牙进行传教活动，又把范围扩展到了非洲——帕洛斯的拉比达(La Rábida)修道院对此事尤其热情。而当这项传道计划失败后，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美洲。

与此同时，两位君主还调集大量资源，全力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仅存的穆斯林政权——格拉纳达王国。他们做出征服格拉纳达的决定是出于商业扩张的考虑。一直以来，西班牙都是欧洲的一个海上强国，到

15世纪末，它已经成为大西洋航海探险的领导者。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特拉斯塔马拉王朝想要染指与亚洲的贸易。斐迪南的阿拉贡王国将势力范围向东扩张到地中海一带，打响了与意大利的热那亚的海上争夺战，目的在于控制前往科西嘉岛、撒丁岛和西西里的航路。斐迪南还亲自发动了一场领土征服战争，为阿拉贡夺得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地盘。

而卡斯蒂利亚王国则不同，它的渔船和商业船队正向西往大西洋沿岸扩张。虽然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都拥有港口，但王国的船只如果要经由直布罗陀海峡把货物从地中海运送到北欧的港口，就会碰到两重有力的阻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格拉纳达，以及大西洋上的葡萄牙舰队。

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统治者们在经济方面有很充分的理由来维持与格拉纳达王国的盟友关系，因为格拉纳达的国王每年都会把王室收入的四分之一，约1.2万达布隆金币[①]，作为贡赋交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此外，1279年签署的一份条约使热那亚的一个商团获得了垄断格拉纳达的海港马拉加的贸易的权利，而卡斯蒂利亚与北非之间的贸易往来经由格拉纳达和意大利商人从中穿针引线，进行得十分顺利。

29

相反，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则有充分的理由来控制格拉纳达。首先，他们想要保护西班牙船只免遭同时来自北非的海路攻击和来自格拉纳达的陆上攻击。而更为迫切的是，相传格拉纳达和马拉加的丝绸市场极为繁盛，这让两位君主非常看重征服那里的市场所带来的潜在商业利益，而不是那份四平八稳的年贡。怀着这个目标，从1482年开始，他们每年在适合作战的季节都对格拉纳达发动攻势。但一直到1485年末，卡斯蒂利亚所采取的正面进攻格拉纳达城的策略始终未能成功。征伐的路上还有很多堡垒和屏障，无法快速行军，而且作战时间始终无法持续，因为在敌方土地上不太可能维持一条过长的供给线。

---

① Doubloon，古西班牙金币名。——译者注

不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最终将格拉纳达城与其各处海港以及环城的农村地区隔离开来。1487 年,他们围攻并占领了马拉加,将城中近 1.5 万名顽强抵抗的市民贬为奴隶。格拉纳达的臣民们很好地吸取了这一战的教训。随着基督徒的军队攻占了一座又一座海港,格拉纳达的民众也先后逃往非洲。这座城市最后不战而降,并得到了优厚的投降条件。投降的穆斯林统治者于 1492 年 1 月 2 日向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移交了统治权,卡斯蒂利亚的君主们于 1 月 6 日正式进入该城。

胜利者们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清算这里的财富。王室财政大臣埃尔南多・德萨福拉(Hernando de Zafra)花费了大量精力清查格拉纳达城内及郊区的各类财产,全部工作直到 1497 年才完成。这次清查确认并评估了每一所被逃亡的主人遗弃的房屋、每一块田地、每一笔税目和资金,以将它们完整地移交给战争的胜利者,并为重建这座城市提供基础。

两位君主按照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分派制度"(repartimiento)对战利品进行了分配。两位"天主教徒国王"将格拉纳达城中原来属于穆斯林王室的所有赋税、土地、宫殿、要塞和城墙都划归王室所有;将原先用于供养伊斯兰宗教和慈善活动的基金分给了教会;并将诸如穆斯林公墓、牲畜和鱼类市场、水源、喷泉、公共浴场、下水道系统、街道和城郊的牧场和荒野等公共财产划归格拉纳达市政当局。这些公共设施成为公共财产,归市议会所有。最后,两位君主把被遗弃的土地和房屋分配给各个征服者。市政当局和王室君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完善和调整分配方案,因为总有意想不到的需求和被低估的资源不断冒出来。

分配完战利品之后,征服者们开始往被征服的城市中移民。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到了格拉纳达,将原属穆斯林的各幢建筑物据为己有。第二任滕迪利亚伯爵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到这里与他团聚,一同在伯爵接受王室任命担任长官的阿尔汉布拉(Alhambra)安了家。 31
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是他们在新家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后来成为新西班牙的总督,即国王的代表。

30



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对格拉纳达王国的征服断绝了这个穆斯林王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年向卡斯蒂利亚王国上交的贡赋，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种经济上的紧迫需求体现在他们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结成商业合伙关系而签订的《圣菲条款》中。从条约里可以看出来，他们甘愿冒极大的风险，迫切地想寻找到通往亚洲市场的道路。

按照投降协定，格拉纳达的伊斯兰居民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法律、习俗。但是他们通常缴纳给穆斯林统治者的税现在交到了基督教君主手里。在这一过渡时期，穆斯林官员和基督教王室官员合作管理城市。所有证据都表明，王室执政者对穆斯林很宽容，并试图调合城市里两种文化的人群。而且很明显，穆斯林人口超过了基督徒。

到 1497 年，格拉纳达的基督徒已经多到可以建立自己的市政政府了。1497 年，市议会会议第一次召开，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这个城市一直未能繁荣起来。

1499 年末，当新任托莱多大主教、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门内斯·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访问格拉纳达并给穆斯林婴儿施洗礼时，矛盾首度爆发了。穆斯林认为这是违反和平协定的行为。一些被激怒的穆斯林发动骚乱并杀死了两个治安警察(Sheriff)。滕迪利亚伯爵外交介入后，城市骚乱才停止。但是这时暴乱已经扩展到附近的山村。由斐迪南国王直接指挥的王室军队最后镇压了这次起义。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认为，先前的协议已经无可挽回地被这次起义破坏了，因此要求当地穆斯林在 1501 年前归化为基督徒。穆斯林选择移居到非洲，而不是归化为基督徒。格拉纳达被征服前的人口大约有 10 万，此时开始下降了。

1507 年，这个城市遭到台风的蹂躏。台风夺去了大主教埃尔南多·德塔拉韦拉(Hernando de Talavera)以及滕迪利亚伯爵的夫人和最小儿子的性命。1512 年，格拉纳达的人口下降到 8 万左右，并且在 16 世纪继续下降。基督教征服格拉纳达后，将其从伊比里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的首都变成了一个被打败的、极度分裂的边缘地区，远离卡斯蒂利亚政治生活中心。

1400 至 1580 年葡萄牙进行海上扩张的秘密在于它与意大利模式大相径庭。不像意大利那样通过商业财团开展业务，葡萄牙人利用王室特许权进行扩张。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授权进行每一次航行，并为航行任务选择船长。航行成功后，国王和船长分享利润，船长再将他这份利润分给其他船员。

就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一样，葡萄牙商人并不将贸易站点看作是殖民地。站点上只有少量驻军和王室行政管理人员，保护商人们到达、卸货、装货并离开。在非洲、印度、南亚、日本和巴西，葡萄牙人都建立了这种没有成户的居民、平民居住区和市政管理机构的贸易站点。

15世纪，葡萄牙利用这种模式在大西洋进行扩张。1415年，王子——"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在夺取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休达(Ceuta)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此后资助进行了在大西洋和沿非洲西海岸的商业探险航行。其中一艘船最早从几内亚(Guinea)带回了奴隶和黄金。1448年，亨利在阿尔金岛(Arguin，位于今毛里塔尼亚)建立了一个军事堡垒和仓库。几年以后，这个贸易站点在开拓几内亚商贸活动上很成功。根据一位意大利旅行者的记载，许多葡萄牙船只每年运来小麦、衣物和马匹，运走黄金、700至800名奴隶、丝织品和棉布。但是在非洲海岸，葡萄牙人无法通过武力获取领土。当地的武装土著人乘着小木舟，不断地袭击想要登陆的葡萄牙船员，阻止他们到达岸边。

葡萄牙人并不试图征服当地人，相反，王室和当地统治者通过谈判获取非洲港口和欧洲商人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利。撒哈拉港口萨非(Safi，位于现在的摩洛哥)是最重要的市场，也是从非洲内地运来羊毛原料并购回盐和羊毛织品这一穿越沙漠长途驼队商路的终点站。葡萄牙人在此地获得了同欧洲贸易的专有特许权。1454年，当热那亚商人试图前往萨非做生意时，那里的葡萄牙法官认为他们违反了特许贸易权，并判决砍掉了他们的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父亲此后几年在萨非做羊毛生意时，一定从葡萄牙人手里购买了贸易特许权。

1480年，通过谈判，葡萄牙国王约翰在几内亚内陆一个土著人的金矿旁建立了一个贸易站点。当地的头领答应给予葡萄牙人在这个地区的独家贸易特许权，并允许约翰建立一个武装的贸易站点：矿山的圣乔治(Saint George of the Mine)[①]。仅这一个站点的利润之丰厚就

① 葡萄牙语名为 são Jorge da Mina(圣若热-达米纳)。——编者注

形同传奇。由此，其他欧洲君主都深信：在和海外政府打交道时，王室的支持和保护对生意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

王室贸易垄断权收获了巨大的利润。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嫉妒葡萄牙人在西非的贸易垄断权。卡斯蒂利亚国王尤其如此，他开始和葡萄牙竞争并模仿他们。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进行其美洲探险事业时，将葡萄牙人最关键的成功经验都融入到其合同中。1492 年 4 月 17 日，在一个名叫“圣非条款”(Santa Fe Capitulations)的合同中，斐迪南、伊莎贝拉和哥伦布结成贸易合伙关系来进行和亚洲的商业和贸易。

作为君主惟一的合作伙伴，哥伦布有权利在去亚洲的航行中提供八分之一的货物，并获得八分之一的利润。君主决定航行的目的地和路线，任命哥伦布来指挥这次航行和管理货物贸易，提供船只、船员、补给品和货物等。国王和女王提供给哥伦布一封给亚洲统治者的介绍信，并授权他代表卡斯蒂利亚君主和这些亚洲统治者进行贸易谈判。因此，从一开始，西班牙人的远航就不是按照传统的热那亚模式进行的。他们不是一群商人结成的商团与统治者签订商业合同，而是统治者之间在签订商业协定。意大利海外扩张的“旧世界”还没在美洲开始就已结束。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选择了葡萄牙模式。

33

哥伦布在第一次航行中使用了葡萄牙模式。1492 年圣诞节时，机会来临了。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在埃斯帕尼奥拉岛(La Española，今作伊斯帕尼奥拉岛，包括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搁浅了。哥伦布和船员们抢救出了大部分货物，但是剩下的两艘船“尼尼亚”号和“平塔”号没有足够的舱位送每一个人回到西班牙。于是哥伦布建立了一个贸易储运站点，将它命名为“拉纳维达德”(La Navidad，意为“圣诞节”)。他的这一举动与葡萄牙人的作法惊人地相似：哥伦布出发前往西班牙，留下商品、装备、补给品和 38 位船员，他们由舰队司令指挥。不论是留在“拉纳维达德”的，还是回到西班牙的，所有人都是西班牙王室的受薪雇员。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害怕葡萄牙人干涉他们将要开辟的去亚洲的航线。因此，当哥伦布于 1493 年进行第二次航行时，他们坚持派骑兵来

保护这个贸易站点。但是,当哥伦布回到"拉纳维达德"时,他发现所有的欧洲人都死了。那些被哥伦布描述为温顺而友好的当地印第安人变得满怀敌意,并善于战斗,就像和葡萄牙人进行战争的非洲人那样。哥伦布第一个迅速反应就是使用骑兵来对付印第安人,但内地崎岖不平的地面对马匹造成了很大伤害,并在西班牙人内部引起了极大不满。

哥伦布放弃了"拉纳维达德",重新建立一个贸易站点,名叫"伊莎贝拉",以献给伊莎贝拉这位王室赞助者。他在这里建造了石头结构的房子作为王室仓库,所有贸易都由王室垄断。哥伦布不仅担任舰队总帅,而且作为王室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商业代表还有权利得到贸易利润。第二次航行中的 1 200 个受薪雇员不得不从王室仓库里购买欧洲自产的食品、装备和衣服等。这种作法学的是"矿山的圣乔治"的模式。

王室贸易垄断、贸易站点加受薪雇员的模式很快结束了。从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进行远航,到 1506 年哥伦布去世,这一时期是新旧大陆的接触中最复杂和多变的时期。在最初的几年里,西班牙国王开始慢慢适应美洲的实际情况。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重新调整了他们和哥伦布的关系,改革了贸易政策,并对美洲的西班牙和印第安人定居点进行改革。他们对美洲大陆的了解不断加深,这就迫使他们结束旧的欧洲探险和扩张模式。

到 1494 年初,一支从伊莎贝拉贸易站点返回的补给船队带来一份报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据此认为,葡萄牙的探险模式不适合美洲大陆。他们已经派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远航,目的是将贸易站点扩展为一个供应站。但是很显然贸易站点的欧洲人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草料来满足自己和马匹的需要。他们种植的欧洲谷物根本不能成熟,而在加勒比的热带气候下,国王从西班牙运来的粮食在运送途中就腐烂了。

34

西班牙国王马上进行了改进。意大利和葡萄牙每 4 年或 5 年派 1 至 2 艘货船到贸易站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开始每年派几艘船。从 1494 年 2 月到 1496 年 10 月,他们派了 4 支补给船队穿过大西洋到新的贸易站点。这种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稳固的联系成为西班牙殖民征服的一个显著特点。从 1492 年起,除了 1497 年,每年都有从西班牙到美

洲的船只。这种持续的交流将美洲、非洲、欧洲(以后还有亚洲)联系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世界。

另外一个变化发生在哥伦布和国王之间的合作协议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想让哥伦布找到一条从新大陆到亚洲的新道路,但是他们意识到哥伦布没法同时兼顾这项使命和照顾好他们的合伙生意。从美洲归来的人所写的报告里记述了哥伦布对王室仓库管理不善,以及他和西班牙人、印第安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这让西班牙君主非常不安。因此,1497 年末,他们拖延续签 1498 年、1499 年和 1500 年的圣菲条款,直至审计完最初两次航行的账目。

面对美洲的新现实,西班牙君主们又进行了创新,圣菲条款延期续签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塞维利亚批准建立了合股公司来资助在南美的探险活动。王室君主是主要的股东,同时邀请安达卢西亚的投资者购买这个非法人企业的股票。这是一种新的集资形式,之后成为法国、荷兰、英格兰等国在新世界的公司模式。1497 年,在塞维利亚召开了股东大会,就远征队如何在新大陆的沿海地区探险、绘图和进行殖民做出部署。这个新大陆被哥伦布称为“另一个世界”。到 1503 年,不同的西班牙船长指挥了 11 次远航,并绘制了从现代巴西到巴拿马的南美和中美洲海岸的地图。几百位西班牙男女已经在这些远航中移民到了这些地区,但是他们也由于船只失事、饥饿、疾病以及和美洲土著的战争而大量死亡。

埃斯帕尼奥拉岛食物短缺的紧迫情况意味着从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港出发的补给船队不能因等待远在加勒比的哥伦布来投资其股份而再耽搁下去了。在 1497 年给哥伦布第三次远航的指示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制订了计划,决定以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所采用的同样模式在美洲进行殖民。在哥伦布的第三次远航中,30 名西班牙农民随行到达埃斯帕尼奥拉岛,种植欧洲农作物来养活贸易站点的雇员,并为补给船只提供食物。他们希望这些船只会很快和亚洲大陆进行贸易。

35

西班牙王室指示哥伦布建立常设的自由镇。这和贸易站点完全不同,这里有作为自由人的农民和公共土地,西班牙妇女也被要求带到这里。我们只知道四位最早来到这里的西班牙妇女的名字和身份:塞维

利亚的卡塔利娜(Catalina de Sevilla),一个名叫佩德罗、来自萨拉曼卡(Pedro de Salamanca)的士官的妻子,陪其丈夫来到这里;塞戈维亚的格拉西亚(Gracia de Segovia)大概单身并独自远行到这里;埃及的卡塔利娜(Catalina de Egipcio)和埃及的玛丽亚(María de Egipcio),两个吉普赛女人,她们被判犯了谋杀罪,移民到美洲做10年无报酬的服务,王室许诺这样就可以改判她们的罪行。

这时,西班牙王室对哥伦布管理能力的怀疑愈发加重了。1498年,第三次远航的殖民者刚登陆就造反了,因为哥伦布试图阻止他们建立新城镇。哥伦布不希望建立新城镇,因为镇内的自由市场将会构成对其贸易垄断权的威胁。哥伦布试图和新的殖民定居者谈判,保护他在公司仓库的利益。这个仓库已经移到了南部海岸的一个新镇: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但是矛盾很快爆发了。因为在西班牙定居者看来,这是一项不容谈判的事情。他们相信西班牙城市运作的传统已经包含在了合同之中。这次反抗行动赢得了岛上的最高司法官的支持和领导,他是哥伦布任命的上诉法官,名叫弗朗西斯科·德罗尔丹(Francisco de Roldán)。

殖民者向王室抱怨说,哥伦布一直极力决心通过公司仓库控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阻止自由市场发挥作用。这使得王室于1500年派了一个调查法官来到这个岛上。他解除了哥伦布的职务,把这个舰队统帅以及他的兄弟们送回西班牙,接受王室的审判。王室逐步恢复了哥伦布的一些职务和特权,但是任命了新的行政长官和新的经理人。

另外,对前两次远航进行审计后,王室对哥伦布经商能力的信心也被彻底摧毁了。这种失望促使王室任命了新的贸易站点经理费尔南多·德蒙罗伊(Fernando de Monroy)。1500年,一支庞大的船队护送新行政长官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前往埃斯帕尼奥拉岛。哥伦布和他在塞维利亚的热那亚承包商们负责选定了船队所载货物中属于他们的那八分之一,这些货品包括厚英格兰羊毛。1501年末,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就蒙罗伊不接收这些货物做了如下评论:"按照

合同,作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八分之一份额而发给你们的货物的情况,通过你发来的信,我们都知道了……因为这些货物很难快速卖出去,并且定价太高,所以你拒收这些货物是很对的。"一句话,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清楚地了解加勒比海气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哥伦布和他的意大利同伴们却仍旧试图去做欧亚贸易中传统的羊毛衣物生意。

36

到了1501年,王室坚持让加勒比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城镇里:"从现在起,我们希望埃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基督徒们不要分散居住,我们应该确保没有人在城镇外居住,这些城镇建在这个岛上,每人都应在他们的土地上拥有自己的小屋或住所,这样去查看或耕种土地时,他们就有地方可住了。"此时,王室的政策将建立自由城镇作为最迫切的问题。王室垄断权带来的利润、哥伦布的合约、公司仓库等,所有这些都让殖民者们难以忍受。他们来到这里本来是想成为西班牙城镇的自由公民,并且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农场作为私有财产,居住在城镇核心区,那里有自由市场可以出卖自己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并且通过民主的镇会议和每年选出来的镇议会来管理他们自己、管理市场以及公共设施。

王室所有的公司仓库以及贸易垄断权一直是抑制移民的因素,同时也阻碍了对殖民地进行和平治理。1503年,殖民者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控诉公司仓库无用的货品和其超高的价格。这年年末,王室最终得出结论:只要殖民城镇不能在自己的市场上买卖欧洲商品,殖民事业就不能够成功。他们认为城镇比利润更重要。

1500年,当和哥伦布的合伙关系合同到期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没有再续约,同时也没有和其他商人再签订类似合同。美洲贸易的风险太大了,不能仅由少数个人和合股公司承担。只有进行大规模的跨大西洋交通和贸易才能带来利润。因此,王室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投资者。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废除王室的贸易垄断权,并向西班牙人开放对美洲的自由贸易。1504年7月28日,实施这一决定的王室敕令生效。王室不再从贸易垄断的合伙关系中获取利润,而是向途经由王

室严格管理的西班牙和美洲港口的旅客与商人征收王室费用和进出口税。1505 年 3 月 5 日，斐迪南国王向西班牙的外国居民开放了对美洲的自由贸易，条件是他们在美洲的合作伙伴和代理人必须是西班牙王室的臣民。

对于哥伦布来说，这是最不友好的一个打击。1504 年他回到了西班牙，1505 年他不断地给在宫廷任职的儿子迭戈(Diego)写信，猛烈攻击自由贸易并抱怨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向西印度地区发货，而不需要再和他签订贸易合同或者做他的合伙人。他指示迭戈游说在宫中的朋友，试图令王室收回自由贸易的法令。但是王室拒绝了。自由贸易仍是西班牙在殖民地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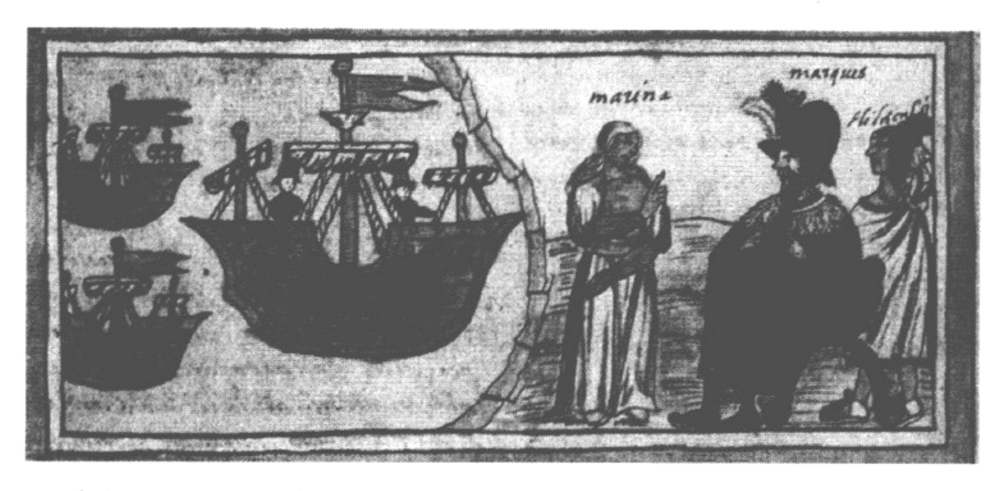
37

王室贸易站点变成自由的市镇，公司仓库变成城镇市场，这种变化吸引了新型的定居者。新的殖民城镇和不断增加的家庭数量改变了西班牙贸易的性质。以前货舱里装满武器和火药的船只，现在开始运来家庭生活用品。例如 1509 年，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Diego Alvarez Chanca，约 1463－1515 年)博士和他的妻子安娜·德苏里塔(Ana de Zurita)在塞维利亚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向殖民地进行出口贸易。他们的装货单表明，自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开始其新殖民地贸易政策的 10 年间，变化有多么大。现在出口货物包括女性的衣服和化妆品：已婚妇女的帽子，女士的围脖、发网和内衣等。昌卡博士和他的夫人还发了一些照顾病人的货物(这通常是妻子的责任)，例如 150 盒椁药膏(这是一种著名的泻药)，以及 10 桶葡萄酒，3 桶上好的面粉，2 桶蜂蜜，药草以及药品等。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情况，富有创造力地、正确地做出了反应。这种革新源自美洲的现实环境、土著人与欧洲人的互动，以及加勒比地区一年又一年不断开创出来的美洲新世界。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就落后了，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506 年哥伦布去世时，他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实行贸易垄断权的旧世界已经消失了。他未能在新世界的自由市场中寻找到和以前同样关键的角色。当西班牙人的利益已经转移到墨西哥大陆时，加勒比海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已

经完成了创新。那时，这些殖民地已经成为一个家庭农场的新世界，这里有夫妇和孩子们组成的家庭、地方民政机构和自由贸易。

即使最富有造反精神的卡斯蒂利亚人也很关心市镇社会和公民身份问题，其程度之深可以从科尔特斯探险队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历史学家现在承认：探险队决心向墨西哥城（特诺奇蒂特兰）进发，并和蒙特祖马皇帝对抗，这是违背在古巴的王室长官命令的行为。这些人不听长官的命令，在探索完海岸以及救援被困为奴隶的西班牙人后拒绝回到古巴。他们违背长官的命令，在韦拉克鲁斯建立一个城镇，自己成立了一个政府，并且直接向查理五世皇帝陈情要求获得承认。他们没有组建一个国家、王国或者帝国，而是建立了一个卡斯蒂利亚王国城镇公民都熟悉的市镇政府。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国王想让他的美洲领土都成立城镇政府。他们也需要一个借口来拒绝长官的命令，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即向墨西哥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进发。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决心建立一支城市武装。为此，他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市政政府，这就是他们要建立韦拉克鲁斯城的原因。



在今天的墨西哥海岸登陆后不久，埃尔南·科尔特斯就见到了一个阿兹特克皇帝派来的使者特利兰卡尔奎(Tlillancalqui)。科尔特斯要借助玛琳娜（又叫玛琳奇）做翻译。在这幅画中，科尔特斯被刻画成一位侯爵，这是他征服阿兹特克帝国都城之后获封的头衔。

科尔特斯计划建立一个城镇，由此可以成立市镇民兵，来攻击特诺奇蒂特兰，但是这种造反行为在其西班牙同伴中引起了争议。长官选

38

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ázquez)的盟友想回古巴,理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这次远征的目标。他们指出:总督并未授权探险队建立一个定居点,这和科尔特斯在古巴宣称的不一样。总督的书面命令只是让科尔特斯及其探险队探索海岸以及赎买那些因船只失事而被印第安人抓作奴隶的西班牙人。探险队里持异议的成员还说,他们缺乏补给品和人员进行定居,他们将来也不可能从古巴那里得到支持。科尔特斯似乎也认可这种观点。

但是科尔特斯和他的盟友秘密决定抵制任何企图放弃墨西哥大陆的行动。他们和探险队的每一个成员单独进行谈话,劝说他们投票赞成举行镇会议。晚上,几个头领去劝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指出探险队仅仅探索和赎人,而不进行殖民拓居,是没有意义的浪费行为;但是进行殖民拓居又违反了总督的命令,这是违法的事情。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城镇议会并且请求国王承认,这样就可以绕过总督的管辖权力。科尔特斯的盟友劝说迪亚斯道,如果大家在镇议会上选举科尔特斯做市镇民兵的头领,那他就不是总督任命的指挥官了,(他就可以)“以国王的名义行动,并向国王,我们在卡斯蒂利亚的主人,发送消息了。先生,一定投下您这一票吧,这样我们所有人就可以一致选举科尔特斯做首领,因为这符合上帝的旨意,也符合国王——即我们的主人——的旨意”。

翌日,他们召开会议,并要求科尔特斯建立一个城镇。这些人抱怨说,他们被骗到这里来了,科尔特斯在古巴宣布他将要去殖民拓居,而不是来赎人的,因此他们要求,以上帝和国王的名义,马上进行建立一个城镇。他们还进一步提出这样做的理由:当地土著不会允许他们和平地来此拓居,而如果这些地方被西班牙人占领并居住,岛上其他的士兵就会来支援他们。他们还说,贝拉斯克斯总督故意把他们像个傻子一样指挥得团团转,就是由于总督宣称从国王那里得到决定是否移民拓居的权力,但实际上正好相反。最后,反叛者们宣称,他们“想要定居在这里,任何不想待在这里的人都可以回到古巴去”。

39

最后科尔特斯同意建立一个城镇,但却是在大家的三催四请之下,

做足了西班牙谚语中所说的"央求我做其实我愿意做的事情"的戏之后,而且还提出条件:大家选他做临时的法官和军事长官。此外,扣除给王室的五分之一,他们得到的所有黄金中他要拿五分之一。最后一个条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因此延长了几天。但是人们为了建立这个城镇,最后还是同意了科尔特斯的条件。然后,一个王室公证人迭戈·德戈多伊(Diego de Godoy)起草了一封给国王的信,在信中,他们用最忠诚和传统的措辞解释了他们的叛乱行为:"对于我们来说,以您,我们尊贵的国王的名义,建立并且居住在一个带有法庭的城镇是较好的做法,这样您就可以像在您的其他王国和领地里那样,也拥有此城镇的主权。一旦西班牙人定居在此,就增加了国王陛下您的领地和财政收入,很荣幸您赐予我们以及将来的拓居者一些光荣。"

科尔特斯随即着手建立这个城镇。今天它依然矗立在墨西哥城东边的墨西哥湾上。他任命了一些市政官员:两个法官、一个治安警察、一个司库、一个会计和若干镇议会议员。他还树立起来一个代表正义的圆柱和一个绞架,作为镇上的司法象征。他将这个镇命名为韦拉克鲁斯(意思是"真十字架"),因为他们在1519年4月22日耶稣受难节那天于此地登陆。这些创始公民们开始修缮房屋,同时在周边地区勘察,和大约30个印第安小镇建立了联盟。

叛变之后,这些人试图通过像市镇那样生活获得合法性。镇议会开会并要求科尔特斯向他们展示总督贝拉斯克斯派遣他来这块大陆任职的书面命令。但是他们发现科尔特斯的任命有效期限已经过了,他不能再行使上诉法官或者军队首领的权力。议会认为自己现在是大陆上惟一合法的西班牙人政权机构,于是它任命科尔特斯为镇民兵的首领和临时法官。他们向国王发了一封信,解释他们的行为:"我们任命了科尔特斯……并且接受了他的宣誓,他将为陛下您服务,我们以您的名义,在镇会议和议会上任命他为临时上诉法官以及民兵首领。"

这封信走了大约6至7个星期才到达西班牙。在此期间,科尔特斯和他的探险队同伴们开始建造新城镇的核心居住区,以此证明他们已经建立的新的城镇机构的合理性。迪亚斯曾这样记述:"从科尔特斯

40 到每一个队长和士兵，都用努力的劳动迅速完成了城镇和军事要塞的修建。科尔特斯第一个开始挖掘土石大地基，其他人有的打地基，有的砌墙，有的运水，有的在石灰坑劳动，有的造砖瓦，有的寻找食物，有的锯木板，有的打铁，因为他们有两个铁匠。这样，我们不停地劳动，印第安人也来帮忙，直到教堂和房屋的屋顶造好，栅栏搭建完成。"城镇建好后，镇民兵就收拾起他们的装备和行头，和他们的印第安同盟们一道向内陆进发，向特诺奇蒂特兰进军。

任何没有机会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城市的征服者都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出现了。通常来说，当基督徒们征服了一个穆斯林城市，他们一般受制于已有的城市格局。因此，在卡斯蒂利亚有两种类型的城市，一种是从穆斯林手里夺取来的没有核心区域的城镇，例如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马德里等。另外一种城市是新建的城市，按照古代罗马的风格，其市中心是一个大广场。我们通常将格拉纳达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城市，而西班牙人自己则认为这些穆斯林城市群不合乎常理，不停地试图对它们加以修正。格拉纳达市议会记录描述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拓宽和拉直大街，合理布局街区以及开辟宽敞的四方形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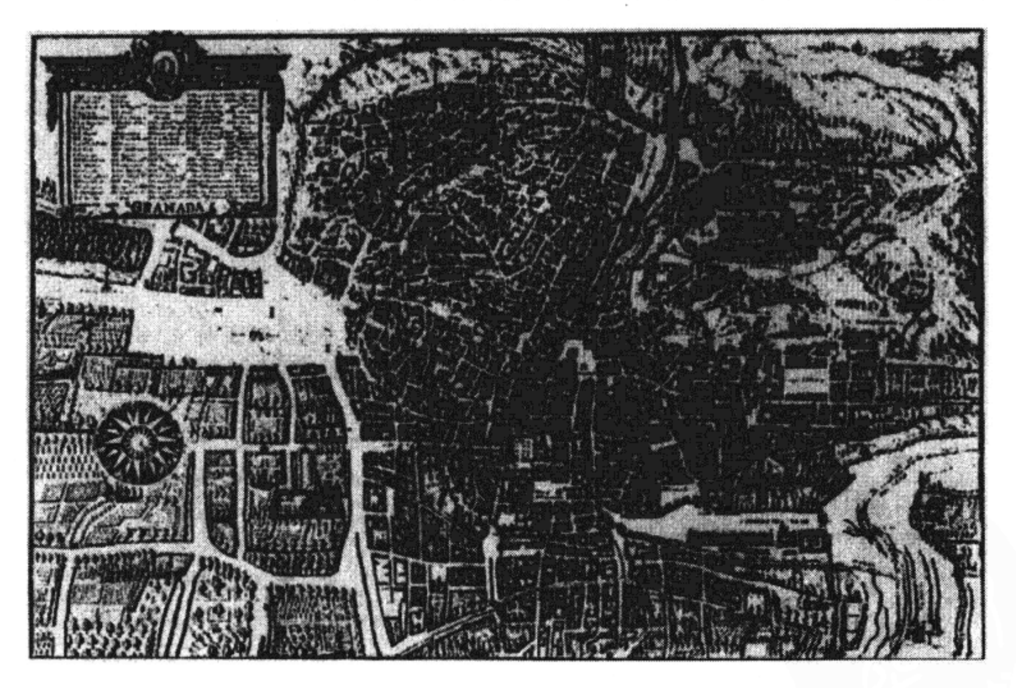
格拉纳达被征服后，新的市议会马上建立起来，他们建造了一个四方形的广场，拓宽了大街。穆斯林城市在城墙里没有开放的市场，他们的商人利用城墙外的空地做牲畜生意。在城墙里面，商贩和工匠利用住房的底层做商店，进行贸易。街道通常狭窄而弯曲，只能通过人力和驮兽才能把货物运进来。穆斯林时期的格拉纳达商业区是埃尔比利亚(Elvira)大街，它从城门一直通到市中心的丝绸和小麦交易市场，这里的街道狭窄而拥挤。

穆斯林离开这里以后，市议会决定在城门比夫兰夫拉前开辟出空地，建造一个真正的卡斯蒂利亚式的广场。为了完成此项工程，需要拆除现有的房子和商店，以便腾出地方，并且还需要为此赔偿房主们。这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也付出了一大笔钱。为了建广场，通常的做法是议会任命 4 个议会成员陪同王室上诉法官对将要拆除的建筑物等进行巡

视，估算其价格，以便赔偿其房主。但是比夫兰夫拉广场很快被发现不够大。每当广场开放了一块新地方，马上就挤满了商贩的摊位。

西班牙中世纪城市为商业活动方便而设计，这一传统为新世界的城市所继承，新旧世界城市之间的继承性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因此历史学家似乎对格拉纳达和墨西哥城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感到吃惊。然而，科尔特斯探险队的成员都太年轻，没有参加过征服格拉纳达的战争。而且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城市似乎和墨西哥有更紧密的联系：墨西哥大部分商业和行政模式源自塞维利亚，而墨西哥城的新规划设计模仿自托莱多城。但是 30 年不过是历史一瞬，有好几个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自称他们的父亲或者祖先曾参加过征伐格拉纳达穆斯林的战争。有理由相信，科尔特斯探险队的成员在重新规划和建设墨西哥城时，脑海里有格拉纳达的影子。我们有必要提到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这个人，这种传统的继承性在他身上体现得很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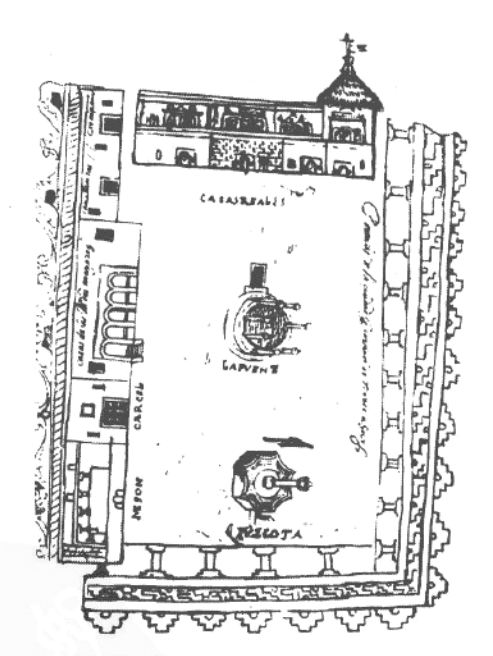


1497 年，基督徒组成的市政议会开始运作，它推行了一项使格拉纳达的城市景观大大改观的举措：建立了中心市集比夫兰夫拉广场(图下方正中位置)。这个广场紧邻丝绸市场和市政厅，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中心。后来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下令当众焚烧《古兰经》和其他穆斯林书籍时，就选在了这里焚烧示众。

清楚。1513 年,年轻的安东尼奥·德门多萨是格拉纳达的市议会议员,他已经学会了按照卡斯蒂利亚传统来建造广场和拓宽大街的技术。1535 年,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作为新西班牙第一任总督来到韦拉克鲁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导墨西哥城的市议会拓宽和拉直城市大街,沿着广场四周建造有棚盖的柱廊,以便下雨时供摊贩们避雨。

征服战争同时也摧毁了它想得到的战利品。胜利的征服者们摧毁了城墙、建筑物、桥梁、供水系统以及民众。因此,征服者有多大能力来重新建设城市,恢复人口水平和进行良好治理,决定了这些被征服的城市是否值得去占领。1521 年 8 月,格拉纳达陷落 30 年后,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人重建了这座被征服的城市,重新组织了政府,使被征服的民众皈依为基督徒。西班牙人对一个城市该是什么样子,脑海里有一个清晰的理想蓝图,他们就按照这个蓝图来重建了格拉纳达和特诺奇蒂特兰。这是两个相同的行为,但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我们对被征服的城市抱有不同的感情。

42



在西班牙人与阿兹特克人初次相遇的 60 年后,特拉斯卡拉的集市已经融合了西班牙的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市政厅、监狱、酒馆和王室派驻机构的办公室环绕在公共喷泉和正义之柱四周。建筑风格结合了西班牙和美洲本土的装饰性元素:市政官署的屋檐是欧洲风格的,而广场其他各面的私人建筑则展现了鲜明的本土特色。

据说,相比格拉纳达,对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更加野蛮。这是一个神话般的传奇大都市,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建筑物和精巧的工艺,但是它

却遭到毫无理智、毫无文化宽容的人们的野蛮蹂躏。在文学作品中，特诺奇蒂特兰被描述成一座漂浮着的仙境城市，这座城市最初使得西班牙人着迷，但最终还是毁于西班牙人之手。

科尔特斯面临的重建特诺奇蒂特兰的任务尤为艰巨，因为阿兹特克的这个首都被他的探险队摧毁了，这在西班牙漫长的征服历史中是史无前例的。征服格拉纳达是前几代人最重要的征服活动，其破坏的水平也无法和特诺奇蒂特兰相比。格拉纳达的确是一座传奇般的大都市，有着精致的建筑和精巧的手工艺品，但是它遭受的实际破坏很小，因为在遭到围困之初，它便投降了。但是，尽管格拉纳达几乎保存完整，但是基督徒们组成的市议会马上开始摧毁建筑物来建大型的广场，把大街拉直和建造教堂。简而言之，格拉纳达和特诺奇蒂特兰相比被征服的方式虽显著不同，但遭受了相同程度的城市重建。西班牙人对城市该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观念，这使得他们无法容忍格拉纳达穆斯林留下的杂乱弯曲的城市街道，如同他们无法接受特诺奇蒂特兰以运河为基础的市场运输系统一样。城市历史学家认为四四方方的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赋予城市以新文艺复兴的建筑理念，即理性和直线条化。中世纪西班牙城镇的规划历史则被认为是完全相反。就像几个世纪以来在旧大陆所做的一样，他们在新大陆同样这么建造城市。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到现代，四方形的广场一直是西班牙城镇和村庄的典型特征，这种设计不是王室强加的一种文艺复兴式的创新。西班牙城镇并不是经常有着笔直的街道、方方正正的街区和四方形的广场，但市议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达到这个目标。

43

中部墨西哥实现了西班牙人的许多梦想和期望，因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一个居住在城市里的社会。既然土著人的城市组织和政府不符合欧洲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城镇和村庄，征服者就用西班牙语里的统称词汇“pueblo”（市镇）来称呼它们。可是，当西班牙人向北进发时，他们遇到了在加勒比、中美洲和南美东海岸探险时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这里的人们伴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定期在海边定居地与内陆村庄间来回迁徙，他们从来都不建造永久性的建筑和市镇。对于西班牙人

来说，他们是未开化的民族。

甚至印第安人伟大的保护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74－1566)也因此将加勒比群岛的岛民看作原始人群。按照其他比较标准，例如宗教的完备性、家庭关系、经济生产力水平、智力发育水平、战争能力等，他认为这些岛民是文明人。但是就像他在《辩护简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sumaria*)一书中所讲，这些岛民“居住分散，互相隔离，没有任何城市形式的居民点，有些人甚至不住在大大小小的居民点中，像野人一样终日游荡”。拉斯卡萨斯认为，加勒比印第安人这种非城市化的特点说明他们缺乏文明社会基本的政治生活体验。在这一点上，拉斯卡萨斯和其他人一样，依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政体》(*On Politics*)一书中的观点：“显而易见，城市(希腊语中为 polis)属于固有的东西，而人天生就是城居动物。因为自身原因而不是偶然原因不城居的人，或者是一种可怜的种类，或者是高于人的种类；这种人就像荷马所批评的那样，‘他们是没有家族、无法无天的人’。”

拉斯卡萨斯倾注毕生精力想推翻这一观点，即加勒比岛民是由于他们自身天性的原因而没有选择城市生活。相反，他认为岛民没有城市生活是偶然的历史发展事件导致的。他不顾其早期的神学观点，而是依据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包括欧洲人的，都是通过人类经验的日积月累发展起来的，因此推论说：岛民缺乏城市生活是人类学或者发展的原因导致的，而不是他们天性中的缺陷导致的。他解释说，因为我们遇到的岛民处在和其他文明的原始时期相同的阶段，因此他们只需要时间和正确的榜样就可以实现城镇自治的目标了。

44

拉斯卡萨斯认为，西班牙人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岛民汇聚起来让他们居住在核心城镇，然后通过教育和示范，让土著人自己发展智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能建立自治的城镇：“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曾在那块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大陆上找到的人类那样的人，他们应当被看作是理性的人，可以成为守秩序和理智的人。”拉斯卡萨斯声称，西班牙人不能做的事情是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和劳动力，这样就会阻止这些加勒比印第安土著人潜力的发展，阻止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当未来我们发现这

样的孤立的原始民众时,我们应当用热情、细心、爱和友善来对待他们,引导他们聚集在城市中生活,这样他们自己就能体会到自治的好处。”下一代的传教士试图通过在墨西哥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即传教教会,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机构在西班牙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科尔特斯和拉斯卡萨斯的一生中,他们之间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他们将同样的核心价值理念灌输到生活方式不一样的美洲土著人身上的手段。科尔特斯进入新大陆,将印第安人的社会机构作为“市镇”接受了,然后在它们中间建起新的西班牙市镇。16 世纪末,在新西班牙和加勒比地区大约有 100 个西班牙城镇。它们和帕洛斯和韦拉克鲁斯的发展模式一样:在已有的城镇中间由定居者建立,尽管在中美洲,这些已存在的城镇是印第安人建立的。新旧大陆城镇建立的进程和结构都是一样的,因为其目标都是创立一个自治的城镇,不论创立者是印第安人还是欧洲人。

拉斯卡萨斯的经验局限于加勒比海岛屿以及中美洲部分地区。他和科尔特斯持有相同的文明价值观,但是他难以接受和承认他所热爱的人们有这种非城市化的、迁徙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不停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来将他们组织成自治的城镇。

征服者科尔特斯和教会人士拉斯卡萨斯不同的背景使得其对墨西哥有着完全不同的期望。在墨西哥,就像在西班牙母国一样,教士们一门心思地试图将墨西哥人改造成基督徒,过起和他们类似的教会理想生活。但是贝尔纳尔·迪亚斯和埃尔南·科尔特斯这样的世俗人士只有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认真思索平日里视为理所当然的宗教问题。在到达墨西哥之前,世俗人士和教会人士的分裂就困扰着西班牙。骑士和市镇民兵将对穆斯林的战争视为征服领土和劫掠战利品的行动,而教士们则将其描述为宗教的十字军远征。

发动和进行扩张行动的西班牙世俗人士从来没有动摇过其决心:不论是王室、商人、士兵,还是王室行政人员,都将贸易看作是向西探索美洲的主要目的。到了 1519 年,他们发现这个以前未知的大陆挡住了前往亚洲的道路,他们对此深感不满,并且对在美洲发现的文明和经济

很失望。他们在加勒比、中南美洲海岸探索，获取了受人欢迎的矿产资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希望在亚洲得到的东西：没有石头的建筑物、城市和巨大市场。

特诺奇蒂特兰拥有这些东西。科尔特斯似乎被征服了："它是如此美妙，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的感受，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看到过或者之前梦到过的。"幸运的是，他还是描述了这一切，尤其关注其最大市场特拉特洛尔科里面的货物。他首先描述了里面最珍贵的货物——黄金、白银、宝石、羽毛、斗篷、刺绣品、男女奴隶、衣服和巧克力，迪亚斯继续列举了总共 65 种不同货物。他将特诺奇蒂特兰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货物充盈，买卖人聚集。

通过文艺复兴的转型，西班牙成为一个贸易主导的社会，它在美洲不再仅仅是进行武力征服，更重要的是殖民。曾经有效地重建了卡斯蒂利亚的机构和传统继续影响着美洲西班牙居民点的建设。因为市镇生活是西班牙的常态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文明体没有市镇。当他们在墨西哥中部发现大城市时，他们非常高兴发现了欧洲人之前不知道的文明。除了极少数例外，西班牙人一般不摧毁印第安人的市镇，而是在已有的市镇之间建立新的西班牙城镇。就像西班牙自己一样，墨西哥的城市模式也是在几千个自治城镇中间夹杂着几座大城市。

第二章　相遇时的墨西哥

苏珊·施罗德(SuSan Schroeder)

1502年,一群西班牙人正航行在洪都拉斯和尤卡坦(Yucatan)半岛之间寻找水源,忽然看到了一艘装满货物的玛雅人的贸易船,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快乐吧。这种船被称作独木舟(Canoa),这个名称是西班牙人从加勒比的岛民阿拉瓦克(Arawak)人那里借来的一个词汇。这艘船上装载着细羊毛衣服、陶器、金属器具、武器、可可,也许还有女奴,用来和尤卡坦半岛上的人进行买卖和交换。这种独木舟有时候长达40英尺,能够容纳大量货物和多名旅客,是大部分美洲印第安人主要使用的运输工具。它也让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工艺技术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坐在船头的玛雅官员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装束很漂亮。还有一些印第安奴隶,他们被绑在一起,脖子上套着绳子,负责划桨驱动船前进。其他玛雅人聚集在岸边,观察这些奇怪的西班牙人船只。此后,这些印第安人给这些新来的人提供食物和水,为西班牙船只上的马提供饲料和其他西班牙人要求的东西。这初次的相遇就表明了玛雅人的富裕和当地社会的发达程度。这就吸引了西班牙人进一步探险,并进入内陆地区。 47

此后西班牙人对自己和玛雅人的接触进一步进行了报道,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大部分人尽管对土著人的好客程度表示失望,但是他

们被沿海地区的玛雅人建造的“塔”即用开凿的石头砌成的庙宇、宫殿惊呆了。这些建筑物位于像图卢姆(Tulum)城这样的地方,它是当时的一个贸易站点。但他们没有办法确定,在更远的内陆地区是否有其他更发达的社会,那里的居所又是否会比之前所见的更令人叹为观止。

48 尤卡坦半岛地势平坦,属石灰岩构造,延伸入加勒比海。这个半岛的表土很浅,植被稀少,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很少。与此相比,半岛与大陆相连的地方则属于雨林和湿地地区。暴雨将这个地区土壤的养分都冲刷走了。在这一地区之外的高原地区(即现在的危地马拉[Guatemala])则海拔较高,经常有活火山活动,有大的湖泊,有富饶但是崎岖不平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是由地面径流从山区带来的泥土形成的。分属不同语言系统的玛雅人就住在这样一块地方。他们的领土大约有40万平方公里,从东南部的塔瓦斯科(Tabasco)州,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萨尔瓦多(El Salvador)。这里的地形并不太好,但它仍然孕育了美洲大陆上最不平凡的文明之一。

的确,(西班牙王室声明占有的)墨西哥的领土向北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北部和新墨西哥,向南到达了哥斯达黎加边境。4万年以前,几百万土著人从欧亚大陆移徙而来,他们路过或者定居在这个广阔的地区。这些最早的土著居民当时只属于五个语群,但却分化并散居到了几千个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集团。这个地区的社群及其所适应环境的复杂性,从加利福尼亚就可见一斑。这里丰富的海洋产品、森林和河流平原等资源造就了大约120个不同语言的土著文化飞地。

但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关注生活在现代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境内或边境上的土著人。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古典时代的玛雅人(他们生活在公元250至900年或1000年的危地马拉热带高原地区),还有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这两大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主要是因为它们靠近肥沃的火山土冲积平原、森林、大型的河流和湖泊,另外,在沼泽地区修筑的水上园地能够使粮食产量增加。阿兹特克人尤以一种被叫做奇南帕(chinampa)的水上园地开垦技术著称于世。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一些基本的食物品种正是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大量种

植，例如玉米、豆类、南瓜和辣椒等。他们还养殖火鸡、蜜蜂和小狗等家畜，也采集植物或者猎取动物，来补充营养或者满足其他生活需要。鹿、美洲狮、野猪、兔、鸡、鬣蜥和其他爬行动物和昆虫也很丰富，还有一些可食的水果和植物等。他们甚至也打捞湖里的浮游植物，煮熟了来吃，以增加营养。

尽管上述地区社会政治组织各不相同，民族差异更大，但是区内都有人口稠密的中心定居点，而随着距离两个中心地区越来越远，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小。在墨西哥的北部和南部，湖泊和河流越来越少，地势也变得崎岖不平。仙人掌、灌木和稀疏的草木覆盖着广阔的平原。在北部边缘地区，至多有季节性的降雨。因此土著人口变得很稀少，出了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后，就只有半定居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季节性的狩猎和采集提供了主要的食物来源。但也有例外。说萨波特克(Zapotec)和墨西特克(Mixtec)语的中南部墨西哥人和阿兹特克人与玛雅人一样，在他们占据的似乎广阔无垠的山地峡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中心。尽管所处地理环境、种族和语言多种多样，但是大部分印第安人社会都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例如饮食、智力水平和技术成就。为了将这些值得关注的族群与北美的其他土著人区别开来，20世纪40年代早期，人类学家保罗·基尔希霍夫(Paul Kirchhoff)建议将这些地区及其社会和文化命名为中美洲(Mesoamerica，关于中美洲文化的分期，参见章后附表一)。

49

但是，虽然有诸多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语言和种族有多么不同，但他们的许多重要社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文化祖先和地区，这就是韦拉克鲁斯附近湿润的低地海湾地区和居住在那里的奥尔梅克人——“Olmec”，在阿兹特克人所使用的纳瓦特尔(Nahuatl)语中，意思是指“橡胶(olli)地的人们”，他们被公认为是中美洲文明的母亲。

奥尔梅克人建立了一套社会政治系统，这个系统让他们可将部分精力投入到建筑设计、美术和深奥的宗教概念中。除此之外，奥尔梅克人还为后代作出了另外一项重要贡献，即运用图画符号来表达一种统一的世界观、美学和王权观念。因此，以后几个世纪里，玛雅、萨波特

克、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就用象形符号、象形文字和图画等，在书籍、石头、骨头、木头和陶器上记录历史，以此来颂扬和印证王权的权威性。

大约在公元[①] 1500 年，墨西-索克(Mixe-Zoquean)语族的祖先定居在了后来奥尔梅克两个地方：圣洛伦索(San Lorenzo，约公元前 1200—前 900 年)和拉本达(La Venta，约公元前 900—前 400 年)，这是奥尔梅克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他们的文化自此兴盛。在这里，许多土质结构的金字塔和很多平顶的小山和祭坛被建造起来，它仍是用做行政和仪式场所的建筑群的一部分，还有大型的石柱，上面都雕刻有浅浮雕，用来纪念当权者和他们的事迹。但奥尔梅克文化不只是几个举行各种仪式的中心，因为这些具有战略性的地区居民点在区域统合和整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不同的奥尔梅克族群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性和多杂性，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大。

橡胶是韦拉克鲁斯地区的自然资源，它有很多用途，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来制造橡胶球。这种球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00 年韦拉克鲁斯的马纳蒂(El Manati)，在那里它们被当作仪式上的献祭品被存放在偏远的储藏室里。此后，奥尔梅克人成千上万地出口这种球。在位于遥远的恰帕斯(Chiapas)州太平洋南岸地区的伊萨帕(Izapa)，也受奥尔梅克影响，证据表明这里是中美洲球戏最早开始的地方。这种游戏很快开始盛行，但不同的印第安人有不同的玩法，其规则、装备、球场建筑等都不同。考古证据表明，这种球场在中美洲各地都有，处于这个地区之外的波多黎各和亚利桑那也有。

球场很大，很壮观，有令人生畏的巨大石墙。一般来说，它们建在宗教和市政设施旁边，供统治者在举行宏大仪式时使用。至少存在 3 种不同的球戏。从口述历史中我们知道，这种游戏的赌注很大，并且竞争激烈。失败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丧失性命。

我们对奥尔梅克人的起源地所知甚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以及所创的球戏却遍布各地。运送玉和黑曜石的贸易路线向北面和西面一直

---

① 原文可能有误，奥尔梅克文化始于公元前 1500 年。参见本章后分期表。——编者注

延伸到特诺奇蒂特兰,向南则到达了瓦哈卡(Oaxaca)州和危地马拉。考虑到北美地区没有驮兽,只有依靠人力的驮夫,不论去哪里,都是艰巨的旅程。更不要说,还要驮着这么多石头走路了。

奥尔梅克人并非墨西哥中部地区惟一的居民,与之十分接近的当地的土著艺术和建筑风格扩展于其他许多地方,那里有很多奥尔梅克风格的陶器、贝壳、石头船和俑。他们的木头制品、纸张和衣服等大部分都不见于考古记录。在奥尔梅克的众多艺术主题中,美洲虎面具的人类和野兽最为流行。奥尔梅克器物的另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是有意变形的头颅设计,其前额有一条裂缝的戴着头盔或者帽子的武士造型的人物,以及三脚式脆响足的器皿(中空,但在每一个支撑足的里面有一个能发出声响的珠子)。这些东西是被运来的商品,还是受到奥尔梅克影响的地方制造的产品,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在已发现的奥尔梅克人的早期遗存物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韦拉克鲁斯南部找到的众多巨大的玄武岩人头像。这些巨大的玄武岩是从很远的地方开采出来,然后用木筏或者独木舟运到海岸边。石像的脸部特点鲜明,上面雕刻有头饰,并被放在重要的地方。这些头像和人的身材差不多高。他们可能按奥尔梅克国王们的形象雕成,并象征和代表着国王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用途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石头原来是用作祭坛或者王座,然后被重新雕刻来纪念刚去世的统治者。公元前400年左右,奥尔梅克文明衰落的时候,这些石像遭到毁坏,并从巨大的底座上被推下来。研究者们至今仍在探究,奥尔梅克人的衰落是由于内部的暴乱,还是由于外部的入侵。

51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奥尔梅克某些地方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或者曾经有过长途的贸易活动。如果没有可靠的食物供应,依靠步行穿越如此长距离的荒野是很困难的,直到发明了玉米饼(tortilla),这种活动才变得可能。奥尔梅克晚期,在特拉斯卡兰(Tlaxcallan,又作Tlaxcala)和查尔卡钦戈(Chalcatzingo)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科马尔(comal),这是一种陶制或石制的烤架,用来烤玉米饼和做便于携带的食品。但是奥尔梅克人的生活并未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们

控制的领土已经开始缩小了。利用这种工艺成就来营建一个帝国就只能由他们的继任者来进行了。

显然,奥尔梅克文明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的发展停止了。一个地方的衰落往往意味着其他地方开始发展,起初缓慢,随后则越发迅速。几乎在同一时期,中美洲的各个土著族群利用当地富饶的土地和奥尔梅克人留下来的知识和技术进行发展。规模更小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墨西哥中部地区的奎奎尔科(Cuicuilco)、丘皮瓜罗(Chupícuaro)和特拉蒂尔科(Tlatilco)等地方进行的工业、贸易和其他一些活动。考古学家估算这类地点有几百个。这基本上是一个转型时期,标志着形成时期的结束。同样,新的社会集团正在新地区建立新中心,那里的人口开始持续增长。最后,一些规模巨大的政治都城,例如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塔津(El Tajin)、阿尔万山(Monte Albán)、蒂卡尔(Tikal)和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u),开始分别控制一方领土。这标志着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文明开始并走向鼎盛。

在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低地地区,很多玛雅社会开始合并成地区性的王国。奥尔梅克难民和从海湾地区来的殖民者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当地居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定居点改善了土地利用技术,特别是食品生产技术。有些玛雅地区实行轮垦,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短期耕作,因此土壤肥力持续时间很短。由于耕作主要依靠台地,几乎每处耕地都要休耕 2 至 20 年。人们在其他地区的沼泽地上建成了水上园地,或是将这些沼泽地里的水排干,以便进行高效的耕作。就像在中美洲的其他地区一样,人们利用一种被称作"科阿"(coa)的木棍挖地,玉米、豆类(玛雅人吃的小而黑的豆子)、南瓜和辣椒产量很大,足以产生和支持起一整套等级制度,包括统治者、祭司及其他专业人员。成片的水果、名为珂玭(copal)的一种树脂,以及可可,都是玛雅农田里的常见作物。可可只产在早期玛雅生活区的小片区域里,因此只有贵族方可享用。

在玛雅古典时代的早期,蒂卡尔(约 375 — 600 年)和卡米纳尔胡尤(约 400 — 650 年)等一些王国在其首都外的边远内陆地区也拥有很

多臣民。社会基本上由贵族和普通平民两种阶级构成，奴隶是一个特殊阶层。玛雅平民和奴隶除了要从事粮食生产，还要承担很多繁杂的劳动，包括建造和维护像金字塔一样高耸入云的石头庙宇，以及宫殿和其他仪式性的建筑。此外还有些玛雅人是工匠和商人，他们既非贵族，也无需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各个玛雅王国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平民，他们耕种田地，为所有人提供食物。

52

玛雅统治者通过选择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家族进行联姻来巩固权力，这些王室伙伴则通过传统的继承原则保证自己的地位。此外，由于实行一夫多妻制，那些不是嫡系的王室子孙就通过和政治盟友联姻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这样也加强了王国的统一。王室的儿子们和女儿们似乎都会参与这类政治联姻。

在有些中美洲的王国里，妇女可以继承官位或者成为女王。通过和墨西哥中部强盛的特奥蒂瓦坎王国进行贸易联系，蒂卡尔和卡米纳尔胡尤的地位大大增强了。相距遥远的贵族们交换新娘以求促进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黑曜石是主要的商品，特奥蒂瓦坎的商人或者通过战争，或者通过对这种商品的垄断，持续地对高地玛雅人施加着影响。特奥蒂瓦坎人通过提供新娘进行联姻，为玛雅基因库做出了生物学上的贡献。此外，他们还对神学、艺术和建筑做出了贡献，这些都融入了蒂卡尔和卡米纳尔胡尤的公共生活空间，并成为玛雅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财富和国力的增强，玛雅的地方统治者又可以对邻国成功地进行侵略战争，让他们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当特奥蒂瓦坎衰落，并且失去了墨西哥中部的资源时，其对蒂卡尔和卡米纳尔胡尤的控制也减弱了。因此，一些附属国，例如亚斯奇兰(Yaxchilan)和科潘(Copan)开始成为主要的霸权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玛雅王国也开始繁荣起来，特别是在佩滕(Peten)的热带雨林一带，即今天的危地马拉地区。

对于正统的玛雅王国而言，血统和领土是统一的，因此边界很明确，而对外战事却相当频繁，因为统治者会毫不留情地对邻国发动战争，以此获取战利品和奴隶。被征服的王国通常不会被摧毁，而是成为新的附属国，被迫交纳贡品。但是每一个团体都保持自治以及自己的

种族特征,有自己的国家等级制度、臣民以及本地风俗习惯。

因为社会和地理的原因,组成一个帝国似乎不具有实际的可行性。山脉、森林、湖泊和沼泽等极端险恶的地形,阻碍了这个地区的政治统一。但是,帝国没有形成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战争是一些血统接近的贵族们的特权,他们的数量有限,限制了参战的人数,当然这也限制了瓜分战利品的人数。玛雅贵族不但是一个封闭而排外的武士集团,而且也控制着商业。因此,对于非精英阶层的玛雅人来说,通过战争和经商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的。虽然一个政治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彼此是亲属(尽管可能只算远宗),继而也同是一国的子民,是同胞,但王国的资源却总是控制在一伙彼此联系紧密的精英群体手中,其中有男有女。王室对于非精英人群采取的酬报和保护政策,就足以保证他们集体效忠于王室了。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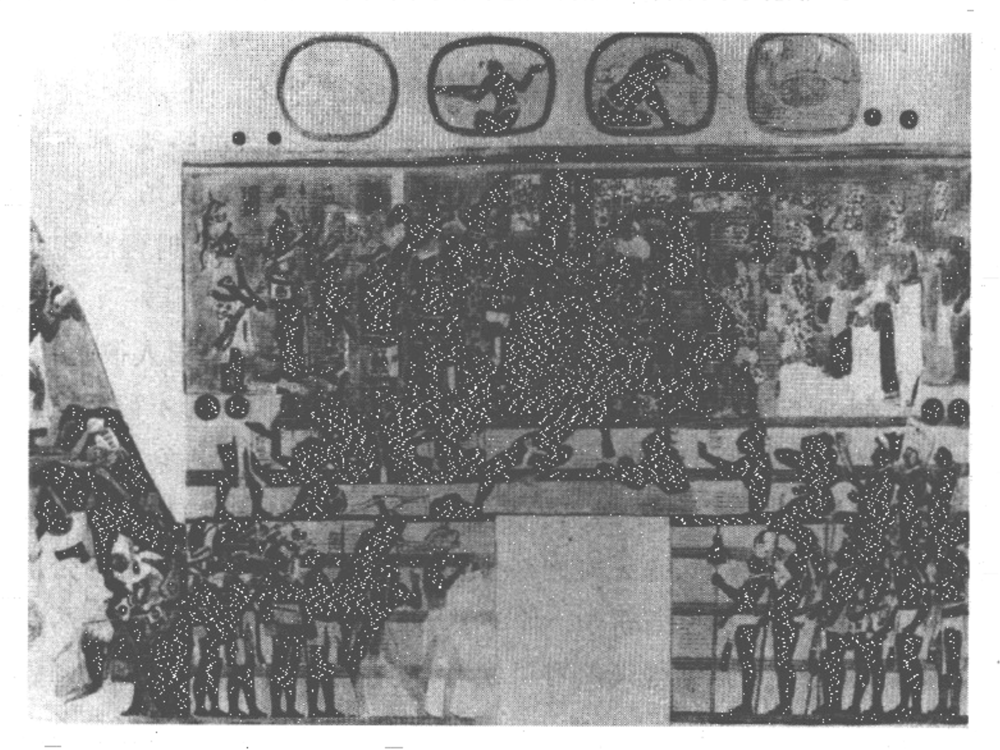
政治分立状况并不意味着简单和停滞,因为玛雅人在此时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文化成就。同时,玛雅人的国内贸易网络和通向墨西哥中部的国外贸易都大幅度增长。玛雅人的奢侈品,例如羽毛、陶器、兽皮、盐、巧克力、珠宝,以及奴隶,都被用来交换黑曜石、贝壳、水晶、雪花石膏,以及其他从远方贸易站点运来的货物。此外,当穿越这些贸易走廊时,思想、语言和这些货物一起被带来了。这些玛雅王国繁荣昌盛起来后,彼此之间便开始了竟争和战争。但是显然没有一个王国有更宏伟的目标,即成为众王之王,把原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其他地区降服并合并在一起。

古典时代玛雅的各个王国还有一些其他典型特征。其中需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其石匠的工艺水平之高超达到了超出想象们地步。就像他们的奥尔梅克前辈一样,帕伦克(Palenque)、科潘、亚克斯奇兰、比埃德拉斯-内格拉斯 (Piedras Negras)等地的玛雅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和宫殿,其中有许多建筑物是真正的奇观。建造时,工匠们通常将壮观的阶梯建在前面,一直上升到有着类似梳子一样屋顶的庙宇里。在科潘还增建了一个阶梯,上面雕有精美的象形文字,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鼓舞民众的宣传文章,因为之前一次战争失利了,统治

者为此安抚科潘的民众。

建筑物的表面装饰有王室人物漂亮的浮雕肖像。祭坛、石碑和雕像工艺精美，并且作为庭院建筑的一部分，还铭刻有用象形文字记述的相关文献。最为典型的是，玛雅人的拱门采取一种尖的枕梁弧形。这是一种尖顶的弧门，作为屋顶，常常（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被用来覆盖墓室。

玛雅建筑物的内外墙都经过粉刷，有时则画上壁画，里面房间的墙壁也绘有关于玛雅生活的壁画。在所有现存的壁画中，博南帕克(Bonampak)的三间房子里的壁画最让人兴奋不已，因为这些绝美的壁画描绘了玛雅王位的继承历史：男孩被定为继承人，随后是为夺取王位而必须进行的谋杀和内斗，最后是胜利后王者展示其威严。 54



1946年在博南帕克的考古发现包括在恰帕斯玛雅古典时期遗址的2号室中的色彩鲜艳的壁画。这幅绘于公元800年的画描绘了战争胜利后的欢庆场面。在一座有台阶的庙宇高台上，玛雅的统治者们身穿美洲虎服饰，佩戴着各种玉器，梳着引人注目的发饰。随侍在侧的包括女性和一大群显贵（其身份可以从头顶上的铭文上辨识出来）。俘虏已经被剥了皮，至少有一人已经死亡，其他人伤痕累累，血流不止，正在等死。

通过这些绘画以及保存下来的大量石头雕刻,我们可以看出玛雅上层人物的面貌和衣着。这个时期的贵族享受着许多奢侈品,包括许多漂亮、时髦的玉器和宝石物品,例如耳环、唇饰、项链、手镯和戒指。他们的衣服包括男人穿的织工精细、装饰精美的腰部与髋部棉布制品、胸部装饰用品,以及皮带、腰带、斗篷、长袍、凉鞋、羽毛和珠宝头饰等,品种繁多,制作精美。妇女们穿着打扮也很美,其衣服包括女式长衫、裙子、斗篷和长袍,有些服饰的设计和质地甚至像锦缎。她们也不缺各种珠宝和漂亮的头饰。

玛雅人确实喜欢美的东西。但是如果穿衣人不精心修饰自己的容颜,这些好看的装饰也是不会受到大家赞赏的。玛雅的美学标准要求颅骨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比较理想的是前额扁平,鼻梁在一条直线上。长着斗鸡眼的人,尤其是女性,被认为富有吸引力。女性和男性都在鼻子、耳垂和嘴唇上穿孔,来佩戴和炫耀他们的宝石。在脸颊和下巴上纹身或绘画是另外一种化妆的方式。要想展现迷人的微笑,那就必须在牙齿间镶满精美的珠宝,甚至还要故意在牙上钻孔以填入珠宝。头发被向上挽起来,上面经常戴着精致的头饰。妇女们有时候会将头发系起来,或者让长头发直直地飘在背后。

55

大部分玛雅精英非常注意整洁,仪表堂堂,但是有些男人很肥壮,大腹便便。年事已高者并未被排除在宫廷之外,他们因为才智而受到尊重。统治者坐在宫殿里由美洲虎皮覆盖的王位上,拿着象征权力的权杖和其他物品。一些下层贵族簇拥着统治者,他(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佩戴着自己的徽章,毫无疑问许多人都有亲戚关系。当国王为公事离开王宫时,他经常乘着轿子。他的妻子们也是宫廷重要的一部分,经常紧紧跟在他周围,给他调制可可饮料,或者自顾自地扇扇子,或顾镜自怜。在战争和劫掠中捉到的女奴们一般负责为贵族料理家庭杂务。

玛雅人的饮食主要有玉米、豆类等各种蔬菜,以及当地猎人所能捕到的肉食和鱼类。玛雅人的家中并没有用来做玉米饼的科马尔。没人确切地知晓他们为什么不用科马尔,不过,有人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更喜欢玉米粽(tamales)和玉米做的粥和炖汤。不论是社交性的还

是宗教性的仪式中,宴会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打完胜仗后,统治者一般会和他们的下属分享战利品,包括食物。而这些下属也会将剩下的部分物品分给普通平民。妇女们负责做饭和服务,而王室女性一般和男人们分开就餐。

巴尔切酒(balche)是一种含酒精的饮料,用树皮和当地所产的蜂蜜一起发酵酿成,贵族和平民都饮用它。只有王室人员才能在饭后享用的一种泡沫巧克力饮料才被看作是最美味的饮品。喝这种饮料需要使用特制的陶器,有时候,饮料里还会加入辣椒粉、胭脂(achiotl,类似多香果)、香草或巧克力等,这样就使得食物变得更加完美了。其他一些兴奋剂和酒精饮料,如尼古丁和当地的一些致幻剂,也会被制成吸入剂和水疗剂,在一些重大仪式上被享用。

音乐经常是中美洲人展示排场的一种手段,职业的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奏家因为其贡献毫无疑问享有特殊的地位,获得丰厚的收入。他们似乎与谋士、抄写员、祭司和其他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一道,构成了一个贵族亚文化群体。玛雅的乐器有两种,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歌唱和舞蹈是每一个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南帕克,贵族的音乐会上会演奏鼓、小号、葫芦和乌龟壳摇铃等乐器。哨子、笛子、摇铃和击打乐器(rasps)等,一般都是用贝壳、骨头(有时是人骨)、木头和陶器等材质制造的,它们也是中美洲地区的主要乐器。

王权是玛雅生活的重心,其权力来自历史发展,这种权力被认为是统治者所固有并使用的一种神圣的知识。神圣的知识包括对时间和宇宙的理解,以及玛雅人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中美洲人已经制作出一种相当精确的日历,这种日历来源于多年的天文观察和数学计算,用52年作为一个计算周期。有可能因为需要确定种植和收获作物的最优的时间周期,当地的科学家按照两个日历年的周期,设计出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第一种周期有260天,分为13个月,每月20天,天天都有特定的名称。第二种周期即太阳历,有365天,分为18个月,均有特定名称,每月20天,年底还有5个“霉运天”。这些日历就像两个轮子那样同时运转,一个比另一个大一些,彼此配合,互相追赶。

56

同一天，在 260 天的日历中有一种记录方法，在 365 天的日历里有另外一种记录法。每 52 年，这两种历法就重合一次。

玛雅知识分子不断追踪这些时间的跨度，并且长时间地仔细计算，这样就可以精确地记录过去、现在和将来事件的时间。玛雅人用二十进位制，而不是美国人现在常用的十进位制。他们也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数字系统，利用点(等于 1)和横(代表 5)来量化计算玛雅时间和物质文化。

对于中美洲人来说，时间的流逝和他们的宇宙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和人在宇宙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月份的名字有着特殊的含义。而且每一个月都和一个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这个神从这个月的开始到结束都担负着一定的任务。预言家很重要，因为他们能够解释时间和一个人出生的日子对他整个一生的影响。天体和环境现象，例如彗星、地震、洪水和饥荒等被记录下来，并且和某些历史事件对应起来。

玛雅的宗教很复杂，在他们的万神殿中有许多神，都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玛雅的世界分为 3 个平行的层级：天堂各层位于最上面；天堂下面是中间层级，这里有玛雅人最熟识的树和其他尘世的东西；再下面就是地府，有 9 层，被叫作西巴尔巴(Xibalba)；这三个层区都是神圣的地方，互相联系在一起。玛雅人战死只有，因分娩而死，或者作为祭祀的牺牲而死时，才能免于下到可怕的西巴尔巴；其他所有人就会像但丁在《神曲》中所描绘的那样被判入地狱，然后在玛雅式的来世中再次相遇。

玛雅人相信，人类的创造者是一个被他们称作乌纳布·库(Hunab Ku)的抽象且难以捉摸的神。他是全能之神伊察姆纳(Itzamna)的父亲，而伊察姆纳是掌管天空、白天和黑夜的神。但是宇宙并非玛雅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东西，因为他们相信 4 个巴塔勃勃(batabob)神代表 4 个主要方向和神圣的颜色，并掌管着天空。这 4 个方向和颜色分别是东红、西黑或蓝、南黄、北白。还有第五向——中间，圣色为绿色。而太阳具有许多神的属性，它至高无上，在进行每一天的循环运行时，穿越每一个宇宙层面，带来生命和新生，同时保持玛雅世界的完整性。

57

在玛雅的宫殿、庙宇和石碑的正面，都向玛雅公众提供有关王室、重大事件和他们的神的信息。神圣的信息都被作为历史记录下来，通常写在抄本里，这种抄本是用树皮和鹿皮做成的像折页一样的东西，上面的文字和图像雕刻精美。这些折页是长长的纸张，可以被合在一起，将它们展开就能阅读。一些圣贤，例如祭司、国王和科学家拥有大量这类书籍，并且不时抄写和制作这些文本。

玛雅人的语言音节丰富，这有利于他们发展其书面文字。口头语言可以通过手势和图形标志来表达。许多此类的文献或者口头语言的意思非常复杂，直到今天还没有被翻译出来。毫无疑问，当时并非所有的玛雅人都能够阅读这些他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但是当国王和女王在举行盛大仪式时来到其玛雅同胞面前，他们的举动就生动地揭示了历史意义。

这种祖传的特权，在文献中被明文规定为神圣的东西，并被赋予神圣的权威性。统治者通过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在困难时期抚慰民众，在进行战争时激励民众。玛雅统治者通过恐怖的自残行为来激发民众的感情和感动神灵，例如用剃刀一样的刀子割伤耳朵、舌头甚至阴茎来获取血液，同时伴随着激烈的舞蹈和歌唱仪式，点燃火炬和香烛，口述夸张的言辞等，统治者通过这种血祭的方式成为了王国的化身。那些远在外地的普通平民，虽然不能现场参与王室的这种仪式表演，但他们也知道这些活动，明白这些活动正是代表他们而进行的，并且从中感到自己也是这个政治集团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

尽管如此，在古典时代的后期，墨西哥中部发生了经济实力的转移，玛雅国王们对此无能为力。9 世纪末期，玛雅王国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对玛雅古典文明的衰落，有许多理论解释，例如流行病、侵略、水土流失和干旱引发的农业衰落以及内部的起义，甚至贸易从陆上转移到水路，也可能导致玛雅的衰落。不管怎么说，宏伟的玛雅国家的中心城市，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并且再也没有重新繁荣起来。剩下的玛雅人分散到各地，有的移民到尤卡坦半岛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这个半岛也成为墨西哥地区向南到巴拿马地区的贸易路线的控制中心。有些

玛雅人则移居到高地火山区。

11世纪进入了所谓的后古典时期。玛雅人的定居地开始受到墨西哥中部一系列不同的入侵者的影响，例如琼塔尔玛雅人（Chontal Mayas）、普顿人（Putuns）、托尔特克人（Toltecs）等。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入侵者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我们尚不清楚。在尤卡坦，新来的伊察（Itzas）人在奇琴伊察（Chichén Itza）建立了首都，这个地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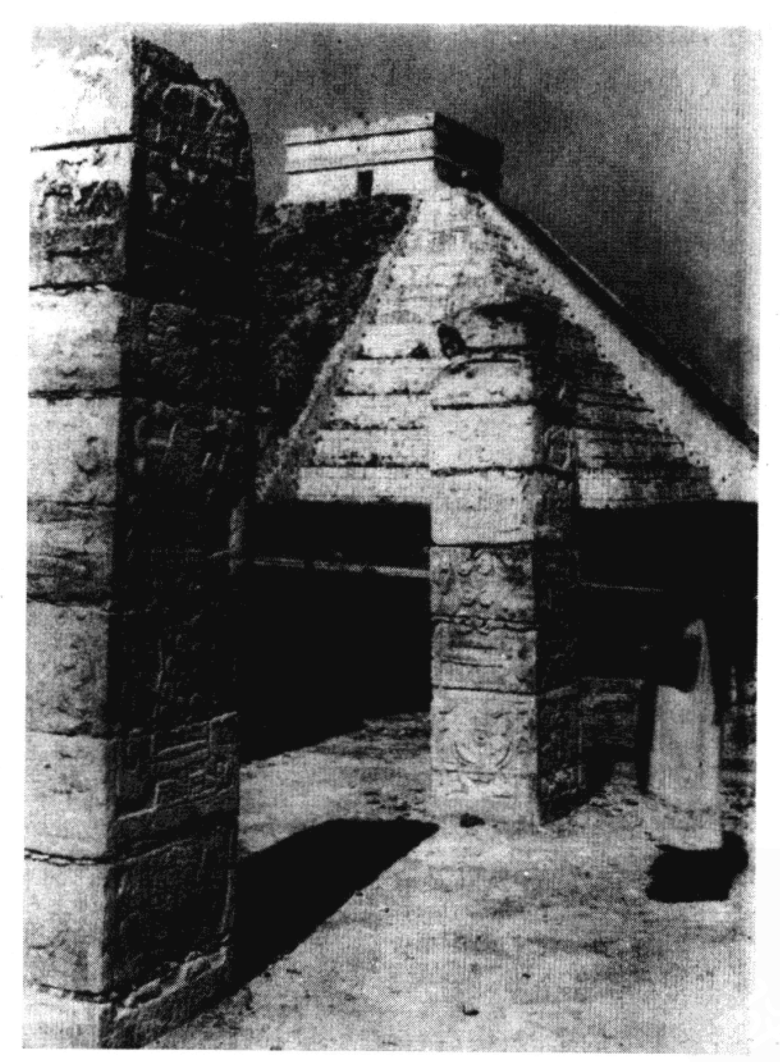


这幅古典玛雅时期的经典石雕作品出自危地马拉低地地区亚克斯奇兰的一根横梁上，创作于公元725年。作品中，国王"守护者美洲虎"（King Shield Jaguar）手持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而王后索克（Xoc）则跪在地上，把一根带刺的绳索磨过自己的舌头，施行血祭。王后长袍上的华美装饰，厚重的胸前玉饰以及两位统治者的项链和繁复的发式都是刻画的重点细节。象形文字铭文记录了两个人的姓名、头衔、时间（公元709年10月28日）和事件。

突出特色是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石碑、球场、羽蛇以及其他东西。它们的风格和墨西哥中部的托伦城(Tollan,据说就是今天的图拉[Tula])在后古典时期的风格部分类似。伊察统治者的血统比任何古典时期的玛雅统治者都要混杂得多,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一系列新型的社会和政治方式,在尤卡坦北部统治了接近两个世纪。

最后,古代玛雅传统的王室血统正统论占了上风。一些宗室成员联合起来在1221年成功地推翻了伊察人的统治。中央政府的权

59



武士庙(Temple of the Warriors)的卡斯蒂略(castillo)是玛雅遗址奇琴伊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之一。奇琴伊察的玛雅人在1221年玛雅潘崛起之前,统治尤卡坦半岛长达近两个世纪。

力由此从奇琴伊察转移到玛雅潘(Mayapan)手里,他们是几个王室宗室的联合体,但是却从奇琴伊察那里进行借鉴和创新,再次改变了当时盛行的艺术和建筑风格,同时恢复了用象形文字进行历史记录的习惯。

这样一来,从 1221 至 1440 年,古典风格的玛雅世系统治了尤卡坦半岛,直到最终一个集团推翻了另一个集团,联盟解体。随后,尤卡坦分裂出 16 个互相争斗不休的派别,他们为争夺食盐和可可等当地资源而进行战争,但是他们也继续从事远距离的贸易网活动。在玛雅高地地区,基切人(Quiche)和卡克奇克尔人(Cakchiquel)声称他们是墨西哥神圣的托尔特克人的后裔,并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好战的强国。到 16 世纪,他们统一并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正是西班牙人第一次写信向母国描述的玛雅人。图卢姆是一个继承了玛雅潘的贸易中心,其高高耸立在加勒比海悬崖上的塔和宫殿,给这些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西班牙人对玛雅人的宗教和社会习俗感到很骇然,但是他们仍旧不由自主地赞赏他们遇到的当地人的情况。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从中收集到普通玛雅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生活的宅院,规模很大、组织良好的城镇,还有附近的耕地,地方政府、饮食、衣服、工具、武器、语言,当然还有略显过分的热情好客。对于玛雅人的历史来说,循环不息的征服战争并不新鲜。玛雅人仍旧珍惜那些古抄本,并从中求取对现世的解答。西班牙人有着类似的神圣知识,但是这对于中美洲人来说,也没什么稀罕的。中美洲人一直在完善他们自己的知识,并以此对宇宙的一切现象进行理性分析。

60

对这些恢弘的玛雅王国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的,就是它们与特奥蒂瓦坎(约公元 700 年)的贸易以及联姻。特奥蒂瓦坎是古典时代墨西哥中北部一座城市。到公元 200 年,特奥蒂瓦坎成为一个繁荣的土著人的大城市,并形成了一个商业帝国。它首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然后统一了许多主要的王国,统治着包括墨西哥最南部地区,甚至远至墨西哥湾地区的人群。

无论以何标准来看,特奥蒂瓦坎城都是独特的。特奥蒂瓦坎非常

大，而且城市化程度很高，从面积大小、艺术完美程度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看，它都是中美洲地区史无前例的。在其顶峰时期，它代表着古典时期极致的精致和完美。按照传说中所讲，特奥蒂瓦坎在纳瓦特尔语中的意思是“诸神之地”，是当地的神最初为人类牺牲自己的地方。金字塔建在好像子宫的洞穴之上或者环绕这类洞穴，这印证了创世神话中对最初住在此地的人们生活状况的描述。特奥蒂瓦坎人认为上帝和人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对于在大约5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居住在特奥蒂瓦坎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神灵们对其生活有着巨大影响。他们的金字塔、庙宇、塑像、壁画纪念了一大批神灵。实际上，和中美洲其他地方的习俗不同，在特奥蒂瓦坎，宗教的重要性超过了王国的政治斗争。当然，这个城市不再被视为一个伊甸园，能够免于任何争斗和暴力。但特奥蒂瓦坎也不是以好战传统为特点的。

尽管统治特奥蒂瓦坎的本地国王们一度统治过多达20万的人口，但是他们显然感到没有必要向公众展示他们的统治权力和个人功绩。而且，如果他们出现在文字、视觉或口头历史记录中，一般都是作为神的化身。在美丽的、以特奥蒂瓦坎为模板描绘的大千世界壁画中，微型的人像在嘴的前面画有卷轴，这代表在演讲。这些人像在唱歌，颂扬城市之神的慷慨，它提供了丰富的雨水和阳光、众多的植物和动物。特奥蒂瓦坎知道和使用我们熟悉的中美洲计数和日历制度，但其他神圣的知识则似乎多是神学方面的。甚至他们的独石雕刻、庙宇正面和陶器等，也都描绘的是神灵。

61

万神殿里最常见的是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女水神查尔丘特利奎(Chalchihuitlicue)、太阳神和月亮女神，以及一个老的火神，当然还有无所不能的羽蛇神克察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最不吉利的神是西佩·托特克(Xipe Totec，即画皮神)，他是春神和重生之神，其化身实际上披着一张从被献祭者身上剥下来的人皮。

对宗教的高度兴趣并不意味着特奥蒂瓦坎就没有统治者和祭司，以及他们的谋臣、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重重等级。这个城市垄断着黑曜石以及其他贵重货品的交易，这一般都在宽敞的市场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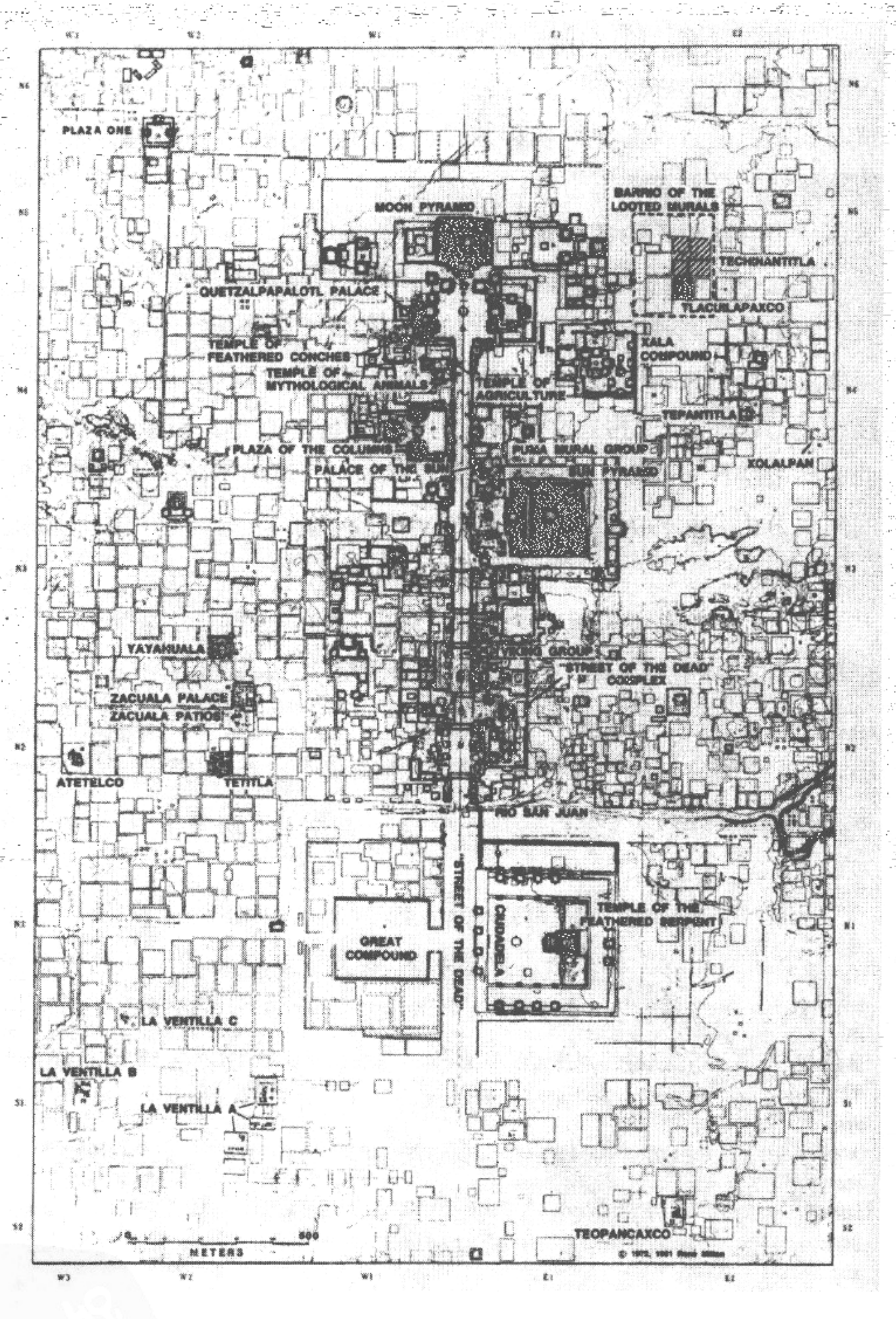
行。阿尔万山或韦拉克鲁斯等遥远贸易中心的手工业行会常常被搬迁到特奥蒂瓦坎,在这里他们负责监督一些奇特商品的生产,而这些商品本来在当地是没有的。作为侨民,他们为这座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很大贡献。有至少一块地方被单独划出来,供萨波特克人工匠们使用。

在特奥蒂瓦坎人对中美洲文化的所有贡献中,影响最为持久的就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许多墨西哥本地社会将 4 这个数字看作最神圣的数字。根据继之而起的其他许多城市遵循的模式,有些研究者推测,特奥蒂瓦坎的城市规划就是四方形的。考古证据表明巨大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最先沿着中间南北向的轴线被建立起来,然后又建立了网格状的街道。

特奥蒂瓦坎的建设重点随后转向民居和庙宇。每一个分区都由大型的四方形住宅区构成,每一个住宅区包括多达 175 个单元。这些住房屋顶较低,单层,没有窗户,门道上铺有纺织品,房门开向通风良好、光线充足的天井。毫无疑问,这些建筑具有很多社会功能。每一套住房都有富丽堂皇的柱廊门厅,它们直接通向宽敞的平面稍低的庭院。建筑物的石头外墙面雕刻有精美的装饰性浅浮雕。

这些住房大概构成一个大家族的院落,或者是一些各自围绕一个天井形成独套房屋的群落,这些住户彼此之间存在亲戚关系。我们不太了解特奥蒂瓦坎城内外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大部分人显然都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其他城市生活必须的工作。一般认为,特奥蒂瓦坎的男人有 1.62 米高,妇女身高大约为 1.45 米。他们的预期寿命,宽一些估算,大约在 35 至 40 岁之间。

城市的统治者大概居住在神庙旁边的一块独立地区,这些神庙主要是为了祭祀克察尔科亚特尔,现在被称为堡垒(ciudadela)。一座宫殿建筑经常包括多达 45 个房间,并带有中庭和特奥蒂瓦坎式的庭院,旁边还有举行仪式的平台。正是在这些宫殿里,我们发现了精美的壁画,这些壁画告诉我们这里的居住者对神灵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古典时期的特奥蒂瓦坎城中心区域占地约7平方公里。这张图展示了该城的城市规划布局。正中心为"死者之路"(又称"大道"),城中分布着数量繁多的宫殿、神庙、庭院和居住及制造业区域,另外还有著名的羽蛇神的神庙。

63 其他图案描绘了凶残的丛林狼和美洲虎，这些图案大概意味着后古典时期形成的好战特性。城市其他地方被专门划定为制造区，制造贸易和国内消费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在古典时期，黑曜石的重要性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因为在特奥蒂瓦坎，我们已知至少 350 个店铺从事与此相关的各种业务。

公元 500 年后，特奥蒂瓦坎的人口开始大量萎缩。在一个世纪内，城市的主要地区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是何因素导致这个城市的伟大与辉煌迅速消失，我们还难以确定。无论是否与特奥蒂瓦坎的衰落直接相关，其他杰出的古典文明城市的影响此时也在迅速衰退，例如其东面的乔洛兰(Chollollan，今天的乔卢拉[Cholula])和墨西哥中南部地区的阿尔万山。和伟大的古典玛雅文明的各个首都一样，这些中心城市失去了影响力，而且人口和领土都在缩减。

后来，一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例如从北部来的移民，填补了这种空缺，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仍未定型的外来的社会和政治习俗。最后，这些外来者甚至建立起新首都和领土。进入到所谓的后古典时期后，中美洲社会文化再也没有恢复到鼎盛期的水平，也就是古典特奥蒂瓦坎和其他同时代人那样的文化水平。墨西哥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就像中部墨西哥那样，自从公元前 1500 年奥尔梅克文明开始发展，一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繁盛起来，但是其优势依赖于其他经济体的繁荣，依赖与其贸易、贡金和社会联盟。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只有当外部敌人威胁到现状时才可能被破坏。

特奥蒂瓦坎衰落后，外来者不停地入侵，带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没有人知道这些外来入侵者来自何方，在墨西哥中部定居的更文明的社会称他们为奇奇梅克人(Chichimeca)，其定义至今还有争议。纳瓦特尔传说中记载，奇奇梅克人来自墨西哥的北部边境，那里的人依靠打猎和采集为生，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渔猎。奇奇梅克人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沙漠文化”，他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依赖最简单粗劣的食物生活。每一个部落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部落有了领导人，

其中有一人被称为“驮神者”,背上始终背着一些神的象征物。当然奇奇梅克人也佩戴弓箭以及其他武器,供狩猎或者防备劫掠者的攻击。

这些土著人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年,耕种并收获粮食,然后再继续前行。按照显然为周而复始的历法制度,他们举行神圣的祭祀火的仪式,并且按照前面提到的 52 年一循环的制度来“确定各个年份”。他们的土著历史为编年史,里面充满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考验和磨难的故事,记录下这些不同的游牧部落向着墨西哥中部肥沃的土地艰难前进的历程。几个世纪以后,特斯科科(Tetzcoco)和查尔科(Chalco)这几个伟大的王国褒扬了奇奇梅克人的品质:坚韧、毅力和成功,并且再次启用这个名字作为他们地位最高的君主和国王的尊称,是为“奇奇梅克王”。 64

这些入侵者和其古典文明时期的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尚武的特点。在这些入侵者中间,值得注意的是托尔特克人(Toltecs),他们在托伦建立了首都,它位于特奥蒂瓦坎西南面约 60 公里处。神话传说中大量讲述了早期图拉的贵族统治者兼祭司托皮尔津(Topiltzin)的故事。他虔诚地敬奉爱好和平之神克察尔科亚特尔。他后来被称作托皮尔津·阿克西特尔·克察尔科亚特尔(Topiltzin Acxitl Quetzalcoatl),和蔼并且受到臣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受到凶残的、爱报复的神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的欺骗。据说,托皮尔津不光彩地乱伦,并且做了其他淫荡行为。因为自己的愚行抹黑了图拉的王权,国王感到很羞耻,他来到墨西哥湾沿岸,把自己放逐到海外。这大约发生在公元 10 世纪末。在另一个版本中,他一来到海边就被火化了,然后消失在天空中,成为了金星,也就是启明星。

这些流传很久的记述却很少提及托尔特克战士们的宗教崇拜情况、他们真正的战争情况以及人牲祭祀的习俗。这个习俗当时很普遍。但是它们的确告诉我们一些社会冲突和派别斗争的情况,这有助于部分解释图拉的衰落。就像刚才提到过的一样,当托尔特克人分散到各处时,有些人加入到玛雅和其他受中部墨西哥人影响的部落,并在尤卡坦的奇琴伊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统治。其他托尔特克人后裔参与建立

了基切和卡克奇克尔王国,这些王国在 16 世纪统治了危地马拉的高地地带。托尔特克的大部分人依旧呆在墨西哥中部,只是移居到了乔卢拉等地,加入到了当地的定居部落,并修建立起了整个美洲最大的金字塔之一,来永久祭祀克察尔科亚特尔神。

正是托尔特克首都本身代表了后古典时期(大约公元 900 — 1150 年)土著人的信仰和习俗。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中美洲的文明标志就是金字塔、神庙、球场、住宅区、祭坛,以及独石结构的柱子和石碑。但是在图拉,最有特色的石头柱子是凶恶的蛇和令人畏惧的战士的形象,并且都全副武装。更加让人害怕的是比真人还要大的查克姆尔(Chacmool)。这是一个石雕的人,手里拿着盆子,来接人的心脏。神庙墙上的装饰性壁画描绘了托尔特克武装军团如何驱使鹰、美洲虎和丛林狼。颅骨架和绘有蛇像的墙描画了人牲和吃人的行为。

从特奥蒂瓦坎时代起,为生活和自然之美歌唱的令人尊敬的神的化身已经消失了。现今在图拉已经没有此类祭祀的地方,它们如同托皮尔津·阿克西特尔·克察尔科亚特国王一样被抛弃。这些神要求的更多,战争是托尔特克人生活的常态。

65 与特奥蒂瓦坎的情况一样,黑曜石是托尔特克经济生活的支柱。在此时期,黑曜石尤其重要的用途是制作一些类似于玻璃的武器尖端,例如用在阿特拉特尔(atlatl)、飞镖和大棒上,以及用来制作仪式上所用的一种做工精细的小刀,这种小刀被用来剜去祭祀人牲的心脏。

到 12 世纪末期,大概是内部的争斗和北方侵略者新入侵的浪潮促使了托尔特克统治地位的结束。图拉城被劫掠和焚毁,但是后来者仍然保存着对其伟大文明成就的记忆。

尽管受到特奥蒂瓦坎和其黑曜石帝国的影响,位于现在墨西哥中南部的同时代主要城市蒙特阿尔万山由于不处在常规的入侵路线上,因此相比其他古典时代末期的中心城市,其年代和文化的连续性上没有大的中断。阿尔万山长期居住着说萨波特克语的人,这些人很早就独立地发展了一套自己的书写系统。它也是瓦哈卡地区最早的几个萨波特克中心城市之一。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萨波特克的神庙、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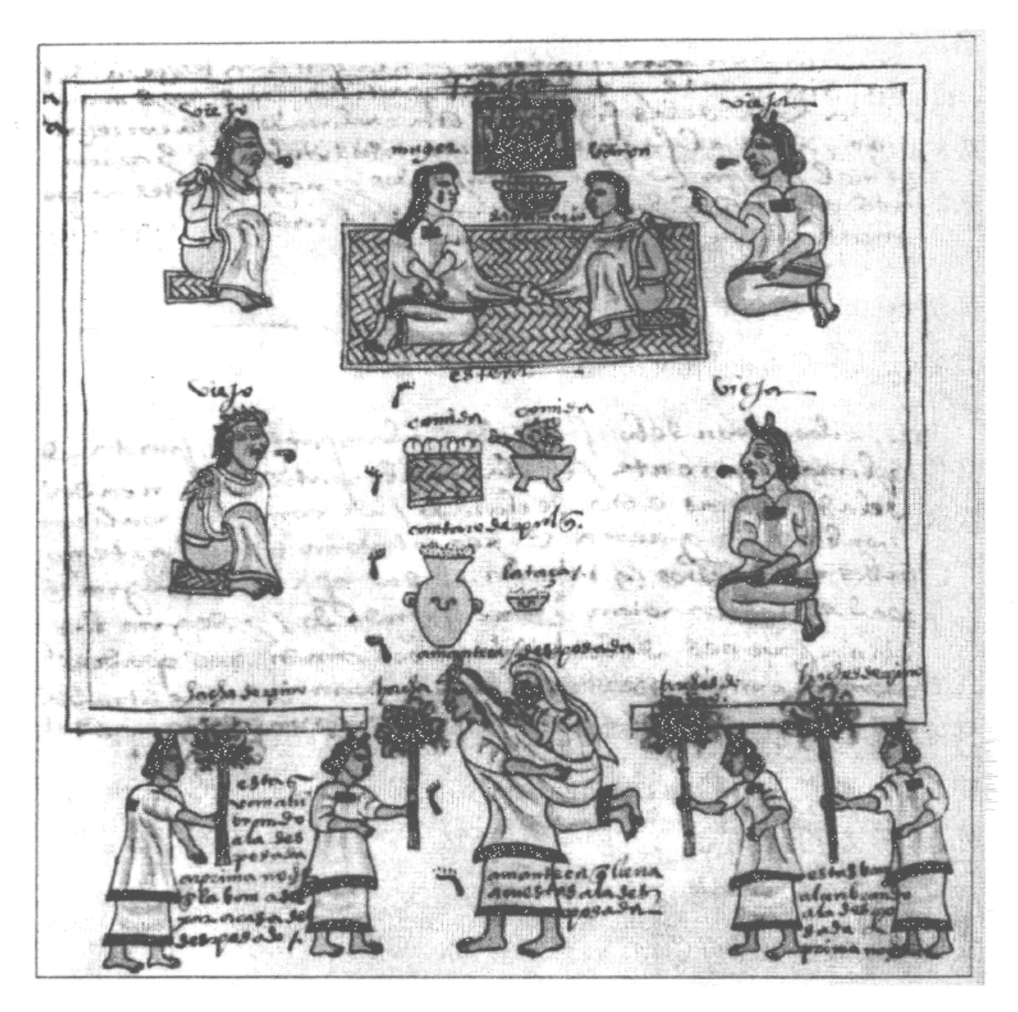
祭坛等都反映了一种古典式的,但是又略作修改的斜面-平板风格(talud-tablero,这是一种建筑样式,特点是渐渐倾斜的斜面墙,在每一级的中间插入一块横着水平的镶板),这种建筑风格还带有精巧设计出来的几何图案。

就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萨波特克的神灵都和特奥蒂瓦坎以及其他神灵类似,但是名字却不同。此外,阿尔万山的跳舞者(Danzantes)很有名,这是一系列完成于萨波特克文化形成时期的石雕墙板,刻画了大约 150 个死去的裸体男人像,大概是象征被征服的国王们,以此来警告其他地方的国王。"跳舞者"总是提醒着人们,这个社会总会遭受一次次的暴力和起义,即使在中美洲早期的历史上也是这样。

阿尔万山的陶器品种也很丰富多样,许多陶器按照当地神灵的形象来塑造。与通行的做法一样,花瓶、瓮和其他陶器被放在墓室里当作死者的陪葬品。萨波特克人的墓穴已经发掘了大约 170 多座,它们特别能体现出这群人的世界观。因为这些墓室装饰很豪华,装满了精美的礼物。墙壁上有壁画,纪念他们的神灵以及最近去世的统治者。此外,象形文字所写的铭文在阿尔万山到处都有,有些甚至写于该文明形成之初,不过这些图像文字大部分现在还未能破译。很显然,萨波特克文化的发展影响了许多地区,例如南部的玛雅人地区,东部靠近卡卡斯特拉(Cacaxtla)和特拉斯卡拉的地方,以及特奥蒂瓦坎以制造业为主的卫星城市。

在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了战胜在特万特佩克(Tehuantepec)的敌国,萨波特克人和其他武力集团,例如米斯特克(Mixtecs)人,建立了政治联盟。此后,萨波特克和米斯特克两族的联盟通过联姻更加巩固了。最后,米斯特克作为萨波特克王国的继承人,完善了这种跨越政治集团边界的政治联姻,并将其作为稳定处于不同集团统治下的地区的主要手段。一旦这一手段成熟,血统的排他性便日益凸显,以至于王室子孙互相通婚,以保持王朝统治的单纯性。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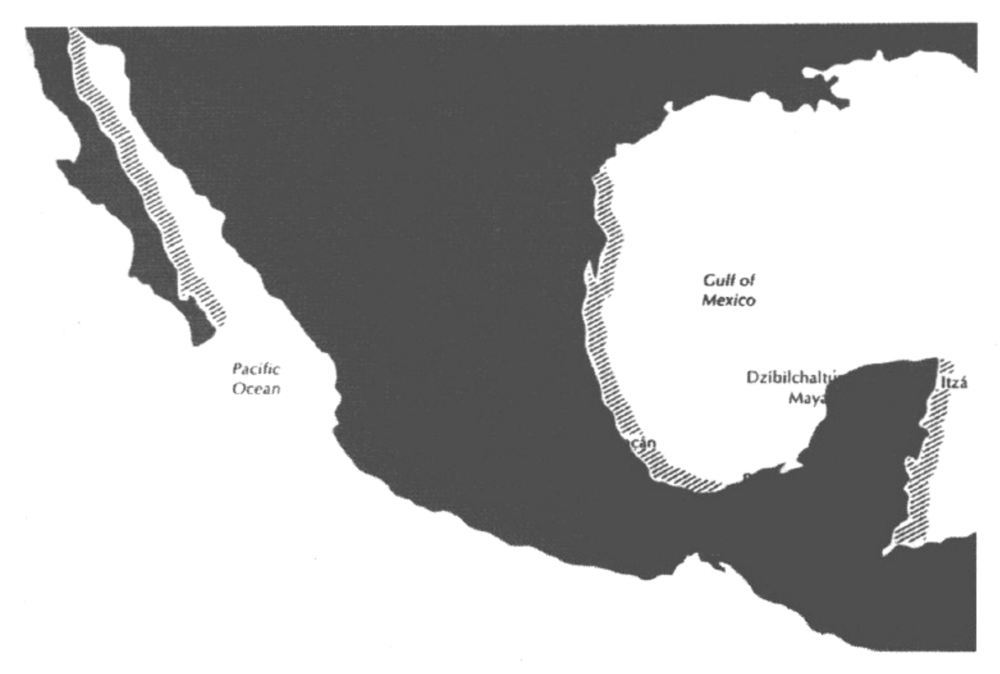
在中美洲的后古典文明时期,米斯特克知识分子,例如艺术家、建筑师和学者,建立了著名的强大飞地,他们在此将前辈们的遗产发扬光



16世纪早期墨西卡特诺查的婚礼场景。新郎和新娘象征性地“缔结”,数位长者在一旁给他们提出忠告。新娘才15岁,新郎则比她大得多,这桩婚事是由媒人从中撮合的。

大。例如米特拉(Mitla)的神庙,其精细的设计和装饰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装饰艺术,不论是水晶、玛瑙、黄金、骨头或者陶器,都十分精致完美。他们的古抄本是文字记载的主要形式,提供了他们的个人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有些幸存下来的作品成为有关米斯特克文明社会永久而珍贵的记录。

与玛雅统治者一样,米斯特克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于本文化的圣书,即一种历史和谱系的记录,通常可一直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几乎每一个王室家族都保存有自己的记录,并以此证明自己的血统是纯正的,



中美洲的主要考古发掘点。

也用来追记时间和记录神灵的旨意。这些文本大部分为象形文字，可能作为一种帮助记忆的符号工具，帮助国王、祭司和桂冠诗人在一些政治和宗教仪式上用一种通常很艰深的语言风格来讲述其中的故事。在这些重大的场合，歌唱和跳舞欢庆传统上是每一次重要表演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这种活动，因为他们不但分享他们祖先的光荣历史，而且也在这种特殊场合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作为声名狼藉的托尔特克传说的良好继承者和传播者，墨西卡人(Mexica，15 世纪阿兹特克帝国的主要缔造者，又被称作阿兹特克人)是 13 世纪到达墨西哥中部的一系列新来的居民群之一。按照他们的编年史，他们和查尔科(Chalca)、霍奇米尔克(Xochimilca)、特帕内克(Tepaneca)以及其他人群一道，于公元 1064 年从传说中遥远的极北之地奇科莫斯托克(Chicomoztoc)出发，奇科莫斯托克意为"七洞之地"。墨西卡人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宇宙观和特奥蒂瓦坎人类似：神灵和人类都是从山洞里诞生的。墨西卡人从北方穿越大陆和河流，其传奇性的长途迁徙史知道的人最多，不过其实奇科莫斯托克的所有 7 个部落

最后都来到了墨西哥中央盆地肥沃的土地上，并定居下来。他们定居的地方今天仍有着与当年相似的名字。

墨西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参加了这次迁徙。跟随着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由一个或者几个祭司抬着他们的主要神灵，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旅途中，他们举行适当的仪式来祭祀各个神灵。这些祭祀仪式并不能使这些旅行者免于旅途艰辛，例如和其他部落的战争等，以及与其他神灵的可怕的竞争性的战争。在靠近图拉的一个名叫科阿特佩克(Coatepec)的地方，威齐洛波奇特利神(Huitzilopochtli)的崇拜很流行，他一出生就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他被迫杀死了其邪恶的姐姐科约尔克萨乌基(Coyolxauhqui)，并吃掉了当女祭司的母亲科亚特利奎(之前已被其姐姐杀死了)的心脏。根据墨西卡人的传说，就是在威齐洛波奇特利的指点下，墨西卡人才到达了这块应许之地。此后的 1428 年到 1521 年，他们作为阿兹特克人建立了对墨西哥大部的统治，因此墨西卡人对该神有了敬奉的义务。

但是墨西卡人最初作为野蛮的奇奇梅克人，在所到达的任何地方都不受当地定居已久的具有更精致文化的居民欢迎。因此，为了确保他们能在这一地区安全地生活下去，他们采取了许多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投靠了和托尔特克人有关系的库尔瓦坎(Culhuacan)统治者，做了他们的雇佣军，来对付库尔瓦坎统治者的敌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带回来许多装满敌人耳朵的袋子。

有关墨西卡人早期成就的记录很多。下面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他们试图和库尔瓦坎的王室搞好关系，并且预示了此后会发生的事情。在认同了关于托尔特克人统治地位的流行神话后，墨西卡人努力促成族中一个年轻男子和库尔瓦坎国王的女儿结婚，以此通过联姻来建立血统上的联系。但他们却在一个祭祀西佩·托特克神的仪式上，把作为新娘的公主献祭，剥了她的皮，让一个作为神的化身的祭司披上她的皮肤，并且在她已经吓呆的父亲面前展示。当然，所有的墨西卡人因此被逐出了库尔瓦坎。

墨西卡人毫不泄气，遵照威齐洛波奇特利的预言，当他们看见一只

鹰嘴里叼着一条蛇，站在一棵高大的仙人掌上时，他们就可以定居下来了。公元1324年，在他们还不很如意时，就这样定居在一个响尾蛇肆虐的岛上。这是惟一留给他们的地方了。他们把新家命名为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Mexico Tenochtitlan)，意思是“靠近尖利的仙人球的地方”，而蛇和鹰则成为墨西哥文化最悠久的象征。

但是墨西卡人现在处在强大的特帕内克(Tepanecas)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他们的首都是阿斯卡波特萨尔科(Azcapotzalco)。墨西卡人被迫交纳贡赋，并且提供战士来帮助特帕内克人征服其他的人民和领土。墨西卡人也辛苦地劳动，希望通过仿效他们接触到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原本的奇奇梅克生活方式变得更文明些。

但是，墨西卡人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主要是在特诺奇蒂特兰发展奇南帕农业。奇南帕是一种水上园地，主要位于沼泽地区，或者在围绕岛屿的湖泊边缘。这种园地是通过从湖底挖泥，然后一排排地堆积而成，这样也便于排水和灌溉。这是一种集约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土壤一般很肥沃，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作物来种植。

69

到14世纪50年代中期，阿兹特克人使用的纳瓦特尔语可能成了墨西哥中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尽管奥托米(Otomi)、皮诺美(Pinome)，以及其他语言也在应用。这种语言一般被统称为纳瓦语特尔，基本上是中美洲的通用语言，但中美洲的各个族群其实均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认同。独立的纳瓦政治集团被称作阿尔特佩特尔(altepetl)。这是一个合成词，阿特尔(atl)指水，特佩特尔(tepetl)指山。这是用比喻的方法表达一个王国和种族集团的本地概念。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领土、统治者和社会。这些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贸易、军事联盟、战争和征服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威望。

墨西卡人仍旧想通过托尔特克祖先的血统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他们再次娶进了库尔瓦王室的一位女性。这场联姻诞生了一名男孩，名叫阿卡马皮奇特利(Acamapichtli)，他因此成为贵族，并成为墨西卡王国的创立者和第一个特拉陶尼(tlatoani，意为“发布命令的



墨西卡人在伊兹科亚特尔和特拉凯莱尔·西瓦科亚特尔的率领下征服了阿兹卡波特萨尔科王国。画家为我们描绘了武士的装束、所持的武器和战斗的大概过程，另外还刻画了仍在征服者宫殿脚下的被剥了皮的战俘。在这幅画中，甚至连女人也身着盔甲。

人”，实际上就是墨西卡王朝的国王)①。阿卡马皮奇特利使得特诺奇蒂特兰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有了很大发展，这样他的儿子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和孙子奇玛尔波波卡(Chimalpopoca)继位后，就可以继续扩展这个阿尔特佩特尔的势力。

然而，将王国带到了顶峰的人是奇玛尔波波卡的叔叔依兹扣特尔(Itzcoatl)，他同时也为阿兹特克帝国奠定了基础。依兹扣特尔征服了阿斯卡波特萨尔科，并和墨西卡人之前的领主特帕纳克人建立了新的联盟。在新的制度下，继承墨西卡王位不但需要良好的个人品格和战场上的勇敢坚毅，而且还需要得到王室伙伴们的正式认可。

70

我们不能说墨西卡人是很好的创造者。他们的天才在于借用既存

① 关于墨西卡和阿兹特克历任领袖和国王，参见本章后所附表 2。

的意识形态和习俗，并且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宏伟目标服务。墨西卡人的世界观，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上都承袭了前辈们的观点。他们也认可四方宇宙，并按照这个精细和复杂的宇宙法则来塑造自己的生活。

就像他们的中美洲前辈那样，墨西卡社会理论上由两个阶级构成：贵族和平民。但是，成功的战士和商人以及结了一门好姻缘的人都具有很大的社会流动机会，并且其他例外情况也很多。同样，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也分为四个主要的有等级高下之分的中美洲式居住区，莫约特兰(Moyotlan)在西南方，特奥潘(Teopan)在东南方，阿特萨瓜尔科(Atzacualco)在东北方，奎波潘(Cuepopan)在西北方。但是，东方虽一向是中美洲人主要喜欢的方向，却不是他们心中的首选。

阿尔特佩特尔中的四个区又进一步被分为几个小区，称作卡尔波利(calpolli)，这里基本上居住着平民。卡尔波利经常有 4－6 个，每一个都有一名领主，负责维护该区的安宁，收贡金，履行该区的宗教义务和按一定时间周期上交阿尔特佩特尔-特拉陶尼(altepetl tlatoani，即国王)所要求的货物和劳力，然后国王再将平民上交的贡品中的一份奉献给更高的统治者贝伊-特拉陶尼(buey tlatoani，大王，即阿兹特克皇帝)。每个小区都是一个完备的单体，彼此平等，各有自己的名称、辖区、首领和神灵，如同一个小王国。由于其政治体制井然有序、各区统治者等级分明，按规定的制度轮流履职，因而组织良好，运行有效。

纳瓦人家庭是一个微型的卡尔波利和阿尔特佩特尔。纳瓦语中没有指代家庭的名词。和此规模接近的社会组织一般包括聚集在一起的许多房子，都朝向一个共同的天井，居住者都是依靠血缘和婚姻而联系起来的，有时可达好几代人。亲属关系将这个集体紧密联合起来，一个成年男性成为整个团体的头领。祖父母、父母(大概还有寡妇)、兄弟姊妹、侄女、侄子以及孤儿(没有什么标准，大概如此)住在一个固定的屋子里，几个这样的集团聚居在一个共同的地方形成聚落，若干个聚落，就构成了卡尔波利。

集团内和跨集团的婚姻产生并巩固了家庭、小区以及王国的联盟。即使在阿兹特克帝国最兴盛的时候，它仍主要靠婚姻来联系，阿兹特克皇帝

71 从遥远的阿尔特佩特尔娶来那里王室的女儿做妻子，而他们的儿孙们则成为新政治集团的统治者。阿兹特克国王据说有几十位妻子，和至少同样多的孩子。但是这只是贵族的特权，大部分纳瓦人还是实行一夫一妻制。

在纳瓦人的生活圈中，婚姻是关键环节。因为婚姻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媒人代表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族进行协商。财产、住房和仪式理所当然都是要讨论的问题。当一切都谈好后，新娘就要独处，为结婚做准备。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缔结"，即将新娘的裙衣或上衣和新郎的披肩在肩上系在一起。

丈夫的责任包括供养家庭，不论是以耕种田地，或者当商人和工匠的方式，当然还要在接到召唤时去当兵打仗。妻子的责任同样很重要，其家务包括看护家人、种植和收获粮食、打扫家庭卫生、举行一些神圣的家庭仪式来祈祷幸福、织布、提供贡献品，以及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等。

孩子的出生是欢庆的时刻，并有许多仪式，其中包括把胎盘埋在房子的泥地中。如果是女儿，她们的脐带要被埋在靠近壁炉的地方。人们会请求祭司占卜孩子的未来并起名，然后按照性别，给孩子赠送一个小吉祥物作为礼物。小女孩一般会收到一套炊具和织布梭，男孩子会收到耕地的工具、武器和其他预祝其在将来的战斗中获胜的东西。

纳瓦人的孩子们很受珍爱，并受到严格的教养。在成长期，男孩女孩都要去上学。平民和贵族的孩子都有各自的学校。他们的父母教导他们学习承担家庭里不同的角色。想成为神庙女祭司的女孩子们可以去一种特殊的学校。孩子们接受教育，为今后承担的许多责任做准备，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为今后成为统治者、祭司、学者、科学家、法官或者艺术家做准备。

纳瓦人的社会礼节很完备，因此他们的语言中有很多固定的句式，以及高雅的言辞。男人们用一种特殊的语式相互交谈。在一些正式演讲中，长者告诫孩子们要谦虚，对上级要尊重。理想的人格是"外貌和心灵"都要美好。在15和16世纪，墨西卡社会拥有大量教养良好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其他专家，他们的影响和贡献被认为对王国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

72 国王依兹扣特尔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特拉凯莱尔(Tlacaelel)之间的政治合作给墨西卡社会带来了很大好处。特拉凯莱尔是一个天才，他让

这个阿尔特佩特尔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很快，特拉凯莱尔赢得了一个不祥的头衔“西瓦扣特尔”(Cihuacoatl，意为“母蛇”)，因为他帮助统筹策划了墨西卡的神学、宗教和战争等各方事务，为王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财富。正是在依兹扣特尔和特拉凯莱尔的共同领导下，阿兹特克帝国建立起来了。国王和特拉凯莱尔建设了新的广泛的贸易网络，这不仅给墨西卡人带来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货品和再分配的贸易盈余，而且还带来了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大量奢侈品，从而改写了墨西卡的历史。

得到这些资源主要依靠一批被称为波奇特卡(pochteca)的精明商人。他们到已知也到未知的地方去获取战略情报，并促进贸易发展。当外国人抵制阿兹特克人的侵扰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一旦这些外国人被征服(只有一小部分人能长期抵抗住阿兹特克人的攻势)，这些新的臣民就被要求提供贡品，包括任何被要求贡献的土特产品，以及被用来做劳力和祭品的年轻男女。例如，在 16 世纪，韦拉克鲁斯附近的托奇特佩克(Tochtepec)被要求每年进贡 16 000 个橡胶球供帝国玩球戏。此外，除了偶而勒索贡品以供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城举办一些特殊活动使用外，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阿兹特克帝国的扩张带来的好处是地方和地区性市场的发展。食物、手工制品、纺织品、药品、奇珍异宝和奴隶只是市场上所提供的物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市场位于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这是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岛上的一个伙伴王国。在重要的市场贸易日，大约有 5 万人来此市场。市场上的物品非常丰富，以至于需任命法官来维持公平贸易。货币的形式经常是几块布，或者一定数量的可可豆。不止一次发现可可豆被假冒，有人在里面塞了些土粒或谷物来冒充可可豆。

除了享受市场上这些丰富的物品，阿兹特克人还支持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行会，将大部分珍贵的物品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阿兹特克人将他们的物品样式和作品风格比作托尔特克式，但是实际上，阿兹特克艺术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来自征服者和当地幸存者的第一手资料都证明了阿兹特克装饰艺术的独特风格。例

如，中美洲许多地区的羽毛制品工艺，在头饰、盾牌、扇子和宫廷服饰中体现出来，并且毫无疑问，宫殿、神庙和住宅中也装饰有羽毛挂毯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其他奢侈品包括精心制作的陶器、马赛克、金器、银器、铜器，宝石、翡翠和龟壳是大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73

而与这些精巧的艺术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兹特克人的石头雕像。他们仅仅用石制工具就雕刻出大量巨大的，通常令人畏惧而又魂牵梦绕的神像。例如，威齐洛波奇特利的母亲夸特利奎(Coatlicue)的雕像大约重 16 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是为了显示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神的尊崇。他们的街头、神庙广场和其他地标建筑等，也都装饰着诸如长满獠牙的蛇头，石头头颅，骷髅人像，以及高大健壮、和真人一样大的挑夫之类的石像。

毫无疑问，阿兹特克人最高的美学成就体现在文学和音乐上。每一个纳瓦人的阿尔特佩特尔都有从自己的编年史中衍生出的文学传统，哲学、神学和天文学理论，王朝的谱牒，以及口述历史等。它称颂自己的历史遗产和成就，以抬高自己贬抑他人。“黑与红”(Intlilli in tlapalli)是纳瓦特尔语中书籍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书籍里充满了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纳瓦人用当地一种叫做阿马夸布伊特尔(amaquabuitl，又叫纸树)的树的皮制作纸，以这种纸写成他们珍贵的书籍并与地图、进贡记录，以及其他官方、私人的文件等一起保存在王室图书馆里。

除了文学成就，阿兹特克人也是历史和口头作品的大师。在广大民众里，圣贤人物的智慧被认为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统治者、祭司、学者、书记员和艺术家一起创造了阿兹特克的文学规范。在战争胜利、新国王继位、关于某个神的节日纪念活动、日历上规定的典礼活动日等场合，这些书籍被公开展示，其中记载的秘密信息也被公诸于世，书中的人物形象被大家牢记住。伴随着音乐、舞蹈、烧香，纳瓦特尔语的说唱文学就这样不断地将阿兹特克所有的文化经典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了。

到 1428 年，墨西卡人强大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的经济大繁荣确保了他们与另两个阿尔特佩特尔——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一道创立一个三头权力结构，由此成立了现在我们所称的阿兹特克帝国。“母蛇”特拉

凯莱尔活得比伊兹扣特尔和他的两个继承者还要长。和其他两个王国联盟后，三国联盟利用其联合武力，大力扩张其领土。就其自身来说，阿兹特克的战争场面的确值得一看，因为许多战士加入到了很受人尊敬的骑士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纹章标志、旗帜、服装、特权和战争礼节。老鹰和美洲虎骑士团最为声誉卓著。

74



在这幅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欧洲幻想绘画作品中，蒙特祖马·霍科约特尔身着美洲传统服饰，背景则是罗马式的建筑。

在此时期，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成为展示的橱窗。除了雕塑，它还建了一些宏伟的宫殿和神庙，此后的历任统治者继续扩建了这些建筑。据估计，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拉特洛尔科的市区加起来接近 16 平方公里。到 16 世纪，帝国的宫廷成为一个有围墙的大居住区，里面包括很多仓库来贮存贡品和战争中劫掠的战利品，还有房间、球场、颅骨架、统治者和家人居住的宫殿、动物园、花园、图书馆、法庭和军械库。为了满足阿兹特克宫廷的需要，每天有几百人来提供服务，其阔绰和奢华超过了其他任何已知的北美土著人。

75

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霍科约特尔(Moteuczoma Xocoyotl，习惯上称其为蒙特祖马)注定要代表阿兹特克帝国和科尔特斯等西班牙人进行谈判。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智慧、个人风格和领导能力都是他那个时代及其传统的典范。在他的宫廷里有一个双神殿的神庙，即主神庙(Templo Mayor)，两座神殿分别用来祭祀雨神特拉洛克和威齐洛波奇特利。主神庙被认为是阿兹特克世界的中心，因此是一个神圣且有神力的地方。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宗教专家都倾向于认为，主神庙是阶段性地逐渐建造起来，被用来纪念几个世纪前威齐洛波奇特利出生时在科亚特佩克(Coatepec，意为"蛇山")所经历的和他的母亲及姐姐的野蛮故事。蛇形台阶的底部雕刻着一个被砍头的科利约尔克萨乌基巨大雕像，美化神庙的象征图案，查克姆尔，埋葬象征帝国疆域以及财富的献祭品场所，还有各种第一手记载，都证明了阿兹特克神无所不能的声誉。实际上，特拉凯莱尔以及后来的阿兹特克统治者都极力培养这种观念，即无情的威齐洛波奇特利神控制着他们的生活。

阿兹特克用时代或者太阳周期计算宇宙和时间，而且大都受宇宙神灵的古怪的想法所支配。先前 4 个太阳都已经在大灾难中消失了，现在是第 5 个太阳，也是最后一个，它将会在一次大地震中结束。每 52 年，在一个特定的日子，纳瓦人会愤怒地举行一场神圣的祭祀火的仪式，这预示着另外一个历法周期开始了。带着无比的尊敬和赎罪的心情，所有的火被熄灭了。房间被仔细地清洁，旧东西被清理掉了。当晚上来临时，一个人将被作为祭祀的牺牲杀掉，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

与此同时，神的化身爬上首都南部的一座山，然后用钻试图在被杀死的献祭者敞开的胸膛上点燃新的火种。火焰再次确保每一个人生命的安全。

政治活动在阿兹特克的首都中仍然很频繁，宗教活动则紧随其后。皇帝经常向神庙的祭司们咨询以确定何时进行战争比较吉利，以及解释不吉利的神灵和自然现象，例如彗星以及火山爆发产生的烟等。阿兹特克的神学家们掌握着一种集体性的、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宗教。这种宗教对人死后的生活并不是很关心，他们更关心此时此地的生活情况。就像阿兹特克人的哲学和诗歌所说的那样，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短暂和难以把握的，人类生活经常被比作正在开放的美丽花朵，这些花朵将会很快衰败并消失。

为了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享受生活，因此有必要按照帝国通行的规定来管理每一件事情，从处理通奸到喝龙舌兰酒(pulque)，再到何时以及同谁进行战争。他们举行一系列精心准备的仪式来纪念数目众多的神灵，包括他们旧有的，以及那些在征服过程中吸纳进来的。但是最骇人听闻的是要杀掉一定数量的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并将他们的心挖出来奉献给威齐洛波奇特利。它是战神，是太阳的使者。阿兹特克祭司们声称，要经常进行活人献祭。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进行战争之前，常举行献祭。皇帝还利用活人献祭来恐吓臣服于他的王国。据说，在15世纪80年代末期，有一次献祭杀了8万多人。

76

到了蒙特祖马·霍科约特尔的时代(1502－1520)，阿兹特克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互相交织在一起，但是皇帝的权威依然占统治地位。他亲自上战场进行战斗，或者在主神庙顶上和祭司站在一起，并且熟练地从一个战俘身上挖出心脏，这是为了神灵的荣光和国家的繁荣，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蒙特祖马是一个很正统的人，但是当面对阿兹特克圣书里没有解释过的情况时，例如面对在韦拉克鲁斯附近侦察的西班牙船只、没见过的马匹、可怕的狗，以及西班牙人本身的不可理喻的野蛮和暴力时，他很好地运用了其祖先积累下来的知识和实践。

阿兹特克的对外礼仪要求使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互相赠送礼物,包括妇女;安抚他们的神灵;以及格斗。但是中美洲几个世纪来的价值传统都不能同欧洲的体制和技术抗衡,何况他仍面对的是原本地位不复,一心想从阿兹特克人那里为自己获取战利品的西班牙人了。蒙特祖马的巨大帝国和宏伟的大城市,都不是科尔特斯及其同伴所能想象的。

表1　中美洲文化分期年表

分　期	起 始 年	结 束 年
古代时期		约公元前1500
前古典时期或者文明形成时期	约公元前1500	约公元100年
古典时期 中部墨西哥 玛雅	 约公元1年 约公元250年	 约公元900年 约公元900－1000年
后古典时期 中部墨西哥 玛雅	 约公元900年 约公元900－1000年	 约公元1521年 约公元1540年

77

表2　墨西卡和阿兹特克的领袖和国王

序号	名　字	统治时期	头　衔
1	蒙特祖马(Moteucçoma)	不详	
2	查尔奇乌特拉托纳克(Chalchiuhtlatonac)	不详	
3	瓜乌特勒克兹基·戴奥玛玛(Quauhtlequetzqui teomama)	1168－1205	特雅卡纳尼(teyacanani,意为“领袖”)
4	阿卡西特利(Acacitli)	1205－1219	特雅卡纳尼
5	西特拉利特津(Citlalitzin)	1219－1234	特雅卡纳尼
6	津潘(Tzinpan)	1234－1235	特雅卡纳尼
7	特拉祖津(Tlaçotzin)	1235－1239	特雅卡纳尼
8	托兹奎奎斯特利(Tozcuecuextli)	1239－1278	特雅卡纳尼

（续　表）

序号	名　字	统治时期	头　衔
9	韦韦·威齐利威特尔（Huehue Huitzilihuitl）	1278－1299	墨西卡-奇奇梅克的特拉陶尼（国王）
10	特诺奇津（Tenochtzin）	1299－1363	夸乌特拉陶尼（代统治者）
11	阿卡马皮奇特利（Acamapichtli）	1367－1387 （1376－1396）	墨西哥第一位特拉陶尼
12	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	1391－1415 （1397－1417）	特拉陶尼
13	奇马尔波波卡（Chimalpopoca）	1415－1426 （1417－1427）	特拉陶尼
14	伊兹扣特尔（Itzcoatl）	1427－1440	特拉陶尼
15	韦韦·蒙特祖玛·伊尔威卡米纳·查尔奇乌特拉托纳克（Huehue Moteucçoma Ilhuicamina Chalchiuhtlatonac）	1440－1468	特拉陶尼
16	阿克萨亚卡津（Axayacatzin）	1469－1481	特拉陶尼
17	蒂索克（Tiçoc）	1481－1486	特拉陶尼
18	阿威特索特尔（Ahuitzotl）	1486－1502	特拉陶尼
19	蒙特祖马·霍科约特尔（Moteucçoma Xocoyotl）	1502－1520	贝伊特拉陶尼（众王之王）

注：

在不同的年表中，日期会有些不同。其他供选择的时间在括号里标出。

来源：

Don Domingo de San Antón Muñón

Chimalpahin Quauhtlehuanitzin，“The Diario”，Bibliothèque Nationale，Fonds Mexicain 220，pp. 72－75，104－106.

另请参阅 Elizabeth Hill Boone，*The Aztec World*，Montreal and Washington，D. C.：St. Remy Press and Smithsonian Books，1994 年，p. 47.



领兵征服墨西哥后，科尔特斯返回了西班牙，并于1522年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墨西哥行政长官之职。查理五世海授予他统治墨西哥谷地的世袭领主权(señorío)，以及瓦哈卡谷地侯爵的头衔。

第三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罗斯·哈希格

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故事不仅仅是又一段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而且相关的第一手记述材料也完全是西班牙人留下来的。这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顺着他们当年设计的路线来理解这个故事。此外，征服者的记录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让西班牙人相信这些征服是合法的，确保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以及让他们的行为能够赢得土地和财富。 79

西班牙向墨西哥的扩张是其探索和殖民西印度行为合乎逻辑的延伸。在行政长官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略斯（Diego Velásquez de Cuellos）的授权下，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于 1517 年 2 月 8 日离开了古巴，随行的有 3 艘船和 10 个人[1]。3 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了尤卡坦的卡托切（Catoche）海角。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看见了当地土著人的城市和发达的文明。但是西班牙人声称自己的国王对此地拥有主权，这就和当地统治者产生了冲突，于是这些全副武装的西班牙人很快陷入了和当地人的战争。尽管有两人死亡，更多人受了伤，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占据了上风，土著

① 原文如此，疑为"110 人"。与后文人数不符。——编者注

人被迫弃城,西班牙人则立刻冲入城中掠取了很多黄金。

科尔多瓦迅速沿着尤卡坦半岛海岸航行,途中数次登陆补充给养。但是由于降雨很快流入尤卡坦半岛常见的石灰岩层里,因此只有在赛诺特(cenotes,即天然水井)里才能找到淡水。这里也看不见流向大海的任何河流。西班牙人知道只有找到玛雅城市才能找到水井。在有些地方,如坎佩切(Campeche),玛雅人允许西班牙人取水,但是他们通常拒绝让西班牙人这么做。

在钱波通(Chanpoton,或写作 Champotón),得益于优势的武器,西班牙人打退了围困他们的玛雅人,但是 50 人被杀死,两人被活捉,还有一人受了伤。4 月 20 日,科尔多瓦坐船回到古巴,他最后也在那里去世。

80

这样一来,贝拉斯克斯意识到了这个新发现地区的富足。他派出了第二支远征军,并委任胡安·德格里哈尔瓦(Juan de Grijalva)为首领。1518 年 5 月 3 日,格里哈尔瓦率领 200 人到达了科苏梅尔(Cozumel)。格里哈尔瓦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在海岸边侦察,同时避免和玛雅人战斗。但是当他们试图获取补给而遭到玛雅人袭击时,他通常用大炮进行还击。为避免受到更多的袭击,这些西班牙人沿着海岸航行,一直到达了韦拉克鲁斯州中部。他们在 1517 年 4 月 20 日[①],从那里又按照原路返回到古巴。

科尔多瓦和格里哈尔瓦都没有在他们所遇到的土著人集团中造成长期性地,或者根本性地改变。但是格里哈尔瓦的远征军的确和韦拉克鲁斯的阿兹特克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的接触,并且他们到达的信息传到了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现在的墨西哥城)里的蒙特祖马国王那里。国王和其顾问们讨论了他们的到来,但决定不采取直接行动,而是派人去海岸边进行观察。

阿兹特克人按照自己的知识背景来解释西班牙人的到来意味着什么。西班牙人不像他们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一种人,而且还拥有神灵一样的技术能力(大炮、火绳枪、有帆的船、马、金属武器等),因此他们认

---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注

为西班牙人是超凡的神灵。不过，把西班牙人等同于克察尔科亚特神则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不论这些入侵者是神还是人，阿兹特克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军队的到达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被预测，但西班牙的船只却能够在不发出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在几百英里长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个地点登陆。阿兹特克人不可能守卫整条海岸线。

格里哈尔瓦还没返回古巴时，贝拉斯克斯就任命埃尔南·科尔特斯指挥第三支前往墨西哥的远征军。科尔特斯的当选颇有争议，他最终能够得到这项任命，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贝拉斯科斯的秘书安德罗斯·德杜罗(Andros de Duero)以及国王的会计师阿马多尔·德拉雷斯(Amador de Lares)的游说，他们俩都是科尔特斯的秘密盟友。

这次远征征募了 350 多人。此时，有谣言称科尔特斯将不会严格遵从贝拉斯克斯的命令，这使得后者转向其对立一方。为了逃避行政长官撤销他任远征军司令的计划，科尔特斯急忙离开了古巴的圣迭戈。他首先驶往特立尼达港，然后去哈瓦那。在那里，他获得了更多的补给和人手。尽管贝拉斯克斯命令地方政府抓捕科尔特斯并送他进监狱，但是此时科尔特斯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1519 年 2 月 10 日，科尔特斯驶往尤卡坦半岛，同时到达的还有 11 艘船，多达 450 名战士(包括 13 名火绳枪手和 32 名弓箭手)，4 门被称作“小鹰”(falconet)的小炮，10 门铜炮和 16 匹马。他在科苏梅尔登陆，这里曾是格里哈尔瓦的远征军靠岸的地方。他在这里作出了一系列性命攸关的决定，这将对这次远征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他派出一艘船寻找据传被玛雅人虏获的西班牙人。1511 年，18 个西班牙人在尤卡坦半岛遭遇船只失事，只有两人幸存。其中一个是贡萨洛·格雷罗(Gonzalo Guerrero)。他现在身上纹着当地人的图腾，娶了一个印第安女人，有了一个家庭，并且还在玛雅社会升到了很高的位置。他已经被同化了，拒绝回来。但是另外一个人，赫罗尼莫· 德阿吉拉尔(Gerónimo de Aguilar)加入到科尔特斯的队伍中，并在整个征服过程中，担任备受信任的玛雅语翻译。

81

科尔特斯沿着尤卡坦半岛海岸，到达了波通钱(Potonchan)，并在此登陆。他们遇到武装人员时，科尔特斯命令阿吉拉尔用玛雅语向敌

人宣读谕令，命令他们承认教会、教皇和国王的权威，如果不服从，就将受到惩罚。然后，远征军击败了印第安人，并夺取了市镇。

在此后的战斗中，大约35个西班牙人丧命。玛雅人表示效忠，并赠送了礼物，包括20名女子。这些女子中，有一人来自墨西哥湾南部的科亚查扣尔科(Coatzacoalco)地区。她被称为拉玛琳奇(La Malinche)，在她受了西班牙人的洗礼后，又叫作唐娜·马琳娜(Doña Marina)。

马琳娜既会说玛雅语，又会说纳瓦特尔语，她作为科尔特斯的翻译，在征服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她作为翻译的作用被夸大了。首先，墨西哥湾南部的许多人都会说这两种语言，因为在这些地方，这两种语言很相近。这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像马琳娜一样轻松地充当翻译。第二，至少有两个西班牙人奥尔特吉利亚(Orteguilla)和胡安·佩雷斯·德阿蒂亚加(Juan Pérez de Artiaga)在特诺奇蒂特兰陷落之前就学会了纳瓦特尔语，当然这就减小了马琳娜的重要性。第三，虽然玛雅语和纳瓦特尔语的互译很有用，但是西班牙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翻译更重要些。跨越这两种语言的是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而不是马琳娜。他既说西班牙语又说玛雅语，并在整个征服过程中陪伴着马琳娜。

在波通钱打败了玛雅人之后，科尔特斯将他们的神像移走，换上了十字架，以此确立了一种名义上将这些臣服的人归化为基督徒的模式。他将在今后的征服过程中沿用这种做法。西班牙人在波通钱住了5天，照顾他们的伤员，然后开始继续向墨西哥进发。玛雅人声称他们的黄金和珠宝都是来自那里。

4月21日，科尔特斯到达了韦拉克鲁斯中部海岸的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e Ulúa)，格里哈尔瓦曾经在这里建造了港口。在这里，他的船遇到了当地的阿兹特克总督滕特利尔(Tentlil)派来的独木舟，上面坐满了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得到了食物和货物后离开了。科尔特斯将士兵、大炮、马匹运上了岸，并在此安营扎寨。第二天，滕特利尔带着4 000人从奎特拉奇特兰(Cuetlachtlan)来到这里，并带来了食物和礼品，其中包括许多黄金制品。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证实了玛雅人的说法。但是阿兹特克人的真正目的是为蒙特祖马搜集信息，随

行的艺术家将他们看见的每一件东西都画了下来。大概是为了在心理上让阿兹特克人觉得他们高人一等，西班牙人展示了武器，还表演了策马飞奔以及开炮射击等。阿兹特克人驻扎在西班牙人附近，向他们提供食物，同时等待着蒙特祖马的应对之策。

一个星期之后，滕特利尔的人从蒙特祖马那里带回更丰厚的礼物，同时也带来一个要求，即西班牙人要留在海岸边，不能去特诺奇蒂特兰。国王要求西班牙人将营帐移到 6－7 里格之外的一个村庄里。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这说明西班牙人不会甘心和阿兹特克人保持那种有限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因为很难确定西班牙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和阿兹特克人的关系，蒙特祖马不敢直接挑战西班牙人，但是他的阿兹特克同胞却在 5 月 12 日将帐篷拆了，这让西班牙人同样惴惴不安，害怕遭到袭击。

82



蒙特祖马的使团给西班牙人送来食物。他们送上了洒着人血的墨西哥面饼，但西班牙人拒绝接受。不过，西班牙人确实吃了其他的墨西哥面饼、火鸡、火鸡蛋和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使团中包括几名巫师。西班牙人指责他们诅咒了自己，不过诅咒没有生效。

一旦西班牙人拒绝了他的条件，那么对于蒙特祖马来说，继续提供食物和草料以及其他物质保障给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就意味着他向西班牙人屈服了。政治上，蒙特祖马没有选择，但是由于断绝接触，他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通过监视西班牙人以及派遣使者，阿兹特克人确信自己能与对方保持接触，同时也能阻止其他本地的族群接近西班牙人。但是一旦政治谈判的失败迫使阿兹特克人后退，就不能防止其他集团的人和西班牙人进行接触了。不到 3 天，当地的托托纳克人(Totonacs)就拜访了西班牙人，这让科尔特斯明白了阿兹特克人有他们自己的敌人。

和心怀不满的当地人建立联系很重要，但维持西班牙人内部对科尔特斯的支持同样重要。许多人想回古巴，特别是那些忠于贝拉斯克斯的人。但是科尔特斯耍了个法律花招，建立了比利亚里卡·德拉韦拉克鲁斯(Villa Rica de la Veracruz)镇，同时还设了一个议会，声称其权力直接来自国王查理五世。这个捏造的法律事实至少在理论上绕过了行政长官，让所谓“选举”产生的镇议会可以借国王的名义，重新任命科尔特斯为首领，这就让他免受贝拉斯克斯的限制。

83

新大陆的领导者已经习惯了独立自主，因为路途遥远，而且每年适合航行的时间很有限，向国王请示通常需要一整年的时间，科尔特斯利用了这种时间差。在武力威逼他停下来，或者权威的皇家敕令直接下达之前，他将努力征服墨西哥。他自己的行动将决定其命运。失败意味着被判处叛国罪，但是如果成功，这就意味着土地、财富和国王的支持。因此他就不必管贝拉斯克斯是否反对了。

因此科尔特斯所耍的法律花招与其是想让其行动合法化，不如说是要拖延执行贝拉斯克斯的命令，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一个借口，并且一旦成功，未来其行动就可以合法化了。尽管如此，当贝拉斯克斯的支持者发现了科尔特斯的行动时，他们还是开始抗议了。于是科尔特斯安抚他们说，任何人想回古巴都可以。他大概从来没有必要兑现这个诺言，或者他压根没有想过要这么做，因为他向贝拉斯克斯的支持者许诺分给他们更多的战利品，由此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在至少暂时巩固了西班牙人对他的支持后，科尔特斯开始转向试图赢得印第安人的支持。6月3日，他来到了附近的塞姆波瓦兰(Cempohuallan，即塞姆鲍拉[Zempoala])，也就是托托纳克人所在的地方。托托纳克人对他盛情款待，并赠以厚礼。当地的统治者表达了对阿兹特克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要向阿兹特克人进贡，所以他们很愿意和西班牙人联合起来对抗阿兹特克人(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们自然流露的感情，还是科尔特斯挑动他们这么干的)。这次联盟让科尔特斯第一次知道了阿兹特克人和其附属国之间的不谐情绪和政治裂痕，而他果断地利用了这一点。

科尔特斯大概被托托纳克人表达不满的话误导了。在欧洲，附属国敢于反抗宗主国，其表达方式要比墨西哥的激烈得多，这是因为阿兹特克和西班牙帝国之间表面上类似，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欧洲人通常先征服一个新地区，然后将这些地方合并起来，以便能榨取更多的贡品(尽管按照欧洲的方式替换当地的统治者和维持军队需要很高的行政成本)，但是阿兹特克人征服一个城市后，会让当地的政权保持完好。这种霸权方式要比欧洲模式获得较少的贡金，因为它放松了控制。但是这也让士兵不必进行更多的军事扩张活动。

使得这个间接统治系统能够运转的因素不是武力，而是权势(一种认为阿兹特克人总能够达成他们目标的感觉)。阿兹特克附属国一般自己处理内部事务，但是整个制度的成功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因为如果国王软弱无力或者优柔寡断，那么帝国就会很脆弱并易于衰落。因此，国王的武勇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荣誉的问题，而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果老国王死了，而继承人不是强有力的人物，那么这个制度将会瓦解。当然，托托纳克部族是阿兹特克的附属国，向其效忠并交纳贡金，但是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功能依然保持完好。西班牙人的出现改变了当地政治体系的平衡，从而打破了托托纳克人服从阿兹特克人的制度基础，而且他们和西班牙人的联盟也使权势平衡发生改变，倾向于对西班牙人有利的方向。

84

如果没有技术优势，科尔特斯就很难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西班牙

人很少,人数上的劣势使他们很容易被对手压制和消灭。而且由于科尔特斯的政治地位,他也很难在西印度地区招募更多的西班牙士兵。替代的办法是分化印第安人,而在征服的过程中,科尔特斯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他许诺帮助托托纳克人反对阿兹特克人。

科尔特斯和托托纳克人相处了几个星期后,他发现其他城市对阿兹特克人也充满怨恨。他也许诺帮助这些城市。当阿兹特克派去收贡品的 5 个人到达塞姆波瓦兰时,科尔特斯命令托托纳克人把他们抓住,并拒绝交纳任何贡品以及服从蒙特祖马的命令。托托纳克人照做了,但是科尔特斯是否实际上计划这么做,还是仅仅向国王证明他自己的信誉,这并不清楚。无论如何,托托纳克人抓捕了这些收贡品的人。按科尔特斯自己的说法,他事前并不知道抓捕收贡品的人这回事,并释放了其中两个人,想让蒙特祖马相信西班牙人还是他的朋友。当然,托托纳克人对此很是不安。于是科尔特斯假装很愤怒,说这两个人逃跑了。但是紧接着,他又秘密地释放了剩下的 3 个阿兹特克人。

科尔特斯当然有可能在作假,他记述这些事件是在 3 年后的 1522 年,说这些事都是计划好的,也许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科尔特斯不能够完全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因为他没能理解当地国王和阿兹特克国王的权势大小和各自的局限性。第二,他不知道周围摆开阵势对付他的军队有多少人。第三,他不明了他们军队的能力如何,因为他只和组织性较差的玛雅人打过一仗。第四,如果他是故意将阿兹特克人抓了又放,并且向托托纳克人否认这是故意的行为,那这就是他和当地土著人多次结盟时撒下的最大的谎。如果事实如他所说,他的这种行为大概出自于无知,那么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此作了调整。但是,西班牙人和托托纳克人之间存在潜在的误解是很大的,以至于科尔特斯赢得了托托纳克人的信任,却没有和阿兹特克人断绝关系。

科尔特斯声称忠于阿兹特克人,但是他却没怎么信守诺言,不过,托托纳克人也是如此。这个地区的政治关系就是这样。如果托托纳克人知道他们和科尔特斯的联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将会很快重新屈服于阿兹特克人。虽然托托纳克人有可能背叛其盟友,但是他们一定看

85

出了西班牙人很强大，因而抓捕阿兹特克收贡品的人一事不管是谁挑起的，都会促成这种局面。

打造联盟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旦他们确立了联盟，就开始建造并巩固比利亚里卡·德拉韦拉克鲁斯城。在此期间，科尔特斯和阿兹特克人的信使保持着联系，他的盟友托托纳克人对此很警觉。当托托纳克人向科尔特斯提出，要他帮助他们袭击阿兹特克人的军营蒂萨潘津科时，他的处境很尴尬。他不想和阿兹特克人闹翻，但又需要托托纳克人的支持来进军内地，甚至就是住在此地也需他们的帮助，后者是更迫切的需要。于是科尔特斯派了他所有的400人和4 000名印第安人一起去参加战斗。但是当联军到达蒂萨潘津科时，阿兹特克人已经离开了。也许托托纳克人其实早知道如此，但是科尔特斯的行动表明他信守了诺言。不论如何，这次公开的行动巩固了科尔特斯和托托纳克人的联盟，他获赠了8个女子，都是国王和贵族的女儿。

在中美洲，联盟的统治家族彼此通婚是加强政治联系的通常做法。即使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对于塞姆波瓦兰的人们来说却很重要。托托纳克人与西班牙人联姻之后，科尔特斯又通过宗教归化将塞姆波瓦兰的统治者和他牢牢绑在一起，当然这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

科尔特斯试图使塞姆波瓦兰的人们归化为基督徒大概也有宗教上的考虑，因为他首次到达塞姆波瓦兰时，曾经试图释放那些被用作祭祀牺牲的奴隶们。被拒绝后，他出于建立政治联盟的需要，马上放弃了宗教上的考虑。只有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科尔特斯才进行宗教改宗，并摧毁了托托纳克人的偶像。西班牙人将基督教的物品放到塞姆波瓦兰的神庙里，这引起了当地民众和祭司的激烈反对，可见任何这种改宗至多只是表面的。此外，科尔特斯一直拖到当地统治者在政治上开始依赖西班牙人时才进行宗教改造，这就表明了背后的政治考虑。由此，他既可以向西班牙王室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又可以迫使塞姆波瓦兰的统治者摧毁自己的旧神灵，并引进新的神灵，否则就会失去来自西班牙人的支持，从而导致阿兹特克人的报复。

在整个征服过程中,其他西班牙船只也陆续到达墨西哥。其中一艘船刚好在此时到达,带来了查理国王已经授权贝拉斯克斯与墨西哥进行贸易并建立殖民定居点的消息。科尔特斯认为这对自己有利,于是在7月6日派遣一艘船到西班牙,不但带去了国王应得的五分之一财物,而且还带着搜集到的所有黄金。但是这艘船违反科尔特斯的命令,首先到达了古巴,这时有关科尔特斯背叛行政长官的消息已经传到贝拉斯克斯那里,这促使行政长官准备派一支舰队去捉拿他。

此时,科尔特斯和他的同伴之间又发生了问题。大概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新的想法,或者是因为他将所有的战利品都送给了国王,或者是他们对目前的危险局势有了更新的认识。于是,科尔特斯借口忠于贝拉斯克斯的人密谋抢夺船只意图驶向古巴,逮捕了他们,宣布判处2个主要的密谋者绞刑,砍掉导航员的双脚,其他人每人处鞭刑200下。不过这项判决并没有完全执行。不论是否有此项密谋,科尔特斯利用这个借口,卸完了剩下10艘船的货物,并凿沉了这10艘船,这样他的人就无路可逃了。然后他继续实践向内地进军的计划,让胡安·德埃斯卡兰特(Juan de Escalante)留在韦拉克鲁斯指挥60－150名士兵,并从托托纳克人那里借来40－50名士兵和200名挑夫。8月16日,科尔特斯和300名西班牙士兵离开了塞姆波瓦兰。

86

虽然蒙特祖马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但阿兹特克人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公开反应。而且,自从格里哈尔瓦登陆以后,他就在和顾问们商量如何对付这些西班牙人。一旦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即使是国王做出的任何决策变动,也会削弱政治上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却是国王获得所需支持的政治基础。所以,科尔特斯的军队能够不受干扰地前进。

按照塞姆波瓦兰人的建议,科尔特斯不顾阿兹特克人此前的友好,采取了敌对行为:向特拉斯卡兰(Tlaxcallan,即Tlaxcala)进发。特拉斯卡兰人应该已经知道西班牙人已经登陆,正向内地进发,托托纳克人和忠于阿兹特克的附属国一直伴随着他们,而且也意识到阿兹特克的盟友为他们提供食宿。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班牙人怀有敌意。

接近特拉斯卡兰边境时，西班牙人看见了一小队武装的印第安人，并试图捉住他们。但是西班牙人遇到了抵抗，几匹马和几个骑手受了伤。西班牙人继续追赶，但是中了埋伏，结果他们侥幸逃了出来，又有几个人受伤，一个人阵亡。

特拉斯卡兰的军队是科尔特斯在中美洲遇到的第一支职业军队，他也严重低估了其威胁，这既是军事威胁也是政治威胁。如果科尔特斯被打败，或者被驱赶走，他的盟友将认为他很软弱，会中止援助，甚至有可能背叛他。不论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科尔特斯赌他能战胜一切对手。其盟友可能的反应阻止科尔特斯采取最谨慎的军事行动：撤退。

第二天，尽管科尔特斯一再力求避免，另外一场战斗还是开始了。如果不能找出脱离困境的方法，科尔特斯最终将失败，不论他有什么技术优势，因为敌军的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短期内，西班牙人只能用大炮、火绳枪、弩弓将特拉斯卡兰人逼退，但是他们很难发动进攻。

尽管西班牙人的火力最终将密集的特拉斯卡兰人打退，但形势非常危急，因为他们不能将这场战斗搞成一场消耗战，否则他们最终将会失败。因此，西班牙人向周围的村镇发动进攻，希望能找到些粮食，但是却一无所获。特拉斯卡兰人实行了“焦土策略”。

87

西班牙人只有几天的供应了，于是他们再次倡议和谈，但是这次不像以前那么成功。第二天，袭击又开始了，科尔特斯把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射击，一部分趁此机会给弩弓和火绳枪装弹药。这样便能集中火力来对付特拉斯卡兰人的队伍，并最终打退了敌人。

迄今为止所使用的中美洲人的常规战术对于特拉斯卡兰人来讲也是代价沉重的，于是他们发动了夜袭。在黑夜里，特拉斯卡兰人很难保持通讯联络和进攻队形，因此西班牙人的大炮和弩弓在夜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这些武器比印第安人的武器杀伤力大，射程也更远。当特拉斯卡兰人最终靠近来进行徒手搏斗时，他们已经穿过了一大片西班牙人严酷的火力网，死伤惨重。西班牙的火力之强远远超过特拉斯卡兰人的想象。但是夜袭也多少削弱了西班牙的这种优势，因为在黑暗中

更难瞄准目标。

领导特拉斯卡兰人进行袭击的是西科滕卡特尔(Xicotencatl)将军。他后来成为西班牙人眼里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叛徒。弓箭手、掷石手(索具手)、掷枪手从三面袭击了戴着头盔的西班牙人,同时剑手迅速地冲过火力网的有效杀伤地带,开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种战术削弱了西班牙人的火力优势,但是骑马的长枪兵扰乱了特拉斯卡兰人的队形,印第安人在黑夜里无法重新集结,于是撤退了。

自从离开韦拉克鲁斯,大约有 45 名西班牙人阵亡了,另有 12 人生病,16 匹马中有几匹被杀死了,粮食供应正在减少,同时减少的还有炮弹、铅丸和火药。于是科尔特斯再次求和,同时威胁将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尽管他知道其实他们没有能力这么做。双方都尽力减小自己的损失,而且都不知道对方的实力。但是很明显,特拉斯卡兰人能够击败这些西班牙外来者,尽管这要付出很大代价。损失很大、补给品减少,还可能彻底灭亡,因此科尔特斯的人很可能进行兵变,尽管科尔特斯通过哄骗和许诺一再劝说他们继续待在这里。

科尔特斯再一次发动进攻,洗劫了附近的几个小村镇,但是他的军队至此已经下降到大约 250 个西班牙人,10 匹马(都受伤了),200 名不能战斗的挑夫,以及盟友提供的不超过 100 名的印第安战士。虽然特拉斯卡兰人的伤亡数字现在还有疑问,但战斗最终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

特拉斯卡兰人也在考虑他们的处境。这种考虑有些当然是针对目前的战况,但主要却是源自特拉斯卡兰复杂的政治局势。特拉斯卡兰并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可以对战争做出权威性的决策,而是分成 4 个联合在一起的行省,各有各的统治者。

基亚威兹特兰(Quiyahuiztlan)、特佩蒂克帕克(Tepeticpac)、奥科特洛尔科(Ocotelolco)和蒂萨特兰(Tizatlan)省分别由希特拉尔波波卡特尔(Citlalpopocatl)、特莱韦霍洛特尔(Tlehuexolotl)、马西克斯卡特尔(Maxixcatl)和老西克滕卡特尔(Xicotencatl Elder)领导。每一个省的王位继承过程都充满变数,合法的继承是通常的模式,但特拉斯卡兰的王位继承历史也充满着混乱、暗杀、篡位和各省之间变化无常的关

系。当科尔特斯到达时，最强大的两个省是奥科特洛尔科和蒂萨特兰。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这些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马西克斯卡特尔和老西克滕卡特尔之间的斗争很有代表性。西克滕卡特尔很老了，眼睛也瞎了，而马西克斯卡特尔年纪很轻、更精力充沛，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老西克滕卡特尔已经基本上将领导权让渡给他的儿子小西克滕卡特尔。他也是军队的指挥官。一旦小西克滕卡特尔正式继承了王位，他将有可能控制马西克斯卡特尔以及整个联合体。

西克滕卡特尔父子都支持和西班牙人战斗，这也成为特拉斯卡兰联邦的政策，尽管没有记录表明其他三个统治者的态度。但是当小西克滕卡特尔没能很快取胜时，统治者之间开始产生分歧，这大概是因为各自想竞争领导权的缘故，当然也是由于已有的政治矛盾。无论如何，改变政策的结果就是在内部削弱了小西克滕卡特尔的权势(即使原来的目的不是这样)。因为和马西克斯卡特尔联盟的军队就像其原来的联盟城市韦霍津科(Huexotzinco)所做的那样，已经在战场上抛弃了他。

他们决定和西班牙人讲和。其实他们有能力继续战斗，直到彻底打败西班牙人。他们也可以停止战斗，让西班牙人尽快离开。或者他们也可以和西班牙人结成联盟。尽管这个决定反映了长久以来的政治现实，但讲和实际上符合特拉斯卡兰人的利益。

特拉斯卡兰人和阿兹特克人已经进行几十年的战争。但是现在他们被阿兹特克人的附属国包围，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此时，西班牙人出现了，势力平衡被打破。和中美洲通常的武器相比，西班牙人的大炮、火绳枪和骑兵能够轻易地冲破敌人的阵形。尽管西班牙人很少，不能完全有效地利用突破形成的缺口，但是如果和大量的印第安士兵联合在一起，他们就能对敌人形成毁灭性打击。

特拉斯卡兰人非常熟悉中美洲其他部族军队的情况和战术，他们已经看到了联合的优势，这样就可以利用西班牙人作为他们数量巨大的印第安人军队的突击部队。至于西班牙人是否也已经迅速意识到了这一优势，其实并不重要了。因为是否联合取决于特拉斯卡兰人。他

们本来可以打败西班牙人或者撤退。寻求联盟是一个经过精心考虑的决定，而且是他们单方面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其他三个统治者的共识，但是小西克滕卡特尔反对。三人要求小西克滕卡特尔停止战斗，但是他拒绝了。直到当他们号召他的部下不再听命于他，并三次派人重申他们的决定后，小西克滕卡特尔才停止抵制。

89



科尔特斯派了一名塞姆波瓦兰人作为使者去见特拉斯卡兰人。这名使者(图中站立者)正在对特拉斯卡兰的诸位头领讲话，几位头领可能代表着特拉斯卡兰的四个省，不过图上没有文字指明每个人的身份。

特拉斯卡兰人于是派了四个贵族到西班牙人的营区，宣称他们相信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是联盟，而先前的战争是由奥托米人(Otomies)引起的，特拉斯卡兰人并不认识他们。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样就使得特拉斯卡兰人和科尔特斯名义上平等地提出并接受议和。

此时，阿兹特克使者正陪伴着科尔特斯，他们要求科尔特斯在蒙特祖马皇帝的旨意来到之前，不要进行议和之事。科尔特斯答应了。西

班牙人的记述声称，蒙特祖马要求科尔特斯不要去，还说愿意成为他的臣属国，并向他交纳贡金。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毫无疑问是自我吹嘘。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将特拉斯卡兰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所以特拉斯卡兰的几位统治者来到西班牙人的营地和他们谈判。第二天是9月23日，这一天科尔特斯进入了特拉斯卡兰城。

当他们到达这个城市时，西克滕卡特尔送了一个女儿给科尔特斯，但他随即将她转送给了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马西卡特的女儿被送给了胡安·贝拉斯克斯·德莱昂(Juan Velaisquez de Leon)，其他贵族也将女儿送给了另几位西班牙人，总共大约涉及300名女子。不论科尔特斯将西克滕卡特尔的女儿送给佩德罗是否意味着他对各位统治者的地位早有高下判断，西班牙人被安排住在马西克斯卡特尔的奥科特洛尔科，而不是住在西克滕卡特尔的蒂萨特兰，这说明马西克斯卡特尔现在作为亲西班牙派的领导者，享有了更高的权威。

尽管科尔特斯不能强行让特拉斯卡兰人皈依基督教，但是他被允许在一座神庙里树立起一个十字架以及圣母的神像。他们也允许科尔特斯给这些统治者的女儿们进行洗礼，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皈依，而是从形式上表明不允许西班牙人和土著女子发生性关系，除非她们成了基督徒。在特拉斯卡兰，科尔特斯了解到了阿兹特克人的实力、军队，以及特诺奇蒂特兰城的情况和防卫状况。但是既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蒙特祖马还是未能征服特拉斯卡兰，科尔特斯相信特拉斯卡兰和阿兹特克人其实力量相当。他没有意识到对特拉斯卡兰人进行的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鲜花战争。

90

鲜花战争的目的是先压制对手于一地，然后慢慢地将他们包围起来，最后勒死他们。因此，虽然针对特拉斯卡兰的鲜花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阿兹特克人并没有直接派大军来袭。一旦阿兹特克人将特拉斯卡兰人彻底孤立，后者就会被压垮。但是科尔特斯没有分清楚不同战争类型的区别，而且他受到蒙特祖马不断送礼物和不发动攻击的现象的误导，因此出现了判断失误。

赠送礼物一般是为了承认臣属关系，虽然阿兹特克人从一开始就给西班牙人送礼物，但是阿兹特克人这么做是为了向“神灵”表达敬意，并不是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西班牙人的臣属。阿兹特克人没有攻击西班牙人，这让西班牙人认为阿兹特克人自甘为臣属，这也许是对的，但他们这么做其实还另有原因。一方面，蒙特祖马仍旧没有确定西班牙人到底想干什么。另一方面，当西班牙人在海岸登陆并向内陆进发时，贸然出兵会削弱这一地区对蒙特苏马的政治支持。最后，当时是 9 月，而阿兹特克人通常在旱季，即每年的 12 月到次年的 4 月才进行战争。那时收获季节已过，有更多的士兵可用，食物充足，道路易行，河流也容易趟过。但是蒙特祖马此举却被西班牙人解释为软弱。

17 天后，科尔特斯离开了特拉斯卡兰向乔洛兰(Cholollan，即乔卢拉[Cholula])进发，号称去寻找补给品。当科尔特斯要求进城时，乔洛兰人不情不愿地答应让西班牙人带着 5 000 — 6 000 名特拉斯卡兰战士进城。科尔特斯进入乔洛兰城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补给品，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乔洛兰人传统上和特拉斯卡兰及韦霍津科结盟，但是最近加入了阿兹特克人的阵营。因此，无论特拉斯卡兰人告诉过科尔特斯些什么关于乔洛兰人的情况，肯定都不是什么好话，因为他们认为乔洛兰人是叛徒。科尔特斯起初不愿意介入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但是他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征服乔洛兰人。他最后通过欺骗的手段达到了这一目的。

科尔特斯带队在一天之内基本走完了到乔洛兰的 5 里格路程，并在当晚扎营休息。在这里，城中的贵族带着食物前来欢迎他们。第二天早晨，在乔洛兰人的要求下，特拉斯卡兰人留在营区里，西班牙人带着大炮进入了乔洛兰城，只有塞姆波瓦兰人和特拉斯卡兰人陪伴在身旁[1]，他们受到了良好的食宿招待，可是两天后，食物招待不知何故停止了。

91

按照西班牙人的记述，翻译唐娜·马琳娜获悉乔洛兰人阴谋屠杀

① 原文如此，此处对特拉斯卡兰人的说法疑有矛盾。——编者注

西班牙人，帮凶是隐藏的阿兹特克人军队，据称大约有 2 万至 3 万人，甚至可能有 5 万人。科尔特斯得悉这个警报后，首先动手了。他将乔洛兰人召集在一个大院子里，由武装的西班牙人把守在各个出口处，然后屠杀了这些被包围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

尽管西班牙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支持乔洛兰人阴谋屠杀西班牙人的说法，但是这似乎并不准确。首先，那里并没有阿兹特克人，因为蒙特祖马当时不可能在农耕季节派遣数万名士兵前往乔洛兰。即使有这么多的士兵可用，从科尔特斯到达乔洛兰至所谓的阿兹特克军队出现，只有 3 天的时间，只勉强够送信到特诺奇蒂特兰，更不要说筹备军队、武器、补给品以及派遣军队了。因此，虽然科尔特斯指控蒙特祖马派遣了一支军队让他被迫反击，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而且，西班牙人声称他们之所以如此警觉，是因为看到城市里的路障和房屋上面堆放的石头，以及城市外面隐藏的陷阱，里面有削尖的木桩。前者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附近的特拉斯卡兰人最近已成为他们的敌人，需做些防范；但是后者纯粹是西班牙人的臆测和猜想。隐藏的陷坑是欧洲人用来对付骑兵的常规手段，对步兵毫无作用。所以，当西班牙骑兵猜测将会遇到陷坑时，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当地有过此类陷坑，这对于墨西哥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墨西哥在被征服前，根本没有马。

的确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但受害者是乔洛兰人。科尔特斯大概是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消灭其统治者，并对其他城市发出警告。乔洛兰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和韦拉克鲁斯城之间，对两城间的交通构成威胁。一旦科尔特斯向特诺奇蒂特兰进发，它可能会切断他与后方的联系。科尔特斯需要从韦拉克鲁斯获得安全的补给品供应线，因为和特拉斯卡兰的战争已经迅速消耗了他的弹丸和火药。韦拉克鲁斯是惟一能提供这些基本弹药补给的地方，这个供应渠道是绝对不能被阻碍的。而且，既然已经和特拉斯卡兰人建立了联盟，科尔特斯对待像乔洛兰这样的阿兹特克附庸国就不再那么克制了。

简而言之，去乔洛兰不是为了取得补给，只因这个城市和西班牙人的新盟友特拉斯卡兰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将打乱科尔特斯的推进计

划。因此,科尔特斯决心去乔洛兰的原因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后方和保护补给线,同时也是为了教训一下朋友的敌人。科尔特斯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并没有接触过乔洛兰人,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原因去袭击他们。这次袭击有可能是特拉斯卡兰人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西班牙人对自己是否忠诚。如果西班牙人袭击乔洛兰人,这就证明他们的忠诚,也打击了现在被鄙视的敌人。但是这次袭击同时也是对阿兹特克盟友的打击,西班牙人和蒙特祖马由此彻底敌对起来,而西班牙人很难再从此立场上后退了。这个难题迫使西班牙人向特拉斯卡兰人表忠心,而后者却不用为此承受任何风险。

这次袭击巩固了科尔特斯和特拉斯卡兰人的关系,也报复了乔洛兰人的变节行为。仅此一击,科尔特斯就消灭了该城的国王、大部分政治领导人和乔洛兰军队的精华。大屠杀之后,科尔特斯任命了新的国王,并强迫他们与特拉斯卡兰人结盟。同时,他将这次屠杀归咎于蒙特祖马。

尽管西班牙人将自己描绘成这些征服美洲事件的推动力量,但是科尔特斯很可能并不清楚当时此地的形势,因此也不可能抓住这个制度的弱点,并设法利用它们。其实这一体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王位继承的习俗。

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中美洲的王位继承并无诸如长子继承制之类的严格制度。国王往往来自上层贵族,虽然通常都是国王的儿子,但究竟选哪个,还要看城市及其盟友在政治上支持谁。即使国王的候选人被选出来了,仍然会有其他竞争者。这种争端在乔洛兰就体现得很明显,使得他们疏远特拉斯卡兰人而和阿兹特克人结盟。乔洛兰的国王大概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支持者和获益人。但是毫无疑问,还有其他贵族是特拉斯卡兰人的政治盟友和亲戚,其中的许多人也是王位的合法竞争者。

科尔特斯也不可能知道中美洲王权的运作过程,也不知道哪个乔洛兰人属于哪个阵营,但是特拉斯卡兰人知道。当科尔特斯声称要选择一个新统治者,他大概将自己看作是“制造国王的人”,但实际上,他

只是特拉斯卡兰人和乔洛兰人内部政治争斗的工具罢了。杀死国王以及他的大多数贵族支持者，使得继承者之争变得明了。一位亲特拉斯卡兰的统治者独揽大权，他可能在这之后的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乔洛兰人效忠对象的改变并不是一个痛苦的从一方到对立一方的剧烈变动，而是一个微妙的过程，使得现在的某一个派别掌权。在这场政变中，西班牙人负责武力执行，但指导思想却是印第安人的，因为只有他们才了解乔洛兰人内部的权利分配，以及知道谁将支持反叛者。

乔洛兰人和平地接待了西班牙人，但是却遭到袭击，并被毫无顾忌地消灭了，这让蒙特祖马非常吃惊。这就促使他更加不愿意让科尔特斯来特诺奇蒂特兰。蒙特祖马派了一队使者会见科尔特斯，了解他的真正目的，同时也派了魔法师和巫师，想借助超自然力量阻止科尔特斯。当这一切外交和魔法手段都失败了的时候，蒙特祖马命令在从乔洛兰到特诺奇蒂特兰的路上种植龙舌兰。这是一种传统的封锁道路的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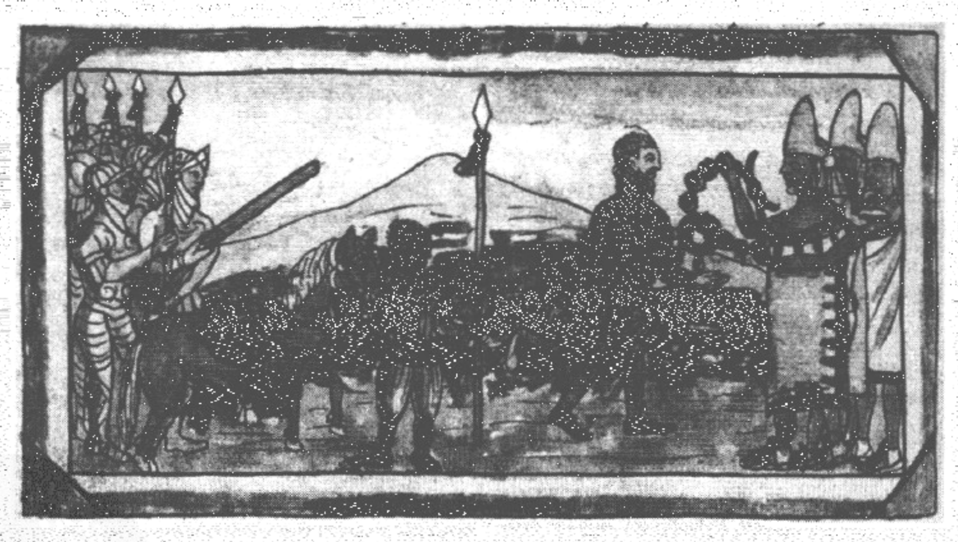
——特拉斯卡兰的贵族和印第安人挑夫跟着科尔特斯参加了远征。图中的脚印和蹄印说明他们长途跋涉，房子代表查尔科，这是远征队伍中途休息的地方。房子里的石头可能就指石头，也可能代表其她小东西。图的远处有一只西班牙狗，图的前方则绘有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手段，是关系破裂的信号，同时也是阻止西班牙人前进的最后努力。

两个星期之后，科尔特斯离开了乔洛兰，选择两条路中靠南的那一条，继续向特诺奇蒂特兰进军。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有人警告他说，阿兹特克人已经在北面那条路布下了埋伏。这种解释看起来并不可信，因为科尔特斯选的这条路更狭窄和曲折，也更容易设埋伏。

南面这条路的优势在于它通向查尔科。尽管它是阿兹特克的附属国，但是却对阿兹特克人怀有很深的敌意。北面那条路通向特斯科科，其国王支持阿兹特克国王。无论如何，西班牙人穿过了查尔科地区，跨越了奎特拉瓦克（Cuitlāhuac）堤道，通过了伊斯特拉帕拉潘（Ixtlapalapan，即伊察帕拉潘[Iztapalapa]）。11 月 8 日，他们进入了岛屿之城特诺奇蒂特兰，他们在这里受到了蒙特祖马的接待。

由大约 300 名西班牙人和 1 000 多名印第安人组成的盟军毫无阻碍地步行进入了中美洲最强大帝国的首都。蒙特祖马允许他们进入，是因为他知道在乔洛兰所发生的事情，而他自己的城市也面临政治分裂，有许多各持己见的派别。他担心反对科尔特斯会鼓励这些集团活动起来并削弱自己的统治。此外，由于当时不是战争季节，蒙特祖马的军队没有动员起来。然而一旦科尔特斯进入特诺奇蒂特兰，蒙特祖马



这幅蒙特祖马与阿兹特克贵族们迎接科尔特斯的画面表现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或者还有非洲人相遇的场景。图中为科尔特斯牵着马、拿着长矛的似乎是一位非洲仆役。

自己将会变得易受攻击。

至此一切顺利，科尔特斯受到了鼓舞，但是毫无疑问，他错误地估计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实力。它要比科尔特斯以前在墨西哥所看到过的任何城市，或者说比欧洲的任何城市，都更强大。特诺奇蒂特兰城大约有 20 万人口，若加上受其辐射的周边村镇，总人口甚至可达 100 万至 265 万。但是一旦进入墨西哥谷地，科尔特斯就无法再后退了，因为他现在完全依赖印第安人的后勤供应、劳力和军队。如果他动摇，其盟军就会抛弃他。

所以，不论是出于计划还是判断失误，西班牙人还是身处特诺奇蒂特兰了。蒙特祖马给他们礼物和食物，让他们住在阿萨亚卡特尔(Axayacatl)宫。他大概想让科尔特斯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内，这样就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来抓捕和杀死西班牙人，也可以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召集一支更大的军队。不论动机如何，他现在公开表示欢迎科尔特斯。

特诺奇蒂特兰是一个巨大的岛屿城市，通过三条堤道和大陆联系，每条大道上都有可以移动的桥。西班牙人面临的危险很快就很明显了。特拉斯卡兰人大部分住在城外，几百名西班牙人住在城里，这很容易被彻底压制和击败。

科尔特斯到达特诺奇蒂特兰后的几天里，有消息说阿兹特克人袭击了墨西哥湾地区的托托纳克人，尽管韦拉克鲁斯的西班牙人赶去救援，但阿兹特克人还是获胜了。也许是对这一消息做出的反应，也可能只是将之作为一个借口，当时无法离开特诺奇蒂特兰的科尔特斯将蒙特祖马抓了起来。阿兹特克人现在被控制起来了。科尔特斯在特诺奇蒂特兰待了 8 个月，同时也将国王囚禁了约 8 个月。在此期间，科尔特斯通过蒙特祖马有效地进行统治。我们不知道，蒙特苏马为何这样应付这种形势，也许其个人的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另外一个原因是，拒绝和科尔特斯合作将会使政府瘫痪，还会鼓舞那些拒绝承认西班牙人的反对派，这最终会使他付出丢掉王位的代价。

蒙特祖马命令袭击托托纳克人的阿兹特克军队回到特诺奇蒂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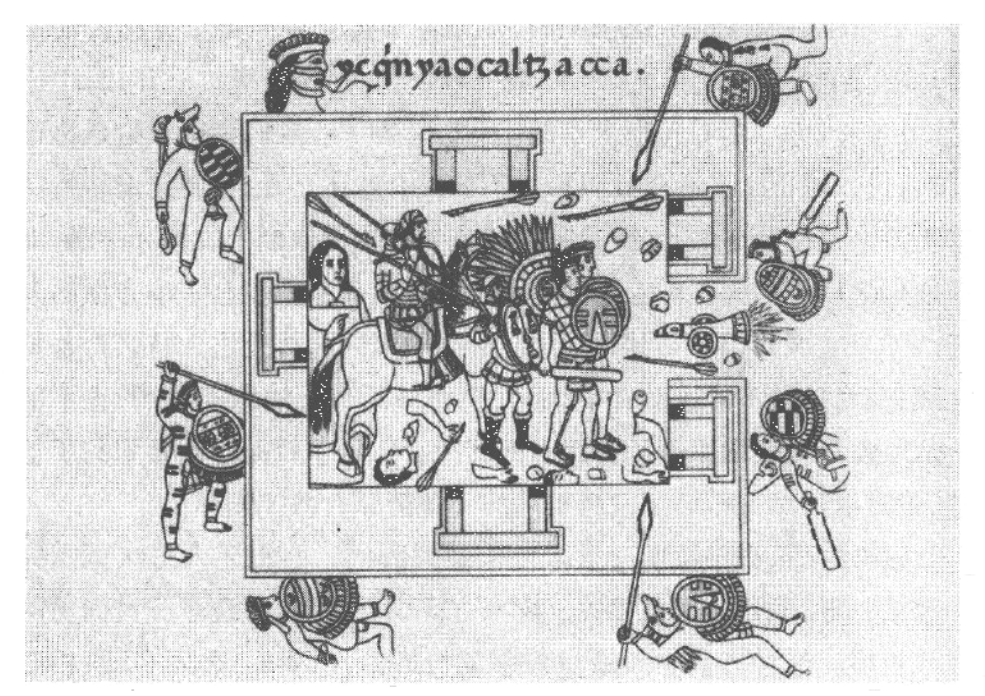
兰,很明显他在讨好西班牙人。当这支军队的首领否认是蒙特祖马下令进行袭击时,在科尔特斯的坚持下,国王将他烧死了。但是他这么做,以及被监禁并按科尔特斯的旨意行事的明显事实,使蒙特祖马显得很软弱,其控制力便由此下降了。这种违背王国利益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个人,而且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如果国王不再下决心做出回应,来自附属国的贡品将会停止,而贵族们是依靠这些贡品生活的。

最先谋反的是特斯科科的国王卡卡玛(Cacama)。他和科约瓦坎、特拉科潘(即塔库巴[Tacuba])、伊斯特拉帕拉潘和马特拉津科的国王一道,密谋袭击西班牙人。蒙特祖马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告诉了科尔特斯,并派了6个忠于自己的贵族前往特斯科科,在特斯科科内部反对派的帮助下捉住了卡卡玛,并且把他带回了特诺奇蒂特兰。科约瓦坎、特拉科潘、伊斯特拉帕拉潘的统治者也被捉住了。但是,阿兹特克人对蒙特祖马的支持程度却下降了。尽管我们不清楚科尔特斯是否知道并重视这件事。

与此同时,古巴总督贝拉斯克斯正在集合一支舰队,大约包括19艘船、20门大炮、800名步兵、80名骑兵、120名弓弩手和89名火绳枪手。这支舰队由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指挥,奉命前往墨西哥捉拿科尔特斯并将他带回古巴。大约在1520年4月20日,纳瓦埃斯在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e Ulúa)登陆。当科尔特斯从阿兹特克信使那里得知此事后,决心与之对抗。他留下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在特诺奇蒂特兰指挥80名士兵,自己带领266名西班牙人向海岸边进发,大约在5月27日到达了纳瓦埃斯位于塞姆波瓦兰的营地。按照科尔特斯的记述,他在夜里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抓获了纳瓦埃斯,招降了其部下。但是,这次战果应归功于科尔特斯的计谋,而不是战斗技巧。科尔特斯此前已经开始和纳瓦埃斯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纳瓦埃斯没有预料到这次进攻。当攻击来临时,许多士兵没有参加战斗,大炮也没有进行射击,因为科尔特斯早已在纳瓦埃斯的阵营里实施贿赂并挑拨离间。一俟纳瓦埃斯被囚禁在韦拉克鲁斯,他手下的人便加入了科尔特斯的阵营。

而在特诺奇蒂特兰，西班牙人获邀出席托斯卡特尔(Toxcatl)节，但在此期间，阿尔瓦拉多领导了一起针对几千名阿兹特克贵族的屠杀。他辩解说，阿兹特克人正在阴谋袭击西班牙人。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托斯卡特尔节是每18个月一次的最隆重的节日，一般在只有4个出入口的巨大神庙的院子里举行。当庆典正在进行时，阿尔瓦拉多堵住了所有出入口，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士兵进入院内，开始屠杀手无寸铁的阿兹特克人。我们不知道这场屠杀遇难者的确切人数，16世纪的教士迭戈·杜宁(Diego Dunin)估计大约有多达8 000到1万名参加节日的贵族被杀。民众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拿起武器开始攻击西班牙人。他们杀死了7人，打伤了许多人，并把剩余的人赶回了住地。西班牙人在这里拼死抵抗，用大炮使攻击者不能近前。

96



科尔特斯不在阿兹特克首都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副手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命手下的西班牙人和特拉斯卡兰盟军在敬奉特斯卡特利波卡神的仪式期间袭击了阿兹特克人。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阿兹特克人打算利用这次仪式来反叛西班牙人。为了报复这次大屠杀，阿兹特克人袭击了西班牙人在城中的总部，包围了阿尔瓦拉多的部队。这幅画描绘了被围困的人——西班牙人、特拉斯卡兰人和唐娜·玛丽娜——以及他们的大炮。在图的左上方绘有特斯卡特利波卡神的小像。图中散落的人的肢体说明战斗非常激烈。

阿尔瓦拉多的行动可能是出于判断失误，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恶果，但这也可能是他故意策划的。如果是后者，阿尔瓦拉多不会擅自决定进行这么大的行动，有可能是在科尔特斯的授意下干的。不管责任在谁，现实的情况就是阿尔瓦拉多被包围了。他派了两个特拉斯卡兰人去告诉科尔特斯发生了什么事。当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关系已经决定性地转向恶化时，这次大屠杀已消灭了众多经验丰富的阿兹特克老兵和贵族武士，并且破坏了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机构。

在包围之下，甚至西班牙人的优势火力相比阿兹特克人也占不了上风，但是蒙特祖马保护了西班牙人免受直接的攻击。然而，每当蒙特祖马在西班牙人操纵下发号施令时，他都会失去更多的支持。这次屠杀导致人们的愤怒终于大爆发了。

当科尔特斯知道了这些事后，开始从韦拉克鲁斯带军返回。他带着1 300名西班牙人、96匹马、80名弓弩手和80名火绳枪手开拔，中途又加进来2 000名特拉斯卡兰战士。6月24日，他们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进入城市时没有受到阻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特诺奇蒂特兰的街道全都空荡荡的，大概是阿兹特克人在表示他们的反对和不满，就像他们之后声称的那样。但允许科尔特斯回到城内也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如果在城外，科尔特斯可以随心所欲地转移，可是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之后，他就不能这么做了，而且他的马匹也无法派上用场，也不能再从盟友那里获取军事和补给上的支持了。科尔特斯应该意识到了这些，可是他仍然寄希望于蒙特祖马的干预能够有效控制形势。

97

进城之后，科尔特斯一行人很快遭到围困。西班牙人每次试图突围都被打退，而且还伤亡惨重。绝望之下，科尔特斯建造了三台简易的作战机械。这种塔状的大型机械移动灵活，可以容纳20—25人相对安全地从里面向外开火。可是这些机械很快就在战斗中损毁了。西班牙人又打算火烧特诺奇蒂特兰城，但城里运河水道众多，所以这个计划也失败了。等到实在没有什么军事上的对策后，科尔特斯把蒙特祖马带到屋顶上，要他对民众讲话。

根据西班牙人的说法，蒙特祖马请求他的子民停止攻击，结果被下

面的人向他扔的石头砸中。而阿兹特克人却说，是西班牙人杀了他。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阿兹特克人民以前就杀死过不再有权势的国王；另一方面，对西班牙人来说，蒙特祖马现在已成了一个负担：即使有他做人质，阿兹特克人还是会毫无忌惮地实施攻击；而如果放了他，阿兹特克人更会受到鼓舞，团结起来对抗西班牙人。不过阿兹特克人的说法可能更为可信。

西班牙人现在缺水缺粮，弹药也快用完了，他们必须突围逃跑。可是他们被围困的地点处于城市的中心，无论选择从哪个方向突围都免不了一场厮杀。向西去往特拉科潘的那条大道路程最短，所以最有可能突围成功。

但阿兹特克人移走了各条大道上的桥，这样西班牙人就插翅难飞了。科尔特斯为此专门造了一座可移动的浮桥。6 月 30 日快午夜的时候，冒着肆虐的暴风雨，西班牙人开始逃亡。他们在冲击第二道关卡的时候被发现了，城中拉响了警报，西班牙人只好赶紧扔下浮桥逃命。在四面受围攻的情况下，最后只有科尔特斯和一小队西班牙人逃了出来，抵达了特拉科潘。据估计，所有被囚的贵族都被杀死，大部分纳瓦埃斯的部下、特拉斯卡兰人和韦霍津科人也被杀害。殿后的西班牙人与冲出去的前锋队伍脱了节，只好退回到城中的总部。他们在那里又被围困了好几天，之后全部被杀。

得以逃脱的西班牙人只有绕过此地的湖区才能到达特拉斯卡拉，因此科尔特斯开始向北行进。虽然西班牙人在逃亡途中也遇到了几次袭击，但他们在穿越北方湖区时遭遇的战斗规模都比较小。这可能是因为阿兹特克人要按传统为在科尔特斯逃跑时杀死的那些贵族哀悼四天。被杀的人中包括卡卡玛和蒙特祖马的众多子女。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此时正值农耕季节，阿兹特克人还没有动员起大量的军队并为他们配备好补给。所以，袭击西班牙人的战士大多来自他们沿途经过的城镇，但在北方，城镇的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

可是当西班牙人到达谷地的东部时，印第安人的攻势变得凶猛起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奥通潘（Otompan，即奥蒂恩巴

[Otiemba]),西班牙人侥幸逃脱。第二天,他们终于抵达了特拉斯卡兰。科尔特斯方面损失了 860 名西班牙士兵、5 名和纳瓦埃斯一起到达的西班牙妇女和 1 000 名特拉斯卡兰人,这使他们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急切希望得到接待。

战败逃亡时,科尔特斯发现,因为其军事优势受到严重削弱,他的盟友也不那么可靠了。科尔特斯实际上意识到了其危险的政治处境,他命令部下不要抢夺沿路人民的任何财物,尽管他们迫切需要补给。他们进入特拉斯卡兰人的领土后,到达奥托米人的韦伊-奥特里潘(Huei-Otlipan,即奥托米人的韦约蒂帕[Hueyotipa])镇。尽管当地人提供他们食宿,但是要求他们付账。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西班牙人和特拉斯卡兰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就像在特诺奇蒂特兰一样,特拉斯卡兰人对待西班牙人的态度也是分裂的,西克滕卡特尔将军一直反对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逃离特诺奇蒂特兰更加重了他的反对情绪。如果特拉斯卡兰人曾经是阿兹特克人的盟友,只是后来背叛了他们,那他们大概还可以重新效忠阿兹特克人,但是他们现在是独立的敌对国,因此他们选择的余地很小。在科尔特斯到达之前,他们自己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妙。由于很难成为阿兹特克人的盟友(即使仅仅是一个卑微的盟友),他们最好的选择还是继续支持西班牙人。

特拉斯卡兰和韦霍津科的统治者仔细商量了几天以后,来到了韦伊-奥特里潘,重新巩固了和西班牙人的联盟。但是权力格局已经明显改变了。特拉斯卡兰人提出,只有科尔特斯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们才肯帮助西班牙人打败阿兹特克人。这些要求包括让乔洛兰、韦霍津科和特佩蒂克帕克成为他们的附属国,在特诺奇蒂特兰保有一个军事要塞,获得所征服所有城镇、省的战利品的一半,以及他们永不需纳贡。简而言之,新的条件不仅是为像以前那样继续支持西班牙人而抬高要价,而且还是特拉斯卡兰人要求以平等的共同征服者身份支持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并大幅扩张本王国领土愿望的反映。

6 月 11 日,科尔特斯到达了特拉斯卡兰,同来的还有 440 名西班

牙人、20 匹马、12 名弓弩手和 7 名火绳枪手。虽然每一个人都受了伤，但是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全地休息和调养。有些人精神颓丧，想回到韦拉克鲁斯，但是科尔特斯再一次劝诱他们留了下来。

蒙特祖马和其他统治者死后，特诺奇蒂特兰陷入一片混乱。奎特拉瓦(Cuitlahua)是蒙特祖马的兄弟、国王阿萨亚卡特尔(Axayacatl)的儿子，他被选为国王，但是还没有正式加冕，也没有巩固好自己的地位。因为只要完成了交纳贡品的义务，附属国的国王一般会被留在当地，所以他们对特诺奇蒂特兰忠诚的程度依赖于他们如何看待阿兹特克人将自己的意志付诸行动的能力。一般来说，已在位国王的权威很少受到挑战，但是新的统治者却要首先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加冕前，每一个阿兹特克新王通常都要率领军队打一仗，表面的原因是获取在加冕祭祀时的人牲，实质却是借此证明新国王的军事能力。一次有效的武力展示将会确保所有附属国的国王参加加冕仪式，并且重新宣誓效忠，这样就免去了重新征服他们的麻烦。但是特诺奇蒂特兰发生的事件以及现在还不是战争季节，阻止了圭特拉华马上展示他的武勇。同时，特拉斯卡兰和西班牙人使他的附属国有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盟友。所以，奎特拉瓦继承的帝国很快失去了凝聚力。

99

科尔特斯试图从特诺奇蒂特兰内部来控制这个阿兹特克王国，但是失败了。现在没有一个顺从的在位国王，这一招已不可复制。如果要攻陷特诺奇蒂特兰，就需要从外面攻打，这就意味着科尔特斯需要整顿自己的装备、重建和印第安人的联盟，以及确保粮食供应，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蒙特祖马能够确保提供的。现在人员和装备都很少，科尔特斯决定派人去韦拉克鲁斯获取更多供应。这个海港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物资的人员供应点，尽管时有时无，但此时只有 7 个人可供使用，他们也很快加入了科尔特斯的队伍。

虽然科尔特斯的西班牙军队实力很弱，但是他可以得到特拉斯卡兰人的支持。如果科尔特斯能够征服阿兹特克的一个附属国，并且许诺保护它不受报复，那么让其效忠自己是很容易的。这是由阿兹特克帝国的组织结构决定的。在西班牙人受困于特诺奇蒂特兰期间，来自

韦拉克鲁斯的一队西班牙人在特佩亚卡克省遭到袭击并被杀死了，于是这个地区就成为科尔特斯的第一个打击目标。这或许是为了报复，也可能是履行对特拉斯卡兰人的诺言，以确保在攻打特诺奇蒂特兰的战斗中获得他们的支持。

西班牙人的记述声称，阿兹特克人派军队到了特拉斯卡兰人的地区，但科尔特斯是在特诺奇蒂特兰进行战斗后不到1月就开始攻击这个地区的，这时候还没到收获季节，派往这一地区的阿兹特克士兵不会很多。不论如何，大约在8月1日，科尔特斯带着420名西班牙人、17匹马、6名弓弩手和2 000名特拉斯卡兰人，向特佩亚卡克省进军。

科尔特斯在离镇子3里格的地方扎营，并送信给对方要求其投降。被拒绝后，他向特佩亚卡克军队进攻，并击败了他们。西班牙人自己没有伤亡。这场战争最后有多激烈，我们不太清楚。此时仍旧是雨季，所以每一方都没有做好准备，也无力派大军出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直到1467年阿兹特克人最近一次征服他们之前，特佩亚卡克人和特拉斯卡兰人还是盟友。而且各种有利于和特拉斯卡兰人重新结盟的关系，包括亲属关系都还存在，所以这场战斗更多是做个样子，而不是真打。无论如何，特佩亚卡克的统治者发誓向西班牙人效忠。此后，科尔特斯和其盟友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继续征服这一地区。科尔特斯在特佩亚卡克建立了拉比利亚·德塞古拉·德拉弗隆特拉(La Villa de Segura de la Frontera)[①]要塞来防卫这个地区。经过一系列的战斗，科尔特斯的军队控制了从韦拉克鲁斯到乔洛兰沿路的大部分城镇。8天后，从韦拉克鲁斯得到了更多的人员和补给——一艘船运来14名士兵、2匹马，另外一艘船运来9名士兵和1匹马。

为了阻止西班牙人继续扩张，奎特拉瓦派军队到了夸乌克乔兰(Cuauhquecholan)和伊兹约坎(Itzyocan，即伊祖卡[Izucar])，堵住了从乔洛兰到莫雷洛斯(Morelos)的主要道路，也就是通向墨西哥谷地的道路。但是科尔特斯派出了反击力量，在夸乌克乔兰统治者的帮助下

100

① 意为“边境地区的安全城镇”。——编者注



特佩亚卡克地处海湾地区和特诺奇蒂特兰之间，驻扎着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阿兹特克军队。科尔特斯决心要击败这支部队，夺取该地作为自己远征的基地。图中那张鼻子相当夸张的人脸图案是特佩亚卡克城的象征。

击败了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又反攻到伊兹约坎，但是西班牙人再次击败了他们。这时，科尔特斯用忠于他的新国王代替了这几个城镇执迷不悟的统治者。

科尔特斯不停地声称，这些统治者对他宣誓效忠。这大概是真的，但也掩盖了一个更大的事实。尽管不是很典型，但科尔特斯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投入了 200 名西班牙步兵、13 名骑兵和 3 万多印第安人盟军。因此，虽然西班牙人很重要，但是主要的战斗力量毫无疑问是特拉斯卡兰人。所以，即使其他统治者向科尔特斯表示忠诚，也只是装装样子，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避免直接屈服于其传统的敌人。

胜利后不久，另外 3 艘西班牙船只相继到达了韦拉克鲁斯，科尔特斯的军队增加了 145 名士兵和 19 匹马。此时，墨西哥正遭受一场瘟疫。纳瓦埃斯余部中有一个人感染上了天花。墨西哥人从未听说过天花，感染它对印第安人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两个因素导致了这次致命的瘟疫爆发：印第安人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疾病，所以他们缺乏免

疫力;并且中美洲人之间的遗传基因相差不大,第一轮传染的后果已足够严重了,但天花病毒适应了宿主后还能有效地提前适应基因结构,这就让下一轮感染更加致命。10 月中旬,天花病毒到达了墨西哥谷地,在特诺奇蒂特兰持续了 60 天,12 月上旬结束。墨西哥中部大约 40% 的印第安人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死去了。死者包括,他在 12 月上旬死去,只统治了约 80 天。这种疾病的病理特点决定了他在死之前的两个星期应该就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这实际上让整个帝国在最关键的时期群龙无首,因为这一时期恰好是阿兹特克人通常为战争做准备的日子。

101

天花的确影响到了整个征服战争的进程,但是不仅仅是通过阿兹特克人大规模死亡的方式。西班牙人的盟友们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损失双方都有。但是天花对阿兹特克首领们的影响更大些。新的首领出现了,但是他们比前任更经验不足,需要更多的时间巩固地位。有些亲西班牙的首领也死了,但是西班牙人有更多的免疫力,因此他们幸存下来,并且领导层保持完好。

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是国王阿威索特尔(Ahuitzotl)的儿子,他被推选接替奎特拉瓦。正式的加冕仪式直至 1521 年 2 月才举行,也就是其前任去世 2 个月之后。帝国再次失去了统治者,而夸乌特莫克同样没有时间巩固其统治。与奎特拉瓦的做法一样,新的国王给了一些附属国统治者大量礼物,并且返还了其他人的贡品,但这不仅未能挽救他的统治,而且可能被视作软弱的表现。

当科尔特斯逃离特诺奇蒂特兰时,奎特拉瓦和夸乌特莫克都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来对付遭受重大打击的西班牙人。主要是由于特诺奇蒂特兰的内部混乱、天花,以及时节不对,不过阿兹特克人也相信西班牙人大概不会再回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因让这些头领留守在墨西哥谷地:阿兹特克人能在墨西哥谷地周围集结大量军队,留在这里会让他们保持优势,但是一旦离开这里进军到其他地方,不仅费用会很高昂,而且如果不能在当地获取补给(这在敌人的土地上的确会发生),就必须用人力来驮运粮食跟着军队行军,每个挑夫大概需要带

50 磅的东西，即使按照最好的比率(1 个挑夫供应 2 个士兵)，大约也只能携带 8 天的粮食供应。这种后勤供应的限制使得阿兹特克人只能派一小部分军队进行长距离作战。所以他们不能派遣足够规模的军队到特拉斯卡兰，去击败事实上由那个地区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队伍。

但是，留在特诺奇蒂特兰使得形势发生了逆转。夸特莫克的所有士兵留在这里，而其敌人却被迫向这里行军，并承担人力的损耗。而且，留在特诺奇蒂特兰附近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使用独木舟，这样就有了很大的机动性，内部的交通线也更短，而西班牙人却被迫在山谷里沿湖岸行军。独木舟也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机动、集中，并支援墨西哥山谷各地的部队，而西班牙人失去了安全的后防，被迫在各处同时进行防守。而且，一个以湖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减小了西班牙人马匹的作用。在陆上进行的任何攻击都必须通过 3 条主要的堤道来运送兵力。这些堤道上没有空间进行军队调度，阿兹特克人很容易将西班牙人围住并击败他们。这个计划也减少了可供科尔特斯调配使用的联军数量。虽然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阿兹特克人采取守势很愚蠢，但这样的确减少了科尔特斯的主要优势，并迫使他采取更冒险的措施。 102

在第一次进入特诺奇蒂特兰期间的战斗中，西班牙人被切断了外部支持，孤立无援地围困在城里，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科尔特斯现在的目标是反过来切断阿兹特克人的外部支援。在进军墨西哥谷地之前，科尔特斯就命令特拉斯卡兰再建 13 艘双桅船。锚、帆、索具等物资的供应来自韦拉克鲁斯的被凿沉的船只，它们被拆卸一空，然后运到特拉斯卡兰。一艘新来的船带来了西班牙的铁匠、更多的武器、3 匹马和另外 13 名士兵，他们也加入了科尔特斯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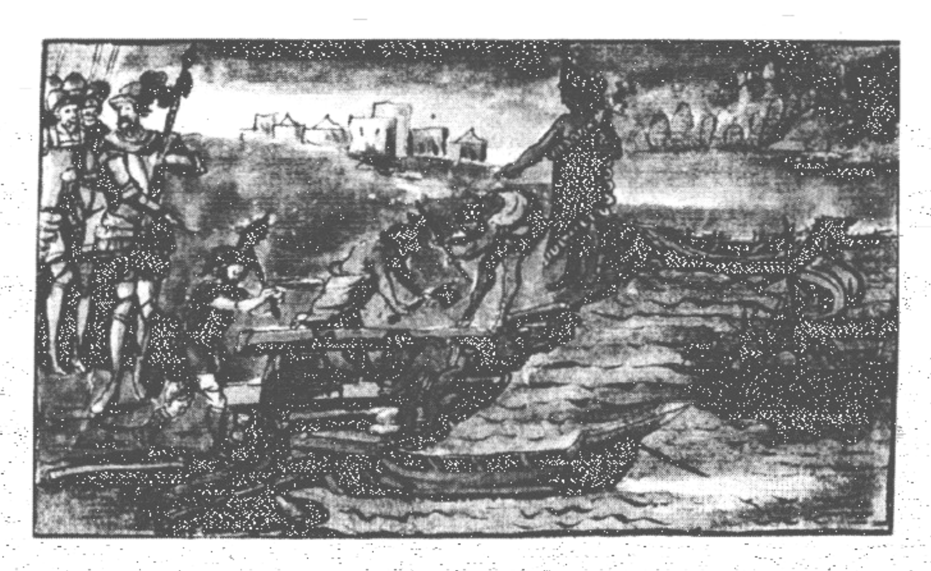
1520 年 12 月 28 日，科尔特斯启程再次进军特诺奇蒂特兰，此时他有8－9门大炮、40 名骑兵、550 名西班牙士兵(其中 80 名是弓弩手或火绳枪手)，以及 1 万名特拉斯卡兰士兵。尽管科尔特斯在路上遭遇了一支敌军，先打了一仗，但他离开特拉斯卡兰仅仅两天后，就到达了靠近特斯科科的科亚特佩克(Coatepec)。第二天早晨，在特斯科科的贵族们的邀请下西班牙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城。

特斯科科是帝国第二大重要的城市，分享着帝国的财富（尽管不是最主要的享有者）。它本来可以成为阿兹特克人的一个坚定盟友，却没有对抗科尔特斯，这是由于其内部几年来的政治分裂。1515年，当特斯科科的国王内萨瓦尔皮利（Nezahualpilli）去世时，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儿子，他们都有权利继承王位，包括科亚纳科奇（Coanacoch）和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Ixtlilxochitl）。但是蒙特祖马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将内萨瓦尔皮利的另外一个儿子卡卡玛（也是他的外甥）扶上了王位。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开始造反了。他拿起武器，挑起内战，并最终导致了特斯科科国土的分裂。他自己控制着北方，而卡卡玛在特斯科科统治着南方。当科尔特斯逃离特诺奇蒂特兰时，卡卡玛被杀死了，科亚纳科奇成为国王。不过关于他继位的细节我们并不太清楚，并且特斯科科还是处在分裂之中。科尔特斯的到来使形势逆转为对科亚纳科奇不利。科亚纳科奇欢迎西班牙人来到特斯科科只是为了给自己赢得时间，以便和其追随者乘独木舟逃离这里，前往特诺奇蒂特兰。

科亚纳科奇逃跑后，国王内萨瓦尔皮利的另外一个儿子特科科尔（Tecocol）成为新的国王。作为西班牙人支持的派别首领，他命令加强城市的武装力量和防御工事。尽管科尔特斯声称他在墨西哥中部立了几个国王，但他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即使知道，他也没有能力这么做。相反，是既存的政治派别抓住机会，利用西班牙和特拉斯卡兰人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平衡，并为自己获取权力。伊斯特利尔霍特尔陪伴科尔特斯回到墨西哥谷地，他大概参加了特科科尔的就任仪式。不论有否正当理由，当特科科尔在2月1日去世后，伊斯特利尔霍特尔登上了王位。

103 这些政治上的明争暗夺使得特斯科科完全落入了西班牙人手里，给了科尔特斯一个在当地的行动基地，并解决了就地长时期保障后勤供应的难题。现在，特斯科科和科尔特斯结盟，特斯科科附属国的国王也同样宣誓效忠科尔特斯。

在大约7 000名特拉斯卡兰人和20名特斯科科贵族的支持下，科尔特斯开始向伊斯特拉帕拉潘城进军，他在路上受到了阿兹特克人从



西班牙人建造的双桅帆船在征服特诺奇蒂特兰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中,科尔特斯正在命令西班牙和印第安工匠一起建造这些船只。

独木舟和陆地上发起的袭击。这些阿兹特克人从各个方向进攻,不过科尔特斯还是冲破了防线,进入该城。不论是西班牙人赢得了这次战斗,还是阿兹特克人假装失败,科尔特斯的军队此时却处在容易受攻击的状态。伊斯特拉帕拉潘城建在水上,实际海拔低于湖面,由大堤保护着。科尔特斯的军队一进入城里,阿兹特克人就掘开大堤,水淹入城市,迫使西班牙人四散奔逃。有些人淹死了,大部分人逃到较高的地面,西班牙人被迫撤回特斯科科。

这次大溃败后,科尔特斯回到了特斯科科,几名原来属于纳瓦埃斯一方的西班牙人据说密谋想暗杀科尔特斯并离开墨西哥。因为许多重要人物卷入了此事,科尔特斯无法与对方公开决裂,但他抓住并绞死了领头的安东尼奥·德比利亚法尼亚(Antonio de Villafaña)。

骚乱继续进行,但是科尔特斯设法控制住了局势,同时极力分化敌人。然而改变当地政治局势的,不是别的,正是西班牙人和特拉斯卡兰人联军的存在。有些国王想寻求西班牙人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他人则抵制。但是后者往往会被寻求西班牙人支持的挑战者赶走。在整个征服战争过程中,墨西哥谷地一直处在政治分裂状态之中,按照

地区的不同,形成不断此消彼长的势力范围。但是历史上曾经的恩恩怨怨也起了很大作用,就像在查尔科城那样。

104

阿兹特克帝国的军队控制着查尔科人,但是他们对阿兹特克人没有什么感情,随时准备改变政治联盟的对象。相比其他反叛的附属国,查尔科控制着由南面和东面进出墨西哥谷地的最佳位置。在一次发生在查尔科的战斗中,西班牙 15－20 名骑兵、200 名士兵和所有的特拉斯卡兰人联合击败了阿兹特克人,于是查尔科人转而支持西班牙人。起初,墨西哥谷地的政治形势对科尔特斯很有利,因为那里有许多阿兹特克城镇,而士兵却很少,当西班牙人和特拉斯卡兰人联合发起攻击时,对方很难同时保卫各个城镇。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城镇转而投向科尔特斯时,这也导致了同样的问题,即如何保卫他的盟友。阿兹特克人仍旧可以坐着独木舟在谷地进行攻击,现在轮到科尔特斯很难同时保护其盟友了。所以,科尔特斯让其部队驻扎在特斯科科这一个地方,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派军队出去。但是这种以防守为本的战略意味着派出军队时,攻击造成的损害已经不可挽回。阿兹特克人的报复性袭击因此侵蚀了亲西班牙人的国王们的支持,威胁着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自己城市对其的忠诚度。

科尔特斯于是意识到,他必须进攻并直接打击特诺奇蒂特兰城。为此,他让人从特拉斯卡兰运来木材造船。4 天后,人和材料到达特斯科科。大约在 2 月 1 日,随着双桅帆船开始建造,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的坚固领地发动了两次主要进攻中的第一次。

2 月 3 日,科尔特斯向岛屿城市哈尔托坎(Xaltocan)进军。尽管得到特诺奇蒂特兰的支援,哈尔托坎除了一些小规模的独木舟攻击外,对西班牙人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这个城市的继续自由对战事来说本无碍大局,西班牙人可以轻易地绕过这个城市,但是哈尔托坎形成了像特诺奇蒂特兰一样的障碍,因而这是对西班牙人战术的一次测验。

西班牙人得到消息,通往哈尔托坎的堤道已经被摧毁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独木舟进行交火,但是这些独木舟装备有很厚的木头防护板,使得西班牙的武器很难摧毁它们。直到哈尔托坎的敌人告诉

科尔特斯，堤道实际上并没有被摧毁，而仅仅是被水淹没时，这个城市才最终被攻陷了。西班牙人穿过堤道，徒步进入了城市并击败了哈尔托坎人，但是用水作为屏障的做法被证明是很有效的。如果不能控制湖泊，西班牙人没有任何希望来征服特诺奇蒂特兰。

科尔特斯继续攻击北面的沿湖城市，例如夸乌蒂特兰(Cuauhtitlan)、特南约坎(Tenanyocan)和阿兹卡波特萨尔科(Azcapotzalco)。这些地方人很少，无法抗击西班牙人，于是城市里的居民撤退到了特拉科潘。在这里，科尔特斯遇到了大量军队和路障，但是他迫使防卫者后退，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当阿兹特克援军通过大路从特诺奇蒂特兰来到这里时，科尔特斯当然也和他们打了起来。但是一旦在堤道上进行战斗，阿兹特克人就可以从两面得到独木舟部队的支援。西班牙人只能在堤道上直接和阿兹特克人交锋，在几个人阵亡和许多人受伤后被迫后退。遭到了 5－6 天的持续攻击后，科尔特斯从特拉科潘撤退，并于 2 月 18 日到达了特斯科科。 105

越来越多的城镇投向西班牙这一边，但是这些叛变者之前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反抗努力。许多城市，包括查尔科城，还处在阿兹特克人的攻击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西班牙必须做出回应，所以科尔特斯派出一支西班牙人部队，与一些特拉斯卡兰人和一队特斯科科人一起前往查尔科，这些人之前都没有参与北进查尔科的战斗。这支部队由贡萨洛·德桑多瓦尔(Gonzalo de Sandoval)指挥，他把阿兹特克人驱回到瓦斯特佩克(Huaxtepec，即 Oaxtepec)，并在那里击败了他们，然后又胜利前进到亚卡皮兹特兰(Yacapitztlan，即 Yecapiztla)，之后回师特斯科科。西班牙人刚撤退，阿兹特克人就用独木舟继续攻打查尔科人，但是在韦霍津科人(Huexotzincas)的支援下，查尔科人打退了阿兹特克人的进攻。

2 月 24 日，更多的船只到达了韦拉克鲁斯，科尔特斯拥有了更多的人员和武器。前往韦拉克鲁斯的路线仍然是西班牙人最重要的补给线。所以，科尔特斯决定向亚乌特佩克(Yauhtepec)进军以保卫这一地区。4 月 13 日，科尔特斯在继续进军征服夸乌纳瓦克(Cuauhnahuac，

即 Cuernavaca)之前,击败了亚乌特佩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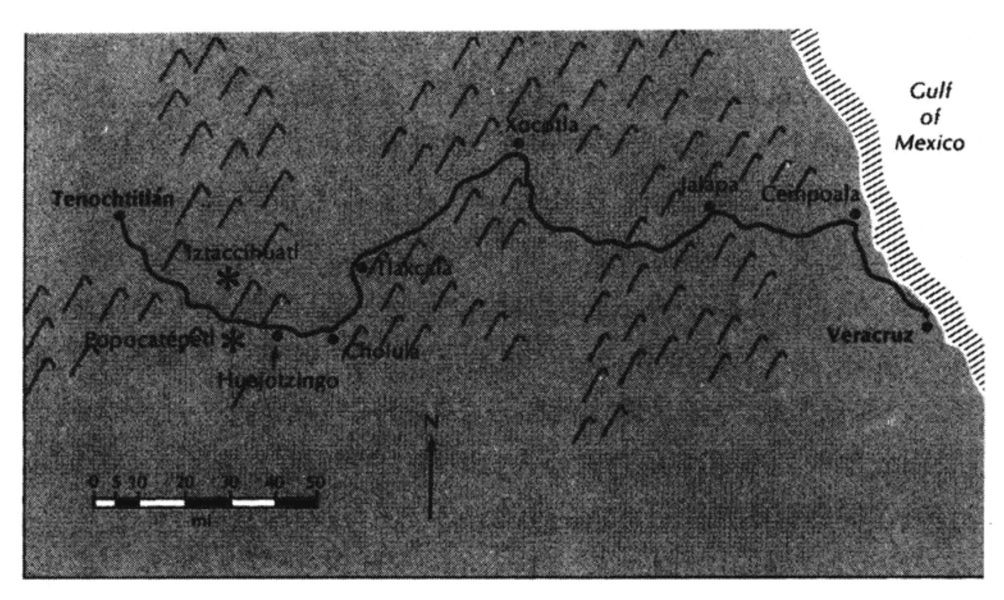
第二天,科尔特斯继续向墨西哥谷地进军,并于 4 月 16 日到达了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城。这座巨大的城市是特诺奇蒂特兰最重要的粮食补给基地,位于墨西哥谷地的西南角。西班牙人本来可以从查尔科的西面直接通过陆路到达这里,但这需要沿湖滨行军几公里,在到达这个设防严密的城市之前,很容易受到阿兹特克人独木舟的攻击。通过山南面的亚乌特佩克和夸乌纳瓦克进军,西班牙人在重新进入霍奇米尔科人后面的山谷之前就可以免受阿兹特克人的直接攻击。尽管如此,科尔特斯的军队还是在肖奇米尔克受到了重大挫折,最后被迫撤退。

4 月 15 日阿兹特克援军到达时,科尔特斯行军至科约瓦坎(该城已经荒废),穿过了几座被废弃的城市——例如阿兹卡鲍特萨尔考(Azcapotzalco)、特南约坎和夸乌蒂特兰——继续向特拉科潘进军,其间受到零散的阿兹特克人及其盟军的持续攻击。循着上次在北面攻击的路线,科尔特斯在 4 月 22 日到达了特斯科科。尽管遭受了严重伤亡,墨西哥谷地南部地区的这场战斗形成了一个忠于西班牙人的城镇防卫带,这就防止了受到南部更远地区阿兹特克附属国的攻击可能性。

因为大部分战斗是在阿兹特克军队和西班牙人的印第安盟友间展开,所以路上的战斗纠缠不休,很是麻烦。双方都自由地布置部队、进入战斗、脱离战斗,或者控制接战的程度。在水上、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的部队会占据优势,因此控制湖泊很关键。2 月末,科尔特斯的船只已经建造了几个星期了。集结的地点位于湖滨一里格远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多次打退阿兹特克人独木舟的攻击。12 艘单桅或者双桅的船只有 40 英尺长,8－9 英尺宽,第 13 艘船大约 50 英尺长。每一艘船有 12 个划桨手、12 名弓弩手和火绳枪手、一名船长,加上操作安装在船舷的大炮的炮兵。4 月 28 日,这些船在一条运河里下水了。这条运河是由 4 万特斯科科人花了 7 周的时间才挖成。

106

为了协调这次进攻行动,科尔特斯派人去特拉斯卡兰要了两万多



科尔特斯从韦拉克鲁斯进军特诺奇蒂特兰的路线。

名战士，并从墨西哥谷地的盟友那里要了更多士兵。小西克滕卡特尔和奇奇梅卡特乌克特利(Chichimecateuctli)率领特拉斯卡兰的军队前往特斯科科。奇奇梅卡特乌克特利是一名特拉斯卡兰将军，和马西克斯卡特尔那一派联盟，因此与小西克滕卡特尔很是敌对。西克滕卡特尔后来离开了特斯科科(一种说法是，由于他爱上了一名在特拉斯卡兰的女子)，科尔特斯随后便将他抓起来并以叛国罪绞死。西班牙人对此的解释无人信服，其他本地的头领也放弃了战斗，和他们部队一起离开，但科尔特斯没有采取行动来反对这种行为，大多数叛变的西班牙人也没有被绳之以法。西班牙人的记述给了一个似乎令人满意的合法理由，但是从大背景来考虑，绞死西克滕卡特尔是出于政治原因。

当科尔特斯第一次到达特拉斯卡兰时，四个省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两个省的统治者手里，而其中又主要由蒂萨特兰省统治者老西克滕卡特尔掌权。当他的儿子和未来的继承人小西克滕卡特尔领导特拉斯卡兰军队反对西班牙人时，其竞争对手奥科特洛尔科省的统治者马西克斯卡特尔持相反的立场，对西班牙人表示支持。在西班牙人还没有很快派出军队时，支持已转向马西克斯卡特尔一方，他在联盟中的威望压过了

西克滕卡特尔。可马西克斯卡特尔死于天花,由他十几岁的儿子继承其权力。他曾将女儿嫁给胡安·贝拉斯克斯,试图和西班牙人建立友好联系,但是这两个人在逃离特诺奇蒂特兰时都被杀死了,这一联合告终。

107 因此,小西克滕卡特尔时来运转了,而科尔特斯的运气则恶化了。如果这种形势早些发生,将会对整个西班牙人的事业构成致命威胁,但是现在,即使西克滕卡特尔的国内地位更为加强,其他事件,例如科尔特斯和阿科卢亚人(Acolhuas)的联盟,也削弱了其在外部事务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小西克滕卡特尔现在对科尔特斯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此他的死有可能是西班牙人打算除去特拉斯卡兰与己不睦的统治者,并提高那些亲西班牙人的地位。

科尔特斯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将剩下的西班牙人分为三部分。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被派往特拉科潘,随行的有30名骑兵、18名弩弓手和火绳枪手、150名西班牙步兵和2.5万名特拉斯卡兰人;克里斯托瓦尔·德奥利德(Cristobal de Olid)被派到科约瓦坎,随行的有20名弩弓手和火绳枪手、175名西班牙步兵和2万名印第安联军士兵;贡萨洛·德桑多瓦尔被派去伊斯特拉帕拉潘,随行的有24匹马、14名火绳枪手、13名弓弩手、15名西班牙步兵,以及3万名韦霍津科、乔洛兰和查尔科人。西班牙人的记述刻意削减了印第安人的参与程度,但是仅仅是出兵数字的差距就足以说明印第安人的关键作用。而且,所存在的语言障碍使得土著头领在指挥作战和协调行动上起了关键作用。

阿尔瓦拉多、奥利德、桑多瓦尔三人的进攻目标既不是政治上重要的城市,也不是最大的城市,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是特诺奇蒂特兰3条堤道的终点。切断它们,就可以限制特诺奇蒂特兰的人员和物资供应,并把阿兹特克人牢牢围困在里面。

1521年5月22日,军队离开了特斯科科,奥利德和阿尔瓦拉多一起,沿着湖岸向北进军到特拉科潘。他们进军到查波尔特佩克,打败了防卫的敌人,并把向特诺奇蒂特兰运水的双线水渠切断了。作为一个咸水湖上的岛屿城市,特诺奇蒂特兰主要从外部得到淡水和食物,这正





这两幅图反映了阿兹特克人与西班牙人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异。上图展示了西班牙人正沿着一条大道进入特诺奇蒂特兰；下图则展示了双桅帆船和驳船正在进攻守城的阿兹特克人。

是科尔特斯要切断的生命线。但是特诺奇特兰的位置却允许它利用中美洲最有效的运输工具——独木舟。陆上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一般每人至多运输 50 磅的东西；而一条独木舟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同样的速度运输是其 40 倍的东西。所以，当一些堤道被堵、水渠被切断后，独木舟也就轻而易举地取代了这种迟缓的运输方式。

在中美洲，围困并不常见。缺乏轮子和畜力意味着所有的供应都必须依靠人拉背驮，所以军队很难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长期战争，也很难有足够长的时间困死和饿死那些准备很充分的敌方城市。所以科尔特斯的战略可能是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的。

阿尔瓦拉多和奥利德回到特拉科潘后，开始对通往特诺奇蒂特兰的堤道发动进攻。在中美洲，不论是在堤道上还是关隘中，限制作战交锋面通常都有利于防卫者。因为这会限制交战战士的数量，减少进攻者的人数优势，延长战斗时间，而这些都意味着进攻者最终会被迫撤退，因为后勤供应会出问题。这种限制同样也会影响西班牙人，但是影响的结果不同。

109

例如，在阿尔瓦拉多的军队中，每个西班牙人大约对应着 100 名印第安士兵。每一条堤道大约 22 英尺宽，足够容纳 8 匹马并肩行走。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简单地限制了在任何时间一次能够投入的兵力数量，同时也允许这些兵力的构成发生变化，因为它意味着能够使用更高比例的西班牙士兵，而他们的武器更精良些。即使阿兹特克人有更多的战斗兵源贮备，在堤道上战斗限制了他们展开战斗队形和利用其人数优势。而且，在堤道上战斗迫使阿兹特克人集中兵力，这为西班牙的炮火袭击创造了理想的靶子，尽管相对缓慢的射击速度意味着一般都是以徒手搏斗为主。西班牙人有技术优势，又不受敌方人数优势的威胁，而且他们一直在尽力加强机动性，避免受到包围和击败。

阿兹特克人被迫调整自己的战略来适应西班牙人的优势武器。他们很快了解到大炮总是按直线进行射击，于是他们开始采用左躲右闪的曲线进攻，而不是直线进攻，并且当大炮射击时，他们开始匍匐前进，而不是直挺挺地站着。

阿兹特克人最有效的战术是水上攻击。在这种战术中，乘坐独木舟的士兵攻击堤道上的西班牙士兵，发射箭、飞镖，以及从武装的独木舟上向西班牙人的侧翼扔石头，同时远远待在西班牙人剑和矛的攻击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奥利德和阿尔瓦拉多率领的军队被击退了，损失惨重，然后这两支军队分开了。奥利德向北进军，到达科约瓦坎，而阿尔瓦拉多还继续留在堤道上。分开之后，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只能留在营帐里，采取守势以抵挡阿兹特克人的进攻。

5 月 30 日，桑多瓦尔开始向南边的伊斯特拉帕拉潘进军。他袭击并焚毁了这座城市。同时，科尔特斯的舰队下水并驶往特佩波尔科(Tepepolco)。这是一个靠近特诺奇蒂特兰的岛屿要塞。他占领了这个岛屿，但是在阿兹特克人的反击下，只好退了回来。

事实证明，西班牙的双桅船在水面上占有令人信服的优势。它在航行时可以掀翻了阿兹特克人的独木舟，直到进入运河区，因为航路很窄，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后，科尔特斯的舰队启程开往科约瓦坎，一小队士兵在那里登陆，并且占领了堤道的一部分。第二天，科尔特斯到达了，他的船只对付独木舟非常强大有效。将堤道断开后，他们继续向前航行。

成百上千的联军的独木舟也和科尔特斯的舰队一起进军，它们迅速摧毁或者驱散了阿兹特克人的舰队，这让桑多瓦尔的军队得以继续向墨西卡津科进军。但是阿兹特克的舰队将堤道切断，阻止他和奥利德的军队会师。在堤道交汇的地方，只有一支军队可以被有效地利用。因此，桑多瓦尔的军队被派到特佩亚卡克去堵住仍然无人防守的北面堤道。 110

作为回应，阿兹特克人建造了陷阱。他们在湖水相对较浅处的湖底挖坑，这样掉入或者被推下堤道的西班牙人就会被淹死。阿兹特克人也在湖底插入削尖的木桩，来刺穿西班牙的船只。

在舰队的保护下，西班牙人沿着堤道继续进军，但是他们无力巩固已有的战果，因为只要西班牙人离开那些阵地，阿兹特克人就会马上将之重新占领。晚上，西班牙人并没有撤回营地，而是被迫沿着堤道向前

移动营地，并且布置哨兵，防止阿兹特克人重新占领这些地方。当地面的战斗艰难进行时，西班牙人竭尽全力阻止特诺奇蒂特兰从外面继续得到补给。运来的食物和水不能通过步行到达城里，水上的封锁使得一天中通过独木舟的运输量下降到最低程度。

在这场战斗中，就像少数西班牙士兵在成千上万的印第安盟军中的作用一样，舰队在数以千计的盟军独木舟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们虽然数量很少，但却是一支不可代替的，具有很大冲击力的力量。不过，如果没有盟军独木舟的支援，舰队即使能够冲破阿兹特克舰队，也很难利用这一战果，并有可能被成群的阿兹特克独木舟部队压垮，因为他们很难战胜这些独木舟。如果风向合适，大舰队比独木舟速度要快，但是特诺奇蒂特兰岸线很长，13 艘舰船很难完全封锁住这些独木舟。此外，没有几艘舰船能够在晚上继续航行，因为在水里藏着木桩，而且这些船吃水很深，不能进入大多数较浅的水域。所以，联军的独木舟对于围困特诺奇蒂特兰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争夺堤道的战斗继续进行，任何向前冲锋或者和大部队脱离的人都很容易被对方抓住。阿兹特克人现在很善于引诱西班牙人向前冲锋穿过堤道的突破口，然后他们再返回来将西班牙人赶回突破口，这样西班牙人就难以施展其精妙的战术调度了。所以科尔特斯命令，必须先将突破口守住，然后才能继续向前进军。当马被派到堤道上进行战斗时，阿兹特克人已经很习惯了。在马匹到达战线之前，他们用特别长的矛来刺杀马匹；他们还将战斗放在崎岖的坑洼地带进行，而不是开阔地带，这样马就不能冲锋；或者在开阔的广场放置路障和巨石，同样可以对付马匹。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及其联军继续无情地向前推进。当战争的形势发生改变时，周围城镇的忠诚度也在改变。西班牙人的每一次胜利都动摇着阿兹特克城镇的忠诚度。最后，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和奎特拉瓦克背叛了阿兹特克，尽管他们后来遭到了阿兹特克人的报复。伊斯特拉帕拉潘、威齐洛波奇科、科尔瓦坎和米斯基克(Mizquic)截击了前往特诺奇蒂特兰的供应，而向西班牙人提供劳力和食物。

此时，夸乌特莫克命令向西班牙人的 3 个营地同时发动两次进攻。尽管一些西班牙人被杀死了，但是阿兹特克军队的力量却遭到分散。于是夸乌特莫克决定集中所有的兵力向一个西班牙营地发动进攻，即位于特拉科潘的阿尔瓦拉多的部队。然而，由于这次袭击发生在白天，所以西班牙人能够有效地利用大舰船，阿兹特克人被打退了。

111



这幅画出自《佛罗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展示了特诺奇蒂特兰攻防战的激烈程度。画面中西班牙的长矛骑兵刚攻入特拉特洛科市场。

6 月 30 日，西班牙人遭受了可算得上是最重大的挫折。当阿兹特克人假装撤退时，科尔特斯穿过突破口继续追击他们，但是突破口没有人防守。阿兹特克人派独木舟进攻突破口，切断了科尔特斯的退路，再用陆地上的部队和水军把他围住。科尔特斯逃了出来，受了伤，但是其他 68 个西班牙人和 8 匹马没能逃出来。10 个被抓住的西班牙人很快在大神庙作为祭祀的人牲被杀死了，他们的头颅被带回到了战场，并扔还给了西班牙人。其他的俘虏被剜去心脏、划开面部后鞣制成人面皮，送给阿兹特克的盟友们，证明西班牙人是会死的，并警告印第安人不要

背叛阿兹特克人。

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在接下来的 4 天里，阿兹特克人袭击了西班牙人的每一个营区。战斗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许多印第安盟友开始抛弃科尔特斯。只有特拉斯卡兰人、乔洛兰、韦霍津科人、特斯科科人、查尔科人和特拉尔马纳尔科人象征性地留下了些部队，其他大部分人都回家了。但是西班牙人却没有泄气。在双桅帆船的帮助下，他们在两个星期后击退了阿兹特克人。当阿兹特克人没能消灭西班牙人时，西班牙人的盟友开始回来，例如特斯科科、特拉斯卡兰、韦霍津科和乔洛兰人。于是西班牙人继续向城里进攻。

此时，双方都疲倦了。特诺奇蒂特兰的食物和淡水越来越少，阿兹特克人的战斗损耗无法得到补充；但是西班牙船只却越来越多地到达韦拉克鲁斯，新的武器和士兵供应持续拥向特诺奇蒂特兰。

112

当科尔特斯最终进入特诺奇蒂特兰时，他开始摧毁城市以防止阿兹特克人借这些防守设施来进攻西班牙人的侧翼。当西班牙人从南部进入城内时，阿兹特克人撤退到北面的特拉特洛尔科。尽管如此，西班牙人仍继续进攻，并于大约 8 月 2 日到达了特拉特洛尔科大市场。当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抓住了他的兄弟科亚纳科奇时，忠于科亚纳科奇的人改变了立场，这使阿兹特克人丧失了更多士兵。

但是即使在最后的日子，当这个城市面临饥饿，希望越来越小时，阿兹特克人相对科尔特斯的印第安人盟友时，依然有很大的优势，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当这些印第安人在没有西班牙人的支援下发动进攻时，阿兹特克人仍旧能够切断其退路并杀死他们。所以西班牙人有时候装作印第安人，混在其印第安盟友中一起进军，以便引诱阿兹特克人袭击这看起来全是印第安人的军队。

垂死挣扎之中，夸乌特莫克装扮成国王阿威索特尔(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者，1486 — 1502，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的样子作为精英武士指挥进攻。但是这一最后的努力失败了。8 月 13 日，西班牙人突破了阿兹特克人最后的防线。在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战中，西班牙的双桅帆船捕获了夸乌特莫克乘坐的独木舟，国王投降了，一同臣服的还有

他的妻子和大约 30 名贵族，包括特拉科潘的国王。他们要求去见科尔特斯。

经历了 3 个月的围困之后，特诺奇蒂特兰成为一片废墟。但是西班牙人的盟军继续进攻阿兹特克人，杀死了几千人，抢掠了 4 天多。印第安盟军对这座顽抗到底的城市，做了人们预期他们会做的事，科尔特斯也无力制止他们。当屠杀最终停止的时候，科尔特斯命令修理水渠，将死者移走并掩埋。科尔特斯和幸存的 900 名西班牙士兵无愧于“征服者”的称号，但是扮演关键角色的是其印第安盟军，他们给每个参战的西班牙士兵提供了约 200 人的支援。

因此，对墨西哥的征服不仅仅是西班牙人的胜利。科尔特斯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新型军事技术，但是征服成功依靠的是成千上万的印第安盟军士兵，他们利用这些武器制造出的防线突破口，并使得这种突破最终发生效力。如果没有印第安人发掘并抓住机会，一举推翻阿兹特克人，就不会有西班牙人一显身手的机会。



第二部分

新西班牙的王权、教会和骑士：1521—1810

113

1521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城建立了殖民地的首府。直到约一个世纪以后的1607年，英国人才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永久定居点。1620年，西班牙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城市里有大教堂、大学以及印制当地报纸的印刷所。英国殖民者面对的是荒野，而西班牙殖民者则居住在和欧洲一样现代化的城市里。

300年中，西班牙国王统治着新西班牙，这个地区的面积是现代墨西哥的2倍。西班牙统治者坚持将美洲土著归化为基督徒，想以此证明其建立美洲帝国的正当性。美洲帝国的经济被看作是西班牙的财产，西班牙人企图用墨西哥的白银来资助自己在美洲的冒险事业，并建立一个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结构类似的社会(在社会等级、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西班牙王室坚持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力，并通过殖民地机构和教会来实行统治。但是，距离的遥远(从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坐船需要6到8周)以及殖民地充满诱惑的大量机会(从发财致富到取得名誉地位)，都削弱了王室的权威。而且，许多美洲出生的白人觉得，遵守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表面上，旧的方式和宗教习俗都继续存在，但是在发现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压抑和不方便后，人们凭本能找到了很多方法来规避。

尽管如此，在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形成的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仍是，西班牙的文化：当地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南部的方言(当然也增加了很多阿兹特克词汇)；当地的法律主要受到了马德里法律的影响，当然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变化；当地的宗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并结合地方特点进行了改动。

114

西班牙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随着欧洲植物和动物的引进，日常食物有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当地人的食谱里增加了猪肉和鸡肉。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当地人的基本食品：玉米(做成玉米饼，tortilla)、豆类

(现在用猪油煎了)以及辣椒(当地主要的调味品)。这种改良的饮食,例如炸玉米卷(tacos)、肉馅玉米卷饼(enchiladas),现在成为了墨西哥在世界上的象征。在文化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圣母在一个名叫胡安·迭戈(Juan Diego)的印第安牧童面前显灵。现在,瓜达卢佩圣母的形象已经成为墨西哥最著名、流传也最广的宗教偶像,也有人在争取让胡安·迭戈封圣。

第四章　一个无与伦比的帝国

马克·伯克霍尔德(Mark A. Burkholder),
苏珊娜·希尔斯(Suzanne Hiles)

115　从科尔特斯摧毁特诺奇蒂特兰城到墨西哥获得政治独立,经历了三个世纪。在此期间,西班牙迅速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其他地区,建立起西班牙式的城市、城镇、矿区和乡村庄园。主要是由于征服者带来的传染性疾病,土著人口大量并迅速地减少,这对西班牙人利用本地劳动力、开辟土地进行放牧和农业生产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种名叫汞齐化(amalgamation)的冶炼方法被引进了墨西哥,即用水银将银从矿石中分离出来。通过跨大西洋的贸易网络,墨西哥的白银被运到西班牙以换取各种欧洲商品。有了这种贸易,再加上从欧洲引进的动植物,西班牙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也能过上像西班牙本土一样的生活。

早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那种后西班牙征服时代政治和管理的稳定局面就已经形成了。社会结构也同样稳定,其特点是以种族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在新大陆的后裔(即克里奥尔人[criollos]),构成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普通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构成金字塔的塔基,混血人种构成中间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增长很快。从许多方面来看,西班牙征服者到

来约半个世纪后，这里的确像是“新西班牙”了：传教士来了；墨西哥城建立了大学用来让殖民地的西班牙年轻人学习，以便以后进入教会和政府工作；同时宗教裁判法庭也设立了。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56—1598)统治时期，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达到巅峰。与此同时，西班牙在新大陆的统治日益巩固，墨西哥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王室的腰包，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到西班牙塞维利亚的跨大西洋定期舰队护航制度也日益完善。但是，西班牙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军事失败带来的影响力下降，以及 1620 年以后舰队护航制度的逐渐衰落，都使得西班牙和殖民地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

116


RECOPILACIO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SEGVNDO.

EN MADRID:
Por Ivlian de Paredes, Año
de 1681.

《西印度法律汇编》(*The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是西班牙王室颁布的用于治理西印度地区的四卷本基本法规集成，其中包括了 6 500 条法规，但还只是当时所颁布法规中的一小部分。1681 年，它成为殖民地法治的主要依据，是法官和律师们的必备书目。它后来又重印过，但从没进行过修订。

当不断挣扎着的西班牙逐渐沦为欧洲二流强国时，新西班牙摆脱了对宗主国的依赖。这块殖民地远离当时的战争和冲突，社会安定、政治管理秩序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大约在 1630 年以后，人口也开始持续增长。尽管在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室拥有行政监督权，但是殖民地的商人、矿主、大地主和政府职员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他们主要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王室的利益。墨西哥能够生产所

有生活必需品，还可以用白银进口奢侈品，因此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经济独立。同时，西班牙在此地无可置疑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提供了政治稳定的基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又刺激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与扩张。

16世纪70年代，新西班牙代替秘鲁成为西班牙帝国主要的白银供应地。直到墨西哥独立，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领地，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它的人口种族构成多种多样，而且人口总数也最多。墨西哥城作为总督驻地，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其他新兴的大城市。1688年以后，西班牙王室小心谨慎地选拔墨西哥的高级官员，不再将新西班牙的总督"提拔"为秘鲁总督。西班牙殖民地边界的不断扩张，使得墨西哥可以免于遭受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入侵。1762年，英国人夺取了古巴的哈瓦那，这使得马德里的王室顾问们深受震动。墨西哥成为美洲大陆需要加强保护的首要目标，包括增加财政收入以及加强行政管理等。到1789年，所有重要的改革都已开始实施，例如开放整个总督辖区实施"帝国内部自由贸易"(comercio libre)等。但是，18世纪80年代的传染病、干旱和谷物歉收都表明，在"白银繁荣"景象下是日益严重的危机。18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使得不断增长的白银生产的价值缩水，而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土地短缺，并使得许多印第安人和其他农村劳力的生活日益恶化。尽管如此，在马德里的统治者看来，新西班牙还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是王室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来源。18世纪90年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墨西哥会用武装起义来反抗殖民统治。几乎3个世纪以后，新西班牙仍是殖民帝国无与伦比的核心。

117

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的陷落刺激了西班牙人探险和寻求财富的野心，新发现的土地提供了诱人的机会来获取矿产、肥沃的土地和大量定居的人口。他们相信有一条水道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更加刺激了探险的欲望。早期探险者对征服阿兹特克后的微薄回报感到很失望，于是加入了后来的移民行列，希望进行探险并获取更多的财富。后来的探险者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很难和科尔特斯的相媲美，但是他们也扩大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范围，并且增加了有关新大陆的地理知识。伴

随着探险者而来的是定居点和道路的建设,这也带来了未来的潜在财富。王室官员和教士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墨西哥这块殖民地上行使行政管理权和教会管辖权。在5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征服者和定居者将征服前各式各样的土地和人民变成了统一的新西班牙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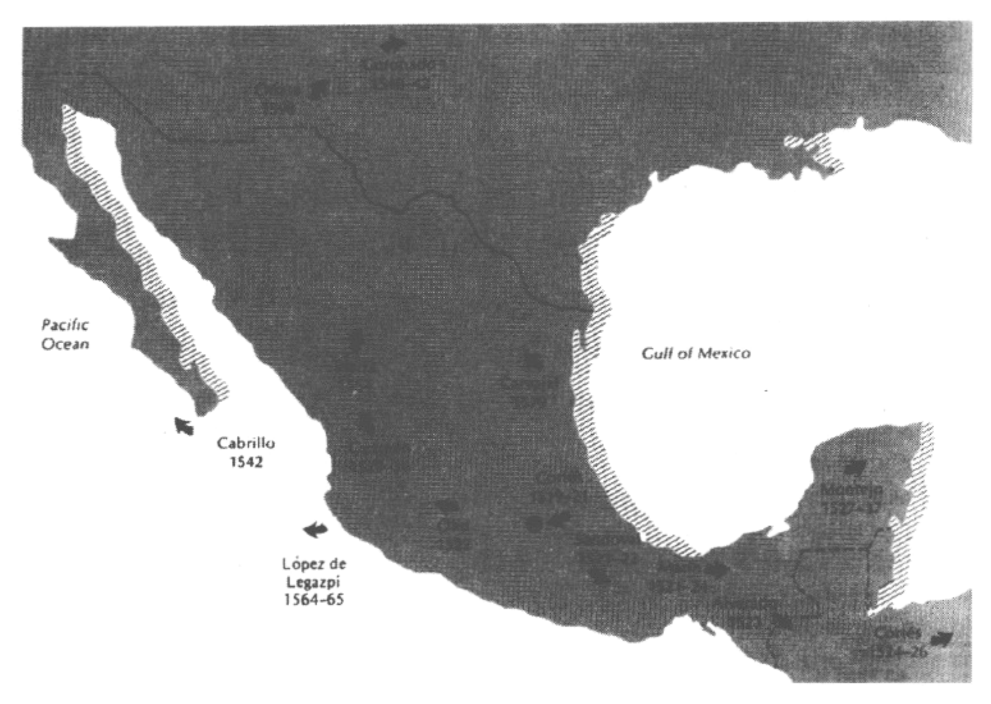
墨西哥殖民地是1535年建立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核心。新西班牙行省是总督辖区的中心地区,由总督兼任省督直接统辖。处于太平洋沿岸、特万特佩克地峡(Isthmus of Tehuantepec)东侧,一直延伸到墨西哥湾是尤卡坦行省。新西班牙行省的北面和西面是新加利西亚行省。其后殖民地进一步扩张,又建立了新比斯开(Vizcaya)(1562年)、新莱昂(1580年)和新墨西哥(1598年)等行省。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一些边缘省份进一步裂分。

这些行省的面积和人口都很庞大,特别是新西班牙和新加利西亚更是这样,因此下面又分出一些地方行政单位,通常被称为市长辖区(alcaldías mayores)。16世纪70年代,此类行政单位的数目达到了顶峰,然后又因为土著人口的减少和加强行政管理的原因而大幅度下降,在17世纪晚期下降得尤为明显。每个辖区内,都有一个核心市镇,为本辖区行政长官——市长(alcade mayor)的驻地。

118

最多的行政单位是市镇。西班牙王室认可既存的土著人市镇及其附属的村庄(cabeceras 和 sujetos),并且强调它们的中心地位。此外,当土著人的村庄合并时,要建立新的市镇。在土著人的市镇里,印第安官员负责管理行政事务,并且充当市镇与西班牙的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及王室官员之间的联系中介。

自从1519年建立韦拉克鲁斯以来,西班牙人就模仿其祖国的模式,在墨西哥建立了很多市镇。这些市镇是宗教、社会、市场和行政管理的中心,它们的管辖范围起初一直延伸到附近市镇的边界处,但西班牙国王很快做出决定,将它们的范围限制在15里格的半径以内。如果这个范围内有土著人的社区,则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土著人飞地。大部分西班牙市镇人口并不多,并拥有各种各样的种族。至16世纪50年代初,所有那些在18世纪末人口达到或超过1.5万人的市镇都已经建



16 世纪时西班牙主要的探险和征服行动。

立,最不济的也已形成采矿营区。除了首都墨西哥城,这些城市包括普埃布拉(Puebla)、克雷塔罗(Querétaro)、安特克拉(Antequera)、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韦拉克鲁斯、瓜纳华托(Guanajuato)和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在 16 世纪 30 年代中期,新西班牙只有 12 个左右的市镇,16 世纪 70 年代已增加到 35 个,1624 年又增加到 82 个。

墨西哥缺乏可供航行的河流,而且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也缺乏用来运输的驮兽,因此建造适合驴子运输的道路就非常有必要了(牛车在这里很少见)。道路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人员、牲畜以及地区内生产和消费的货物的流通,同时也有利于进出口贸易。自征服时代起,从墨西哥湾的韦拉克鲁斯到墨西哥城的陆上交通就已经显得很重要了。16 世纪 60 年代,西班牙"平定"了菲律宾,并在墨西哥和菲律宾之间建立了定期的贸易制度,因此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到墨西哥城的道路也开始建设了。尽管如此,这条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修整,只适合驴子行走。1546 年,在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将该城与墨西哥城连接起来的皇家大道(Camino Real)很快就修筑完毕。

119

这条大道在最终到达新墨西哥的圣菲之前，也途经了许多北方的矿区。其他的市场、矿区和行政中心之间也有较窄的道路相连。这个交通网络的重要特点是将墨西哥城置于中心。它是一个陆路中心，就像菲利普二世将马德里作为西班牙的陆路交通中心一样。

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了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这迫使西班牙王室将更多的权力授予殖民地的官员，比其在西班牙通常可得到的授权要多得多。因此，虽也有体制上的行为制约，新西班牙的官员仍享受着比西班牙同僚们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权限。一份 7 月上旬从马德里下来的命令，通常到 9 月下旬才能到达墨西哥城。直到次年春天，对命令的回复才开始送出，到达马德里已经是这年秋天了。如此漫长的周期还只是解决某个问题的过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这种由骑马的信使和帆船承载的远距离通信方式使得西班牙和墨西哥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

卡斯蒂利亚王室非常希望从“西印度”（西班牙人对新大陆的称呼）获得财政收益。1493 年，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里获得的合法的征服权，以及在卡斯蒂利亚实行的绝对主义的王权统治，都使得西班牙国王可以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制度略微修改之后，移植到美洲的殖民地去。在将这些制度进行试验并作了必要修改后，西班牙王室迅速在新西班牙建立了行政机构，这使得西班牙的统治在这里持续了约 300 年。

西班牙王室认为，就王室财政和卡斯蒂利亚的经济两方面而言，都应该将从西印度获得利益予以制度化，因此于 1503 年在塞维利亚成立了贸易署（House of Trade）。塞维利亚是一个富裕的卡斯蒂利亚商业中心，拥有通往大西洋的河道。贸易署向前往新大陆的船只和旅客发放执照，监督来往船只并征收货物贸易税，绘制最新的海岸线和航道地图，并且负责处理殖民地贸易中的纠纷和公海上发生的犯罪事件等。

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后，殖民地的潜在财政收益很快显现出来了，因此西班牙亟需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来管理殖民地的日常事务。1524 年，西印度事务院（Council of the lndies）成立，担负起西班牙在新大陆所属领地的行政、立法和管理职能。在近 200 年中，西印度事务院作为西班牙国王的顾问机构，制订并以国王的名义发布了许多政策，和墨西

120

哥以及其他新大陆的西班牙属地官员进行通信联系，并参与选拔高级行政人员，但值得注意的是，总督除外。

此外，西印度事务院还是重大民事案件的上诉法庭，并且对官员进行司法审查(residencia)，有时候还会进行特别巡视(visitas)。这是16世纪40年代起，在墨西哥形成的制度。西印度事务院的官员对墨西哥很少有亲身接触，资历深厚者常被提拔到卡斯蒂利亚王室会议(Council of Castile，这是国王的主要顾问机构以及管理机构)。这个另外，机构有着根深蒂固的办事缓慢传统，再加上跨大西洋的交通不便，这些原因都使得该机构办事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其在17世纪慢慢失去了权威。18世纪早期，西印度事务部(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lndies)成立，接手了其很多职能。

驻墨西哥的最高长官是新西班牙总督。查理一世任命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为第一任新西班牙总督，他是卡斯蒂利亚一豪门望族的小儿子，这样一个有着良好政治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威慑那些征服者以及早期的移民定居者。在长达15年(1535—1550)的任期里，他在墨西哥牢固确立了王室的权威。

作为国王的私人代表，门多萨和其后的总督都住在坐落于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的宫殿里，有无数的仆人，经常举行奢侈的招待会，充分体现出了皇家的气派。西班牙国王虽然鼓励这种皇家做派，但是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很多限制。这些限制总督权力的措施包括：规定任职的期限，西印度事务院经常发布指令，不时进行特别视察，禁止形成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小圈子，以及在任期结束时进行司法审查等。更为重要的是，其他殖民地机构和国王的代表对总督形成权力制约，例如墨西哥检审庭、墨西哥大主教、财政部官员和墨西哥城市政议会等。他们的职能和总督相重叠，并且拥有直接和国王以及西印度事务院进行独立联系的特权。

作为新西班牙的主要行政管理者，总督负有很多责任，包括防止“不公正”地剥削土著人，管理殖民地的防卫、探险和定居，司法管理，民事管理，税收征集，财政事务，以及鼓励经济发展并将财政盈余运送到

西班牙。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国王衡量一个总督是否称职,就是他能将多少财政盈余运送回西班牙。

总体而言,1535－1808年间的44位总督(其中只有3位是克里奥尔人)都是富有军事、外交和管理经验的杰出人士。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1516－1700),任职者都比较年轻,其中的9位总督被提拔为秘鲁总督。但是,当新西班牙作为白银和财政收入的来源日益重要,甚至超过秘鲁时,西班牙国王就不再这样做了,1688年任命蒙克洛瓦伯爵(Conde de la Monclova)为秘鲁总督是其终曲。其后不久的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在新的波旁王朝治下,再也没有类似事件发生。大多数新西班牙总督都是死在任上的。7个波旁王朝时期的新西班牙总督死于任期内,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只有2名总督死于任内。总督们一般都出身于贵族,只有4名哈布斯堡时期的总督在就任时还没有贵族头衔,其中有1位总督在其第二任期内获得了贵族头衔,这一般来说很少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只有11位波旁时期的总督在获得提名时拥有贵族头衔,其中有1位是在得到提名后马上获得贵族头衔的。波旁和哈布斯堡时期的大部分总督都属于某个骑士团(military order)。

121

总督们不仅权力范围很广,而且生活得像国王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仿佛拥有远远超过其实际具有的权力。墨西哥和瓜达拉哈拉检审庭的法官虽然职位较低,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检审庭是新西班牙总督和新加利西亚检审庭主席的咨询机构和高等司法机构。西班牙国王一般任命总督时都有任期限制,但是检审庭的法官都是终身制,除非他们在司法领域内被提拔或者转到另外一个法庭。由于墨西哥检审庭的成员很少会转到西班牙的法庭或者西印度事务院任职,而且只有少数人被提拔为其他检审庭的主席,这就使总督周围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人。这些人结交广泛,在当地的机构中很受尊重,因而拥有很大权力。明智的地方行政首脑们都很尊重他们的建议。

1527年在墨西哥城,以及1547年在瓜达拉哈拉城,国王建立了检

审庭。皇家法律规定,所有的检审庭法官都必须是合法的婚生子(他们都拥有贵族地位),至少 25 岁,拥有大学法律学位。第一批获得任命的法官出生在西班牙,但是 1585 年之后,许多克里奥尔人被任命为法官。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瓜达拉哈拉检审庭的大部分法官都是从基层的法庭事务做起,而且几乎一半左右的人再也没有得到升迁,大部分人最后去了墨西哥检审庭。64 名法官中只有 9 名是美洲本地出生,2 位法官出生于墨西哥检审庭所辖地区,没有一位法官出生于瓜达拉哈拉检审庭所辖地区。由于没有瓜达拉哈拉出生的人在当地检审庭中任职,1700 年之前调往墨西哥检审庭的 3 人中的 2 人只在当地任过职务,因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当地人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力。

西班牙国王对来自新西班牙的财政收入非常重视。1521 年在墨西哥城,1531 年在韦拉克鲁斯,国王直接任命财政官员,紧接着又成立了财政委员会。1605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了审计厅(accounting tribunal),这标志着国王想进一步控制支出和收入,并且监督财政官员,防止他们滥用王室的资金。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财政委员会的王室官员数量稳定下来,一般为 2 至 3 人:一名会计和一名出纳,有时候还包括一名被称为业务主管(veedor)的成员,他同时兼有业务员和审查员的角色。根据资料,在 1660－1780 年,约有 225 名新西班牙财政署和审计厅官员被任命,其中 75%的人出生于西班牙,20%左右来自新西班牙,只有 4%来自其他美洲地方,不过大部分西班牙人通过联姻和墨西哥当地出生的同僚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网,就连单身的官员也形成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精英集团,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破以出生地划分人群的观念。

122

王室任命的官员中大部分是地市级官员。起初任命这些官员主要是为了管理已收归王室所有的原委托监护地上居住的美洲土著人。这些官员还拥有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的数量变化很大,16 世纪 70 年代达到顶峰,约有 270 多人。此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合并,官员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到 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实行监政官(intendant)制度时,在新西班牙行省有 129 个市长,在北部边境地区大约有 7 个省督和 62 个

市长，还有几个省、市长在东南部地区。

从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的任职期直到17世纪70年代，大部分地市级官员由总督任命。征服者的直系后裔和早期的拓居者都按照其父辈的职位获得了这些官职。1538年，王室发布法律，承认了这些官员的地位。16世纪晚期，此类官员中有约40%出生在新西班牙。总督的官职任命权同样也惠及了那些跟随他们来到墨西哥的随员们。

17世纪70年代晚期，国王决定出售这些地方官职位，这不仅大大削减了总督们的特权，也刺激了购买者在其3至5年的任期内，拼命搜刮更多的利益来补偿自己的购买成本。这些市长们上任前通常都因为购买职位而负了一大笔债，并且都承诺上任后要回报这些债权人。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暗中勾结来剥削辖区内的印第安土著。这些债权人大多是墨西哥城的批发商。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臭名昭著的摊派制度(repartimiento)，例如在瓦哈卡的印第安人辖区，这种制度通常是这样运作的：将一些原材料，如棉花，分配给印第安土著，他们负责将这些棉花加工成一定尺寸的棉织品(例如毯子之类)，然后获得一定报酬(远远低于自由市场的工资)，市长或直接将这些成品按市场价出售，或通过债权人指定的代理人将这些产品运送给债权人来出售。1750年，出售职位的做法停止了，但是腐败的摊派制度却继续存在。

在这层层行政管理结构之下，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土著人的市镇，都有各自的地方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员。市政议会通常有4名或4名以上的议员(regidore)，2名地方法官和议长(alcaldes)。此外，市镇还有其他官员，负责当地的警察事务，管理当地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管理当地市场零售业务，以及其他一些普通行政事务。印第安土著的市镇当局也负责管理一些事务，例如征收赋税、保管财税收入和社区财产、供养当地教堂、审理较轻犯罪行为、处理地方土地和水源事件、保护当地的权利和财产等。独立的印第安村庄(首要市镇)也有当地人的地方长官。毫无疑问，地方事务多由本地出生的人参与。墨西哥城是最大的城市，从1590年开始，大部分市政议会议员由本地人担任。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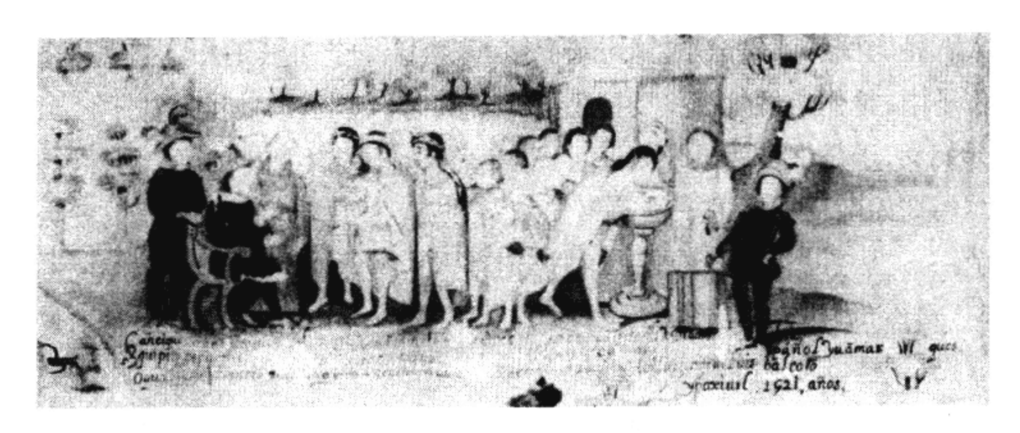
西班牙国王在欧洲深深卷入了战争，为了筹集战争经费，1633年

批准出售财政署的官职，1677 年出售地方官职，1687 年出售检审庭官职，1677 年甚至开始出售总督的头衔。但这些出售的官职都有任期限制，只有很少的情况允许购买者终生任职。国王还出售西班牙人市镇中的一些职位。1606 年以后，甚至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卖和继承这些职位。这种售卖官职的制度保证了当地出生的精英集团成员通过其代表直接控制本地的正规行政机关。相反，非本地出生的地方精英不得不依赖间接的手段，例如经济和社会关系，来影响财政署和检审庭的官员们。

新西班牙的官僚机构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主要是通过法律，而尽量少用武力来维持西班牙的统治，维持王室、殖民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将财政盈余运回西班牙等。虽然许多殖民地官员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致富，但他们投身当地的经济事务，通过联姻、亲属关系以及做别人的教父和教母等方式形成了社会关系网，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官员非常注重当地人的利益，并在执行王室的命令时加以变通。这有利于协调王室和殖民地的利益，并保持政治稳定。这和墨西哥独立之后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班牙的征服战争永久地改变了墨西哥的社会结构，制造了宽泛的、按照种族划分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群体；同时也加速了种族的融合，并为某些西班牙人和本地出生的人提供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西班牙王室承认在土著人中存在着贵族和平民的区别，但是他们还是把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土著人统统划入到“印第安人”这一单一群体中，并让大部分土著人缴纳赋税，以此作为臣服的标志。相反，白人却被免除了任何直接的税收，这一特权在西班牙是贵族的标志。

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有助于那些征服者和拓居者实现其提升社会地位的梦想，这也是其最初的吸引力所在。科尔特斯的征服者团队中很少有人出身于卡斯蒂利亚上层贵族阶层，最初的委托监护人(encomenderos)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合法的贵族出身。但是，委托监护制能够给予委托监护人对被监护者实际的领主地位，这种制度本身具有贵族制度的性质，远远超出免税所赋予的贵族意味。参与征服活动的人获得了委托监护权，马上就形成了新殖民地里最初的



两位委托监护主(可能为德纳瓦家族[de Nava]的成员)参加附近村庄的头领们的洗礼。通过参加洗礼,这些委托监护主就尽到了保护向他们交纳赋税的土著人的职责。

顶级阶层。西班牙国王很快就意识到,在墨西哥有可能形成真正的贵族阶层,于是迅速而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了他们成为卡斯蒂利亚国内那样的大贵族家族,阻碍他们在其领地享有很大的权力和拥有司法管辖权。

除了广义上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区别外,土著社会在征服前已经存在的金字塔结构,以及种族、性别、民族等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毫无疑问,当科尔特斯和其伙伴在墨西哥湾驻扎下来时,种族融合在新西班牙就已经开始了。科尔特斯和其土著女翻译玛琳奇(西班牙人称其为唐娜·马琳娜)私人关系密切。这说明性和战争进程总是相辅相伴。16 世纪 20 年代,非洲奴隶也被运来了,这使得美洲社会的种族结构更加复杂多样。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祖先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

西班牙人遇到了土著金字塔型社会里各阶层的人,从部落首领、贵族到奴隶。蒙特祖马二世处于征服前墨西哥社会结构的顶层。尽管西班牙取得最高统治权后严重打击了土著贵族阶层,但是幸存下来的贵族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征服战争之后不久,一些土著统治者的女儿嫁给了西班牙人。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蒙特祖马二世的女儿唐娜·伊莎贝拉·蒙特祖马(Doña Isabel Moctezuma),在第一位丈夫阿兹特克皇帝夸乌特莫克死后,她先后嫁给了 3 个西班牙

人。她的妹妹莱昂诺尔(Leonor)先后嫁给了2个西班牙人。在这两个例子中,她们结婚时都将委托监护地作为嫁妆。殖民地早期缺少西班牙妇女,于是许多西班牙人娶了一些出身稍低的印第安妇女。例如,科尔特斯的翻译就娶了一位印第安妇女,并且生了7个孩子。征服者贡萨洛·罗德里格斯·德拉马格达莱纳(Gonzalo Rodríguez de la Magdalena)也娶了当地的印第安妇女,生了8个孩子。因为父辈地位显赫,这些孩子们都被看作西班牙人。

更多的西班牙人则不和印第安妇女结婚,而仅仅是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性关系。科尔特斯承认有6个非婚生孩子,包括和唐娜·马琳娜生的一个儿子,和唐娜·伊莎贝拉·蒙特祖马生的一个女儿,以及和其他印第安妇女生的两个女儿。征服者阿隆索·冈萨雷斯(Alonso González de Portugal)正式承认有两个梅斯蒂索(mestiza,西班牙和印第安人混血儿)女儿。早期的拓居者佩德罗·努涅斯(Pedro Nunē)和迭戈·德奥坎波(Diego de Ocampo)各自有3个非婚生女儿,她们的母亲当然是印第安妇女。这些梅斯蒂索孩子如果被父亲承认并作为西班牙人抚养,就会很快融入西班牙人的社会。但是,一些非婚生的梅斯蒂索孩子缺乏父母的抚养和保护,既不属于西班牙人社会,也不属于印第安人社会。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受到公开的歧视,并且很难找到工作。他们普遍都缺乏正式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大部分梅斯蒂索年轻人在西班牙官员眼里都是些无所事事的麻烦制造者、流浪汉和小偷。

一开始,印第安土著把来到墨西哥的少许非洲人看作是"黑的白人",和其他征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皮肤黑而已。随着黑人奴隶的进口,其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是男性,因此也学着其白人主子和当地印第安妇女发生性关系,这使得当地的种族类型也越来越丰富。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人口越来越多的非婚生混血人种中的一部分,与非婚生的梅斯蒂索人一起,被统称为卡斯特人(castas)。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主要是克里奥尔人,即墨西哥出生的西班牙人。到17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卡斯特人之间混血产生的后裔数量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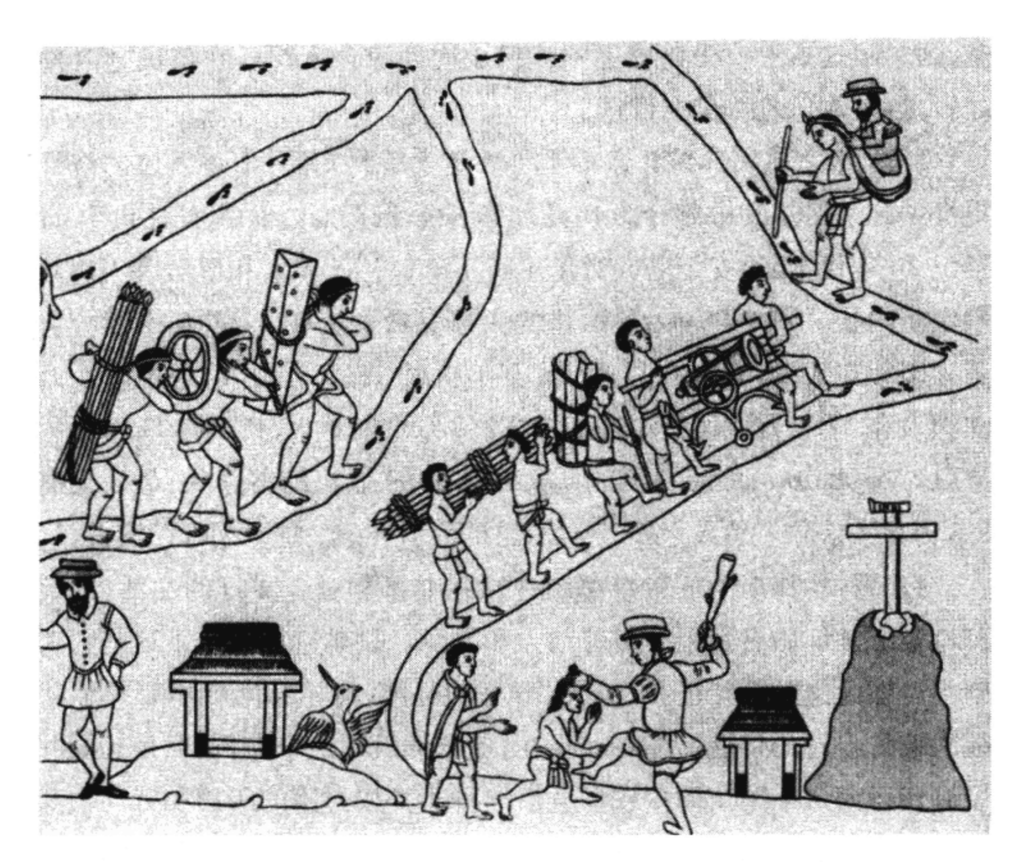
多,远远超过了主要由克里奥尔人组成的西班牙人口。在殖民地时期之后,这种人口趋势仍在继续。

1570 年之前人口统计数字不可靠是人所共知的,土著人口的统计更是如此。但是其中整个人口发展趋势是明显的。从征服时代到 17 世纪 20 年代,印第安土著的数量不断下降,白人、黑人和混血种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到 1650 年,墨西哥的人口总数约为 170 万,其中四分之三为印第安人,约有 130 万;此外,还有大约 18.5 万白人,包括 1.4 万欧洲人和 17.1 万克里奥尔人;还有 22.5 万卡斯特人,其中有 11.6 万穆拉脱人(mulattoes,即黑白混血儿),以及 10.9 万梅斯蒂索人;最后还有 3.5 万黑人。除了黑人之外,其他种群的人口在殖民地时期都在增长。

跟随科尔特斯的征服者都向往得到财富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都希望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得劳动力和贡赋。科尔特斯满足了这些人的要求。在此之前开始征服加勒比群岛的时候,科尔特斯就用委托监护权来犒赏自己的早期追随者。现在,他依然沿用这个惯例,但是起初并没有获得西班牙国王的授权。凭借这种监护权得到的印第安劳动力和贡赋供养着大约 500 名征服者和早期的拓居者(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居住在墨西哥城),以及他们的家人和随从,使他们无需亲自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们有时候也开发土地和矿山来获取利润,以此积累了大量资本,并投资到其他各种各样赚钱的生意中去。这些委托监护人的确也要负担一定的责任,例如负责将印第安土著归化为基督徒,向西班牙国王提供兵役等,但是其主要的利益是扩大自己的财富。 126

通过委托监护制度,或者通过对土著人实行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度,西班牙征服者和早期的拓居者奠定了殖民地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剥削大量的印第安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数量很多,而且是定居人口,他们具有服从统治者并交纳贡赋的历史传统。因此,征服者可以轻易地通过印第安人首领,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西班牙人想要的东西,例如贡赋和劳动力,很快就远远超过当年阿兹特克帝国统治者的需求。被西班牙征服前,印第安臣属部落主要向阿兹特克帝国提供玉米、西红柿、豆类、棉织的斗篷、琥珀、羽毛、



在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之前，除了在可以利用独木舟的墨西哥谷地的大湖区域外，印第安挑夫们就像图中所描绘的那样靠肩扛手提把货物运送到墨西哥各地。尽管此后驴子、牛和骡子的引入提供了其他的运输方式，但西班牙人仍然继续使用印第安挑夫，尤其是在征服之后的头几十年里。

篮子、可可、辣椒、盐和火鸡等。随着欧洲农作物和牲畜的引进，又增加了小麦以及马的饲料等，铸币引进后又增加了货币税赋。劳动力需求包括用人力运输货物和材料，建造私人住宅和附属建筑，田间劳动，修筑道路，开发矿山，以及家务劳动等。

征服战争后，许多西班牙市镇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市镇很快成为印第安人缴纳的贡赋的最终市场。委托监护主将自己家里用不着的贡赋拿去市场售卖。这些市镇同时也是剥削当地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因为委托监护主要造住宅，教士要建教堂，政府官员要修市政厅、街道和其他市政设施。

127

如果印第安人口保持稳定，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对劳动力的要求

还能在几年内得到满足。但是，在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城陷落之前，印第安人口就开始不断下降了。印第安人口不断下降的同时，西班牙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因此迫使西班牙人调整对贡赋的需求，并改变使用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方式。

征服战争前，印第安人口约在1 000万到1 200万之间，也有人估计超过2 500万。17世纪20年代早期，土著人口只有75万。传染病再加上西班牙人的虐待和对劳动力的无度需索，都使得土著人口不断下降。天花是第一大传染病，1520年它从大安的列斯群岛传播到墨西哥，不但打击了西班牙人的敌人，同样也使其盟友深受其害。1545－1548年、1576－1581年、1629－1631年，另外一些传染病也相继开始蔓延，而一些局部的地方性传染病大爆发更使得人口损失加剧。1630年以后，人口数量稳定下来。其后的殖民地时期，人口开始增长，尽管仍是时有起伏，且各地增长情况不一。

土著人口的下降使得委托监护权的价值大为下降，而且使得幸存的印第安人负担更为沉重。同时，新来的西班牙移民也希望从土著劳动力那里分一杯羹。一些教士亲眼目睹了委托监护制对土著人的残酷剥削后，开始大力谴责这种罪恶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王室也不希望将委托监护主变成新大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不愿意让他们对被委托监护者拥有无限的可以继承的控制权。1542年，王室发布了“新法律”(New Laws)，集中批评委托监护制，这充分反映了王室和教会的观点。尽管委托监护人最后保住了继承权，但是土著人口的下降和王室不断试图控制剩余土著人口的努力，都使得提供劳动力不再是土著人的义务了。

1549年，王室官员开始给西班牙人分配定期轮换的被强迫征发为劳动力的印第安人，让他们从事农业、矿山、建筑和其他劳动，并声称这是为了公共利益。因此，分派劳役制度(repartimiento system)代替了委托监护制度，这给西班牙人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率的使用土著劳动力的机会。但是，持续的人口下降也影响到了分派劳役制度。17世纪早期，人口的下降以及西班牙雇主的经济发展要求让这个制度也支撑不

下去了。

当西班牙雇主发现分派劳役制度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时，他们就向印第安村民许诺提供季节性劳动工资，这显然比分派劳役制度所提供的工资高多了。1632年，新西班牙总督规定，除了墨西哥城的排水和防洪设施建设以及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矿山开采工程，其他工作如果使用强迫劳役分配制度下的劳动力都属于非法行为。此后，在新西班牙的乡村地区，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劳工以及乡村庄园里的住家劳工就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

16世纪，传染病使得人口急剧下降，这也刺激了重新安置印第安人计划的产生。新西班牙的教士数量相对较少，他们督促王室将幸存的印第安村民从分散的村落里集中到新的定居点，以便他们进行布道和做礼拜。这种定居点被称为“集合地”(congrega ciones)王室的官员、委托监护人和其他西班牙人也认识到将印第安人集中在一起会有好处。因此，他们拥护16世纪50年代，关于按照西班牙的典型城市布局来建设新的土著人村镇的王室法律。1560年，大部分征服前就已存在的、有西班牙教士布道的印第安村庄都被重新安置，住在边缘地区的印第安村民也移居到新的地方。1576－1581年的传染病导致了1593－1605年的第二波人口大迁移。西班牙人和教士们渴望控制这些新空置出来的土地，因此也积极鼓励这种人口大迁移。

1576－1581年的传染病使得人口下降，这也导致了大庄园史无前例的大扩张，因为这里有大量可供利用的土地、良好的市场条件，以及受到优惠工资待遇和土地使用权吸引的大量劳动力。征服战争后，虽然市政议会的官员和王室官员就开始授予土地，让委托监护人能经常使用他们属地上的印第安人，但是墨西哥中部印第安人的人口密度较高妨碍了早期大庄园的形成。征服者引进的牲畜，以及其他西班牙拓居者的到来改变了土地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和农业需要的大量劳动力相比，畜牧业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却需要大量土地作为牧场。目的不同，授予的土地面积也有很大差异。拨付给农业目的的用地一般只有100－400英亩，养殖绵羊和山羊的用地大约为2 000英亩，而

养殖奶牛的用地约为 4 500 英亩。

西班牙人一般都居住在劳动力供应充足、有机会赚钱，或者二者兼备的地方。因此，第一批西班牙人定居点距离土著人口密集的地方都很近，这样就可以通过委托监护制度获得劳动力和贡赋。但是白银矿脉丰富的地方一般都远离土著人的居民点，这就要求找到其他的替代劳动力来源，同时也意味着靠近矿山的未开发土地很快会被开垦为农业用地和牧业用地。

对贵金属的渴望使得矿藏勘探的地域范围很快就越出了墨西哥中部地区，努尼奥·德古斯曼(Nuño de Guzmán) 带领西班牙人来到了墨西哥城北部和西部，这里后来成了新加利西亚行省。1540 — 1542 年，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率领探险队进入现在美国的西南部。1541 — 1542 年爆发的米斯顿战争(Mixtón War)表明，20 多年以来在阿兹特克帝国范围以外的寻找贵金属的探险活动失败了。但是，作为战争的余波，一些教士和牧牛人还是向瓜达拉哈拉城的北面和西面继续前进和开拓。

129

1546 年，在萨卡特卡斯城附近发现了银矿。这里原本是一个矿区居民点，之后发展成了城市。这刺激了北进运动，也导致了大量农业庄园的产生。这些庄园向新的定居点提供小麦、肉类和皮革等。16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从南部招来的印第安人来到这里，他们是受薪劳工。此外，矿主们也建立了一些矿山庄园，庄内包括磨坊、加工设备和储存设施、马厩、主人用的马匹、工人住的宿舍和小教堂。附近的土地用来饲养驴子和种植谷物。萨卡特卡斯城的矿业繁荣刺激了对财富的更大追求，也导致了更多的银矿被发现，例如瓜纳华托(1550 年)、帕丘卡(Pachuca，1552 年)、米内拉尔-德尔蒙特(又称雷亚尔-德尔蒙特 Real del Monte，1552 年)、松布雷雷特(Sombrerete，大约 1558 年)、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í，1591 — 1592 年)，以及帕拉尔(Parral)。1631 年，帕拉尔还发生了一次大罢工。

西班牙人将势力扩张到墨西哥中部之外尚未被征服的大奇奇梅克(Gran Chichimeca)地区。这立刻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敌意。随后双方

产生的冲突,使在连接萨卡特卡斯和墨西哥城的皇家大道上建立了许多设防严密的城镇。16 世纪 90 年代双方达成和约后,墨西哥中部定居的印第安人向北迁移,主要是墨西卡人、特拉斯卡拉人、塔拉斯科人和奥托米人。敌对形势的结束也使得萨卡特卡斯可以利用原来用于战争的资金来从事其他建设。萨卡特卡斯本身不再是一个边境城市了,在其居民眼里,它是新西班牙地区地位仅次于墨西哥城的重要城市。因此,它也成为向新墨西哥、新莱昂和新比斯开等北部地区开拓定居点的基地。

银矿产生的大部分财富最终都要流向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是殖民地的商业和金融中心,1556 年就已经拥有大约 10 万人口,同时也是食品、燃料、纺织品和奢侈品的重要市场。它不仅是新西班牙的最大贸易中心,而且是帝国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这个贸易网络从墨西哥湾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南至危地马拉,北到遥远的边境地区稀稀落落的居民点。16 世纪 70 年代,自菲律宾马尼拉中转,从中国运来了丝绸、瓷器和其他物品;从非洲运来了奴隶;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运来了纺织品、橄榄油、葡萄酒、纸张、玻璃、钢铁和其他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也可能是从欧洲其他港口走私进来的。

但是,墨西哥城的大部分居民更关心如何便捷、实惠地买到当地生产的食品和纺织品,对于那些通过跨大西洋或者跨太平洋贸易网络运来的橄榄油、质量上乘的葡萄酒、精美的纺织品、各种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当地人并不是很关心。随着从欧洲引进了羊、牛和猪,殖民地居民的食谱里增加了羊肉、牛肉和猪肉等食品。小麦很快成为主食之一,墨西哥谷地的农场迅即开始出售小麦。16 世纪晚期,普埃布拉和其周围的谷地地区开始向墨西哥城和加勒比地区的买主出售小麦,同时也向韦拉克鲁斯港的跨大西洋船队提供补给品。城市开始积极建立对于市政公共谷仓以及提供充足谷物的监管制度。在整个 17 世纪,物价基本稳定;只在 1624 年和 1692 年出现了少有的几次价格大波动。实际上,在 1600 年之后,影响小麦、玉米和大麦价格的主要因素是运输条件。

130

小麦是高地农作物,而低地地区主要种植甘蔗。早在 1531 年,科

尔特斯就通过出售其在莫雷洛斯私人地产上出产的甘蔗而大获其利。依靠其靠近墨西哥城市场以及墨西哥城出口商的便利，莫雷洛斯的甘蔗种植业盛极一时。整个殖民地时代以及其后的世纪里，这个地区一直是主要的甘蔗产地。

尽管纺织品是新西班牙的主要进口产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奢侈的织物。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都使用本地加工的布料。大群的绵羊提供了丰富的羊毛原料，由那些雇了约凡百人、工作条件恶劣的作坊(obraje)，将羊毛加工成廉价的羊毛织物。墨西哥中部和南部成为最重要的羊毛加工中心，个中翘楚克雷塔罗更是在17世纪达到了其顶峰。这些作坊生产了大部分纺织品，但是土著手工纺织者仍然继续他们本地的纺织生产。

在整个殖民地时代以及19世纪，白银是墨西哥主要的出口商品。西班牙征服战争后，官方登记的白银生产增长很快。16世纪50年代中期引进了用水银将白银从矿石中分离的生产工艺汞齐化法，这大大刺激了白银生产。1561－1570年，白银产值超过了2 500万比索，1611－1620年更是达到顶峰，超过了5 300万比索。1641－1650年，产值又回落到3 460万比索。1681－1690年，产值又回升到近6 000万比索，此后一直到19世纪，除18世纪60年代外，白银产值都在大幅度增长。1801－1810年，白银登记产值达到了2.164亿比索，是18世纪最初10年产值的4.5倍。

这些只是官方正式登记的白银生产数据，因此实际产量要远远超过这一数字。从17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运抵欧洲的银块数量始终高于殖民地正式登记的生产量(某些时期甚至超出50％)。不过，对于墨西哥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1671－1680年间，墨西哥登记生产的白银超过了秘鲁，这个北美的总督辖区自此成为西班牙帝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

殖民地引进了越来越多的欧洲植物和动物，西班牙工匠也来到殖民地指导土著人和黑人加工欧洲的手工艺产品，白银产量的增加(尤其在引进了先进的汞齐法工艺之后)，以及殖民地从走私者那里购买进口

131 产品,都说明殖民地早期对西班牙的经济依赖性正在减少。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贸易结构仍然是以出售白银为基础,从而从欧洲和东亚换取进口的纺织品和其他货物,这是墨西哥经济的主要特点。

墨西哥的白银始终是西班牙的敌人所垂涎的对象。西班牙王室首先禁止船只单独航行,然后又在 16 世纪 30 年代采用了舰队护航制度。1564 年,该制度进一步完善,预计每年派两支舰队从安达卢西亚的港口驶往韦拉克鲁斯和巴拿马的港口,然后回程时途经哈瓦那,次年回到西班牙。前往新西班牙的舰队一般在 4 月扬帆起航,在先卸下给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岛屿的一部分货物后,到达韦拉克鲁斯港(距加的斯 4 860 英里),历时两个半月。

直到 17 世纪 20 年代,护航到韦拉克鲁斯的舰队还是定期起航。但此后,合法的大西洋贸易额开始下降,直到 1660 年,航运货物的数量和价值才开始增长。虽然贸易额有所增长,舰队航行的数量在 17 世纪下半叶还是下降了,平均 10 年里才有 5 次。尽管舰队护航制度直到 1789 年才正式废止,但 18 世纪时,舰队已经不再定期起航了。詹金斯耳朵之战(War of Jenkins' Ear, 1739－1748)之后,西班牙和墨西哥间的贸易主要靠拿到许可证的个体船只维持,是它们确保了白银能够顺利到达卡斯蒂利亚。

尽管有军事护航措施的船队不再定期起航,但是还是达到了其最初的目的。在武装舰队的保护下,商船顺利到达韦拉克鲁斯港,不会受到外国威胁。然后,海军舰队再将银条运回西班牙。但是有一次外国人将整支舰队都捕获了。1628 年,荷兰人在皮耶特·海恩(Piet Heyn)的指挥下,在古巴海岸附近突然袭击了舰队,抢走了所有的货物,价值大约 1 000 万比索,这足够让荷兰西印度公司给股东们发放一次丰厚的分红了,并且也足够从财政上支持 1630 年对巴西的入侵。1657 年,英国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在加那利群岛附近成功地摧毁了新西班牙舰队的大部分船只,这是西班牙的海上敌人取得的不多的另一次重大胜利。

1571 年,菲律宾马尼拉到墨西哥的定期贸易开始了,并一直持续

到 1814 年。航行的主要运输工具是大帆船，它的载重量可以达到 2 000吨，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只需要大约 3 个月，但是回程一般却需要 6－9 个月。马尼拉作为亚洲货物的转口贸易集散地，是一个极富价值的贸易交换网络的中心。从新西班牙来的商人美洲的白银交换中国的丝绸、大马士革布、珠宝、瓷器，以及印度的棉布、日本的漆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菲律宾的肉桂和蜂蜡等。墨西哥对亚洲货物需求很大，特别喜欢质高价廉的丝绸和其他纺织品。这威胁到西班牙进口纺织品的垄断地位。惊恐的西班牙商人于是向西班牙王室施加压力，要求禁止新西班牙和秘鲁之间日益兴盛的贸易。因为，自从到马尼拉的商路开通之后，这种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亚洲货物了。他们也要求限制墨西哥和马尼拉贸易的规模和商品总值。因为在有些年份里，和马尼拉的贸易量等于甚至超过跨大西洋的贸易量。1634 年，西班牙王室正式地切断了秘鲁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尽管禁令使得墨西哥和秘鲁间的贸易大幅度减少，但是走私贸易却络绎不绝。18 世纪中期的旅行家曾经记录到，利马的居民都穿着来自东方的丝绸衣服。

132

但是，那些限制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间航运量的禁令则有效得多了。但是，船主们对从阿卡普尔科起航的船只只能载运价值不超过 50 万比索货物的禁令嗤之以鼻。一般载运货物的价值是禁令规定价值的两倍。17 世纪 30 年代晚期，至少有一次载运的货物超过禁令 10 倍之多。大量的白银被运到亚洲，以至于墨西哥比索成为中国的一种常见流通货币。

在公共节日里，不同年龄、不同肤色和不同职业的人都聚在了一起。教会和政府首脑组织这些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他们的身份地位再次得到公众的认可，而虽然节庆氛围意在促进社会的和谐，却也让各种团体和种族之间的区别同样也得到确认。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和黑人都参加节日聚会，或者至少旁观这些活动。这些节日活动为不同阶层的殖民地民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墨西哥城的规模、财富、地位和多样化使得它在新西班牙的城市中无与伦比。它为新总督的来临，举办盛大的节日聚会。而且由于墨西哥城内有许多不同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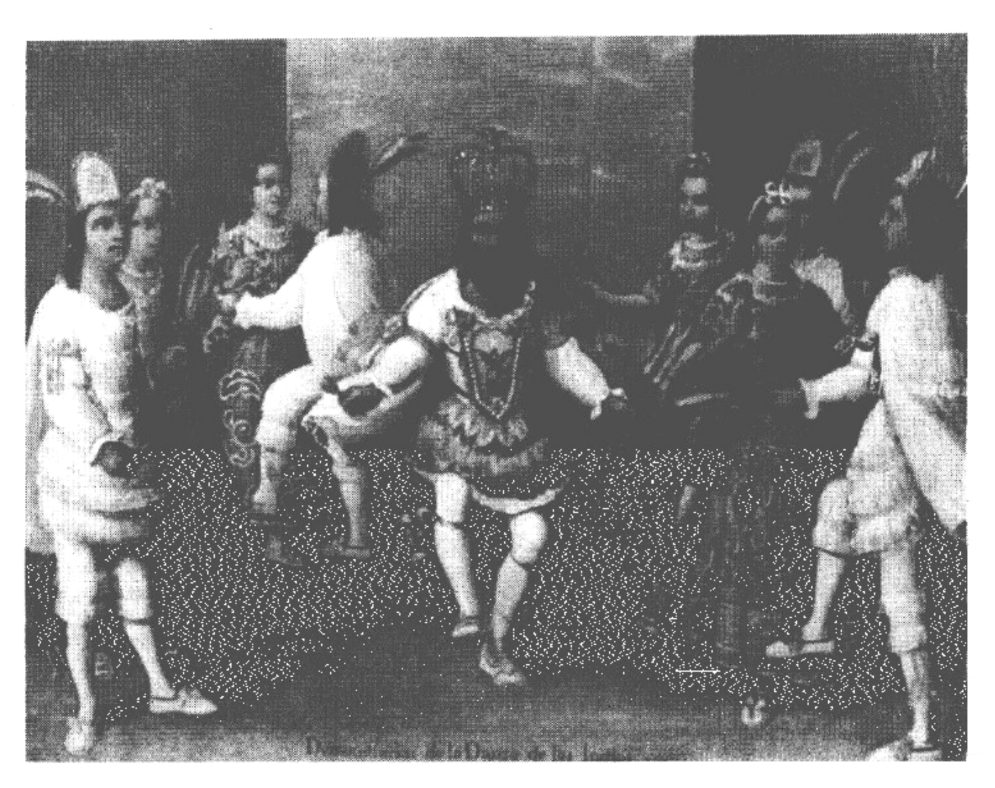
教团体、行会组织和其他各类团体，这里经常能看到许多盛大的庆祝活动。此外，就像在西班牙一样，每座城市都要庆祝自己的圣徒节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宗教节日。而且，新西班牙人民也过圣体节和其他宗教节日，这就使得新西班牙和其母国间加深了感情，强化了其宗教和文化联系。

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1516－1700)，新总督的来到成为从韦拉克鲁斯到墨西哥城的各地举行盛大节日庆祝的一个由头，这往往要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外地赶来，参加这一豪华、奢靡和花费巨大的城市节日。市政议会经常花费超过年平均收入的钱来举办各类活动，就是为了彰显母国和国王私人代表的光辉形象。这些活动主要包括：斗牛、舞蹈、模拟战斗、比武、音乐、演说艺术、庄严的宣誓、花车游行、文学竞赛、游行活动等。因为这些活动将展示白人居民对殖民地制度的坚定支持，因此组织者总是设法让其他城市居民群体也参与到总督入城仪式中来，不论是积极参加活动或者做一个积极的旁观者，这将有助于增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

在这些仪式上，政府官员们按照其官职大小和职位的不同，身着正式的礼服列队游行。他们一直走到城市的胜利拱门，它有70英尺高，上面有各种象征性的、神秘的和预言式的文字和图画，表明总督的任职证明以及城市对他们新总督的美好期望。通过走过拱门这个形式，总督含蓄地表示其对民众期望的应许。在仪式上，同时还有土著人表演的舞蹈、音乐，持续几个晚上的烟花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在18世纪，这种庆祝仪式还伴有对波旁王朝的效忠宣誓活动，这都使得经常举行的总督招待宴会黯然失色。但是，其共同的目的都是展示这个政府的合法性。

133

总督的招待酒会经常定期举行，庆祝新国王即位的仪式一般比较少，但是圣体节则是一年一度的节日。圣体节在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旗帜下，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这比按照不同社团而组织举行的世俗节日更具有凝聚力。对主的礼拜是宗教的基本内容。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都参加同样的仪式，以及神坛、宗教服装、舞蹈、音乐和戏剧演



在历任总督和市政官员的鼓励下，美洲土著积极参与到墨西哥城圣体节的庆祝活动中，提供鲜花装饰和其他装饰品，为游行路线搭建茅草遮雨棚。他们在庆典的歌舞表演中尤其活跃。后来因为当局不太赞同这种似乎有些“过”的行为，市政议会在18世纪时停止为庆典雇佣舞者。

出等。同时，不同社团的成员在仪式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强化了现存的社会分层结构，没有一个社团能够独自主导和控制这一活动。

圣体节是每一个人的节日。在墨西哥城，就像在西班牙的城市一样，市政议会的官员们也平等地参与这一活动，象征性地打破了社会等级区分，当然这是很短暂的现象。波旁王朝对节日活动做了一些改革，很快又发布法令，禁止在首都的节日里进行舞蹈、饮酒以及展示奇装异服，目的是防止类似1692年的骚乱再次发生。尽管这些禁令和其他法规影响了庆祝活动的举行，但是圣体节还是像以前那样反映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特点，并为许多军民提供了一个摆脱日常的枯燥生活，进行娱乐狂欢的机会。 134

但是，贸易不像节日活动那样容易受到国王的控制。西班牙国王

将新西班牙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试图禁止其他欧洲国家和殖民地进行直接接触。从法律上讲,殖民地只能通过西班牙母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接触。但是,这项禁令没能禁止西班牙征服者和美洲土著人的产品和文学艺术作品传播到欧洲旧大陆。新西班牙土著人的遭遇催生了“黑色传奇”,详细描写了西班牙人的残忍。这些故事开始在意大利传播,然后由荷兰和英国的作家使之广泛流传。16 世纪中期的西班牙思想家试图确定和维护土著人的特点和权利,相关辩论的成果推动了国际法的形成。而且,新西班牙的,特别是征服前土著人的手工艺品、手稿和其他奇珍异品,成为欧洲众多国家王室和贵族的收藏品。尽管白银是新西班牙对欧洲经济的主要物质贡献,但是胭脂虫、靛蓝、玉米、可可、香草、辣椒和西红柿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因此,新西班牙在欧洲的形象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新大陆的财富,以及欧洲人认为西班牙贪婪、虐待和剥削土著人。欧洲宗教改革引起了宗教和政治冲突,信仰新教的欧洲国家更是加强了反对天主教的情绪,同时也妒忌西班牙所拥有的殖民地。特别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英国与荷兰的宣传家总是兴高采烈地引用那些来自西班牙的文献资料,来无可辩驳地证明西班牙人是如何残酷虐待土著人,同时也想证明这些从新大陆得来的都是些不义之财。1583 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写于 1552 年)《印第安人毁灭简史》(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ión de las Indias)一书的英译本出版,书中突出表现了西班牙征服西印度的可怕场景以及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书中还称,西班牙人在新西班牙造成的死亡比西印度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

1689 年,一本著作的英译本的标题突出表明了该书反西班牙和反天主教的偏见:《在血腥中展现天主教本质,或天主教的西班牙对西印度土著居民犯下的各种你所能想到的滔天罪行,可怕的,无与伦比的屠杀、集体屠杀以及其他罪恶》。1603 年前西班牙语作品的英译本一般既反对西班牙人也反对印第安人,此后的一些翻译作品则揭示了土著社会的一些成就。反对西班牙人的情绪则一直持续存在。1648 年,托

马斯·盖奇(Thomas Gage)出版的广为流传的《英裔美洲人》一书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参考从西班牙文翻译来的资料,以及他本人在新西班牙和中美洲的经历,这部作品描述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腐败,特别是天主教会人士的腐败。他还强调夺取这些西班牙殖民地会很容易。盖奇的分析刺激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4年制订了著名的西印度计划。此后,英国先是袭击了埃斯帕尼奥拉岛,但是没有成功,但接着它成功地夺取了牙买加岛。

关于科尔特斯征服新西班牙的讯息,迅速通过口口相传或者出版物传遍世界,最先是1522年用西班牙文出版的第二封来信。到1532年,他的更多来信相继出版,共有18版之多,有各种语言的版本,例如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以及荷兰-弗莱芒语等。这些书籍使得认字的欧洲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征服新大陆的传奇故事。当殖民事业空前扩展,新西班牙的财富广为人知后,西班牙王室决定禁止有关墨西哥和日渐成长的美洲帝国的书籍进行流传,以防止潜在的对手和诽谤者借机生事。因此,1527年,西班牙王室开始采取书籍检查的政策,禁止科尔特斯的西班牙语书信继续出版,以此限制有关新大陆的信息流传。

1553年,西班牙王室同样将前一年出版的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所著的征服墨西哥的历史列为禁书。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哈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编辑整理了有关征服前墨西卡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的资料,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现在被称为《佛洛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但在他有生之年从未面世。1577年,西班牙王室命令没收作者的手稿,以此禁止关于新大陆土著文明的作品流传。直到1820年,官方一直禁止任何作品描述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美洲土著人文明。

尽管西班牙人试图控制欧洲人传播有关征服情况和新大陆财富的讯息,但是有关殖民地的消息和土著人文明的描述还是迅速在欧洲大陆流传起来。富有的欧洲收藏家们,热心于寻找新奇事物,非常青睐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文明的实物,积极地搜集地图、古代文献抄本、土

著人的艺术和工艺品。甚至在征服前,欧洲地图就描述了新西班牙海湾的部分地理情况。1524 年印刷的一张关于特诺奇蒂特兰的地图,描述了当地城镇化的情况。1536 年的一张世界地图描述了麦哲伦-埃尔·卡诺(Magellan-El Cano)的环球航行,并让欧洲人知道了中部和南部墨西哥湾的大致情况。16 世纪 60 年代,北美和新大陆的地图清楚地,但不是很准确地,将新西班牙绘成新大陆的主要部分之一。

有关墨西哥土著人以及他们的艺术、手工艺品的讯息很快传到了欧洲的知识界。意大利人文学家和西印度事务院成员彼得·马特尔(Peter Martyr)于 1520 年用意大利和德语出版了他的著作《第四个十年》,其他语种的版本稍后陆续推出。书中描述了科尔特斯献给查理一世的礼物,包括金银器、古抄本、羽毛、武器和棉织的衣服等。这些物品在塞维利亚、布鲁塞尔和巴利亚多利德展出。在布鲁塞尔市政大厅,著名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对展出的蒙特祖马的珠宝表示非常赞赏,虽然它们并未对他产生影响。1522 年,马特尔邀请威尼斯大使及其代表团到西班牙,观赏科尔特斯献给查理国王的其他物品。大使紧接着又将这些物品的情况告诉了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议员们。有些墨西哥的玉石和玛瑙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品。其他一些物品,例如大祭司的权杖(mitres)、羽毛做成的宗教祭祀服装等落入到其他收藏家的手中,主要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著名的《门多萨抄本》(*Codex Mendoza*),是 16 世纪带有插图的墨西哥手抄本,保存了很多图画和人物形象,都成为法国海盗战利品的一部分,被带回法国,并在 1553 年成为王室宇宙学家的收藏品。为 16 世纪的欧洲读者制作的前征服时期的阿兹特克手抄本(已无真品存世)的复本,现在依然保存在欧洲艺术品的宝库里。

136

尽管欧洲收藏家们对印第安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欧洲艺术家们并没有把此类艺术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它们对 16 世纪欧洲的艺术家影响甚少。西班牙在征服战争后,通过压制异教徒的事物,灌输一种欧洲文化至上的观念。例如,一位德国画家描绘了一些陪伴科尔特斯去西班牙的印第安人形象,但是其风格完全是欧洲的,只是描绘的对象是

墨西哥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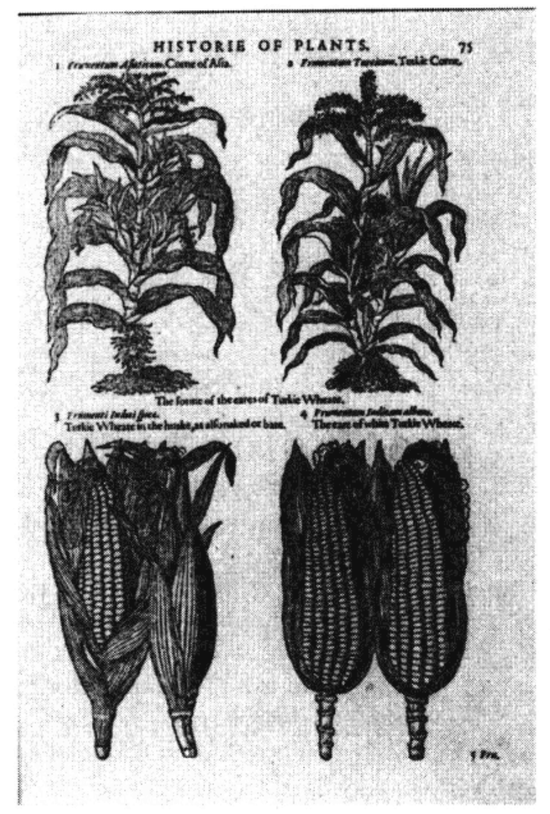
但是,前征服时代墨西哥土著人的文化和社会成就还是吸引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注意,最终引起了一场辩论:即如何将印第安土著文明进行分类,如何对其进行宗教灌输和行政管理。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因激烈抨击征服者的暴行,以及委托监护制度的罪恶,并倡导以和平的方式将土著人转变为基督徒而著称。他曾指出,中部墨西哥人建立的金字塔,说明了当地人具有文明特性。他还比较了阿兹特克文明与美洲其他印第安人地区原始状态的不同,因而强化了一种欧洲式的社会发展观,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何为发展。因此,就连承认阿兹特克的文明也只是证明了欧洲文明更加先进的观点。

支持亚里士多德奴隶制天然性理论的西班牙人总是利用阿兹特克人作为自己论点的有力证据。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和其他人认为:土著人天生充满奴性,而且毫无理性可言。因此,他们应该由充满理性的人类来统治。但同时,一如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在一项教皇通谕中宣布的:这些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是更低等的生物。在说到关于西班牙在新大陆统治的权利问题时,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简略地勾勒了印第安土著的财产权利和政治主权。西班牙在西印度是否拥有领土主权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胡果·格劳秀斯在其国际法中所发展的原则。

在殖民地时代,新大陆对欧洲最大的直接影响还是输送金银等贵金属,尽管历史学家还在不断讨论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对16世纪欧洲的通货膨胀(也被称为“价格革命”)倒底有多大影响。墨西哥产出黄金但主要是白银。直到18世纪30年代,来自新西班牙的贵金属总量才超过秘鲁,此时,这两个总督区生产的注册金银条价值总量均达到了大约10亿比索。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走私的金银条没有计算在内。

墨西哥的移民将钱款直接汇给西班牙的亲属,或者将钱花在建造宗教设施,以及开展宗教和慈善活动上,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贸易署有个专门的机构负责遗嘱认证,主要为那些在新大陆去世,但在

137



图中所标的"土耳其小麦"字样说明,在早期人们搞错了玉米的真正起源地。玉米是被征服前的墨西哥以及其他新世界文明人口最重要的主食。西班牙人很快就认定它相当于他们所吃的小麦,对它做了相应的分类并引入欧洲。

西班牙有继承人的移民们服务。墨西哥那些能产生利息收入的财产也使得殖民地的财富转移到了其母国西班牙。

墨西哥对欧洲的贡献还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在这些产品上,例如:玉米、辣椒、西红柿、可可、香草、胭脂虫和靛蓝。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1493 年,哥伦布在第一次航行回来时,将其带到了欧洲。1525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始种植玉米。1597 年,约翰·赫拉尔(John Gerard)写了一本著作,题目为《草药和植物简史》,在书中,他认为:玉米是一种坚硬而且很难消化的植物,是猪的好饲料,但是却不适合人吃。这可以代表大部分欧洲人对玉米的态度。但是,17 世纪晚期,在欧洲一些不适合种植小麦的地区,人们开始用玉米煮粥或者做面包吃。

墨西哥人培育了很多品种的辣椒,这是他们的另外一种主要食物。辣椒也很快被传到了欧洲。1565 年,西班牙的花园里能经常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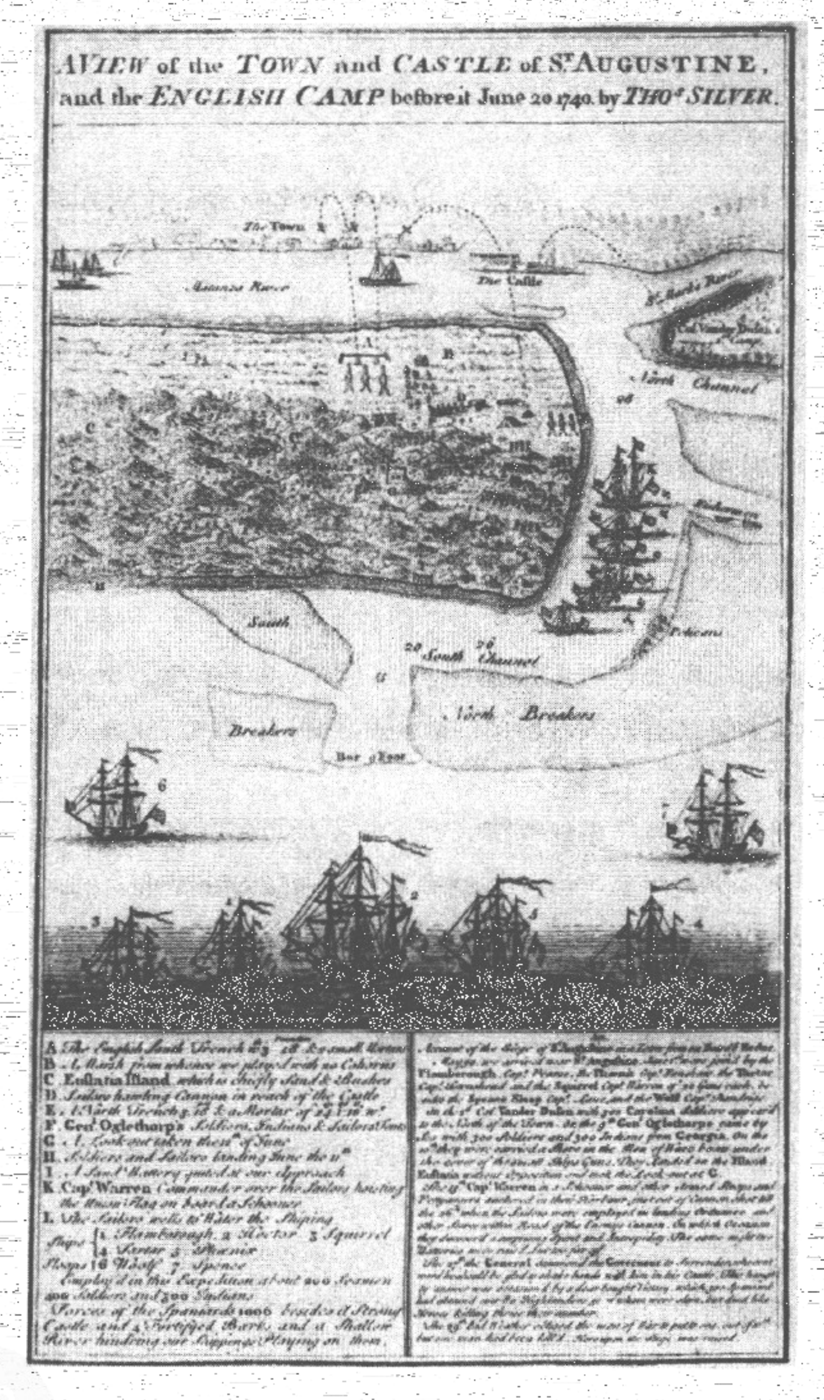
西红柿也迅速在欧洲传播，但是欧洲人刚开始时认为它有毒，因此这限制了它的食用。但是，18 世纪晚期，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开始使用西红柿做菜。

阿兹特克贵族喜欢一种冷饮料，即可可里面搀着辣椒和香料。欧洲人发现，如果再加上香草、糖或者肉桂，这种饮料就会产生巧克力的味道。这种饮料很快就风靡欧洲大陆。可可豆主要在中美洲种植，它很快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商品。1600 年，中美洲可可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其他殖民地开始供应日渐增长的欧洲可可市场，其核心区域在阿姆斯特丹。到 17 世纪中叶，热巧克力已经成为西欧贵族阶层最喜欢的饮料。1661 年，英格兰的塞缪尔 · 佩皮斯(Samuel Pepys)利用它治疗宿醉。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巧克力饮料在贵族和教士中间都很流行。香草最早产于韦拉克鲁斯和瓦哈卡的山区，传到西班牙时，主要是作为巧克力饮料的添加品。17 世纪，法国宫廷开始使用香草，英国海盗则将其看做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在 19 世纪之前，人们在喝可可饮料时，经常添加香草。

欧洲人还对原产于新西班牙的某些植物可能具有的药用价值而兴奋不已。一位名叫尼古拉 · 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的西班牙外科医生声称：菝葜(sarsaparilla)这种植物具有治疗梅毒的作用。1557 年，英国商人约翰 · 弗兰普顿(John Frampton)将莫纳德斯的著作翻译为《从新发现的世界里传来的好消息》一书。源自于米却肯地区的泻药，据说也可以治疗许多病痛。烟草也使得欧洲人对它热情百倍，因为据说可以治疗疾病。但是，烟草的主要种植地不是墨西哥，而是新大陆其他地方。

胭脂虫原产于墨西哥瓦哈卡州，是一种猩红色的染料。它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出口品。它最早运到西班牙大约是在 1526 年，到安特卫普约在 1552 年，英格兰不晚于 1569 年。到 1600 年，每年运往西班牙的胭脂虫大约为 25 万到 30 万磅。这些胭脂虫大部分被再次出口，运到荷兰，用作生产纺织品的染料。在 17 和 18 世纪，佛兰德、荷兰和英国纺织厂成为这种染料的主要市场。

139



1740 年 6 月，英国海军围困西班牙位于佛罗里达的殖民城镇圣阿古斯丁。虽然这次围困失败了，但它生动地例证了欧洲各国对势力广大的西班牙帝国不断发起的挑战。在七年战争中落败后，西班牙国王被迫在《巴黎和约》中将佛罗里达殖民地割让给英国，以换回古巴和菲律宾。

至少在1576年，通过来往墨西哥的船队，靛蓝就被运到了西班牙。尽管墨西哥生产一些靛蓝，但是中美洲是主要的出口地区。到1600年，这种蓝色和紫色的染料就超过可可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17世纪早期，合法的出口量大约是每年24万磅，约占总产量的一小半。一个世纪以后，每年经过韦拉克鲁斯出口的靛蓝达到了60万磅。18世纪后半期，产量达到了顶峰，主要是由于北欧的纺织品生产不断增长。

尽管墨西哥白银对欧洲经济生活有着直接和快速的影响。但新西班牙还持续极大地影响着欧洲人对西班牙的态度，这体现在黑色传奇、新植物的传播和纺织染料的引进上。毫不奇怪的是，尽管新西班牙对其日常生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但是欧洲人还是有一种文化优越感。

140

到17世纪晚期，西班牙认为新西班牙比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更有价值。而事实上，这种重视已超过新西班牙对其母国的重视。随着新西班牙的领土、经济和人口扩张，其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没有确切的日期表明这一重大变化何时发生。西班牙王室起初慢慢地、不定期地试图充分利用这一增长趋势。到18世纪60年代，西班牙的努力毫无疑问地表明它想加快新西班牙的增长，同时加强对殖民地越来越宝贵的资源的控制。

从1793年开始，西班牙卷入了欧洲的战争，这使得西班牙很快陷入了财政困境，并且它和殖民地的贸易关系也陷入了危机。而此时，墨西哥的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使得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生活水平下降。在进入新世纪的转折关头，西班牙和新西班牙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日益相左。1808年，查理四世退位，斐迪南七世即位，其后发生了危机，西班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新西班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殖民地很快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墨西哥。

从17世纪晚期开始，新西班牙的殖民地定居点扩展到了北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在这一地区，既有来自土著印第安人的威胁，也有来自边境地区法国与英国探险家、商人和拓居者的威胁。这促使传教士和边境军事守备部队加强了防卫力量。耶稣会士在北至今天美国亚利桑那

州的地方建立了传教区。1680年,爆发了灾难性的普埃布洛(Pueblo)起义,这迫使西班牙人放弃了圣菲,此后他们又重新在新墨西哥拓居。18世纪最初十年中,由于来自法国的威胁,西班牙人在得克萨斯建立了一个由传教团和守备军队驻守的缓冲区域。

尽管被法国人占领了2年半,但1698年,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湾(Pensacola Bay)建立的圣卡洛斯要塞仍然巩固了西班牙在墨西哥湾北部海岸的地位,不过,法国商人依然在路易斯安那很活跃。1763年,通过《巴黎和约》,西班牙从法国人手里获得了路易斯安那,这巩固了它在这片人烟稀少地区的利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及詹金斯耳朵之战中,西班牙成功地抵御了英国人对圣阿古斯丁城的入侵。1763－1783年,佛罗里达东部落入英国人手里。尽管如此,佛罗里达对墨西哥边境防卫圈还是具有重要意义。从1697年开始,传教士就来到了下加利福尼亚。从1769年开始,传教区、一些军事要塞和城镇就开始出现在上加利福尼亚。因此,西班牙的势力很快扩展到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简而言之,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边境地区的居民点不多而且稀稀落落,但是新西班牙的领土规模要远远大于一个世纪以前。

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新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很快,当然增长并不平衡并且只限于某些特定经济领域。约翰·杰伊·特帕斯克(John Jay TePaske)的统计说明:从17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60年代,注册金银条的生产量处在一个低谷,平均每年约350万比索。此后的40年里,增长到每年大约500万比索。1700－1710年,产量为4 830万比索;1741－1750年,产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9 690万比索;1791－1800年,又增加了一倍,达到了2亿比索。

141

和金银条的快速增长相比,纺织品生产的增长要慢得多,原因是其主要依靠大量土著人的手工家庭生产。进口和走私的布匹数量增长很快,特别是较便宜的英格兰棉布,18世纪晚期走私进来的很多。纺织品的大量进口说明金银条生产大增刺激了消费,人们对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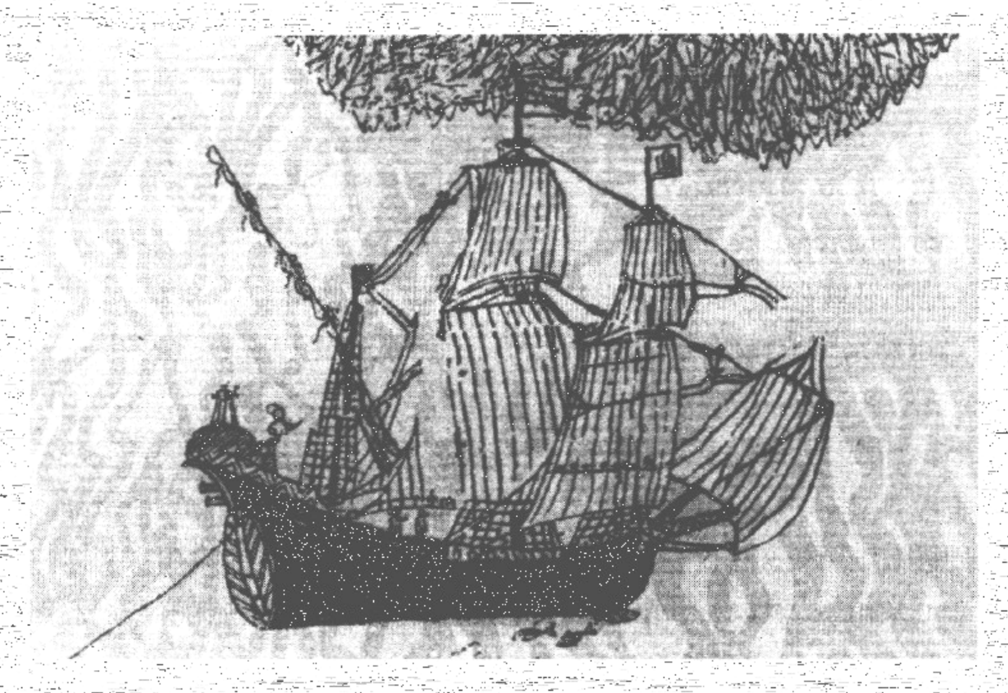
1660年以后,尽管贸易周期波动很大,贸易额和贸易值毫无疑问

有很大增长。但是,贸易增长的幅度,以及贸易增长和收缩的周期规律还存在很大争议。历史学家统计了金银条的生产总量(与正式的官方登记数是不同的)和无法得知的走私贸易的总量。走私贸易包括舰队制度中的非法贸易,也包括商人们直接从外国港口和集散地运来的货物量,例如1655年英格兰夺去了牙买加后,船主们从牙买加进行的走私贸易。但数据仍不精确。

面对不时发生的战争以及日益兴盛的走私贸易,西班牙极力维持着与新西班牙的贸易体系,最后,不得不渐渐放弃了舰队护航制度。1650年之后,尽管到新西班牙的船队航行频率要少于去秘鲁的船队,但是从1650到1699年,平均每10年里还是有5批船队到达墨西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舰队制度给予沉重打击。1701－1707年,至少50艘满载欧洲货物的法国船只到达了韦拉克鲁斯港。战争结束以后,《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英国人有权每年让舰队护送一艘船到西印度,并运送奴隶。在这些合法的活动之外,还有大量的走私活动,这激起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以及墨西哥湾地区进行清剿活动,最终导致了战争和冲突,即著名的詹金斯耳朵之战。为了维持冲突期间的航运,西班牙王室废弃了军事上易遭受袭击的大型舰队护航制度,转而采用私人船只许可证制度。1717－1738年,几只护航舰队到达了韦拉克鲁斯港。但是,从西班牙到新西班牙的船只中,80%是私人船只。1765年,西班牙开始对美洲殖民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789年,开始允许几乎所有西班牙港口开出的船只都可以直接驶往新西班牙,这个新政策实施了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因为1796年西班牙又卷入了和英国的战争。次年,英国封锁了西班牙加的斯港,这导致了中立贸易的产生。

自由贸易政策刺激了新西班牙的合法贸易继续增长。白银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同时农业和制造业商品也帮助摆脱对金银条的传统依赖。1758－1791年期间,瓦哈卡的胭脂虫登记输出量价值只有一次是在90万比索以下,12次超过200万比索,3次超过300万比索,有一次甚至超过400万比索。尽管胭脂虫的出口价值只有白银的八分之一,但是在1786年到达加的斯的新大陆商品中,却超过了黄金,位列第四。 142

尤卡坦毫无疑问从自由贸易中获益，通过坎佩切的出口至少增长了3倍。新政策使得传统贸易商品棉布以外的商品可以运到新西班牙之外的市场。哈瓦那是尤卡坦龙舌兰绳索及索具的主要出口市场。它也转口销售一些航海用品，例如腌肉、玉米和豆类，以及皮革和染料木等。18世纪晚期，每年出口的农业和制造业商品价值大约为600万比索，大约是金银条出口价值的四分之一。



西班牙大帆船船舷有重型武器，搭载的船员也比一般的商船更多，它们承担起了护卫商业船队的职责，这些船队把水银等商品和王室命令一道运到韦拉克鲁斯，返航时则把白银和官署回文带回西班牙。虽然更为常见的是体积没那么大的帆船，但到16世纪70年代时，这类帆船中有些吨位达到750吨，大多数也接近500吨。

17世纪中期以后，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食品工业也增长很快。即使在矿业生产的巅峰时期，食品业产值也超过了矿业。玉米是新西班牙的最重要农作物，在大部分年份里，其生产量超过其国内市场的需求。但是，各个地区的情况并不一样。在一些地区，例如中部低地巴希奥(Bajío)地区，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包括瓜纳华托的矿业中心，农业的增长却跟不上人口发展速度。如果遇上歉收的年景，后果就很严

重了。1785 年,霜冻使得本来就供应不足的玉米更加短缺,再加上流行病爆发,使得 30 多万人死亡。

尽管面临农作物歉收和流行病,从 17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中期间的人口还是增长了约 50%。17 世纪 20 年代,印第安人口到了一个最低点,只有 75 万人。到了 1793 年,印第安人口增长到了大约 230 万人。当然,印第安人口已经越来越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纯粹种族意义上的印第安人。也在 1793 年,白人人口约为 65.5 万人,混血种人口为 78.8 万人,黑人人口约为 6 000 人;新西班牙人口总计约为 380 万。各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很不相同。1740－1790 年,瓦哈卡谷地一带的人口增长了约 57%,而瓜纳华托矿业地区增长了 155%。1700－1810 年,巴希奥地区的一些教区人口增加了 4 倍,1774 年,尤卡坦地区的玛雅人不到 13 万,20 年之后增长到了几乎 25.4 万人。

143

西班牙王室鼓励新西班牙的领土扩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首先,完善政策来限制殖民地的开支,保证向西班牙汇回尽可能多的财政盈余。为了从新大陆获取更多的财富,西班牙王室有时候改革税收政策,并采用一些惹人非议的办法,特别是出卖行政和司法职位等措施。尽管如此,17 世纪 80 年代,西班牙王室的确从新西班牙获得的财政盈余,远远超过从秘鲁获得的收入。同时,18 世纪,新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是临时性,但是从 18 世纪 60 年代,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防卫水平、加强行政控制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等。但是,从 18 世纪 90 年代起,财政上一些便利措施却削弱了改革议程。

王室总是选择让西班牙半岛人出任墨西哥检审庭的职位,而不是选择墨西哥本地人,这表明它试图控制不断增长的殖民地财富。西班牙王室也限制检审庭职位的出售,并将一部分购买者的职务撤销,这也说明新西班牙的地位要比秘鲁重要。从 1740 年至 1790 年,王室只任命了一位本地人为墨西哥检审庭法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750 年利马法庭有 13 位本地法官,此后一直没有少于 5 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

但是，官职任命不是王室收紧对新西班牙统治的惟一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王室直接加强财税的收缴。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们传统上依赖“包税商”来负责征收一个特定税种，然后按照一定的成规，返还一定的税金给包税人。1575 年，新西班牙开始征收销售税(alcabala)，1537 年，新西班牙开始销售赎罪券(cruzada)。王室对扑克牌具有垄断专营权，在某些年份里，有些包税人要为此付 10 万比索。墨西哥城的造币厂于 1536 年建立，长期以来都是依合同来进行运营。到 1600 年，造币厂的主管们大部分都是商人和他们的儿子们。王室以很高的价格出售这些职位。1629 年，价格甚至高达 27.5 万比索。

哈布斯堡王朝一直到 18 世纪都不依靠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依赖包税商制度。但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这种情形慢慢减少。1729 年，一家新的造币厂在墨西哥城开张。1733 年以后，它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受薪职员构成，到 18 世纪末，大约有 400 人。1753 年，西班牙王室开始对销售税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1746 年，销售税的收入大概稍微超过 70 万比索。由于贸易的发展，1799 年销售税收入达到 240 万比索，1803 年为 320 万比索。

144

18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新大陆属地的财政收入有很大增长，但是西班牙国王在提高行政管理以及加强王室财政收入方面动作有限。1762 年，英国占领哈瓦那，这刺激了西班牙马上将付诸行动，不再官僚式地因循守旧。1763 年，按照《巴黎和约》，哈瓦那归还给了西班牙。但是这个港口的暂时丢失还是极大震动了查理三世的顾问们，他们很快制订并实施措施，保护古巴、墨西哥以及大部分殖民地地区。保护墨西哥的计划包括派遣正规军，扩大和训练民兵，确保邮路畅通无阻，开辟新的税收来源、收税并让快速发展的殖民地自己负担越来越严峻的军事防卫任务，以及加强行政管理等。1764 年，国王在墨西哥发起了军事改革。次年，国王又派遣了一位总巡视员，目的是指导金融行政管理，这也是对行政管理状况进行广泛调查的一部分。

1765－1771 年，何塞·德加尔维斯(José de Gáilvez)前往墨西哥巡视，他是未来的西印度事务大臣(1776－1787)。他强调：王室对待

改革是认真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加尔维斯重组了海关，职员改由受薪人员组成。龙舌兰酒是一种从当地植物龙舌兰酿造的广受欢迎的饮料，此时也和王室垄断的扑克牌一起成为王室直接管理的对象。此外，他还将此前外包的火药垄断经营权归由受薪人员进行管理。

王室在经济生产和分配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其中最诱人的一项政策就是烟草业垄断经营权，它为西班牙的国防事业提供了特别的财政支持。尽管早在加尔维斯到达墨西哥之前，烟草垄断专营权就已存在，但是充分发挥其作用，还是在他来到墨西哥之后才开始的。1771 年，墨西哥城的烟草工厂有 5 600 名工人，奥里萨瓦(Orizaba)城的工厂有 600 多名工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对新的限制措施深恶痛绝，例如垄断专营权强迫人们购买，强迫销售，官营药店专营零售烟草业务等。但是烟草垄断经营制度达到了其目标。从 1768 年开始，每年王室收入达到了 80 万比索；1789 年，收入达到了 300－500 万比索。

加尔维斯还将目光转向矿业生产。西班牙阿尔马丁(Almadin)城的水银产量不断增加，这使得他可以在 1767－1776 年期间将水银的价格削减一半，从而扩大白银的生产。他还对那些对旧生产设施进行改造的矿主实行免税政策。矿主们投资进行设备升级改造后，15 年内可以得到额外的 50％的减税。此外，矿主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些减税而获益，例如购买原材料和补给品免税，爆破用的火药价格可以减低 25％等。其成效一方面是大大提高了白银的产量，另一方面是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1796 年，墨西哥城的造币厂生产了大约 2 400 万银比索，100 多万金比索。政府的矿业财政收入超过了 550 万比索。

从王室的角度来看，西班牙从殖民地得到多少收入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新西班牙的经济产量是多少。王室希望总督辖区自己负担开支，自己承担境内的国防费用，并把财政盈余运送回西班牙。实际上，汇往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也有很大增长，原因主要有：贸易增长而税收也随之增加，印第安人口增长而贡赋也随之增加，烟草和其他垄断经营

权带来的收入,以及矿业收入等。1761－1800年,墨西哥汇往西班牙的财政盈余超过了9 000万比索,而秘鲁却没有财政盈余汇往西班牙,这也证明了墨西哥在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18世纪90年代,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改变了墨西哥的种族结构,这也是近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印第安人、白人和混血种人(Castas)增长很快。而黑人则从17世纪中期的8万人下降到6 000人,当然黑人混血人口增加了约4倍。西班牙半岛人大约有8 000人,只有1646年时半岛人数量的60%。土著印第安人人口增加到了230万,这对农业生产、耕地使用压力、贸易量(特别是地方官员组织的贸易),以及贡赋数量等都有重要的牵连作用。白人人口的增加,以及混血种人口稍微慢一些的增长,也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18世纪晚期,人口普查人员、教士、政府官员和新西班牙的普通居民习惯上一直用种族概念来区分人口,但是职业、收入和文化背景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有些印第安贵族和部落首领非常富有,有些混血种人也很殷实,财富、收入和西班牙血统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墨西哥实际上拥有最多和最富的贵族阶层。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秘鲁拥有最多的贵族头衔家族,但是1700年之后,墨西哥居民中拥有贵族头衔的家庭增长很快。新西班牙也比其他殖民地地区拥有更多的百万富翁。墨西哥城也展示了新西班牙居民财富的最大差距。

在墨西哥城,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上大约有100个"豪门家族",每一家都积聚了大约或者超过100万比索的财富。新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大约有12个这样的豪门家族,其中瓜纳华托大约有4－5个,瓜达拉哈拉有2个,他们都有类似多的财富。这些豪门家族们组成了真正的精英阶层,即使有些家族具有印第安和黑人血统,也丝毫不会影响其地位。一般来说,这些豪门家族的子女总是和其同阶层的人通婚;他们之间有时甚至是直系表兄妹的关系。这些豪门大家族大部分都是克里奥尔人,通常和上层西班牙人结亲。除了细心选择通婚对象之外,他们的生存之道还包括多元投资、商品化农业、海外贸易、矿

146

业、商业、政府职位以及其他领域。尽管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拥有贵族头衔，但他们经常戴着显示贵族头衔以及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团体成员、宗教裁判所代理人、市政议会名誉成员等荣誉称号的服饰。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一般包括首都市中心有一座住宅，并且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的仆人，来显示这些豪门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但是，西班牙血统并不能保证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一小部分半岛移民成功了，但是大部分移民都是命运平常之辈，而且还有些人充当家仆或者做不熟练的劳工。

这些人中近99%的人都称自己为西班牙人，包括半岛人和那些出生在新大陆的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在豪门家族和专业人士中占绝大多数。同时，他们也几乎涉足社会行业的每一个角落，例如商业、农业等。在一些地区中心城市，例如安特克拉(Antequera)和瓦哈卡，只有9%的克里奥尔人可以被看做地方精英，53%的人是地位较低的手工业者，而一小部分人则和混血种人一样成为仆人和雇工。在矿业中心瓜纳华托，80%的克里奥尔人从事的职业显然不属于上层阶级。克里奥尔人的木匠和裁缝是劳动大军中地位较高的，其他较低的职业还有仆人、修鞋匠、矿工以及赶骡子的人。克里奥尔人，包括许多妇女，甚至也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例如卷烟工人。在墨西哥城、奥里萨瓦的卷烟厂里，克里奥尔人居多数，占60%。

在18世纪晚期，很少有非白人能够跻身精英阶层。即使在地方上，例如在瓦哈卡，也只有4名非白人是精英人士。这里约有70%的成人男性是地位低下的工匠和赶骡子的人。在瓜纳华托，三分之二的矿工是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混血种人已经代替印第安人成为纺织厂的主要劳动力。尽管规定只有西班牙人、卡斯蒂索人(castizos，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后代)、梅斯蒂索人才可以服兵役，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参军入伍。同时，在某些部队中，军官只能是白人。墨西哥城的下层人民中，在18世纪90年代估计大概有2万—3万人，里面有来自各种族的人。1796年，市政当局认定在被逮捕的人中，37%的人是印第安人，30%是梅斯蒂索人或者穆拉托人，33%是白人。

18 世纪晚期，许多印第安人仍旧住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土著人村落里。对于大部分部落居民来说，相比他们的种族特征，职业特征并不重要。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为满足自己或者当地的需求而进行农业、牧业和特定的商品生产。尽管有一些土著人家庭很富有，但是大部分人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在一些人口持续增长、村落可耕地不足的地区，例如瓜纳华托，18 世纪时期的生活是很困苦的。

147

18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的黑人奴隶制几乎消失了。不像利马、加拉加斯和哈瓦那的富人家庭，这一时期的墨西哥城的富裕家庭很少购买和保留奴隶，以此作为奢华消费的标志。几千名殖民地的黑人奴隶中，大部分人被当作沿海热带地区的劳工，例如在韦拉克鲁斯附近的甘蔗生产地区。

1793 年，墨西哥城各种族的妇女数量都超过了男性。除了教会机构，妇女在人口总量中占了 57%。毫无疑问，她们也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753 年，妇女占劳动力的约三分之一，1811 年稍微少一些。大部分妇女劳动力来自下层阶级，混血的印第安妇女从事劳动的要比西班牙妇女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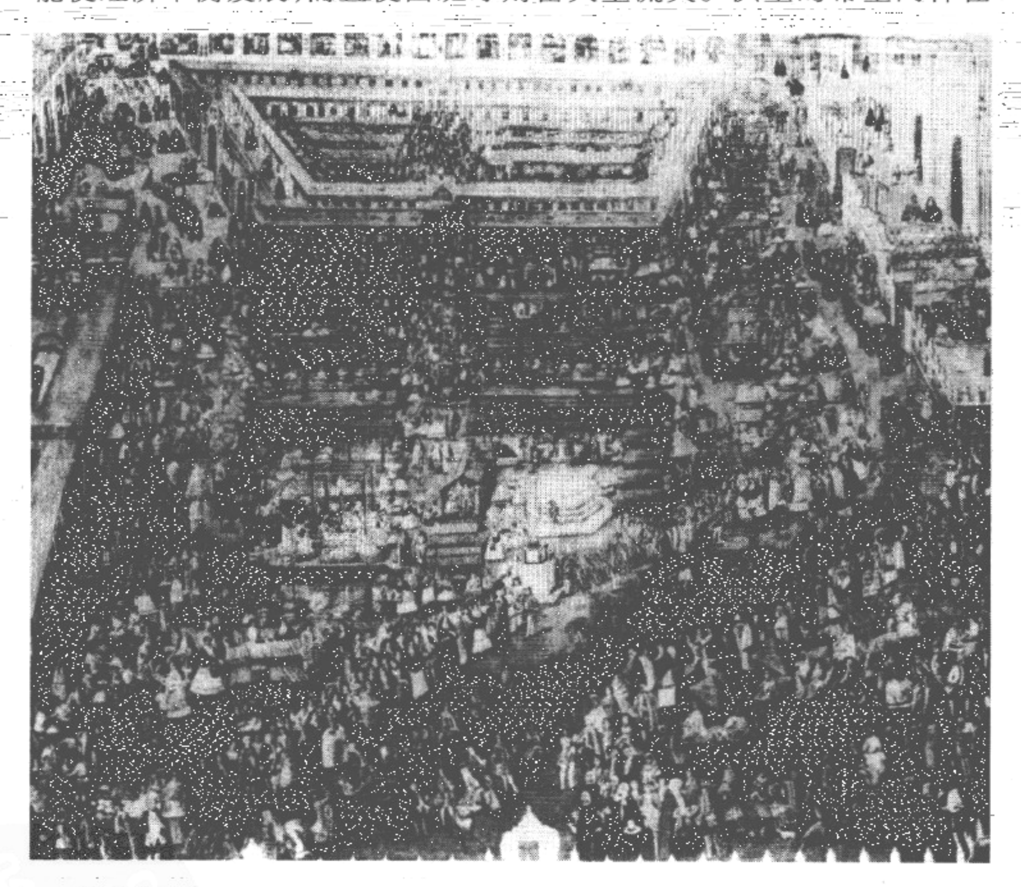
安特克拉的男女比例之差要比墨西哥城小一些，大概是因为移民的限制。在克里奥尔人中，妇女数量要高于男性。但是印第安人中，男性数量高于女性。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都在本族中通婚，但是穆拉托人越来越融入白人社会。大约 60%的男人有克里奥尔人、卡斯蒂索人和梅斯蒂索人妻子。在莱昂，西班牙人互相通婚的比例高于安特克拉，但是莱昂的印第安人更倾向于种族之间杂婚。不像安特克拉，莱昂地区的穆拉托人更倾向于本种族内通婚。18 世纪晚期，在巴希奥地区，渐渐分为两大主要种族，印第安人和穆拉托人。在其两端，低端的是少许梅斯蒂索人，高端的是西班牙人和大部分梅斯蒂索人。

毫无疑问，18 世纪后半期的人口增长也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向下趋势。尽管白银产量增加以及贸易增长，18 世纪 90 年代的新西班牙还是面临许多严重的、日益恶化的问题，有许多是由人口增长导致的，

例如：种族之间的通婚越来越多，墨西哥城的下层阶级数量增长很快，1775年后的通货膨胀使得拿固定工资的工人生活日益痛苦，对土地使用的压力不断增加，总督区政府日益攀升的债务等。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一名德国科学家和旅行家，他对当时的墨西哥有着敏锐的认识和观察，但是他认为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他指出，墨西哥有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大量的自然资源，没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也值得称道，还有教育和文化机构，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墨西哥有着光明的前景。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和西班牙的关系问题。西班牙的行政管理糟糕，限制贸易，不鼓励外国移民，未能使经济平衡发展，而且使西班牙财富大量流失。洪堡的希望同样在

148



墨西哥城的主要广场商业繁盛。波旁王朝的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18世纪末，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墨西哥城既是这个总督辖区中最重要的城市，又是辖区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因此当局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改造其面貌，使其无愧于西班牙王室最重要的殖民地的首府的地位。

墨西哥人中获得共鸣,他们也看到了未来获得独立能带来的益处。尽管在18世纪90年代,还没有人能主动地去考虑推动彻底独立的进程,但波旁王朝进行的改革,加强国防、增加国库收入、加强行政管理都使得克里奥尔人不满,而优先任用西班牙半岛人的政策更让一些野心勃勃的克里奥尔人倍感挫折,从而埋下了殖民地人们不满的种子。西班牙王室卷入欧洲的战争,使得形势更加恶化。这激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使得查理四世和斐迪南七世退位,法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政治和财政危机爆发,西班牙丢掉了美洲大陆的帝国属地。1821年,新西班牙,这个帝国最富裕的殖民地,成为独立的墨西哥共和国。

149

第五章　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宗教信仰与道德伦理

琳达·A. 柯西奥-纳吉(Linda A. Curcio-Nagy)

151

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的中美洲文明由等级分明的酋长领地、城邦国家和帝国政府构成,而这三者又都被一种指导一切的世界观、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系统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宗教,更是主导着宇宙、历史时期的运动和古代美洲土著人的日常生活。而土著人的日常生活则围绕着每年周期性运转的与整个社会主要关切相联系的节日庆典进行。土著美洲人相信,人类和神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父母—子女般的关系。由于神灵牺牲了自己而创造了人类,因此需要受到尊重、慰藉、奉献并得到满足,这样才能够维持天堂里的秩序或平衡,才可以避开灾难和自然灾害。对于一个深受自然界变迁影响的农业社会来说,所有这些的重要性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大多数祭神的庆典都与农业和丰收这类事物有关。

掌权的统治者们——僧侣和贵族阶级,在芸芸众生和超自然神灵间充当中介。他们获得了天文和数学的知识技能,并垄断了书写与保存记载的技艺。简而言之,他们最终控制了被认为是神圣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则是维持各种宇宙力量间不确定的平衡的工具。

此外,宇宙秩序也被复制到了社会的层面上。严格的行为规范对

土著人社会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这些规范明确了社会成员对神灵、掌权的统治者和平民的义务和责任。一个人的身份与一种血统联系在一起，而血统更是附着于神灵、统治阶层和神圣的历史。

早期的欧洲传教士遇到中美洲居民的时候，对于后者政治结构的复杂程度和生活方式的善良本性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对于这些人的偶像崇拜和用活人祭祀也感到惊骇不已。在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们(也是修会的成员)负责向土著人传播基督福音，并通过欧洲人历史和经验的滤镜来看待这些土著居民。特别是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他们切实主导了墨西哥中央谷地居民聚集地的土著居民皈依基督教的运动。

152

方济各会修道士，尤其是其第一代传教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背负着一种强烈的基督教千年盛世使命观，并怀有历史天启观，这些使他们的修会组织居于领导地位。绝大多数的早期传教士来自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圣加百列修道院(Provincial house of San Gabriel)，该院是由胡安·德瓜达卢佩(Juan de Guadalupe)神父于1469年创办的。后者强调特别贫困的"活福音书"，以效法耶稣基督和该教会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圣方济各和瓜达卢佩两人都受到约阿希姆·德费奥雷 (Joachim de Fiore)著作的影响，后者通过做梦和无数次按照逻辑方法阅读圣经后发现，人类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前会经历三种不同状态：第一种状态是世俗教会时期的圣父时代，其日期是从亚当到耶稣基督；之后便是圣子和祭司教会时代，其日期是从耶稣诞生到公元1260年；第三个时代是圣灵时代，这是修会统治和现世教会毁灭的时代。

费奥雷描绘的新救世主将是一个修会的创始者。一些方济各会修道士相信圣方济各就是这个弥赛亚，一旦现世教会毁灭，他将统治千年。基督教千年盛世论所说的是一个完美的平等和慈善世界千年王国，最贫穷和最卑微的人们将居住在那里。虽然许多教会人士认为这一解释太过极端，但它还是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会存在奉公守法的方济各会修道士，以及西班牙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

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领导的改革运动——这位红衣主教关闭了奢华的修道院,并强调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应该过一种贫困的生活。

1492 年"发现"的最后的异教徒——美洲土著人,被看成是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来临这一预言的一种明显征兆。在向土著人传播福音的时候,第一批方济各会修道士们相信,他们在创造基督教千年王国或世间的基督天堂中正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关于土著人虔诚、谦卑和服从的报告造成许许多多修道士一开始就猜测,土著人是预言中第三个时代的基督徒。这就说明了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在讨论将土著人转变为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教化"这个词,而不是"基督教化"。他们认为土著人已经准备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只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热情将他们引导或教化就可以了。

因此,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追求将土著人教化成符合基督福音的纯粹基督徒,并创造一个印第安人的基督教国家。为此,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一个艰巨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消灭土著文化的前提下根除土著宗教。这一目标部分地反映在他们坚持用土著语言而不是西班牙语来教化这些土著人上面,而这是直接违反西班牙王室的指令的。修道士们还反对向土著人开征什一税的企图。可能就是因为这两项行动使得土著居民西班牙化了,并使注定衰落的现世教会保住了统治地位。

153

甚至不赞成早期方济各会修道士天启观点的教士都受到另一位学者——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著作的深深影响。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哲学和讽刺性论文宣扬教会改革,他认为教会机构已变得太奢华、太世俗、太远离初始的基督教会。这种态度导致一种对普通欧洲人——特别是那些移民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人的严苛观点。一些教士感到普通殖民地居民信奉的天主教是颓废的和有污点的,不适合正在临近的第三纪。这些西班牙移民把自己的伊比利亚民间天主教的信仰和实践带到了殖民地,那就是信奉圣徒、马利亚和圣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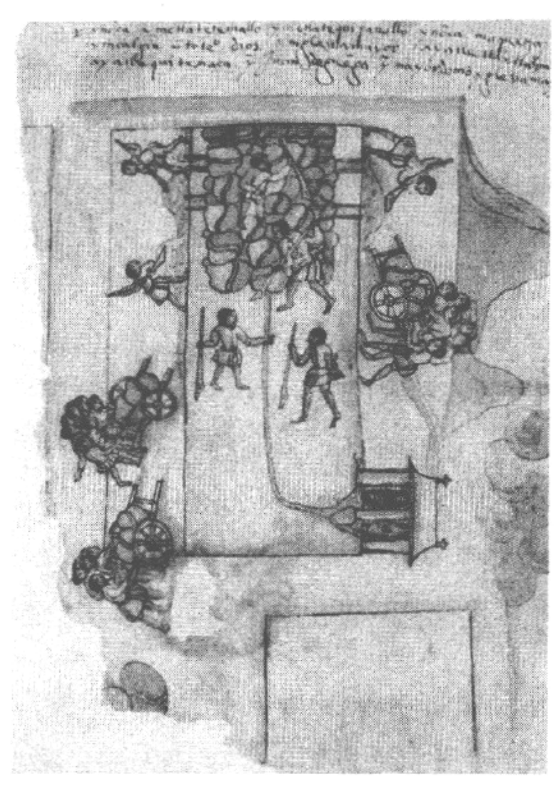
幻觉和奇迹标示着当时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礼仪性的宗教活动被用来公开展示神灵崇拜，如宗教游行、朝拜，特别是到著名的圣地朝觐。参加弥撒和忏悔的人数很少，一般的宗教教育极为缺乏。不仅如此，民间的（尤其在农村地区的）天主教是自发产生的，并独立于官方教会。诸如方济各会修道士之类的托钵僧组织开展了进行宗教教育的会社，他们已成为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方面教育居民和坚持教会控制的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在16世纪晚期达到顶点——1545年特伦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宣扬的改革传入了殖民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努力创建一种正统的教会控制的宗教虔诚。

一些教会人士对西班牙殖民者表现出来的轻蔑之情不仅建立在这些宗教和哲学原则上，同时对委托监护制下土著居民受到的虐待也进行了指责。1542年之前，西班牙国王实行委托监护制，即准许早期的殖民者有权征收贡品和征发劳役，作为对他们在征服期间为王室服务的一种回报；作为交换，他们应对土著居民进行基督教化。委托监护主邀请修道士到自己的领地传布福音，即使如此，许多传教士还是力图把他们对印第安人的责任与热衷于剥削土著劳力的堕落的西班牙人鲜明地区分开来。某些修道士，例如大名鼎鼎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后来变成了委托监护制的激烈反对者；尤其是对个人劳役那一条款，他们将它比作（实际上也确实是）土著人的奴隶制。但此时，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委托监护制如果清除了其中明显滥用权力的部分后，还是一种合适的制度，因为它使美洲土著人改变了信仰。此外，许多传教士和委托监护主一样大肆剥削土著劳力，强迫他们修建修道院、教堂，依靠土著人生产的东西过活。

在关于实行委托监护制的激烈争论中，墨西哥中部地区成为许许多多进行基督教化乌托邦实验的场所和基督徒生活的家园。最著名的是圣菲济贫院（Hospitales de Santa Fe），由前检审庭法官，后转为多明我会传教士，其后又成为米却肯（Michoacán）主教的巴斯科·德基罗加（Vasco de Quiroga）创建和监管。基罗加依据托马斯·莫尔（Thomas

154

More)爵士在他的名著《乌托邦》(*Utopia*,1516 出版)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建立了济贫院或是主教治下的特许公社。



在不断收到印第安社群有关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勒索过多的劳动力、食品和建筑材料的抱怨后,王室于 1561 年正式对殖民地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视察,称为"总视察"。本图选自《奥苏纳抄本》(*Codex Osuna*),这份文件是本次视察的官方记录的一部分。它沿用了前西班牙时期的绘画传统,用西班牙文字标注写出纳瓦特尔语文本,并用西班牙语加上了注释,综合这三种形式来描述对印第安人的剥削情况。

传统的土著人社会和乌托邦都坚持将善和基督教义混为一体的共同基本原则。在济贫院中,土著人在共有土地上共同劳动,为市场生产商品,管理公社的日常运作,并估算未来的需求。生活在公社里的传教士引导儿童学习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学习基本的阅读和书写。济贫院中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接近那些相信基督教千年盛世的传教士们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

基罗加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欧洲人认为济贫院取得了成功,而且的确土著人也大为仰慕基罗加,称他为"老爸"(Tata),这个词语沿用至今。然而,在基罗加去世后,济贫院虽然还在继续运作(有些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但这种基督教化的模式始终都没有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因为它需要大量定居于此的教士和制度上的极大支持,它还使土著人离开了委托监护制及其后的摊派制强迫他们劳动的场地。尽管如此,还

是有一些意见认为,后来边境地区的传教区制度是从基罗加的济贫院那里受到启发的。

155 1523年,首批三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来到墨西哥;次年,又有12位被称为"十二使徒"的传教士从韦拉克鲁斯步行200公里后到达墨西哥城。另一些修会成员如多明我会修道士于1525年到来;阿古斯丁会传教士于1533年到来;耶稣会会士于1571年到来,他们在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运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要提一下的是,考虑到他们肩负的任务,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在人数上极为有限。1559年,大约有800名传教士在265万土著居民中工作。一个世纪之后,也只有6 000名正式任命的神父在管理土著人和殖民者。

除了天主教传教人员短缺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制约和限制了对土著人的基督教化和精神征服。这些因素有:语言障碍,文化上的无知,西班牙人之间的争执——如前述的罗马天主教修道士与殖民者、乃至与西班牙王室间的纷争等,以及教会内部的争斗——如教义之争和修会间的争执等。

传教士们最初的任务就是学习当地语言,结果他们编撰出版了一大批词典和语法手册,从而帮助了实地的传教工作。被征服的土著贵族的子女皈依了基督教后,也参与了这些由传教士们创办的学习中心的工作,使得上述产品成为可能。在墨西哥城有两所这样的学校,一所叫圣何塞(San José),由方济各会修士佩德罗·德冈特(Pedro de Gante)领导;另一所为著名的圣克鲁斯·德特拉特洛尔科学院(Colegio de Santa Cruze de Tlatelolco),这两所学校分别由墨西哥第一任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和第一任主教胡安·德苏马拉加(Juan de Zumárraga)创建。通晓西班牙语、拉丁语和本地纳瓦特尔语的年轻土著学者翻译并撰写了祈祷与忏悔手册、布道辞、历史著作及其他宗教论著,这些东西对于基督教化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要成功归化土著居民不仅仅需要学习土著语言的基本原理,而且需要了解土著社会。他们为了消灭大量土著文化而学习土著文化,结果却催生出了一批伟大的开拓之作,如迭戈·杜兰(Diego Durán)、贝

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安德烈斯·德奥尔莫斯(Andrés de Olmos)、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Toribio de Benavente,莫托里尼亚[Motolinía])和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等人的宗教编年史著作。这些人虽然本身已是语言学家,但他们还是紧紧依靠土著人助手、咨询人和翻译一起工作。西班牙王室欢迎这些研究,因为他们对了解前哥伦布时期的政治、经济和贡税等实际情况很感兴趣。

传教士们一方面学习本地语言,另一方面也借助其他教育手段努力将土著居民教育并转变为基督徒。他们发展了形象性的辅助手段,如描绘耶稣基督受难以及圣徒生平的壁画和宗教画,向新皈依基督教的土著居民解释宗教寓言等。但这种形象手段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这些东西的成功要依赖土著人自己去理解那些形象,但他们的想象可能与传教士们想要解释的内容不尽相同。

譬如,传教士们几乎都直接把十字架和耶稣受难的绘画推销给玛雅人。但对于玛雅人来说,十字架的象征却勾起他们对自己神圣的“第一树”(first tree)的回忆。这棵生命之树显示了连在一起的天堂、人间和地府,而宇宙的轴心就在该树的中轴之上。此外,它还象征式地显示了统治者被神化并成为天堂一员的方式。它赞美创造、牺牲和复活,而且如果画上了一棵玉米树,那就直接涉及农业的周期。它还显示了一个神界,神灵们将来会去那里接受祭品。因此在玛雅人看来,耶稣基督也是许多在生命循环中踏上通神道路的一个统治者,没有必要被当作独一无二的拯救罪孽的救世主。 156

无论是前哥伦布时期的宗教还是西班牙人的天主教,公众的宗教仪式总是最重要的。因此,传教士很快就向他们教区中的土著教民介绍宗教剧、宗教音乐和宗教节日,尤其是在复活节和圣体节的时候,因为这两个节日都要领圣餐。此外,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也希望以自己充满基督徒热情的虔诚而卑微的生活为榜样,来激发当地土著的宗教虔诚。这种方法最终似乎是给土著平民留下了印象,后者早先曾被欧洲人的贫困誓约弄得不知所措,因为在被征服前,他们自己的祭司都衣着华丽,以符合其贵族的身份。

早期的传教士是巡回传教的,两人一组进入村庄、小镇或城市居民区,主要工作是把地方首领转变成基督徒。一旦卡西克(cacique,村长)或酋长接受洗礼,社区的其他成员很快就会效仿。洗礼前的宗教布道非常简短,这样可使1万名土著人的洗礼尽可能同时完成。但问题是,这些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最多也只能称之为肤浅。随着最初转化工作的完成,传教士们又着手贬损和驱逐传统的土著高级祭司,从而强迫他们将活动转为地下。尽管如此,传教士们还是很难根除一些等级较低的土著宗教人士的作用,如产婆、巫医、占卜人、求雨人等,因为这些人的职位与地中海地区天主教中已有的职位是相应的。因此,这些传统中的许多东西还很好地传承到现在。

传教士们下令摧毁任何明显可见的偶像或雕像,但土著人还是从欧洲人的眼皮底下成功地藏匿了其中的一些。传教士们抨击非法同居和在土著贵族中尤为盛行的一夫多妻制。由于传教士的人数有限,而且又是巡回工作的,因此新皈依基督教的土著精英人士便负责管理新的土著人基督教会的日常运作。土著精英人士显然成为西班牙人社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媒介,他们管理土著人、收取贡税、为工程项目提供劳力。在这方面,他们继续担负着他们在征服之前所担负的职责。

新皈依基督教者在土著社区中的宗教角色可以说也是如此。皈依基督教的首领和新的"寺庙"联系紧密,并充当自己的人民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中介人。譬如,"行政长官"这个民政职位和"司库"这个教会职位通常由同一个人担任,即使不是同时,也会是交替的。司库是教会的会计,他主持新寺庙的日常运作,根据自己的意愿增添帮手,在人临死时给予精神上的慰藉,组织殡葬服务,还作为教义回答者和宗教教师为他人服务。

157

教会的唱诗班实际上就是教区议会。其成员在镇议会中也拥有职位。教会司库和唱诗班要保证居民参加弥撒及一些新的宗教仪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向神父报告后者不在时发生的事情。从中也可窥知,为什么修道士最初相信福音布道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即使整个殖民

地时期禁止土著人担任天主教神父，但基督教信仰显然还是通过一个本土的“过滤器”，即土著精英分子传了进来。

传教士是根据那些已经被土著居民熟悉的东西来宣讲基督教的。换句话说，传教士不仅允许而且有意鼓励将土著神灵、符号和宗教仪式与欧洲人宗教中对等的东西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被称为“有引导的类并”（信仰与实践的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些复杂而又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当传教士力图将土著神灵概念与基督教的上帝与撒旦概念混为一体的时候。土著神灵具有多面性，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出现，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特性。

譬如，传教士一般都选择把特斯卡特利波卡（与他相伴的是羽蛇神）作为最高神灵，其化身之一便是天神，他是近处的所有者、周围的所有者、天空和大地的所有者。虽然这只是一种恰当的比拟，但特斯卡特利波卡并不具有特别的道德权威，因为他被认为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此外，特斯卡特利波卡还被看作是骗子和混乱之王。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有时就利用他的这一特征来表示魔鬼的罪恶。这样一来，教士们就必须不断地阐明他们所说的特斯卡特利波卡是特斯卡特利波卡的哪一面。

一个与魔鬼更为共同的关联是人形猫头鹰（纳瓦特尔语为tecolotl），这是一个与疾病、死亡、夜晚和阴间有关的神灵。但它只是一种精灵（nahualli），而不是高级神灵（teotl）。实际上，将魔鬼说成“高级神灵”，减弱了土著人心目中邪恶的概念。这样一来，邪恶也可表示混沌，而后者在土著人眼中是个正面概念，或者至少也是不令人害怕的。

我们继续列举来自墨西哥中部的例子。纳瓦人没有把宇宙看成是善与恶（上帝与撒旦）间的斗争，而是混沌和秩序力量的一种平衡。在土著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向善避恶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他们所要做的是（通过奉献和礼拜）发现和保持两者间的适当平衡以求继续生存。维护这一平衡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斗争，在其中，混沌的本质不是恶，而是生命之源。

158　此外，传教士们极为强调耶稣基督的爱心和救世之情，让新皈依的基督教徒摒弃"上帝主要只关心来世"这样的观念。另一方面，撒旦经常引诱人类，出现在此时此刻人类情欲的世俗世界里。一些土著人把撒旦和上帝看成是同一个神，他具有双重神性——既有负面也有正面的神性，因此撒旦和上帝一样也应得到崇敬和奉献。

将基督教化进程弄得更加复杂化的表现是：传教士使用土著语言翻译神话故事、祈祷词、布道辞和教义问答；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构想一些独特的方法来解释他们的听众完全陌生的基督教概念。他们要选择土著语言的术语来表述土著文化中所没有的基督教概念。譬如，讲纳瓦语的人有自责或对某一特定行为感到抱歉的观念，但却没有等同欧洲人的"原罪"概念的专门术语。同样含糊的是用来表示纳瓦语"善"(cualli)的概念的术语。"善"(cuanlli)是动词"吃"的被动形式。传教士们选择 cualli inyollo 表示"善心"或"心纯"，但实际上这个词组是说"心是善的"，可能是古代在用活人心脏祭神时使用的词组。人们希望通过与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不断增多的接触，两种信仰系统中初级的概念融合将逐步让位给纯粹的基督教释义。

崇敬圣徒的观念也产生于将神灵和宇宙哲学观念合为一体的过程中。有些传教士对引进天主教的这一关键部分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害怕圣徒的作用可能会被误解，土著人可能会依照自己的观念把这些圣徒视作为神灵。此外，圣徒的雕像还可能会被曲解为偶像而不是神奇人物的象征。然而，既然西班牙的民间天主教有这样的特点，它就不可能排斥对出自本土基督教圣徒们的崇拜。许多传教士还鼓励土著人崇拜他们西班牙老家的主保圣徒。

相比盲目地接受传教士们的选择，土著首领还是更愿意接受土著长老的托梦，这与他们在前哥伦布时期选择主护神灵的方式非常相似。长老们也为街道邻里、氏族部落和家族选择主护神和各种不同的圣母马利亚形象。很快，在土著人的家族庭院里，圣徒之屋(santocalli)替代了西班牙人征服前的神灵之屋(teocalli)。

与圣徒崇拜猛增连在一起的是成立崇拜某个特定圣徒或圣母马利

亚的宗教组织——教友会(cofradías)。它们在传统上虽然都是排外的男性组织,但土著人的教友会似乎已经吸收了一些杰出的女性。教友会很快就与土著人中的精英分子结为联盟,后者成为专门供奉社区守护神的联谊会的官员,而这类联谊会通常都是城镇中最重要和最有钱的组织。

159

教友会负责收集资金,并为殡葬事务和某个已故成员未亡家属提供服务。它的成员为礼拜堂和圣像提供维护和装饰服务。社区特别重要的事是庆祝主保圣徒的节日。教友会的成员,特别是官员们,监控、组织并资助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作为财富和特权的象征,也作为对下属百姓的馈赠,土著贵族们用这种方式继承了欢庆节日的古老传统。这一习俗最后演变为今日的"义务制度"(Cargo system),即挑选一些人来主办主保圣徒节(在许多情况下,这将会对这些人的财政状况造成相当大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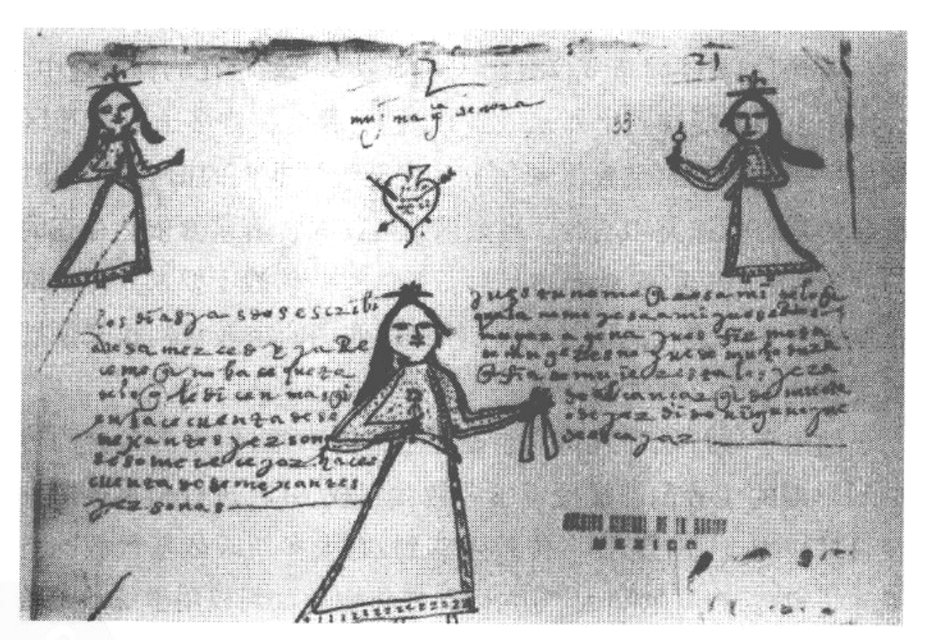
总之,传教士们被迫接受一种灵活的信仰体系,该体系对宗教仪式和教义的解释带有土著人的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传教士最终承认,基督教化可能是一个需要日常管理的漫长过程。大多数传教士可能不懂得,虽然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但土著宗教却有悠久的包容传统,它将新的神灵连同祭拜仪式都加入到他们已经存在的神庙之中。

由于土著人能够同化外来的宗教观念,因而在许多土著人社区中发展出了一种并联的宗教体系。土著人既崇拜他们的旧有神,同时也崇拜新的基督教神灵和圣徒。当意识到传统的土著宗教依然存在的时候,一些传教士很生气,感到这是种背叛。这些传教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抵制这种正在进行的偶像崇拜,并利用他们的宗教裁判权来惩罚那些被发现还在暗中继续实践自己传统宗教的土著人。

虽然由于施行死刑而受到西班牙王室的责难,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和早期的主教们都被授予了宗教裁判权,并在进行精神征服期间行使该项权力。国王和许多传教士感到,有太多新皈依基督教的土著人受到了审判,而且惩罚太严厉,因此在将宗教裁判权用于统治土著人并确保他们皈依正统时,表现得相当犹疑不定。尽管如此,1522 年,一位来自阿科瓦坎(Acohuacan)的印第安人被正式指控非法同居,并成为墨西哥第一个被宗教法庭法官审问的人士。1527 年,马丁·德巴伦

西亚修士(Friar Martín de Valencia)认为土著文化是魔鬼的产品,因而下令对4位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头领以崇拜偶像罪处以死刑。在墨西哥中部,这类事件在1539年时达到了高潮,该年,胡安·德苏马拉加处决了特斯科科前城邦国家首领堂·卡洛斯·奥梅托奇琴(Don Carlos Ometochtzin)。

在苏马拉加的领导下,宗教裁判所主要被用来惩处暴发致富的西班牙人。1536－1543年是该机构活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共有152个案件被正式立案调查,其中只有19个案子牵扯到美洲土著。被宗教裁判所审问的土著人遭受了严刑拷打,他们往往是贵族成员。在这方面,它向人们显示,对土著人实施的"信仰行动"(autos-da-fé)是一种做秀仪式,它想展示西班牙人的权威并企图报复那些本该成为臣民模范的土著人领袖。惩罚的极端性和公开性实际上是想以此来警告其他的偶像崇拜者,但它也可能使得潜在的反抗者转入地下。许多土著人显然认为烧死他们的领袖,只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财产。



宗教裁判所负有维护正统信仰的使命,在不同的人掌权期间,它先后发起了多次大规模运动来保证政治和社会一致性。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中也因此保留了大量有关殖民地日常生活的社会信息。比如,图中这封情书就是在一次对不当行为的调查中查获的。

精神征服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事件是 1561 — 1565 年间迭戈・德兰达在尤卡坦半岛对大批玛雅人的严刑拷问和审讯。此人针对受过洗礼的土著人的敌对行动被认为是整个殖民地时期最极端和最残忍的审讯与折磨。审讯期间或者受到审讯后,共有 158 名土著人死亡,13 人自杀。还有其他更多的人终身致残。由于这些行动,兰达受到了大量的谴责。他被召回西班牙对此进行解释,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居然有些辩护还取得了成功。他又重返尤卡坦担任主教,但更进一步的审讯中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兰达编撰了一本最全面的玛雅人前哥伦布时期社会的编年史。后来,他又主持了一次焚书活动,成百上千的典籍、土著人宗教文献作为魔鬼宗教书籍而被付之一炬。

虽然西班牙国王提拔了兰达,但后者的行为促使王室决心改革宗教裁判所对待土著人的态度。1547 年,宗教裁判所对土著人的管辖权已转移给教区主教法庭(Provisorato del Ordinario),这是主教区中的一个地方机构,负责处理各种各样的宗教事件。兰达的大审讯之后,虽然教区法庭可以起诉和惩处土著人,但不再执行死刑或者严刑逼供。现在普遍相信,16 — 17 世纪时,整个总督区内教区主教法庭上审理的土著人宗教案件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而且局限于边远地区,而不是在墨西哥的中部谷地。更重要的是,当 1571 年宗教裁判所的宗教法庭最终来到墨西哥的时候,它已经不具有对土著人的管辖权了。西班牙国王感到,如果让土著人看到西班牙人因其宗教上犯错而受到惩罚,可能会更有效果。只要土著居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欧洲人,崇拜偶像的文化就还是主流文化,那么上述举动就是一种富有远见的举动。 161

有些土著群体没有将欧洲人的信仰添加到他们自己的信仰之中,而是强烈地抵制基督教和西班牙人的统治。譬如,1541 — 1542 年米克斯顿战争期间,奇奇梅克人于 1541 年的圣诞节在新加利西亚(当时属于总督区的北方边境地区)举行了起义,用暴力回应了征服和基督教化。土著祭司宣称,他们的主神特拉托尔(Tlatol)回来了,该神与他们复活了的前辈们一起,将带来一个黄金的世纪,并拒绝接受基督教的上帝。这些土著祭司主持了悔罪和净化的仪式,以此根除外来宗教的所

有印迹,并呼唤采取暴力行动,特别是要杀死基督教的传教士,以迎接预言中的世纪。

不管西班牙传教士的行动、信仰和磨难如何,有一项因素比其他因素对精神征服的成就影响更大,那就是人口灾难。到16世纪末,墨西哥中部谷地的美洲土著人口从2 500万锐减为107.5万,这深深地影响了土著文化和土著宗教。不管是基督教上帝还是土著人神灵都有可能制造天谴,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并联的宗教体系,以向基督教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神祇进行奉献和礼拜。

这样的人口损失终于侵蚀到了土著人的宇宙观,因为一个村庄的历史传承要依靠那些活下来的人的记忆和记录。因此,土著人把更多的基督教观念整合到他们的信仰体系之中。这就是土著民族的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圣约书:尽管经过了500年的时过境迁,他们还是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尽管现在的土著社会整合了许多基督教的观念、仪式和象征,但在许多乡间村落里,主导性的世界观依然是本土的。

除了无数与传教计划有关的复杂问题,修道士们还有其他要争斗的问题。譬如,进入16世纪后,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士发现自己与政府越来越不一致了,因为国王开始积极地提拔世俗教士(即教区神父),特别在16世纪70年代之后。世俗教士是指那些在主教领导下供职的神父。而罗马天主教修道士则是各自修会首脑管辖下的传教士,如方济各会传教士、多明我会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阿古斯丁会传教士等。世俗教士既不拥有天启观点,也不拥有第一代罗马天主教修道士的宗教热忱。殖民地一旦稳定下来,西班牙国王原则上希望在那些地方实行和巩固欧洲人的社会与经济模式。这一计划中就包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世俗教会。虽然这一进程要经过数年才完成,但他日益偏爱世俗教士却改变了基督教化使命的轨迹。这个更为宽松的宗教措施推动了并联的宗教传统在土著村庄中的延续。

162

从特拉斯卡拉乡庆祝亡灵节(Todols Santos)的例子中,上述现象便可见一斑。亡灵节从实际上说是一个纪念自己所热爱的死者的日子。在这一天,死者的灵魂要返回家中接受祭拜,并享受活着的亲属献

祭的食品与饮料。根据前哥伦布时期宗教的一种遗风，不同的亡灵按照死因有各自的特定日，然后依次祭祀：11 月 1 日是祭祀自然死亡的成人的日子；11 月 2 日被规定为祭祀亡童的日子。

此外，亡灵节是有空间区域区分的，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祭祀仪式，遵循各自信仰体系。过节时要建一个精心制作的家庭祭坛，用守护圣徒的雕像、亡灵喜爱的食物与饮料，甚至香烟将其装点起来。这个节日中的私密部分更贴近土著人认为人死后血缘关系会延续下去的传统观念。土著人相信死去的亲属会继续保佑他们，并充当幽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保人。这个节日中的公共活动则是在墓地彻夜守灵，在教堂中做大弥撒，装点坟墓以荣耀死者——所有这些都来自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天主教传统。虽然墨西哥亡灵节的庆典也是一个庄重的场合，但音乐和食物基本上是通宵守夜最要紧的部分。这表明在土著人看来，死亡和生存是互为依存和轮回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个依然与生命和这个世界有联系的新起点。

方济各会传教士被清除出当地土著人的教区并被主教辖区的神父替代可以说明宗教仪式私密和公开的两重性质。方济各会传教士至少在最初确实想更加用心地审查土著人的习俗和对天主教教义的解释，并且更热衷于灌输天主教教义。而许多世俗教士虽然也热爱自己的教区居民，但通常都把土著人视为基督徒，因此很少会审查和批评土著人的习俗，特别是当这些习俗表面上是符合早期西班牙天主教传统的时候，譬如建一个用于私人祭拜的临时家庭祭坛。

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不仅是世俗教士，而且整个新一代的罗马天主教修道士都在搞转化计划，他们对于创建一个基督教乌托邦的可能已明显感到幻灭。最初的热情、关于基督教化即刻成功的天真报告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对把土著人变为基督徒并促使他们适应这种文化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缓慢性的更为深刻的理解。转化土著人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西班牙王室与世俗教士间的冲突，以及出生于西班牙的居民和出生于新世界的居民之间出现敌对状态时罗马天主教各修会间的冲突。

163



每年11月1日的亡灵节给了人们大肆庆祝生与死的互补性的机会。如同大多数墨西哥的节庆一样，这是一个嘲讽社会的机会。19世纪最后20年里，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José Guadalupe Posada，1852－1913）绘制了很多有关这些节日的讽刺漫画。他所画的素描图(Calaveras)以幽默的形式反映了许多社会刻板印象。与波萨达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幅招贴画以漫画的形式夸张地刻画了社会成员的形象。

就如欧洲宗教影响了土著文化和宗教一样，土著人的传统也影响了欧洲人的宗教形式和观念，特别是一般殖民地居民的民间宗教。譬如，一般认为土著人的医学和草药知识在医治新世界的疾病方面要比常规的欧洲医学更为有效，因为它是新世界土生土长的东西。西班牙人、混血种人和非洲裔人硬要印第安人向他们披露“秘方”，以此来医治百病、强身健体、壮阳御女，甚至得到“点石成金”的能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西班牙人和非洲裔人皈依土著宗教以求得帮助，或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要求得到纠正。在所有土著传统中，医术对殖民地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欧洲医生不多的时代里，甚至宗教裁判所都承认土著医术的效用。然而，随着土著医术一起来的，还有土著人的世界观、土著人的宗教礼仪，以及基督教观念的土著化。

跨文化同化的这个过程还延伸到被强迫贩卖到墨西哥的非洲人身

上。非洲奴隶居住在新世界中的西班牙人集聚区，在城市人口中占的比例最大。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甘蔗种植园、纺织工厂、矿山和农牧业中，都有非洲裔人。这些大部分来自西非和中非的非洲人和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在居民中所占比例高达20%，在墨西哥城尤其如此。 164

一般说来，西班牙奴隶主有责任了解横渡大西洋来到此地之前已受洗的非洲奴隶的宗教教育情况。这些奴隶可能只接受了极少的天主教信仰教育，因为教会没有在非洲人中进行他们对待美洲土著人那样的大规模精神征服。他们鼓励非洲裔奴隶参与宗教服务，非洲裔人和穆拉托人的教友会团体也庆祝他们守护圣者的节日，并参加如圣体节这样的大型城市节日。不过在17世纪早期，这些设于墨西哥城圣多明哥教堂(Church of Santo Domingo)中的非洲团体是被禁止的，因为西班牙国王怀疑他们会聚众谋反。甚至到他们不再被怀疑有可能颠覆政府的时候，非洲人的宗教组织也还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伴随有非洲音乐和舞蹈的宗教游行被认为是丑恶可耻的。他们经常资助专门的教区教堂，就像穆拉托经常资助专门的墨西哥城的圣罗克教堂一样。

尽管被贩卖到墨西哥的奴隶们说着西非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他们的民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共同拥有他们带到墨西哥的重要宗教理念。传统的非洲宗教传给他们的是对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神灵和祖先的信仰，以及魔法和治病的习俗；而每一种习俗都有各自相应的祭拜习惯和仪式。所有这些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信仰体系内互相关联的结构；这个信仰体系帮助很多人在其奴隶生涯中存活下来。非洲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是全能的、可请教的，并可以用这些力量来改善奴隶们的生活。譬如，非洲裔墨西哥人都佩戴符咒和护身符，这些东西能驱魔辟邪或者帮助他们得到某些他们想要的效果，如减轻一个严酷主人的惩罚。非洲裔人和穆拉托还携带特殊的尘土，通常是墓地泥土或人的骨灰，这些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许多其他做法，如向身体涂抹用来慰藉焦虑之情的油膏和药剂等，已成为净化仪式中的一部分，并与禁食某些食物结合在一起实施祈福。奴隶们还关心使用各种不同的草药来医治疾病，尤其是催眠。奴隶们的确想对奴隶主们这么做，因为奴隶主

睡着以后奴隶们便可以自由行动了。还有其他一些项目，如用玛瑙念珠来预测未来事件，预见朋友、亲戚，特别是奴隶主的行为等。

非洲裔人就像美洲土著一样，从他们新的生存环境中吸取对他们有价值、或与他们非洲老家相似的文化成分。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非洲裔奴隶和美洲土著之间有一种程度很高的文化互动。譬如1647年，一个叫佩特罗纳(Petrona)的土著妇女在她雇主的家中主持165 了一次礼拜圣安东尼的仪式——一种被禁的私人宗教仪式，她邀请了非洲人和穆拉托朋友，以及孩子们的教母，这些人在仪式结束后还跳了舞并吃了糖果。

非洲人的和美洲土著的传统相结合，产生了有趣的宗教形式。譬如，在18世纪早期的哈拉帕(Jalapa)，一个非洲裔奴隶主持了一系列礼拜圣安东尼的宗教仪式，参与这些仪式的土著人表演了传统的舞蹈。这个奴隶作为这群人中的萨满巫师，进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向神灵们问起事来，醒过来之后又转达了他从超自然世界中接受到的忠告。宗教习俗间的这种相互交织最终创造了一些全新的信仰体系。虽然非洲-墨西哥宗教由于奴隶贸易的衰落以及土著居民人数的上升而没有在墨西哥广泛地传播，但它还是带有巴西的坎东布莱教(candomblé)和古巴的崇神教(Santeria)这类宗教的许多特点。在这些土著宗教中，非洲人的神灵体系与天主教的圣徒、三位一体说，以及印第安人的自然观念都联系在一起了。

就像这些例子显示的那样，民间宗教仪式和信仰是灵活的、自发而生的，并且向殖民地中存在的其他宗教传统开放。然而这些创新全都披着欧洲天主教符号和礼拜形式的外衣，特别是与普遍的圣徒崇拜仪式连在一起的大规模公众礼拜。每一个社区、教区、教友会、行会、机构、乡村、城镇、城市和种族群体，都保持着自己对某个特定圣徒的礼拜仪式，或是颂扬马利亚或耶稣基督的宗教游行。虔诚的人们满怀宗教热情，隆重而盛大地庆祝这些节日。这些充满特色的演示是个人和团体骄傲的源泉，并成了不同教友会间激烈竞争的缘由，如17世纪在墨西哥城中就发生过那样的事件。除了这些一年一次的节日外，献给某

个特定圣徒的盛大游行也不时装点着殖民地的生活，因为那时的生活经常会受到传染病、干旱、饥荒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其中墨西哥中部地区的主要就是土著人、西班牙人和混血种人对主管干旱和疾病的救难圣母(Virgin of Remedies)和主管洪水的神匠圣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的礼拜仪式。最后，一种对圣母马利亚的宗教敬礼在墨西哥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瓜达卢佩圣母的礼拜仪式。

据说在1531年12月9日，瓜达卢佩圣母显圣于一名叫胡安·迭戈的卑微的土著人面前，要他告诉胡安·德苏马拉加主教，在距离墨西哥城中心以北4英里处的特佩雅克山(Tepeyac Hill)上她显灵的那个地方修建一所教堂。主教对此并不相信。3天之后，圣母再次出现在胡安面前，并告诉他捡几朵玫瑰花，把它们放在他的斗篷里。胡安把这几朵玫瑰带给了苏马拉加，并再次请求主教在那座小山上修建一所教堂。胡安站在主教面前，撩开了自己的斗篷，在原先放置玫瑰花的地方显现出圣母的形象。这幅圣像于是便成为崇拜的中心之物。1533年，在圣母显圣的地方建造起了一座小教堂。1556年，经过大主教阿隆索·德蒙图法尔(Alonso de Montúfar)的努力，一座更大更华丽的教堂建成了。到1622年，神龛被移置到这座小山的山脚之下。1695年，神龛新址处又建起了一座新教堂。 166

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崇拜瓜达卢佩圣母的热潮持续高涨，克里奥尔教士和市民领袖都开始把瓜达卢佩圣母视作独特的墨西哥圣母，与欧洲人的圣母形象相对应。整个18世纪，由于教区主教、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修道士们的积极推动，土著人对这个圣母形象的崇拜快速地增长。在那以前，土著人一般都重视各自的地方主保圣徒或马利亚圣像，其中也包括救难圣母，这位圣母后来还与反对墨西哥独立运动(1810－1821)的保皇党势力连在了一起。1756年12月12日，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瓜达卢佩圣母节，以庆祝她被指定为新西班牙总督区的保护神。

对圣徒和马利亚的崇拜也主导着私人的信仰习俗。有钱的克里奥尔人在自己的私人教堂的图书室里摆满祈祷书和圣徒传，以此来激发

宗教沉思。一些普通的家庭则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如亡灵节或举行私人祭神仪式时)搭建一个临时的小祭坛。大多数家庭一般都至少把一至两个雕像放在一个色彩光鲜、精雕细琢的带门的小木柜里。这种小祭坛是便携式的,可带着它去做弥撒祈福或参加宗教游行。

向圣徒们立誓以求保佑自己免受疾病、伤害、遗弃,或者求偶之类的祈祷是相当普遍的。作为对其希冀的奇迹的回报,虔诚的信徒可能会去某个圣地做一次朝圣之旅,或是捐赠钱款给慈善事业、修建一所赞美圣徒的教堂、充当清扫教堂的志愿者,或者看护病人。此外,那些有家庭成员曾得到奇迹般救治的人们会委托本地的艺术家将奇迹的主要事迹画成绘画。这些绘画,或者说这些还愿画,作为这些人祈祷力量的见证,也作为感谢上帝的一种小小的表示,被悬挂在教堂的墙上,专门奉献给那些圣徒。

至 1600 年,墨西哥的民间天主教成为一种非洲人、土著人和西班牙人各自传统的极为离奇的结合。普通市民相信奇迹并期待能定期地见证神力。所有的居民都想通过圣徒,或是护身符、药剂或宗教仪式,汇集或影响超自然的力量使个人、种族和社区获利。三个重叠的宇宙学说——欧洲天主教的、非洲人的和美洲土著的,都向个人提供缓解生活压力和治疗疾病的机会。不可否认,民间宗教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巫术的。天主教会本身则想证明上帝、圣徒、圣母马利亚奇迹般的力量,而其他民间信仰则带有不正统的味道。

利用豆子、卡片、茶叶或随便什么东西来预言未来的占卜术,或者是炮制什么方剂和符咒来安抚夫妻、求偶、中伤仇敌,或者是影响他人的行为,这些都是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天主教会想方设法消灭这类信仰,因为这类法术挑战了自由的信条,后者认为上帝赋予个人在善与恶间作出选择的权利,因此它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通过法术预先注定和知晓的。天主教会认为信仰这类被称为巫术的法术,是一种迷信和吹牛者的活儿,其意图就是欺骗无知和绝望的民众。巫术极少向魔鬼祈愿,但许多符咒和仪式都添加了天主教的符号和仪式,巫术的这一特点令天主教会很不高兴。

167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瓜达卢佩圣母就是墨西哥最鲜明的象征。作为新西班牙殖民地的守护者，社区或个人在遇到危机时就会祈求她帮助。这幅绘于1743年的瓜德卢佩圣母版画描绘了1737年时，圣母降临墨西哥城帮助虔诚的人们。

既然存在这种交叉同化的宗教和文化环境，那么专门用来搜寻非正统和异端的西班牙特殊机构的到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570年1月25日，菲利普二世下令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建立宗教裁判所。次年，第一任宗教裁判官佩德罗·莫亚·德孔特雷拉斯(Pedro Moya de Contreras)到达墨西哥城，在圣多明各教堂附近的同名广场建立了他的总部。宗教裁判所在该处一直留存到1819年。墨西哥宗教法庭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罗马天主教信仰和教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抗持有异端思想或对天主教教义表现出缺乏尊重的罪恶行动的个人。为此，宗教裁判所拥有起诉一切犯有宗教异端罪行者的权力。

168

实际上，宗教裁判所完成其指定任务的能力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弱化影响。首先，墨西哥只被授权开设一个法庭来监视民众的宗教思想和行为，它管辖着涵盖整个加勒比和中美洲的总督区，该地区北起美国西南部，中经墨西哥，直到菲律宾群岛。与其相比，在领土小得多和人

口少得多的西班牙本土却建立过15个这样的法庭。此外,墨西哥的宗教法庭相比其担负的工作,显得人手不足。法庭由5个人组成:2个宗教裁判官,1个会计,1个公证人和1个法警(jailer)。此外,17世纪的宗教裁判官都缺乏经验,没有特定的资质,并时常穷得付不出雇员的工资,因此他们也不总是待在法庭里审阅证词和质询告发者。

墨西哥宗教法庭通过委派特派员(comisarios)或代表(在西班牙人城镇中通常为教区神父),力图使其影响遍及殖民地各处。特派员的职责是将其社区中可能的异端活动向上汇报,可以拘禁和审讯个人,并寻求来自首都总部的训令和指导。特派员参与其所在社区的许多活动,而其中只有一项需要他代表宗教法庭。这些人不像宗教裁判官那样受过专门培训,不会不受当地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告发和案件都只来自于第二大西班牙人城市普埃布拉以及墨西哥城。

最重要的问题是,墨西哥的宗教法庭对于美洲土著是没有正式管辖权的,在17和18世纪,后者构成了殖民地居民的一半。关于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问题还在继续。17世纪早期,天主教教士敏锐地察觉到土著人依然继续坚持其原有的宗教。埃尔南多·路易斯·德阿拉尔孔(Hernando Ruiz de Alarcón)和哈辛托·德拉塞尔纳(Jacinto de la Serna)这两位传教士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依然在土著人教区中泛滥的偶像崇拜。

虽然这是第一篇引起更多研究的报告,同时宗教裁判所的命令和调查也在不断增多,但是并没有发生广泛的反美洲土著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没有导致宗教裁判所当局对待土著居民的态度发生任何变化。尽管也有土著人直面宗教裁判官的案子,但一般来说,被指控的印第安人也只是被转交给主教辖区的教区法庭。尽管印第安人事实上是不受宗教裁判所管辖的,但非洲人以及混血种人却不是这样。非洲人不能不受宗教法庭管辖的理由是,西班牙人认为非洲人是与欧洲人相邻而居的,因此应该学会信奉严格的正统天主教。

除了这些事项外,宗教裁判官们深感失望的现实是:尽管异端邪

说表面上看是创建宗教裁判所要铲除的罪恶，但它却只占其所有经手案件的15%。虽然异端邪说大多数总是涉及西班牙人，但其他因犯罪而被指控和受到惩罚的人也有来到总督区的外国人——新教徒海盗以及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游客。墨西哥殖民地时期历史中极大多数的异端邪说案件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时期：16世纪末和17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这两个时期，宗教裁判所总共起诉了500多起案件。

一般来说，如果有一群人组成一个重要团体，或者一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一件巨大的丑闻，这时宗教裁判所就会去追查异端分子。此外，对秘密信奉犹太教者的大量起诉的研究显示，宗教法庭对于异端邪说的调查明显与地方上或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有关。譬如，16世纪晚期对犹太人的大迫害是与菲利普领导的反摩尔人（强迫摩尔人脱离伊斯兰教皈依天主教）、土耳其人、英格兰人、秘密犹太教信徒和荷兰人（此时荷兰正与西班牙开战以赢得独立）的整个运动有关。而17世纪戏剧般的大审讯则是由一个新的宗教裁判官胡安·萨恩斯·德马尼奥斯卡（Juan Sáenz de Mañozca）领导的，该人曾资助过秘鲁的反犹运动。许多被控者都是支持奥利瓦雷斯公爵（Count-Duke Olivares）的社团的著名成员。当公爵于1640年失势后，这些人便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

大体上，墨西哥殖民地中的犹太人都是改宗者，他们被迫皈依天主教，或逃离西班牙移居葡萄牙。1580年后，他们乘西、葡两国合并之机移民到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是与欧洲犹太人社区隔离的。这使得他们的地位比起他们在西班牙的同胞们更不稳定。在墨西哥，犹太人不得不与统治阶级交往，因为他们是欧洲人，为了求得经济上的成功（他们中许多人本来就是商人），不得不生活在西班牙人占大多数的城镇中。但是，他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奴仆，却利用宗教裁判所来为自己报复西班牙人，尤其是那些异端的西班牙人。对犹太人生存最大的威胁是生活在像中部河谷那样的人口稠密地区，这些地区毗邻宗教法庭。

所有这些因素对犹太人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公开场合

像基督徒一样行动,而在家中时则实行犹太教。许多人被同化了,甚至变成了神父;还有一些人皈依了基督教,从而也就终止对迫害的恐惧。不过,婚姻还是件复杂的事情。鉴于他们拥有作为显赫的西班牙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有必要与犹太社会之外的人结婚,虽然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做。犹太男子一向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而另一方面,犹太女子却成为犹太文化的储藏者,但她们却不会用希伯来语阅读和书写,或者从事希伯来语的研究。这样,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犹太教缺少犹太教神学中的许多精细表达,而是倾向于注重习俗、仪式、斋戒、宗教洗礼和殡葬仪式。

由于要调查的异端邪说很少(土著人那儿就更少了),宗教裁判官就把他们的时间用在整理档案、处理事件和审阅成千上万份有关道德行为和民间信仰问题的举报上。(确实,有些举报的政治和经济动机是企图打击他们的仇人;实际上,宗教裁判官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通过设立严厉惩罚来阻止那些作伪证、报假案的人。)1571 — 1700 年,共有 12 000 份举报,但只有 2 000 个案件被提交审理并作出惩罚。而且就在平均每年 15 起的案件中,有 15%的案件尚未完成审理便宣告无罪。其余的则作为一项不良记录被束之高阁。

170

宗教裁判官似乎已完全投入到在民间维护天主教正统性的任务之中。不管怎样,宗教裁判所的举报、审判以及它最初 130 年间的法令的基本概要,还是使我们对殖民地宗教信仰的基本纲领和问题有了一个不寻常的看法。譬如很明显,三分之一的案件只涉及很轻微的宗教违规行为,主要是亵渎。违法的性行为在案件中占居第二的地位(近乎 20%),其中包括重婚罪和忏悔时的引诱罪。巫术罪占审理案件中的 18%以上,而偶像崇拜罪只占案件中的很小一部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土著人不受宗教裁判所的管辖。这些案件的当事人有非洲裔人、混血种人和西班牙人,这些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或获取财产,转而接受前哥伦布时期的土著人传统。

因此,法庭力图让非天主教居民接受有关亵渎、巫术和性自由等是罪恶的教育,这是一个要通过多种途径来完成的任务。譬如,宗教裁判

官们定期发布告示，在这些告示中详细地阐述被认定为异端和不正统的信仰和行为。这些告示在布道坛上被宣读，时间一长，人们便知道了哪些是教会不可接受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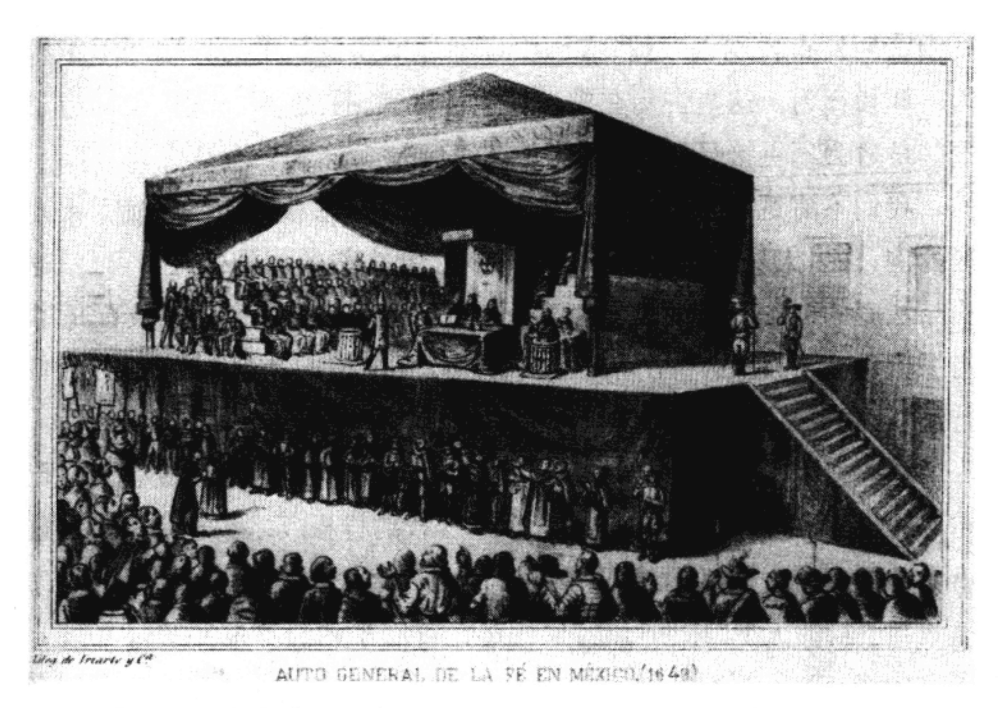
我们不清楚这些告示实际是否减少了民间宗教活动。以犹太人社区为例，许多人从这些告示中学到了关于犹太教的信仰仪式和习俗，这样与法庭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然而，宗教法庭还有一个由其支配的教育手段，它非常适合一个如此喜欢看热闹和演出的社会：隆重的"信仰行动"仪式！

这些引人入胜的仪式海报让所有社区的人们去观看经过审讯并已定罪的囚犯，这些人被用来充当背叛基督教的样板。宗教裁判官数周前就宣布要进行这一仪式，并下令立即开始准备。以墨西哥为例，所有宗教裁判所搞的大型"信仰行动"仪式都在首府墨西哥城的中央广场即索卡洛广场上进行（规模小一些的则在靠近宗教裁判所本部的圣多明各广场，或是宗教裁判所法庭内秘密进行）。在广场上，工匠们会搭建一个特别的平台和露天看台，为显贵教士、市政官员、宗教裁判官和罪犯提供坐席。一般说来，在宣布执行火刑前，宗教法庭要等待有足够多的"罪大恶极"者的"信仰告白"，因为他们希望将行刑仪式的影响最大化。

171

监督平台装饰的宗教裁判所雇员特别注意总督座席的放置，一般都置于后面，仪式场地的中央。虽然西班牙国王和高官们极少莅临火刑场，但殖民地总督却有责任亲临这一场合，因为总督的位席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个场面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火刑宣判被设计成最后审判日的样子。在这一天，耶稣基督要审判一切，还将挑选与他共治天堂的人们：在他右侧的人将进入天堂，而那些在他左侧的人则将被判处永受地狱之火煎熬的刑罚。在新西班牙，宗教裁判官根据罪犯是否已归顺教会，对所有的罪犯进行判决并选择惩罚方式。罪犯分坐在总督的左右两侧，使得耶稣基督在尘世的象征性代表是皇家总督，而不是宗教裁判官。

总督及所有其他显贵一到场，仪式便开始了。先是一篇强调异端和不正统罪恶的布道，然后罪犯们被依次带上平台，面对观众，接着便



宗教裁判所会定期举行对危害信仰的人的公审。这些公审称为“信仰行动”(autos-da-fé),罪人们要戴上表明他们所犯错误性质的彩色帽子,胸前还要挂上写明他们罪行的牌子。世俗和宗教领导人都会参加公审,还有大量民众前来围观。罪人所受的惩罚包括当众穿上特制的长袍接受羞辱,鞭刑,乃至架上火刑架被烧死。

列举他们的姓名、罪行、悔改状况及惩处方式。被起诉者戴着一顶高帽子(coroza),或一顶画有烈火和魔鬼图案的圆锥形高帽,同时穿着一件名为悔罪服(sambenito)的布外衣。悔罪服的不同颜色标志着不同的罪行,带有红色十字架的黄色衣服代表悔罪;而带有彩色火焰的黑色衣服则代表不悔罪。绝大多数被告都服从了教会,以此证明宗教裁判官和母教会的胜利,因为宗教裁判所的目标就是要保护信仰并纠正犯错的人,从而拯救他们的灵魂。

172

然而,拒绝放弃原信仰的罪犯又将怎样呢?他们的灵魂要被永远诅咒,而这是宗教裁判官们千方百计想避免的东西。在审讯期间,法官一直鼓励罪犯放弃自己的异端信仰,忏悔自己的罪行,恳求得到原谅,并重新加入到正统信徒的行列中去。这时的忏悔将减轻惩罚,但如果一个人一直等到信仰告白仪式的最后时刻才宣布放弃原信仰,那惩罚可能会更为严厉。在宏大的悔罪大会上,群众积极地鼓励罪犯放弃原

信仰，否则将会太迟。那些面临死刑的犯人如果在死刑判决书还没有宣读之前就宣布放弃原信仰，将会被中止执行死刑。教士们会继续不停地恳求和引诱那些顽固不化的犯人，甚至当这些人已经向架设在阿拉梅达公园(Alameda Park)里的柴堆(死亡)走去的时候还在那么做。那些行至半路或者甚至已经被绑在火刑柱上面的犯人一旦认罪，便会被轻判为绞死而不是被活活烧死。

坚强不屈的硬汉会引发观刑人群的极大愤怒，人们大声辱骂受刑者并要求市政当局烧死他们。隆重的火刑与绞刑一样，是一场民众的狂欢，人们认为那些绑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的罪犯就是魔鬼，他们应该去地狱。火刑之后，较轻的惩罚接着在市民的嘲笑、辱骂和凝视下执行。

宗教法庭根据罪行的危害程度或性质，犯罪者的性别和年龄，他或她在法庭上的表现，以及及时的忏悔和由衷的悔改，进行处罚和判刑。大约18%的悔罪者皈依了天主教，并宣称真正悔罪，发誓再也不重新犯罪。顺从教会的悔罪方式有：念特定的祈祷词，穿着可识别的服装同时手举一根蜡烛做弥撒或是参加宗教游行。所有的悔罪行动都是公开进行的，目的是要羞辱犯罪者，从而更进一步地教育和警示其他人。从某些方面讲，这些惩罚构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因为这些惩罚执行了以后，可使犯罪之人重新回到基督徒的社会。鞭笞示众是对于重婚者、巫师、亵渎者和不信上帝者的一种常见惩罚。鞭打的数目根据一个人的罪行、性别、年龄而定；50 鞭为起点，最高到 400 下，一般平均为 200 鞭。

较轻的惩罚还有软禁或者服役——如在医院或修道院里干活，为政府或市镇项目服务，或到桨帆船上服役。软禁是一种替代终身监禁的惩戒办法，只限于墨西哥实行，并有一定年限(通常为 2 年)，因为新西班牙的法院不具备实施这类惩戒的设施和资金。因此，软禁一般只适用于那些被判处在修道院里终身监禁的教士，其目的就是使这些人不再重新犯罪或制造公众丑闻。

173

桨帆船，是一种靠帆和桨推动的大船，到船上服役是对有悔改心的巫师、重婚者和不再担任神职的普通教徒的一种惩罚。把罪犯送到这

类船上服役，通常是充当划桨手，但这对于政府来说代价很昂贵，因为必须先要将这些人押送到西班牙或菲律宾。

减刑针对的是那些已被判“缓刑”或依然在押等待死刑的罪犯。受到这种惩罚的罪犯实际上人数很少。譬如，1571－1700 年间的 2 000 起案件中，只有 37 起被直接判刑，107 起被判焚烧模拟人像。大多数巫师都逃脱了即将执行的火刑，而只受到较轻的惩处，如从 6 个月到 10 年不等的流放。

由于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和宗教裁判所缺乏资源，执行强制流放并进行监督是极为困难的。执行流放，罪犯就要被押解到装船地点，等待来船将他们运离殖民地或城镇。在 17 世纪被判流放西班牙的 74 名犹太人中，只有两个人到达了塞维利亚，而其他人则跑到新西班牙总督区的各个地方重新开始了他们生活，有些人甚至还回到了首府。罪犯还必须付罚金，罚金通常与犯人的经济能力相符合。所有的物资罚没都有标准的程序，直到一个人被证明清白无罪；由于必须要向罪犯家属提供一定的生活所需，因此会适当减轻这类惩罚的严厉程度。

宗教裁判所对裁判官的要求非常明确：他们必须吐字清晰、口齿伶俐，至少在公开宣讲、判决仪式，以及他们的守护圣徒殉道者彼得的祭奠日上要如此。按照官方说法，宗教裁判官得到耶稣基督的亲自授权，并一直跟随着使徒和基督教殉道者的脚步。他们在宗教裁判所中的职责就是一挑沉重的担子，一副十字架，这些东西突出了他们本身作为潜在殉教者的身份。此外，他们还像复仇天使，担负着审理、起诉和判决死刑的职责。不过，他们也承认仁爱是影响异教徒或迷途者，并把他们带回基督教怀抱的一种有效方式。

民众对于宗教裁判所的职责的认识相当复杂，难以一言以概之。普通市民一般都接受甚至欢迎宗教法庭在社会中的存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告发他们的同胞。对于处死顽抗的异教徒，民众已然达成共识，但我们不知道，当地居民眼见他们的邻里受到惩罚时会有怎样的感受，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只是被发现依然保持着广为流传的宗教信仰，或者宽恕巫术或亵渎这类行为。当然，墨西哥城的居民们已经明白，大批

告发案件从来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调查过，而且只有最公开、太过分的行为才会引起宗教法庭的愤怒。

174

此外，人们用各种形式的民间讽刺文学和茶馆表演讥讽宗教裁判官，就像他们讥讽其他教士和政府官员一样。人们经常会在别人告发自己之前先检讨自己，这已经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有些人这么做则是出于一种明显的良心危机——这些人感到只有宗教裁判官才能让他们减轻自己对于不朽灵魂的恐惧。最后要记住的是，一旦离开了中部河谷地区，宗教法庭的实际效力就变弱了。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为了逃避宗教法庭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有多少人是移居到了殖民地最边缘的地带。

仔细检视宗教裁判所的案件调查向现代学者打开了一扇窗，我们可以通过它，生动形象地了解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某些宗教状况。如上所述，绝大部分案件(72%)显示，宗教法庭几乎把它们的所有时间都花费在改变民众的宗教信仰上。譬如，亵渎罪就包括了这样一些普通的行为：诅咒，滥用上帝或圣母马利亚的名字，污蔑宗教裁判所本身的特权，不信上帝，乱扔或踩踏十字架等行为，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是重压或狂怒之下做出的无意识行为。

另一大类案件是性犯罪。这些案件都与处女、通奸或贞洁之类的行为和言论有关，其中还包括错误的但很流行的观念——婚前性行为和与妓女的性行为并不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些案例——富有的家庭力求把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嫁给较年长男子，以求保护家庭间的政治和经济联姻。宗教法庭在得知这样的婚事时，会帮助年轻的女孩并插手保护她。巫术案子大都集中在个人身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都企图预知将来或者获得佳偶。

宗教裁判官所认为的最嚣张的异端形式之一就是在忏悔时的性索求。有些时候，神父会在其教区女信徒忏悔其罪恶前后或忏悔当中施压、引诱或强迫她们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宗教裁判所为了发起对这类案件的调查，必须将指控与忏悔形式的神圣性联系在一起。地方主教和大主教对教士们所做的那些浪漫的私通或性混乱之事是要负责任

的。这样,异端便体现在了对思索罪恶、祈请宽恕所必不可少的圣洁与信任的亵渎之中。神父在社会中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因而人们会认为,做忏悔的地方是不会被玷污的。毕竟,神父被看成是神灵和虔诚罪人间的中保人;人们相信,神父拥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执掌上帝恩典的天赋能力,能决定人们在炼狱中涤罪的时间,并帮助人进入天堂。

绝大多数人最为关心的是定期忏悔,他们害怕意外或突然的死亡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在未被赦免前就死去会危害灵魂不朽。因此,神父可以提供精神上的平静和宽恕。此外,神父还拥有即使不具支配性但是依然很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长者、智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西班牙人;因此属于最高的社会等级。神父有着慈父般的形象,在许多情况下是很多妇女们遇到的唯一一个肯专心地倾听她们必须诉说的各式各样事情的男人,包括倾听精神和神学上的问题。

175

妇女们被鼓励在忏悔中倾诉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恐惧,当然也要女子能接受告解神父的忠告和安慰。忏悔时的交谈被有计划地用于调查教区居民最隐秘的思想、感情和梦想。这条途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性方面的问题,因为肉体之罪被看作是社会中最深入普遍的罪恶。这样,这些受神许可的秘密交谈就有可能转变为某些更具亵渎性的东西。天主教会企图规范忏悔,从而限制滥用它的可能性,因而隔出了带有墙壁和屏风的忏悔室,以防止不端行为。

很难确切获知新西班牙殖民地的妇女是如何应对这种对其荣誉和信仰的侵害或凌辱的。西班牙人的最新研究显示,半数受到骚扰的妇女会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害怕和震惊,她们的信仰会暂时,甚至永久地发生动摇。还有一些妇女会猛烈地,有时是暴烈地谴责神父。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其中许多人是家庭暴力或冷暴力的牺牲品,会在宗教裁判所发现此类行为并决定调查此类案件的时候,明显关心和偏帮自己的告解神父,只有在一再的威逼之下,才肯作出不利于后者的证言。

在性案件中,也会出现被指控犯重婚罪的人,虽然这类案件的数目很少,却显露出了家庭生活和道德伦理某些方面的新动向。绝大多数

犯重婚罪的人是西班牙男人，但根据当时的文献，妇女和混血种的人数也不少。这些案件的审判描绘出一个流动性相当大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个人为了寻求经济机会，移民外出或移民内居，留下了配偶和家庭，后来又在教堂里再次结婚。有些男子参加了军事行动、探险远征，或殖民行动。有些人成为巡回商人或简单地暂住在盛产白银的新兴小镇之中。因为种种缘由，许多人没有回到他们的原配身边。大部分犯这类罪的人都宣称，他们认为自己的第一个配偶已经故去，虽然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来确定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还有一些人宣称，他们第一次婚姻的环境不正常，譬如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结婚的，因而那段婚姻是无效的，他们觉得可自由地再次结婚。

在许多案子中，墨西哥殖民地社会非常典型的亲密无间对揭露重婚者的表里不一起了大作用。陌生人很可能结伴出游，或者聊天打发时间。谈话一般以询问这些问题开始：出生地点、亲戚和有联系之人等。在这些不同方式的天真无邪的谈话过程中，重婚者的秘密可能就会暴露无遗。一般的群众对这类双重婚姻持模棱两可的看法，而特别关心此事的市民则会迅速向宗教裁判所的代表报告可能的重婚案或一夫多妻案。 176

有官方记录的婚姻大概只占所有婚姻的近一半左右，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习惯法的婚姻是大众阶级常见的选择，它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直到 1545 — 1563 年的特伦托公会议改革中，天主教会强调神父主持婚礼的权力之前，许多男女结合都是由家族、邻里和普通社区安排的。历史上，当众立誓被看作是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被大家所承认。只有统治阶层或有钱人才求神父出席并主持仪式。习惯法婚姻中的人如果有财产，可以请教会确认其婚姻的合法性，以便使他们的子女成为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以墨西哥为例，殖民地时期，在神父面前和教堂中结成的正式婚姻一直在增多，这也证明早期的改革取得了虽然缓慢但也不可忽视的成功。很明显，平民们逐渐认为经由宗教仪式缔结的正式婚姻是一种理想婚姻，其他配偶的存在将损害其价值。

家庭和婚姻是绝大多数人最关切的问题，但新西班牙天主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存在女性宗教人员。墨西哥殖民地修建了成百上千座女修道院，特别是在17世纪。然而，要获得基督之女的称谓却必须是西班牙妇女，不管她们是土生白人，还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白人。一直到1723年，才专门为上层土著妇女修建了一座女修道院。年轻姑娘因各种因素而渴望过一种隐居的生活：希望去侍奉上帝；希望远离结婚的压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日夜敛心默祷；希望获得教育或者继续自己的研究。

虽然有些妇女是因失去贞操而被家庭成员安置在女修道院中的，但一般说来，大多数修女都是主动自愿地进入修道院的。尽管有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姊妹或女儿是一种荣誉，但一桩幸运的婚事能够使家庭的社会经济财富变得更多，因此有些妇女为了进修道院而同顽固的父兄斗争多年。

所有的女修道院对进院人员都要求交付一笔神职款，以维持修道院和它的宗教使命，以及修女们的福利。大多数高级的修道院要求很高数目的捐助，修道院用其投资房地产，特别是城市地区的联体公寓。修道院一般置于某个特定修会或主教的监督之下，但它们在财务上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虽然所有的修道院都要求纯洁、服从、远离世俗世界，但富有的修道院却一点儿都不遵守这些准则。在某些女修道院里，妇女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不顾惯例对于着装的任何要求。修女们还有一大批随从人员和收藏丰富的图书室。她们居住在带有小厨房的成套房子里，而不是简陋的单人房间里。有些女修道院经常用吟诵会和戏剧演出来款待地位显赫的男性神职人员。

177

财务上较为正派的修道院既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政治实力来维持这种奢华的形式，但它们因对穷人行慈善以及能从事烘焙糕饼或制作糖果等特定事业而变得出名。尤其在盛大的节庆，如新任总督或大主教就职仪式期间，这些修道院便可获得相当大的利润。修女们还将担任育婴堂的看护、管理学校、在医院中服务作为维持自己生活和做慈善工作的一种手段。

某些神父被选作告解神父和精神导师，结果与他们的教会姊妹间产生了一种亲密关系。有些人甚至跨越了底线而发生性关系。不过一般来说，告解神父和修女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洁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会导致许多美妙的文学作品问世，它们被称为精神传记(spiritual biography)。

一种目的明确、广受欢迎的与上帝充满狂喜地进行交流的神秘传统，是被教会接受并受到鼓励的，在某种程度上还被用来确定女修道院的灵性。修女们斋戒，身穿粗布衣服，沉溺在自我禁欲之中，连续数小时地不停祈祷。她们体验到了耶稣基督或圣母马利亚令人着迷的幻象，他们慰藉、激励和忠告修女们，从而更进一步加强化了后者对斋戒、祈祷和沉溺于自我禁欲的向往。男性神父有独特的机会通过倾听告解来分享这些体验。一位挑选出来的圣洁修女向某个神父忏悔，便能增加神父的权威；有些人甚至挑选出有神秘能力的修女来倾听神父们的忏悔。

看到幻象的修女们被命令去描述她们的幻象和生活。这就成为“精神自传”(一种几乎包罗万象的女性作品形式)这一文学体裁的基础。(修女们还创作了祈祷诗、祈祷文、节庆日上演的戏剧作品。)虽然这些自传是在男性指导者关注的眼睛下写成的，但修女们还是有机会进行自我发展，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因为归根结蒂，她们掌握着自己神秘体验的叙说或描述，并因她们与上帝的关系而受人尊敬。最后出版的作品是由男性作者执笔的，其中大量采用了修女们的叙述(通常是对自己神奇体验的描述)。男性作者将修女述说的关于修道院的，或者是与告解神父间的任何难事一律删除了。

这些精神传记反过来又成为殖民地家庭的一种常见特色，至少在土生白人那个阶层是如此，它们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修女们亲口承认在进入修道院之前就阅读过这类材料。精神自传往往要遵循圣徒言行的指导，并用来当作其他妇女虔诚性的文化榜样。因此，这种被庄严赋予的灵性在修道院之外也变得十分有名，并影响着关于女性虔诚的流行观念。教会还出版了许多有关敬神方法的指导书，或是显圣时接

178

收到的特殊祈祷文。

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见到对作为一种女性灵性形式的神秘途径的接受；在新西班牙的天主教中还可见到大量的“受赐福妇女”(beata)，也叫圣洁之女。她们最早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当时正肩负着教化年轻土著妇女的责任。表面上，她们竭力模仿神秘修女进行狂热的精神奉献，但实际上保持着很大程度的自治，因为她们的誓言是自己决定的。这就意味着许多圣洁之女并没有苦修，没有沉溺于禁食，也没有从事修女们所做的慈善工作。许多人很穷，也缺乏手段收集一笔给修道院的捐赠，但即使如此，她们还是与其他圣洁之女生活在一起，并以这种方式力求模仿修道院生活的精华。

金钱上的考虑迫使许多没有赞助人的圣洁之女在外工作以养活自己，那种赞助习俗在那些有一位教会追随者的人们中间是特别常见的。和她们隐居的修女一样，她们也体验到入定和恍惚入神，据说也能直接和神灵交流。然而，圣洁之女又不同于修女，她们积极地忙碌于外部世界之中，如看病或预言，要求或期待(并收取)食物或金钱捐赠。实际上，她们中有许多人成为了她们所在社区的精神顾问，并受到相应的尊重。她们的邻里相信她们拥有来自上帝的特殊才能，她们的存在给社区带来了神的恩惠。由于这些世俗活动及她们没有受到男性教士严密监视的事实，许多圣洁之女成为宗教裁判所注意的对象。她们比修女更可能被指控伪造神启和幻象煽动迷信，并以此中饱私囊。

事实上，新西班牙的第一例关于光照派(Alumbradismo，相信或宣称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特别的个人启示)的案子发生在1598年，被控告者是一名叫玛丽娜·德圣米格尔(Marina de San Miguel)的圣洁之女。光照派在16世纪早期与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个特殊教派有关。该教派的少数信奉者从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移居墨西哥，也把这一宗教运动传到了新大陆。在宗教裁判所看来，光照派总是将性放纵与异端教义结合在一起。

该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叫格雷戈里奥·洛佩斯(Gregorio López)的圣洁隐士，他住在总督区首府之外。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相

信天主教的肉体禁锢和宗教仪式,而是强调个人交流和内在神性。他们坚信天启世界观,自认为是被选中居住在新耶路撒冷的完美之人。玛丽娜作为一位在自己社区受尊敬的圣洁之女,是该教派的梦幻家。她允许放任,并取消了神父的宗教誓言。她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天主教会作为中保的价值。此外,她和与其同派的信徒都相信,由于她们是纯洁的,因此她们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性活动而不用害怕会堕入地狱。

179

可以确定,其他圣洁之女看起来非常圣洁,并被教会高层所承认,因此与宗教裁判所间没有什么冲突。其中最好的例子是著名的"普埃布拉中国女"(China Poblana)卡塔莉娜·德圣胡安(Catarina de San Juan)。她来自印度,后在葡萄牙人的奴隶贸易中被贩卖到新西班牙,最后来到普埃布拉市定居。直到1688年去世,她一直处于有权势的耶稣会士的保护之下。她为整个基督教社区祈祷,过着一种隐居和苦修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幻觉。她对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人物的灵魂进行预测。她的例子证明,特别在17世纪,民间自发的侍奉上帝的大型活动是能够在圣洁之女这样的人物周边发展起来的。卡塔莉娜的画像还出现在家庭祭坛上,她的居所成了一块圣地,人们会前往朝圣。接受过她的忠告并分享她的幻觉的耶稣会士积极地推举她为圣女,但这一努力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作为对民间册封"圣者"进行严厉打击的一部分,她的"圣地"最终被拆除,她的画像也被没收。但是这类民间造圣运动有许许多多,并成为墨西哥殖民地巴洛克式宗教虔诚的一大特点。

18世纪将改革的浪潮带到了墨西哥,这些改革措施对天主教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形成了挑战,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市民的宗教习俗。在改革的时候,就连宗教法庭也无法不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波旁王朝时代的发展,宗教裁判官越来越难以完成他们规定的使命。由于启蒙思潮、历史著作的出版以及美国和法国引起争议的革命的出现,反对异端的斗争愈发受挫;政府的政策培育出了一种向往独立的社会环境。

宗教裁判官们力图禁止政治哲学著作和任何存在挑战政府理论的书籍,以免殖民地居民受其"蛊惑",将普适的政治理论应用到特殊的殖

民地环境之中。禁书名单的开头就是有关法国革命的小册子。宗教裁判所一直是一个政治机构,而且总是把异端视作为叛国,但此时相比以前更多地把异端分子与社会革命者等同起来,这些人不仅危害他们邻里的灵魂,而且还危害整个政局的稳定。因此,在王权控制不断加强的波旁王朝时期,宗教法庭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王权至上的得力工具,专门迫害政治改革者和异端造反派。但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在外交和军事结盟上的变动,使得惩处外国异端分子和防范政治思想变得十分困难。

此外,由于王室和教会当权人士采取哲学上的折中主义态度,从而很难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可接受的东西。正式认定的正统特性也总是处在变动不居和模棱两可的状态。宗教裁判所权威最大的崩塌发生在边境地区,它在那里的力量一向是最薄弱的。效率低下的一个结果,就是宗教裁判官们对他们管辖的事务以及自己机构的尊严都变得十分含糊。随着时间的流逝,宗教裁判所遭到了启蒙主义反对派越来越多的重击。宗教裁判所应对这些大问题的无效,也弱化了该机构影响民众信仰的能力。

180

波旁当局还打击了其他以消极态度影响民众文化的教会机构。为了加强和巩固王室对殖民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控制,18 世纪的改革者对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威发起了攻击。天主教会不仅扮演着个人和上帝间第一中保人的重要角色,而且已成为殖民地最重要的经济机构之一。譬如,自一开始,教会就成为虔诚、有雄心和政治野心的人追求社会地位和获得受教育机会的主要途径。对于墨西哥殖民地中的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无论男女)来说,事情必然是如此。然而到了 18 世纪,法令限定了任命教士和兴建新男女修道院的数目,这样便切断了这种职业道路。这种情况发生在人口增长时期,正好是最需要教士和修道院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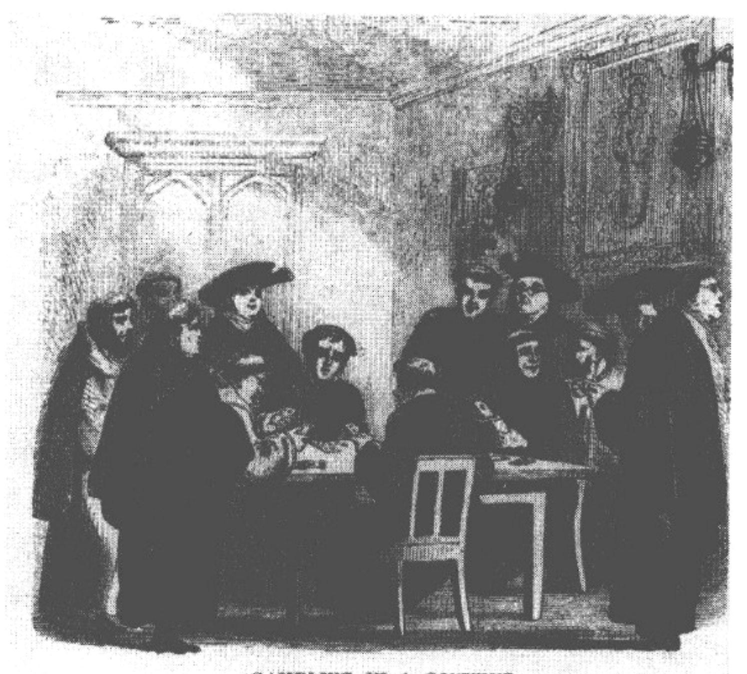
此外,政府针对教士们具有特权的社会地位采取了两项措施:取消教会的"福埃罗"(即特殊的法典和专门的法庭),同时颁布皇家婚姻敕令,加强父母对于成年子女婚姻的权利。第一项法令取消了教士犯罪可不受世俗法庭起诉的惯例,使教士和市民在法律面前至少理论上是平等了。现在,市民可以旁听教士公开受审,并依据民法被判刑。当

然，这些做法让教士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损害，尽管教区居民早已知道教士也参与赌博，过度酗酒并公然不遵守自己的独身誓言。

皇家婚姻敕令禁止教会官员干涉青年恋人与父母之间在选择结婚伴侣问题上的争执。根据新的法律，由政府对所有这类案件进行裁决，并几乎无疑地再次肯定了父权观念，即父母对自己子女有监管权。通过这些举动，政府轻蔑地践踏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心原则之一——自由意志学说，并且还限制教士在婚姻事务中解释该项学说的能力。

对于一般居民更为不利的后果是颁布了大批法令来“清理”民间信仰，或者将其现代化。承担了大半地方公众祭祀任务的各种宗教团体都要接受审查。那些没有正规执照和许可证的教友会正式被取缔，不过许多团体提出了上诉，并企图不待王室批准就开展他们的宗教活动。

181



GAMBLING IN A CONVENT.

教会当局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士们是否行为不端。规范他们行为的措施包括：编制行为手册、颁布官方指令，以及宗教裁判所进行调查。这幅素描图描绘的是，一个外国旅行者报告的韦拉克鲁斯哈拉帕的方济各会修士聚众赌博的场景。这位旅行者指控这些方济各会修士一边玩牌，一边还喝酒，爆粗口。

这种情况在边疆地区(如新墨西哥)特别多,因为那些地方缺少教士监督和调查这些教友会及其成员的活动。此时,宗教游行和宗教节日已被当作庄严的事务来庆祝,不再有跳舞、娱乐和斗牛。艺人们被强令要穿戴得体地表演适合宗教节日的节目。那些虽然在礼拜历法上很重要,但看上去轻佻而带有亵渎性的宗教节日在西班牙人的城市中心都完全被废除了,特别是亡灵节和首府墨西哥城的美洲土著狂欢节。

一般来说,在18世纪,土著人的公开祭拜仪式都要接受审查并最终受到攻击。波旁王朝的官员禁止土著人参加这类由来已久的节日欢庆,如墨西哥城圣体节时的圣树搭建和装饰。更重要的是,当局发起了一场旨在取消土著人城镇中大型保护神节庆祝活动的运动。新的王室法令命令土著人要将原先用于节日的国家税收用来建造学校并雇请教师来教育土著儿童,并特别强调一定要用西班牙语进行教学。土著人的头领把这一王室干预看作是对自己的宗教虔诚、信教传统及土著文化的一种攻击。贯彻执行新法令的乡村教士面对的是极大的仇视,甚至是反叛,因为他们教区的土著教民拒绝遵守这些法令。

宗教裁判所已经尽力地监视内心信仰及其外部表现,但波旁王室却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者身上,力图通过颁布法令来规定"现代"宗教虔诚的外部表现。他们也完全不理解千百年来文化和宗教相互作用的力量。民间宗教信仰从来就没有受到有效和成功的挑战。同时代的墨西哥民间信仰是深深扎根在这些传统中的,这些传统在殖民地时期又得到了发展和升华。时至今日,圣徒崇拜、节日、圣徒对于社区和个人需要的中保角色的力量,仍像16世纪晚期时一样。每年5月15日,一些村民依然抬着农民的保护者圣伊西德罗(San Isidro)的雕像走到田野之中,使他为他们的庄稼祈福,从而确保一场丰收。每年12月12日,数百万人沿着"奇迹者之路"(Calzada de los Misterios)行走,表达他们对瓜达卢佩圣母的崇拜和履行对她发出的誓言。草药和传统医学依然兴旺,例如制作春药。查穆拉的玛雅人用宗教游戏来庆祝狂欢节,

182

这些游戏重现了一部分前哥伦布时期的古老书本《波波乌》(*Popol Vuh*)中描写的创始神话。庆祝活动还包括抬着天主教的圣徒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神灵雕像一块游行。就在那个查穆拉村,天主教神父曾试图改变那里土著人的传统,结果被有礼貌地赶出了村子。

第六章　印第安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罗伯特·W. 派奇(Robert W. Patch)

183　墨西哥土著居民对西班牙的殖民者采取了反抗和融合并存的态度。事实上,各种形式的融合也影响着土著居民的反抗性质,正如当印第安人屈服于殖民统治时,他们学会了利用西班牙的法律制度反抗统治者。更有甚者,当他们被迫信仰基督教时,他们反而从陌生的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革命思想,并最终把他们的矛头又指向了外国入侵者。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反抗所涵盖的内容和意义一直在变化。

与此同时,反抗也是含义相当宽泛的术语,如果不加定义,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可以算作反抗:上至暴力叛乱,下至平日里的嘲笑和白眼,从而使整个印第安人史等同于一部反抗史。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对反抗的定义相对较窄:反抗是指我们目前可以辨认的,印第安人出于本性反对殖民统治和阻挠殖民者活动的行为和思想。这一定义不包括基于阶级差别而进行的一些反抗(例如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庄园工人与老板的冲突,等等),因为这些反抗行为未必是殖民主义的后果。

但实际上,印第安人的反殖民主义行动有时会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或工人运动相重叠,而我们也很难将阶级斗争与殖民反抗相区别。因为殖民主义的其中一个影响是将一个包含着各个阶层的土著社会转

变为一个大型的农民阶级，因此，农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印第安人的反抗活动。我们的定义已经足以覆盖墨西哥土著居民史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反抗殖民主义也是印第安人在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生活的核心部分。

184

墨西哥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了解这种多样化对理解墨西哥历史的所有方面，包括印第安人的反抗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关于南北墨西哥的划分。在北纬20度左右，墨西哥城以北75－100英里处有一条分界线，将墨西哥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墨西哥南部和尤卡坦半岛是前西班牙时期所有著名的墨西哥文明的发源地；而墨西哥北部，甚至在阿兹特克时代还被认为是“奇奇梅克之地”，即那些游牧的“野蛮人”的家园。但这些游牧民族有时会反抗阿兹特克的扩张，甚至袭击南方部落。

墨西哥南北部对殖民者的反抗形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南方，土著居民已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或通过与殖民者谈判而主动投降。南部的印第安经济达到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每年有大量的农业产品剩余，包括食物（玉米、豆类、蔬菜、火鸡）、可可（中美洲盛产）、棉花和棉纺织品。西班牙人若要从当地的经济形式中获益，保存土著居民原有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因此，西班牙皇室通过三种主要形式保持当地社会的已有形态。

第一，西班牙人通过承认土著统治阶层在殖民地体制中的合法贵族地位，帮助巩固其在土著社会中的合法权利，以此来赢得土著统治阶层与殖民政府合作。南部早已形成了以强势领导人为核心的社会传统，而且南部的土著社会一直保持着这种以领导人为核心的社会状态：政府机构在颁布政令、维持秩序、征收税款和维护权威方面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换句话说，印第安人已经习惯了服从由领导人安排的生活。

第二，逐步保存印第安人本土经济，并将当地的经济盈余以贡品或非正式赋税的形式交付给委托监护主、神父或王家官员。西班牙王室批准了关于土地使用的土著所有权制度，因此土地可以由私人、家族或

亲属私有，或者以社区共有的形式存在。西班牙殖民者承认印第安人是他们所使用的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尽管对“使用”一词的定义一直有待商榷），同时允许他们将农村土地出售给他人。

第三，为了保护当地居民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侵犯和虐待，西班牙王室于16世纪后期建立了印第安常设法院（General Indian Court）。该法院的运作经费来自当地税收，主要目的是为当地土著村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并允许土著居民起诉西班牙人以捍卫自身的利益。不用多言，西班牙王室颁布的这些殖民地政策并没有阻止西班牙殖民者虐待南部的土著居民或强行占用其土地，但其至少尽量减缓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掠夺步伐。因此，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仍旧拥有很大一部分的农业用地。

185



美洲土著种植玉米、豆类、南瓜和辣椒作为主食；直到今天，它们仍是墨西哥人主要的食物。这幅幻象画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形象与规整的欧洲建筑物结合在了一起。

南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使得等级分明的土著社会在殖民主义时期得以延续，同时也对印第安人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高度的组织性和对本土权威的尊重，使南部的印第安人可以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抵制欺压。事实上，在殖民主义时期，南方发生过几百次反抗殖民主义的起义。另一方面，殖民主

义者早已破坏了当地在前征服时期的统治形式,分裂了其政治体系,把层级分明、体系完备的土著政府分成了多个独立的小型政治单位。通常情况下,一个政治单位包括一个主要村镇(cabecera),以及一个或多个被称为"大农庄"的独立定居点(auxiliares)或联合定居点。因此,由某些当地原因引起的起义通常只发生在本地,很少波及其他乡镇或定居点。此外,当地的农民在起义前后常会向当地法院寻求保护和帮助,与此同时,法院也能起到遏制起义传播的作用。

所以,尽管南方发生了大量的起义,但其规模都不大,只有少数几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1712年的策尔塔尔(Tzeltal)玛雅人起义和1761年的尤卡坦玛雅人起义席卷了整个南方的殖民地,要求恢复土著人的统治权利。这两起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被定义为革命。

墨西哥北部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有其鲜明的特色。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之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其生产力远没有达到南方的水平,每年很少有剩余产品。大多　186
数情况下,北部的印第安人还要依靠狩猎和采集野果来作为其经济来源的补充。由于每年饥饱不定,随时都有粮食短缺的危险,北部的印第安人对充裕的食物有了强烈的渴望。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当耶稣会和方济各会带着大量的食物到来并许诺如果印第安人合作将提供长期食物



在他的《新西班牙地图》(Mapa de Nueva Espana)一书中,特奥多罗·德布莱(Theodoro de Bry)加入了一些有关新西班牙殖民地的人民和动物的浪漫主义绘画。

供应时,当地的大部分印第安人会被吸引前往由这些修会建立的西班牙传教区。当然,传教士带来的还有纪律和处罚。因此,当地的印第安人也不得不去习惯被鞭打加接受教义灌输的生活。

尽管之后的新加利西亚和墨西哥城以北地区的土著居民也最终服从了委托监护制度,但委托监护制度在南部远没有其在北部来得重要,涉及的印第安人口数量也比北方少得多。在更北部,比如新比斯开,委托监护制度等同于强制劳动制度,就像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等地一样,因为以上地区的生产力实在低下,殖民宗主国西班牙无法通过贡品的形式从中捞取半点油水。某些北方的印第安人属于游牧民族,但多数已经定居下来,西班牙人称其为农场工人(rancherias)。这些定居点的规模和人口密度相对南方来讲都要小得多。正因为北部分散且生产力低下的经济状况无法支撑起完整的政治体系,加之各部落纷纷分裂成小的政治实体,且其领导人均是选举产生,缺少南部世袭贵族的绝对权威,北部土著小邦的实力相对南部显得薄弱许多。

但是真正的边境战争却在北部打响,它通常被称为"剑与火"的战争。西班牙人摧毁了土著居民的定居点,奴役被俘虏的印第安人,那些俘虏常常被施以酷刑并折磨致死。大量的土著居民在类似的战斗中丧生,但他们却很少缴械投降,真正被征服。相反,最终是殖民地的总督做出让步,并向印第安人摆出和平的姿态:他们给印第安人购买了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物品作为"礼物"。在北部,西班牙人和土著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像南部一般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尽管有时会要求土著人允许基督教的传教士进入定居点传教,但更多时候,神父只有在受到邀请后才能进入。印第安人也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西班牙在北部设立的永久边界意味着,只要土著居民愿意,他们可以随时选择离开或进入殖民地,而大多数土著居民也和更北方的完全独立的印第安人保持着联系。因此,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很少被西班牙化,也比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了更多印第安习俗,甚至还保存了一些未被殖民主义触及的土著文化。

187

然而不久以后,西班牙人马上在墨西哥北部取得了成功。大量矿

藏的发现，尤其是银矿的发现，吸引了包括勘探者、矿工和冒险者在内的大批淘金者。为了巩固西班牙在北部的殖民统治，他们从墨西哥南部的殖民地带来了大量殖民地居民（通常是阿兹特克地区或特拉斯卡拉地区的印第安人），通过建立农业定居点来维持永久殖民统治，并宣传典型的定居点模式。紧接着，西班牙殖民政府还建立了被称为“要塞”(presidios)的军事殖民地，以防范印第安人对新的殖民领地的攻击。要塞由西班牙人和西印混血种人管理，这些管理者通过服兵役来获得大量的土地。最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传教士，尤其是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

北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与南部有很大的不同。北部的印第安人很少在一个地点永久定居，因此西班牙文化多是通过互动而不是强制的形式影响土著居民。相对南部的印第安人，北部的印第安人很少屈服于强大的统治者或殖民主义管制，对自己的文化也有着更多的控制权。印第安人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也使得当地的反抗常常只限于个人层面，但一旦突破了个人层面，北部印第安人的起义相对于南方无数个小型起义就更为有效，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也更具威胁性。

随着时间的不同，反抗的内容和形式也都在发生变化。殖民主义初期发生的起义及强加的殖民统治与之后一两百年内发生的起义和殖民统治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印第安人，或生长在殖民主义刚入侵阶段的印第安人，很少受到西班牙宗主国文化的影响，大多数起义者都能清晰地回忆起西班牙到来之前的生活。因此该时期的起义常常不做任何文化上的让步，即起义者们要求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并对与西班牙有关的一切事物，从天主教到橘子树，都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接触在印第安人身上起了作用。当地的土著居民从殖民者那儿学到了各类事物，而他们对殖民入侵前的生活只残存着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印第安人开始崇拜欧洲文化，开始把天主教的许多做法看成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殖民主义进入墨西哥一两个世纪后，印第安人的起义便不再试图推翻一切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相反，晚期的殖民地起义经常 188

会将西班牙和印第安文化两相结合,并形成独特的混合产物。

虽然殖民主义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很多具有显著印第安特点的文化在殖民主义时期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印第安人的语言、宗教和历史观念。印第安语让印第安人筑起了一个西班牙人无法进入的世界,而土著宗教,尽管有了基督教的影子,却还是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他们的宇宙观,即印第安人对天堂和人类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理解。很多印第安人相信历史不是沿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行,而是以圆周的形式在进行周而复始的运动,因此,西班牙的统治最终被推翻,西班牙人也终有一天会臣服于土著居民。因为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过去也会变成未来,所以"好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这样的信念带有革命的潜力,使印第安人安于接受痛苦的现实,因为他们相信印第安人时代终究会到来。

接下来,我们将选取印第安人殖民反抗历史中较为重要并反映反殖民本质的起义,进行分析评述。除了暴力起义之外,印第安人也通过一些非暴力行为和日常活动来反对殖民主义,但考虑到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力量的悬殊,这样的反抗更相当于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定义的"弱者的武器"(the weapons of the weak)。

对殖民主义的大规模反抗常常爆发于殖民入侵初期,参加起义的大部分印第安人还能记得西班牙入侵之前的生活。其中,以1540—1542年在新加利西亚(尤其是现在的哈利斯科州、纳亚里特州[Nayarit]和萨卡特卡斯州南部地区)爆发的米斯通战争和1546—1547年在东尤卡坦半岛爆发的库普尔起义(Cupul Uprising)对西班牙在墨西哥统治的打击尤为沉重。而这些也正是印第安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最后的也是最佳的时机。

新加利西亚的前身在1531年被置于臭名昭著的努尼奥·德古斯曼(Nuño de Guzmán)的统治之下,古斯曼在该地区(卡兹坎[Cazcan]、特乌尔[Teul]、特奎克斯[Tecuex]、托纳拉[Tonalá]和其他地区)的暴行激起了无数土著居民对西班牙的仇恨。1540年,为反抗经济勒索和强制劳动,起义爆发。北方非殖民地区(可能是萨卡特卡斯地区)的土

著巫师的到来,则成为这场起义的催化剂。这些巫师在这个地区散布言论说:旧神将要恢复其统治,如果人们放弃信仰基督教,神将会赐予他们其祖先一直梦寐以求的丰盛食物以及绿松石和羽毛等贵重物品;老人们将会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而且人人都能长生不老;男人们不用再受西班牙传教士的约束遵守一夫一妻制。而那些坚持信仰基督教的人将会永远失去光明,并被野兽啃食。总之,巫师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基督教的战争。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巫师们选择在1540年的圣诞节揭竿而起,因为西班牙人在这天都忙于过节,无暇过问印第安人和殖民地政事。189

这些传统宗教的使者成功地煽动了那些被迫顺从西班牙统治和基督教教义的土著居民。由于过去的20年惨遭瘟疫之苦,死亡幽灵一直在印第安人的身边徘徊不去,巫师们给出的"长生不死"的承诺对于当时的土著居民而言就显得格外诱人。参加起义的有来自特拉特南戈(Tlatenango)、胡奇皮拉(Juchipila)、哈尔帕(Xalpa)和其他许多瓜达拉哈拉北部村庄的头人。起义军在纳亚里特州的一座名为特佩斯蒂塔奎(Tepestitaque)的山峰上建立了一个要塞,在萨卡特卡斯的一座名为米斯通的山峰建立了另一个要塞,而前者传说是旧神重现之地。

由于巫师的行动相对隐秘,所以初期的起义并不是特别激烈,但随着各个村的头人的加入,信徒们开始攻击,有时甚至杀害那些不幸居住在无防御设施的乡村地区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黑奴。这之后,殖民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米格尔·德伊瓦拉(Miguel de Ibarra)上尉组建了一支由17个西班牙人和超过1 000名印第安人组成的小型军队。但就在伊瓦拉向特佩斯蒂塔奎行军的途中,他的盟军不是突然消失就是提前倒戈,将他的军队引向一个又一个陷阱。印第安人击退了伊瓦拉的进攻,并迫使其退军。这次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起义军的威望,起义开始扩展到更多的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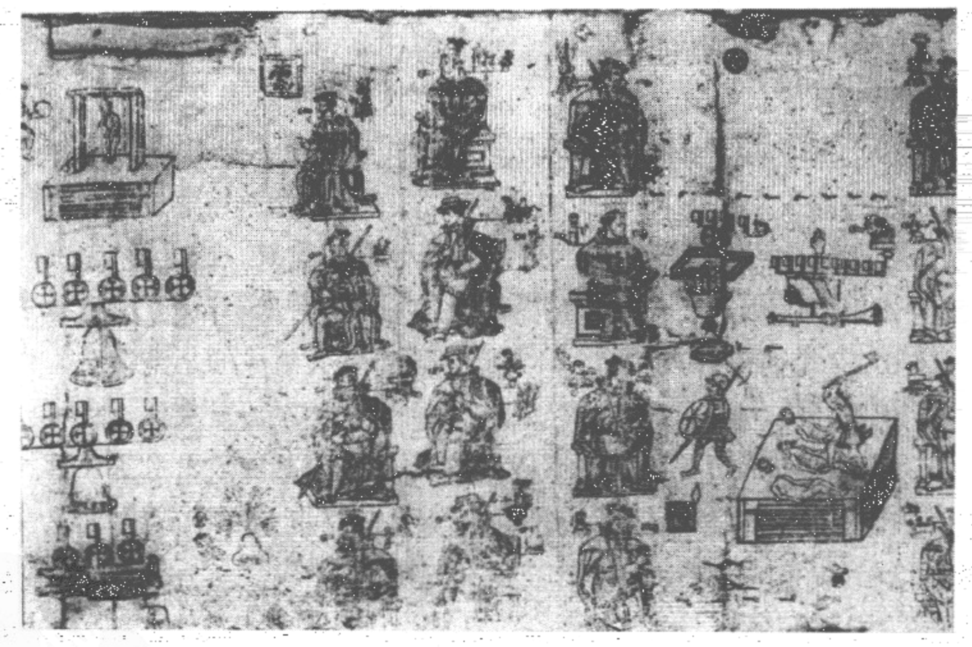
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在瓜达拉哈拉咨询了当地的一些印第安部落领导人之后,决定组建第二支军队,并由克里斯托瓦尔·德奥尼亚特(Cristóbal de Oñate)领导。该军队由超过50名西班牙骑兵、炮兵和

许多印第安联盟军组成。1541年4月，他们准备袭击米斯顿要塞。印第安起义军对西班牙军队采取了前后夹攻的战术，使西班牙军队死伤无数，被迫撤退。起义军再次击退西班牙军队的消息鼓舞着其他印第安人相继投入起义的队伍。在哈利斯科北部的山峰上，起义军在诺奇斯特兰(Nochistlán)和科伊纳(Coyna)建立了更多的军事要塞。与此同时，起义还扩大到了瓜达拉哈拉以西的地区，好几个西班牙人聚居区被包围。

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门多萨下令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他还向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寻求帮助。阿尔瓦拉多是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的得力干将，也是危地马拉的征服者，当时他恰巧和一支军队在西海岸执行航行考察。经验丰富的阿尔瓦拉多带领着他的考察队在诺奇斯特兰与起义军相遇，但不幸遭到重创，阿尔瓦拉多本人也在战斗中丧生。

打败著名的阿尔瓦拉多一役极大地推动了起义的进程。很多奇奇

190



《特拉特洛尔科手稿》为我们提供了一份1554年前直至1562年后当地人民和事件的图像纪年。其中有关人物和事件的图像非常引人注目，有些画面还表现了米斯通战争。

梅克人也纷纷南下参加了这场起义。在把西班牙军队完全赶出哈利斯科以后，大批的印第安军队开始围攻瓜达拉哈拉并几乎占领了该城。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变得岌岌可危，当地的西班牙妇女也开始加入到这场战斗中，这也是西班牙占领墨西哥以来遭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威胁。

到了9月，总督门多萨不得不亲自出马，率领包括攻城炮队在内的大部队迎战起义军。门多萨的部队很快就侵入了哈利斯科北部地区，并包围了印第安人在科伊纳的要塞。与印第安人和平谈判失败后，门多萨发动进攻，并在两个星期后拿下了该军事要塞。在找到起义军偶像崇拜和活人献祭的蛛丝马迹之后，门多萨使用了被西班牙人称为"示范处罚"(exemplary punishment)的方法，也就是处死他手中的印第安人俘虏或将其卖身为奴。此举使该地区的其他印第安人纷纷投降以求得特赦的机会。此后，西班牙军队开往诺奇斯特兰，围攻并最终拿下了该要塞。

门多萨的下一步行动是攻打印第安人的最后一个大本营——米斯通。一支由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对门多萨军队的前方和后方进行了袭击。由于西班牙的军队十分强大，袭击没有成功，印第安人被迫退回了其军事要塞。不久，在炮兵队的支持下，门多萨再次组织了一次正式的围攻。最终，起义军中的某些印第安人为了得到殖民军的特赦而背叛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将西班牙军队引上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秘密小道，终使西班牙人攻破了米斯通的防线。此时的门多萨发现，这次起义已经不再会对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产生太大的威胁了，因此他放走了许多印第安人，并散布了殖民军队战无不胜的传言。米斯通陷落之后，门多萨发现迫使印第安人投降比与其正面交锋容易。1542年初，起义结束。

但是，起义就像是一团野火，一处刚刚扑灭，在另一处又开始熊熊燃烧起来了。米斯通战争后的第四年，在远离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尤卡坦半岛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库普尔起义，该起义的起因与米斯通战争极为相似，同样撼动了西班牙殖民政府在墨西哥的统治。

191

尤卡坦半岛东部的玛雅人组成了几个分别名为库普尔、科丘阿(Cochuah)、索图塔(Sotuta)和乌艾米尔-切图马尔(Uaymil-Chetumal)的小土邦,它们二十多年来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入侵,直到尤卡坦半岛中部的玛雅部落成为西班牙的盟友后才投降。因此,东部的印第安人记得他们过去对抗殖民主义的成功经历,也对殖民主义加在其身上的经济负担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土著的巫师在这次起义中再次成了催化剂,他们使很多土著居民相信,跟随宗主国而来的天主教最终会威胁到玛雅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成千上万的玛雅人死于疾病,四处蔓延的疫情也使当地居民产生了回到过去的渴望。

本次起义的爆发与米斯通起义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这次起义是由尤卡坦半岛东部甚至中部地区能干的玛雅人共同领导的,是场有组织、有领导、有预谋的起义。他们在 11 月的第一个月圆之夜(1546 年 11 月 8 - 9 日)揭竿而起。和新加利西亚地区的起义如出一辙,玛雅军队轻易地杀死或抓获了在农村做生意的西班牙委托监护人和他们的仆人。库普尔地区的玛雅人在这场起义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们的行动有时也接近疯狂,比如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将他们的西班牙领主折磨致死。该起义同时还杀死了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因为不愿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遇害;还有一部分则是从墨西哥中部作为西班牙盟军赶到尤卡坦半岛来的纳瓦人。这场起义摧毁了所有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人、动物(包括猫、狗、马、牛和猪等)、植物,甚至包括方济各会种的树。总之,这是一场毫不妥协的运动。

攻击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标志着库普尔人将起义带到了库普尔所在地区的西班牙城镇。整个城镇中的宗主国居民只有一半幸存,大约 22 个,其余的全被起义军杀死。然而巴利亚多利德的西班牙男女和他们的印第安同盟军仍旧誓死抵抗,于是起义军决定包围这座城镇。

令西班牙人感到幸运的是,西班牙人最为集中的梅里达(Mérida)地区的玛雅头人为了等待关于东边起义的消息而推迟了在该地采取行

动的时间。因此在土著头人发动起群众之前，梅里达地区的西班牙人有时间把他们逮捕关押。没有了首领，尤卡坦西部的玛雅人就不可能参加这次起义，而梅里达地区的殖民官员也有了充分的时间组织起一支营救巴利亚多利德的部队。巴利亚多利德在被起义军围困了几个星期之后，城内的居民基本上已经穷途末路。由大约40个骑兵和500个印第安人组成的同盟军踏上了营救巴利亚多利德之路。与此同时，索图塔部落的玛雅人在成功组织起一场尤卡坦中部的起义后，继续挑战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权威。而位于东海岸的西班牙殖民小镇萨拉曼卡-德巴卡拉尔(Salamanca de Bacalar)也因乌艾米尔-切图马尔部落的玛雅人的逼近而告急。

192

西班牙增援部队的抵达并没有使库普尔的玛雅人气馁，他们继续包围该镇，前来增援的西班牙军队及其盟军经过了几天的激战才突破玛雅人对巴利亚多利德的包围。但玛雅人撤回自己的村庄后继续与殖民军队激战，迫使殖民军为了夺回该地区不得不在不同的村庄内与起义军作战。就在这时，其他的西班牙增援部队，连同来自坎佩切地区的印第安盟友也投入了这场战斗。这些军队由蒙特霍(Montejo)家族的许多成员领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该家族在带领西班牙军队占领尤卡坦地区方面有着赫赫威名，而这支军队也最终夺回了索图塔地区。不久以后，位于墨西哥东南海岸的乌艾米尔-切图马尔部落向殖民政府投降，这一结果使西班牙殖民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打击位于东北部的其余起义军。1547年3月，战斗告终。

事后，西班牙殖民政府通过调查确定了起义头人的身份，并处决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大多是土著巫师。尤卡坦和任何起义后的地区一样，殖民当局迅速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由镇压改为安抚，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印第安死人身上捞到半点好处。然而，尤卡坦半岛东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对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敌意一直持续了好几代，这也使得很少有西班牙殖民者移居此地。这也为整整三个世纪后，在此地爆发的最后一次伟大的玛雅人起义——尤卡坦种姓战争(Caste War of Yucatán)奠定了基础。

米斯通战争和库普尔起义说明了墨西哥殖民地时期抵抗和镇压的三大特点。第一，在这两次起义和所有之后的起义中，西班牙殖民政府都依靠印第安盟军来打击和镇压起义。事实上，在镇压军队中，盟军几乎占了多数；没有他们，殖民主义无法苟延。印第安人互相残杀其实并不稀奇，因为土著民居本身也分成不同的文化部落，他们之间的敌意和分歧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证明，所有的土著居民绝对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反对外族入侵。如果墨西哥的土著居民之间没有分歧和裂痕，很难想象西班牙殖民政府可以通过自己仅有的一些手段成功地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

第二，米斯通战争和库普尔起义都带来了典型的西班牙式的报复。西班牙殖民政策的特点是严惩"罪犯"，却不消灭整座村庄。对有能力进贡的人口进行整体灭绝并不符合西班牙的利益。相反，西班牙殖民政府会尽快使受创的土著社会再次运作，并尽快生产剩余产品，这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所在。

第三，这些殖民地早期的起义说明宗教在推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的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土著巫师为了维护自己在基督教影响下岌岌可危的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可是，宗教动机比巫师们的自身利益要深得多。基督教不止是一种新形式的礼仪或是在现有的神殿中新增加一个神位。这是殖民者用武力逼迫殖民地人民接受天主教神父宣扬的一种文化。长此以往，对当地印第安人产生的最大威胁不再是种族灭亡或是经济剥削，而是基督教和其他殖民当局带来的文化改变。当土著居民失去了他们的文化，他们会接受新的西班牙文化，那么就算他们依然长着印第安人的面孔，也不能被称为印第安人了。对那些生活在殖民主义征服后的动荡岁月的印第安人来说，本土宗教是反抗殖民者的最佳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中少数几样值得用死去捍卫的东西。而当西班牙粉碎了征服时期的起义后，这也就意味着墨西哥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变革之门已缓缓打开。

193

一旦殖民主义的征服结束，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便进入了一种殖民关系模式，即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必须服从他们的征服者。这一过程

要求改变却又抵制变革，而本土文化就在这夹缝中生存。在这个过程中，印第安人通过反抗，以及通过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拖延，掩饰，假装顺从，偷窃，故作愚昧，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至少保留了他们的一些文化。

其实，当地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每天都在进行。正因为如此，文献中很少记载，同时也为研究带来了困难。但当某位神父抱怨说如果不用高压政治，印第安人根本不理会教会时，我们又发现这些反抗确实存在。另一个有关反抗相当普遍的证据是，西班牙人不得不经常使用武力来招募劳工或推行其（商品）摊派制度（指当西班牙殖民政府官员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交易时，不论是买入或卖出货物，其价格都需极大地有利于西班牙）。其他的证据还包括，当曾被强迫迁居到某些主要城镇的印第安人若干年后又被命令迁回更为偏僻的原地时，这些土著居民常常选择逃跑，并在恰帕斯州（Chiapas）和尤卡坦人口稀少的热带低洼地区建立秘密定居点。当然，普遍不愿进贡也是另一种反抗形式。

土著居民也用其他方式反抗殖民主义。他们会利用西班牙政府提供的殖民地机构来对抗西班牙的统治。殖民地的常设法院为当地的土著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并给予了他们诉讼的权利。全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都在抱怨土著居民“好诉讼”的天性，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该政策的效果。一旦诉讼被法院受理，墨西哥的土著居民常立即将西班牙人带上法庭。档案显示，反抗中的法律元素在帮助土著居民捍卫对其生存极其重要的水和土地所有权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土著居民还借用了西班牙创造的书写体系来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他们写下自己的历史，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记录下了被殖民之前的重要文化传统。他们还写下宗教经典、戏剧和诗歌，以证明自己享有与西班牙人平等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极其珍视其关于农村土地有权的记录，因为一旦与外界发生土地纠纷，这些记录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还有一些印第安人记录

194

下自己对世界的隐秘看法,在批评殖民主义的同时为后代留下了他们那时的世界观。但土著居民的低识字率意味着该活动只是面向少数印第安人。还值得一提的是,对殖民主义的记事表达了印第安人的想法,尽管不是革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殖民体制力图建立的思想霸权的作用。

宗教是反抗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关键领域。土著居民的宗教保卫战实质就是本土文化保卫战。通常情况下,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太大的反对和抵触情绪(除了个别部落,尤其是北部未被征服的许多印第安人)。大部分印第安人都愿意,甚至渴望接受这种新的宗教。但是与他们之前接受其他宗教的情况相似,印第安人是以其自己的理解接受天主教的,他们常常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接受新的宗教思想。土著居民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就是用新的理念去适应旧的思维方式的过程。土著居民虽然成了基督教徒,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本土宗教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关键的信仰:例如对时间的周期性的认识,个体是民族的一部分,万神也都是善恶的共同体,以及泛灵论和泛神论等思想。

另一方面,基督教本身的概念也造成了墨西哥地区的神学混乱。基督教徒并不怀疑魔鬼的真实存在,但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独立于上帝以外的强大魔鬼对一神教的教义提出了质疑。同样,天主教关于圣母马利亚和圣徒的教义跟印第安本土宗教中的多神论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普遍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例如,墨西哥基督教中的圣徒成了村民的保护者,开始扮演地方神的角色,如果你告诉某一个村庄的土著居民,他们的圣米加勒大天使与其他村庄的圣米加勒天使别无二致时,他们会对你的言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土著居民们不但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基督教,而且有时还继续举行他们非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在殖民当局记录在案的调查中,有许多关于“偶像崇拜”的记载,通常伴随着本地巫师和传统迷幻类物质的使用。这种仪式一定相当普遍,而且数量无疑比殖民当局记录在案的要多得多。土著居民对本土仪式的执着一方面是出于保持其传统的考

虑，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当地草药知识为基础的传统药物通常非常有效。

总而言之，印第安土著居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形式多样，某些形式所取得的效果较其他更为明显。墨西哥的土著居民并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应该夸大或将其反抗浪漫化，因为殖民主义最终还是成功地改造了他们并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油水。但是，尽管反抗有时很难记载，但它却真实存在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记录得最为详尽和明确的反抗就是暴力起义。

195

16 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开始向北扩张，在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不断碰到新的印第安土著部落，后者大多生活在生存标准线的边缘，没有任何可供掠夺的剩余产品。西班牙人还打劫印第安人聚居区，并劫掳当地居民作为奴隶，但之后，他们通常会对这些印第安奴隶失去兴趣，除非他们在某处找到了金矿或银矿。一旦发现矿藏，西班牙殖民者就视那些住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为绊脚石，因而会把他们赶到其他地区。然而，贵金属并非随处可见，要在西班牙人占领的墨西哥北部发现金矿或银矿犹如在沙漠中寻找绿洲一般困难。即便如此，一旦西班牙人发现“绿洲”，那么原本居住在“绿洲”中的土著就会被迫移居“沙漠”。

虽然西班牙人认为北部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他们并没有忽略后者。西班牙王室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教化当地居民的任务，殖民政府也最终将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代表派往北部。到 16 世纪晚期或 17 世纪，绝大部分土著居民地区的同意牧师或传教士以非常虔诚的态度在当地展开活动。但也就是在传教士抵达后不久，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就爆发了。北方的反抗与此前殖民者入侵南部地区时的大型起义类似，常常发生在土著居民还未被教化，且记得入侵前的生活的时期。由于仍然与本土文化保持着密切接触，北部的印第安人有时倾向于全盘反对西班牙的文化和宗教，以求重振印第安的本土文化。

西班牙殖民政府自迈开其扩张的步伐开始，就不断遭到许多土著

居民的顽强抵抗。在屈服于殖民主义后北方第一支反抗的部落，则是居住在杜兰戈(Durango)以西和奇瓦瓦(Chihuahua)西南面的西马德雷山脉(Western Sierra Madre)地区的特佩瓦内人(Tepehuanes)。耶稣会于16世纪90年代在该地区开始了基督教化的工作。传教士的工作之一是引导当地居民聚居在传教区的周边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7世纪初在特佩瓦内部落爆发的疫情的蔓延，从而导致大量土著居民的死亡。

发生于1616－1620年间的特佩瓦内部落起义受到了以下几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肆虐的疫情、新出现的宗教，以及迫使印第安人成为劳工的西班牙委托监护人。起义的领导人是刚刚被教化的印第安人夸乌特拉塔斯(Quautlatas)。夸乌特拉塔斯显然怀疑新宗教的真实性，并开始对传教说"不"。他因此遭到了耶稣会的鞭笞，但这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愤怒和仇恨。于是，夸乌特拉塔斯开始了反基督教的宗教运动，并试图通过该运动恢复传统宗教在特佩瓦内部落中的主导地位。他鼓励当地人民反对与基督教有关的一切事物，恢复对旧宗教的信仰，并把侵略者赶出这片土地。他在一个又一个的定居点中传播他的思想，甚至还传到了更北部的塔拉胡马拉(Tarahumara)族印第安人那边。起义军的思想包括了在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士兵会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七天复活这样的信条。总之，起义已经进入土著抵抗欧洲入侵者时代。

196

起义爆发于1616年11月，打了耶稣会与殖民当局一个措手不及。当西班牙殖民当局还沉浸在成功完成自己的宗教教化计划的沾沾自喜中时，他们完全不能想象并接受这个失败的事实。只在几周的时间里，起义军杀死了超过400个西班牙人，包括6个耶稣会传教士，1个方济各会传教士和1个多明我会修道士，还有100多个西班牙移民，他们听说有一条安全通道可以撤离战区，便离开了圣迭戈-帕帕斯基亚罗镇安全的教堂。起义军烧毁了教堂，摧毁了包括圣母马利亚像在内的所有宗教画像。特佩瓦内人相继占领了杜兰戈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与此同时，北部的一些塔拉胡马拉族的印第安人也加入了这次起义，并袭击了位于奇瓦瓦的西班牙殖民者聚居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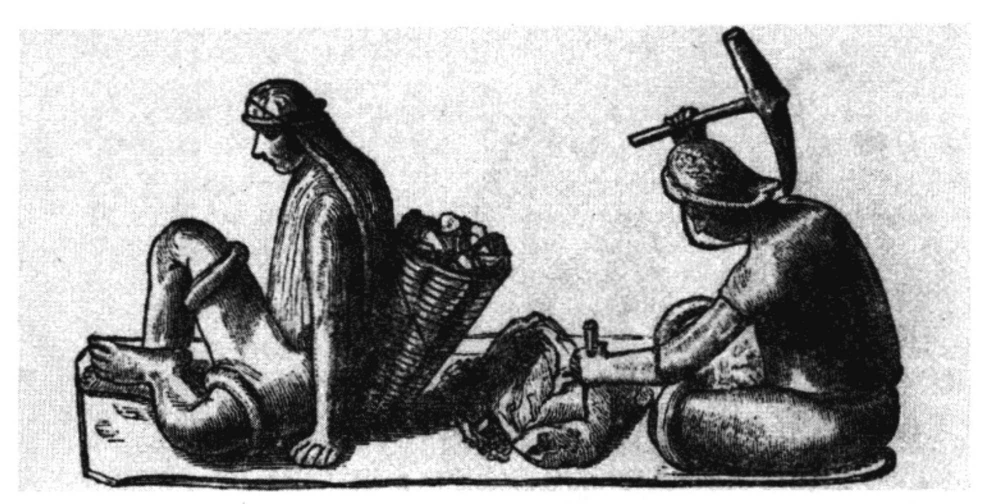


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团最早抵达墨西哥，并因他们在当地土著中的传教工作而赢得了声誉。这幅克雷塔罗博物馆所藏的绘画作品（作者不详）描绘了两位方济各会的圣徒。

当然，西班牙人也立刻以武力进行反击，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最终镇压了这次起义。在此过程中，一千多名印第安士兵丧命，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被卖作奴隶。特佩瓦内部落相当贫穷，即使整个部落都灭亡也不会令西班牙殖民政府蒙受任何损失，因此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镇压此次起义时显得相当冷酷无情。此外，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此次起义中表现得尤为义愤填膺，很多基督教信徒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对于传教士而言，背叛宗教就等同于叛国。因此，牧师们把起义描述为魔鬼的行径，并宣布已死于战场的夸乌特拉塔斯是一个叛教徒。由于特佩瓦内部落的人口数量不多，西班牙殖民政府最终成功地镇压了这场起义。据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特佩瓦内人因这次起义而丧生或被卖为奴隶。直到 1623 年，该地区才渐渐恢复和平。

197

居住于特佩瓦内部落以北的塔拉胡马拉部落将西班牙在当地的殖民脚步推迟了近一个世纪。塔拉胡马拉人占领了现在的奇瓦瓦州西部和索诺拉(Sonora)州南部，而且从未像特佩瓦内部落一样对西班牙殖民当局进行异常激烈的抗争，但他们也发动过好几次重要的起义，并参



新墨西哥艰苦的采矿工作完全是由人力完成的。图中右边的矿工正在开凿矿石，左边的矿工负责把矿石运送出去。他要背着一篮子矿石，爬上很多级阶梯（往往就是只凿出踏脚处的圆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把矿石送到地面上去。

与了其他部落的起义。因为塔拉胡马拉部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因此他们对殖民主义抗争都是各自为政的。

除了参加特佩瓦部落起义的最南端的塔拉胡马拉人外，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触角很少涉及该部落其他人，直到 1631 年，帕拉尔地区发现了丰富的银矿。发现银矿后，西班牙殖民地的疆界便向北大幅度延伸，大量的移民者开始迁至塔拉胡马拉部落的东部边缘。西班牙殖民者试图强迫当地的土著居民成为其劳工，与此同时，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将他们的传教团派到了被称为"下塔拉胡马拉"（Lower Tarahumara）的地区。到 17 世纪 40 年代，也就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土著居民开始实质性接触 10 年后，下塔拉胡马拉地区爆发了激烈的起义。当时移居到天主教传教区周边并参加天主教洗礼的印第安人数量已经超过4 000人，但他们同时也对强迫劳工制度和牧师们对其实施的惩罚充满了仇恨。终于，像特佩瓦内部落中的夸特拉特斯一样，很多印第安基督教信徒开始背叛基督教，并迅速得到了该地区西部和北部的许多非基督教印第安人的支持。第一次起义于 1648 年爆发，并摧毁了驻扎在当地的耶稣会传教区。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平息了这场组织松散的起义。

198

殖民当局试图利用这次胜利，在北方一个被称为"上塔拉胡马拉"

(Upper Tarahumara)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移民聚居区和多个基督教传教区。这一决定几乎在同一时间又引发了另一场起义，该起义由基督教化的印第安人特波拉梅(Tepórame)和另外两个叛变的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的印第安人领导。不幸的是，这次起义仍旧只有少数塔拉胡马拉人参与支持，并迅速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扑灭。

1651 年，特普拉梅在上塔拉胡马拉领导了另一次起义。这一次，起义军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一名传教士，并肢解了他的尸体。西班牙人放弃了这个聚居区，殖民政府也立刻派遣另一支军队打击起义军，并成功地重建了上塔拉胡马拉地区的殖民统治和传教区。然而，起义军仍然奋起抵抗，并于 1652 年杀死了一名传教士和该地区所有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并再次成功地赶走了该地区的西班牙人。此后，起义军开始向东进发，捣毁了七个管理孔乔(Concho)印第安人的方济各会教区，但是起义军却没有成功说服下塔拉胡马拉的印第安人加入其阵营。最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西班牙殖民当局通过特赦的方式逼迫印第安人交出其起义领导人特普拉梅，并将他处死。起义结束。

但特普拉梅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西班牙殖民者决定不再占领上塔拉胡马拉地区，而该地区也享受到了将近 20 年没有殖民者侵扰的自由生活。直到 17 世纪 70 年代才有几个耶稣会会士进入该地区，并在 80 年代建立了几个传教区。但是到了 1685 年，西班牙人在上塔拉胡马拉的东部再一次发现了银矿，随之而来的矿工开始奴役当地的印第安人。1690 年，西班牙人对该地区的重新入侵引发了当地第四次塔拉胡马拉起义。第四次起义和前几次一样，都以屠杀当地传教士为开端，印第安领导人通过声称加入起义军的人均会得到重生而迅速得到支持。西班牙政府镇压了该起义，但 1696 年，新的起义又爆发了。

塔拉胡马拉人的第五次起义是该地区最后一次，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在该起义发生之前，瘟疫席卷了墨西哥北部和新墨西哥地区，极大地刺激了整个地区的印第安人起义。塔拉胡马拉地区的土著居民普遍认为，新的宗教对瘟疫的蔓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区使大量的印第安人集中聚居，才使得疫情传播的速度

如此之快。萨满巫师，也就是天主教牧师口中的“术士”，一直对外声称，只要人们回复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就会像过去一样健康。于是，刚刚皈依的印第安教徒为了远离病魔，纷纷背弃天主教，重新信仰自己的传统宗教。

为了打击塔拉胡马拉族的起义，西班牙殖民当局采用了恐怖主义的手段：他们杀死了大量的人质，并拿着这些人质的头到处炫耀，试图吓退起义军。但是就像恐怖主义通常的效果一样，这些举动非但没有吓退印第安人，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民愤，从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最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解放了整个上塔拉胡马拉地区。但是，起义最后还是以西班牙人击败起义军告终。1698 年以后，西班牙人再次在上塔拉胡马拉地区建立传教区。新一轮的淘金热把更多的西班牙人引到了塔拉胡马拉东部地区。为了避免冲突，塔拉胡马拉人开始往远离西班牙殖民聚居区的西部或南部迁移。在其后的殖民地时期，只有宗教使团仍会侵扰塔拉胡马拉人。大部分的塔拉胡马拉人为了躲避这些殖民代表，搬到了西马德雷山脉地区的要塞中，他们的后人迄今仍生活在那里。剩下的许多塔拉胡马拉人通过参加阿帕切人(Apaches)的队伍继续他们的反抗，在整个墨西哥北部地区给西班牙殖民者制造麻烦。

199

在殖民主义时期，北方最为成功的起义是发生在新墨西哥的伟大的普埃布洛起义。与其他北部的起义不同，这次起义发生在西班牙开始其殖民统治好几代后之后。1598 年，胡安·德奥尼亚特带领他的远征队伍踏入了格兰德河上游大峡谷，并胁迫当地印第安人屈服于殖民统治。和许多北部的土著居民不同，该地区的印第安人聚居区尽管都不大，但分布相当集中。事实上，“pueblo”在西班牙语中是村庄的意思，这个词因此成了这些印第安人的集体名称。在这里，西班牙人引入了委托监护制度，但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该制度的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普韦布洛人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和部落，和北方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在政治相互分离，而且很少合作。

受西班牙王室委托进入新墨西哥传教的，不是耶稣会会士而是方

济各会会士。传教士们初到新墨西哥时，对当地的宗教还是采取包容的政策，但是到了 17 世纪 50 年代，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认识到本土宗教仪式并不是“迷信”，而是一个平行宗教的形式。因此，天主教的神父开始怀疑印第安人对基督教的忠诚，于是他们采取措施停止了一些他们认为过于盲目崇拜的仪式，并取消了大部分本土宗教仪式。与此同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开始恶化，阿帕奇队伍的袭击愈加频繁，但西班牙人却未能阻止他们。干旱和饥荒又在 17 世纪 70 年代横扫该地，疫病开始流行。

正如大多数起义一样，随着基督教未能制止或避免的各种危机的到来，本地宗教越发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萨满巫师声称饥荒和疫情是上天对那些背叛本土宗教，信仰基督教的印第安人的惩罚。这些反对基督教并为自我而战的土著巫师还承诺，如果恢复传统，那么疾病和死亡也自然会走向终结。这次宗教复兴运动的头领名叫波佩(Popé)，曾因擅自举行土著仪式而被殖民当局逮捕和鞭笞。他和其他萨满巫师一起，计划通过起义将西班牙殖民者赶出大峡谷地区。

人们曾一度认为普埃布洛缺少政治团结，但在 1680 年，这些村庄却显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大部分部落都参与了这次起义。起义军杀死了大多数西班牙传教士和许多殖民者，并在同年 8 月包围了圣菲，迫使西班牙人放弃首府并逃到了周边的村庄。在起义军的步步紧逼下，西班牙人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整个格兰德河上游大峡谷，并一路撤退直至埃尔帕索。在那里，大量西班牙难民的到来加重了当地印第安社会的负担和压力，并最终引发了更多的反殖民主义起义。最后，起义开始遍布整个奇瓦瓦、索诺拉的北部地区和塔拉胡马拉地区。很大范围内的印第安人都为推翻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基督教而奋不顾身。 200

因为新墨西哥远离西班牙在墨西哥殖民统治的中心地带，西班牙殖民政府花了较长的时间才组织起了对付普韦布洛起义的人力和物力。直到 1692 年，西班牙人在其能干的迭戈·德巴尔加斯(Diego de Vargas)的领导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重建了西班牙人在新墨西哥的统治。很多普韦布洛部落的顽强抵抗使西班牙殖民者花费了很长时

间才重新控制该地区,但起义最终还是以殖民当局的胜利而告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第安人内部的纷争。1680 年,各村庄摒弃前嫌暂时结合到了一起,但是随着内部摩擦的增大,尤其是起义的领导人波佩在 1688 年去世之后,各个部落间的矛盾终于激化并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帮助西班牙人争取到了不少盟友,而在几年前,这些互相攻击的盟友还并肩作战共同抗击西班牙人。1694 年,西班牙军队重新夺回了其殖民首府圣菲,并开始重建其传教体系。在这期间,印第安人进行了殊死抵抗并杀掉了一些传教士,但所有努力最终没能挽回其失败的命运。西班牙军队击垮了所有的起义,包括 1696 年普韦布洛的第二次重要起义。这以后,许多普韦布洛人拒绝向殖民主义投降,并搬到了西部,而峡谷中的人口数量随着死亡和移民急剧减少,在之后的殖民地时期再也没有恢复到起义之前的规模。由此可见,印第安人为起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740 年,亚基(Yaqui)和马约(Mayo)人也在北部的印第安人反抗中脱颖而出。与其他起义不同,宗教并非其关键动因。耶稣会传教士早在 1617 年就在该地区设立传教区,而当亚基人听说传教牧师不但会为那些新入教的教徒提供漂亮的装饰品,而且在粮食短缺时期还能提供食物时,都纷纷要求入教。但是传教区的出现却不能确保给亚基人最基本的食物供应。1740 年,玉米歉收导致当地饥荒,亚基人揭竿而起。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开始攻击耶稣会传教士和其他西班牙人(但是这一系列攻击仍旧没有一致的首领和协调);另一方面,耶稣会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以饥荒时期提供食物来换取印第安人的自主入教,而这毋庸置疑也成了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

但这里,和墨西哥的其他地区一样,也有着复杂的因素。第一,因为东部山区的矿区对食物和工人的需求,该地区的西班牙人聚居区正在兴起。这也导致了大批庄园的建立,有时亚基人和马约人的土地会被殖民者掠夺来建立庄园,有时他们会被征召去矿区当矿工。不用说,这些变革极大地破坏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生活方式。

201 第二,这些亚基人和马约人饱受耶稣会传教士的欺凌。这些传教

士试图通过农业商品经济使自己的传教事业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将作物卖给附近的采矿营地。他们还把亚基地区的牲口送往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的传教区，并通过当地的廉价劳动力把自己的传教事业扩大到其他地方。为达成自己的心愿，他们会选取一些当地人每星期为他们工作好几天。不过，这些传教士比较喜欢用那些非亚基人或梅斯蒂索人做领班，这一举动无疑也惹恼了亚基人。而一旦亚基人在工作中偷懒，便会遭到一顿毒打。

第三，在冲突发生时，西班牙殖民者民政与宗教当局之间的冲突使墨西哥土著人能利用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的情况。1734 年，西班牙王室开始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管理领地引入民政机构，传教士对此变动耿耿于怀。此时，印第安人传教士对耶稣会传教士也心怀不满，并希望通过求助于民政当局解决冲突。1736 年，一个名叫穆尼(Muni)的亚基头人反对耶稣会教规和使用外来人做领班。由于其不合作的态度，他遭到了鞭笞。随后，他将此事汇报给了新成立的民事当局。当耶稣会传教士得知此事后，用甜言蜜语使民事官员倒向他们那边。结果，官员逮捕了穆尼和他受洗时的教父贝尔纳韦(Bernabé)，以及其他一些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当此事传开以后，大批的亚基人聚集到市政监狱门前游行，要求西班牙当局释放其头领。为了避免暴乱，当地政府答应了亚基人的要求。被触怒的耶稣会传教士则寻求报复：在西班牙当局恢复穆尼和贝尔纳韦的职位后，先逼迫他们辞去村庄头领的职务，再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是亚基人要求穆尼和贝尔纳韦离职的假象。

穆尼和贝尔纳韦在 1737 年找到了他们的盟友。已经成为墨西哥城临时总督的墨西哥大主教正想缩小传教士的权力范围，遂邀请穆尼和贝尔纳韦去墨西哥城呈上一些反耶稣会传教士的证据。在那里，穆尼和贝尔纳韦控诉了传教士强加的日渐增多的重负。他们相信，通过对上层机关申诉，可以帮助当地引进新的民政权力机构，削弱耶稣会传教士的作用。同时，牧师也已开始抱怨印第安人的态度越来越不合作，甚至表现出敌对。

1740 年 1 月，当穆尼和贝尔纳韦仍在墨西哥城时，水灾使亚基地

区农作物严重受损。耶稣会传教士因为忙于将牲口送往下加利福尼亚牧场,无法为印第安人供应足够的粮食。亚基人便袭击了传教区和西班牙人所拥有的牧场,偷走牲口和其他食物。到了 3 月,抢劫风潮已经演变成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在一次著名的案件中,亚基人俘获了一群西班牙士兵,偷走了士兵身上所有的衣服,迫使这群士兵一丝不挂地走回兵营。然而,这些印第安人的袭击似乎并没有得到协调,他们更像是个别群体在独立行事。5 月,关于穆尼和贝尔纳韦在墨西哥城已被处决的谣言开始蔓延,激起了更多的叛乱活动。亚基人最终将西班牙人统统赶出了亚基河和梅奥河之间的地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印第安人在没有公认的头领时更具有抗争性。假如在起义发生时,穆尼和贝尔纳韦也参与其中,那么起义的力量很有可能会被一些自称"亚基人"的极端独立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大削弱。关于穆尼和贝尔纳韦死亡的传言对印第安人的激励要远远好过一个有血有肉的领导。在亚基人中间,愤怒被证明是比领导更有效的力量。

202

起初,由于缺乏士兵,殖民当局对此无能为力。但最终,随着亚基人战斗热情的减退,西班牙地方长官曼努埃尔·德维多夫罗(Manuel de Huidobro)先后平定了一些村庄的叛乱。穆尼和贝尔纳韦也于八九月间从墨西哥城返回,并说服多支叛乱队伍返回正轨,这也从另一方面帮助平息了叛乱。然后,新上任的总督还是批评维多夫罗不称职(或"怯懦",耶稣会传教士就是这样指控他的),因此在 1741 年,一个铁腕长官阿古斯丁·比尔多索拉(Agustín Vildósola)接替了他的位置。

比尔多索拉消灭了最后几个起义的亚基部落。当他怀疑穆尼和贝尔纳韦在密谋另一次起义时,立刻在 1741 年 6 月将其处决。不论这两位亚基领导人是否真在策划起义,两人的死再一次激起了亚基人民的强烈反抗,但力量相较前次更为薄弱。阿古斯丁·比尔多索拉于同年 8 月恢复了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1741 年 9 月,叛乱完全平息。此后,尽管印第安人与耶稣会传教士的良好关系从未恢复,但该地区还是相对太平的。

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亚基人要求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保持自治。

亚基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亡国奴。尽管相对于西班牙移民和传教士而言,他们的权利较少,但他们会采取措施恢复自身对局势的控制;尽管他们没有成功赶走侵略者和传教士,他们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让传教士非常难堪。事实上,亚基人的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西班牙皇室制裁传教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亚基人还成功地让他们的领地更少地受到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侵扰——这实际上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基人比大部分与西班牙殖民主义抗争的土著居民都要成功。试想一下,如果在亚基人的领地发现了大量的珍贵矿藏,西班牙宗主国还会对亚基人这样"仁慈"吗?

墨西哥北部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反抗往往是有效而成功的。在某些情况下,土著居民的行动推迟或中止了西班牙人的殖民扩张。大多数印第安部落在殖民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其部分的传统文化。事关他们存亡的真正威胁大多出现在独立以后,那个时期移民者的生活很少受到约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全国或地方的统治阶层开放了所有地区,包括那些印第安人的领地和矿区等。

203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的起义以外,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起义。而且,暴力反抗决不仅限于殖民侵略时期的起义。许多未被征服的部落,诸如阿帕切人和科曼奇人(Comanches)也通过袭击西班牙人聚居区和传教区、杀害或奴役西班牙人、盗窃物品和牲畜等手段,表达了自身对殖民制度的不满。这些活动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从未停止,直到19世纪墨西哥和美国对当地的土著居民推行完全不同的政策以后,军事技术为入侵者提供了绝对优势为止。

人口因素决定了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规模。北部的印第安部落通常都较小。瘟疫横行更使他们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并削弱了其进行长期反抗的能力。然而,瘟疫的爆发也从另一方面使许多印第安人开始质疑传教士所宣传的新宗教的有效性,也在短期内通过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了反抗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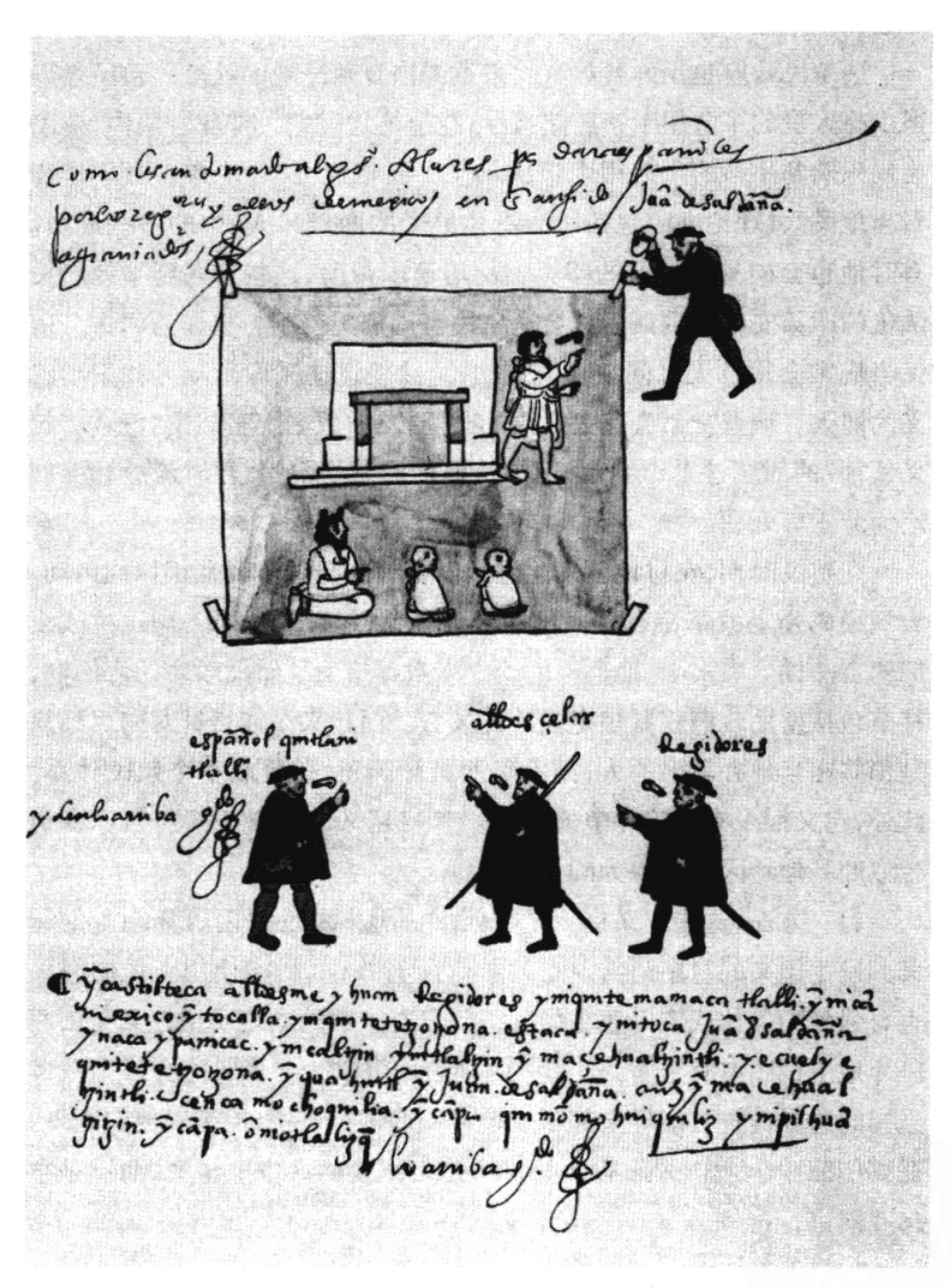
贵金属银在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似的作用。只要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银矿,他

们的军队最终会取得胜利。伴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寻找财富而来的经济动机和军事实力都大大超出了印第安土著居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居住在矿藏丰富地区的印第安人总是首当其冲地被西班牙殖民者强征为劳工开采矿藏,然后被赶出其世代生息的土地。相比之下,殖民者很少会去顾及那些没有黄金或白银的地区。传教士虽然原则上要到各地进行传教,但是他们更愿意把他们的传教区建在设有大型采矿营地和农庄的地区。因此,有些土著居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幸运的。他们的贫穷帮助他们躲开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密集进攻,而这也是殖民主义时期对其生存的最大威胁。很多印第安人因为生长在生产力低下的地区而在殖民主义时期得以生存下来——在西班牙殖民军在美洲进行极力扩张的所有动机中,经济动机对印第安人有着最大的影响。

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数量是北部的好几倍。因此比起北部,南部的起义数量要多得多,且大多数起义都有共同的特征。南部的起义几乎都是当地性的,其影响范围极少超越一个村落。尽管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通常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而这些起义常缺乏事先规划,具有极大的自发性,村民会突然对其不满的对象宣泄愤怒——这些对象通常是殖民地政府机关、神父、印第安部落首领、非印第安裔居民,或其他村落的印第安人。起义军队经常袭击皇家政府机关、监狱和教堂。大部分起义人员——或头领——常常是女性,这与墨西哥北部传统价值观引导下的男性主导的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所有墨西哥南部的起义都带有暴力性质,但在起义中的伤亡人数常常少于 10 人,而且从未发生过滥杀滥伤无辜、强取豪夺的现象。起义者的武器也反映了起义的自发性质:石头是最常见的武器,其他便是农业社会的常见农具(大砍刀、匕首、棍棒、斧头、锄头等)。枪支极少被使用,一方面是由于这类武器较为昂贵,另一方面则是殖民当局限制土著居民拥有枪支。但人们不满的对象常常要么死亡,要么逃亡,或者藏匿到教堂或修道院,把空空的村庄留给起义者。因此起义者们成功的喜悦马上会被对遭到报复的惧怕心理所取代,所以他们之后的动作往往是向殖民政府当局和平投降,或者在之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204



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非没有遭到抵抗。《奥苏纳抄本》是一份有关失去土地、遭受劳力剥削和遭勒索食物各种抱怨的法律记录，这幅图就出自其中。画面上西班牙人包围了一所印第安人的房屋，正准备抢夺由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组成的这个土著家庭的财产。

内逃亡至其他村落,并用谈判结束起义。

而殖民政府也用好几种方式来重新恢复殖民地的秩序。殖民当局很少将大量的军队用于镇压起义军;在殖民地时期大部分时间内,殖民当局只储备不多的士兵用于镇压起义。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员只是征召当地民兵(理论上应包括所有身体健全的西班牙人)中的一些成员。有时他也会向其他地区的印第安部落请求帮助,这些加入到平息起义队伍的印第安部落到最后总会从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特权作为回报。殖民当局常会用几天时间恢复其统治,之后便迅速采取行动寻找策动起义的罪人。调查常常会花去几周的时间,然后数名土著居民会被以"起义领袖"的罪名送上审判台,而等待他们的常是鞭笞、暂时流放和强制沦为劳工等处罚。

在殖民时期,农村地区发生过数以百计的与城市骚乱相似的运动。大规模的暴动或革命在墨西哥却极为罕见;起义军从未考虑过挑战当局的合法性。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殖民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包括殖民政府强制规定的纳税义务。而起义军懂得针对的目标只是那些在当地办坏事的人,而不是西班牙国王、总督或整个殖民体系。此外,起义很少有阶级斗争的特点。参与起义的人很少将与自己身份相似的其他地区的人视为同一等级。

另一方面,这些起义也不是墨西哥失地人民反对西班牙地主的起义。发生起义的村庄通常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村中使用土地的村民也有强烈的集体或家庭业主的意识。只有少数的本地小型起义是由西班牙地主试图占有土著人土地而引起的。有时,土著居民会因为殖民当局的边界调查可能导致部落土地流失而进行反抗,但是对他们来讲,抵制庄园主土地扩张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此侵略者告上法庭,而不是拿起武器进行抗争。

如果地方性的起义不是因土地被剥夺或由阶级觉悟引起的,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引起的呢?绝大多数起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当殖民政府或传教士企图肆意改变村民与外界现存的经济关系时,比如提高税额、增加分配额度、征用强制劳工、增收服务费或宗教管理费,或干

涉印第安人控制的生产和贸易等，印第安人会对此采取暴力反抗的手段。土著居民承认国家与教会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尽管他们可能不喜欢它们，他们仍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一旦任何超出其能承受范围，他们便会试图进行反抗。英国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将此称为“道德经济”，即精英与群众之间关于可接受的剥削程度和行为标准的理解。当剥削者超越道德界限时，被剥削者便有了采取行动重建道德平衡的意识，而采取的行动中有时包括暴动和起义。

第二类起义则可以被视为因殖民当局违反道德政治，擅自干预土著人的政治而引起的反抗。这种干预包括殖民当局没有经过当地印第安人同意，或故意无视印第安人的愿望而擅自决定其部落首领或组成当地政府。通过支持不同的派系彼此争斗，殖民官员自然而然将殖民当局卷入了乡村政治生活中。西班牙人有时还通过拘捕未能执行殖民政策的村庄官员来干扰当地的政治事务。印第安人强烈地认识到，既然西班牙法律有规定，而且殖民当局也承认各村落的村民享有选举村庄官员的权利，西班牙人就无权擅自做主。因此，一旦地方官员有了类似的苗头，就会遭遇当地村民的普遍反对或反抗。在当地领导人因为没有很好地执行殖民政策而被逮捕时，当地村民就会集体反抗，并从监狱中救出他们的首领。但另一方面，如果印第安首领与“外界”合作，共同践踏道德经济和道德政治，印第安人则会同时把他们的起义矛头对准其首领。

另外，村民们也会为保护其对传统宗教仪式的执行权利而奋起反抗。这类反抗通常与特定的神社或宗教社团联系在一起。当主教或当地殖民政府干涉或试图“改革”这些传统仪式时，当地的土著居民有时便会通过暴力反抗来支持本土传统。这些起义也常常由本地的巫师领导。还有本地居民为维护本村的宗教自主权而进行起义的情况，就是要求殖民政府将自己所在的村落划分成一个教区，而不是受制或归并到其他村落。

1767 年发生的圣路易斯波托西起义和米却肯起义，是殖民政府对起义者采取极端暴力的典型案例。耶稣会传教士的被驱逐引发了这场

起义;人们起义的目标不是针对传教士,而是为了捍卫现有的宗教事务。驱逐令是由当时西班牙国王派往墨西哥的总视察官、半岛人何塞·德加尔韦斯(José de Gálvez)颁布的。加尔韦斯的任务是确定是否要变革现行殖民地政策,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尊重殖民地的现行政策。他命令刚从西班牙抵达殖民地的正规军竭尽全力对此次起义进行镇压。随后殖民政府对起义者的惩罚也相当残酷:起义者中有85人被绞死,73人被鞭笞,117人流放,674人入狱。这种草率镇压骚乱的行为可以说极不寻常,因此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207

如果有人认为,除非受到外来的殖民政府官员或传教士挑衅,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幸福和祥和之中,那么就大错特错。每当起义发生,印第安人的言行往往显示出他们对西班牙人、外族和殖民主义根深蒂固的敌视——这一仇恨远远超出了引起起义的直接因素。一旦起义军控制了村落,他们便会用西班牙人侮辱他们的方法侮辱那些非印第安人。与此同时,土著居民也常常憧憬着某一天殖民体系会改变,那一天印第安人可以统治西班牙人。

这样的想法和行动表明,尽管印第安人没有阶级意识,但他们也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剥削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清楚他们所处的社会体系极其肮脏,而他们的行动也显示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反对以各种新形式索要金钱、货物、劳力和进一步剥削。大量与此相关联的起义证明,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殖民政府官员一直试图不断扩大剥削,但也一直引来当地人的反抗,所以始终没有达到殖民当局的预期。实际上,殖民主义一直处于国家形成与人民不断抵抗的持续妥协过程中。殖民体制被不断质疑,其性质随着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结果来回转变。印第安人关于他们的宪法权利有着明确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像美国宪法一般以书面的形式出现,而是某种英语中所谓的不能随意变更的政治秩序。土著居民认识到自己对墨西哥的义务,但不是对眼前这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接受外来的国王、总督和地方官员对其的统

治,并以此要求享有一些自身在当地政治中的自主权为回报。这种对权利的捍卫是印第安人反抗殖民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到了18世纪,墨西哥南部玛雅地区成为两次反殖民运动的中心。这两次运动非常激烈,他们企图推翻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因此被称为革命。好几方面的原因使玛雅人比其他印第安人具有更强的革命性。第一,尽管玛雅人没有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事实上,玛雅人与世界经济通过本地制造的棉纺织品出口联系在一起),和墨西哥南部的其他大多数印第安人相比,玛雅人受到西班牙殖民主义以及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少。殖民主义的确使其生活发生了改变,但是并没有完全破坏其基本的生活方式。第二,和墨西哥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相比,玛雅人尽可能地保留了更多的属于印第安人的基本世界观、宇宙观和宗教基础等文化形式。他们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他们同时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应玛雅人的生活观念。从许多方面来看,本次起义是玛雅人为争取将基督教玛雅化而进行的一场斗争。

恰帕斯高原(当时被称为恰帕)居住着大量不同种类的玛雅人,而其中最重要的分支分别是策尔塔尔(Tzeltal)、佐齐尔(Tzotzil)和乔尔(Chol)。到了17世纪末,该地区成了宗教狂热的温床。很多玛雅人亲眼目睹了上帝或圣母马利亚在非正式的宗教仪式上显灵,于是他们在天主教堂之外建立了自己的祭坛。教会当局当然不会对这类事情坐视不管,他们立刻竭尽全力对这种潜在的异教进行了镇压。这一宗教冲突奠定了1712年起义的基础:尽管是经济动机引发了那次起义,但宗教将它演变成了对殖民主义的全面挑战。 208

和许多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一样,恰帕斯的玛雅人一直受到殖民主义的剥削,但把该地区的玛雅人逼向绝境的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主教。1708年,这位主教在巡视教区期间发现,他可以通过要求教民支付高额的确认圣礼费用和批准宗教社团的费用来勒索当地的印第安人。受其掠夺之后,当地人几乎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使经济得以恢复。但是,1712年8月,这位主教宣布他将进行第二次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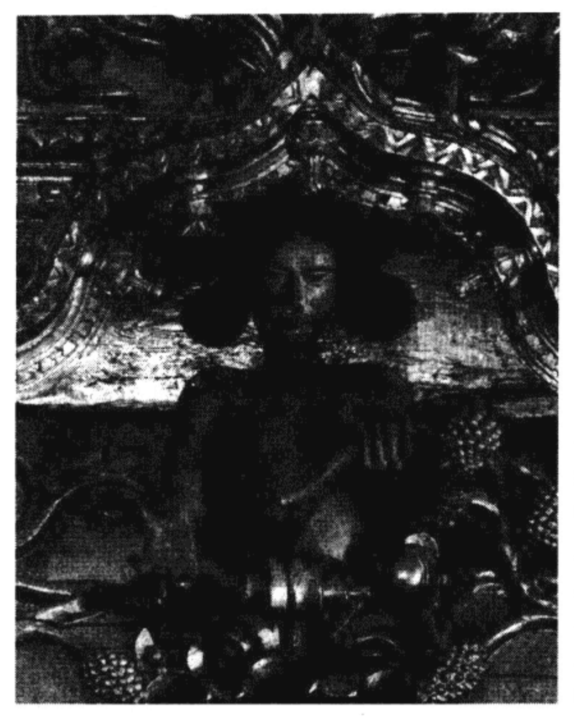
我们只能说,主教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很糟糕。一个强有力的对

圣母的新宗教崇拜在特塞尔塔尔人的坎库克村,也就是今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地区的东北部刚刚出现。1712 年 5 月,当地一个教堂看守人的女儿,13 岁的玛莉亚·洛佩斯(María López)看到了圣母马利亚显灵,在此次显灵中,圣母要求当地人为其修建一座教堂并成立一个宗教团体。村庄管理机构同意了圣母的要求,该教团很快便蒸蒸日上了。为了镇压该教团,当地的传教士鞭笞了洛佩斯和她的父亲,恰帕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也将村庄官员关进了监狱,以示对其支持该活动的惩戒。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法阻止该教团的成长。不久,这些村庄官员成功越狱,而此时,大主教第二次巡视的可怕消息也刚刚传到该地区。回到当地后,坎库克的村庄官员立即宣布起义,以抵抗西班牙殖民政府并支持他们自己的宗教,而参加此次运动的人都将自己称为“圣母的士兵”。

和其他许多殖民地时期的起义不同,坎库克起义扩展到了其他的村庄,并最终推动了大规模暴动的爆发。该暴动把矛头同时指向了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暴动的过程中,一旦有村民拒绝加入其队伍,起义者便会将他们杀害。此外,起义者还杀害被俘虏的非印第安人,有时还包括儿童。他们通过强迫克里奥尔妇女与印第安人结婚,使玛雅人拥有了改变其在殖民者主人前面地位的权利。最后,当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玛雅人宗教崇拜出现在高原时,“圣母的士兵”开始对他们的对手进行大屠杀,以确保自己所拥戴的宗教的唯一正确性。最后,几乎所有的特塞尔塔尔玛雅人,以及一部分特索特希尔和乔尔的玛雅人都加入了这场斗争。起义者最终控制了高原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数以百计的玛雅人、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被杀。新宗教的领袖还在坎库克建立属于自己的天主教堂,将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任命为主教,并要求该主教任命相关的玛雅神职人员来管理相关的仪式和圣礼。换句话说,玛雅人在实现宗教自治的同时也实现了政治自治。

209

在一个月内,殖民当局组织起一支足以镇压此次起义的政府军队。1712 年 8 月,起义者开始进入防御阶段。1712 年 11 月 21 日,西班牙殖民军队拿下了坎库克,还有一些零星的地区斗争持续到了第二年,但



这个归顺的印第安人的形象出自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的拉卡里达德教堂(La Caridad Church)圣坛的挡板上,雕刻于1712年起义发生后不久。雕像手拿许多西班牙的物品,西班牙人想借此表明,只要土著人归顺,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暴动此时已经结束。起义的大部分首领在保卫坎库克之战中丧生。西班牙政府将逮捕的所有参与屠杀的起义者执行了死刑,对其他被俘虏的起义者进行了鞭笞,然后释放了他们。玛莉亚·洛佩斯,这位起义的最初之源在斗争中得以逃离,却在之后不久的分娩中死去。数以千计的人在此次起义中死亡,而这次起义也是整个殖民主义时期墨西哥南部所爆发的最强烈的暴力起义。

1761年,宗教问题使尤卡坦地区的又一支玛雅部落揭竿而起。经济因素毫无疑问对起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玛雅人认识到了自己在18世纪中期所受到的剥削相对从前已经变得更为严重。此次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人。1761年11月,这个人来到了位于尤卡坦地区中部的某个不起眼的小镇西斯泰尔(Cisteil),声称自己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救世主、基督耶稣、国王和蒙特祖马。他叫哈辛托·乌克·德洛斯桑托斯(Jacinto Uc de los Santos),原本是一个在尤卡坦半岛东部海岸的荒野流浪的萨满巫师。他那令人震惊的声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预言:一个基督王式的大人物将会降临并

210 解救众生,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建立玛雅人自己的统治国度。经过讨论,当地的村庄管理机构认可了哈辛托救世主的地位。在此之后,这位萨满巫师就称自己为卡涅克(Canek,最后一个独立的玛雅君主的名字)·蒙特祖马国王。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将原本戴在圣母马利亚头上的银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同时开始利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法衣和圣器举行宗教仪式。他的追随者把他带到街上进行游行,并在他面前焚香祈祷,俨然将他供奉成一个人神。周边地区的人们也慕名来到西斯泰尔瞻仰这位久负盛名的国王,而起义也慢慢地开始积蓄自身的力量。

第一次暴动发生在一位西班牙旅行商人侮辱了恰涅克的脸之后。国王的追随者听从国王的命令杀死了这名男子。这以后,该运动便开始带有革命的性质。恰涅克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府并承担起尤卡坦半岛西班牙省长的权力。他宣布西班牙人必须死亡,但同时又吩咐手下找出西班牙女性,迫使她们与玛雅人通婚。此外,恰涅克还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任命军队长官,并呼吁其他各部落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试图征服周边的人民,也没有试图与西班牙政府进行谈判。说到底,他所要求的就是要建立玛雅主权国家,但是关于这一点,殖民政府和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更多的暴动发生在一支由 20 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小队进入西斯泰尔企图重建殖民统治之时。恰涅克的追随者用长矛和砍刀与西班牙军队战斗,杀死了其中的两名士兵。余下的幸存者设法逃脱,并将此噩耗散布了出去。于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再次集结人马,组织了一支大约 500 人的军队来镇压叛乱。当这支军队逼近西斯泰尔时,他们发现沿途有不少当地印第安人已杀死了他们所有的猪。原来恰涅克曾表示猪身上有西班牙人的灵魂,将猪杀死也就意味着印第安人有了诛杀西班牙人的权利。1761 年 11 月 26 日,西班牙军队开始攻击起义军。恰涅克鼓励他的追随者奋起反抗,并表示西班牙的枪械杀不死他们,同时他也制造出了治愈创伤的药物。

不用说,恰涅克的预言并没有成真,印第安人被枪弹杀死的不在少数,恰涅克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西斯泰尔的大部分玛雅人或死于这

场战争,或之后被处决。恰涅克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逃亡的路上被西班牙军队抓获,并被带至梅里达接受审判。245 名关押犯人之中,只有 9 名——包括哈辛托·乌克·德洛斯桑托斯在内的犯人被处以极刑,其余的人在接受鞭笞或被割掉一只耳朵之后被统统释放。

1712 年和 1761 年的玛雅人起义属于复兴运动,在起义中,玛雅人努力恢复失去的文化因素并加强现有的因素。这两次起义表达了当地居民建立更好的国家来取代现有的殖民地墨西哥的强烈愿望。殖民主义剥夺了印第安人最高的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而坎库克领导人和恰涅克的行为则体现了玛雅人对政治和宗教充分独立的愿望:通过控制任命权和享有充分的主权,起义者主导了政治系统;通过给予自己的国王和主教与超自然世界进行沟通和任命神职人员的权利,起义者掌握了他们的宗教。在没有西班牙人监管的情况下,他们成功且简单地实现了自己的宗教独立,但是由于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我们无法就此了解玛雅人政治独立的全部含义。

211

以上的起义与殖民者刚入侵时期的起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殖民者入侵后的 150 年中,墨西哥的本土文化发生了改变,这些文化开始与西班牙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相融合,而玛雅人已经不再对这些因素产生抗拒心理。比如,尤卡坦地区的一些印第安人杀死从欧洲引进的猪,但他们并没有杀同样从欧洲引进的马、牛和鸡等其他动物。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恰帕还是尤卡坦地区的起义军都希望保留天主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礼仪和层次结构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文化因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印第安人生活中无法舍弃的重要部分。起义者不再拒绝而是希望控制这些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革命。

西班牙带来的宗教最终唤起了玛雅人的革命本性。基督教救世主的出现强化了玛雅人关于历史周期性的传统观念。万众期待的救世主的出现就代表着这个历史周期已经进入尾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玛雅人借鉴了基督教的这一元素,将其融入反抗殖民者的起义中。但尽管玛雅人的革命是文化的必然产物,但激烈的反抗也有其物质原

因。玛雅人知道自己是被压迫的一族,他们希望通过统治西班牙人来颠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中殖民主义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与剥削是玛雅人世界观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物质原因,玛雅人就不会产生让过去轮回变成未来的愿望。因此,文化和经济因素都与针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殖民入侵时期和之后的殖民主义时期,墨西哥北部和南部的印第安人抵抗殖民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连续的过程,它并不只是由一系列离散的事件拼凑而成。虽然大部分起义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它们却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延缓了西班牙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控制墨西哥的进程。大部分当今的印第安人和本土文化较之从前都有了变化,但很多基本的理念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印第安人承诺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做到了。简而言之,是反抗创造了世界的多样性。

第七章　疾病、生态和环境

埃莉诺·G. K. 梅尔维尔(Elinor G. K. Melville)

213

1576 年,在年复一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后,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出版了他的墨西哥征服史。在书中,他对西班牙军队进入阿兹特克帝国心脏地带的沿途风景描述得非常清晰,利用书中的描述,人们不但可以辨别诸如山脉和河谷之类的地形,而且可以了解城镇和乡村中诸如大型蓄水池之类的人造工程。在书中,他对 1519 年第一次见到墨西哥山谷时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精彩。与科尔特斯一起前去觐见蒙特祖马皇帝的士兵被他们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好似漂浮在水上浸润在山间空气中的城市、华丽的宫殿、花园。所有这一切都让他们误以为自己闯入了一个仙境。这种庄严、陌生却又美丽的景色深深地印在了迪亚斯的脑海里,50 年后仍然对这些场面记忆犹新:"我站在那儿看着它,"他写道,"想到世界上的其他任何角落都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地方了,因为那时还没有秘鲁,也没有想过会有秘鲁。"接着,作者伤感的表述回响在我们这个已经习惯于轻易侵入并肆无忌惮地改变与已不同的世界的 20 世纪:"所有这些我看到的景象在之后都被摧毁,失落无踪,没有留下半点残余。"

从 16 世纪开始,有关西班牙人找到一个陌生而强大的帝国——一个"失落的世界"——然后征服并摧毁了它的故事,就开始使人们为之

着迷。在传统的历史中,征服墨西哥的故事成了西班牙权力的象征,而这也源于欧洲人"天生"的优越性。但是随着人们对土著社会了解的加深,历史学家不再将西班牙人的优越性作为想当然的理由。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一小队士兵可以征服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并建成殖民地呢?最近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孤立的世界本身就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在 1492 年之前,那个世界里只出现过不规则的"新"与"旧"世界的接触,土著居民对欧洲人和他们的黑奴身上的病原体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当这些病原体进入印第安人的生态系统时,当地居民面临的是灾难性的瘟疫。瘟疫带来的高死亡率减少了反抗人口的数量,而反抗体系的崩塌也从另一方面使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统治有了可乘之机。

214



西马德雷山脉是墨西哥最壮丽的自然景观,它是从北向南贯穿墨西哥,并一直延伸到美国的洛基山脉。它在墨西哥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这里勘查出了好几个世界上最丰富的白银和矿藏矿区。这里还是许多拒绝融入墨西哥这个国家的地方群体和小社群的家园。

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进一步指出,不仅仅只有外来的疾病帮助欧洲人入侵到新西班牙和美洲的其他地

区，而且是疾病连同入侵者们带来的试图在当地重建欧洲环境的植物和动物（他将它们称为“生物旅行箱”[partmanteau biota]）一起作用的结果。他指出，欧亚非的疾病组成了一支“突袭部队”，而伴随着所有外来物种引进而导致的生态变化则为巩固军事侵略的成功、发展长久的殖民模式以及占领大片的土地立下了汗马功劳。大片的土著风景被欧式风景所替代，大量的土著居民被欧洲人和非洲人所替换，这样的生态改变过程完成了一次生物学上的征服。克罗斯比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这一概念来描述欧洲人和他们的生物旅行箱对美洲（以及之后的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的入侵过程。

215

克罗斯比研究最多的是他所谓的“新欧洲”的形成，例如：加拿大、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用克罗斯比的术语来说，这些是“人口接管”之地：在那里，欧洲人及其后裔在人口数量、经济和政治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在那里，牛羊成群；在那里，草原和平原上小麦和大麦飘香；也就在那里，大大的果园种满了欧洲的水果。在这些土地上，无处不在的欧式风景时刻向人们展示入侵的生物旅行箱在生物学上的成功。

而墨西哥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尽管墨西哥的自然景观随着诸如牛、马、驴、绵羊、山羊和猪等动物，以及小麦和果树等植物的引进，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景观同时也反映出土著环境和文化的继续存在，西、印两大族群混合后带来的种族和文化的发展。西班牙人的确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在墨西哥占着绝对优势，但在人口数量上，他们的数量从未超过土著居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人口数量的主导地位。墨西哥的自然景观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诸如小麦和牛等引进的农业要素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当地的品种，如玉米等，仍旧在国民经济和自给经济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墨西哥的征服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土著居民的景观被欧式景观取代。正如克罗斯比指出的，墨西哥不是“新欧洲”。

生态帝国主义在墨西哥的表现和在其他地区很不相同：西班牙人引进到新西班牙的植物、动物、害虫、杂草和疾病与北美洲其他地区几

乎相同，按理来说应该会引起相同或相似的生态过程，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我们在本章中将在研究欧亚非洲的疾病、植物与动物对土著环境产生的冲击的同时，也探讨中美洲生态和社会对入侵者的影响，以及西班牙殖民环境的形成和结构。自然环境在此不再是一个人类活动的静止背景——一种只在被人类利用时才会显现作用的自然资源，而是造成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因为在墨西哥历史研究方面，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我们只掌握了其中的一半内容，也许比这更少；因此，以下只是我们对西班牙入侵后墨西哥环境的简要、初步的讨论。

在研究殖民地环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西班牙到来之前的墨西哥本土环境和社会状况作一个简要的陈述。

一个关于埃尔南·科尔斯特的故事提到了这样内容：当查理五世询问科尔斯特墨西哥的样貌时，科尔斯特弄皱一张羊皮纸，然后把它扔到桌上，说道："就像那样！"虽然这无疑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但却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墨西哥的地理特征：中央高原的高地从墨西哥山谷的正北一直延伸到得克萨斯；而加勒比海尤卡坦半岛的低地则相对平坦（至少包含相当多的平坦台地、盆地和河谷）；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仍是支离破碎的山地。

216

中部的高原地区从北部的近海区域开始上升，到墨西哥山谷时，其海拔已经达到了 5 000 多英尺。两条长长的山脉（东马德雷山脉和西马德雷山脉）就如两条人类的脊柱一般顺着中央高原的两边蜿蜒而下，并在墨西哥山谷周围达到了最高点，形成了海拔 1.8 万英尺以上的山地，这一高点就坐落于墨西哥西部最为狭窄的地区——人们所熟知的新火山轴，我们也可以想象，从这一最高点开始，随着海岸线的越来越近，其地势便开始急剧走低：从墨西哥山谷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沿岸，墨西哥的地形开始了多级跳：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Puebla-Tlaxcala）山谷，夸乌特拉-马塔莫罗斯（Cuautla-Matamoros）山谷和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山谷，最后是很长的一段悬崖峭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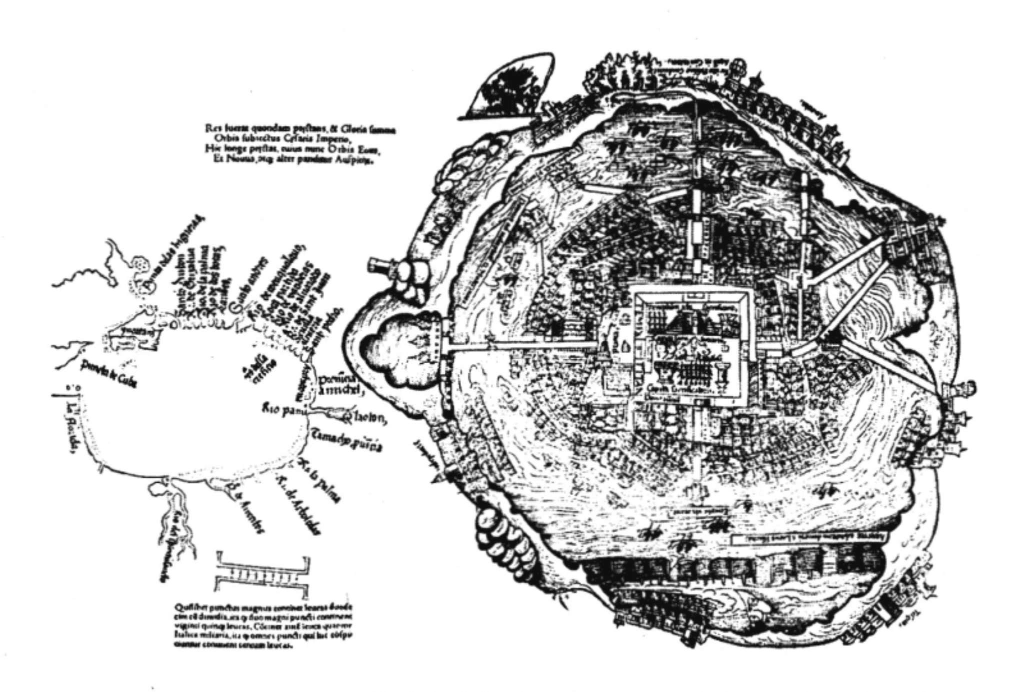
这个狭长的、金字塔型的大陆分隔了两海洋：东部的加勒比海和西部的太平洋，而这两大水系对墨西哥的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

每年形成于加勒比海的飓风会给这个国家东部沿海的夏季带来大量的雨水,有时甚至影响到更远的内陆地区;而起源于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则会在某些特殊的年份强烈地影响当地的气候,改变雨季的时间和强度。尽管三分之二的墨西哥大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因此它应属于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但事实上是,由于三分之二的国土是由海拔极高的山地和峡谷组成,除了沿海地区和低洼地区符合热带气候风貌以外,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的气候特征。海拔在这些山地的地区气候形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人过去根据海拔定义的地区气候一直沿用至今:海拔 1 000 米以下的地区被称作热带地区;海拔处于 1 000 到 2 000 米的地区被称为温带地区;而 2 000 米以上的地区则被称为寒带地区。因此,墨西哥山谷的盆地地区虽然地处亚热带,但是按照海拔的分类定义,该地区仍是属于温带地区,而盆地周围的山地则是寒带地区。

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年复一年都循环着这样的气候规律:温暖潮湿的夏季和寒冷干燥的冬季,但是即使在很近的距离内,地区之间也会有着极大的差异。纬度、海拔和山中的位置都对某个区域的气候特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处于雨影区的地带年降雨量比较少。但从整体上看,墨西哥南部的雨区有着丰富的降雨量和极少的气候变化,而北部地区的气候则以雨量相对较少且气候变化显著为特点。土著人的聚居形态早已反映出墨西哥大致的雨带分布:大量定居农民常常聚集在雨量充沛且年气候变化极小的南部地区,而轮作流动性强的农民和狩猎者则出现在雨量稀少难以预测的北部。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很久以前便学会利用不同气候各自的优势种植不同的产品,并与从属不同生态系统的居民实行物物交换。

217

到了 1519 年,当地的广泛系统和长距离贸易已经把从属于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并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人口体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由农业人口组成的,而根据其流动性的特点,我们将这些农民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住在村庄的定居农民,他们通过自己的劳作,生产了大量用于生活、制造和销售的原料,同时也用于缴税和进



阿兹特克人绘制了这张特诺奇蒂特兰的地图(已知最早的该城地图),并把它献给了科尔特斯。图中有大量居民区,表明该城人口稠密。在同一张纸上还绘制了墨西哥湾沿岸的地图。科尔特斯在写给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描述他的远征情形的第二封信中,附上了这张绘有两张地图的纸。

贡;第二类是在各地不断迁徙的游牧农民,他们常常根据土壤的肥沃程度和水源变换自己的农作物和耕作地点;同时,还有大量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城镇的居民,而且特诺奇蒂特兰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些土著居民群体有的组成了土邦和帝国,其他的则形成了小型的独体社会,但无论其规模和复杂性如何,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墨西哥的自然景观,因此也影响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定居型的农业和密集的人口给前西班牙时代的自然景观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的活动并不都是良性的,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定居型农业对当地植被的改造:为了生产足够的日常食物、以及用于织造衣物和其他方面生活用品的原材料,当地居民常常会清空整片土地。另外,在一些复杂的生态系统区域中,当地居民建立了更适合大量生产的单一农业生态系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密度的增加,当地居民也对地理环境做了进一步改造:他们加

218

强了农业生产，当肥沃的土地用尽时，便把边缘地带也用于农业生产。在那些供水不平衡、降水量不规则，或因人为活动太剧烈造成水源不足的地方，农民则发展了诸如沟渠灌溉之类的用水管理系统。

这些改变都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后果。砍伐森林和边缘土地的开垦——特别是在陡峭的山地——可能导致水土流失等问题。地表植被的单一化，以及作物的密集化种植会加剧生态系统中营养物质的外流，从而引起土壤贫瘠。此外，沟渠灌溉也往往导致土壤盐碱化。毫无疑问，当时的土著农民都遇到过以上这些问题。例如，考古学家就曾发现前西班牙时期各个阶段土壤遭到严重侵蚀的大量证据——通常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谢尔本·F. 库克(Sherburne F. Cook)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理论：前西班牙时期不同阶段的大量定居人口导致了严重的土壤侵蚀问题。库克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很多考古学家在解释例如 9 世纪玛雅文明的崩溃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观点。

库克还指出，西班牙入侵前大量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严重的侵蚀现象，因此当西班牙人到来时，墨西哥中部的环境已经濒临生态崩溃的边缘。但这一论断较难证明，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的到达还是西班牙人到达之后使当地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土著人口的密度过大。此外，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土著居民在减缓人口增加和密集型农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也有相当成功的经验。他们不断地与土壤侵蚀作斗争。比如，他们在山坡上开垦梯田，在沟壑上兴建大坝，他们把收获后的茎秆留在地里以防止泥土直接被风侵蚀，他们还把树和灌木种植在农业用地的周围，以起到防风和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虽然有些地区的梯田由于建造速度太快和缺乏足够的养护而坍塌，还将大量的泥沙带至山谷，但大多数地区的梯田在防止侵蚀和侵蚀扩大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西班牙时期的农民不用去处理放养动物的破坏性行为：踩坏梯田、踢倒防护墙等，这也有好处，因为在没有这些食草动物的地方，被废弃的梯田的大量泥土会因杂草和灌木丛的生长而得到稳固。

219

土著游牧农民也发展了一套旨在维持土壤肥力的措施，例如将土地闲置一段时间或对土地施肥等。除安第斯山区以外，印第安人很少驯养动物，因此他们缺少在欧亚农业中用作重要肥料的动物粪便。他们用绿色肥料（收获后剩下的植物叶茎和杂草）和人类的粪便代替动物肥料，补充土壤的肥力，但这些做法都对欧洲人到来前后当地病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和单一文化系统中所采用的作物轮种制不同，当地土著农民采用的是混种的种植方式：他们在同一个空间内种植好几种不同的作物。即使是最简单的土著农业生态系统——传统的玉米地，也是混种的：豆类和南瓜常和玉米一起种植，随着作物的生长，玉米的茎秆为豆类提供了支撑，而大量的南瓜铺在土地表面，既保持了土壤的湿润又防止了杂草生长。种植玉米对土壤的含氮量要求较高，而豆类则正好善于将空气中的氮固定在土壤里。通过将玉米和豆类混合种植，土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种植玉米对土壤造成的极端损害。

为了使农业产量与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相一致，土著农民发展了一套更为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不但要求土壤在消耗大量养分的同时仍然保持肥力，而且要求开发出一整套水源管理体系以确保供水的稳定。于是，沟渠灌溉、导洪灌溉、排水和湿地的管理都被当地农民搬上了历史舞台。湿地农业是美洲土著居民集约化农业实践中最为闪亮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土地管理体系之一。湿地农业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奇南帕”（Chinampas），也就是所谓的墨西哥山谷中的水中田畦。奇南帕的前身是当地农民将植物种植于沼泽上的一个竹篮结构中，并由水面上的竹竿加以支撑的种植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结构趋于稳定，同时长、低、窄的种植平台也被相继运用到高于水面的系统中。树木和灌木被种植于平台的边缘用于加固。狭窄的奇南帕可以保证种植台面中部的植物也能通过其根部获得充足的水分，同时也避免了由上而下灌溉引起的土壤盐碱化。如果奇南帕太宽就会产生岛屿效应，那么中间的植物就会由于周围植物的过滤作用而吸收不到水分，从而需要人工浇灌——同时也带来了盐碱化的问题。随着奇南帕数量的增加，一个更

为复杂的种植模式和沟渠灌溉系统开始发展起来。沿沟渠而行的独木小舟将奇南帕上成熟的作物带至市场,同时将种苗和人类生活的垃圾(用作化肥)带回平台。定期的疏浚保证了运河的畅通和清洁,而河底肥沃的淤泥也会被用作奇南帕土壤的肥料,以使奇南帕土壤保持足够的肥力继续种植农作物。

奇南帕是遍及四处的湿地管理系统中的地方典型,这种系统开发于前西班牙时期,并被一直沿用至今。这种系统通常被称为垄状的或抬高的田地,其鲜明的特色是由沟渠分开被抬升的种植表面。垄和渠的作用根据各地的水文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在多年生的沼泽地区,垄和渠起到抬升种植表面,以防植物烂根的作用;在每年发洪水的地区,这些沟渠则既有雨季时的排水功能,又有旱季时的储水功能。湿地农业系统可大可小,小到由个人修建和维护的单独高地,大到玛雅地区和墨西哥山谷一带大范围的山脊状土地。当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山谷之时,正好赶上霍奇米尔科湖(Lake Xochimilco)三分之一的面积被开垦并转变为奇南帕。在某些地方,这一系统被用来扩大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但在类似于墨西哥山谷的其他地区,这些系统为城镇居民提供了绝大多数的食物来源。

与此同时,土著农民也实行涉及生态系统管理和单一农业生态体系的广泛的土地管理系统。这种土地管理的方式之一便是轮垦农业。在当代人的观念中,轮垦农业是通过简单粗糙地砍伐和烧毁森林来耕种诸如玉米之类的植物的一种管理系统。人们认为农民通过烧毁树木和灌木,利用草木灰来补充土壤的肥力,此外,农民们常常在耗尽某一块土地的养分后就搬迁,到其他地区继续重复这样的动作。但是,关于轮垦农业的最新研究表明:轮垦农业并不仅仅是在一片森林的空地中短期种植某些植物;相反,它是长期管理和使用森林的一个系统。玛雅人将轮垦阶段(即在一片森林的空地上种植玉米的时期)看成一个由不同植物联系起来的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整个过程会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多的时间。轮垦农民利用森林中开垦出的土地种植作物,而在农民利用完之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会渐渐长出草皮、灌木、树木,并

引来栖息的动物，从而再次变回森林。他们了解并命名每一个阶段。在他们心中，轮垦阶段和之后的各个阶段一起预示着人类的活动可以带来森林的回归，因此也证明了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而不是一直向前的。

和其他的土地管理系统一样，轮垦农业也模仿了自然界中的过程，比如飓风和火灾的效应。飓风和火灾在森林中销毁了大小不一的树木冠层，给再生的植物提供了足够的阳光和土壤，以此开始了连续的植物组织再生过程。尤卡坦半岛的住宅花园和人造森林则是另一种模仿植被的现代农业生态系统。例如，住宅花园包含了家养和“野生”的植物品种，人们模仿当地的植被特征，排列种植这些植物。而尤卡坦半岛的人造森林(pet kol)则更为有趣：它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误以为是孑遗森林，直到发现这些孤立的生态系统中所生长的某些植物品种根本不产自该区域，人们才得知事实的真相。当地的农民视人造森林为森林复兴之源和重要植被之源，因此他们常常会小心翼翼地用石墙保护起这块区域。

221

考古的证据表明，土著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模仿和利用着身边的生态系统。的确，人们发现野生的玉米和豆类一起生长的遗迹，而其生长方式与后来印第安人栽培玉米和豆类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豆类沿着玉米茎秆生长。而一些研究者也根据以上的发现指出，土著农民在栽培玉米和豆类的过程中正是自觉地模仿了自然生态系统。

这种土著农民利用、管理和模拟生态系统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土著掌握了一些现代农民，甚至当今大型农场的农民所未知的秘密。现代农业领域人造化相当明显，而我们也已经习惯将农业定义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而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真正的农业距离我们并不是特别遥远。我们应该还记得就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和欧洲，很多现代农民的祖父还在荒地上寻找药品、食物、木材等东西，他们还运用技术修剪树木，并用这些剪下的茎条制作篮子、储物箱、家具等物品。

美洲地区较为不寻常的现象是，当地的印第安人驯化的动物种类非常有限。基于自己对中美洲地区的研究，奥尔加·利纳雷斯(Olga

Linares)指出,美洲土著并没有驯养特定的动物,而是相反,通过种植一些特别的植物,用自己生活的环境吸引那些他们希望利用其皮毛、皮革和肉的野生动物。所以,他们驯化的是生态系统而不是某些具体的物种。不论是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还是之后,有限的家养动物都对土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缺少动物帮忙牵引和搬运就意味着,所有的农业系统中都必须由人力借助不同的工具来完成相应的任务;缺少动物还意味着,当地农民没有了一大部分肥料的来源。猪、绵羊、山羊、牛和马的引进的确给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肥料,同时也节省了人力,但是也带来了不利。到 1519 年,墨西哥本土的自然景观已经被几千年的人类活动所改变:随着人口的增减,森林被砍倒又重新变回森林;地表的植被被简化、利用,并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土壤被堆积起来又被冲刷干净;水被引入沟渠,并用于高度复杂的土壤水源管理系统;种于轮垦地、奇南帕、高地、梯田和洪泛区的植物也是该地区之前就已经栽培的植物;而 1519 年耕种于这片土地的农民也是发明这些系统和栽培这些植物的先人的子孙。 222

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自然景观和维持着这个植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生态系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养的动物第一次进入了这块对其陌生的土地,对该地区的自然植被、土壤和水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的植物以及土地和水源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时间表,都用当时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着这个生态系统。土著居民社区和原来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在 20 世纪晚期,他们相当成功地再现了自己。但在西班牙人到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都随着陌生的人群、动物和植物的到来而被重新定义。但同时,土著世界也改变了这些侵入者,并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是土著原有的与引入的植物、动物和土地管理系统互相混合后的产物。

这个关于扩建、定形和再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对象。由于西班牙人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这一主题太过于宽泛和复杂,因此我们将本文只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疾病、植被、动物和水。

"... a la sazón de la tierra por todas partes hervía de gente."
("当时[16世纪20年代]这块土地上各处都挤满了人。")
——托里维奥·德贝纳文特·莫托里尼亚修士

也许西班牙的入侵给墨西哥环境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后果就是大量疾病病原体的引入,包括天花、水痘、麻疹、流感、百日咳、伤寒、霍乱、猩红热、疟疾、黄热病、鼠疫和白喉。事实证明,土著居民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病原体的袭击。他们被流行病的易感染程度、毒性以及带来的高死亡率深深震撼,而这些流行病就是所谓的"处女地"(virgin-soil)流行病。

顾名思义,处女地流行病是指发生在从未接触过此类病原体的人口身上的流行病,其特点就是传染率高、死亡率高,尤其对15至40周岁的人群——即主要的食物生产者和看护人员。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由于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因此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就是病毒的"处女地"。而在美洲土著身上,由于他们与欧亚非人群的长期隔离,从未感染过那些病毒,因而他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对这些病毒毫无经验,所以传染病一旦爆发,其传播的速度就非常之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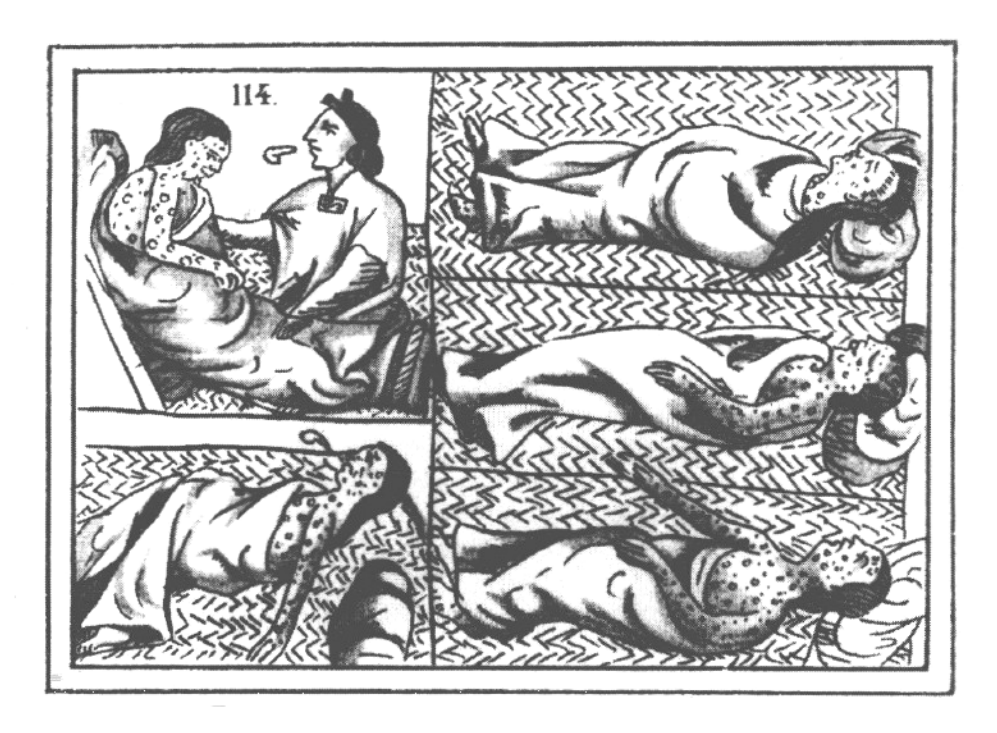
在新西班牙,至少在初期,没有储备具有免疫力的土著居民来照看那些被外来病原体感染的病者;虽然一些西班牙人试图提供帮助,但是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而被感染的病人却暴增。因此,死亡率上升的程度在任何一个欧洲感染区都无法看到,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速下降。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自己撰写的一篇关于处女地流行病的经典论文(1976年)中指出,土著社区所面临的问题随着人们对死亡的必然性的普遍接受和绝望的加深而变得日益严重,尤其当人们认识到,当代医学实践无法防止感染,更不用说避免死亡时,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由于没有人对这些流行病有经验,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而恐慌的人们四处逃散,则常会将病原体带到远离病发区的其他地方。克罗斯比还特别提到,伴随着侵略者进入美洲大陆的大部分病原体,即

使在其家乡也有着致命的威胁。麻疹、百日咳和水痘尽管致病死亡率已经大大降低,但仍对儿童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人们对这些疾病仍将束手无策。为了保证病人不发生肺炎等继发性感染,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要确保病人得到足够的水和食物。可是,在处女地流行病的情况下,主要的食物生产者和看护人员是受病毒感染最为严重的群体,那些感染的幸存者常常死于继发性感染、饥饿或脱水,甚至是以上三者的共同影响。1995 年扎伊尔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使我们对处女地流行病所制造的恐慌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人对此病有免疫能力,感染原因不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阻止这场瘟疫,而死亡的到来却快得异乎寻常。

就算是在“处女地”的同等条件下,当时的美洲土著在疫病流行期间的长期和短期的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从单种流行病的短期感染来看,某些流行病在某些人群中的死亡率已经达到了 75%;从长期来看,新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在其第一个 100 年里总人口减少了大约 90%;此死亡率堪与 14 世纪在欧洲引起恐慌的黑死病相比,后者的死亡率达到了三分之一。

224

对美洲土著有着如此高的死亡率的传统解释是:土著人天生比较羸弱。大批美洲人死去时欧洲人却顽强地活下来了,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欧洲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性。最近的解释更多地关注美洲的人口史,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对处女地流行病出现的解释一样,这些研究者关注疾病本身的历史和环境因素。比如,克罗斯比指出(1976 年),超高死亡率的出现主要因为,这些土著社区并不是被一种疾病感染,而是同时受多种流行病的困扰,而这些传染病在感染之后的约 100 年又重复出现。弗朗西斯·L. 布莱克(Francis L. Black)指出(1992 年),美洲土著相对较高的同质基因族性(原始迁徙次数有限的结果之一),帮助了疾病的快速传播,并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布莱克指出,因为病毒的基因结构适应了某一主体后,也比较容易适应与主体基因结构相似的其他机体,当病毒在基因结构相似的主体,例如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传播时,其致命性会随之提高。因为美洲土著人曾是,并仍然是具有同质基



一场天花疫情袭击了阿兹特克帝国，尤其是特诺奇蒂特兰城。这场疫情在特诺奇蒂特兰传播的时间大约是在西班牙人逃离该城和他们后来反攻回来企图完成征服之间。

225 因的种群，病毒在直系亲属以外的基因相似主体中传播的几率也就更大，而致命性就相对而言要比其他人群高。因此人口历史——有限的移民次数和定居点的封闭性——不但揭示了土著人口易感染之谜，而且解释了欧亚病原体在美洲毒性增强的原因。

环境因素对新西班牙最为明显的影响也许是驯化动物的引进，以及资源开发新系统的发展，例如采矿和放牧。由于美洲土著社区家养的动物相对较少，土著也很少与大量的动物近距离接触，因此避免了很多人畜之间的传染疾病。但是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西班牙人把各种各样的动物，如鸡、鸭、猪、山羊、绵羊、牛、马和驴等带到了中美洲地区，这些动物通常被带进乡村和土著人的家庭，并对土著文化、社会和疾病环境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家畜带来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的水源被污染。土著居民愤怒地向西班牙官员抱怨饮用水水源被动物的粪便、动物走进堤坝

和灌溉水渠踩起的烂泥、屠宰场的废弃物、制革厂和木料加工厂的污水等污染的情况。其实在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些污染以外,更有致命的微生物被这些动物一起带入当地的动植物群的疾病环境。

毫无疑问,远在西班牙入侵者到来以前,土著居民的社会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微生物,它们通过人类粪便肥料的使用和排污管进入河道。当时的土著居民收集和食用池塘、湖泊中的海藻的事实也暗示着人类对水源的污染。但外来家畜身上携带的外来微生物,以及西班牙人入侵时携带的微生物,无疑都增加了不能适应这些微生物的人口得病的概率。与此同时,大量外来动物的引入也使已有的微生物产生新的变种,或为全新的病毒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最新的研究表明,与家养动物共同生活可以导致动物病毒向人类转移(莫尔斯[Morse],1990)。在转移的过程中,动物的病毒往往会在人类社会中制造出一种“全新”的疾病——尤其是病毒,因为病毒的毒性在转移的过程中会不断增强。

好几种处女地流行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小范围内反复发作,会导致这部分的人口全部消失。然而,几种处女地流行病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反复发作却不会导致整个人口的灭亡,尽管人口规模会急剧下降,同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会显著减少,并会发生人口统计学中的人口崩溃现象。举个例子,在新西班牙殖民地建立后的第一个百年内,随着土著人口慢慢获得对那些外来疾病的免疫力,欧亚非的流行疾病开始成为地方性疾病,偶尔才会突变成流行病;但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印第安人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 226

1519 年科尔特斯抵达墨西哥时土著居民的人口规模、其下降幅度以及人口的破坏程度,都是充满争议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了解西班牙人的征服过程和 16 世纪末殖民社会的形态,还要了解前西班牙时代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在今天的墨西哥版图内,对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到来时人口从 2 500 万到 200 万多种估计数字都有,鉴于 16 世纪的人口文件的性质,“多数派”(这些人认为原始人口很多,并在西班牙人到来后大幅减少)和“少数派”(这些人主张原始人口很少以及人口减少幅度很低)之间的辩论估计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当研究者们开

始把视线转移到人口下降的绝对数量,而不再考虑其究竟是按90%、80%,还是50%的速率递减,讨论依旧热火朝天。不过,当我们跳出个别学者对具体数量和递减率的争辩,没有人对人口崩溃这一事实提出过反对。

土著居民人口数量的减少也从自然景观中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耕地数量的减少和休耕地的扩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开始减少,城镇的规模开始缩小,一些村庄甚至消失了。与此同时,土著居民的社区被迫承认西班牙政府所设置的新的管理体系和生产体系。也就是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地域内的存在开始变得愈发明显——尽管入侵的人口在数量上仍然少于土著居民。因此,无论土著居民实际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尽管经历了人口的大幅减少和16世纪中期以后西班牙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土著居民还是在数量上保持着优势——而这一事实也影响了西班牙的统治政策以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在人口急剧减少后的17世纪初期,新西班牙的土著居民数量开始增长,到了18世纪末,其社区又开始面临人口过多、土地贫瘠和水源短缺的问题。事实上,殖民主义时期墨西哥所有种族的人口数量都有所增长。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相关的压力和问题与日俱增,而此类矛盾在总督辖区内的城市和城镇显得尤为突出。过于拥挤的城市与极差的卫生条件使这些城市再度成为霍乱和伤寒之类的流行病滋生的场所。城市的管理者自此开始了区分纯粹的"城市"和严格意义上的"乡村"的进程。

227 土著居民的人口在经历了16世纪的急剧下降和占有空间的改造之后,其数量在17和18世纪开始出现稳步增长。在其他方面,引进动物的数量也开始快速增长,随之造成新的资源开发体系的瓦解。当然,也增加了许多新的作物、果树和花草等等,这些都是新西班牙在植被方面的变化。但是情况仍然非常复杂,换句话说,在墨西哥的版图上,我们找不到一处由西班牙人直接取代土著居民在那里生息的地方。既没有找到西班牙人的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系统直接替代土著人的系统的情况,也找不到一种不受新引进的动植物品种影响的土著土地利用系统。相反,土著居民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品种(除一些重要的以外),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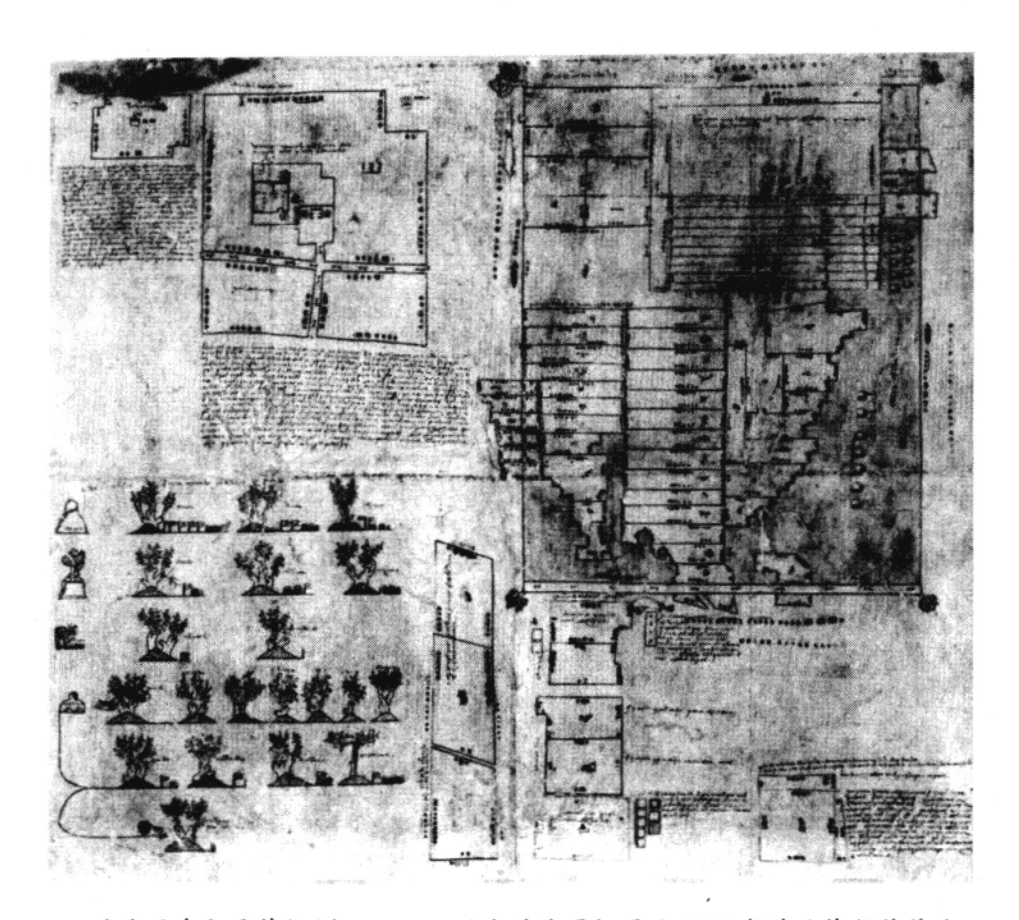
如此，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新的物种还是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许多(有时甚至是深刻的)生态社会的变革和文化变革。而目前的研究也已经开始涉及和展示新西班牙时代植被变化的新格局。

正如本章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精确且公平地说，前西班牙时期的毁林与人口密度有着直接的联系。粗略地说，在人口数量多、密度高的地区，毁林有利于清空土地，为农业集约化提供生产粮食所需的空间；而在人口较少的游牧民区，毁林的行为则相对较少。

但随着西班牙人进入新西班牙，人口数量与砍伐森林的直接联系发生了变化。在西班牙殖民主义时代，这种森林砍伐与人口密度的直接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往往与之前的经验相反：毁林更有可能发生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西班牙人发展了全新的资源开发系统，他们经常转移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并清除那里的森林。银矿和放牧这两种西班牙人利用资源最重要的形式，都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带进行。以萨卡特卡斯州和瓜纳华托州的大银矿为例，这两座银矿都坐落在离墨西哥城几百公里的人烟稀少的北部地区。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常常在城市的周边放牧，但作为墨西哥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典型特征的巨型牧场都在北部地区。

采矿与大范围的树木砍伐有着密切的关系，矿工需要大量的木材进行矿井建设，或用作提炼金属银的燃料。矿工以矿井为原点，不断扩大在周边森林的开采范围。未来森林的再生应该还有可能，但矿井周围的地区早已被清空并被用于粮食生产和放牧。动物由于其对矿井地区有特殊的利用价值而被大量引入：它们的皮革在塑料时代来临之前有着无数的用途，例如制造搬运矿石的袋子；而活的牲口则被用来搅拌矿石和向墨西哥城运输提炼好的银；此外，动物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肉类食物。 228

在征服时期，土地清理在城市中心附近仍持续进行。为了生产石灰以及更重要的木炭，西班牙人加快了已在进行的森林砍伐的速度(关于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土著人是否生产木炭，目前仍有争论)。他们建造市镇时，砍伐了大量木材来搭建教堂屋顶。因此，尽管森林砍伐仍然



这张画在阿马特纸(Amate paper)上的地图标明了1540年前后特斯科科的土地状况。这类以前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的绘本记录,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仍在沿用来记录土地、人口普查和交纳贡赋的信息。这幅图上有西班牙语和纳瓦语双语说明文字,记录了75块土地的信息。在图的左下方,画了一些嫁接在本地树木上的欧洲果树。

和城市生活相联系,其最终的用途已经不再是为大量的农村和城市人口获取食物和生产原料而腾地。事实上,随着入侵者携带的病原体进入美洲,土著居民人口数量锐减,其社区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已经缩减了将近90%。人口数量的猛降也导致了农业用地面积的缩小,尤其是那些最好的可耕地和湿地的面积大幅缩小。与此同时,休耕地数量却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森林的再生,但是西班牙人的土地使用和管理,如为开矿伐林腾地,使其再生的速度大大减缓。和矿区一样使森林的再生速度减缓的还有广泛的放牧,后者相对其他手段影响更为明显。

229



在17世纪初期，西班牙人仍然在使用非常原始的方法来提炼白银。这幅画描绘的是1599年时一个银矿的景象，印第安工人在用皮袋背矿石爬出矿井。

在讨论放牧对天然植被和土壤造成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在新西班牙特定地区替代土著农作物的两种重要的外来植物：小麦和甘蔗。小麦是西班牙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当他们来到中美洲后就竭尽全力要求当地居民种植小麦，并作为其向殖民者进贡的贡品之一——但是收效甚微。小麦所面临的问题是，当西班牙人引入该物种时，他们试图用它来取代土著居民的谷物、玉米等，因此它面临来自习惯和喜好方面的激烈竞争，同时也受到具有宗教背景的当地玉米的威胁。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玉米不仅仅是他们赖以活命的粮食，而且是与他们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息息相关的因素。此外，小麦的种植也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小麦一般春播秋收，而这一时间段刚好与当地农民

栽培玉米的时间重叠,因此就有了与种玉米争劳力的问题。不仅如此,小麦在春天播种也就意味着小麦在成熟之前必须经历夏季的暴雨,大量的雨水和偶尔的霜冻往往会导致农作物失收。除了以上问题,适合制作面包的小麦很容易烂根和得锈病。当西班牙农民发现了春播带来的不利时,他们将小麦播种的时间移到了秋季,并通过灌溉技术帮助植物度过干燥的冬季,迎来春天的收获。这一时间上的改变解决了大量问题,但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又需要建造庞大的粮仓来存储小麦,以防它们被第二年雨季时的雨水淋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根据当地的耕作时间和气候调整自己的耕作制度。

相反,甘蔗的生产没有遇到种小麦那样的挫折,但它对新西班牙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引进大量的黑奴,殖民政府解决了甘蔗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耕作制度问题,墨西哥湿热的气候环境尤其适合甘蔗的生长。然而,蔗糖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木柴用于甘蔗制糖,这会造成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

尽管甘蔗和小麦对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相当重要,但相对来说,其种植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受到了限制。相比之下,放牧的牲畜几乎很快就遍布了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圈养的动物也开始成为家庭、村庄和庄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 16 世纪末成为殖民地的普遍现象。对猪、山羊、绵羊、牛、马和驴的简单引进使当地的植物群体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当有蹄类动物(如羊、牛、猪和马)进入一个陌生的生态系统时,往往需要 11 至 13 年的环境适应期。过了适应期,也就是当它们开始完全适应新的气候和植被后,这些动物便开始以极快的速度繁衍;而如果它们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比如温带的动物无法适应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时,这些动物便会死亡。有蹄类动物种群快速增长的关键是可食草料的数量。如果草料的数量远远多于已有动物的需求,有蹄类动物种群就进入了“爆发期”,其数量开始成倍增长:充足的食物促使雌性蹄类动物的繁殖年龄提早,每胎的幼仔数增多,幼仔的存活率提高。牲口的数量一旦超过现有草料的承受范围,其数量又会下降,直至两者适

应,牲口的数量才会稳定下来。这种由增长、暴增、减少到最后调整的整个过程被称为有蹄类动物的急剧繁殖期。

植被群也经历了一个互适的过程：随着动物种群数量的大量增加,植被群开始减少;在动物种群减少时又得到复苏;最后,植物和动物种群开始互相适应。这个适应的过程往往是动态的,动物和植物的数量在不断地震荡中互相影响：只要有丰富的植被,动物的数量就开始增加,但一旦超过植被的承载能力,其数量又开始减少。从外来动物的引进到植物与动物群落相互适应,需要经过 35 至 40 年的时间,这一过程被称为繁殖震荡期。

231



图中,土著农人正在锄玉米地。文明降临在我们今天称为墨西哥的地区,是伴随着对农作物的培植而来的,这些作物包括南瓜、豆类、辣椒以及最重要的玉米。虽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风云变幻,但玉米饼却一直是墨西哥人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

而植被群发生的转变并不只是数量变化那么简单。当有蹄类种群进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后,当地植物种群的结构和组织形式都会发生较为彻底的变化。高大的草类会被矮小的草类替代;植物之间的空隙增大;干旱地带的物种——仙人掌开始入侵更为干燥炎热的地方。那

些不能承受啃食和踩踏的植物被抗踩踏或味不甘的植物所替代,后者大多属于木本植物。牧豆树是墨西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典型的外来树种;墨西哥刺木的木质茎秆上长有大量尖锐的刺,甚至连山羊也奈何不了它。随着植被的组成和结构的变化,相关的动物群数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最终的结果便是整个生物区域的改变。

人类通过控制动物的数量和密度也间接地影响了植被的变化。举例来说,当牧民高密度地放养动物时,他们扩大了植被的变化,同时也提高了因过度放牧导致植被在生长季无法再生的风险。由于在过度放牧的过程中,动物会吃掉树苗,剥取树皮,甚至刨地吃根,因此森林的可再生性大大降低了。从这些动物进入该地的生态环境之时起,它们就改变了植被分布,甚至使其消亡,从而对当地的土壤和水分的供应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牧草的大量减少使牧民开始踏上改善牧群饲料之旅,而他们的行为则可能导致植被和土壤侵蚀等不可逆转的变化。

232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为了刺激植被的生长,人们在新西班牙最常用的方法便是放火烧荒。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为了刺激牧草再生,中央高原的牧场地区在早春时节一直弥漫着烧荒造成的大量烟雾。过度放牧、硬蹄类动物的践踏和燃烧将地表的土层完全暴露于风雨之中。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如位于墨西哥山谷北端的梅斯基塔尔谷地(Valle del Mezquital),就在16世纪晚期出现了大范围的土壤侵蚀现象。

这种侵蚀模式清楚地展示了西班牙人入侵和定居以后复杂的环境变化。正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一样,前西班牙时期的侵蚀方式与人口密度相联系;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遗迹论证了,特别是在陡峭的山坡上,通过清除植被而开垦的土地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而引起滑坡和水土流失。西班牙征服时期水土侵蚀的特点则刚好相反,常常发生在地势低缓、人口密度小的地区,这些地方往往由于采矿、生产木炭或石灰、烧荒和过度放牧消耗了大量的植被,加重了对土地的压力,从而引发了土壤侵蚀。同时,放牧在其他方面也给土壤造成了压力:随着牛羊来往穿梭于水源地和牧场之间,土壤随着动物的踩踏而

逐渐压实和硬化,因而把水源地的水也用水渠引到了其他地区,通常还开沟引水。

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土壤受到侵蚀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与土著居民的脚犁相比,欧洲人犁地犁得更深,因此土壤的疏松程度便更高,也就更容易遭受风蚀。此外,欧洲人的犁地方式形成了原土著居民没有的排雨水的沟渠,加速了流水侵蚀。也就是说,同前西班牙时期一样,农业人口的聚居地也会发生侵蚀,但这种侵蚀不再与人类垦地活动相关,而开始与大量的绵羊、山羊和牛群有关。

墨西哥自然景观和环境方面的学者已开始探询与西班牙人入侵和殖民定居相关的植被和土壤的变化。由于缺少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植被的种类和范围的相关信息,情况显得有些复杂,因此我们得出的有关西班牙人和他们的生物旅行箱对墨西哥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一结论也缺乏足够的论据,只能被视为尝试性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大致情况。第一,殖民地时期大量的毁林情况与前西班牙时期大量人口的垦地没有任何联系,而森林的砍伐与大量放牧和采矿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面积毁林和水土流失往往发生在远离城市中心的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带。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城市中心采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引入家养动物,比如牛、猪和山羊;使用欧洲人的犁地方式——所有这些都加速了征服时期和殖民地时期城市周边地区的森林毁灭和水土流失。在农村地区,由于土著居民人口数量和耕地数量的减少,森林的覆盖率开始提高。因此,西班牙入侵者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以西班牙模式代替土著原始模式;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土著居民和西班牙人的经验都无法预测的更为动荡的情形。

233

小麦、面包、奶酪之类的奶制品、猪羊肉等肉制品和柑橘类水果等,以及葡萄酒、橄榄和橄榄油,都被欧洲人视为延续文明生活的必需品。从 1493 年哥伦布第二次踏上新大陆的征程开始,西班牙人和之后的其他欧洲人就开始了把自己生活必需的植物和动物引入美洲大陆的过程。这些物种常常首先被带到加勒比岛屿,并从那里由征服者和定居

者带往大陆腹地。1519 年,科尔特斯和他的部下带着 16 匹马和许多战犬一起进入了中美洲大陆;到了 1540 年,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洛纳多在他北上(前往现在的美国西南部)的旅程中带了大量的猪和马。西班牙人一旦定居下来,便开始饲养他们带来的绵羊、山羊、鸡、鸭、猪、牛、马、驴和骡子等牲畜,并将这些动物用于运输、耕地和骑行(骡子以其平稳的步伐尤其受到赞赏)。

引入美洲的动物在新土地上繁衍得非常顺利。事实上,很多动物在放养的过程中逃离了牧人的看管(或被故意放归大自然),成了野生动物,靠自己的能力在草原上和森林中生存,并以惊人的速度生息繁衍。有些物种,比如马,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美洲的环境并开始繁殖,但一旦它们适应后,其繁殖的速度也相当快。旅行者曾不止一次地赞颂北部平原上不计其数的马匹和马群。而那些由人类控制、居住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农业地区的动物数目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并开始与土著居民争夺空间和水源。动物闯进农田,污染村民的饮用水,吃掉土著居民食用和医用的植物,并踩踏其他的植物。随着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这片土地的承受能力时,它们的食物开始短缺,它们只能在绝望中食用植物的根充饥。到了 16 世纪 40 年代,印第安人不停地向西班牙官员抱怨动物毁坏其庄稼地,牧羊人和牛仔掠夺他们的妇女。西班牙政府立刻作出回应——颁布了相关的法令以限制牲畜的移动:西班牙人放牧的牲畜区域应限制在城镇的 1 000 步以外;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收割的牧草都将作为饲料;牛和马被放逐到远离人口稠密中心地带的区域;只有在远离城镇的地方才允许自由放牧。

234

由于疾病,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农田开始荒芜。动物数量的增长并没有造成多大的问题,但 16 世纪晚期动物数量的大量减少却带来了羊毛和肉类危机。此时,放牧及其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已经成了新西班牙一道独特的风景。即使在与西班牙殖民政府对抗的人口稠密的土著聚居区内,牧场主仍然成功地获得了大片的领地。有人对新西班牙用牧群扩展土地的方法进行深入考察后发现,这些牧群为人类入侵者创造了空间,所有牧场最后都名正言顺地被纳入殖民主义体系。



纳瓦人描述墨西哥如何被征服的绘本中的这幅图，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看到的科尔特斯的远征队登陆的情况。西班牙人有很多家畜，这在美洲可是件新鲜事，而且他们还有其他一些货物。除了马之外，船队还带来了羊、猪和一头耕牛，一名西班牙的书记员则在记录卸下的货物。

牧群跟随征服者踏上这片土地，并非常成功地在征服者的引导下开拓了新的牧场；但反过来其实也成立：牧场面积扩大——这些牧场成为殖民地的一部分——征服成功。用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话说，这些"杂草"般的投机家在纷争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让我们看看权力和生态系统是如何共同作用，使西班牙人实现其扩张和征服"梦想"的吧。 235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西班牙人是如何在这些人口已经相当稠密的地区引入动物的？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征服者一般都会为所欲为，而且并非所有的土地都适于耕作。那为什么西班牙殖民者没有将那些牲畜弄到"闲置"的土地上呢？最近的研究表明，西班牙人（至少在最初的时期）并不能为所欲为。原因很简单，他们初到中美洲大陆的时候人数不多，而土著人口却数以百万计，同时他们却很清楚地看

到，最适合放牧的土地正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农田，那里的水源是动物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西班牙人能成功地将动物引入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区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畜群的数量至少在初期是非常少的；第二，根据西班牙中世纪的法律和习俗，畜群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息繁衍，也就是说，牲主不需要为了放牧而特意腾出一块土地。因此，只要牧民们不要求放牧的专用土地，就可以继续将牲畜放养于庄稼地边，实行多种经营；只要畜群的数量有所限制，同时悉心管理不让其踩踏农田，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这些奇怪的新动物及其看管者（基本上都是非洲人）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了这片土地。而农业则正好与此相反，耕种者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才能耕种，如果夺取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土著农民早已拥有并正在使用最好的耕地，他们必定会反抗。

第二个要问的问题是，牧民是如何在农业定居区内驯养如此庞大的畜群的呢？换言之，他们是如何扩展的呢？1952 年，莱斯莉·伯德·辛普森（Lesley Byrd Simpson）指出：畜群数量的增加填补了人口数量减少之缺。但对 16 世纪位于中央高原的梅斯基塔尔谷地引入绵羊这一案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后发现，在人口数量还未崩溃之前，当地绵羊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畜群开始与农民争食。

人们还发现，当畜群的数量急剧下降的时候，当地的人口数量正好位于自我崩溃的底部。换句话说，家畜数量的增减与人口密度基本上没有联系。因此，畜牧业在当地的成功并不像辛普森所说的那样，是因疫病消除了人类这一竞争对手之故。相反，畜牧业之所以成功是保护土著社区的政策和动物引入美洲后的植被转型带来的意外效果。举例来说，殖民政府曾颁布法令，要求西班牙人必须在离当地村镇一定距离的地方生活工作，这在限制了印第安人对土地和所处村庄一定的自治权的同时，也使西班牙人能在大量的村外土地上施展手脚。随着西班牙人对使用土地范围的扩大以及相应的对印第安人控制区的限制，城镇外放养牧群的土地不断扩大。这也意味着传统的资源，比如林地等，也像农业用地一样被不断圈占。随着外来畜群领地的扩大，中美洲大

236

陆的土地开始发生更大的变化。有时原先的自然景观被畜群彻底消除，只剩下放牧后的痕迹。西班牙的牧民就常常使用这种方法来确认其土地所有权：西班牙法律赋予每一个土地使用者拥有该土地的优先权利，由于相比农业，畜牧业多年来在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应该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不仅仅是在上面种草和其他东西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西班牙牧民把牲畜群赶到了原本属于土著居民的大片土地上，并将其纳入西班牙的殖民体系。

但这不单纯是一个关于倒霉的殖民地农民被迫接受不请自来的文化的故事。以人类的"侵略军"和随之而来的外来畜群入侵造成的环境变化为代表的"推动因素"，毫无疑问有助于解释为何西班牙殖民者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占领如此广袤的土地。但是，在历史上还有一些被称为"吸引因素"的东西也在起着作用。很明显，外来畜群的最终胜利离不开这一事实：当土著居民发现这些牲畜可不断供应肉类、皮革和温暖舒适的羊毛等诸多好处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家畜圈养的队伍中。他们对来自日益严重的西班牙牧民侵占其农田的压力当然持抵制的态度，但是对家畜本身并没有拒绝。更有可能的是，那一大群牛羊使土著社区和部落首领拥有的当地植被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我们在瓦哈卡、特拉斯卡拉、梅斯蒂特兰(Meztitlan)和梅斯基塔尔谷地就找到了土著部落和个人拥有大片牧场的大量证据。将放养畜群引入农业土地，有点像将特洛伊木马引进了城：通常不会将一大群动物集中赶入某个地区，相反，它们从内部扩大并占领空间。最初被引入的一小群牛羊对周围基本上不会产生影响，但当它们的数量增加，所需的空间变大时，当地的环境也就发生了变化。土著社区则变成了牧区和农业世界的一部分。

牧区不断扩大的历史再次证明了克罗斯比关于生物因素在欧洲人扩张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论点。引入放养畜群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因为这些畜群并非只身来到美洲大陆，而是作为更加庞大的"侵略军"的一份子。入侵者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们在入侵的同时带来了生物旅行箱，并造成了深刻的环境变化。即使欧洲人在人口数量上不占优势，

237

他们也还是实现了自己对当地的土地和人的控制。

新西班牙发展了适合各地不同环境条件、文化和需要的不同形式的农牧业。某些地区的畜牧生产管理系统是从西班牙带入新大陆，并在相似的环境中实施的。比如来自西班牙南部海滨沼泽地区（拉斯马里斯马斯，las marismas）的牧民，搬到了墨西哥湾沿岸的帕努科（Pánuco），并在当地发展了类似的开放式放牧系统。在高原地区的平原地带开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开放式牛群生产管理系统成了美洲典型：人们每年都会对成群的野生牛群进行“围捕”，将其屠宰或制成皮革并贴上商标。尽管畜牧业对于土著来讲仍是一项非常新的产业，但新西班牙的农户们对待牲口的做法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几乎无异。举例来说，由于需要将畜群控制在村庄土地的范围之内，农牧民常常白天将动物放养在外，到晚上再将其带回家中圈起来。

和美洲的其他地区一样，新西班牙开发出了不同的新品种。事实上，经过改良的原有畜群的变种十分适应当地的环境，而这些变种被称为克里奥尔种。这些改良物种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现在常常将改良品种与克里奥尔种杂交，以保证新畜群不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所淘汰。

人们很难想象，没有欧亚家畜的墨西哥会是怎样一种景象。没有猪、山羊、绵羊、牛、驴、骡子和马的墨西哥村庄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墨西哥北部的自然景观正是以巨型的牧场和成千上万头牲畜闻名于世的。我们已经论证了由于这些动物，特别是家畜的引进，墨西哥产生的一些变化。我们注意到，毁林和过度放牧引起了土壤侵蚀，而畜牧业的发展和植被与土壤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环境变化是该地区水资源的变化。

在墨西哥中部高原的山谷：墨西哥山谷、普埃布拉山谷和梅斯基塔尔山谷，殖民地时期的人们抱怨旱情愈显严重。有报道说，雨水比往年更少，一些泉水已经枯竭，一些常年有水的河流和小溪变成了季节性河流。西班牙的土地管理实践对高原地区的旱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由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例如，殖民

地时代(约 1580 — 1810)正处于所谓的"小冰川期",这一时期以某些地区降水量少于往常为特征。此外,殖民地时代,尤其是 18 世纪,造成水源短缺的主要原因不是降水量绝对值的减少,而是新西班牙的政治经济政策与不断增加的人口对现有水量造成的压力。事实上,当时的水源管理和分配也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社会各个集团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和巨大差异。

238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人引入的类似过程,诸如加速森林砍伐、过度放牧以及广泛的犁地等,也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加速了干旱。所有这些活动都造成了地表的破坏,而放牧、犁地和开沟引水最终都会引发洪水。但充满矛盾的是,以上活动也能减少土壤对水分的吸收——由于没有植物的茎秆阻挡,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到地底深层;由于动物的踩踏和犁地形成的沟渠加速了水流的速度,从而也从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壤吸收的水分。因此,到达土壤储水层的水量减少,泉水和溪流的水量也受到了影响。但这些活动是否真的影响了降雨量目前仍不清楚。民间传言认为,砍伐森林最终导致了雨量减少,但是专家对此却还未有定论。

在更为仔细地审视殖民地时代后期在水源供应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之前,有必要对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对待水资源管理的不同态度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土著人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尤其是在分配灌溉用水方面颇有建树,而西班牙人对此也较为熟悉。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土著农民会种植一些耗水量大的植物;而在雨量较少、水源匮乏的地区,土著居民会建大坝储水,改变河流的流向,并利用灌溉沟渠将水引到农业用地中。他们还在陡峭的山坡和低缓的山坡上修梯田,调节作物的用水和提供足够的种植面;在水资源太多、洪水频发的地区,土著人会通过沟渠系统排出多余的水。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土地管理制度,西班牙人经常全盘采纳这些管理方式。比如,他们使用土著人的沟渠灌溉系统,并将此系统扩大到其他的区域,改善别处的生活。

但也有一些对水源和土壤的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并不为人所熟知。西班牙人和土著人在对待静止的水和沼泽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态

度。西班牙人认为静止的水域是停滞且有害的，而沼泽更是贫瘠且危险的地方，只有流动的水才是健康干净的好水。相比之下，印第安人将沼泽视为最适宜发展集约化农业的场所，而湖泊和沼泽在提供静止的水域的同时还有大量肥沃的湖底淤泥，土著居民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发展了具有极强生产力的湿地管理体系。

239

最为著名的湿地农业是发端于墨西哥山谷湖泊沼泽区的水中田畦系统（奇南帕）。水中田畦农业体现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对待静止水域态度的分歧。这种农业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它利用沼泽栖息地的优势，在沼泽上形成了集约型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这一系统好像是建在沼泽中的“岛屿”，通过土壤和水分调节机制，可以不间断地种植所有的谷物、水果和蔬菜。土著居民没有采用沼泽排水的方式，而是发明了一套水土交替系统，同时还将这一农业系统成功地发展到了湖上。因此到了 1519 年，霍奇米尔科湖近三分之一的表面由植物覆盖。

与此相反，西班牙人只在干旱时节才将湿地用作牧场，或者企图通过排水使其适宜农耕。西班牙人对水中田畦农业的技术和精髓缺乏了解，当他们接管和使用前西班牙时期的沟渠灌溉系统时，他们将湿地农业留给了当地农民。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了从墨西哥山谷排水这一浩大的工程。墨西哥山谷位于内陆盆地，没有天然的泄流途径。直到 16 世纪末，这个盆地还有着大量的湖泊系统。在 16 世纪中期，居住于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市的西班牙人连续受到洪水的困扰。之前的阿兹特克人也遭遇过相同的问题，而当时也已经发展了大量的水中田畦系统。这也许是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毁掉山谷周边山脚的大量森林而产生的后果。就在西班牙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摆脱水的困扰时，阿兹特克工程师却一直与湿地为伴，并建立堤坝来规划管理湖泊的水位。他们用这种方式向西班牙人表明，他们可以控制洪水并获得更多的农业用地。西班牙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阿兹特克工程师的建议，仍执着于使用欧洲技术。他们开始了饱受争议的运河工程，修建了一条从墨西哥山谷东北部到图拉河流域的运河。这一工程对墨西哥山谷环境的影响即使

在今天也能感受得到：干旱季节时，2 月和 3 月的风吹起了原先湖床的淤泥，带来了漫天黄土的沙尘暴；多雨季节时，由于地下水位的高涨导致地面的水无处可排；浅水湖泊向湖泊原来的河床扩展，使湖泊周边的农业变成了泡影。因为墨西哥城坐落于积水土壤之上，沉重的建筑物从不同的角度压迫着这块脆弱的土地，而这个城市除了面临如何解决 2 000 万人口的废水问题以外，还要躲避夏天暴雨的袭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由于较高的地下水位，积水无法渗入土壤，必须通过沟渠将水引出山谷。

16 世纪，随着土著人口的锐减，新的土地利用系统开始施行。从土著的土地系统转向西班牙式的土地制度，使当地部落占用的土地越来越有限。但只要人口数保持低水平，农业用地的大量流失就不会对土著生活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印第安人在许多地方都占据着肥沃温润的谷底区域——这对西班牙邻居是个不小的刺激。不过，当他们慢慢从 16 世纪的瘟疫中获得了免疫力，流行病成为美洲的地方病以后，部落的人口开始增长，并对周围的土地和水源造成了新的压力。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和非洲人以及各种混血种人的数量都开始上升。到了 18 世纪中期，包括新西班牙所有种族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将近 700 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源供应开始成为殖民地时期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 240

人口的增长造成村庄、城镇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增加，使得人均可用水量相应减少。同时，水资源的绝对数量也在大量减少：地下水位的下降导致泉水流量下降；虽然地表水可以存储在大坝中，但大部分的水伴随着夏季的暴雨流失了。人越来越多而可用水量却在大幅减少，水资源短缺这一问题被殖民主义社会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了。

墨西哥农村地区水资源的主要竞争者是市镇（村庄、城镇和城市）、地主（如农场主、种植园主、神职人员以及小型的牧场主和工头）和制造商（面粉、羊毛和皮革制造商）。诸如种植小麦和甘蔗之类的专业农产品也需要相当数量的水。如上所述，小麦种植于中部高原，从播种到收

获要经历干燥的冬季,需要水的灌溉才能生长成熟;甘蔗是另一种需要灌溉用水的作物,种植于季节分明区域的甘蔗对水的要求则更高。还有少量的面粉厂也需用水作动力。

到了18世纪,水资源分配的复杂系统将这些单位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使其冲突频发。这些团体往往就地对抗或对簿公堂,原因无非是灌溉水渠和溪流的流向问题,或水资源的归属问题等。冲突可以在各方的协调下,就某一特定水源的分配达成共识,和平地解决;或者可以发展成一个村庄与某私家军之间的对峙。鉴于农业在新西班牙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地产资源在量上的优势,大地主在这些冲突中往往相应地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雇佣暴徒来保护非法的引水活动,或打击村民和小地主;他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法律诉讼搞得对手倾家荡产。但是村民和小地主也拥有一定的资源。水资源之战最为关键的就是地理位置,位于灌溉系统源头位置的那一方拥有相对较强的话语权。村民很少会被威胁和恐吓所吓倒。村民与地主(或村民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庭审记录在显示水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展示了村民在捍卫自己权利方面具有的坚韧品格。但总体而言,水资源经常从社会其他群体流进庄园主和植物园主的手中。

241

随着牲畜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大量加工厂、面粉厂和纺织厂的建立,大城市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而18世纪城市地区的不断扩张,又带动了周边加工产业的发展,比如制革厂、牲畜栏以及屠宰场大都设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这样的场所连同大量的动物对水源分布、水污染和疾病传播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8世纪晚期的普埃布拉就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城市环境的一个范例:大量的家畜(在本例中是大量的猪)给水质和水量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水对生命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不同的人给水所下的定义却各不相同:不仅在如何利用水方面——比如是用来浇灌玉米地,还是把水引到面粉加工厂,而且还涉及水在自然环境中的正确位置及其本质。对于欧洲人来说,沼泽中停滞的水是不健康的水,因此他们会想尽一切方法排干静止的水域;而对印第安人来说,沼泽是代表着肥沃和强大生

产力的神奇水域。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土地管理方法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并开始主导这片殖民地的自然景观。也就是说，这个环境中的水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改变了性质，而环境也开始变得日渐干旱，从而导致殖民征服时期的墨西哥风貌和文明与前西班牙时期完全不同。

西班牙人进入新西班牙之后，这块土地上的土著人口、土著社会、自然景观和环境都迅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令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感到痛心的变化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强迫当地的居民接受西班牙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还包含土著生态系统与外来物种的互相调整，以及侵略者和土著居民之间的相互调整。

在大量创新的文章中，征服时期的历史学家所描绘和分析的殖民地世界大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征服和统治的理解(参见第三章)。这些新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征服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过程；而新美洲的世界则更为动态和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班牙人的数量很少，而土著人的数量很多——的确很多，在殖民主义第一个百年的瘟疫大流行导致人口锐减92%时，土著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墨西哥还是占据优势。正是因为大批土著居民的存在，欧洲人才没能轻易获得强势地位。他们被迫与当地居民进行协商，而土著居民也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协商的过程就暗示着各个领域中的生命和人都在进行妥协和适应，除了征服过程，社会还在混合和适应中逐渐发展。 242

人们常将殖民地时期与征服时期相比较，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停滞不前、没有任何变化的时期，一个殖民地社会和经济确立之后就鲜有发展的阶段。但是，尽管殖民地时期没有征服时期那么壮观和曲折，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殖民地时期是一个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种族的增多而日益复杂的时期，这些变化对新西班牙的自然景观和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殖民地墨西哥的自然景观反映的并不只是西班牙文化(或非洲文化)简单地代替土著文化，也不是土著文化和土著社会的持久性——虽

然土著人民在经历了新物种引进和新的土地管理方式的利用带来的重大的环境变化后，仍能成功地再现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而是一种选择和协商——以及力量的展现。

殖民地社会中不同的种族和经济团体为了在混合的殖民地社会中保持自己的世界而进行各种斗争，并在斗争中互相牵制、互相打磨。当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种人企图在同一地域重建他们熟悉的自然景观时，整个殖民地社会就会发生变化。混合的殖民地社会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特征是对地方的占领和转移。土著居民一直认为他们的领地在被迫发生改变（通常是以微妙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以粗鲁的方式），熟悉的景观开始变得陌生。而外来的人，不管他们是行政长官、定居者还是奴隶，在来之前对这块土地还是相当陌生的；也许唯一可以把转变后的殖民世界称为自己土生土长的“家”的是那些新生的“种族”：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因此，当大庄园和市政当局等经济团体加入到争夺水源和土地等自然景观控制权的斗争中时，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变得更为复杂了。

但是，一个个自然因素在自然景观中转移并不像在棋盘上移动棋子那么简单，它必定会影响环境的进程。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外来畜群的引进，其数量的急剧上升和下降，以及新的土地使用方法（例如采矿和放牧）的采用都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形式的自然景观在墨西哥的很多地方并存，而纷繁复杂的自然景观特征可以看成是不同种群互相接触之后留下的痕迹。举个例子，同一地区内庄园的自然景观和土著村落周围的风景就截然不同。但是，生态进程却不会在同一地区完全不同的两个自然景观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因此我们也很难知道混合环境区域的形成。但如果我们将殖民地社会和自然景观看成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上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殖民地社会是混合和杂交的，不同的种族、社会和经济团体都是保持这个社会成功运行的关键因素。同理，殖民地环境也是由不同的种族和社会团体发展出的各种地域组合而成的，它们用自然的方式揭示了社会和生物的杂交与融合。

243

第八章 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妇女

亚松森·拉夫林(Asunción Lavrin)

245

欧洲人与后来被称为新西班牙的这片大陆上的土著居民的最初交流,是通过一个充当征服者的"口舌"或翻译的土著女人进行的。拉玛琳奇或唐娜·玛琳娜是一个会说纳瓦语和玛雅语的女人,她被沿岸地区的一个酋长送给了埃尔南·科尔特斯。对于征服者来说,她真是一个无价的伙伴。如果没有她老练的斡旋,科尔特斯了解土著人财力和智力的工作会十分困难。与此同时,她和其他妇女出现在新来者的队伍中不仅仅只是妇女反抗家长制社会的一种标志。妇女是两种文化建立友好关系的渠道,也是征服与殖民过程中的受益者、共同参与者和牺牲品。

在作为双方了解过程的征服时期,土著妇女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变,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她们的男性亲属在互相理解的过程中必须对现实的、宗教的和道德的事务予以重新调整。如果说这一时期土著妇女被男人当作交易物品而受到直接的损害,那么随着西班牙妇女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批到来,男女间的个人和社会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随同西班牙妇女一起到来的是具有完全欧洲式价值观与预期值的文化。作为征服者的女眷,她们的显贵地位赋予她们超越其他妇女的社会地位,而且她们及其子女还要将这种地位保留下去。但是,另外三个妇女群体给这一状况增添了复杂性。西班牙男子与印第安妇女的孩子——

梅斯蒂萨(女混血种人,Mestiza)中,又掺杂了人数虽少但也在不断增加的非洲裔妇女(她们从16世纪开始到来)的混血后代;这三大种族混血的结果,即产生所谓的“卡斯特人”(castas),将构成在墨西哥殖民历史中占一席之地的妇女谱系。这三大族群可能确实在许多(情感和宗教的)方面建立了纽带。我们也许可以从性别的角度写出所有妇女的状况,但这些妇女的经历却并不相同。

246



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婚姻在16世纪时远比在18世纪时(本图绘制的时期)更为常见。到18世纪时,西班牙精英阶层的男人(如图中所示)极少会娶印第安女人,哪怕这女人是部落的女头人。

从殖民地社会早期直到17世纪中叶,最有影响的两种文化因素是印第安的和西班牙的,但自殖民地时代中期之后,混血和血统因素就变得格外重要。社会各阶级中所有种族和民族的人群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男人在家庭和社会上拥有权力和权威。男人进行统治、制定法律并统领家族。特诺奇蒂特兰墨西哥人中间的尚武价值观与征服者带来的价

值观并不相悖，也许还要更强一些；而那些征服者才刚刚完成了从伊斯兰统治者手中光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大业。在这两种社会里，妇女虽然因她们的生育和教养角色而受到尊重，但她们却完全不能参与最高层决策。

247

当墨西哥中部中心区域的征服完成后，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组建家庭的方式以及支配性别关系的共识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著社会虽然保留了其独具特色的社区和个人习惯中的某些东西，还是不得不接受西班牙法律中的一些共同准则，在这些准则中，所有妇女，不管其民族或种族如何，都是受到约束的。1256－1265年间，"博学者"阿方索（Alfonso the Learned）领导起草了一部法典《七法全书》（*Siete Partidas*），它于1348年作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一部法律被正式颁布。1505年生效的《托罗法》（*Laws of Toro*）规范了作为社会个体成员及家庭成员的男人和女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法律制定了一些原则，规定妇女在家庭和世俗社会中应从属于男子；男子享有父权，也就是在儿女未婚和成年，或男23岁、女25岁前，拥有规范儿女行为和管理他们财产的无可争辩的权力。已婚妇女依法受到其丈夫的监护；同样，如果父亲不放弃他的父权，未婚女子在25岁前也没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而父亲放弃父权则是一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丈夫对妻子可行使几乎完全的监护。只有成为单身成年人或寡妇时，妇女才享有完全的法律人格。只有到那时，妇女才有权买卖、管理家产和钱财、继承和遗赠、向法院提出诉讼，或作为证人出庭。因此，妇女的民事地位决定了她们个人的自由程度。作为丈夫，男人在其临死时有权决定由谁对其未成年子女实行监护。丈夫可以指定一名家庭外的监护人，也可以指定其妻子为监护人，委托她执行对其子女的监护，直至子女成人或结婚。而子女，无论男女，都可同等获得父母遗产。男人对女人、丈夫对妻子和儿女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了家长制的基础，而家长制则赋予男人一种特权地位。

法律一方面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置于严格限制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也用一些保护性措施来平衡妇女的境遇，特别是在遗产方面。《托罗法》通过禁止丈夫随意处置妻子财产的方式来保护妇女的财产。

此外，一位寡妇可接受婚后共有财产的一半以及她原先的所有陪嫁(如果她结婚时带来嫁妆的话)。婚姻地位强迫妇女要严格顺从丈夫的意志，并承认后者在所有法律事务中有代表她的权利。男人也可以经常放弃他的这种权利，准许已婚妇女完全独立地行事。妇女的举止如果不恰当，那么她的许多权利可能被取消或者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一位父亲可用许多合法的理由来剥夺子女的继承权。一位寡妇如果再婚，便可能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如果妇女发生不当的性行为，就会丧失她的许多权利，并使受到侵害的男方有理由用他认为适当的程度来报复她和她的情人。不过，滥用这类权力的事并不常见，而且也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中每天都在进行这样的约束。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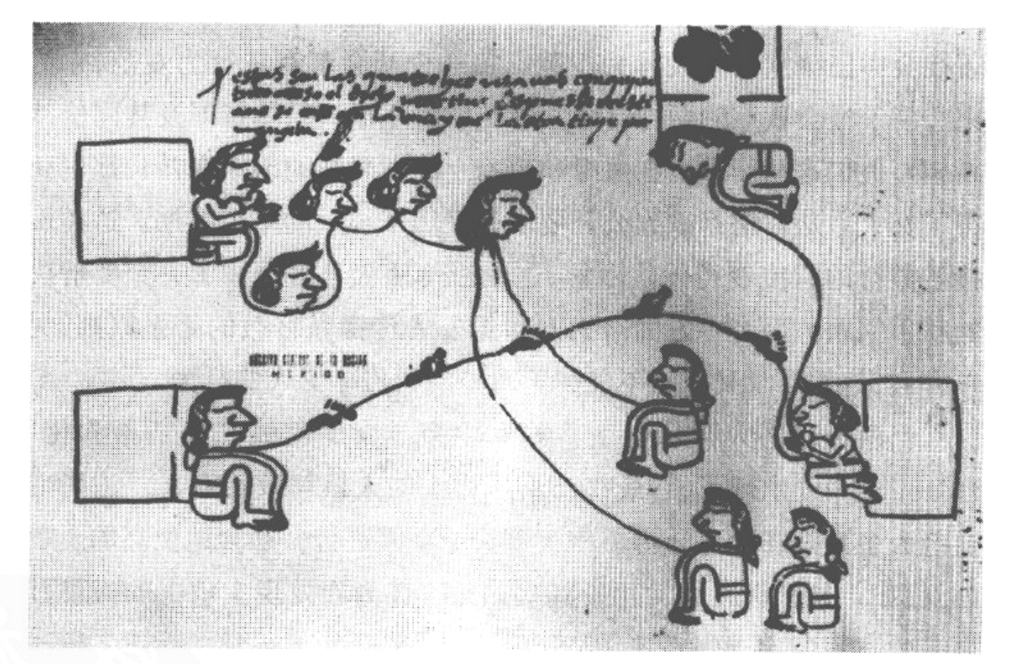


佩纳斯科伯爵一家人在敬拜瓜达卢佩圣母。这种全家肖像图在墨西哥并不常见，不过在18世纪发现的比前一个世纪的更多点。即便如此，墨西哥殖民地当时大多数社会精英阶层的肖像都是个人肖像，而不是家庭群像。

当西班牙人开始在被他们称为“新西班牙”的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时，他们便对所有人（无论哪个种族或阶级）实行《七法全书》的原则。理论上，所有的妇女都受到同样程度的束缚，但她们是否都被要求那么做，却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问题。只有奴隶，作为一种财产是不受适用于自由人的法律保护的。即使如此，男女奴隶在被法律承认为人的范围内，都有机会接近教会和世俗当局，并请求承认他们在家庭、世俗和教会法律原则规定中的权利。

阿兹特克妇女管理着众多的拜神仪式，监督着市场的运行，并获得了在社会活动中的权威地位。征服前的贵族妇女通过被安排的婚姻来履行其政治职能。最新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身为女王或王后，女人能够以与其欧洲同性伙伴同样的方式用其儿子的名义运用政治权力。在法律上，被认为已经成年的贵族妇女可以继承土地使用权和得到藩属进贡的贡品。在被西班牙人征服后的社会里，部落女酋长或女贵族根据西班牙人来到之前的法律及新法律，要求得到其

249



马丁·胡奇米特尔被指控把四姐妹收为自己的妾室。传教士非常关注纳妾这个问题。在征服之前，惟一被允许纳妾的是当地的社会精英阶层，而传教士们则试图根除这一习俗。

应得的土地和贡品。此外，西班牙和土著妇女承担着比那些狭义界定的法规所允许的更多的责任。

随着上层土著妇女和后来其他各社会阶层、种族的妇女开始了解法律制度，她们开始作为原告和被告出现在各种案子中。由于新西班牙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同于西班牙本土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状况，因此不得不采用特别法律来适应总督辖区的需要。《印第安人法》(*Derecho Indiano*)或与印度(这是西班牙人经常运用于其领地的术语)有关的法律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土著妇女是否可免除贡税？妇女是否可继承"委托监护权"(即是否有权从土著人的纳贡中受税，以作为效忠西班牙王室的酬劳)？父母是否有权反对其未成年子女与较低社会阶层或种族身份的人通婚？随着征服而产生的另一个法律和社会难题是印第安贵族中实行的一夫多妻制，这是基督教教规反对的一种征服前的(土著贵族)权力。实际上，教会一直十分重视教导实行一夫一妻制，并把根除一夫多妻制作为其传播福音过程中的一个目标。

征服过程造成了两性交汇，这又(暂时地)打破了西班牙社会和土著社会中已确立的个人行为规范。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行为规范，它约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两性结合并规范家庭生活。科尔特斯及其同伙从希望与他们这些新来者在血缘和政治上建立联系的印第安酋长那里获得了女人。从自愿奉献到公开要求只经历了很短的一个时期。这类性接触滥行的程度变得无法限量，这就给传播福音者带来了一个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后者一方面努力向印第安人传播基督教的婚姻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有时又似乎不能或不想控制西班牙男人的行为。

250

当西班牙男人开始与土著妇女生育子女的时候，"梅斯蒂索化"(Mestizaje)便出现了，它最终产生了重大的人口与政治意义。这种混血绝大多数是在西班牙男子与土著女子之间进行。社会地位高的土著妇女，如酋长和贵族的女儿最喜欢如此。在为新发现土地上的人民和未来的移民制定通婚政策上，西班牙王室采取的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征服加勒比群岛的早期，国王的政策是由希门尼内斯·德西斯内罗斯(1495－151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等人颁布的。1516年，后者

建议可与酋长的女儿进行通婚。世俗和教会当局都希望，混血后代在文化上是西班牙人，通婚是一种同化政策，也是一种建立宗主权的方式。也有不少土著贵族男子娶了西班牙女子。在首批这类通婚中，就有蒙特祖马二世之孙迭戈·路易斯·蒙特祖马迎娶一位西班牙妻子，他后来成为势力强大的蒙特祖马伯爵家族的创始人。

征服者们明白，土著贵族用与西班牙习俗相同的方式“赠送”他们的女儿，是一种获取财产和地位的快捷方法。西班牙男人追求社会地位高的土著妇女是为了获得有利可图的联姻。当然，这些居住在土著社区中的男子也企图参与到地方政权中去，这是西班牙国王很快就禁止西班牙人居住在印第安人城镇中的原因之一。印第安妇女从这样的联姻中获得了一些东西：她们的丈夫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了解法庭诉讼中予她们保护所必需的所有法律对策。虽然合法婚姻可以保证妇女及其子女可获得财产，但同居显然比合法婚姻更为常见，尽管对这两种形式在殖民地初期的确切数量目前还不清楚。科尔特斯、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这类征服者虽然和印第安女人同居过，但当他们在西班牙社会中获取了高级地位后，还是寻找与他们地位相等的西班牙女子作为合法妻子。科尔特斯曾与蒙特祖马二世的两个女儿发生过关系，但他还是把她们嫁给了两位出身名门的西班牙夫婿，自己则只承认与拉玛琳奇生的儿子，并在遗嘱中予以确定。新西班牙殖民地各处的西班牙官员出于与那些征服者相同的目的，可能确实与社会地位高的土著妇女保持同居关系。这类结合对当事人来说，得失是很不确定的。如果女方被遗弃的话，男方就失去了与土著社会的联系和对土著社会的影响力。

251

当 16 世纪土著居民急剧减少时，混血种人却大批增加，并开始取代土著人在殖民地中所占的人口地位。到了 17 世纪，因于生物学上的再生产和印第安人-西班牙人联姻增多，印欧混血人口大增，开始成为某些城市居民中的主流。另外，非洲人(他们最初是作为奴隶，或者在极少情况下作为自由人来到新西班牙)的出现又造成了一种的各人种混血日趋增多的特别局面。没有法律禁止这类通婚，因为天主教会保

护合法婚姻中的择偶自由。尽管如此，西班牙和土著社会的习俗更赞同社会和种族相同的人之间的婚姻。教会虽然会提出这种通婚的建议，但不会因此破坏自由择偶的原则。那些不介意社会规范的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或结婚。种族和民族的混血造成的多样性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虽然土著人在人数上还占多数，但随意混血通婚的后果还是显示了出来，西班牙人及其后裔依然只占少数。其社会结果便是对"种族"采取一种松散的界定，种族之源可进行横向和竖向的追溯，也可能予以忽略；种族中的类别没有鲜明的标示。这种种族概念上的不稳定导致社会顶层的那些半岛人的后代坚持种族纯净观念，以此维持他们对其他居民的政治控制以及在社会中的权力与威信。血统纯净观念在西班牙曾被用来确定和区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血统纯净意味着几代人内没有犹太人或穆斯林成分。在新西班牙殖民地，血统纯净大体上也仿同其原来的定义。实际上，新近改宗的犹太人和一些穆斯林（新基督徒）也在新西班牙定居，其中有些人在16世纪是非常成功的开拓者和殖民者。如果不是16世纪晚期宗教裁判所开始对伪基督徒进行广泛调查的话，这些人还会继续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实行犹太教。另一方面，非洲人的输入和居民中不断增多的多种族混血，为血统纯净注入了一种新的含义，使它开始主要被运用在祖先为非洲人或犹太人的居民身上。

第一批混血人种的社会处境很难探知，但有两个因素——父母间的阶级平等与合法性——可引导我们去进行推测。西班牙社会中有地位的西班牙男子与土著社会中同样有地位的土著女子所生的子女，哪怕非婚生，只要父亲是负责的，而且子女像西班牙人一样接受教育，那么子女便可获得社会认可的利益。反之，非婚生或是对土著妇女进行性剥削而生的子女，如果因父亲逃避对他们的责任而由母亲抚养长大，往往会被视为"印第安人"，并因被西班牙人排斥在外而忍受着种族不明的恶名，他们的后代也不能享受高等教育，或被任命为政府官员。这些人在土著社会中的地位千变万化。16世纪中叶，许多地方土著领导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混血种人，但他们没有丧失他们的社会地位。

252

与土著平民女子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的处境较为艰难,他们处于一种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社会境遇中。那时,这一群体通过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长途贩运和从事特种手工业谋生。女混血种人的命运更是与她们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几乎没有什么职业期待;作为女人,她们只想通过出嫁并成为母亲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为了确立和维护社会认同,西班牙男子,无论是征服者还是早期或后来的移民,都要回复到母国的社会观念中去,通过迎娶半岛妇女,保证血统纯净和合法性。确实,血统纯净对于那些谋求成为司法界和王室官僚中一员的人和渴望谋求教职的人是最基本的要求。血统纯净需要由证书和证据来证明。半岛妇女因此便成为社会热求的对象,很快使这类妇女具有了一种比土著妇女,甚至地位显赫的土著妇女享有更多特权的地位。整个殖民地时期,都有一些西班牙人继续与印第安妇女结婚或同居,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男子的选择,而且来自外省或乡村的人要多于一些重要城市的人,在总督区的首府则更为罕见。16 世纪是从西班牙迁移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的最高峰时期,白人女子仅占半岛移民总数的 28%。这意味着她们的人数相对很少,而她们在婚姻交易中下的赌注也很大。在移民新大陆的西班牙妇女人数较少的时期,她们在新西班牙出生的女儿便被视作西班牙妇女,是欧洲人的后裔,因而享有社会和种族意义上的特权。17 世纪初,绝大多数普通的西班牙妇女都出生在新西班牙,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因此,一直到殖民地时期结束,她们都拥有祖辈的特权。

种族特权并不一定就能确保经济特权。西班牙妇女在经济上的命运与男子一样反复无常。许多人抱着改变其社会地位的高期望来到这里,但结果却是失望。受男性亲属或伊比利亚半岛上流传的新闻甚至道听途说的诱惑,这些妇女来到这里不仅是寻求婚姻,而且也追求财产、生意及土著妇女的服侍。那些已获得委托监护权的男子为了保持此权利而苦苦奋斗,并把它传给他们的合法继承人。16 世纪中颁布的法律规定,单身或没有立下遗嘱的男子将失去他们的委托监护权。为了保留那份特权,他们必须结婚,而且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半岛女子来达

到这一目的。女性委托监护人很少见,但她们有权支配收入,并拥有一份大多数女性移民所没有的社会权利。

253 为了给女儿打造一个可靠的未来,殖民者便刻意给女儿准备相当可观的嫁妆,想以此吸引最好的夫婿。嫁妆由妇女出嫁时带来的财产和物品组成,在婚姻期间可由丈夫负责管理。一份现金嫁妆可向丈夫提供一笔现成的资金去实现他的兴趣所在。这些嫁妆的数目是很难确定的,但在 16 世纪最后的 25 年中,处于权威地位的男子开始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嫁妆已经猛涨,并逐渐变得不利于那些具有正当种族资格的人娶到自己合意的姑娘。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姑娘会去选择并不符合总督辖区日渐自负的统治阶层所认可的标准的求婚者。主教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以及王室官员写给西班牙当局的信件中都提到了卖淫现象,但这只是为他们担心血统纯净的西班牙人在人数上可能减少而编造出来的一种解释。

为了保持和加强社会秩序,西班牙女性后裔和其他妇女之间被建立起了许多藩篱。虽说那些藩篱没有像男子之间已建立起的那么高——那是因为妇女没有像男子一样被允许接受教育并从事公共服务,但它们仍不时在白人妇女和非白人妇女之间生生地制造了一条鸿沟。赠送嫁妆始于 16 世纪,那时男人就开始区分白种女人和非白种女人了。结婚送嫁妆及在宗教会社中修行是新西班牙社会的民间慈善形式。送一位穷困的西班牙女子出嫁或帮助她修行,是提升(至少是保护)她的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克里奥尔人或美洲西班牙人)为失去父母的白人姑娘结婚或修行献出了大量的捐赠。只要失去父母一方就可视作孤女。这笔资金由民间团体或是教区管理,但不能给那些不能证明其身份合法或血统纯净的孤女使用。这笔钱用来投资以产生年利,可提供每笔 300 比索的嫁妆。每个机构都有一本企求获得捐赠嫁妆的人的名录,通过抽签的办法来分配钱款。300 比索只是个小数目,还不够提升一个孤女的社会地位,但足以吸引一位“正派”的丈夫去保护这位孤女。此外,有些孤女在好几个名册上都有名,能得到好几笔这样的嫁妆。然而,私人捐赠帮助

一位妇女完成修行的事情并不常见。在女修道院中修行需要一笔数目较大的钱(17 世纪时至少需要 2 000 比索,18 世纪则至少需要 3 000 比索),因此捐助人不得不限制受捐人的数目。家族内捐助给亲属的事也不常见,它是在族内控制妇女、保持阶级和种族等级特性的另一种手段。

西班牙后裔中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得到了教会和政府的暗中支持。教育学和宗教教科书往往都强调与一个门户相当的人结婚的价值观;不过即使这些书籍大多由教士编写,教会也从来没有采取什么政策禁止不同种族、不同家庭背景间的通婚。政府也是这样。西班牙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 1759 年卡洛斯三世继位之后,将渴望经济进步和恢复对臣民的霸权统治的传统观念奇特地混杂在了一起。对种族政策的处理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建立了一支由黑人和非洲混血后裔组成的军队,并颁布了一部《黑人法典》(*Black Code*),以便更人性化和有效地管理奴隶和奴隶制度;但他又加强了于 18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对军官婚姻的严格控制。军官的婚姻受到严格的监督,这是为了避免这一精英集团因婚姻而影响其种族和社会地位。1776 年,卡洛斯四世颁布了一大批法规以制止"不对等"的婚姻。1778 年,这种王家婚姻敕令(Pragmática)也延伸到了殖民地。对殖民地而言,这类问题既有种族上的,也有阶级地位上的。卡洛斯四世企图结束 300 年来种族间的通婚,并宽松地控制非精英人士间婚姻的社会习俗。王家婚姻敕令是一种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它企图为婚姻立法和控制殖民地居民种族和阶级构成的社会多元性。该法律规定,所有未成年白人必须请求并得到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准许方可结婚。在上层印第安人中也要强制执行这一法律,但其他居民则明显被排除在这一法律之外,由于没有纯净的血统,他们便没有得到西班牙王室的任何特别关怀。该法律旨在赋予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否决权,如果他们认为求婚者祖先是混血种人或社会地位低下,便有权取消婚事。不管什么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婚姻当作巩固种族精英地位的一种手段。强制执行将民法与教会法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个法律,以及围绕某些案件的境况的含糊性所引起的司法问题,并没有在 1803 和 1805 年颁布的皇家立法中得到补充

254

说明。1803 年,国王批准任何 25 岁以上的人不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即可结婚;但在 1805 年,国王又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有这种选择的自由。

除了那些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很小一部分人,王家婚姻敕令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因为反对孩子的选择或反对父母的否决之类的诉讼,是一个漫长并花费很多钱的过程。地方法院更在意每个案子的好处而不是法律背后的一般原则;赞成婚姻双方选择的裁决往往要多于给予父母阻碍婚姻权力的裁决。即使迄今我们追溯到的案件数目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法律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居民,而这曾是颁布这一法律的目的。这些法律仅仅对社会和种族的精英群体产生影响,这些精英群体本身曾用法律来构建其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现在他们的私人生活时要遭受这些法律消极的干扰。即使王家婚姻敕令能造成某些精英分子的不适,它也很少有机会打破已被该群体接受的那些习惯模式。

255 对婚姻形式进行人口统计学上的研究后,人们发现西班牙群体在全社会中是相当封闭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这些人都是通过种族内婚姻进行嫁娶和生育的。如果他们与种族外的人通婚,就选择在外表上最接近他们的印欧混血种人作为他们的婚姻伴侣。在印第安居民已不构成主流人口的地方,如北方矿区,非同种族结婚的比例在 18 世纪一直上升——也许这就是经济繁荣时期人口较大规模流动的一个结果。我们对妇女在这类婚姻形式中的行为还不太清楚,即使有不少研究,但其结论却千差万别。一般说来,与男子相比,女子在择偶方面较为守旧,比男子更不愿意与本种族之外的人结婚。最新研究中弄清楚了合法婚姻的相关模式,但不适合非法同居:通过后种形式,白人男子不断生产出印欧混血种人及其他混血种人,从而使种族遗传库变得更为复杂。一些人口学家发现,到 18 世纪末,非婚生子女的人数有所下降,这说明整个居民中同居的人数也在下降。

墨西哥被征服后的整个殖民地时期,印第安妇女的地位取决于她们的家庭,而且不论其家庭在新社会中境遇改善或是依然停留在征服

前的水平上。整个 16 世纪，许多土著妇女或是与西班牙男子结婚，或是与他们同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结合逐渐减少了。由于这种形式产生的子女为印欧混血种人，和西班牙男子结婚将会削弱妇女与她原先社会在传宗接代上的联系（除非该男子也入赘到她原来的社会中去）。最后，贫困妇女迁居至总督区的大城市也加速了这一进程。为了保持与土著社会的联系，男女双方不管种族上是否“纯净”，都要居住在该社会之中。征服对土著人口产生的灾难性影响造成了一场浩劫，但也迫使幸存者不得不按照王室命令以符合西班牙规则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选择印第安人为伴侣看来使必须克服 17 世纪人口下降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加强。到了 18 世纪，同种族婚姻或同族群内通婚的比例在新西班牙总督区中部和南部的印第安人城镇中非常高，印第安人口也快速增加。不过在 18 世纪下半叶，土著社会中异族（非本种族的）婚姻也在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婚姻更多地发生在男人而不是女人中，这说明大多数家庭还是对女子的婚姻选择进行控制。

即使土著社会的内部有这种凝聚性，阶级问题以及与西班牙主流文化及其当局相互作用的不同形式都各自影响着妇女。墨西哥被征服之前，在大多数有组织的土著群体间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差别。根据规则，在纳税、社会义务、参与政治决策、受教育乃至着装等方面，贵族和平民都是有区分的。征服颠覆了等级秩序，并使许多社会最底层的人可利用新的法律体系以及与西班牙人接触后产生的经济途径向上爬。那些已经处在社会顶层的人则拼命充当本族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中介人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并通过新的法律体系重新确立他们的特权。酋长在 17 世纪依然举足轻重，因为西班牙人更喜欢与他们打交道，并承认他们作为领主的地位。头人或有声望的人士也保住了自己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这两个群体利用西班牙人带到新西班牙的对社会秩序的共同观念而占据了优势。这些阶层的妇女在土著城镇的市议会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人们不会忽视她们拥有被西班牙和土著当局默认的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权威。有时，产权和社会事务也推动这些妇女以她们自己的名义，或以她们社会的名义成为诉讼人。反过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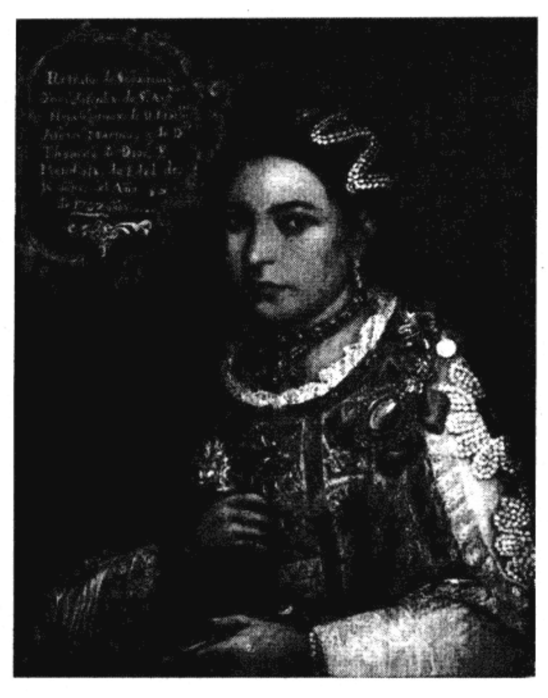
256

如果反对派或组织根据她们的性别或对这一性别的社会期待行为向她们发起挑战，那么她们也可能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因此，她们许多时候会躲在幕后行动，尽管她们的领导能力在她们的同时代人中是众所周知的。

整个殖民地时期，财产所有权和其他传统权利把土著统治阶层与那些被迫要为社会和西班牙人服务的人区分开来。社会地位高的妇女可免交税赋。土著社会中的妇女被认为是其家庭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和保护者。她们的头衔必须来自其夫婿的世系，并被承认为是原配夫人。土著居民像西班牙人一样也持家长式的社会观，妇女可因婚姻而变成贵族并一直保持下去。他们所称的贵族是从父系而不是母系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身份。嫁到酋长家族中去的妇女可一直保持其社会地位，直到她们再婚；如果再婚，该女子便获得其第二任丈夫的社会地位。酋长权位、印第安贵族地位都可以由妇女继承，而且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妇女们都是这么做的。因此，从 16 世纪开始，女酋长和男酋长一样，都要求拥有或更新财产名分，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实际上，在 16 世纪，她们比男人更多地从事诉讼活动。一般来说，继承模式给予男孩和女孩分享父母财产的同等权利，不过丈夫给予男性亲属和子女比妻子更多的优惠待遇。如果男人同意，妇女可作为管家行事；但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男人更经常地以家庭财产管理者的身份行事。血缘亲属比姻亲或后天结成的亲属更具优先权。土著社会望族中居民间的婚姻为同族通婚，这可维系家族的政治权力及其社会领导地位。但在米却肯等地，到 18 世纪时，征服前的土著贵族的人数已大为减少。有人认为，17 世纪混杂的种族并不影响土著城镇中长官职位的权势和继承；但到了 18 世纪，土著贵族中日益加强的种族纯净意识似乎已变得十分时髦和不可避免。这一世纪为印第安妇女修建的修道院对那些修行者从来没有放宽过对血统纯净的要求，并公然模仿西班牙人的方式，拒绝白人或印欧混血种妇女入院修行的要求。

257

殖民地时期委托监护制强加给非上层妇女最沉重的负担是货物、劳役形式，或两者合一的赋税，以及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增收的婚姻税。



在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土著女性，就连女头人这一社会精英阶层也很少画肖像画。这幅画中的女头人只有16岁。

缴纳贡品促使有纳税义务的平民向他们所在地的地主及西班牙收税官员缴纳赋税。在尤卡坦，作为妇女家庭手艺的纺织品生产是纺织品税收的一大来源。烹饪、家务和看护是可被当作贡品缴纳的工作；其他常见的工作还有养鸡、提取蜂蜡和织棉布。马赛瓜尔(Macegual)妇女是西班牙家庭和上层印欧混血人家庭中最常见的仆人。居住在村庄中的单身土著妇女可免除交税，因为西班牙国王认为如果她们不得不搞钱交税，可能会把她们推向丧失妇女美德之险境。这部分人的免税权利一直延续到1758年，大概在那时的帝国改革者的头脑中，贞操已失去了意义。我们已经说过，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妇女作为土医师、年轻女子的教师、媒人和财产所有者的状况在一些地区已经减少。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妇女名下土地产权的数字已经变得非常少，财产诉讼请求也不断减少，而反对异教习俗的压力却日益增加。城市中以女仆、市场售货员为生计的贫困妇女数量也说明土著妇女的经济状况在恶化。虽然这一结论包含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但以自我为中心的酋长阶层在18世纪时依然势力强大；在某些印第安人集聚地区，如瓦哈卡，酋长势力的衰退还没有发生。

258

如果说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还存在着明显可见的种族特性，那么大多数具有混血祖先的妇女却在法律文献中被边缘化了。大多数法律都是针对白人妇女或印第安妇女的；而当血统成为其关注重点时，则有特别的企图。印欧混血妇女，或其他出自各种族的混血妇女，分别被称为“coyotas”、“lobas”和“chinas”，生活在指定的界限之内，但享受不到被完全承认为某个种族的好处。她们的社会地位根据她们的体貌接近上层妇女的程度以及接受上层妇女行为方式的程度来决定。她们的混血祖先通过与生物学上的非混血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结婚，从而消除了较黑和较贫穷的血统。但是，有混血祖先的妇女逐渐成为一些城市地区的初始居民，历史记录显示她们从事着很多形式的经济活动。而且，她们开始挑战教会当局制定的社会规则和西班牙本土的价值观。很难将混血种妇女划归为哪个种群，无论在面对法律还是面对社会精英时，她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习惯，它们反映了西班牙化和社会阶层的不同程度。尽管如此，她们还是生活在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父系和家族范围之内；她们的性别使她们同样都处于男性权威的统治下。

在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如此复杂的社会中，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是错综复杂的，有时甚至令人困惑。西班牙法律对婚姻规定了泾渭分明的界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按照其条文所写的那样来遵守它。教会和民政记录都显示，对法律的反应如同人们面对这些法律所涉及的问题一样千变万化。上层阶级或精英分子的行为接近法律条文的规范，因为这些人要用正确的行为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穷人中就很少有遵守所有法律条文的压力。

带有浓重宗教价值色彩的西班牙和土著行为规范指导着男人和妇女的社会交往。西班牙人在公私领域中举止端庄的行为观念——概括地称为“名节”，在征服前的土著规范中也有着相同的东西，这一观念要求男人和女人克制和稳重。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开始于童年时代在家庭中所受到的非正规教育。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男人和女人因其担负的社会角色不同而应接受不同的教育，且教育的过程应男女有别。男女的明显划分导致了男阳刚和女阴柔。这样的性别教育教导女

孩子要忍受、服从、虔诚和顺从。对于贫穷的妇女，无论她们是印第安人、白人还是混血种人，读书和写字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事情。正规的初等教育只有可以自学的妇女或女修道院中的修女才能得到，而且大多只有白人女孩可以从中受益。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学会像缝纫和刺绣，或者为穷人烧饭之类妇女的活计就已经足够了。

259

人们期待男孩子的是领导、支配和统治。一旦穷人家的男孩子受到某种男性职业的培训，他们便开始走上了谋生的艰苦之路，期待成为养家之人。社会等级没有减弱那种期望，但对于统治阶级的男孩子来说，正规教育扩大了他们的权力领域。塑造一个发号施令的男人，需妇女和下层阶级的男人无异议地绝对承认他有权行使权力。妇女则被期盼遵循女性行为规范，而男人则认为男子汉之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女人行使权力。

民事和教会的法律都制定了指导订婚和结婚进程的明确方式，它适用于殖民地的所有居民。最初阶段是婚姻承诺，即男女发誓要结为夫妇。这里有一小段有关殖民地早期实施这一过程的历史知识：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也无论有没有交换聘礼，这种正式的婚姻承诺被认为具有了宗教的基础，并作为将来结婚时的固定誓词。只有教会当局认可的法定婚姻障碍才可否定这一誓词的有效性。这些障碍中，四服之内的近亲禁止结婚。此外，以前曾与其他人有婚约、谎报某人的社会地位或种族、入狱、得传染病，或被证明为性无能等，都是另一些重要的结婚障碍。男女双方都有义务遵守婚姻誓言，尽管偶尔也有男人提出与女人解除婚约的诉讼。

一旦婚姻商定后，新郎将正式接受新娘家庭的嫁妆，同时也送出一份彩礼（金钱保证）。送嫁妆是一种罗马人的规矩，它在中世纪时已开始有了发展和变化。譬如，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有一份登记在公证记录中的嫁妆，但此时的西班牙或新西班牙殖民地却都没有。而且在后者比在前者更不常见，它似乎成为那些西班牙后裔中妇女地位的一种象征。少数土著妇女（也许精英分子除外），以及更少数的混血种人后裔中的妇女才有被公证过的嫁妆，更别说彩礼了。

嫁妆有金钱、轻便货物、可能还有房地产和奴隶，作为新娘父母遗产的基本部分或一部分，经公证后交给丈夫保管。但嫁妆并不是送给丈夫的礼物，丈夫只是在法律上负责保管这份财物，他临死前必须将其等值地归还给妻子。通常已婚男子遗嘱中的第一条就是拿出嫁妆钱归还给他的妻子；如果妻子已不在，那么就给予她的家庭或子女。彩礼，其金钱总数不超过丈夫资产的10%，是新郎与新娘订婚时送出的，作为对新娘的品德、贞洁和纯净血统的一种奖赏和敬意。未来的丈夫此刻不用出示现款。在他临死时，彩礼钱也要从他的财产中分出并赠予寡妻。由丈夫管理嫁妆，当然可能会处置不当，从而损失金钱或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很少能做点什么。但是，如果她担心这种不幸的事情可能发生，她可以诉诸法律来确保她的嫁妆。不过只有极少数妇女会做出这种困难的决定，因为它必定会把婚姻弄得非常紧张。即使如此，这种不顾一切的案例作为妇女代理行为的一类，也是有记录的。

图中这页纸出自墨西哥城的赫特鲁迪斯·德安吉亚诺的嫁妆明细表。

正如上文所说，在16世纪，送嫁妆已变成人们谋求好婚配的一种得意手段；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此举最为盛行。非常富有的新娘随嫁带来的嫁妆有大量精致的衣服和家具。但由于衣服和

家具会老化，因此，数目达好几千比索的现金以及房屋、奴隶等财产便成为任何嫁妆中最为耐用的东西。丧失或贬值不会改变嫁妆的价值。选择送嫁妆的时机是个关键问题。譬如，结婚时送现金和财产可能会帮助丈夫投身于买卖。通过享用这笔嫁妆的初始价值，丈夫希望自己的财产能在10年或20年后得到升值。在举行婚礼的前几天，要公布一份嫁妆报告，但这份报告在正式形成之前也可以秘而不宣；许多时候它甚至不是什么法律文书，而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头协议。

在一位神父面前举行婚礼的婚姻才算正式成立，这时方可圆房。但是，许多夫妻在最终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只要男方做出结婚承诺，双方就会发生性关系。求爱和结婚承诺为那些甘愿接受因违反教会规定而受到的精神惩罚和能够承受对妇女的声誉可能受到的伤害的男女，打开了发生性关系的大门。贞洁被看成是妇女婚前拥有的最宝贵之物；对于新郎来说，它可保证婚内子女为自己所出。妇女失去贞洁关系到她本人对贞洁价值的道德理解。然而，失去贞洁被社会确认后会带来个人和家庭不良的后果，而怀孕则会使后果更为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她的家人没能保护她，家庭也会因此受到牵连，整个家庭的声名因她的“堕落”而受到玷污。有许多方法可用来解决失去贞洁的问题。结婚是最为合适的一种，而且是唯一能被教会完全接受的一种。如果男方不愿意走这一途径，那么女方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可亲自向其施加压力要其结婚，从而挽回女方的贞洁和家庭的声誉。女方或其家族中的成员还可向当局控告男方，要求其结婚或用金钱补偿。

对失去贞洁的公开羞辱是针对妇女的。由于实行双重道德标准，因而社会期望男性在性问题上活跃和主动，在短期内不会失去性声誉。以后，男人还可以用“恰当”的事情，如通过让非婚生子女合法化或者承认他们来恢复自己的性声誉，不过这些选择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为了避免尴尬的局面，关心自己声誉的单身怀孕妇女和她们的家庭会隐瞒怀孕之事，并把生下的孩子交给亲戚照管，或送私人慈善机构。在出生登记和许多人的遗嘱或结婚证书中出现的“孤儿”，其实都是非法诞生的。法律制度是观念的一种体现形式。一对可结婚而又不结婚夫妇所

生的子女被称为“非婚子女”。一个已婚男子或女子与另一位非配偶的人所生的子女被称为“非法子女”。两者的区别具有社会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不光彩的名声较轻,有被法律承认或认可的可能性,甚至还会被父亲视为嫡出(尽管很少)。在第二种情况下,子女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遗产的继承权——它只属于婚内合法子,被视为嫡出的机会实际上为零。在所有情况下,男人是唯一有资格确定或承认父子(女)关系的人。女人要证明某个男子是其子女的父亲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非常困难。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吓倒各种阶层的许多妇女,她们依然会去控告男人遗弃她们,并要求其子女的父亲做出金钱补偿。

262

因婚外怀孕而丧失贞洁的轻重程度是由该妇女家庭所属社会阶层以及一份避重就轻的个人声明所决定的。所有种族和经济状况的妇女都会对丧失贞洁和遭男性遗弃提出补偿要求。绝大多数诉讼都是由妇女提出的,但它无法使男子在个人、家庭或教会关注的压力下自愿与被他蹂躏的妇女结婚。妇女提起诉讼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也很难说这些诉讼有什么效力。有些历史学家看到了教会和市政当局在受理妇女诉讼中的变化,以及 18 世纪后,妇女得到补偿机会的下降。不过这样的结论并没有得到新西班牙总督区内不同地区大量案例的支持。政府为了将这类问题置于自己的权限下,日益注重将精神关怀与更为切实的社会问题分开,这种态度很微妙地影响到了两性关系。为了给父母在婚姻过程中更多的权力,并竭力从教会手中夺走离婚处理权,政府开始侵蚀 17 世纪流行的伦理和宗教观念。到殖民地末期,一种对两性关系的新观念似乎正在形成,根据此观念,妇女对于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当她们不是合法夫妻中的一方时;而合法夫妻是受 1776 年王家婚姻敕令规定的扩大的父母管束权保护的。

在非精英阶层中,可发现更多性行为是规定形式之外的非正常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比那些精英分子更为“公开”。一方面,不是所有穷困或具有混血背景的人都可能对性关系的发生时间和条件具有一种较为自由的认识;另一方面,婚姻的正规渠道对于这些人也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这些男人和女人形成了姘居关系,并

生出了后代，这些人在后来的登记中便成为私生子、孤儿，或不知父母为何人的儿童。后面那种情况的出现是为了保护所有社会阶级男女的声誉，他们因社会原因不能或不愿意披露这些孩子的生身父母。在17世纪，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在有历史记载的一些地区内是非常高的。它在混血种人中高达三分之二，在西班牙人后裔中为三分之一。殖民地末期这一比例的明显下降说明教会进行了较好的监督，改变了性习俗和社会习俗；或者更为可能的是，更多的居民人群认识到了合法婚姻在社会和法律上的好处。

姘居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虽说这种结合的比例和持续时间很难说得清楚。实际上所有种族和民族群体都存在着姘居，但必须注意到，生活在新西班牙总督区核心地带的土著群体受到更为严格的宗教监督，并且生活在一套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压力体制之下，因此姘居比例较低。即便如此，17世纪在边远地区中社会地位高的土著男子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这与他们在被西班牙人征服前的文化是相同的。个人的社会阶层越高，结婚就越可能成为组建家庭最得体的方式。合法婚姻和正统婚姻的比例在白人中较高，而在混血种人中则较低。 263

一般说来，“不健康的友谊”、“龌龊的关系”和“不体面的同居”在新西班牙殖民地是很常见的。白种男人在这些形式的关系中得到了一种性威力的满足，而甘愿发生这种关系的女人也有某些东西可获。她们通常是社会出身低(无论在阶级还是种族上)的妇女，她们或她们的子女可能希望借此攀上社会高枝，或者保护自己的收入和财产。处于那些社会阶层的人面对这类关系时相对不严肃的态度，及教会对根除此类陋习的无能为力，给这些人留下了自在地生活在法律和宗教准则要求之外所需要的自由空间。由于童贞是一位贞洁妇女最宝贵的东西，因此社会道德及教会设定的规范与许多妇女的实际行为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贞洁是件好事，但不能一直保持或爱护它。只在承诺的婚姻没有付诸实现，失去贞洁才会令人惋惜。由于在婚外失去贞洁的绝大多数是贫困妇女和黑人妇女，因而它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相对而言对于上层阶级成员更有用——她们可用与“婚姻显示了社会地位”

同样的口吻来强调她们的与众不同。

作为合法两性关系和生育的平台，婚姻是教会和政府承认的男女之间的一种持久性结合。特兰托公会议规定，结婚必须当着牧师和合法证婚人的面在教堂内完成。在 16 世纪最后 25 年的新西班牙殖民地，这种形式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被绝大多数结婚者接受了。婚姻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男性和女性间、父母和子女间的权利等级，它具有法律和习俗的力量。家庭就好比微型政府，它的首脑是父亲，他作为家长对其属下——妻子和子女行使全部权力。这一权力的范围是很广泛的。男子在法律上有权体罚或严惩他的妻子和儿女，只要不伤害他们的生命就行。他本人的性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公布并会被认定为丑闻，他必须向教会或行政当局保证进行自责和改正。妻子必须证明男子不道德地滥用其特权，才能通过免除她的义务或与丈夫离异以获得对其处境的补偿。在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分食和分床这种“离异”形式是当时妇女唯一可行之事。丈夫和妻子可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或者直接分居。在这种状况下，男子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多少决定于他的收入和可支付的储蓄。但许多男子一走了之，轻易逃避了这一责任。

264

一个抛弃自己妻子的男人可能会通过姘居追求他的销魂之欢，甚至也可能企图“再婚”。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他都犯了重婚罪，这是一种归宗教裁判所处罚的犯罪。那些在神父面前举行过婚礼的人留下了有助于抓捕和审问他们的法律印迹，因为结婚时要提供自己虚假的“单身状况”证明、结婚意愿，并履行结婚仪式。重婚和一夫多妻要判处数年监禁，最后还要将违法的双方都交还他们原来的家庭。然而作为无辜受害者的第二任配偶却往往一无所得，因为对伤害的补偿当时还是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概念。

一位妇女无论是选择忍辱负重，还是为了公正而离婚，都取决于她能不能靠前夫那一点补偿而生存；通常，她都要依靠娘家的支持。不幸的是，大多数妇女在财政上依赖丈夫，自己不太可能养活自己。为此，她们忍受了人称的“不幸生活”。婚姻不幸的妇女的显著特点就是身体

受到虐待。教规和民法都允许丈夫用适度的方式惩罚自己的妻子和子女。法官必须判定丈夫什么时候超出了合理惩罚的界限,以及谨慎惩罚和因使用暴力而危及生命之间的底线。如果妻子觉得其丈夫的虐待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了危险地位,她可以借助市政或教会当局,要么让丈夫保持克制,要么离婚。这一过程本身对于妇女就是一种挑战,因为它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证人和律师的参与把家庭的隐私都暴露在了公众面前。这会招致丈夫的辩驳,因为他的权威和男子汉自尊心都受到了挑战。

对妇女的暴力有时还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有时男性暴力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一种"发泄"方式还会在社会和家庭范围内被接受。不过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不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那么他会让自己蒙羞。一方面想要控制一家人,另一方面却虐待妇女,这在上层阶级中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情,他们将保护自家妇女视为自身荣誉的一种象征。大多数身体上受虐待的妇女都寻求自己家庭的保护,不过家庭的干预大多只是带来一时的缓和。只有律师和王家官员的干预才会提供更为长久和有效的救助。

恩爱和稳定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比暴力和虐待留下的印迹要少得多。毫无疑问,一些神学家提出的作为婚姻基础的家庭成员间的义务确实存在,不过我们必须理解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基督教带有一种很强的厌女特点,它认为与对上帝之爱相比,婚姻之爱只居于第二位。性被看作是一种具有高尚目的(传宗接代)的亲密体验。它还被看作是一种需要加以约束和适当疏导的危险情感。那些走上歧途和纵容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将自己的灵魂陷于危险之中。特兰托公会议之后,教会人士对性爱在公开场合的表现,甚至在婚姻允许范围内的公开表现,都做了严格限制。如果男女双方都是在基督教结婚仪式中结合的,那么婚姻之爱就被看作是夫妻关系的基础。作为个人意志最后表现的遗嘱通常都含有对爱情、信任和每个家庭成员都感受到的亲情的简单表示。另一方面,从公共档案中发掘出的大量情书也证实了恋爱中男女的感情,他们或是要结婚,或是沉醉于情投意合的关系之中,或是进行

265

了非法的结合。许多正在社会阶梯上攀爬的精英分子或家庭之间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安排的,父母在选择婚姻对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对于妇女来说,如果结婚时缺乏爱情或激情,她们将期待感情会随着时间而增长,或者把它作为一种无私和值得体验的对象转移到儿女身上。在绝大多数婚姻中,亲密、爱情和钟爱的真正界限比不正常婚姻案例中的暴力更难以辨别。不过,无论是妇女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低丈夫一等的地位,或是缺少爱情和情感的公开表现,都不会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婚姻都是利害关系的约定。

男人对女人在等级上的权威在日常生活中是具有很大弹性的。法律规定的局限、习俗的力量以及出自丈夫和男性亲属默许的宽容,都可规避法律的约束。守寡、非婚同居和贫困迫使妇女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根据对 18 世纪晚期的安特克拉(瓦哈卡)等地区的研究,城市地区 23 — 27 岁的白人妇女中有五分之一在主持家庭;而在 60 岁及以上的妇女中,主持家庭的比例近 50%。另一方面,印第安妇女主持家务的比例要比白人妇女低得多。在同一时期墨西哥城的一些教区,各种族妇女中完全主持家务者的平均比例大约为 25%。

无论是靠遗产为生还是自谋生活,各种族群体和社会阶级的妇女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向完全服从和压服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很明显,当社会低层的非白人妇女处于无配偶或无男性赡养者而被迫靠自己想办法生存的时候,她们会遭受到巨大的挑战。即使结了婚,妇女还会因丈夫财力有限而被迫寻找谋生之道。印第安妇女把家禽、蔬菜和纺织品拿到本地市场上去贩卖,或将陶器带到周日市场(它在前哥伦布时期就已存在了)上出售。穷苦的西班牙妇女和印欧混血种妇女大多从事裁缝业,或者摆小摊卖含酒精的饮料、雪茄、糖果、蜡烛和小饰品等。具有中等企业主身份、能够独立谋生的寡妇或已婚妇女则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与人合伙做买卖,从中抽取一半的利润。

266

妇女担任管理职务时,也会像男人在做这种事时一样显示出才干和失误,只是她们的活动要求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并且也要知道何时必须将某些工作委托给男人。男性工头、律师和代理人必须完成习俗规

定的男性工作，如运送货物，或者管理乡村财产。有关土地的诉讼，无论是在酋长间、混血种人之间或是白种人妇女之间都很常见，这在一个以土地所有权作为衡量社会地位以及谋生手段的时代是可以想象的。无论是大土地主还是小土地主或管理人，乡村的女性代理活动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频繁，我们甚至还得承认，妇女有时还作为几代同堂的大家族的管事者在行事。妇女适应与管理有关的事务和文化的能力在以下这件事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16 世纪米斯特克能干的女酋长掌握了西班牙的财产继承法律制度，从而发财致富，并始终保持着特权地位。由于免除了赋税并乐意为她们地产上的普通印第安人提供服务，她们赚得了大量的土地，并在 1550—1600 年间登上了被称为权力的黄金时代的高峰。图图佩克女酋长安娜·德索萨（Ana de Sosa）的财产比某些富有的委托监护人庄园主还多，人们认为她的地产仅次于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一般说来，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酋长已失去了权力和财产，但他们依然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着作用；而妇女在努力维持生计中也没有被边缘化。

在城市里，妇女们拥有自己的纺织作坊、面包房、印刷店，以及通常从已故丈夫那里继承来的买卖。曾经有过妇女丝绸织工行会，但大多数女织工都是作为家庭手工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不过妇女在大规模批发和长途贩运买卖中是很少见的。从殖民地末期皇家烟草制造工厂开业起，新西班牙殖民地的工业开始雇佣妇女。这一行业 7 000 名员工中有一半是妇女，她们定期领取工资，从而预示着 19 世纪带薪妇女职业的开端。18 世纪下半叶，部分受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影响，波旁王朝的皇家顾问开始推广这样的观念：妇女可以也应该成为推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在 18 世纪 60 年代，政府已开始鼓吹对妇女实行初等教育，并对她们进行可从事工作的技能培训；特别鼓励那些社会较低阶层的妇女到政府提倡的行业中服务，如烟草工厂；如果是寡妇或单身，则应挣得一份独立的收入。一些重要的学校在墨西哥城创建了起来，如为巴斯克裔女孩开设的“比斯开语学校”和“马利亚修道会教育学校”。后者招收来自最上层家庭的寄宿生，但在社会关切的

鼓动下，它又为所有种族和经济地位的女孩开设了公立学校。在各省城也
267 创建了一些学校，它们都既为公众服务，又为富人服务。18 世纪末期开设的女子学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学生人数也是很多的。但是它们依然满足不了大多数女性居民的需求，而为新西班牙殖民地大量乡村妇女开设的学校就更少了。直到 19 世纪，妇女中的文盲数目还是很高的。

当做小买卖、提供个体服务和挣工资当雇工的工作成为非统治阶层妇女的主项时，统治阶层的工作便有了一种不同的内涵。如果大家庭事务管理中男性权威壁垒出现了临时破绽，一些女性就会逐步进入管理层，直到另一个年轻男子成长到可以接手的年龄。特别富有的妇女（如塞尔瓦-内华达[Selva-Nevada]女侯爵）的特例表明，在特定时刻，女人可以用与男人相同的能力控制家庭财产的命运。女侯爵头衔原来的所有者安东尼娅·戈麦斯·罗德里格斯·德佩德罗索（Antonia Gómez Rodríguez de Pedroso）接受的遗赠规定只有家族中的女性支系才能继承这份财产。这一规定在此家族中已施行了四代。第一代女侯爵 1778 年被授予贵族头衔后，就精心为她存活下来的每一个子女策划婚姻和生活；成为寡妇后，她还用一大笔她精心照料的巨大财产建立了两所女修道院。同样有趣的例子还有圣迭戈伯爵和萨尔瓦铁拉（Salvatierra）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玛利亚·伊萨贝尔·贝拉斯科·阿尔塔米拉诺-奥万多（María Isabel de Velasco Altamirano y Ovando），她未婚，拥有两个头衔和三处限定继承财产，管理着整个家族的买卖。1797 — 1809 年间，她与妹妹玛利亚·何塞法（María Josefa）掌管着家族事务。

没有比上层阶级妇女管理女修道院的例子更好地说明她们适合自我管理和权威场合的能力了。这些女修道院是实行双重层面管理的：女修道院之内，修女们负责管理该机构日常运作的每一件具体事务，包括放贷、抵押和财产的管理；第二层面是外部管理，由一名管家或管理人和负责所有修道院事务的主教辖区官员实施。管家和修女分别保管着一套账册，账册上记录了每一笔进出款项。账册必须定期核对，管家要对借记和坏账负责。主教区的官员对他们辖区内的所有修道院都有最终监督权，有权批准或否决所有的放贷、抵押、采购和财产出卖。

修女们很少拥有会计方面的教育背景，只是在上手前简单地学了一下，因此失败是可以预见的。一些女修道院不时会发现管理出了问题，但另一些女修道院则精于改进自己的财务工作。1629 年墨西哥城的大水、劣质粮食和迟钝的经商意向等外部问题，都影响到那些具有各式各样经济利益的女修道院。可是，修女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一种轮流替换的义务，它能使修女们控制好自己的钱财，追求自己的利益。她们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削弱她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当境况顺利时，其他妇女也完成了相同的管理或决策工作。妇女的代理能力，不存在什么种族、民族或肤色的障碍。

268

代理能力并不只体现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宗教资助——如大量的临终捐赠、宗教节日庆典，或创立资助一位神父或修女任教职的资金等，都是与有钱妇女密切相关的事情。这些慈善行为有些是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采取的，不过通常是那些对自己的财产取得完全支配权的寡妇们做的。17 世纪早期，就出现了数千起这样的捐赠。从 1600 年到殖民地末期，新西班牙 30 座修道院中有 16 座是妇女们创建的。这些虔诚的行为增强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使捐赠者相信：善行将有助于拯救他们的灵魂。在一些例子中，赞助条款将女修道院中的一些地方划给创建人的亲属，这样便为那些展现宗教感召或需要一个安全或避世之地的亲属提供了资助。有钱而又没有子女的妇女还通过收养儿童来行善事，供养他们直到成家。由于 17 世纪非婚生子女大量增加，而且其中大部分孩子都是西班牙人的后代，因此非正式收养相当普遍，甚至在混血种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中间也是如此。被收养者都是被认为是“孤儿”的儿童，他们可能是有钱人家妇女的非婚生子女，或者是那些不准备公开承认其父亲为何人的妇女的孩子，或者是缺乏证据证明其父亲为何人的妇女的孩子。收养一般都在同种族或民族群体的居民中进行，对精英阶层而言，这是为一定数量的本阶级儿童提供社会补偿的一种机制。

宗教生活对妇女来说是一种选择，其方式与男人立誓成为一名神父是相同的。实际上，新西班牙殖民地唯一可确定的妇女法人团体就

是由成千上万名修女组成的团体。但如果想到教会内谋生，那么男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男人要立誓安贫、慈善和服从；而女人则必须要增加一个“自我关闭”的誓言，这意味着她们一旦立了这个决定性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修道院这个场所。男人可自由走动，因为大家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服务社会的生活，走动是必需的。相反，女人把自己关起来被认为是履行女性宗教生活目标的最适宜状态。由于她立了誓后，修女便成了基督的新娘，她要在女修道院中为自己赎罪，并服侍基督，还要作为虔诚和有灵性的模范服务社会，用她的祈祷为他人求得宽恕。就像妻子在家中一样，修女通过把自己关闭起来保护自己不受世上潜在危险的侵害。隐居生活被看作是一种非常荣幸的生活状态，获得了很强的社会认可。

女修道院生活也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可庇护处于不利环境中的、或是被认为需要防备可能与社会下层人士缔结不理想婚姻的精英阶层妇女。为上帝服务并履行天职与社会-经济动机合而为一。16世纪的女修道院创建者认为，需要有一个庇护场所使征服者的女儿和后裔以及经历了恶劣经济时光的早期移民过上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体面生活。在以后的时期中，社会要求依然是基金会这类词语，尽管入女修道院的妇女必须满足严格的经济条件。

269

女修道院的准入规定中涉及妇女意愿的直接表示，而只有西班牙移民的后裔才能够进入女修道院。要当修女，就必须证明自己血统纯净、出身合法。有时，对于社会显贵私生女的出身合法性要求是宽松的，而对一个纯净的半岛血统要求却不是这样。虽然墨西哥第一所女修道院——怀胎圣母女修道院(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收留了蒙特祖马的一些后人，但这只是一种特例，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直到18世纪，土著妇女才有了自己的女修道院，她们可以在那些地方修行了。混血种妇女从来不会去过修女生活，她们是以女仆甚至奴隶的身份出现在女修道院里的，这使得她们与修女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社会鸿沟。第一所印第安妇女修道院创建于1724年，是新西班牙殖民地总督巴雷罗侯爵(Marquis of Valero，1716－1722年在任)巴尔塔

萨尔·德苏尼加(Baltasar de Zúñiga)赞助的。只有女酋长和纯印第安血统的上层妇女才被允许入内修行,这也维护了和西班牙女性后裔的修道院同样的血统纯净的观念。从事"不光彩"职业或低等职业的男人的女儿被禁止进入女修道院,这样便减少了土著居民中有资格进入女修道院的候选者的人数。酋长和上层家庭对于这一先决条件没有异议。18世纪,又建立了两所面向印第安妇女的修道院,它们是1734年核准在巴利亚多利德建立的科萨马洛阿潘最圣洁怀胎圣母女修道院(Our Lady of the Purest Conception of Cosamaloapan),和1774年在瓦哈卡建立的天使圣母女修道院(Our Lady of the Angels)。所有的女修道院都对底层妇女进行种族和社会排斥。由于圣方济会省会长允许白人修女进入印第安妇女修道院,科萨马洛阿潘的基督圣体女修道院(Corpus Christi)和最圣洁怀胎圣母女修道院发生了分裂性的内部混乱。由于修女及其保护人和朋友担心,如果这一进程不被中止,那么女修道院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于是1745年基督圣体女修道院求助西班牙的西印度院以获得禁止白人妇女新手进入女修道院的王家法令。18世纪末,公众舆论高度认同这些女修道院作为服从和纪律场所的典范作用并不比那些白人妇女修道院差。

女修道院在墨西哥殖民地时期曾十分风行,1550－1811年间大约建立了近60所女修道院。它们成为城市地位的一种象征:凡是入流的城市区域都希望自己的城市中有一所女修道院。遥远的北方地区则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殊荣,不过尤卡坦的梅里达、瓦哈卡和恰帕斯,以及遥远的南方边界地区,却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女修道院,譬如像格兰德河畔的圣米格尔(San Miguel el Grande)、普埃布拉附近的阿特利斯科(Atlixco)小城等。修女的人数根据每一座机构的经济能力多少不等,有时则是由创建者预先定下的。一些大的女修道院,如墨西哥城内的道成肉身圣母女修道院(Our Lady of the Incarnation)和耶稣·马利亚女修道院(Jesús María),几个世纪中曾收留过数百名修女和数千名仆女。女修道院除了具有精神象征功能,以及消除白人妇女害怕不均等社会竞争命运的简单社会服务功能外,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们

270

在建造时期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之后又为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提供出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城市里拥有地产，有些甚至在乡村也拥有土地。譬如，到 18 世纪末，墨西哥城中的女修道院已成为最大的城市地主之一。虽然许多女修道院都将创办资金用到了要求定期翻新的回廊和教堂建筑工程上面，但女修道院还是逐渐成为新西班牙殖民地信贷的主要来源。嫁妆、捐赠和以修道院名义进行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使资金不断增长，使得大多数女修道院都有充足的资金借贷给需要钱的地主、商人，甚至皇家金库。到了殖民地末期，女修道院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放贷机构，其作用是任何男修道院都没法相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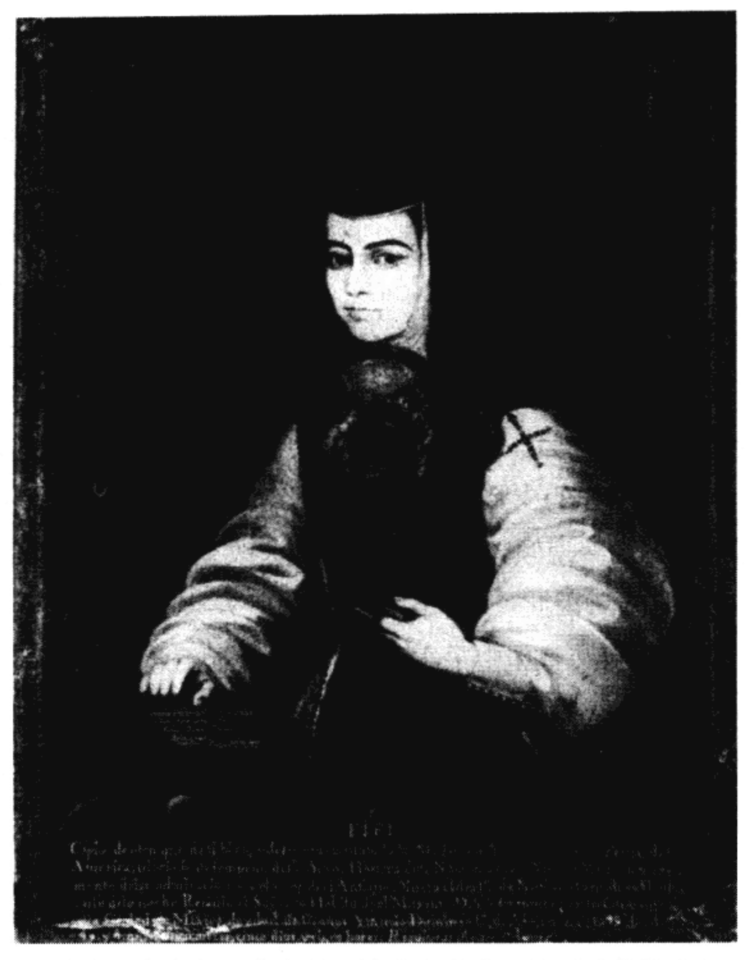
图中的这本书详细列举了墨西哥城圣贝尔纳多修道院的修女们应该遵守的清规戒律。非常考究的修道院院规书籍会委托给专门的艺术家来制作。但这本院规是由非专业的画家画的。

由于所有入院的修女都要求是识字的，而且有些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女修道院便成为可以教习女性文化的唯一场所。女性文化的特点是特别地宗教化，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一直受到男性教会权威人士小心翼翼的监控。许多修女书写自己内心的自发之感，有些则在忏悔

师的鼓动下，检查自己信念的正统性，创作自己精神历程的内心记录之类的东西。在17世纪，修女常常会写其姊妹们的传记以及自己修道院的历史，但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是匿名的。修道会中的男性传记作者和史学家重新撰写有关她们的资料，并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妇女们写出的作品由于自身原因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威，从而难以持久保存，或在女修道院墙外流传。18世纪时，这一情况有了改变，有些修女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作品。该世纪最为著名的教会作家是索尔·玛利亚·安娜·阿盖达·德圣伊格纳西奥(Sor María Anna Agueda de San Ignacio, 1695—1756)，她是一位来自普埃布拉的修女，她受到了其教区主教的鼓励而发表作品。尽管有这样的支持，不论是修女作品的特点，还是不求发表而只为姊妹们写作的普遍倾向都没有发生多大改变。由于不鼓励世俗妇女写作和发表作品，因此修女们的作品，不管发表还是不发表，作为墨西哥殖民地时期妇女著作中最主要的部分，仍显得十分突出。

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以及有机会写作培育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修女，她说自己在成年时就立誓献身上帝，因此对婚姻没有兴趣；虽然也知道修道院生活特有的难题，她还是获准享有她希望的学习和写作的自由。这位特殊女子就是索尔·胡安娜·依内斯·德拉克鲁斯(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她于1669年进入圣赫罗尼莫(San Gerónimo)的耶罗尼米特(Hieronymite)女修道院当修女，1695年4月逝世。胡安娜是非婚生女，她的母亲是文盲，且还有另三个非婚生子女。不过，管理家庭和地产并不一定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她母亲经营着一处乡下地产，并成功地将其女儿提升到了高过自己的社会地位上。索尔·胡安娜作为一位天才儿童在总督府中度过了一段时光。可能由于她的身份和她自己确定的学习使命，她选择进入修道院。她虽然是一个虔诚且重实践的天主教修女，但对写宗教作品没有兴趣，而是乐于探索做正规学问和写作的一切可能性。她创作了宗教和世俗戏剧，用于各种社会场合的十四行诗和其他各种诗歌，用于宗教场所的歌曲，甚至还有一本不为人知的音乐教科书。

胡安娜的巴洛克风格作品异乎寻常的高质量使她在新西班牙总督



索尔·胡安娜·依内斯·德拉克鲁斯是赫罗尼莫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她创作了大量剧本、十四行诗和歌曲。这幅画像上的说明称该画临摹自修女本人的一副自画像,但现在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区之外也赢得了声名。她是各任总督的朋友和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家,但她最终还是与两位教会权威人士产生了矛盾,一位是普埃布拉主教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圣克鲁斯(Manuel Fernández de Santa Cruz),另一位是墨西哥城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德阿吉阿尔-塞哈斯(Francisco de Aguiar y Seijas)。胡安娜在前面那位主教的鼓励下,撰写了一篇关于耶稣灵性的考证,并且十分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神学解释;但当该主教用《雅典娜信札》(*Carta atenagórica*)的名字发表了她的论文后,她的麻烦也就来了。新来的墨西哥城大主教极为严厉,他运

用大主教的权威来威胁修女胡安娜，说要对她在《信札》中表现的思想进行不公开的刑事调查，同时要求她停止出版和出售她的作品。由于立过服从誓言，索尔·胡安娜只好那么做了，但还是写了一篇名为《答辩》（*La respuesta*）的杰作进行自我辩护。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她后来还是继续偷偷地写作和阅读，但在环境的逼迫下她也不得不表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照料患病的姊妹时，她染上了致命的疾病。虽然胡安娜不是新西班牙殖民地唯一的修女或女性作家，但她的作品，尤其是诗歌所具有的复杂性、力量和完美，使她赢得了"第十位缪斯"的美誉。她被认为是殖民地时期最优秀的一位作家，并已成为文学批评家和一般公众中大受欢迎的文化偶像。她一生的讽刺性在于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天才，使之适应完全封闭的修道院生活，并服从宗教家长制强加给妇女的规则，但同时又发挥了一直被低估的女性智力特性。

由于土著妇女在18世纪前缺少自己的女修道院，她们便通过地方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怀。从16世纪早期开始，妇女作为活跃的成员，或有时作为官员，在许多农村土著团体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殖民地的档案中，存有不多的纯粹女性团体记录。在不超越可接受的宗教正统性界限的情况下，有些妇女还从事着萨满教的一些事务，如治病、念咒和为她们的主顾控制其他人的行为等。土著、混血种和西班牙血统的妇女会一起参与这些活动，但它们在地方上是作为地下活动而存在的。这些妇女会不时受到教会当局的揭露和谴责，但这些活动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273

到殖民地末期，妇女的法律地位依然没有改变，但变革之风已开始为她们呼唤新的角色。墨西哥殖民地时期妇女经历的多样性反映了家长制统治下多种族等级社会的复杂性。虽然这三大因素将妇女的生活封闭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内，但性别关系状况上依然存在的横向和纵向的细微差别。在个人层面上打破这一框架的界限是可能的，许多男人和妇女的个人生活也显示出了这一点。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新西班牙总督区中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是建立在经常变化的

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它给予每个群体及其妇女一种不同的经历。不过，对于妇女而言，性别桎梏让她们的生活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譬如要服从父母的权威，遏制了大多数妇女追求性满足的对性行为的双重标准的不平衡，以及夫权强加的种种约束等。虽然对于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还有许多东西要研究，但我们能够描绘出的一般画面已经激起了相当可观的历史想象，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社会的了解。

第三部分

崩溃、新生与挑战：1810－1910

275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墨西哥于1821年独立，并引入了欧洲君主制。1824年，维系了仅10个月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的帝国被共和政体所取代，瓜达卢佩·维多利亚(Guadalupe Victoria)就任总统。他四年的任期仅为共和派领导人的相互斗争以及与那些君主制的支持者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这些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爆发的政治斗争，是以三场战争为主线发生的，这三场战争塑造了墨西哥的政治及政治家。

对于墨西哥领导人而言，这三场特殊的战役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850年，那些曾为两派战斗过的独立战争的老兵一直控制着墨西哥。然后是第二代政治领导人，他们在1846－1848年的墨美战争期间登上了历史舞台。最后，一批将军在反对法国占领(1862－1867)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组成了波菲里奥(Porfirio)政权，其中包括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这些军人从其战争经历中学会了自我实现与自我证明。

对于独立战争的幸存者而言，胜利引发了两种情绪。首先是对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Ⅶ)本人的抵制，也有很大部分是对君主制的抵制。其次，军人普遍支持1812年宪法，该宪法是由来自西班牙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殖民帝国各地的代表制定的，它试图振兴地方市政制度。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关键议题。

经历了1848年墨美战争的人至少学到了两点，这塑造了276 他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对于自由主义。战争的幸存者认为，充斥在政治精英间纷纷扰扰的政治斗争是墨西哥战败的罪魁祸首。并与战争一样令人沮丧的是，这些人发现匆匆组织而成的军队所展示的勇气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以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为代表的这些人认为，军队以民为本才是理想的模式。华雷斯在1861年后就任总统期

间推行文官统治的尝试令人崇敬,但这一做法却受到了抵制,而这些和平时期的反对者中,有许多是曾经效忠于他的部队军官,因为华雷斯对他们的付出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

1862年5月5日,后来被定为墨西哥节(五月五日节,Cinco de Mayo),一部分军人在这天首次击败了法国入侵者,但他们仍旧不得不承受后者长达五年的占领。这些人在战争中产生了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对于通过实现现代化确保墨西哥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认为,在国内出现外商要比出现外国驻军好,通过专制统治实现自治要比因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而求助于外国军队来建立秩序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19世纪的墨西哥人都能够领会军人对战争和政治解决方案的阐释。比如说,教会的最高当局首先效忠的是罗马。那些被孤立的乡村人,主要是印第安人与城市中的墨西哥人的观点迥然不同,其政治立场的出发点是他们的村庄,法国人和墨西哥城的人对他们而言没有区别,都是外来者。牧师们试图捍卫其所拥有的宗教特权,而村民们则努力保护他们的部落土地,拒绝墨西哥城的政客把所谓的政治带到这里。政客们则认为这些都是建立现代社会的障碍。

第九章 旧殖民主义终结，新殖民主义开始

弗吉尼亚·古埃迪亚(Virginia Guedea)

277 1700 年波旁家族登上西班牙王位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朝代更迭。18 世纪初，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与西班牙的竞争日趋激烈，这迫使西班牙开始了对其统治地区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包括加强王室的监管、财务运作，以及建立有效的帝国防御体系。

改革计划首先在西班牙本土进行，50 多年后才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展开。改革计划被引入到新西班牙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时既非一帆风顺，也不甚完整。然而，由于改革改变了殖民地政府的结构和功能，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足以引发一场危机。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义、自然哲学观念的传播，使克里奥尔人可以从新的角度作出判断，这也促成了后来危机的爆发。这些新观念使殖民者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美洲人，增强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认同和热爱。18 世纪两场主要的革命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对危机产生了影响，不过它们是在宏观的方面发挥了示范效应，而非政治理念的直接影响。

大约 18 世纪中叶，推动西班牙帝国现代化的观念开始兴起，目的是使其可以应对中央集权的、专制的、更有效率的政权所控制的欧洲新

兴工业化力量所带来的挑战。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Ⅲ)[1]及其政府(1759－1788)负责组织和实施这些改革计划，这就是著名的波旁改革(Bourbon reforms)。



卡洛斯二世(Carlos Ⅱ)[2]是一位深具启蒙精神的西班牙君主，是他颁布谕令，在美洲殖民地实行波旁改革。他希望在帝国范围内建立更为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税收机制。这次改革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但却激起了广大殖民地人口的不满情绪，削弱了他们对西班牙王室的忠诚度。

278

根据波旁改革，新西班牙作为"西班牙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将成为真正现代化的殖民地。第一项工作是要彻底改革其经济，使其在完全独立于西班牙半岛的同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以增加其每年对王室的贡献。另一方面，王室认为殖民地应由王权牢牢控制。这意味着要降低日益自信的新西班牙人已达到的自主和自治程度，同时也要限制地方寡头和地方机构的影响力。"最终，人们必须知道他们生来就应服从，无需好高骛远地讨论什么政体设计"，断然将耶稣会驱逐出包括新西班牙在内的所有西班牙领土的王室法令中如是放言。

为了实现其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波旁王朝的管理者们发现他们不

① 英文中拼写的 Charles，即西班牙文中的 Carlos，Charles Ⅲ即 Carlos Ⅲ。本书中对西班牙君主的称号有时写作英文，有时作西班牙文，用法较混乱。请读者留意。——编者注

② 原文如此。按图片及图注说明，此处应指卡洛斯三世。——编者注

得不建立一个与地方权力组织毫无关系的、全新的、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一系统应由明晰改革目的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组成。事实证明，这是增加税入、加强对殖民地政治活动管制的唯一途径。

王室还发现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1762 年，战略海港哈瓦那(Havana)被大英帝国攻陷，这清晰地表明了殖民地军事体系的脆弱性。1764 年，为了给新西班牙提供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胡安·德比利亚尔瓦(Juan de Villaba)被任命为总视察官(inspector general)，负责组建一支专业军队并创建新的军事力量。比利亚瓦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他从西班牙带来的士兵在行动过程中态度非常傲慢，行为肆无忌惮，蔑视当地习俗及政治现实，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279



何塞·德加尔韦斯由卡洛斯三世任命为新西班牙的总视察官，他主持了在墨西哥实行波旁改革。1784 年，他创建了新的行政单位，把墨西哥划分为十二个监政官辖区，并创立了一个由军队直接管辖的北部边区，称为内省。得克萨斯的加尔韦斯顿就是以他命名的。

次年，何塞·德加尔韦斯(José de Gálvez)被任命为新西班牙所有检审庭和王室金库的总视察官和军队的总军需官，任期为1765－1771年。加尔韦斯手握足够的权力来到了新西班牙，按自己的理解方式推行波旁改革的措施。在弟弟马蒂亚斯(Matias)、侄子贝尔纳多(Bernardo)，及其他半岛低级官员的支持下，他推行了多元都市建设(metrop olitan)政策，旨在使克里奥尔的精英层淡出总督府管理机构。为此，他恢复了西班牙人在检审庭中的至高权力，并试图通过引入名誉议员(honorary alderman)和地方法官(magistrate)这两个新的公共职位来控制市镇。他还试图提升加迪斯领事馆的地位，从而削弱墨西哥城领事馆在新西班牙的广泛权利。新西班牙和北美大陆的主要军事驻地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迫使加尔韦斯加强了税收征管。事实上，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变成了新西班牙波旁改革的经济基础。

280

这种情况下，原本因缺乏足够财政人员而由企业家征收的销售税(alcabala)被转移到了殖民政府手中。鉴于这项政策自1754年后一直运行顺利，加尔韦斯决定将其推广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针对印第安人的税收政策是他关注的另一问题。他承担了该地区税收征管的修订和标准化工作，他还撤销了一些矿山和印第安村镇的税收豁免权。黑人和穆拉托人被给予相同的待遇。更为重要的是烟草专卖制度的建立，其最终成为新西班牙最大的财政来源。

在加尔韦斯的监管下，新西班牙的税收有了大幅增加，但由于其政策过于严苛，并对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都产生了影响，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消费税，尤其是食品和家庭用品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物价上涨。烟草专卖在提高了烟草价格的同时还降低了产品质量。卡洛斯·马里沙尔(Carlos Marichal)认为，这场18世纪末的税制改革是十分有效的，它使新西班牙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比伊比利亚半岛多了70%。

新建立的官僚体系和军事机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限制天主教会。教会是殖民地政权的主要支柱，也是殖民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达到限制教会的目的，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分配王室赞助的资金，同时减少神职人员的资源和特权。为此，王室通过教区世俗化削

弱神职人员的影响力,这引起了人们的焦虑情绪。1767 年,查理三世对所有西班牙领土上的耶稣会所下达的驱逐令也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这一法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耶稣会在西班牙帝国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及其成员对罗马教皇的绝对服从。这一决定招致了新西班牙社会的反对,并带来了潜在的严重后果。

加尔韦斯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殖民地各阶层的赞同。事实上,由于日益明显的独裁政策以及无休止的税收,加尔韦斯的统治已经使得殖民政权逐渐失去了当地臣民的支持。对耶稣会的驱逐成为了一些地区起义活动的导火索。

在米却肯、瓜纳华托以及圣路易斯波托西——后一代人进行暴力血腥的起义斗争的主战场——等省,爆发了数起群众运动,其主体既有当地人,也有殖民地移民。正如费利佩·卡斯特罗(Felipe Castro)所言,对改革措施的反对并非是对某项具体措施的排斥,如驱逐耶稣会或严苛的新税收政策,它是对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反对,而这个国家正在试图谨慎地改变政府及其管理对象间的传统关系。

281

加尔韦斯立刻通过惩罚性的远征对起义者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他无情地处罚了起义分子及他们的城镇。并对索诺拉(Sonora)北部地区反叛的印第安人给予了同样的严酷对待。加尔韦斯利用这个机会,明确了他作为国家权力化身的角色,重新确定了西班牙君主和新西班牙人的关系,并永久性地结束了对改革的反对。

1776 年 1 月,加尔韦斯被任命为西印度大臣(Minister of the Indies),这使得改革获得了更大的动力。改革计划进入了最激进的阶段。这一时期,西班牙政府给予了美洲殖民地不少好处,以获取其对改革计划及西班牙王室的政治支持。

为规范和增加采矿活动,1777 年,矿业法庭(*Tribunal de Minería*)成立。王室还向新西班牙矿区派遣了技术代表团,并于 1792 年创建了矿业学校(*Escuela de Minas*)。尽管当时新西班牙的采矿活动已经有所复苏,但这些措施的确很有效并且备受欢迎。

王室还致力于提高殖民地主要城市中心的市政功能及现代化程

度，尤其是北美主要城市墨西哥城。几任总督，特别是第二代雷比利亚希赫多（Revillagigedo）伯爵的任期内，墨西哥城市郊的规划、卫生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老旧建筑的修缮和新建筑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新的机构的建立，如位于墨西哥城的圣卡洛斯艺术学院（San Carlos Art Academy）和植物园，使得艺术与科学获得了长足进步。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进行的外贸改革是整个改革至关重要的一部分。1778 年，殖民当局宣布了以打破加的斯港对美洲贸易的垄断为目的的《自由贸易条例》，外贸改革正式展开。因为一些限制新西班牙贸易和港口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其贸易增长相对落后。事实上，殖民地仅经历了两年的自由贸易，1788 年和 1789 年。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另一因素是随后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先是西法战争，接着是西英战争。这些战争推动了中立贸易的增加。此外，西班牙王室为了削弱墨西哥城领事馆的权力，在韦拉克鲁斯和瓜达拉哈拉也分别成立了领事馆，尽管这会导致各领事馆间的竞争，但新的权力组织的出现成为推动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

1776 年成立的“内地诸省总司令部”（The *Comandancia General de Provincias Internas*）并不归总督管辖，其主要任务是应对新西班牙北部地区日益增加的种种麻烦，同时针对边境地区几股外国势力的威胁进行防卫。不过，对各总督辖区领土的重新划定直到 8 年后监政官辖区体系（intendancy system）建立才全面展开。

282

监政官辖区体制最初于 1749 年出现在西班牙，1784 年这一体系被引入新西班牙则意味着在市镇、地区和总督辖区三个层面的公共管理改革全面展开。王室试图通过引入这一体系和建立新的省，以合理的方式组织和简化各总督辖区的管理。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于是被划分为 12 个监政官辖区，各位监政官被授予之前由总督掌握的各种权力。这些新的官员负责区域内四大领域：行政、司法、采矿收入及军事。这一体系的采用并没有促进统一，相反导致了权力分散。霍斯特·皮切曼（Horst Pietchmann）认为，中央政府的弱化源于王权的代表向市镇和地区政府的分散。尽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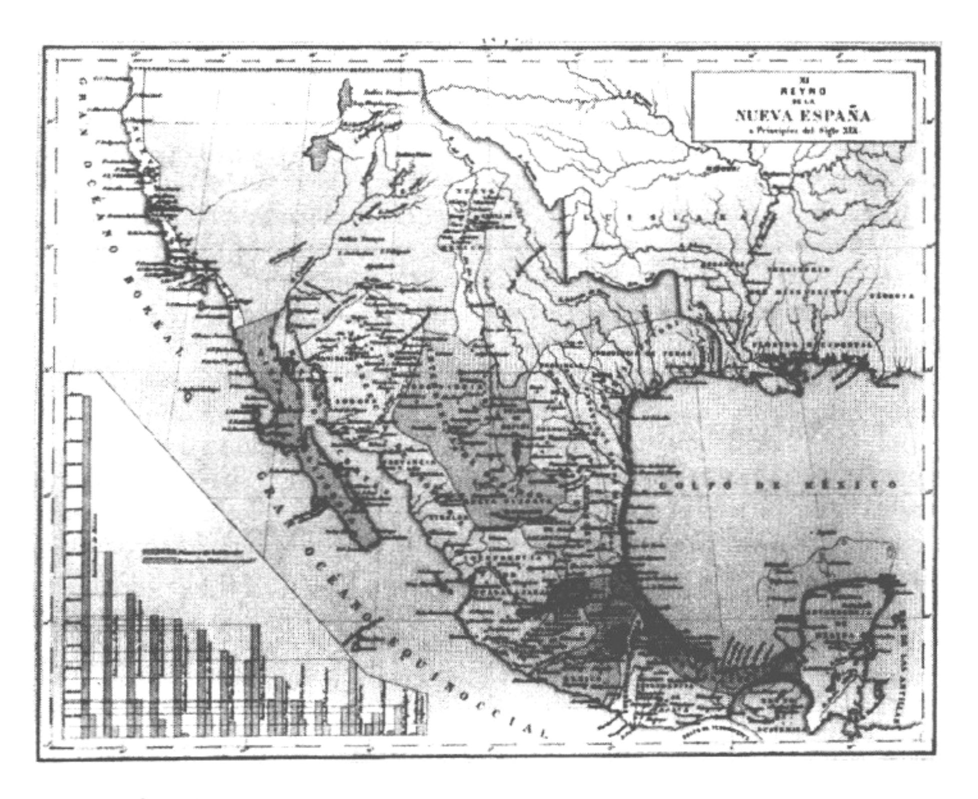
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的地方统治集团,西班牙政府使得其代理者延伸到了一些原本王权控制不到的地区和团体中。

西班牙当局希望通过引入这些改革措施,削弱总督的权力、加强地方财政并限制地方长官垄断对货物的分配。然而,监政官体系的引入事实上并没有增强王室对地方和地区利益集团的控制。相反,地方政府变成了代表地方和地区寡头利益的机构,这些寡头对其所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监政官体系并没有实现其削弱地方政治自治的目标。相反,市镇和地区集团变得更加强大了。最终,监政官体系并没有使王室实现中央集权,无论是在殖民地层面抑或帝国层面。监政官体系的失败源于一个事实,新的官员如果想完成其新的责任,就不得不与地方团体讨价还价。同样的,建立一个高效廉洁政府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因为,监政官们通常采用地方长官的老伎俩,尤其在控制货物分配方面,这使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

收入提高的形式之一是贷款,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这是中央政府在众多场合反复要求的,目的是支持其在欧洲战场的军费开支。这些贷款成为王室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和税收增长的压力,导致了新西班牙各社会经济阶层的贫困,从而削弱了殖民地信用体系,也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

283 1804 年 12 月,查理四世(Charles IV)颁布《加强皇家债券管理的条例》(*Real Orden de Consolidación de Vales Reales*),标志着最严重盘剥的出现。为了为其在欧洲作战(作为法国同盟与英国作战)的军费埋单,在其一贯的、令人绝望的敛财需求的驱使下,西班牙王室决定将一项法令扩展至其在美洲的领土上实施,要求将小教堂和慈善机构所有资产予以出售。每件商品的销售收入须向政府交纳 3%的税收。由于新西班牙一半以上的可用资本来自教会对上述两者的被贷,使得殖民地信用体系受到了这一王室法令严重威胁。教会通过抵押和其他金融工具是新西班牙主要的信贷来源。

这项措施被总督何塞·德伊图里加拉伊(José de Iturrigaray, 1803 -1808)无情地执行着,他手中的权力使其有意无意的都可让自己



监政官制度是波旁改革在行政上的反映。它由总视察官何塞·德加尔韦斯下令于1784年创立，由王室指派监政官管理，旨在加强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控制。但这次改革失败了。它反而增强了地方和地区精英们的实力。

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并非仅仅教会受到了新法令的影响。矿主、商人、农民、甚至失去了部落公共储蓄(Cajas de communidad)的印第安村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这道法令也恶化了西班牙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激起了新西班牙人对宗主国政策的不满。新西班牙曾经对王室效忠的宣誓在近三个世纪后开始崩塌。 284

随着1787年和1788年加尔韦斯和查理三世的先后死去，改革步伐开始减缓。一些改革措施被逆转，继任的总督们开始致力于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官员们希望确保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而商人们则成功地转型了经济控制机制，维护了他们已有的利益。市政议会抵制省长们的干扰，有时甚至直接告状告到王室宫廷里；地方寡头也纷纷寻求市政议会的庇护，从而增强了市镇的力量。

往好里说的话，波旁改革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不一。中央政府

获益匪浅，王室的收入增加了四倍。而新西班牙的情况则迥然不同。生产并没有增长，通货膨胀失控，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没有形成。尽管自由贸易使得财政收入有了一定增加，但最终却被军费开支抵消了。

佩德罗·佩雷斯·埃雷罗(Pedro Pérez Herrero)认为，波旁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对王室而言，其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与之相反，对新西班牙而言，其在经济上是失败的，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正如大卫·布拉丁所声称的，这些改革是政府内部的一场革命，它使得新西班牙的政治进程超出了王室殖民政权的控制。

与其他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一样，新西班牙走向独立的导火索也是1808年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爆发于帝国的最中心，并迅速燃烧到了西班牙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事实上是随后西班牙政治性质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要了解新西班牙的独立进程，必须认识到其政治变革与军事事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原因之一是，战争只是一系列的地区性事件，而政治变革则会影响整个殖民地。政治变革始于1808年拿破仑引发的帝国危机，在整个进程中，政治活动变得激烈，并产生了新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新的国家开始了独立之路。在军事方面，始于1810年的武装斗争开辟了军事化之路，即便政治独立已经实现，这条道路也要一直延续。

事实上，1808年的帝国危机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拿破仑为了惩罚支持英国的葡萄牙，在未经西班牙王室同意的前提下就悍然派遣军队穿越西班牙领土。在穿越过程中，法国军队控制了半岛的主要据点。此时，西班牙王室内部却矛盾重重，1808年3月，查理四世(Charles IV)因此决定传位给儿子斐迪南七世，拿破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将查理四世父子带到了法国，迫使他们让出王位和西印度群岛的所有权，随后他将其赐给了他的哥哥约瑟夫。

285

西班牙王室被推翻，使得整个西班牙政治组织存在的合法依据消失了。随后，半岛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人民群众作为新的政治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大批没有名头、没有身份的民众成为政治活

动的主角，而此时西班牙王室及大批的政府权贵则正向法国卑躬屈膝。人民群众完全承担了抵抗法国入侵的任务。

伊比利亚半岛人民所采用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对海外即将爆发的事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西班牙人反复使用的游击战争，成为美洲起义者抵抗殖民武装力量的典型范式。同时，在政治上，西班牙人民决定通过捍卫他们的国王、国家和信仰，把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后，普通民众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入到了新成立的机构中，主要是执政委员会。最初，执政委员会管理着很小的范围，但迅速就变成地区级别的，随后甚至试图覆盖整个西班牙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多数地方，多数人最初同样也是决心通过建立执政委员会，捍卫他们的国王、国家和信仰。这种遥相呼应的政治态度源于他们所面临的情况与西班牙本土相类似，并且他们也具有同样的情感和不满。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力是他们已经形成的或已经壮大的地方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产生于波旁改革。他们最终收获的是一系列的经验，这些经验体现了各地情况的多样性。

新西班牙的情况最好地体现了多样性，在那里，源于殖民地政治中心墨西哥城最高政治阶层的危机，破坏了社会规则。这对整个殖民地社会产生了影响。帝国危机看上去给单个利益集团提供了出头之日，也为扭转部分波旁改革的措施提供了机会。波旁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率地开发殖民地，但却使得出生在美洲的西裔日渐离心，并推动了他们提出要与宗主国地位相等的诉求。

墨西哥城市政府带头维护自治者的利益。墨西哥城市政府为支持自治者建立执政委员会的倡议，采用了西班牙反对法国时的理由，以及帝国其他地方政府反对西班牙政府时的观点。墨西哥城市政府辩称，新西班牙是卡斯蒂利亚王国通过征服而建立的帝国的一部分，但王国已经覆灭，统治权应归属于整个帝国，尤其是类似于检审庭和地方政府这样的管理机构。其理论依据是当时施行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作为限制总督辖区当局的权力颁布的，并没有被使用太长时间。

286

在反对美洲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与殖民地宗主国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的西班牙帝国利益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代言人墨西哥检审庭(Audiencia of Mexico)公开论证了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认为殖民地都应服从于西班牙政府。新兴的论战结束了克里奥尔人精英与半岛人精英因《加强皇家债券管理的条例》而形成的联盟关系,并为整个殖民地社会的动荡埋下了种子。

西班牙本土先后爆发的几次事件弱化了总督伊图里加拉伊的权力。为利用当前政治运动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他先后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市政府的倡议。会议反复讨论着类似于新西班牙在帝国内应处于什么位置这样的议题,但这一切都在 1808 年 9 月 15 日的夜里被突然粗暴地终止了,总督及新世界利益的主要支持者被帝国利益捍卫者们用武力送入了监狱。

这次政变使得对抗进一步激化。新的形势是帝国尤其是新西班牙所必须面对的,而 1808 年发生在墨西哥城的这场政变则勾勒出了新西班牙人面对新形势时所持的不同立场,也促使这种差异不断明晰并走向了对立。立场的差异缘于利益导向的不同,半岛人或欧洲人倾向于宗主国,而克里奥尔人或美洲人倾向于殖民地。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也涌上了政治舞台,无论是在言论上或是行动上。

新的政治环境为各种行动开辟了道路。西班牙本土已在实行的改革由自由派主导,辐射到西班牙帝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它引入了一些新的措施。改革进程导致了"特别总议会"(Cortes Generales y Extraordinarias)的成立,它代表了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整个西班牙帝国,随后又催生了新的政治宪章《西班牙君主国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panish Monarchy*),该宪法宣称主权属于国家而非王室,国家是颁布基本法律的唯一权力实体。

1809 年,新西班牙迎来了参与这一进程的第一个机会,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团参加了在西班牙成立的王国最高中央执政委员会(Suprema Junta Central Gubernativa del Reino)。市政府在选举过程中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这使其能够重新获得它们在 1808 年事件中业已失去的权力。在宗主国最高等级机构中的美洲代表支持土生白人关

287

于总督辖区是西班牙君主国一部分的观点，他们再一次为利益集团谋求自治开辟了道路，这条道路曾一度因政变而关闭。1810 年，随着"特别总议会"的召开，第二个机会来到了。选举再次举行，市政府同样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

政治行动的机会也不仅出现在体制之内。在殖民体制捍卫者的示范下，暴力成为不满者可行的选择之一。1808 年政变后，几乎所有的反对殖民体制的运动都摆脱了秘密状态或地下状态。一批匿名的小册子体现了民众的普遍不安。进一步讲，地下组织密谋推翻殖民政权。这些组织大部分出现在中心城市，其成员身份各不相同，甚至包括大批印第安人。因为许多地下活动失败了，许多地下团体以社会集会为掩护再次出现，或者加入到其他相对隐匿的社会团体中。在这种情势下，最初的行动是由城市团体发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米却肯州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只不过其在 1809 年就暴露了。

殖民当局对此反应很敏捷。可以理解，对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恐惧使得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殖民主义的捍卫者或自治的倡议者变成了两个极端，他们的立场也日趋激进。

1810 年 9 月 16 日，政变之后整整两年，一个分布在克雷塔罗和巴希奥(Bajio)地区其他地方的城市地下组织遭到殖民当局镇压，但是它却为那场著名的运动开启了大门。尽管没有明确的计划，不能为新西班牙人提供可行的、可选择的行动，但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神父(1752－1811)领导的暴动还是迅速引起了很多团体，其中大部分是底层社会的团体的响应。

迅速的响应引起了起义组织内部的重要矛盾。领导人最初认为，他们是在与腐败的政府战斗，捍卫王国、国王和信仰，为政治行动及参加决策开拓空间。这些都是深植于克里奥尔骨子里的传统的自治诉求。其中一点是建立一个替代政府，即执政委员会，自 1808 年后心存不满的新西班牙人就一直渴望实现这一点。除了起义领导人的诉求外，包括农民、工人及印第安人等其他社会阶层也有自己的要求，他们是起义的主要力量。他们提出的要求的性质不同，如土地所有权和工

288 作条件，相较于将要影响整个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危机，他们更关注农业危机和人口增长，当时的人口增长并没有相应的产出增长相呼应。起义力量还包括了殖民地社会结构下的边缘人群，以及各种趁乱钻空子的人。



伊达尔戈神父领导的这次起义发动了广大的农民(campesinos)和工人，这些人把反叛看作削减他们因丧失土地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遭受的痛苦的途径。这次从社会底部发起的民众起义并没有动员新西班牙的克里奥尔人（出生在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后裔）。

起义蔓延到了殖民地的许多地区，但各地区的起义都是孤立的，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起义只是为了解决地方和地区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殖民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只是几场起义的蔓延。尽管有一些领导人试图联合起义力量，增强凝聚力，像伊格纳西奥·拉永(Ignacio Rayon, 1773－1832)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 1765－1815)，但最终都局限在了地区的视野。而起义队伍中的处于第二等级的领导人极少将起义作为一场联合的整体运

动来看待。地方利益集团是整合各地区起义力量的最大障碍。

尽管首要的起义领导人做出了努力，但起义还是造成了全面的暴力、混乱及破坏，尤其是最初阶段。这使得部分原本不满于殖民体制的人（尤其是那些社会和经济地位最高的人）疏离了起义活动，对西班牙当局而言是有利的。

289

另一方面，殖民政权对起义运动的回应事实上也是非常坚决的。其迅速组织了军队进行镇压。当局努力消除任何不满迹象，因为他们认为（确实不无道理），不满情绪会逐渐升级，更糟糕的是，殖民当局内部的一些不满者也会加入到起义军中。殖民当局镇压起义运动的主要力量是组织有序的正规军，这支军队配备了 18 世纪下半叶波旁王朝购置的专业化武器，后来还包括了西班牙派遣的远征军。尽管起义军具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军官，但整体上组织性较差，武器配置不齐全。此外，由于一些地区起义力量的威胁很大，殖民当局及其支持者们，特别是皇家部队最杰出的军官费利克斯·玛丽亚·卡列哈·德尔雷伊（Félix María Calleja del Rey）准将，认识到了组织地方武装力量镇压起义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恢复了波旁王朝之前的地方民兵组织。组织有序的皇家部队在几次战役中击溃了散漫的起义军，卡尔德隆桥（Puente de Calderon）战役尤其具有决定性，迫使起义军北上。最终在起义开始之后 6 个月，即 1811 年 3 月 21 日，他们俘获了起义军的领导人。之后不久所有人都被处死，伊达尔戈神父还被剥夺了神职，并被逐出了教会。

这是一场血腥的、破坏性的战争。由于枪支短缺，双方不得不使用长矛、刀、弹弓战斗，有时甚至直接肉搏。战争还耗费了巨大开支，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并使大批耕地被夷为平地，大量庄园和村庄被烧毁，加之之前西班牙疯狂的攫取，当地经济持续下滑。商业基础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人们必须重新建设并且采用新的贸易手段。

似乎这一切还不够，战争还涉及宗教信仰。为配合殖民当局，教会高层将起义者们开除出了教会并对其施以诅咒，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另一方面，当一些低级神职人员开始支持起义运动之后，这些措施的潜

在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对许多起义的领导人而言,影响起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所以,为了努力获得更好的结果,他们决定将起义变得更有组织性、完整性。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尤其是拉永和莫雷洛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吸引了来自殖民政权控制区内反对者们的支持。实质性的支持包括一到两台印刷机,这用于帮助起义者宣传他们的诉求和主张,反驳政府的指控,因为此前媒体一向是由政府控制的。大量宣扬起义的报纸开始出现,尽管都很短命。一些专业人士,包括许多像卡洛斯·玛丽亚·德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ía de Bustamante)和安德烈斯·金塔纳·罗(Andrés Quintana Roo)这样的律师,也加入到了起义中,参与其政治组织。他们对起义的拥护至关重要,这使得起义看上去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军事运动,从而改变了起义的公共形象。

290

在第一批起义领导人被大肆抓捕和处决后不久,拉永决定建立管理机构,协调起义运动的军事活动及其他事务。他于 1811 年 4 月向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贝内加斯(Francisco Xavier Venegas)传达了这一意图,并于次年 8 月付诸实现。

尽管随后产生的美洲国家最高执政委员会(*Suprema Junta Nacional Americana*)或曰锡塔夸罗(Zitacuaro)委员会被看作是国家的代表,但并没有正式脱离西班牙帝国,并且仍然承认被羁押在法国的国王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1808 — 1833)。军政府本应由五名成员组成,由地方代表根据群众意见选举产生,但时间紧迫,最终只选举产生了三名成员,分别是拉永、何塞·西斯托·贝尔杜斯科(Jóse Sixto Berdusco) 和何塞·玛丽亚·利塞亚加(Jóse María Liceaga)。值得一提的是,只有 13 名起义军军官参加了选举。然而,为了选举,起义者们与各个地区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包括一些当时被殖民当局控制的地区。

执政委员会并没有取得其支持者及其本身所预计和希望的成就。其失败并非来自殖民当局的破坏,而是缘于自身内部成员的争端。因为起义军多线作战,其领导人难以聚首。意见上的分歧由于距离及缺乏沟通而加剧,并最终变成了公开对抗。起义力量失去了权力核心,并

因此走向了分裂，分成了四大区域，由四位总司令分别指挥，他们的意见在多数时间内也存在分歧。第四区代表兼总司令莫雷洛斯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起义领导人，他试图让军政府代表和将军们和解，但并没有实现。在努力失败之后，他决定用更具代表性的议会取代军政府，议会成员由起义军控制的各地区居民选举产生。他希望议会能够成为一个足够强力的实体，以便消除起义领导者之间的分歧。

因此，莫雷洛斯在包围了阿卡普尔科的要塞、新西班牙在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港口圣迭戈(San Diego)后，他在其控制的地区展开了选举进程，包括特克潘(Tecpan，现在的格雷罗州)、韦拉克鲁斯、普埃布拉、墨西哥以及米却肯。在瓦哈卡，由当地选举产生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

291



安德烈斯·金塔纳·罗是领导着反抗殖民地当局的美洲国家最高执政委员会的律师群体中的一员。

军政府代表成为新议会的第一位成员。一些选举过程是按照1812年西班牙宪法中自由主义者所建立的模式进行的。尽管两部宪法存在差异,并且新的选举进程也非一帆风顺,但却造就了广泛的群众参与。

美洲国家最高议会(*Supremo Congreso* Nacional Americano)于1813年9月成立于格雷罗的奇尔潘辛戈(Chilpancingo)。它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替代政府。议会由来自几个省的代表组成,这几个省覆盖了辽阔的领土,议会集中了所有的政府权力,并负责在其控制的领土上统一运用。议会的其中一项职能是批准政府下属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的活动,这些机构是由来自各地区的个人和团体选举产生的。莫雷洛斯再次被选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还被任命为总司令,负责协调指挥起义军的军事行动。1813年11月6日,议会最终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

随后,为了给新国家奠定基础,在经过与殖民地各阶层群众协商后,议会于次年10月通过了一部宪法。但是,由议会取代执政委员会不仅不能消除起义领导人间的分歧,甚至加大了他们对抗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律师和军人之间。

292

革命行政机构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新政府并没有成功获得来自国外的实质性支持。东北部是个例外,在那里,来自墨西哥城的克里奥尔起义领袖伯纳多·古铁雷斯·德拉腊(Bernardo Gutierrez de Lara)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一支主要由英裔美洲人(Anglo-Americans,是当时对美国人的统称)组成的远征军。这次远征的后果之一是其在圣安东尼奥-德贝哈尔建立了一个执政委员会,并于1813年4月通过了一部宣言,声称得克萨斯地区独立,这部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非常相似。

起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由于西班牙本土出现了新的机构和新的政治秩序,殖民体制内部的政治行动也有了新的选择。新的法律秩序是至为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允许那些一度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众参与到总督辖区的政治生活中来,而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很大的。新的政治基础的确立减弱了起义运动的呼声,因为其拉拢了部分对殖民政权心

存不满的人。

1812年9月，“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加的斯宪法”在新西班牙的公布，不仅使那些在独立运动中声名鹊起的人获得了前途，也满足了他们追求自由的目标。这一新的追求是通过三个层面达到的：地方、省及帝国。此外，西班牙议会允许了出版自由，推动了对殖民体制的公开批评。

在地方层面上，依照宪法建立市政议会的过程推动了自治政治实体的发展和地方团体实力的增强。根据宪法，超过1 000人的市镇即可通过长期复杂的选举过程建立市政议会，期间，大批人口应参与第一阶段的选举。

尽管宪法只赋予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公民权，不包括非洲裔及其他种族，但事实上新西班牙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仍具有广泛性和多种族性，原因之一是当时已经很难分辨哪些是非洲后裔哪些不是了。1812年11月29日，新墨西哥城市政府的选举过程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大批中下层人群参与了这一选举，包括首都两个印第安社区的居民以及其他多个种族。不仅如此，所有参选者都是美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反殖民统治的斗士，也有一些是暗地支持起义运动的。这些情况使大量首都民众兴奋异常，举行了长达两天的庆祝活动。但是尽管很传奇，却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总督勒令推迟选举进程，并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墨西哥城的选举于1813年4月恢复，是在费利克斯·玛丽亚·卡列哈接替贝内加斯成为新总督之后。尽管墨西哥城的选举非常重要，但其并没有妨碍新西班牙其他城市、乡镇、村落的选举活动的进程。

293

省或地区的利益可在省议会中表达出来。这一机构是由新西班牙驻加的斯议会的代表们促成的，特别是米格尔·拉莫斯·阿里斯佩(Miguel Ramos Arizpe)和何塞·米格尔·古里迪-阿尔科塞尔(Jóse Miguel Guridi y Alcocer)。为建立这类新的机构，新西班牙被分成了六个地区。这类会议并非时时举行的，甚至在一些地区，尽管省议会已经成立但却并没有召开，因为第一部宪法持续时间(1812—1814)非常

短促。然而，成立这类机构的选举过程，已使广大中下阶层民众在其第一阶段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在帝国层面上，同样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在第一阶段，新西班牙驻西班牙议会的代表的选举与省议会代表的选举是同步进行的，其同样体现了广泛的参与度。

由于选举活动充分体现了人们对殖民政权的普遍不满，殖民当局开始试图颠覆选举结果。除了中止选举进程，那些选举的支持者、知名的独立人士以及曾表达对君主制不满的人也纷纷遭到迫害。因为不少人利用了由起义运动和宪政所导致的政治选择，针对他们的惩罚方案出台了。当局的做法使得其体系内部和外部的两股反对力量结合到了一起。

起义者发现整合他们势力的途径之一是那些正悄然出现的秘密政治组织，这也表明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正在酝酿之中。组织秘密社会团体对新西班牙人而言并非一项轻松的工作。一方面，他们没有类似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好保密工作。他们在一些活动中的粗枝大叶，使他们很快暴露给了当局，比如在墨西哥城，1811 年就有两个秘密组织被发现。第一个是在当年 4 月被告发，该组织试图建立执政委员会，坚持自治传统。第二个是在 8 月被发现，他们支持拉永和锡塔夸罗军政府。

著名的秘密社会组织“瓜达卢佩人”(Guadalupes)是由几名首都知名人士为核心所组成的，其中多数核心成员是律师。“瓜达卢佩人”明确表达了那些不满于殖民政权的民众(包括一些印第安群体)的利益。它设立的初衷是支持起义领导者通过建立替代政府来组织他们的政治运动。他们对起义军的支持很有效用，因为“瓜达卢佩人”成功地为雷扬提供了资金、武器、人力和情报，后来也为莫雷洛斯和马里亚诺·马塔莫罗斯(Mariano Matamoros)提供帮助。同时“瓜达卢佩人”也在体制内为自身利益奋斗，并参加了墨西哥城举行的选举且获得了巨大成功。该组织直到 1814 年仍在活动，但由于他们与战败的起义领导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使得殖民政府当局有了镇压他们的借口。

1812 年，在韦拉克鲁斯的哈拉帕(Jalapa)也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

294

这是“理性骑士团”(*Sociedad de Caballeros Racionales*)的一个分支，该组织是由几名美洲的驻西班牙议会的代表于 1811 年在加的斯建立的。哈拉帕的这个组织同“瓜达卢佩人”一样，为起义军提供资金、人力、武器和情报。他们还与纳奥林戈(Naolingo)镇建立的临时执政委员会(*Junta Provisional Gubernativa*)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瓜达卢佩人”不同的是，该秘密组织持续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该组织暴露后，其很多成员被捕入狱，另一部分逃离了城市加入了起义军的临时执政委员会。

不幸的是，起义者及不满者们的利益无法真正地达成一致。这削弱了他们的势头，却增强了殖民政权的。另一方面，在最高议会中，律师与军官之间、文人与军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使得前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军队失去了对武装斗争的指挥与控制，这导致了几次严重的失败以及最终起义运动的崩溃。

因遵循了最高议会发布的军事命令，拉永和莫雷洛斯遭遇了惨败。莫雷洛斯的失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失去了两名才能突出的副手马里亚诺·马塔莫罗斯和埃梅内希尔多·加莱阿纳(Hermenegildo Galeana)。在 1814 年 2 月的特拉科特佩克战役中，他的部队伤亡惨重，使得殖民当局找出了他的支持者及相互间的联系，并将这些支持者逮捕。随后，瓜达卢佩人的一些成员被起诉。在一系列的失败后，莫雷洛斯被最高议会剥夺了指挥权，从一名重要部队的指挥官变成了立法机构的一名辅助人员。

在 1814 年，起义军几乎连战连败。也是在这一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返回了国内，立宪制度被废除，旧体制被恢复。这些事件对新西班牙产生了重大影响，殖民当局摆脱了议会中自由派的束缚，可以肆无忌惮地对独立人士及反对者采取行动了。

1815 年底，莫雷洛斯被拘捕并随后被处死，这标志着有组织的起义运动开始走向结束，尤其是当年 12 月起义军司令曼努埃尔·米耶尔-特兰(Manuel Mier y Terán)在普埃布拉的特瓦坎宣布解散最高议会后。起义运动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并最终走向了消亡。

295

克里斯顿·阿切尔(Christon I. Archer)认为,起义组织的解散并不能说明起义运动的结束,甚至也不能说明其减弱。阿切尔认为,解散从未完全联合的运动意味着军事行动的增加,这将给殖民政权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当局不得不随着其增长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从1815年起,失去了协调及组织核心的起义,从一场几乎消失的政治运动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军事运动。

尽管经历分散与解体,但组织起义的努力并没有被放弃。最高议会一解散,西部诸省执政委员会(Junta Gubernativa de las Provincias de Occidente)和塔雷坦附属委员会(Junta Subalterna de Taretan)就出现了。不久,又出现了豪希利亚委员会(Junta of Jaujilla),其一直延续到了1818年。虽然豪希利亚委员会不被拉永所承认,但它仍然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组织起义军。此外,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其他一些起义领导人的承认,如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1783－1831)。在各种军事行动中,哈维尔·米纳(Xavier Mina,1789－1817)要求豪希利亚委员会给予帮助并得到了回应,但豪希利亚委员会最终的结局与其他执政委员会是一样的。在保王派的追捕及袭击下,他们结束了所有行动,选择了投降,其成员多被送入监狱。在此之后,格雷罗在拉斯巴尔萨斯(Las Balsas)又成立了一个执政委员会,但持续时间很短。

起义运动凝聚力的缺乏在1817年哈维尔·米纳远征新西班牙时清楚地体现出来,尽管这次远征一度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恐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由米纳这样杰出的军官指挥的职业外国军队以及像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耶尔(Servando Teresa de Mier,1765－1827)这样著名的反殖民斗士的出现,本应极大地推动起义运动的发展,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米纳的远征不仅没有得到起义者的支持,他还发现了另一个麻烦,本应辅佐他的高层军官们并不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因为他的出现似乎对这些军官的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

为了处理地区性的、分散的起义运动,殖民当局一方面派军队进行镇压,同时也扩大了王室大赦的覆盖范围,借此说服起义者们放下武器。这样一来,起义运动不仅失去了其军事力量,也在政治层面上失去

了动力。结果,到1820年,几乎整个新西班牙都被平靖了。

新西班牙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因此其解放运动的终点与其开始时一样,都与西班牙时局的变化同步前行。1820年西班牙立宪派在与专制派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重新恢复了立宪制度。当时,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一批地下组织,它们与立宪派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组织在新西班牙也迅速地涌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瓜达卢佩人和哈拉帕的类似团体这样的地下组织外,新西班牙的其他此类组织与起义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事实,尽管在来自西班牙的远征军军官的支持下,共济会1813年就开始在像墨西哥城这样的城市中心发展组织,并在1818年左右扩展到了坎佩切和梅里达(Merida)。在首都,地下社会团体与1820年立宪制度的恢复有很大关系,与1821年总督胡安·鲁伊斯·德阿波达卡(Juan Ruiz de Apodaca,1816—1821)被推翻也有很大关系。尤卡坦半岛的地下团体既成功地吸收了"圣胡安社"以前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者成员,也纳入其从前的对手,被称作"顽固派"(*rutineros*)的专制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同样推动了立宪制度的恢复,并推翻了尤卡坦半岛的省长和都督。

296

伴随着1820年新西班牙立宪制度的恢复,大量的选举也开始了,这使得新西班牙人得以发展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随着立宪市政府和省议会的成立,地方和地区势力得到了加强。然而,立宪制度的恢复使得多数新西班牙人确信,为了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改变,就必须要从西班牙的政治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独立主义者及各种各样的殖民政权的反对者开始重新走向前台。像1810年的军事起义那样,一场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城市运动,揭开了新一轮起义的序幕。但需要注意的是,1821年的独立运动与1810年的起义运动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新的起义运动是由杰出军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上校领导的前皇家部队发起的。伊图尔维德被总督阿波达卡派往南方去镇压依然活跃在那里的起义武装力量,但他却私自改变了决定,与那里的起义领导人尤其是比森特·格雷罗达成了协议,并宣布独立。所以新的起义力量是正规军人,有着良好纪律、武装和组织。

297



由于其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成为了这次起义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的队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曾多次在战场上击败君主派的军队。他还一手促成了反对派的政府机构——美洲国家最高议会(Supremo Congreso Nacional Americano)的建立。1815年，他在保卫议会的战斗中被捕，后被处死。



安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是出生在墨西哥州的克里奥尔人，在其事业的早期阶段，他迁往圣路易斯波托西，并在那里为赢得独立而与保王派的军队战斗。布斯塔曼特支持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这个计划最终把墨西哥引向了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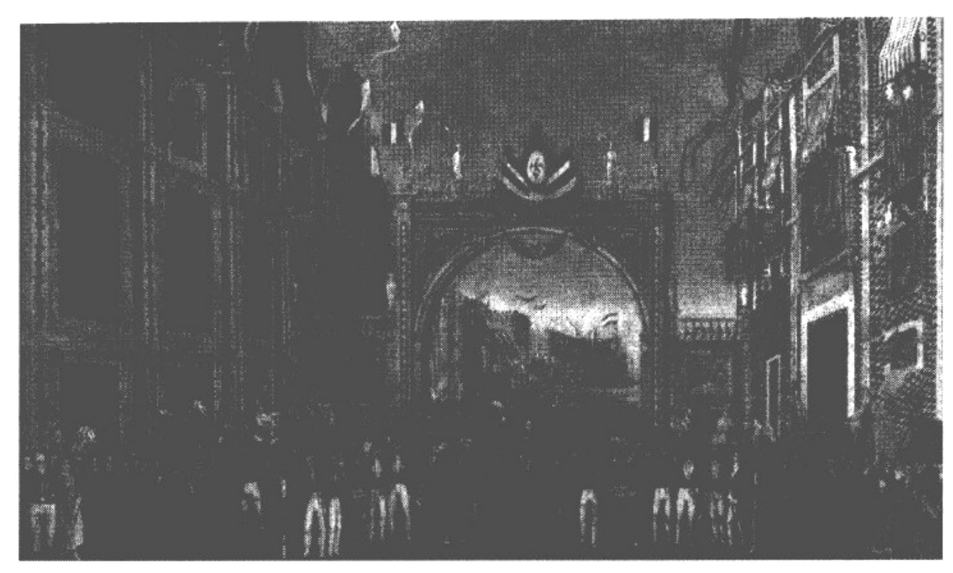
其次，只有少量战役发生。大批的乡镇和城市表示支持伊图尔维德于1821年2月24日发布的伊瓜拉计划(Plan of Iguala)。因此，造成的流血和破坏很小。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起义者都加入到了伊图尔维德的行动中。这次起义被称为“三大保证”(Trigarante)，因为它提出了三项主张：信仰、独立和联合，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有保皇派的官员加入了起义队伍中。

伊图尔维德的起义能够达成一致，是因为其有一个简单而具体的目标：脱离西班牙独立。这一产生于伊瓜拉计划的共同目标由《科尔多瓦条约》(Treaty of Cordoba)继续坚持着，人们之所以在目标上达成共识，是因为所有人都对长达十一年的战争感到厌倦了。

298 伊瓜拉计划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以斐迪南七世或波旁王朝的其他王室成员作为墨西哥国王。这在开始是为了呼吁所有新西班牙人加入到一个联邦国家中，从而为共同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呼吁只针对了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没有包括印第安人、黑人及其他种族人群。此外，伊瓜拉计划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而并没有改组教会、政府结构、官僚机构以及司法监管等方面。

伊瓜拉计划有很多有趣的主张，其中一条是，在墨西哥议会起草墨西哥帝国宪法期间建立执政委员会管理国家。1808年以来，自治的目标打动了全社会各阶层的民众，而这一计划再次表明人们对自治的渴望就是建立执政委员会。1821年7月30日，伊图尔维德与奥多诺胡(O'Donoju)签署了《科尔多瓦条约》，该协议再次重申了伊瓜拉计划的主张。包括建立由新西班牙“最杰出和知名人士”组成的“最高临时执政委员会”(*Suprema Junta Provisional Gubernativa*)。协议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权力行使机构，而立法权则归属于执政委员会直到墨西哥议会召开。

299 在伊图尔维德和“三大保证”军胜利进入墨西哥城之后一天，即1821年9月28日，墨西哥帝国独立宣言被公布。那些拥护独立宣言的人与宣言中的政治观点同样值得关注，包括了新西班牙精英中最杰出的人士，像老资格的自治拥护者以及著名的保王派官员，但并没有以前的起义领导人。许多“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成为了“临时执政委员会”的成员。



1821年9月27日，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率领他的“三大保证”军进入墨西哥城，为墨西哥赢得了独立。他们是以和平方式进城的，城中居民对他们夹道欢迎。伊图尔维德的独立计划得到了新西班牙大多数人的支持。

300



比森特·格雷罗是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英雄，他与伊图尔维德齐心协力在1821年实现了墨西哥脱离西班牙而独立。1828年，他当选为墨西哥的第二任总统，并任职到1830年。但这一年他的政府被推翻，不久他本人也被对手击毙。

为了使新西班牙人支持其独立运动，伊图尔维德所采取的手段是说服而非强迫。这样一来，除了大部分皇家军队以及相当一部分神职人员与贵族外，他整合了包括自治分子、反对派甚至起义者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毕竟，伊瓜拉计划能使社会各阶层的每个人都得到一定的实惠，包括那些希望波旁王室成员登上墨西哥王座的人。短短几个月内便控制了首都，以及建立了一个人们极度渴望出现的执政委员会，似乎建立共识是很容易的，但这被证明了是误入歧途。这一共识是为了实现独立这个唯一目的而达成的，但一旦目标实现了，围绕如何建立新国家的分歧就会出现。这给墨西哥作为一个新国家未来的发展之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十章　一个新国家的形成

克里斯顿·阿切尔(Christon I. Archer)

301　1821年9月27日,墨西哥解放者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根据伊瓜拉计划胜利进入墨西哥城。很快,那些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普雷西迪奥监狱(prisidio prison)里的囚犯——罪犯、逃兵或者是对前政权持怀疑态度的人,恢复了自由身,每人还得到了比索的现金帮助他们开启新生活。这些人从监狱中走出,却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

10年的血腥战争已经使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变得支离破碎。它分为两个敌对派系——爱国者和保王党(royalist)两派。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加丘平人,gachupines)、美洲出生的克里奥尔人、复杂的混血群体以及当地土著人之间的旧恨也被进一步增强。许多地区的本地村民对此很是不满和愤怒,很多人还通过政治运动来表达情绪。战争教会了社会各阶层的人通过动员和政治活动来进行利益诉求,甚至通过暴力手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土地持有方面的争端之类的问题上,他们更喜欢诉诸暴力来解决,并希望通过此手段获得有关税收争端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些农民起义者和游击队战士中的许多人不懂西班牙语,但通过顽强的拼搏往往能为不同的派别和地区获得成功。即便有人为躲避战争和残酷镇压而逃进崎岖山区或假装成中立的非战斗人员,这些无休止的游击战、猖獗的盗匪活动和普遍的暴力行为还是深深地改变了村

民们的生活。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群体起初在米格尔·伊达尔戈神父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手下开展斗争，他们的立场却变得更加强硬，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使得游击队和土匪团伙在墨西哥无处不在。有的游击队甚至兼职做土匪，袭击商人和精英人士拥有的庄园，趁着战时的无政府状态大肆侵占政府和大庄园主控制不到的农地和牧场，势力大为壮大。在城市，由流浪者、赌徒和小偷组成的大量流动人口游荡在公园和公共市场里，做着斗鸡、斗牛等诸如此类的流行的娱乐活动，在夜里，这些人对于守法的城市公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然而，虽然叛乱、战争、专制、任意的军事任务、重税、强加的事务安排和狭隘的父权统治造成的混乱局势让土著人口和混血种人尊严全无，但也催生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要求获得权利的意识，这些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将以新的方式表达出来。

302

虽然10年的战争对墨西哥各地区的影响并不平衡，但整个长大的一代都质疑旧的制度，并要学着在无休止的叛乱、反叛乱和政治混乱下生存。无论保王派或爱国者、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家庭，不论贫富，每个人都不得不处理诸如被禁止买卖和通讯、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等事情，还要面对专制的征兵要求去为五花八门的军事派系卖命，并承受争斗双方征收的沉重的赋税，以此来“支持”他们进行战争。

墨西哥城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军事独裁统治政权是压抑和反动的。该政权得到军方高级官员，大部分城市精英，部分旧式的地主阶级、行政文书人员和商人阶层的支持，其领导人所持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立场，而支撑这种立场的基本观念在以后还会翻出来得到利用。但这种从墨西哥城以及普埃布拉、巴利亚多利德(今天的莫雷利亚)、克雷塔罗、圣路易斯波托西和瓜达拉哈拉等地区首府施行的政治军事独裁在帝国政府实施了1812年西班牙自由主义宪法后变得黯然失色。在许多边远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地势崎岖，人口稀疏，热带疾病和地方病泛滥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中央政权始终没能对其加以有效的控制。

即使提前获得训练的战斗人员，战争期间的混乱也使他们中的许

多人失去了对自由的理论原则和改革治理的热情。“打倒坏政府和西班牙人”、“宗教万岁”、“瓜达卢佩圣母万岁”,“美洲万岁”和“国王万岁”这些口号喊了这么多年,早已经失去了影响。保王党人有时会怀疑:“好的事业”(la causa buena)真的比叛乱分子推动的“坏的事业”(la causa mala)更好吗?有时,两派之间似乎差别不大:叛乱者和盗匪被保王党军事分遣队跟踪捕获,如果他们同意改变立场可以获得赦免,但一旦军队撤走,没人监督,他们往往推翻承诺,再一次反叛。墨西哥的村民在经历了这些不合理的规范条例和野蛮的反叛乱镇压活动后往往加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1821 年,保王党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权的迅速瓦解开启了一个混沌、混乱、矛盾的未来。



1824 年的墨西哥共和国。这个第一共和国包括 19 个州,外加 4 块属地。

303 在许多方面,伊图尔维德的胜利是全民战争疲劳的产物,而不是因为民众明确选择了某一计划或新的方向。伊瓜拉计划有三大保证:独立、信仰和联合统一,它其实是提供了让国家恢复的时间或临时的妥协

方案，而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详细计划。1820 年，自由主义者在西班牙发动叛乱，宣布在帝国全境恢复实施 1812 年宪法，这为改革殖民地统治形式提供了范本，为代替高度中央集权的波旁专制统治政权对新西班牙的统治提供了一种选择。1820 和 1821 年间在整个墨西哥，这部宪法被逐条宣读给广大的平民大众。细心的听众立即领悟到自由主义宪法的意思，反对那些对于镇压叛乱的保王党至关重要的军事税收，而且自由主义宪法强调将把大量的权力从中心城市转向城镇和村庄。城市、城镇和村庄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宪法的实施，尽管这种欢迎是精心编排的，不是自发的。通常这样的庆祝活动包括在主要地区或城市的教堂举行庄严的弥撒、用鲜花和横幅把街道装饰一新、夜间进行烟花和管弦乐表演、火炮齐射、数天的节日狂欢，和当地监狱大赦囚犯。显然，组织者和民众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04

但在萨卡特卡斯市，精心安排的欢庆活动很快失去控制，助推了越来越高的被授予权力的期望。当城市当局暂停民众集会时，群众自发地在城外举行非正式集会。市领导和精英们担心，这种集会将煽动暴力活动，还可能引发民众起义，例如萨卡特卡斯多省联合营（Zacatecas Mixed Provincial Battalion，在当地被称为“Pelones”，意为乏味的人或光头）就曾与市民一道参与颠覆政权的谈判，公然要求独立。在其他地方，许多城镇的律师、教士、商人以及低级别的克里奥尔人官僚加入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和讨论小组。除了关注自治或独立，他们支持区域政治权力的成长，反对旧的中央政权，高呼“打倒万恶的西班牙人”等煽动性的口号来强调他们的主张。

通过给予绝对的行动自由，新宪法废除了军事化政府设立的许多管制。它终结了通过办理通行证和设置关卡等措施对来限制旅行的政策，但这种政策曾对战争期间的社会秩序维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几十年间，平民旅行者和商队都带着刀、枪等武器来防止盗匪的骚扰。没有了证件来确定个人身份，当局就不能知道碰到的是诚实的商人、游客，还是叛乱分子、土匪、逃犯、军队的逃兵和一些“不良”分子：自封的警察和司法官员，这些人互相用革命中所用的“市民”（ciudadano）称呼

对方,鄙视所有官方人员的法律权威。

在新颁布的墨西哥管理方针里,伊图尔维德超越了西班牙宪法中所提出的模型架构。在伊瓜拉计划中,他建议让国王斐迪南七世或其他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成员以君主立宪制来统治一个自治的墨西哥政权,这种本土自治或(说直白点)独立的方式更能让前保王党人接受。此外,新政府将保护天主教,这是每个人都乐于见到的。每个人,不论种族,根据自身的能力在理论上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很多有欧洲西班牙血统的人惧怕大众的激进行动,急匆匆地加入到伊图尔维德的阵营。

伊图尔维德坚持认为,伊瓜拉计划是为这个饱受外来控制和内部不和威胁的国家的公众福祉着想的。他利用了由来已久的仇外情绪和认为英格兰新教徒和法国无神论革命者会入侵的恐慌。这些恐惧虽然很虚幻,但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团结旗号和周日乡村牧师布道的话题。精英人士更热衷于伊图尔维德做出的政府将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的声明。伊瓜拉计划中的保证被迅速传播,直至最小的城镇,村庄里的居民都在讨论这些条款,好像这些已经被所有人所接受似的。即使是以嗜血无情著称的顽固叛乱分子"印第安人"(El Indio)佩德罗·阿森西奥(Pedro Ascencio),据传闻也已经被伊图尔维德的倡议所动摇,开始停止发动袭击并退还从其对手那里抢得的物资和财产。

305

伊图尔维德和伊瓜拉计划的广受欢迎暂时模糊了国内的各种分歧,这些分歧此后将使新的国家几乎无法得到控制。在整个 1821 年间,许多西班牙本土和美洲出生的中高层人士纷纷倒戈投向伊图尔维德。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其实并没有改变,但作为执着追求等级、身份和权力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迅速就接受了从殖民地到帝国,然后再到共和国的过渡。1821 年,一个始终忠于保王党的西班牙本土军官拉蒙·多明格斯(Ramón Dominguez)沮丧地发现,"邪恶的(伊瓜拉计划)在让不同地方驻军指挥官间达成妥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军官和许多文职领导人接受了伊图尔维德的警告,认为他的做法是唯一可以避免新西班牙各省发生灾难性的社会暴力冲突的。虽然根据反西班牙法律规定,一些前王室高级军官后来被驱逐出墨西哥,其实还有其他

很多曾经支持西班牙事业的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以很大精力实现了对墨西哥及其地区的过渡统治。

1812 年的宪法和伊瓜拉计划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力量，它帮助了战后塑造一个复杂的新的公民文化。经历了受战时条件和军事化影响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年代之后，许多地区和市镇的人民能够分享更大的权力。军队坚定地支持伊图尔维德，但许多城镇举行了选举并形成了立宪的镇市议会。然后，他们拒绝支付税款或听从中央政府的任何指示，它们的代表不断地引用西班牙宪法条款来支持其立场，认为墨西哥城、各省当局，以及任何其他级别的政府必须去其他地方寻找资金。数百个市政府解散了地方防御部队，取消了为保王党民兵提供资金的军事支持税。

麦阿卡特兰(Miacatlán)等地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小型社区的议会抱怨泛滥的军事税种对于普通百姓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有的人已经被可恶的税收折腾得身无分文，被搜刮得一无所有。有的人因为交不起税而不得不忍受残酷的殴打和折磨，有的甚至因此自杀。在普埃布拉举行了一次讨论重新建立民兵组织的市镇议会特别会议(cabildo extraordinario)，但议题很快转向谴责在墨西哥城的中央政府批准在韦拉克鲁斯自由进口外国制成品政策上来，因为该政策破坏了普埃布拉的行业体系，侵蚀了其税基。在 1821 年 5 月，省驻军司令西里亚科·德拉诺(Ciriaco de Llano)准将亲自到市政府和地方各大庄园，寻求招募民兵部队和征税的政策支持，以打击伊图尔维德的叛乱。但地方当局依据宪法条款不予以执行。拉诺不是唯一一个在宪法上碰钉子的人。在墨西哥城郊外的圣安纳村，副代表约瑟夫·玛丽亚·托雷斯(Joseph María Torres)抱怨说，镇上的人们认为，宪法就是“明文授权他们特权，使他们不必听从任何权威”。托雷斯手下没有警察或士兵维持秩序。特别是在喜庆日子，酗酒斗殴开始时，这区域附近的村庄就会变得失去控制，无法治理。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校长被印第安学生羞辱，权威尽失，小商小贩在周末弥撒之前公开兜售龙舌兰酒。 306

西班牙宪法把政治权力下放，甚至直至土著城镇，大部分精英开始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在这个国家出现。这些反对权力下放的人后

来同样反对 1824 年宪法,并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支持中央集权与保守主义。在农村社区,村民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来抵制大地主、外来租户和一切为国家机器服务的人员。从 19 世纪 20 年代直至 30 年代初,广泛的男性普选制使村民们不仅成功获得了许多社区的控制权,而且还可以推迟、忽视或重新解读由其他各级政府通过的法律。也难怪各地区重镇、各州首府和墨西哥城中沮丧的精英分子们会开始摒弃激进的联邦制,并视中央集权制为国家进步的关键。

在新西班牙的最后岁月里,保王党军队解体,官兵纷纷前往参加伊图尔维德的军队,保王党的中央政权彻底瓦解。总督胡安·鲁伊斯·德阿波达卡(Juan Ruiz de Apodaca)在其部下一个个陆陆续续投向伊图尔维德的事件中一遍遍遭受着羞辱,而此前对他忠心耿耿的皇家军队军官开始另奔前程。早些时候,总督几乎不能相信,他自己一手提拔的指挥官伊图尔维德,已经在叛乱之乡(伊瓜拉)附近的特拉科特佩克与叛军头目比森特·格雷罗同流合污,两人还为了筹集资金,一起抢劫了马尼拉护航船队。阿波达卡形容伊图尔维德是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毫无责任感的人,辜负了我对他莫大的信任”。其他西班牙本土出生的指挥官,如克雷塔罗的军事省长和瓦哈卡的前监政官省长在得到这一信息后均表示震惊,可随后他们就为了自己将来的发展而加入了伊图尔维德。

与许多其他随镇压叛乱的西班牙远征团去新西班牙的高级陆军军官不同,伊图尔维德生于斯,长于斯。阿波达卡知道,伊图尔维德对这里十分了解,特别是对他的大本营米却肯和瓜纳华托,而且他对自伊达尔戈起义以来的各种军事技术和谋略都了如指掌。

307

与之前那些构成威胁的人相比,伊图尔维德作为敌人最为可怕,何况他还手握一个备受欢迎的计划——伊瓜拉计划。更值得关注的是,阿波达卡认为伊图尔维德拥有考迪罗式的非凡的领导能力,能让人轻易交心,并迎合那些渴望各省解放的大部分人的利益和野心。

他是一名危险的考迪罗式领导人的典型。伊图尔维德的叛逃打击还不够,几天后阿波达卡获悉,在新西班牙最令人尊敬的保王党人指挥官之一和新加利西亚的二把手:准将佩德罗·塞莱斯蒂诺·内格雷特



安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最终支持了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他后来被选为比森特·格雷罗的副总统,但其后却推翻了格雷罗的政府,作为独裁者在1830－1832年间统治墨西哥。1837－1839年,他是墨西哥的总统。

(Pedro Celestino Negrete)也投奔了伊图尔维德。不久,内格雷特因卖出国护照迅速富裕起来,因为半岛人因担心害怕而纷纷要离开这个国家。

剩下的就是多米诺骨牌纷纷倒塌了。每一次调度都带来了新的军事、民事和宗教领袖的背弃。在3月底之前,安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Anastasio Bustamante,后于1830－1832,1837,1839和1842年担任墨西哥总统一职)上校指挥的圣迭戈谷地和本哈摩地区的军队接受了伊瓜拉计划,并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瓜纳华托。萨尔瓦迪埃拉驻军司令路易斯·科特扎尔(Luis Cortázar)中校从阿帕斯科(Apasco)、特内里亚(Tenería)、阿莫莱斯(Amoles)和萨拉维亚撤军,将当地财政资金全部充公,而他签发命令时所用头衔为“争取独立南方军第二区司令”。科特扎尔随后率军加入了由布斯塔曼特领导的新军。新加利西亚驻军的2 225名保王党官兵仅257人还尽忠职守。其总司令何塞·德拉克鲁斯陆军元帅愤怒地抵制了伊图尔维德的诱降政策,宣布仍忠于西班

308

牙,但他不得不承认革命的思想和分裂主义思想已经在瓜达拉哈拉市上空弥漫开来。

总督下令,仅存的正规保王党部队撤回到首都,但在那里各种阴谋活动及窝里斗使得军队重组已经变得不具有可能性。在被遗弃的驻军地,许多当地士兵是被赦免的前叛乱分子,他们很快加入伊图尔维德的叛乱队伍中去。在萨卡特卡斯驻军中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这其中的潜在危险性。两名士兵,一名欧洲人,一名墨西哥人,在发现地面上的一枚硬币后发生械斗事件。虽然军事警察在二人造成很大伤害之前将二人逮捕,但一队墨西哥巡逻兵在一名中尉的带领下出现在了冲突现场。这名中尉骂骂咧咧地对下属说,决不能容忍西班牙人伤害完他们的同僚后就这么走了,鼓励他的人开枪,并说如果西班牙人被打死,他可能成为萨卡特卡斯的司令。这些呼喊和骚动声引来了一群人,有人开始向守卫在附近堡垒的欧洲士兵守卫队投掷石块。这些欧洲士兵开火回应,并将平民和该省部队逼到附近山区的一个斜坡上。经过多次火力射击和石块发射战后,这名萨卡特卡斯的指挥官才将部队带回各自的军营中,此后他便加强巡逻,并增加了一倍的警力来看管当地监狱。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却深深地昭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

在当地地报纸错误地报道独立派的政府已经在墨西哥城建立时,大量的民众聚集在普埃布拉。这一消息引起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教堂钟声四处响起,烟花齐发。省长兼驻军指挥官西里亚科·德拉诺准将也面临多方的压力,要求他下令让士兵鸣枪致意。由于担心发生暴力事件,他批准进行了几场礼炮庆祝活动,并邀请镇上的音乐家筹备了几场音乐会。地方官员花了几天的时间才让局势恢复平静,并向人们解释清楚并未有宣布独立这件事。

普埃布拉的混乱局面仍在持续升温。到4月初,支持伊图尔维德的反政府武装占领了阿特利斯科、伊苏卡尔-德马塔莫罗斯、特佩亚卡和瓦曼特拉等普埃布拉周边的地方,这些支持伊图尔维德的叛乱者包括尼古拉斯·布拉沃(Nicolás Bravo)(1825－1829年任墨西哥副总统),何塞·华金·德埃雷拉(Jose Joaquin de Herrera)(1844,1845,

1848－1851年任墨西哥总统)和何塞·弗朗西斯科·奥索尔诺(旧叛军首领)。拉诺的手下报告中说王室军队在与伊图尔维德的部队——“三大保证”军遭遇时迅速惨败。一名派去刺探敌情的加尔默罗修会修士采访了一些逃到韦拉克鲁斯的西班牙人,这些人表达了对“三大保证”军的敬畏,并称,整个国家都已经在伊图尔维德的掌控之中。

4月下旬,之前让韦拉克鲁斯省的叛军领导人很是头疼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中校加入了伊图尔维德的队伍。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保王党政权支持者已经所剩无几。每天晚上都有三四十个普埃布拉驻军骑兵和龙骑兵用最好的武器武装好自己,带上他们部队所有钱财,骑马出城加入叛军。有一群军官居然在屋顶设立岗哨,让武装的民众掩护他们与60名龙骑兵一道从普埃布拉出逃。更骇人听闻的是,有一名上尉居然抛弃自己的几乎整个连队而投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离开,让他们的妻子和家属留下来充当间谍以通知保王党的一举一动。等到拉诺准将下令要一名上尉和另一名军官睡在军营中,以防止逃跑事件再次发生时,营里剩下一些最不中用的士兵了。但总督阿波达卡严惩逃兵的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是荒谬的:军官们连同整营整队的士兵及随员都已叛逃。

309

在许多城镇,富裕的居民希望在震荡的局势中有一个平滑的过渡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但激进的民众让他们的期望落空。一天晚上,普埃布拉约200名大人小孩聚在主教府邸前高喊:“宗教万岁,主教万岁,试图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的人去死”等口号。这些人担心他们的主教安东尼奥·佩雷斯·马丁内斯(Antonio Pérez Martínez)可能因写了对西班牙宪法的赞赏之词和积极评价伊图尔维德起义的事情而被总督下令逮捕,人群大声呼吁让他出现在他的阳台上,人们甚至试图闯入他的府邸进行搜查,他们敲打着教堂的门板,并企图敲响钟声来调动整个城市的民众。拉诺准将不得不加强军队巡逻和让炮队做好准备。但民众们仍聚集在那里,超过4 000人的愤怒人群拥堵在教堂周围。这些人零散地呼喊着“独立万岁,政府和西班牙人去死”的口号。

拉诺试图控制这些暴徒,传教士和城市政府官员站出来试图解释

他们并没有下令逮捕主教安东尼奥·佩雷斯·马丁内斯或其他任何人，但毫无作用。在展现了对主教的狂热支持后，很多人离开了这个示威地并来到城市的其他地方。有的来到城市商会民团的兵营并试图强行进入军营中抢夺武器，煽动军队。无法抗拒这么多人的压力，驻军指挥官同意派遣 25 名士兵到主教的住宅。但是直到晚上 11 点，仍然不见主教的踪影，气氛开始变得更加紧张，已经有一大群民众用猎枪、手枪、刀、长矛等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准备长期对抗。随着人群中的一声枪响，剑拔弩张的状态终于爆发。在无明确的命令的情况下，驻守在附近监狱屋顶上的士兵开了枪。2 名男子遭受致命性的枪伤，8 人轻微受伤。虽然暴徒迅速被驱散，但拉诺评论说，该营的一些士兵也试图加入骚乱中来而不是试图恢复秩序。晚上 11 时 15 分，拉诺召开市议会，商讨对策以防止暴力的进一步升级。主教安东尼奥·佩雷斯·马丁内斯在确信总督不会逮捕他后才从藏身之处现身。除了军营里零星的枪声外，午夜时城市终于归于平静。拉诺对留下来的人所具有的温和、谨慎精神充满信心，但他知道这种情况会在城外的叛乱部队进入时发生改变。他警告说，普埃布拉市有发动叛乱的老传统，而且相当数量的人具有革命倾向。

310

总督阿波达卡派遣了一支忠诚的军队镇压普埃布拉一带的叛乱分子，并和韦拉克鲁斯的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诺韦利亚，这个人不久后将在伊图尔维德进逼墨西哥城时推翻阿波达卡)，恢复通信，称集中兵力在革命党实力很强的普埃布拉市是很愚蠢的。到 5 月中旬，普埃布拉市已完全被叛军分块占领。被保王党描述为匪帮的各种杂七杂八的武装力量占领了公路并威胁着剩下的保王党城镇。保王党远征司令在科尔多瓦兵败阵亡。7 月 28 日，普埃布拉的拉诺在经过短暂的围困和一个小时的相持下宣布投降。相持战中有 4 名士兵丧生。从墨西哥城派出的救援部队被告知不惜任何代价来拯救普埃布拉，但却因糟糕的雨水天气被困特斯科科，最后不得不无功而返。

在西部，在 3 月和 4 月间，何塞·华金·马尔克斯-多纳罗领导的最后一支远征军，妄图在通向阿卡普尔科的道路上打垮叛军。他带领

600 人的部队离开墨西哥城去库埃纳瓦卡,但每天都有很多人当逃兵。由于过度劳累和缺少饲料,很多马匹死在路上。当马克斯在库埃纳瓦卡营房问他的人为什么有人要逃跑时,许多人回答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津贴,有的甚至连单件衬衫都没有。不少士兵因为痢疾而身体虚弱,有的军官已经上不了马。忠诚的西班牙军官和官僚只能震惊地看着与此相似的原因侵蚀着他们的队伍。在瓜达拉哈拉的陆军元帅何塞·德拉克鲁斯与伊图尔维德进行了接触,但拒绝打破捍卫西班牙国王和宪法的誓言。他向阿波达卡发表声明说,他的名声和荣誉是不可妥协的,这些东西要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5 月,瓜达拉哈拉沦陷,克鲁斯徒步逃到萨卡特卡斯,后北上流亡海外。其他忠于王室者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瓜纳华托省的指挥官上校安东尼奥·利纳雷斯(Antonio Linares)在他的部队加入布斯塔曼特和科塔萨尔的队伍并转而要逮捕他时逃到了塞拉亚。利纳雷斯开始强化塞拉亚的安全警卫,但一天夜里这座城市的年轻人打开了城门,城里的驻军也随即投降。其中有 23 名忠诚的士兵和一名来自克雷塔罗的官员拒绝投降,但利纳雷斯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不希望这些勇敢的人被叛乱分子毫无意义地屠杀。值得注意的是,利纳雷斯被单独留在自己家里,且看管并不严,他能够继续从塞拉亚送信给墨西哥城的总督。他报告说,青年军官大部分倾向于参加伊图尔维德的叛乱,他怀疑,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普通士兵是否会参加起义。3 月 25 日,利纳雷斯报告说瓜纳华托没有开火直接投降了。巴希奥省的圣米格尔和其他城镇也由于没人捍卫西班牙政权而轻松改旗易帜。

311

政权及其军队的突然崩溃严重损害了商业、采矿和农业生产。副代表、市镇行政人员、地方法官、民兵指挥官、收税员和其他官员,尤其是那些西班牙裔人往往发现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3 月,维查潘的副代表曼努埃尔·德拉奥斯获悉,一个宣布独立的阴谋将在周日弥撒时发动,因为那天当值的民兵会不带武器进行祈祷。该计划是抓捕民兵和抢劫海关及其他拥有税收资金的政府办事处,还抢劫西班牙人的房子。奥斯被这样的威胁吓坏了。他想起在 1817 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

叛军在短短的时间抓住了他,还将他拖到摆着很多叛军头颅的绞刑架旁边。收集了政府资金和他的档案后,奥斯逃往更接近首都的希洛特佩克。

在路上,成群的强盗和逃兵团伙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袭击和抢劫商人车队和看起来有钱的旅客。城镇财政失去收入,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在帕丘卡,银矿业因各省向伊图尔维德的投诚而停顿,现在看来,对高级行政官员、神职人员、忠诚军官甚至一些部队来说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首都了。

由于保王派统治系统的崩溃,阿波达卡受到忠诚的高级军官和官员的尖锐批评,这些人同时也指责宪法和新赋予的自由权利使伊图尔维德崛起,革命再获动力。一些傲慢自大的西班牙人认为少量受过训练的欧洲军队和惩罚几个典型案例就会平息暴动,维持和平。但随着与南北地区及海岸一带恢复通讯失败,以及远征军在科尔多瓦惨败,都城的压力越来越大。

巴利亚多利德的监政官曼努埃尔·梅里诺报告说,他一直担心叛军会招募驻守在本省各边境城镇哨卡的士兵。4 月和 5 月间,归梅里诺管辖的巴利亚多利德的驻军纷纷投奔叛军,其人数从 3 500 人减少到不到 1 500 人之后。梅里诺急于派遣一支骑兵去萨莫拉和希基尔潘(Jiquilpan)抢救存放在这些地区库房里的政府资金。但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能相信手下或邻近辖区的任何一名指挥官。当梅里诺命令米格尔·巴拉甘上校从帕茨夸罗派遣 600 名士兵来协防巴利亚多利德市时,他却碰了一个硬钉子。米格尔·巴拉甘(后于 1833 — 1834 年任陆军部长,1835 — 1836 年任总统)回应说,巴利亚多利德应该效法他和帕茨夸罗人民的做法,按伊瓜拉计划的要求宣誓为独立而战。梅里诺手下的另一名高级指挥官路易斯·金塔纳尔上校派自己的女婿去劝说米格尔·巴拉甘回心转意,但最后无功而返。而且金塔纳尔还公开倒向伊图尔维德,证实了梅里诺认为他是“毫无才能、干劲且优柔寡断”的说法。梅里诺知道,他手下实力不断在削弱的军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分裂态势,一边是忠诚的士兵,而另一边则是想加入叛军的人。他恳求

312

总督派给他 800 骑兵和 500 步兵，这样他就可以打败米格尔·巴拉甘、内格雷特和伊图尔维德。



米格尔·巴拉甘将军来自圣路易波托西，与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一起参与了 1821 年和平解放墨西哥城的战役。他也曾反对伊图尔维德加冕称帝。1825 年他在韦拉克鲁斯指挥战斗，迫使西班牙人放弃了圣胡安·乌卢阿要塞。后来，他曾于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总统任内在内阁任职，并于 1835 年出任临时总统。

4 月 25 日，米格尔·巴拉甘和约 800 至 900 人的部队出现在一座距巴利亚多利德不到 1 里格的小山上。几个军官出去谈判，结果很多人加入了伊图尔维德一方。在城市里，忠诚的军官和士兵对这种不作为感到很恼火，他们要求出去与米格尔·巴拉甘的部队作战。梅里诺继续在和内格雷特谈判，并表示说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保王派的武装去粉碎这些在这个国家到处游逛的叛乱分子。其实这位监政官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双方的军官和士兵都是相互认识的，谁都不想和过去的或是以后的同事开战。接下来动荡的十年中发生的事明确地说明，即使考迪罗、卡西克和各个派系轮番登场，士兵们也不愿意用拼得你死我活的战争方式来解决分歧。与更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政治领导者(这些人的主张反映了地方和区域的利益要求)一道，军官和士兵对新公民文化的出现起到很大的作用。

313

随着身边新西班牙旧大厦的轰然倒塌，阿波达卡不知道该怎么做，

更不知道该听谁的。截至5月末,墨西哥城周围被叛军控制。许多省份宣布归顺伊图尔维德,逃兵和政府行政人员也纷纷投降。阿波达卡意识到叛军已经力量大增,孤立和包围墨西哥城指日可待。到6月,阿波达卡剩下的军队人数只有约6 000人,这些人主要是西班牙远征团的士兵。此外,还有一些忠诚于西班牙的墨西哥正规军队,国民军,骑兵,步兵还有一些在首都抓获的随时准备投奔伊图尔维德的人。阿波达卡还招募城市民兵和志愿者并且组织和动员古老的市商会民团。

直到最后一刻,阿波达卡都始终表现着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并乐观地认为叛军有可能被击溃。他采取措施确保士兵按时获得津贴,干粮和战时奖金。6月期间,查普尔特佩克和瓜达卢佩的驻军负责保护通向城市的通道城市,工人们建起了战壕、护墙等一系列防御工事。一支有1 000多人的机动军队密切注意着敌人的活动,龙骑兵部队负责保护查尔科、特斯科科、圣阿古斯丁-德拉斯奎瓦斯(San Agustín de las Cuevas)、威奇兰戈(Huichilango)和库埃纳瓦卡等一系列城镇。当陆军副总监兼墨西哥军事省长辞职后,阿波达卡委任炮兵副总监陆军元帅弗朗西斯科·诺韦利亚接替他担任这一职位。总督与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阿波达卡夹在要求恢复专制主义政权的欧洲西班牙军官和主张采取温和策略的墨西哥人之间左右为难这种局面难以为继。6月末,伊图尔维德的部队对通讯的成功封锁迫使阿波达卡只能在用易于偷运出去的小纸片上撰写发往西班牙本土的信件。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恳求西班牙政府派出8 000至10 000名士兵过来,并表示说现在情况极为严峻,西班牙的事业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几近绝望中,6月28日,阿波达卡告知帝国政府,他已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唐卡洛斯王子步兵团指挥官、西班牙远征军最高长官——何塞·华金·马尔克斯-多纳罗呈递一份详细的情况报告,并再次强调他需要欧洲部队进行支援。但讽刺的是,直到1822年3月28日墨西哥已独立,这封信才到达西班牙,何塞·华金·马尔克斯-多纳罗也没有出现做最后的求助声明。阿波达卡写完这封信仅一周后,唐卡洛斯王子步兵团、卡斯蒂

314

利亚步兵团以及军事修会包围了总督府，封锁了附近街道，并扬言要向阿波达卡的亲卫队开火。总督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们会见了反叛人员，这些人要求他辞职，让诺韦利亚上位。阿波达卡与军方进行交涉，恳求他们停止将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切计划，但他们只以“深深的沉默”作为回应。没有其他的选择，总督只好将新西班牙的军事和政治指挥权交给诺韦利亚。他声称他这样做是出于自愿的，是应西班牙远征军军官和士兵郑重的请愿而作出的决定。阿波达卡要求他的家人的安全得到保障，他将被护送到韦拉克鲁斯并乘船回到西班牙。

阿波达卡于 1821 年 11 月抵达哈瓦那，因舟车劳顿而病倒。后来他承认早在 1820 年宪法出台时他就预见了即将到来的麻烦局面。一方面，墨西哥人民要求实现自治或独立，另一方面是旧政权的支持者欧洲西班牙军队的顽固立场，他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缺乏一个谈判的空间且很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折衷之法。由于新墨西哥时代的到来，再一次引来了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和挤压，而在此期间，政府官员和士兵对支持哪一个文职领导人上台则再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帝国政府任命上将胡安·奥多诺胡为新西班牙都督。他从西班牙抵达韦拉克鲁斯时就提出了交出剩余西班牙军队的计划框架。胡安·奥多诺胡和伊图尔维德签署了《科尔多瓦条约》，该协定承认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独立，并作为一个新的实体称为墨西哥帝国。胡安·奥多诺胡同意撤回墨西哥城的驻军。虽然诺韦利亚和他在首都的走强硬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未参与谈判，结局注定要如此。普埃布拉、韦拉克鲁斯和其他战略要地的纷纷沦陷和国家首都所面临的紧张形势，引发了一种几近疯狂的两难状态——是要加入伊图尔维德还是要逃离这个国家。诺韦利亚后来说，当胡安·奥多诺胡没带一兵一卒来到这里时，他就已经明白尘埃落定了。他还指出，检审庭法官、高级税务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员几乎都参加了这次所谓的“变节”事件。这些墨西哥出生的人们——包括军官、士兵、政府官僚、富裕的神父、修士和各阶层的妇女，试图淡化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 315

胡安·奥多诺胡在瓜达卢佩会见了诺韦利亚，并告诉他新西班牙



胡安·奥多诺胡是新西班牙殖民地的最后一任总督。他在这块殖民地取得独立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奥多诺胡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理解新西班牙并不想隶属于西班牙帝国,因此签署了《科尔多瓦条约》,终结了西班牙的统治。

已经失势,西班牙将不会对残存下来的保王党做任何支持。他接着指出,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抵抗或冲突只会使未来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陷入困境。当胡安·奥多诺胡威胁要么回到西班牙,要么要求伊图尔维德使用武力进攻首都时,诺韦利亚同意投降。诺韦利亚授予一名官员临时指挥权然后便赶往韦拉克鲁斯,在那里他发现,残存的退守到圣胡安-德乌卢阿海上堡垒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仍然发誓要继续进行战斗。诺韦利亚随后出发前往哈瓦那,会见了古巴的督军,但此人并没有兵力可助西班牙在墨西哥行事。胡安·奥多诺胡的病亡使他免见西班牙撕毁《科尔多瓦条约》。诺韦利亚的临时指挥官主持将主动申请回到西班牙的 492 名远征军成员和 3 699 名未委任的官员和士兵撤回本土。

伊图尔维德六七个月以来发动的这场运动已充分显示了它政治主张的受欢迎性和来自军方和所有其他部门对他的肯定和支持。对战争的厌倦,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来自伊瓜拉计划的信息,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都站在了伊图尔维德这边。胜利是令人激动的。不过,墨西哥新的执政者——临时执政委员会和五人政府——不久就不得不面临如何治理这个新国家的惊人问题。一个由各监政官辖区、各省代表及某

些行业代表构成的国会面临着重重问题：墨西哥将是君主制政体还是共和制政体？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分权制？如何处置这些由未经改造的保王党和许多西班牙人领导的日益傲慢的获胜的军队？如何重建因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如何找到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平衡点？如何协调为对抗西班牙而临时组成的“三大保证”同盟之间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

国家的边境也不太稳固。当伊图尔维德于 1821 年 12 月派遣军队去危地马拉时，一个中美洲代表大会在讨论本地区未来时表示同意加入墨西哥。在 1823 年 7 月中美洲宣布独立之前，这个并不团结的墨西哥帝国北起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得克萨斯，南至哥斯达黎加。有一段时间，墨西哥的领导人雄心勃勃，甚至考虑收回北美太平洋沿岸北至阿拉斯加的地区。

虽然《科尔多瓦条约》规定了欧洲君主统治墨西哥，但留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墨西哥国会可能选择美洲出生的候选人。伊图尔维德利用他的个人声望，利欲熏心地接受了加冕。他从 1822 年 5 月到 1823 年 3 月退位共执政 10 个月，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矛盾与分歧，也进一步表明，支离破碎的状态使国家建设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同样被平民支持的野心勃勃的军队官员们，很多像伊图尔维德自己一样是前保王派的人，重复着伊图尔维德的老路——宣扬自己的计划并开始反叛政府。前叛乱分子比森特·格雷罗和尼古拉斯·布拉沃支持在韦拉克鲁斯州的准将圣安纳。圣安纳发表了分裂性的韦拉克鲁斯计划，反对伊图尔维德并重申在伊瓜拉计划中所作出的保证。但他被围困在韦拉克鲁斯并被指控与圣胡安·德乌卢阿堡垒中的西班牙人合谋，这使其前景一片黯淡。

可是前来消灭他的帝国军官却与他联手宣布了“卡萨马塔计划”，该计划重申了强加给墨西哥的中央集权制是让人不能接受的。在各省，地方当局取消了中央政府税收，拒绝纸币，拒绝中央政府的强迫贷款。显然，分散的联邦制是很合墨西哥各省胃口的。

在整个 1823 年，瓦哈卡、尤卡坦、哈利斯科和萨卡特卡斯相继宣称

自己是独立自治的,并培养了自己的民兵防御部队以备在必要的时候用以抵御正规军。制宪议会不得不起草一个新的国家宪法来承认大部分省份的现有状态。少数人,包括卡洛斯·玛丽亚·德布斯塔曼特,反对联邦制。许多教会领袖、富商和高级军官认为墨西哥是需要集权的,但却无法阻碍宪法赋予各州相当大的自治权。其他温和派指出,墨西哥理论上仍处于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国家政府需要足够强大,以应付来自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最后,温和派主张部分自治的建议被采纳。

317

1824 年宪法将 1812 年西班牙宪法的许多原则吸纳其中,但做了一些修改以反映联邦制与共和制。尽管建立一个强权政府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但出于效率考虑还是用单一的总统代替了可控的行政会议来领导国家。在许多方面这部宪法考虑到了墨西哥建国碰到的现实需求和现有状况。但不幸的是,内部混乱,暴力和外部势力却削弱了第一联邦共和国的行政效率。

面对初生的墨西哥国家,西班牙帝国统治者愤怒地撕毁了奥多诺胡的《科尔多瓦条约》并拒绝承认墨西哥独立。西班牙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立场,设置了一个使许多留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的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的灾难性路线。假如西班牙方面承认这个新生国家的话,1820 至 1830 年间墨西哥发生的驱逐西班牙人的激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耗资极大的军队因为西班牙对墨西哥独立的明显威胁性而一直保留着。1829 年,一支从古巴到墨西哥的远征军对坦皮科(Tampico)的失败袭击向墨西哥人证明了军事准备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需要强调了军事制度的重要性和某些军队领导人的重要性。比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作为坦皮科战役中的英雄,就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韦拉克鲁斯州本就很强大的势力。他在此后的时代里能成为手握大权的最为显赫的考迪罗,与其曾经打败了西班牙军队是息息相关的。

许多西班牙官员放弃了他们在西班牙军队的事业转而投向伊瓜拉计划,他们留在墨西哥出任高级军事和民事职位,这让许多墨西哥人很眼红。西班牙继续威胁着墨西哥独立,这使野心勃勃的墨西哥人不需四处寻找就能找到借口指控西班牙人不忠、危险、邪恶。经过多年战争

形成的社会军事化，使得游击队员和盗匪传统在墨西哥根深蒂固，墨西哥需要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来解决分歧，建立体系并形成针对这个国家的评估系统。可悲的是，墨西哥并没有得到和平。但是，虽然民主制度形成是一个混乱的、复杂的、费时的过程，但有些人却相信他们能使渐进式的革命简洁化并施加更多的专制办法。

像西班牙（后来则是法国和美国）这种外部敌人的出现为各个考迪罗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支持。批评军人和军政府的人们往往未能认识到，军队指挥官们常常真诚地相信凭一己之力就可以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正规军和各省民兵变成了这些军人政治家们的工具，他们其实具有双重身份，既要保护这个新生国家又要维护自己的地方势力圈。死板的原则，狭窄的哲学，保守的地区利益，以及持不同政见者显然无意为达成全国性共识而互相妥协，这些都使政治立场趋于强硬化。 318

西班牙从伊图尔维德取得胜利后一开始就起着腐蚀作用并且错误地认为，一个强大的远征军就可以恢复西班牙的统治，而反叛分子却不能实现其要建立一个更好国家的美好承诺。在这方面，一名叫阿约索·加里多(Aryoso Garrido)的韦拉克鲁斯州居民在 1821 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中长篇累牍地写道，墨西哥城镇正遭受着沉重的税收之苦，那些欧裔士兵靠从事琐碎而吃力的工作获得低微的薪酬，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下苦苦挣扎。整个国家充满着一种普遍的反抗情绪。在马德里，陆军部官员制定了夺回美洲的战略计划，墨西哥是其主要目标。虽然西班牙自由派政权决定不把部队集结到入侵韦拉克鲁斯州的中转站古巴，但在 1821 年 9 月，军部却授权自现有军队中招募志愿军前往“收复美洲”。但直到 12 月，尽管努力对志愿者进行宣传，只有 4 名陆军中尉和 837 名士官和士兵志愿报名。

与此同时，阿波达卡、诺韦利亚等流亡的西班牙官员及其家人抵达西班牙港口拉科鲁尼亚。1822 年 1 月，普埃布拉前省长和指挥官西里亚科·德拉诺准将从哈瓦那给本土写信，表示愿领军重新征服新西班牙。他当初带着他老部队的 126 名士兵和一些人员抵达古巴。留在墨西哥城以协助保王党士兵离开的官员，于 6 月 1 日抵达拉科鲁尼亚，他

们在被驱逐出哈拉帕时，只有24小时的时间去召集稀稀拉拉的西班牙远征军。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第五纵队在1825年之前控制着在韦拉克鲁斯州的圣胡安-德乌卢阿拉堡垒，后来它的继任代理人前往墨西哥观察局势、会见支持者并收集大量已公布的数据。正如所料，在韦拉克鲁斯的墨西哥政府和西班牙海上堡垒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随机的破坏，小规模的破坏威胁，扰乱了仍然是墨西哥进出口主要港口的韦拉克鲁斯的正常商业运行。1822年，曾交出克雷塔罗以归顺伊图尔维德的多明戈·卢阿塞斯准将接手进行韦拉克鲁斯的谈判，他想要负责圣胡安-德乌卢阿拉堡垒的年老古怪的陆军元帅何塞·达维拉放弃无用的顽抗。但正如所料，何塞·达维拉无视卢阿塞斯的要求，他甚至拒绝考虑西班牙军队从圣胡安-德乌卢阿拉撤军。为了回应卢阿塞斯的批判性言论，何塞·达维拉用叛国的罪名来贬低他的对手。他向卢阿塞斯表示说："我既不是固执的，也不是违抗命令的人，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一名士兵，我有我的信仰。不要以为你可以使我成为一名国家的罪人。"韦拉克鲁斯的商人行会会员们尖刻地抱怨说，何塞·达维拉龟缩在圣胡安-德乌卢阿要塞中，时不时干扰商业活动。商人们直接向在马德里的海外事务大臣呼吁，他们希望开放与西班牙的贸易通道，主张撤掉何塞·达比利亚以防止对抗所带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

319

虽然这样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是明智的，西班牙政府却仍在是使用军事征服还是寻求其他手段以谈判赢取墨西哥再次依附本国这两种选择间摇摆不定。何塞·达维拉的继任者是新西班牙代理都督弗朗西斯科·利毛尔，他将见证圣安纳对伊图尔维德的起义，和后来墨西哥帝国的覆灭。虽然这个堡垒在1825年有条件地投降了，但西班牙档案馆里关于19世纪20年代的记录仍然载有大量间谍报告，和重新夺回墨西哥的许多计划。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失去墨西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一个根本不能被接受的事实。西班牙观察家们对墨西哥内部不稳定的局面错误地认为，西班牙自己就能让墨西哥恢复和平并获得一个良好的政府，虽然这样的结论需要西班牙人

忘记这期间长达 11 年的血腥冲突,忘记那些有见识的观察家所做的关于大多数墨西哥人想要掌控自己的事务的报告。西班牙观察家们对圣安纳 1822 年的起义和伊图尔维德在圣安纳、瓜达卢佩·维多利亚、比森特·格雷罗、尼古拉斯·布拉沃这些人发生军事叛乱后宣布退位这些事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欣喜。

这种敌意并不是单方面的。在墨西哥,对西班牙人的敌意——特别是对那些曾在保王党军队服役的人,促使一些限制性的法令出台,并预示着 1827 年法律中关于驱逐西班牙人的条款的生成。巴拉达斯上校 1829 年从古巴远征坦皮科惨败,结束了那些仍对西班牙统治墨西哥抱有希望的人的信念。来自西班牙的沉重的压力破坏着仍然生活在墨西哥的许多西班牙人的生活,更使那些国家统治者找到了保留战时军备标准的借口:防止西班牙军队从古巴发动远征。独立战争换来了这个新的国家,但在一段时期却无法恢复那里基本的通讯和商业活动。那些试图进入这个国家的游客们都用类似"危险","苦难"和"支离破碎"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个国家的现有状态。海关官员时时怠慢游客们,频繁的突击巡查延误着旅客们的时间,并在许多城市入口处设立关卡。这些工作人员查验护照,仔细搜查行李,并对商品征收重税——虽然旅客可以用行贿方式加速这一检查进程,但终归是令人讨厌的。旅馆的肮脏,食物和饮料(包括牛肉干和龙舌兰酒)的不干净使许多外国旅游者患上腹泻和胃痉挛等毛病。无处不在的土匪、强盗、小偷随时准备要夺去旅客的财产,威胁着旅客的生命。即使在墨西哥城,美国大使乔尔·波因塞特和其他访客也同样指出,尽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警队巡逻,抢劫、谋杀和暗杀仍然频繁发生,每个有条件的人都不得不对自己全副武装。中尉罗伯特·哈迪报告称,在首都辖区的暴力犯罪事件多涉及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乞丐,他们参与帮派攻击、袭击和械斗事件。当一名游客向当地法官报告说他目睹一个人持刀行凶时,他被告知最好保持沉默。在农村,赶骡人雇用护卫队保护他们,这些护卫队用大砍刀和轻武器来武装自己以保护这些大货车免遭土匪的袭击。迟至 19 世纪 40 年代初,弗朗西斯·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Frances

320



在为赢得独立而苦战了十年之后，墨西哥各地盗匪横行。从韦拉克鲁斯前往墨西哥城的旅行者在最终到达目的地之前，通常都要被抢劫两到三次。

Calderón de la Barca）就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描述，称"整个国家被盗匪这种瘟疫笼罩着"。强盗们将自己伪装成叛乱分子，这样就可以利用国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来继续为非作歹。她像其他旅客一样指出，这些为非作歹的强盗团伙出没在首都和韦拉克鲁斯之间的道路上，破坏这里的商业活动，无视政府的警告和制裁。

战争破坏了城镇，烧毁了村庄，摧毁了牧场，破坏了桥梁，使墨西哥的许多道路受损不能通车，使在墨西哥许多地方旅行变得困难而危险。1832年，英国旅行家沃德的报告中形容了这样一个充满悲凉色彩的韦拉克鲁斯的景象："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房屋，破败的教堂，充斥着腐烂动物尸体的街道。"沿海岸线的内陆小城镇遭到破坏，甚至连墨西哥城也不能幸免，到处是被战争破坏的痕迹。黑暗的街道，路面破碎，被遗弃的房屋，穷苦笼罩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急需和平来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据说在独立战争中有50万人被杀害，这个数据看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传染病肆虐，人们离乡背井，和农业中断都给人类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矿区，排水系统公共工程的报废，以及技术工人的流失延缓了经济恢复的脚步。

321

从独立时期开始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墨西哥及其各州是被军事领导人统治的，这些人在战争期间站在不同的派系一边获得了升迁，现在有强大的文官政治家做后盾。以前的起义者瓜达卢佩·维多利亚(1824－1829)、比森特·格雷罗(1829)、尼古拉斯·布拉沃(1839－1846年间间断任职)和胡安·阿尔瓦雷斯(1855)相继就任总统。而出任这一国家的掌舵人职位的著名保王党人则包括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1830－1832,1837－1839,1842),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1832),圣安纳(11次当选总统),米格尔·巴拉甘(1835－1836),何塞·华金·德埃雷拉(1844,1845,1848－1851)和马里亚诺·阿里斯塔(Mariano Arista, 1851－1853)。还有许多人担任内阁部长、州长、军区司令、将军和外交官。如前军人圣安纳和阿尔瓦雷斯不仅获得了国家主导权，并且在自己控制的局部地区也很有势力。圣安纳掌控从哈拉帕到韦拉克鲁斯之间的庄园，而前叛军司令阿尔瓦雷斯把1849年时设为格雷罗州的广大区域几乎变为他的个人领地。

鉴于独立后的墨西哥政治、区域和地方上的不稳定，野心勃勃的考迪罗(军队支持的政治领导人)不断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从边境到内地，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独立战争后产生的这个新国家的人民在围绕支持集权制还是分权制政府形式上不断进行着暴力冲突，政治碰撞，对土地所有权，纳税人和区域分配权争论不休。在没有任何其他仲裁的情况下，拥有武装力量的人们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心愿插手争端。文职派系支持的军方官员们试图用驱逐或威吓对手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满意的事情解决方案。一些军事指挥官从混乱中获利，摇身成为地区执行官，趁机侵吞大量的财富和广阔的庄园。然而尽管这些领导人不断扩张着自己的权力，但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开这个国家的政治难题，解决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或用可行的技术性手段来解决这个国家的内外矛盾。边境省份得克萨斯的丧失和尤卡坦州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分离主义运动反映了墨西哥内部存在的深深裂痕。圣安纳后来在自传中描述自己渴望让"伟大的祖国"走向辉煌，但坦陈他在"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反对派汹涌澎湃的革命中"感到深深的挫败。虽

然圣安纳显然在自我评价中存有私心，但他说出了一点真相，像墨西哥其他领导人一样，他并没有发现使这个国家获得持续稳定局面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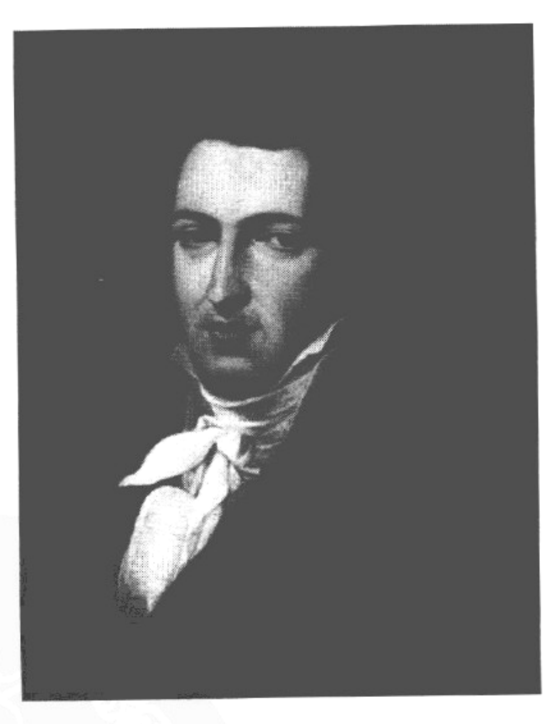
独立时代以来的很多军事考迪罗发现，他们很难从强大的地区军事领导者过渡为受法律和宪法约束的政治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运用武力，通过强制征收，商业控制，随意使用军事法律等手段来获得丰厚的回报。那些支持墨西哥独立的西班牙人往往拥有着不光彩的记录，这些记录使他们成为联邦及诸州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台驱逐西班牙人的法律针对的主要对象。甚至像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这样的克里奥尔人也因此受牵连，人们就其在战争期间的个人记录和其倾向采取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指责。众所周知，伊图尔维德在战争期间作为瓜纳华托军队指挥官时曾滥用职权，在众人的抱怨声中他不得不在1816年到墨西哥城接受调查。伊图尔维德抱怨说，四年多来，他遭受了“从军人到诉讼人的屈辱性转变”。他也深知，他在西班牙军队中已没有前途，于是一有机会来临，他就投身独立运动。在评估伊图尔维德时，乔尔·波因塞特总结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机敏、勇敢、果断，是一个为达目的而隐忍谨慎的人。”尽管一些历史学家曾试图恢复伊图尔维德的名誉，但他对君主制和集权制的支持，在他短暂的作为皇帝统治时期对反对派的毫不留情，最终无可避免地导致他的被流放，并在1824年从欧洲重返墨西哥后被处决。

322

比伊图尔维德更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这名从独立战争中走出来的人物可能时至今日仍是搞乱这个国家的“诸神”中最举足轻重的一个了。历史学家、高级官员、保守主义思想家卢卡斯·阿拉曼将独立运动后的时期定义为圣安纳的革命时代。很多教科书的作者对此也表示认同，并将19世纪中期阿尤特拉革命发生前的时期称为“圣安纳时代”。他的支持者们称赞其为“国土的保卫者”、“坦皮科反西班牙人的英雄”，“无畏的战神之子”，而他的批评者则称他为“祖国的叛徒”、“歪理邪说者”、“狼子野心的人”，“粗俗”且“腐败”。像伊图尔维德和许多其他独立运动后的领导人一样，圣安纳的职业生涯



圣安纳是墨西哥历史上典型的考迪罗。在公众眼里，他有时候是英雄，有时候又是个混球。他曾英勇地为墨西哥而战，抗击西班牙人、得克萨斯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外来入侵者。而他的机会主义政治理念则先后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和无冕之王。



卢卡斯·阿拉曼(1792—1853)是保守派早期的智囊，他深信自己能够为身为总统的圣安纳提供指引，在经历了灾难性的美墨战争后，重振墨西哥的国家声威。可是他的突然死亡使得圣安纳开始自行其是，其中包括把梅西亚河谷地区卖给美国。

是从充当热心的保王党军官开始的。急于消灭叛乱的他有时还会伪造敌人的数量。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很快赢得了高级军官们的关注,他们形容他为"积极,勇敢,热情,对王室忠贞不渝,是一名高素质的人才"。圣安纳对韦拉克鲁斯的保王党军队指挥官龟缩不前的举动很是不满,独自率军追击叛军,追捕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并公然违抗命令处决叛军头领。在受命平定麦德林、哈马帕和圣玛丽亚热带低地村镇时,圣安纳凭借他对该地区的了解,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前叛军,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牢固的大本营。独立后,圣安纳先是支持伊图尔维德。然后,像许多其他军队指挥官一样,他在19世纪20年代的动荡中起起伏伏,在自己的野心驱动下与不同派别的文官政治家分分合合。虽然他成功地获得了韦拉克鲁斯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如果他没能在1829年的坦皮科之战中击败西班牙人的话,圣安纳可能就不会在全国政坛成为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人物。

324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政坛充斥着独立斗争时期形成的各种不同政见和人物派系。在19世纪20年代,过去在墨西哥城和其他城市的秘密组织现在以共济会为中心,形成了各种派系。他们支持像圣安纳、比森特·格雷罗、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这样地区军事指挥官,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区域基础,能组织起可观的军事力量。这些秘密组织和政治团体最后合流为两大共济会派别,一个是"苏格兰仪礼派"(escoceses),另一个是稍晚成立的"约克仪礼派"(yorkinos)。苏格兰仪礼派吸引了许多包括贵族保王派领导人在内的保守派和温和派,这些人认为墨西哥应采取重建旧总督制的一些因素的中央集权制。约克仪礼派则主要由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组成,他们主张联邦制和民族主义,仇视在墨西哥的欧洲西班牙人并害怕西班牙人计划恢复对墨西哥的控制。支持国家分权制的激进主义者们,尤其不满前保王党人又顺利过渡到占据了军队、教会和政府中的高位,并控制着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在某些方面,这些独立战争的胜利者们感到自己却是和平时期的失败者。

即使在教会内部,独立也带来了深刻的而难以愈合的分歧。墨西

哥神职人员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许多农村神父和修士支持土著民族和地区利益问题，但很多城市人群，如克里奥尔人却支持中央集权。一些牧师支持独立，认为这样就可反对之前西班牙波旁王朝对教权的压制，憎恨他们将教会资产占为己有用以来偿还战争债务。传统上，教会在墨西哥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负责登记出生、洗礼、婚礼，以及死亡情况并主导着教育、医院、孤儿院、养老基金和其他慈善机构。然而，墨西哥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批评教会的特权和豁免权，攻击教会在教育中的作用，并要求包括墨西哥大学在内的学校世俗化。自由党认为，随着国家的独立，对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已经从西班牙政府转移到新的墨西哥政府这里。西班牙神父和修士们在墨西哥独立后离开这里，墨西哥大主教于 1827 年离开，只留下了三个主教继续待在墨西哥。他们很难指望从反对叛乱、支持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教皇利奥十二世那里获得帮助。墨西哥神职人员们很担心贫穷的新政府会向教会征缴财富和财产。虽然墨西哥政府已在 1832 年与罗马谈判达成关于取代牧师委任的协议，但教会领导人仍在日益增加的批评声和将教会财富转移到政府部门的计划下感到了威胁。1833 年一部国家法律废除了什一税制度，阻碍了教会经济地位的重建。

325

在 1824 年的总统选举中，前起义军将军和苏格兰仪礼派的大师傅尼古拉斯·布拉沃，与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将军竞争。布拉沃曾在战争期间接受王室政权赦免，被认为是同情保守的集权主义者和欧洲西班牙人的人。最后维多利亚当选总统，按照宪法规定得票位居第二的布拉沃担任副总统。对那个年代来说，维多利亚是不凡的，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个成功完成任期的共和国行政首脑。他在 19 世纪 20 — 40 年代的总统继任者们缺乏足够的权力压制来自反对派的压力，部分原因是由于 1824 年的宪法规定限制了行政机关的权力。

而分散在各州的约克仪礼派开始保护激进的联邦主义和地区自治权使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苏格兰仪礼派吸引了大量有地位权势的人，另一方面约克仪礼派则吸引着大量的像政府公务员，职员，工匠，士官等这些不太富裕的阶层，这些中有很多人都组织起共济会分会。到

19世纪20年代末,代表民众主义思想的约克仪礼会遍布许多城市和村镇,从北部的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再到南部的恰帕斯和尤卡坦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他们通过游行和袭击事件来制造压力,通过宣传海报和标语口号传播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有些约克仪礼派人士支持那些通过法律建立民兵队伍并进行自我防卫的行为,反对墨西哥中央集权制。例如,萨卡特卡斯州长弗朗西斯科·加西亚组建了总人数近1.7万的民兵力量。通常情况下,州和地方民兵反对联邦军队和军队特权(福埃罗)(这种特权使得士兵不受普通刑事民事法院审判而只受军事法院审判,从而拥有专门的司法豁免权和优先权)。在米却肯、瓦哈卡和墨西哥等州,州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国家军队招募的新兵大多来自监狱,这些人包括社会无业游民、酗酒闹事之徒、赌徒、乞丐、小偷和其他流氓社会渣滓等。一般来说,墨西哥人的传统是不喜欢服兵役的范围超出他们的家乡省份和社区的界限,这种传统观念在墨西哥独立后仍然强劲。随着共和政权财政危机的加深,没领到津贴的士兵经常开小差,出售他们的制服并把任何他们能带出的东西偷出来卖掉。

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张局面不可避免地导致墨西哥人开始讨论如何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如何重新让社会井然有序。内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就外国贷款事宜与英国银行进行谈判,帮助墨西哥的采矿业部分恢复,并保持现有官僚机构稳定,但墨西哥却仍日益陷入失业和债务危机中去。独立后的墨西哥社会还充斥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西班牙人成为怨恨指向的焦点,导致骚乱不断,民众号召将这些人从政府中除名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在墨西哥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西班牙人仍然很强势,反西班牙人运动的出现是可以预料的。1827年,对欧洲裔西班牙人卷入反墨西哥阴谋的担心,对被侵略的恐慌,以及一些前王室士兵的秘密行动导致一些主要的西班牙人领导者逮捕,其中包括内格雷特将军和何塞·安东尼奥·埃查瓦里将军。入狱一年后,两位将军的叛国罪名被取消,但却突然被驱逐出境。在一些州,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境的法律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和家庭的分

裂。那些嫁给前西班牙士兵的墨西哥妇女往往不能获得自己和其子女随其丈夫离开墨西哥的许可。

这几年许多反西班牙的倡议都来源于州运动,特别是来自萨卡特卡斯、哈利斯科、瓦哈卡、墨西哥和尤卡坦这些地方。在 1827 年底,中央政府向国会施加压力,迫使国会通过针对已投降西班牙士兵和普通神职人员的驱逐法令。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那些已被证明曾为墨西哥效忠的人获得豁免,许多州的州长利用这些漏洞来保护部分当地西班牙居民。不过,驱逐法律大大减少了西班牙人口并且使许多人才流失。冲动的民族主义和反西班牙情绪以及驱逐法案的出台,其实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失败的关注,中央集权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纠纷以及对潜在的入侵的恐惧。

正如当今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海梅·罗德里格斯所说,围绕 1828 年总统选举的一系列复杂事件导致了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和 19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混乱。随着苏格兰仪礼派名誉扫地,胜利的约克仪礼派分裂成温和和激进两派。温和派提名陆军部长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参选,而洛伦索·德萨瓦拉领导的激进派则支持前叛军领袖、受人欢迎的人民英雄——比森特·格雷罗将军。获得温和派和保守派支持的戈麦斯·佩德拉萨赢得了比格雷罗更多的州的支持,但此时圣安纳宣布起义。当他从哈拉帕进发占领内陆的佩罗特堡垒时,萨瓦拉在墨西哥城发起了协和大厦叛乱(Acordada Revolt)。总统维多利亚未能在任期尾声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干制止暴力骚乱的发生,比如从国家宫到丘达德拉兵工厂之间城市各处各不同派系士兵间的小冲突和炮击事件等。当格雷罗加入起义时,戈麦斯·佩德拉萨不得不放弃竞选,流亡海外。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市中心的“中央广场”一带市集中的商店遭到超过 5 000 人的暴民的哄抢。

327

在 1829 年 1 月,国会接受了暴力运动战胜宪政主义的结果,宣布戈麦斯·佩德拉萨的当选无效,承认格雷罗为总统,选票数排在第三位的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将军则担任副总统。格雷罗代表的是联邦主义和民众主义的立场,而布斯塔曼特则是保守派和集权主义的代

表。面临濒临崩溃的政府,持续不断的起义运动,新驱逐法律引起的骚乱,以及预计已久的发生在1829年7月的反西班牙入侵战等等一系列因素,格雷罗未能稳定局势也是毫不让人奇怪的。为了填补国库,总统不得不开征不受人欢迎的税收项目,并试图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这些举措使得他开始不受许多温和派和保守的有产阶级的欢迎。当反格雷罗的起义爆发时,虽然圣安纳仍然宣布效忠于总统,但副总统以及尼古拉斯·布拉沃(刚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和其他许多人加入了起义中。因此格雷罗被迫辞职,回到他在南部的大本营。1830年,他与自己在独立战争中的战友胡安·阿尔瓦雷斯一道组建了反布斯塔曼特的游击队。但在1831年1月,他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阿卡普尔科被抓获,最后被中央政府下令处决。

布斯塔曼特在1829年末就任总统,并立即对保守派政治家卢卡斯·阿拉曼在内阁中委以重任。像历届军人总统一样,布斯塔曼特依赖于文职领导人来推行政策,努力应付资金的短缺,寻找手段来偿还墨西哥的外债。阿拉曼非常反感由约克仪礼派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政治乱局。他反对新闻报纸和小册子随意传播小道消息,反对各州吝啬地牢牢维护自身权利的措施。他推崇18世纪末波旁王朝的总督管理体制,特别是他们的有序管理和开明专制体制。在阿拉曼的带领下,布斯塔曼特政府整肃了州议会、各州州长和反对派分子。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些目标,政府派出前保王党指挥官解散了萨卡特卡斯和尤卡坦等一向支持激进联邦主义者的地区的民兵组织。

尽管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中央政府的高压政策招来了各州和地区的不满。在1832年初,一些州政府开始重新弱化中央政府政策。激进的萨卡特卡斯州的议长巴伦丁·戈麦斯·德法里亚斯(Valentin Gómez de Farias)上交请愿书,要求总统布斯塔曼特更换内阁。哈利斯科州和塔毛利帕斯州对此表示支持。在韦拉克鲁斯州,圣安纳在这个高墙环护的港口城市建立了指挥部,恶劣的天气、黄热病和疟疾的横行更让这里变得固若金汤。圣安纳将海关税收所得全部没收,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虽然中央政府军在正面战场上击败了韦

拉克鲁斯叛军，但他们并没有进攻这个港口城市。圣安纳这个游击专家在自己地盘上展开了游击队袭击活动并用散播黄热病的方法来对付那些来自内陆高地的士兵们。早在政府军队撤出热带低地前，其他许多州发生的内战和它们对圣安纳的声援使布斯塔曼特政权岌岌可危。面对此起彼伏的起义，虽然联邦军队在一系列血腥的战役中取得了对各州民兵武装的胜利，到 12 月份，政府被迫投降。在充满讽刺意味的和平协议中，从流亡中返回的戈麦斯·佩德拉萨拿回了他在 1828 年输给格雷罗的总统职位。圣安纳与他昔日的敌人戈麦斯·佩德拉萨一同进入墨西哥城宣布胜利。洛伦索·德萨瓦拉和其他激进分子要求对参与谋杀格雷罗的包括阿拉曼在内的布斯塔曼特的内阁成员进行严厉的惩罚，但没有得到回应。

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墨西哥人在两条宽泛的治理之路——联邦制和集权制间苦苦挣扎，这两种体制的某些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截然不同，互相抵触。许多联邦党人试图去寻求本州的自主权，但他们也承认过分的离心力可能导致尤卡坦、科阿韦拉、得克萨斯、萨卡特卡斯、哈利斯科和瓦哈卡这些州要么走向分裂，要么采取激进的分散管理形式。过于激进的联邦主义可能会使中央政府过于虚弱，整个国家四分五裂。韦拉克鲁斯州的圣安纳，格雷罗州（1849 年从墨西哥州分出来）的胡安·阿尔瓦雷斯和许多其他前保王党和起义军政客都试图去保护所辖区人民的利益，恢复经济的健康，刺激农业、畜牧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受区域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一些区域领导人试图通过关税来保护本地区纺织业生产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而另一些区域则主张自由贸易。

虽然许多墨西哥人视极端中央集权制为恢复西班牙统治的一场阴谋，但各州都出现了对因市镇自治议会过于强大导致的极端狭隘地方主义的抵制。拥有 1 000 人以上人口的小城镇用它们的权力来抵御税收和来自周围大城市、省会和墨西哥城中央政府努力的渗透。当地官员阻止法律的执行并随时防止来自其他区域的精英分子、商人和矿工对其利益的侵犯。在某些情况下，是当地人民导致政府行政失败，阻碍

经济复苏，扣留急需的税金。在独立时期形成的势力继续开展乡村动员，武装抵抗，并在墨西哥的周边地区进行着分离主义运动。



墨西哥南部的考迪罗统治着今天的格雷罗州一带。胡安·阿尔瓦雷斯站在爱国者的一方参加了独立战争，直到19世纪50年代，一直致力于自由主义事业。他成为最终推翻圣安纳使自由主义者得以当权的阿尤特拉革命的导师。阿尔瓦雷斯曾短期出任总统，并把墨西哥带入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兴盛期。

那些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行政辖区常常渴望更有序的政治经济系统能重建。有时温和的联邦主义者与集权派的利益相吻合，他们一致认为，下放过多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许多领导人将经济困境、政局不稳和国家过弱归咎于1824年宪法的明显不足，并建议用一个减少区域权力的国家章程来取代它。根据中央集权的1836年宪法（“七部法令”）和1843年宪法（“基本组织法”）的规定，各州失去了权力，成为国家的行政区划。正如所料，包括像格雷罗地区的村民在内的更激进的联邦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于区域自主权的一次沉重打击，是绝对的专制暴政。

329

加剧中央集权化倾向的事实是：1847年前的19个军区将军中有13人是前保王党人，只有6人是起义者；20个准将中，有16人为保王党人，只有4名是起义者。圣安纳、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何塞·华金·埃雷拉和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萨等许多前保王党人

都曾任总统，其他人则担任过代理行政首脑、有影响力的内阁部长、各州和各部门的长官或政坛要人。即使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服役的年轻将领，那些取得极大成功的往往都出自城市，而他们的家族往往是曾站在保王派的一边而反对起义的。许多在18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在19世纪中期仍活跃在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在地位显赫的这一小群前叛乱分子中，瓜达卢佩·维多利亚、比森特·格雷罗、尼古拉斯·布拉沃、何塞·玛丽亚·托尔内尔-门迪比尔和更激进的胡安·阿尔瓦雷斯支持温和的联邦制，而其他人则成为中央集权主义者。作为总统、内阁部长、地区指挥官，甚至是对地区效忠的前叛乱分子都试图找到维持国家统一的方法。 330

在1833年的全国选举中，国会选举了坦皮科的英雄圣安纳将军担任总统一职。巴伦廷·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担任副总统。在广泛的自由派联盟支持下赢得选举后，圣安纳对担任行政首脑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只在首都做了短暂的停留，便称病回他位于韦拉克鲁斯的哈门·德科拉沃庄园而放弃了墨西哥城。这样的举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还将一而再地上演。

副总统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接替其职。在何塞·玛丽亚·路易斯·穆拉等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下推出了第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在墨西哥城以及各州首府，政府解除了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官员的职务，没收教会财产，剥夺教会特权，拿出部分属于老社会精英的地产重新分配，使教育世俗化并讨论立法将西班牙人一概加以驱逐。教会是改革针对的一大对象，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政府要求控制牧师的委任权，取消公民交付什一税的义务，消除了强加给修士和修女们的效忠教会的誓言，并废除了教会地产和财富的限定继承权。戈麦斯·德法里亚斯还试着减少常规军队的规模，撤销军队豁免权。保守派用散发小册子和报纸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不满，他们在这些公共读物中说这些激进分子是一群危险的革命者，是恶魔的化身。在这些报道的煽动下，四处谣传政府正策划着压制寺庙和修道院，没收他们的财富，并将教堂建筑变成马厩、舞厅和剧院。阿拉曼描述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时，

说他像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一样对局势失去了控制。

这场激进的自由主义规划招致了教士、军队和精英阶层的一致反对。许多代表团前往门哈·德科拉沃要求停止这场激进的改革，1834年4月，圣安纳返回首都。他认为自由派打破了国家平衡，内战有可能会爆发，因而现任总统要担负起责任。他封锁国会让这个立法机构保持沉默，纠正激进的法律，遣返流亡者，并将包括戈麦斯·德法里亚斯在内的自由派领导者放逐海外。圣安纳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1824年宪法不能治理好国家，开始寻求新的办法。1835年1月，新一届国会上任。其成员包括中央集权主义者和温和的联邦主义者。这些人中有很多神职人员和军官是圣安纳的信徒，是总统个人的狂热支持者。这届国会撕毁了联邦主义的自由主义法律，并接受圣安纳的看法，认为散漫的地方民兵是毫无能力的，且长此以往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重申了起源于18世纪的正规军的优势，圣安纳通过立法在墨西哥建立了一支正规军队。年轻人对于服兵役的反感使得任何形式的征兵草案都不得人心。潜逃成为那些不能躲避征兵的人的选择。

331



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是早期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坚持联邦主义（即各州行使大部分主权，而不是主要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反教权主义和让墨西哥男性享有普选权。他的部分思想在贝尼托·华雷斯改革时期得到施行。

圣安纳再次以生病为由暂时退隐，重回他位于韦拉克鲁斯的庄园。但是支持联邦主义的各州拒绝投降，联邦主义者的核心人物胡安·阿尔瓦雷斯组织游击队并宣告起义反对圣安纳，声称总统已经用独裁统治取代了联邦制。在瓦哈卡州和其他州，1824 年宪法的支持者们谴责中央集权制并打算进行军事暴动。萨卡特卡斯州州长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动员民兵，命令他们修建防御工事。米格尔·巴拉甘政府不得不重新召回圣安纳，让其领导远征军来镇压联邦主义者。圣安纳的军队击败了装备落后、未受过多少训练的萨卡特卡斯民兵队伍，双方伤亡都很少。他的部队对所经城市进行洗劫，攻击民众，破坏商业设施，破坏外商矿业投资者的财产。圣安纳率军从阿瓜斯卡连特斯、瓜达拉哈拉、莫雷利亚和克雷塔罗一路凯旋归来。在他返回首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再一次被列在为国家服务的英雄之列。圣安纳的支持者们对他大肆吹捧，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活动包括为其胜利特别准备的音乐演奏和照亮整个广场的烟火表演。

332

至此，圣安纳认为用中央集权制来结束混乱是完全必要的手段，地区暴动只能阻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许多圣安纳主义者认为各州民兵、激进的自由主义派系和支持危险的民众运动的政客都是国家进步的障碍。截至 1835 年底，传统的精英、上层神职人员、保王党和殖民者后代的高级军官开始采取行动在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七部法律”用州长和州委员会的中央政权委任制来削弱原由选举产生的州长和立法机构的自治州的权力。总统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任期为八年，政府各部为其咨询部门。为了避免纠纷，不设立副总统一职。此外，许多独断的小城镇政府失去原来的地位，中央集权主义者把权力返还给了那些在独立前统辖周边地区的稍大一点的城镇。限制年收入少于 100 比索的人的选举权，中央集权主义者认为这样将消除联邦主义和激进民主的很多弊端。

对于圣安纳和中央集权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联邦主义者在墨西哥中心内部的暂时性失利并未扩大到它的外围地区。1836 年 2 月，圣安纳率军北上长途跋涉远征得克萨斯，那里主张采用奴隶制的英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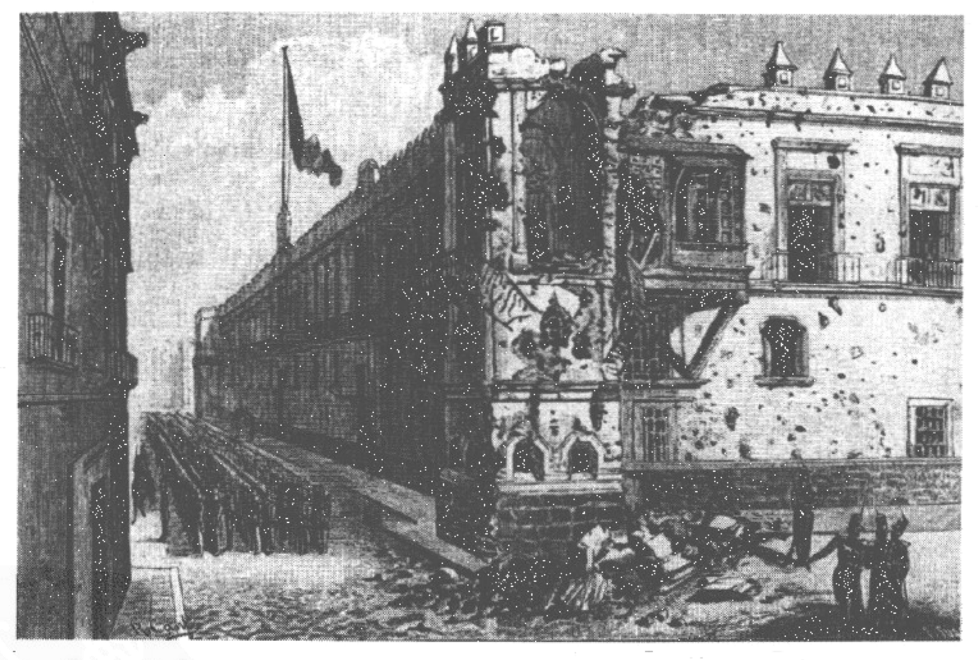
洲拓殖者利用墨西哥的骚乱趁机宣布独立。1836 年 3 月,圣安纳在圣安东尼奥占领阿拉莫,但在圣哈辛托战役中却遭遇惨败。随着圣安纳被得克萨斯人俘获,并因接受得克萨斯独立而名誉扫地,保守派选择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将军作为他的继任者。1837 年,圣安纳在访问完华盛顿后回到墨西哥,退隐门哈·德科拉沃,此时的他显然已不再受这个曾给予他无数荣誉的国家的欢迎了,但他的支持者们拒绝认为他应该对得克萨斯的惨败负责。国家的持续动荡和国家破产的威胁使得布斯塔曼特不得不不停地在借贷问题上与教会进行谈判并且努力寻求新的方法来筹集资金。在许多地区,小规模的反对集权主义和新宪法的联邦主义者暴动打击着中央集权主义者巩固统治的努力。布斯塔曼特在这样的背景下动摇了,甚至似乎倾向于帮助联邦主义者恢复 1824 年宪法。

333

整个墨西哥被危机所困扰着,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笼罩在墨西哥的上空,墨西哥领导人已经在如何将这个国家从混乱中拉出来的问题上变得束手无策。接着,在 1838 年 3 月,法国海军舰队封锁了韦拉克鲁斯。法国要求墨西哥政府支付在墨西哥的法国居民自独立以来所遭受的经济财产损失,其中包括一名糕点师的赔偿要求,因而这场战争有着一个蹩脚的名字——糕点战争(Pastry War)。谈判失败后,法国军舰轰炸了圣胡安-德乌卢阿堡垒和韦拉克鲁斯城。就在墨西哥方指挥官坚持不住就要投降时,圣安纳临危受命,12 月 5 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对城市进行突袭,圣安纳成功对正向船队撤退的法军实施了阻击,迅速地恢复了他的个人声望。一枚从法国大炮发射的散弹冲击波将几名墨西哥士兵当场炸死,圣安纳的坐骑被击中,他的左腿和胳膊同时负伤。外科医生不得不决定将他严重受伤的腿从膝盖以下进行截肢。圣安纳因此口述了一封写给全体墨西哥人民的告别书。但他不久后痊愈,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墨西哥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他的断肢被埋在门哈·德科拉沃庄园里,并于 1842 年被挖出后在墨西哥城纪念碑前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仪式。圣安纳的敌人戏称其为"跛子",历史学家对愤怒的暴民在 1844 年将其断肢拉到街上这件事一直津津乐道。

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墨西哥似乎与刚刚独立时没什么区别，政府系统没有成形，社会契约也没有将不同地区的人民变得更团结。而得克萨斯将可能并入美国这一事件只是全国民众关注的大事之一。1839年，尤卡坦的精英集团废黜了中央集权政府并切断了所有与墨西哥的联系，直到1842年来自墨西哥的远征军抵达收回半岛前，这个地方俨然成为了该国在遥远的东南领域的“得克萨斯第二”。在统治尤卡坦时期，自由派将农民社区控制的土地私有化，此事件成为了种族战争（1847－1854）中暴力冲突的导火线。格雷罗州的农民们在胡安·阿尔瓦雷斯的带领下奋起反抗中央集权统治。土地争端、高昂的税收和对选举权的限制，以及撤销地方市镇政府导致游击战争死灰复燃，叛乱贯穿了整个19世纪40年代。虽然农民思想难以界定，但是很明显，村民们把对自主权的要求与更广泛的联邦主义运动和1824年宪法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频繁的起义和暴动表明，没有哪届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恢复和平。

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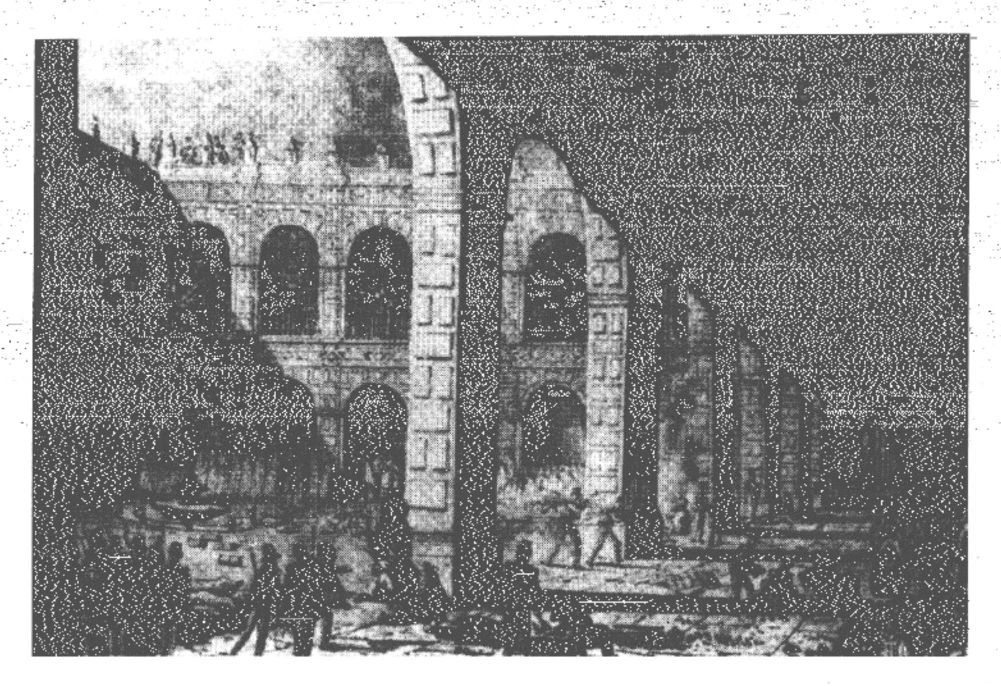
美国军队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率领下进入墨西哥城。斯科特的部队在塞罗格尔多和莫利纳·德尔雷伊击败墨西哥军队后，一直占据着墨西哥的首都，直到和平谈判进行并缔约。

1840年夏天，暴动从各地区蔓延到墨西哥城，联邦主义者在戈麦斯·德法里亚斯和何塞·乌雷亚将军（因在坦皮科发起联邦主义起义而被关进首都监狱）领导下推翻了布斯塔曼特政权。发生在市区的炮击和枪战造成大量平民和军事人员的伤亡。联邦党人攻陷了国家宫，暂时拘捕了总统布斯塔曼特并要求恢复1824年宪法。西班牙大使夫人弗朗西斯·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目睹了这场战斗并报道说："所有的街道都布满了大炮，大炮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所有沿街的人站在阳台上，或三五成群地站在门前或屋顶上，焦急地朝宫殿方向望去，事态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座城市被轰炸持续了12天，摧毁了包括国家宫在内的许多公共建筑和民房。犯罪团伙利用这时的混乱状态趁机掠夺财产，抢劫街上的行人。富裕阶层认为这些可怕的社会革命和暴力冲突都是自由主义者惹的祸。在急于找到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一些保守派认为君主制、独裁制，或两种制度的混合体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

19世纪40年代的情形反映了墨西哥社会深层的分裂状态。各地区持续不断的骚乱和起义破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军队在得克萨斯战役中，在韦拉克鲁斯对法国的战役中颜面扫地，盲目的战斗几乎摧毁了萨卡特卡斯州和墨西哥城，这些都让年轻人感到恐惧和害怕。边境线告急：得克萨斯州和尤卡坦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外国军队对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侵犯也越来越频繁。圣安纳在1841年再次成为临时总统。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几近独裁的控制是实现这个民族和平的关键。1842年，军队出面干预，驱逐了自由主义国会，从而为1843年修订1836年宪法而成的"基础组织法"铺平了道路，以加强总统集权统治。选民的财产和收入条件大幅提高，以确保保守派和中央集权主义者能够掌权。

335

在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教会强制借贷后，圣安纳再一次以生病为由返回他在韦拉克鲁斯的庄园。有消息称，美国计划吸收得克萨斯成为其联邦成员，这个几乎破产的国家不得不再次努力提高征兵部队人数并开始新一轮的税收。这一次，圣安纳缺少足够的支持和声誉来保住总统之位。1844年12月，何塞·华金·德埃雷拉将军在墨西哥城和



在独立战争期间，军队正在为保卫国家宫做准备。庭院中在进行的种种活动的场面极大地展现了革命岁月中的武器装备、制服和各种准备工作的情况。

其他中心城市的暴动配合下发动政变。暴动人员拆毁了圣安纳的画像和塑像，在首都，他们闯进装有其截肢的陵墓。圣安纳试图进行抵抗，但是他的部队遗弃了他，并将他投入哈拉帕的监狱里。1845 年，埃雷拉政权判决圣安纳终生流放，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的虎视眈眈的威胁。

对于现代历史学家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圣安纳一直是个谜。他狡猾、虚伪，可能很腐败，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吸引着像卢卡斯·阿拉曼这样的精英分子为他效忠。他和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是一个军事领导人和区域政治领袖的结合体，能让韦拉克鲁斯人狂热效忠于他。他不是一个在首都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的独裁者，相反，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田园生活。由于墨西哥政治冲突不断，他自我野心的膨胀和长寿，圣安纳被他的许多敌人所痛恨。圣安纳因丧失得克萨斯，和在与美国的交战中几乎损失一大半领土，以及他无法控制这个混乱的国家而备受指责。他从保王派到君主制主义者、

336

自由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中央集权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再到独裁主义者的一系列转变激怒了许多理念至上者。可是，尽管经历了这种种转变，他仍在混乱的时局中和胜败交替带来的荣辱之中，以及一时期对国家造成的混乱中，始终拥有民心和权力，这让一些现代的墨西哥人对其前辈价值判断力表示质疑。尽管圣安纳在某些方面像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流氓，但他同时也是一名爱国者，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时代缩影。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在 1845 年的耻辱后并没有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随后的改革动荡，以及法国的干预让他一直与这些事情纠缠不清。

墨西哥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主体部分可追溯至 18 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强化时期，教会与此息息相关。在独立后的头几年，神职人员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像前保王党人和起义军指挥官成为了国家军事政要一样，高级主教也参与掌权，推动了对这个新国家理念的架构，例如普埃布拉大教堂牧师会的执事是国会议员兼国家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虽然对一些高级神职人员有一些限制，但在 1824 年宪法和大多数州宪法中是允许副牧师和教区神父为政府工作的。这些禁令主要针对的是教会修士。尤其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央集权者掌权时期，教士政客们在保护教会的利益，反对自由主义关于减少教会财富的提案和攻击教会特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何塞·玛丽亚·路易斯·穆拉是一个例外。作为神职人员的他同时是一名伟大的学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建议戈麦斯·德法里亚斯取消什一税，将教会从对墨西哥的青年教育中分离出来。他赞成有产农民理论，指责大地产制，反对社区土地公有制。虽然激进的措施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才被采纳，但许多自由派改革者已经开始相信，国家要繁荣，教会、军队和土著村社就必须丧失作为社团的权利。不同区域间差异明显的现实状况，一个阶层怕被另一阶层控制的恐惧，个人控制国家的过份野心，使得这个国家的建设与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碰撞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337 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墨西哥仓促上阵保卫其领土。它的经济处在崩溃边缘，军队缺乏战斗力，许多公民对保卫国土这件事既不情愿也不

理解。但积极的方面是，通过曲折的最初几十年时期，墨西哥成功制定了未来基本问题的框架。如果在它的北部没有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刚从西班牙继承来大片土地的国家，墨西哥本是有可能避免丧失领土和遭受其他一些灾害的。但是作为邻居的美国不容置疑地存在着，冲突在所难免。1846 年，圣安纳从“终生流放”中归来，用他的英雄主义风格领导着这个国家，但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前方仍然是不可预知的未来。

第十一章　与美国的战争与和平

何塞菲娜·索拉伊达·巴斯克斯
(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

339　美国军队于 1846 年 5 月向墨西哥发起进攻,并于 1847 年 9 月攻陷了其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被美军全面占领,不得不于 1848 年 2 月与美军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在条约中将大块领土割让给美国。墨西哥的战败标志着 18 世纪支撑整个新西班牙繁荣的宏伟梦想的破碎。要解释这次战败,最好把争取独立时的英属十三块殖民地和同一时期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做个对比。对母国来说,这几块英属北美殖民地远没有西印度群岛重要,而新西班牙则被认为是西班牙王冠上的宝石,地位十分重要。新西班牙由采矿业发展起来的相关经济链条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对金融行业、贸易和欧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银成为新西班牙融入大西洋世界的关键。1804 - 1815 年间拿破仑战争的主要竞争对手们发现了墨西哥白银的重要性,这进一步加大了新西班牙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然而,欧洲各国对墨西哥白银的强烈贪欲却让这块独立后的殖民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这两个美洲国家的情况却发生了逆转——一个是经济很不景气,社会动荡不断的墨西哥,一个是充满活力的美利坚合众国,有能力控制墨西哥北部的大面积领土。这种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呢?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以《巴黎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这个条约对尚未独立的美国和新西班牙都影响深远。无论是战争的胜利者大英帝国还是战败者法国和西班牙都面临着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国家疲倦、趋于崩溃问题。这三个国家都不约而同地用新的财政政策和行政改革来促进国家现代化，期望能够因此化解危机。但这些新措施也导致了局势动荡，为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提供了温床。新西班牙与母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些延缓了它希望脱离母国独立的意愿。

340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独立的呼声在这十三块英属殖民地不断高涨，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框架下，他们的斗争唤起了许多欧洲人的同情和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劲敌们纷纷结成联盟来挑战这个战胜国的权威，法国更是出面支持美国独立。西班牙虽未签约表态，但也乐得在削弱英国实力上出一份力，支持斗争。这个宝贵的联盟孤立了当时正由于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而引发内阁危机的英国。因此美国人用较少的伤亡为代价迅速获得独立。英国不得不在1783年承认了这块其前殖民地独立的事实，并认可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独立成员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都颇有政治经验，纷纷表示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另一件事的发生也对美国有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这场波及整个欧洲的革命给了刚刚独立的美国以喘息的时间，让它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自行决定政府模式，用中立的方式来发展自身经济贸易，并于1803年从法国那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还迫使西班牙在1819年放弃对佛罗里达的所有权。佛罗里达的转让清晰地划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和新西班牙之间的边界。因此，当墨西哥正在为自己的独立运动努力奋斗长达11年(1810－1821)之时，美国正享受着人口和领土的双倍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发展。

它的南方邻国就没那么幸运了。王室通过1765－1804年的波旁改革来榨取新西班牙的财富，将殖民地的统治和经济视为填补自己的欧战军费开支和由此产生的银行亏空的必要经费来源。这些改革措施瓦解了发展完善的旧殖民地结构，以便将从前关系疏远的庞大帝国的各项市场纳入其中。这些改革导致新西班牙的省内贸易开始损害墨西

哥城强大的商业行会的利益，从而令地方的精英阶层同首都的精英阶层产生了经济利益方面的分歧。此外，波旁改革削弱了在此前超过25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的机构——教会。

这场改革同时试图加强新西班牙与西太平洋世界的联系，由此加强王权的统治。1808年西班牙发生危机前夕，王室对殖民地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监政官辖区，由王室委派官员管理。这导致殖民地高层管理人员间关系紧张。新财政措施以及自愿和强加的债务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情绪。1804年征收教堂流动资金的王室综合券的发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将教堂资金当做银行资金周转的商人阶级，更是对此异常地愤怒和不满。由此导致新西班牙在19世纪初资本被剥夺一空，陷入破产境地。

341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王室于1808年发生更迭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新西班牙合法地获得自治权。但加布里埃尔·德赫尔莫在9月15日发动政变，总督被捕入狱，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对于母国的重要性、缺少外部盟友和深深的社会裂痕导致墨西哥独立运动演变成一系列持续的暴力争斗。到1821年，这一地区的人们已被混乱的局面拖得筋疲力尽，西班牙王室威信不再，独立更是由先前一直相互打打杀杀的起义军和保皇党人双方最后达成联盟换得。

墨西哥帝国在新西班牙的最后一任西班牙政府认可下成立。但母国拒绝接受这一独立的事实，这给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1783－1824)带来了机会，他在1822至1823年间成为墨西哥的皇帝。在经过长时间的争斗后，缺少资源、国际社会认可和政治经验墨西哥社会，上下一片狼藉。1823年，促成其独立的联盟解散，墨西哥又成为牺牲品。

帝国的瓦解更是将墨西哥推向了丧失领土完整的边缘。虽然联邦共和政府的成立最后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但遗留下来的地区主义问题使得1824年的宪法包含了一种激进的联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弱小的国家政府在财政上依赖于各州的势力，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面对前方的大挑战。

它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无序的经济运行，种族对立，在独立战争

中大量劳动力丧失等等，预示着这个国家已趋于崩溃。新政府在外交上确实取得一些胜利，如在1824年获得了英国的承认，一年后，将西班牙殖民者驱逐出韦拉克鲁斯。然而墨西哥经济上还是需要靠向英国借两笔债来启动经济增长。墨西哥无力履行苛刻的银行条款，整个国家因此丧失了信用，政府难以维持正常运转。

同时，1824年宪法授予立法机关过大的权力，损害了各州和司法部门的权力。选举制度过于民主化，与当时常见的体系一样，没有文化水平和交税额度的限制，只按年龄，这一举措导致大量的选民涌入选举活动中，最终成为煽动行为和党派之争的帮凶。这更阻碍了1828年总统换届选举的和平进行，导致军队的介入。这一套制度因此信誉全无，1835年，大部分政客提出改变选举模式。

西班牙自从于1763年从法国那里获得路易斯安那后，就放宽了反对外来移民的禁令。由于迫切需要殖民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北部的这块土地，西班牙王室于1786年允许法裔加拿大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甚至是英裔美国托利党人、普鲁士人和荷兰人来这里定居，1800年，拿破仑·波拿巴强迫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还给法国。然而，在1803年，随着托马斯·杰弗逊扩张主义政策的推行，美国买下了西属路易斯安那，并宣称这项买卖包括得克萨斯在内。西班牙给予的回应是关掉该地区的边界线，但独立战争一开始，许多英裔美国佣兵就穿越了被封锁的边境线。最终西班牙殖民得克萨斯的努力宣告失败，这里始终人烟稀少。西班牙1810－1814年加的斯议会中的新西班牙代表米格尔·拉莫斯·阿里斯佩在其报告中强调建立居民区和一个港口，并让它们脱离军事政府管制。 342

尽管1819年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Adams-Onís Treaty)对新西班牙边界进行了明确的划定，但美国在北部的扩张趋势日趋明显，刺激着新一轮的殖民竞赛。西班牙再一次允许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移居得克萨斯。这一裁定促使居住在密苏里，因此原来是西班牙王室臣民的摩西·奥斯汀(1761－1821)请求获得特许状，与300个家庭一同迁居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德贝哈尔镇(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的镇议会因为担心受到来自印第安人的袭击，完全支持

奥斯汀 1819 年的建议。最后总督安东尼·玛丽亚·德马丁内斯(1760—1823)不得不将请愿书送至内地诸省司令官手里。

华金·德阿雷东多司令官(Joaquin de Arredondo, 1778—1837)在与州议会协商后于 1821 年 1 月 17 日同意了此项要求。摩西·奥斯汀死后,他的儿子斯蒂芬(1793—1836)充分利用了这份协定。他与第一批 16 名殖民者于 8 月 12 日进入圣安东尼奥。地方长官对奥斯汀的计划给予认可并给予每名殖民者 640 亩(称为一个区)的土地,但同时也要求这 300 个家庭必须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罗马天主教徒,声誉良好,并宣誓遵守西班牙王室所颁宪法,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其唯一指定信仰。这一条件为此后的宗教抗议和 1835 年取消联邦制埋下了伏笔,因为奥斯汀和他的殖民者们在极权主义制下发下了相同的誓言。



在他的拓殖地内,斯蒂芬·奥斯汀一直努力遵守他与墨西哥政府签订的合同,但其他许多拓殖者和从美国新来的人则忽视墨西哥的法律和习俗。

1821 年 6 月 28 日,西班牙议会出台了一项殖民地法令,这项法令后来在 1824 年被墨西哥本土的一部法令所取代。殖民者们再次宣誓遵守这部新法。其中第二十八条法规规定:禁止引入奴隶制并宣布所有已经被带入西班牙领土的奴隶可获得人身自由。曾住在路易斯安那的斯蒂芬·奥斯汀认为得克萨斯州仍由法国体制管理,所以他仍然允许输入奴隶。

在考察好宜居的土地后,奥斯汀出发去往路易斯安那,并于 1822 年初带着一些家庭重返得

克萨斯州。考虑到独立运动已取得的成功，马丁内斯司令官建议他让在墨西哥城成立的新一届政府重新认可他的特许状。奥斯汀在4月末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遇见了包括本杰明·米拉姆、詹姆斯·威尔金森、何塞·特雷斯帕拉西奥斯、约翰·奥斯汀在内的很多其他前来申请者。但斯蒂芬·奥斯汀与这些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他之前已获特许状、他的教育背景、他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和提高得克萨斯州地位的计划。

343

首届墨西哥国会的殖民委员会仅仅接下了这些请愿书并于1822年8月出台了一项法律草案：所有的申请者仅限于墨西哥人、士兵、得克萨斯州游牧部落，且特许状仅颁发给天主教徒。禁止对奴隶交易，并给予14岁以上的奴隶子女以自由。到1823年1月，国家新立法机关在取代了原有国会后，批准了新法，并于3月10日认可了奥斯汀之前拿到的特许状，而且明令只颁发给天主教徒。

1823年3月，帝国的瓦解使得斯蒂芬·奥斯汀需要得到新的官方许可来保护他的权利。他的共济会会员资格在这时给他帮了大忙，所以在其他的请求者不得不要等到1825年在萨尔蒂约(Saltillo)而不是首都墨西哥城进行谈判协商时，奥斯汀和一位叫马丁·德莱昂的墨西哥人的请求已经获得了批准。这件事也第一次充分证明了奥斯汀的优势。

344



科阿韦拉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宪法规定，罗马天主教是本州唯一的官方宗教。另一条款则明确指出，在该州，没有天生的奴隶，而且在本法颁布的六个月内，不得进口奴隶。一些从美国来的拓殖者还是一如往常地忽略了这部宪法中这两条规定。

得克萨斯在1824年曾试图独立建国，但过少的人口数量使其只能做出一项选择：要么成为墨西哥联邦的一部分，要么成为科阿韦拉州的一部分。最后墨西哥的国会接受了得克萨斯的第二个选择。但得克萨斯人很快

发现这项决定带来的坏处：它永远失去了在帝国时期享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得克萨斯成了科阿韦拉的一个区，由州长对各个市议会及该地区的长官进行统一管理。军事上，科阿韦拉、得克萨斯、新莱昂和塔毛利帕斯属同一个防务区。

不幸的是，1824 年的制宪国会并没有完全废除奴隶制，这为未来留下了隐患。国会对于是否要找当地一个名为贾里德·格罗斯的富人商讨废除奴隶制这件事上迟迟未做出决定。此人在得克萨斯拥有 100 名奴隶，废除奴隶制的政策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国会议员们很难就自由权是否高于财产权做出决定，所以就将这项废除法案一直搁置着。他们此后将为在这件事上的优柔寡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对于墨西哥来说，达到美国那样的物质文明水平简直是天方夜谭。内务部长卢卡斯·阿拉曼坚持认为闲置地也是属于国家的，应该归联邦政府所有。然而国会却在 1824 年 8 月 24 日通过的法律中将这一管理权分配给了各州政府，联邦政府只获得了边界线一带 20 里格(约 52 英里)和海岸线一带 10 里格(约 26 英里)土地的控制权。这项法律还偏向墨西哥人、“该州边境线一带所有城镇中”过定居生活的土著印第安人，“以及生活在各州境内的游牧部落”。而且这项法律禁止对经授权所得的土地进行买卖，奴隶输入将由现行法令监管(1824 年 7 月 13 日生效的法令禁止输入奴隶)。

345

科阿韦拉州的立法机关迅速在 1825 年 3 月 24 日颁布了殖民法律。奥斯汀积极地为宗教信仰要求进行着游说，期望该规定可以由“天主教信仰”转换成“基督教信仰”，但这部法令改动与否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对土地问题具最高统辖力的 1824 年宪法已将罗马天主教确认为官方唯一指定宗教。虽然反奴隶制的观点占很大优势，但英美裔的申请者们还是成功地使这种呼声仅出现在宪法起草辩论阶段。奥斯汀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促成形成了这一条款：帝国时期输入的奴隶都是从婴儿时期就长在当地的本土仆役，他们并不在法律框架讨论的非洲奴隶范围之内，如果他们中有人被证明是非本土人员，殖民者会将其带出得克萨斯。奥斯汀相信他能够保有这些已经在得克萨斯生活

的奴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保有他们的孩子为奴到 14 岁。他坚决拥护奴隶制度并提出应准许新奴隶的输入直到 1840 年，这代奴隶的孙子年满 25 岁、孙女年满 15 岁的时候将会获得人身自由。

墨西哥的反奴隶制立场并没有阻碍接下来的移民进入，因为美国的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为墨西哥提供的土地平添了许多魅力。奥斯汀 1823 年凭特许权获得的土地就是免费的。科阿韦拉和得克萨斯州只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一块 4 428.4 英亩的牧场只需要 30 比索(此地一般称为大帝牧场)，一块 177.1 英亩的非灌溉土地(tierra de temporal)只要 2.5 比索，而一块同样英亩的灌溉地(tierra de labor)也只需要 3.5 比索(比索在 1895 年前一直和美元等值)就可以拿到。每户移民的户主一般可以获得 4 428.4 英亩牧场和额外一些农田。地主除了要向州缴纳 30 比索的费用，付给为他争取到集体移民特许状的企业家(empresario)60 比索的佣金，和 27 比索的登记注册费外，只需再额外支付少量费用，包括 2 比索的官方文件钱，15 比索给州土地管理委员会，10 比索交给公证员。这样一块土地的总价加起来大概是 117 比索。缴纳给政府的 30 比索在四年内缴清就可以。企业家每带 100 户移民过来，就可获得五块 4 428.4 英亩的牧场。由于美国的土地价格昂贵，而且必须要用现金购买，使得这一殖民地极具吸引力，其人口日益增加，到 1825 年，该地区的拓殖者已经达到了 1 800 人。

早期的拓殖者大多定居在传教区和该地区的驻防部队营地之间，渐渐形成稳固团结的社会军事系统来共同抵抗当地印第安人的攻击。1823 年，得克萨斯当局委任奥斯汀为当地自卫队的中校，授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奥斯汀的权力一直行使到 1827 年州宪法颁布。奥斯汀为每个居民点的镇长起草了职责规范，减轻了自己的部分职责。 346

奥斯汀善于获取各位联邦和州政府官员的青睐，并因此又获得了一些移民指标。1825 年，他赢得了一份 300 个家庭的移民合同；1827 年，他获得移民 600 个家庭到加尔维斯顿湾居住的特权契约；1828 年，又赢得了一份 300 个家庭的特权契约。加尔维斯顿湾特权合约是对奥斯汀镇压 1826 年发生在得克萨斯纳科多奇斯县海顿·爱德华兹的殖

民地中的叛乱有力的答谢。

除了斯蒂芬·奥斯汀、马丁·德莱昂和格林·德维特的殖民契约被承认以外,其他人的契约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无效契约。这些协议往往具有随意性,而且有时候提到的土地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大多数拓殖者是会输入奴隶的非天主教徒。与路易斯安那毗邻的地区由于缺少移民监管体制,非法移民现象严重,大量为躲避法律制裁的人和冒险者涌入这里。

矛盾主要来自于来此的创业者和边界居民之间的利益权力争夺。海顿·爱德华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26 年,他获得了将 800 个家庭安置到纳科多奇斯县的权利,这一行为为将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因为这块土地上已经有墨西哥殖民者存在。爱德华兹,这个典型的随意冒险者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权威,他只是自卫队的负责人,却当自己是官方军队的领导人。他要求墨西哥人出示他们的土地所有证明,操纵选举以使得英美裔人获得纳科多奇斯县的选举胜利。墨西哥人对此失去耐心转而向州立法机关进行申诉,爱德华兹因此失去了他的特许权。尽管奥斯汀试图从中调停,但爱德华兹却想到路易斯安那"卖掉"自己的特许权。他的兄弟本杰明在他外出期间代管殖民地,在这里建起了弗里多尼亚共和国。在本杰明拒绝地方长官关于大赦的提议后,他的叛乱被政府军和奥斯汀的自卫队联合镇压下去。这件事引起了墨西哥政府的注意,使得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生活在得克萨斯的英裔美洲人的潜在威胁性,于是派遣曼努埃尔·米耶尔-特兰将军着手开始边境界限划分事宜。

墨西哥人在与美国的第一次外交接触中就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美国总统门罗直到 1822 年 12 月才承认了墨西哥帝国,但却迟迟没有向墨西哥派遣大使。1825 年,乔尔·波因塞特最终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对他的指令包括购买得克萨斯,将边界移动至格兰德河等,但墨西哥政府坚决认为美国应该尊重 1819 年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波因塞特积极发展与激进的墨西哥国会议员的联系,并通过共济会组织对他们施加影响。他对墨西哥国内政治指手画脚,使他的朋友墨西哥共和国总统比森特·格雷罗不得不在 1829 年要求美

国对其发出召回令。尽管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波因塞特并没有促成与墨西哥达成两国友好贸易协定，因为他坚持要墨西哥方面保证返还逃亡的奴隶。

后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任命得克萨斯的土地投机者安东尼·巴特勒接替波因塞特。巴特勒放弃了返还奴隶的要求，成功达成了一项商业条约。他发起了一项不加区别地收集北美人所有对墨西哥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的活动，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向墨西哥政府施压的好方法。

英裔美洲人对墨西哥的敌意被归因于文化冲突和被假定的军事独裁统治上。虽然两种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人相处起来很不容易，并且墨西哥人确实对给予外国人的特权心生怨恨，但边境地区的生活还是促进了合作，此外，1841 年之前的墨西哥还没有军事专政。东北地区有很多军事指挥官都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像 19 世纪 30 年代两度出任墨西哥总统的安纳斯塔西·布斯塔曼特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拓殖者钦佩的米耶尔-特兰。真正引发冲突的是得克萨斯对科阿韦拉州的依附关系，特别是在 1827 年宪法规定将许多诉讼权利移交给在萨尔蒂约的州政府以后。

得克萨斯人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墨西哥人反奴隶制的态度和海关的建立。海关的建立结束了多年的进口货物免税制。大多数的殖民者都是顽固的奴隶主，反对西班牙传统。这种传统正如汉斯·巴蒂曾评论的那样："所有者……在无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就可解放奴隶。假如被粗鲁地对待，奴隶可以发起合理诉讼要求被卖给另一名主人。"自从州宪法开始对奴隶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这一问题就逐步一点点加深着墨西哥人和殖民者之间的矛盾。1827 年，立法者决定废除此项制度，但不久就遇到瓶颈，因为奥斯汀介入了关于给予奴隶主赔偿金问题的讨论。由于缺乏资金，立法者在 1827 年得克萨斯-科阿韦拉州宪法中放软了立场："本宪法在州内各地区官署公布后，再没有一个人是生而为奴的；六个月后奴隶输入制被无条件废除。"

殖民者很快就开始违抗法律，与进入得克萨斯的奴隶进行谈判并

达成协议。在协议中,奴隶们表示他们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承诺为主人工作是为了偿还他们所欠的债务。奴隶们年满 18 岁后,在奴隶主扣除他们的住宿和饮食费用后可获得一点薪水,这样可以确保他们永久在这里服务。奥斯汀成功地获得了对这项契约的法律认可。1829 年 9 月 15 日,总统比森特·格雷罗颁布了墨西哥奴隶解放法令,尽管得克萨斯对此拥有豁免权,但恐惧还是在英美殖民者中蔓延开来。他们知道,奴隶制在这一地区也终究会消亡。

1829 年 11 月 14 日,米耶尔-特兰的报告抵达墨西哥之前,墨西哥政府对于得克萨斯的实际状况了解并不多。米耶尔-特兰的任务是在三名科学家的陪同下,根据 1819 年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绘制边界线,建立兵营和其他防御措施,提供该地区的基本条件报告。在调查中,墨西哥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差异性大大地震撼了他,他将英美殖民者归为:"贫穷的劳动者,这些人在美国根本买不起土地……这些人都很勤奋,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与那些他在纳科多奇斯县看到的逃犯、小偷形成鲜明对比。米耶尔-特兰建议政府推动墨西哥和欧洲人殖民并在纳科多奇斯设置一名长官以便更密切地管理该地区。

348

假如米耶尔-特兰看到了 1829 年发生的移民浪潮,其中包括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美国有钱人以及一些人怀有合并目的的人,他可能会就此阻止未来这种问题的发生。但当时他不得不放下得克萨斯的相关事务,去坦皮科对抗西班牙远征军重新夺取墨西哥的行动。与此同时,萨姆·休斯敦抵达得克萨斯,他随后写信给他的朋友安德鲁·杰克逊:"我这里有一些信息,我肯定你会感兴趣,并推断出你的一些想法:密切接触得克萨斯并最终收购它。"杰克逊之前已指示巴特勒公使去购买得克萨斯州,巴特勒随后散布谣言说美国获得得克萨斯指日可待。奥斯汀在信件中表示反对这样的转让。

1830 年初,外交部长卢卡斯·阿拉曼在接到米耶尔-特兰的报告后,匆忙地起草了一部殖民法,经国会批准后于 4 月 6 日颁布施行。该法规定殖民进程由联邦政府掌控,由当地行政长官统一管理。以下是其中的两个主要条款:

第 10 条：尊重殖民地的现有状况永不改变，包括现有的奴隶状态，但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应怀着最强的责任感，确保殖民法的推行，及再也不向该地区输入奴隶。

第 11 条：保留 1824 年 8 月 18 日公布的宪法第 7 条的规定：与墨西哥国土接壤的境外地区的外国公民禁止作为殖民者移民到本共和国境内各州或各地。任何殖民合同，若其条款与本法本条相抵触，若尚未执行，则予以取消。

该法规定为移居到得克萨斯的生活贫困的墨西哥家庭提供土地和相关补助支持，委派米耶尔-特兰得克萨斯建立 8 个驻军营地。新的营地以本土名字命名，力图使得克萨斯墨西哥化。这部法律加剧了殖民者的不满，加深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前者失去了对大量尚未测量的土地的控制权之后，这种矛盾更为深化。米耶尔-特兰在 1830 年 6 月 6 日对联邦政府的这项法律做出了评价。他指出：有些条款太过于幼稚，实际效力太低：殖民者会寻找新的方法来抵制关于奴隶制的禁令，例如“制造虚假的奴隶自由证明”。他害怕这种行为将会把英裔美洲人推向“北方美国利益体的怀抱，这件事他们此前还在犹豫不决……我像所有的墨西哥人一样，痛恨奴隶制度，但不希望这种个人的情绪误导了政府的判断，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他认为当下的权宜之计是暂时容忍奴隶的输入现象，以确保棉花贸易的可持续性和通过一部旨在公正管理的法律。这最后一点“是得克萨斯的殖民者所有种种抱怨中最合情理的”。

349

米耶尔-特兰和副总统布斯塔曼特通知了奥斯汀这个即将颁布的法律。虽然墨西哥驻华盛顿公使何塞·玛利亚·托尔内公布了这项禁令，米耶尔-特兰仍然试图尽力确保已经移居得克萨斯的英裔美洲人的利益，要求新奥尔良领事加快为格林·维特和奥斯汀治下的殖民区办理特权许可证的效率。他甚至为奥斯汀延长了许可证时间。

米耶尔-特兰利用仅有的资源动员起得克萨斯的驻军抵御印第安人的攻击，但这一举动并未引起墨西哥殖民地居民的注意，对印第安人

的威慑作用也很有限。他同时撤销了居民不满150人的殖民区。这给10月份带领15个家庭入境的斯特林·罗伯森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和他的伙伴由于缺少官方许可而滞留在边境。他们后被批准进入奥斯汀的殖民区。与此同时，奥斯汀被选举为萨尔蒂约立法机关代表，罗伯森要求奥斯汀帮他的许可契约通过审查，然而就在他到来时，奥斯汀已经获悉，他的许可证已被转给一名名叫加布里埃尔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为了自己和他的商业组织的利益，拒绝交还许可证。

米耶尔-特兰确实成功地弱化了新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但不满情绪仍在积聚，尤其是在一部将劳工合同年限限制在10年以内的新法颁布之后。此外，两个事件——取消擅自占地者获得的权利和1832年海关开始运作——加起来成为第一次公开矛盾爆发的导火线。米耶尔-特兰确实倾向于不顾法律规定的禁区(边境与海岸)对擅自占地者的权利给予承认。虽然1830年的法案中已经规定，土地所有权问题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但州政府仍然坚持在此问题上插上一脚。英裔美洲人、阿纳瓦克(加尔维斯顿)的指挥官大卫·布拉德伯恩上校却阻止他们这么做。他之前已经因严格遵循法条规定，拒绝归还从路易斯安那出逃的两名奴隶而很不得人心。受委托负责处理此事的威廉·特拉维斯没能通过合法的手段解决此问题，扬言要组织一场救援袭击。由于这是发生在布拉德伯恩治下的联邦土地上的一起反政府叛乱行为，布拉德伯恩利用军事法庭将特拉维斯监禁起来，但殖民者起而叛乱，布拉德伯恩不得不选择逃亡。

350 米耶尔-特兰为了更好地促进殖民者之间的交流，委任外国人担任一些政治职务，如，委任前美国公民乔治·费舍尔担任阿纳瓦克海关署长。向多年来施行免税制度的地区征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任命费舍尔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一艘被要求停下来支付关税的北美货船，其船员开枪予以还击，而当地的殖民者也对此表示支持。米耶尔-特兰将费舍尔解雇，但当奥斯汀提出抗议时，忍无可忍的米耶尔-特兰用愤怒的语气回答说：

你从墨西哥政府这里已经捞到这么多……这些好处足以抵消

你们的那些小抱怨……支付关税是得克萨斯所有殖民地居民的义务，墨西哥各地也一样，只有在布拉佐里亚(海关大楼建在此地)确实引起过一定的骚乱……你说得克萨斯的城镇具有诉讼权……因为没有人知道管理得克萨斯城镇的法律受到了侵犯或它们是如何与墨西哥共和国其他地方不同……看看整个美洲东海岸，从哈得孙湾到合恩角。在什么国家，在哪个港口，是可以不缴纳税款贸易的，你在哪里可以找不到海关？

与此同时，1832 年 1 月，圣安纳对布斯塔曼特政府发起叛乱。米耶尔-特兰试图弱化这一事件在其所管辖区域的影响，但以何塞·安东尼奥·梅希亚为首的反政府武装于 6 月 26 日登陆得克萨斯的消息不久就传了开来，绝望的米耶尔-特兰宣布他已经通知了延长奥斯汀殖民区的免税时间，然而，奥斯汀仍然继续抱怨说，墨西哥政府正在用大量的印第安人和暴徒危及得克萨斯的安全。不适、沮丧、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米耶尔-特兰于 7 月 3 日自杀身亡，彻底丧失了墨西哥保有得克萨斯的最后机会。

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梅希亚因纳科多奇斯县的军队的到来而离开得克萨斯，致使边境线陷入脆弱防御状态。在圣费利佩，殖民者签署了一项支持圣安纳的文件，他们利用此文件攻击“布斯塔曼特的军事独裁暴政”和“指挥官米耶尔-特兰的独裁行为”。欧裔美洲人在 10 月召开的集会中要求废除对于美国移民的禁令，要求给予擅自占地者以法律认可，并试图从科阿韦拉分离出去。第二次集会则决定起草得克萨斯州宪法，派遣奥斯汀到墨西哥城寻求批准。在圣安东尼奥市，议会对于殖民者没有遵循墨西哥式表示抗议的方式表示不满，单独起草了文件。

在墨西哥城，圣安纳已经取得了胜利。选举由国会中的激进分子和政府首脑圣安纳、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所掌控。奥斯汀在 7 月 18 日抵达墨西哥城的时机非常不好，因为政府面临着一个让人头疼的烂摊子：军事叛乱、霍乱流行，和对流放所有反对该政权的人的法令的普遍不满。国会收到了与陈情相抵触的报告，并未对得克萨斯的陈情报告

351

立刻作出回应。不耐烦的奥斯汀于10月2日致函圣安东尼奥的市政议会,建议他们着手组建一个州政府而不再空等墨西哥政府的反应。但不久以后,国会同意撤销对英美移民的禁令,并应允了延期缴纳税款的要求。圣安纳向奥斯汀解释说,有关得克萨斯独立的问题在此时提出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会督促科阿韦拉-得克萨斯制订改革方案。

12月,志得意满的奥斯汀离开墨西哥城。但他写给圣安东尼奥市政议会的信已被送交联邦政府,戈麦斯·德法里亚斯对奥斯汀相当恼火,认为他是个叛徒,并下令在萨尔蒂约拘留他。奥斯汀曾冒失地写信给科阿韦拉的政治家们,表示墨西哥最好在"失去得克萨斯之前"将它出售。这些信件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在科阿韦拉-得克萨斯,政府着手进行圣安纳承诺的改革,增加得克萨斯境内市镇议会的数目,在布拉索斯建立一个新部门,在审判中采用陪审团,以英语为法律用语,甚至任命英裔美洲人杰弗逊·钱伯斯为高级法院法官。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担心得克萨斯人对于奥斯汀被拘留的反应,派遣将军胡安·阿尔蒙特(Juan N. Almonte)进驻得克萨斯进行安抚。

奥斯汀被送至墨西哥城进行审判,但后来被圣安纳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但他不得不继续留在首都。在得克萨斯生活了多年后,享受城市生活喜悦的他出版了《向公众介绍得克萨斯诸事》(1835年)一书,在其中他解释说,得克萨斯人只是想从科阿韦拉分离出来。恢复自由身后的奥斯汀取道新奥尔良于1835年7月回到得克萨斯,并发现此地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投机活动猖獗,赞成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呼声占据了主导地位。

1835年,阿纳瓦克海关的恢复再次引发了不满,但这次,国家和州一级在政治上的复杂局面给得克萨斯的分裂主义以可乘之机。在国家方面,激进的联邦主义者由于对反对他们的人毫不宽容,加之又一心想要控制教会而不被信任。(罗马教皇曾授予西班牙王室以特权,特别是提名教会职务候选人的权利,并监督教皇对新大陆所颁谕令的实施。)激进派输掉了1834年的选举,国会和内阁被温和的联邦主义者所掌

握。温和派认为民兵自卫队造成了不稳定的局面,试图削弱它,但一些州认为民兵组织是它们保持自主性的重要保证,因此反对这项措施的执行。尽管新宪法于 3 月 31 日在国民议会获得批准,萨卡特卡斯州和科阿韦拉-得克萨斯州拒绝服从。试图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冲突的联邦政府最终不得不对萨卡特卡斯无视国家政府的行为调动军队进行管制。由于州长和军事指挥官临阵逃跑,因此并没有发生军事对抗,国家军队直接占领了该州首府。

352

在科阿韦拉-得克萨斯州,政治家们彼此间存在着分歧。分别来自萨尔蒂约市和蒙克洛瓦市的两派为夺取州政府管理权争斗不休。这为得克萨斯人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由于担心军队会对科阿韦拉-得克萨斯州进行打击,在蒙克洛瓦的立法机关授权州长将首府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州长因犯下多重违法行为而被监禁,得克萨斯以此作为借口叛乱。当州长逃离监狱抵达得克萨斯时,殖民者却无视他的权威。

在得克萨斯,分离主义者依然占上风。投机倾向使土地承包人阵营发生分裂,殖民者也是观点主张各异。一些人赞成与墨西哥联盟,一些人主张独立,还有一部分人主张与美国合并。特拉维斯属于后一类。吸取州长被监禁的教训,他下令驱逐了残留在得克萨斯的墨西哥军队。得克萨斯西部的居民拒绝跟随特拉维斯,但在纳科多奇斯县,合并论成为主流,地方当局于 1835 年 7 月 8 日成立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开始为合并进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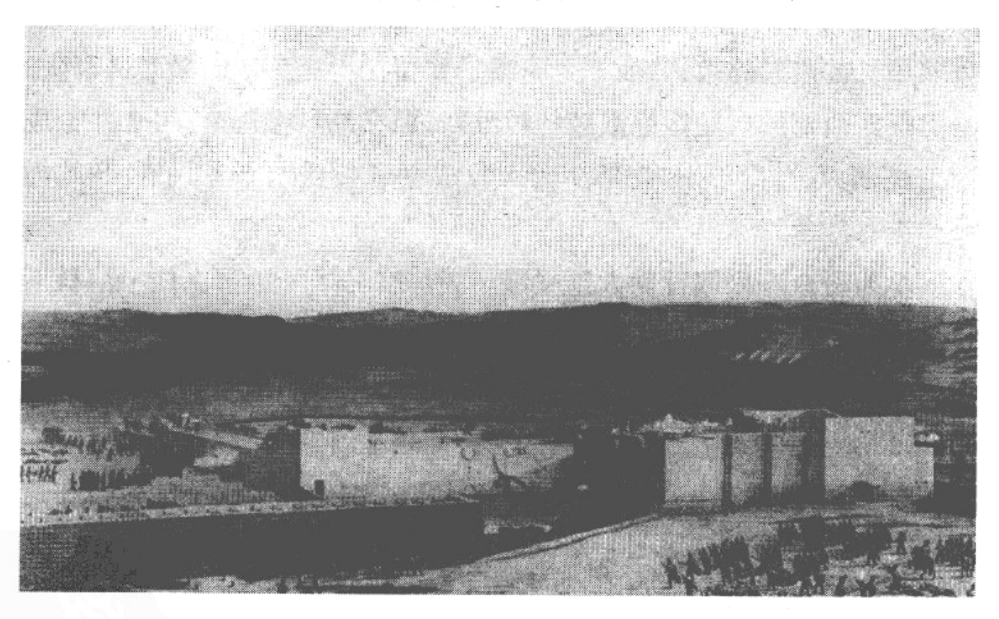
墨西哥政府采取行动太过缓慢。指挥官马丁·珀费克托·德科斯受命为避免激怒得克萨斯人并将部队集中在圣安东尼奥-德贝哈尔。但是他很无能,加上墨西哥将解放奴隶的谣言四起,这激起了得克萨斯人的反感。当奥斯汀表示支持分离,而洛伦索·德萨瓦拉(1788－1836)前来,叛乱行动进一步升级。作为圣安纳的死敌——萨瓦拉在这里颇有些势力。同时美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得克萨斯委员会”热,这些委员会提供志愿者、武器和金钱来换取这块土地的自由。萨姆·休斯敦被安排负责组织这些志愿者,而奥斯汀则负责领导民兵。

在墨西哥首都,得克萨斯事件更坚定了中央集权主义支持者的信

念，他们赞成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政府来控制公共收入并将自治的州变为权力有限的省。他们认为联邦制是导致国家分离的元凶，并主张，只有中央集权制度才能挽回这种分裂的局面。经过长期的犹豫，温和的联邦党人受形势所迫，最终在1835年10月6日同意了转变政治体制的建议。这一变化为得克萨斯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仍召集公民制宪大会，建立临时州政府。他们宣称墨西哥已违背了之前在11月3日与得克萨斯签订的协议。该公民制定大会没有宣布得克萨斯独立，以便不丧失来自激进的联邦主义者的支持，后者认为得克萨斯的目标是与其一致的。

在得克萨斯代表团启程前往美国寻求贷款和支持时，被围困在圣安东尼奥的墨西哥军队于12月14日宣告投降，放弃了他们在阿拉莫的防御工事。这些事件加快了圣安纳的军事远征军前往得克萨斯的步伐，其实这些远征军中很大一部分是未受过训练的士兵。第一拨墨西哥军队在1月进入得克萨斯，紧随其后的是2月份来临的圣安纳的军队。这些部队在3月6日占领了阿拉莫。

353



圣安纳把阿拉莫战役看作是一堂实例课，切实体现了脱离墨西哥联邦要付出的高昂代价。虽然很多民间故事和浪漫主义的逸闻使得战斗的真实经过反倒变得不清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圣安纳做出的不囚禁战俘的决定使自己大受其害。

3月2日，得克萨斯公民制宪大会宣布独立，并选举大卫·伯尼特(David G. Burnet)为总统、洛伦索·德萨瓦拉为副总统。得克萨斯的独立宣言书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仿照了1776年的宣言。它宣称是墨西哥的军事独裁促成了得克萨斯的分离，因为当初墨西哥承诺为定居者提供“共和联邦机制”，以便他们到“该国的荒漠地区”拓殖，但现在它违背了诺言。独立宣言书中列举的墨西哥人对得克萨斯犯下的罪行还包括：不让其独立成州、监禁奥斯汀、审判时不设陪审团、教育体系的欠缺、宗教偏执，以及“政府雇佣间谍煽动野蛮人(印第安人)谋杀当地居民”。上述大多数指控都不能成立，没有承认下列事实：殖民承包商们如何要弄各种诡计从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墨西哥帝国免费获取特许状，他们如何违背了只限移民天主教徒的规定，以及对墨西哥法律的各种破坏和背离。尽管与西班牙传统相背离，但陪审团审判制度其实已经于1834年在科阿韦拉-得克萨斯州被建立，安德里亚斯·雷希称，得克萨斯人所抱怨的问题有90%到1834年时已被解决。得克萨斯的宣言中没有提及奴隶制问题，怕因此得罪美国支持者，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克萨斯的宪法宣布其为合法的：“(得克萨斯)国会不得通过禁止奴隶输入(得克萨斯)共和国的法律……国会也无权释放奴隶，奴隶主也无权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释放奴隶，除非是将这些奴隶转到共和国政府管辖的范围之外。” 354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宣布美国在墨西哥“内”务中保持中立，但他并未强制执行，因为地方官员公开支持得克萨斯人，鱼贯而入的志愿者涌入墨西哥，迫使墨西哥政府发布法令制止这种状况并视这些人为强盗。但这一界定并不能成为施行残暴的统治的借口，圣安纳宣布下令残杀在戈利亚德投降的得克萨斯人，这一行为激怒了许多墨西哥人尤其是殖民者，因为战争法律里规定：“投降者……应该虔诚地按国际法律进行处理。”

失去得克萨斯可能已成定局。墨西哥确实没有一个适合独立自主的好开端。西班牙给它留下了一个经济烂摊子，激进的联邦主义者削弱了政府的统治，使政府无力应对外来的威胁。4月21日，墨西哥军

在圣哈辛托战败，圣安纳被俘。只知道一味接受命令的比森特·弗里索拉遵从被监禁的将军发来的指令，将军队撤退到格兰德河。这实在糟糕透顶，他的行为使得失去得克萨斯已不可避免，因为墨西哥已没有足够的资源再组织一次耗费巨大的远征。

当圣安纳发起对得克萨斯的远征时，墨西哥国会就决定避免在182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因此开始了众所周知的"七部法律"(即1836年宪法)的漫长的草拟过程。该法建立了基于欧洲自由主义的复杂的政府体系。各州制转为各省制，消除了国家和州之间在主权归属上的竞争，这种竞争阻碍了联邦共和国正常行使职能。获得选举权有了财产方面的限制，市镇议会也被限制，但维持了权力分立，各省仍具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设立了政府第四个分支——保护委员会(Conservador)，以监督行政、司法、立法三大分支，保护个人权利不被侵犯。"七部法律"还规定了权利法案，虽然取消了副总统职务，总统的任期被延长至八年，但由于受到保护委员会、国会和国务会议的权力牵制，墨西哥的行政系统仍然十分脆弱。

"七部法律"在1837年1月1日生效。或许是因为对行政机构的限制和平衡有些过分了，七部法律没有发挥效力，并且使政府陷入了瘫痪。人们普遍还把它们与失去得克萨斯、尤卡坦及加利福尼亚的独立运动联系起来。

圣安纳仍旧待在得克萨斯的监狱里，但是休斯敦赢得总统竞选后，美国当局把他接到了华盛顿，然后送他回国。在华盛顿，他见到了杰克逊。杰克逊表达了他要购买上加利福尼亚的想法。圣安纳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墨西哥失去民心，原因是他在1836年签署了《贝拉斯科条约》(Treaty of Velasco)，承认了得克萨斯独立。他决定退出政坛，并直到1838年才重回公众视线之中。当时法国人入侵墨西哥，圣安纳参加了战斗，并失去了一条腿。

355

圣路易斯波托西的联邦主义出现复苏，使得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赢得了总统选举，但他随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缺少资源，墨西哥北部正陷入动荡之中，而且还面临着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威胁。

这两个国家都敦促墨西哥对他们的侨民进行赔偿,包括在动乱中的损失、暴力迫害以及强制贷款。这些抱怨大多毫无根据,或夸大其词。3月,法国下达了最后通牒,但美国正遭受十分严重的经济萧条,他们决定接受普鲁士国王主持的关于墨西哥债务偿还安排的国际仲裁。

法国缺少了继续封锁墨西哥港口的借口,但他们仍将舰队停泊在韦拉克鲁斯。英国是受海上封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它在这座港口城市进行了大型的军事演习,借此迫使法国进行和平谈判。墨西哥不得不举借更多外债来偿还那些不公正的索偿,这刺激了金融投机。

中央集权主义的试验表明其不能解决墨西哥的问题,但是不招人待见的保护委员会阻碍了布斯塔曼特推动"七部法律"改革的努力。1840年,改革进程看上去马上就要开始,首都的联邦主义者却突然起义,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认为中央集权主义已经失败的看法,催生了其他解决方式的提出:军事独裁或者由欧洲王公实行君主制。何塞·玛丽亚·古铁雷斯·德埃斯特拉达在给布斯塔曼特的一封信中提议实行由一位欧洲王公统治的君主制。他的建议引起了巨大的反感,他也因此而流亡。

英国对得克萨斯共和国的承认破坏了布斯塔曼特的政权。墨西哥政治家们确信他们已经失去得克萨斯了,但这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得克萨斯坚持以格兰德河作为西部边境,而此前的边境一直是入海口在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附近的努埃塞斯河(Nueces River),这使得墨西哥对得克萨斯的承认变得更加困难了。1840年,外交部长胡安·德迪奥斯·卡涅多(Juan de Dios Cañedo)与国务会议商讨了这一问题。政府成立一个由卢卡斯·阿拉曼负责的委员会,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委员会建议,如果得克萨斯同意不再兼并更多领土,并且向墨西哥支付赔偿金,就承认其独立,并且让法国和英国为协议提供担保。委员会的提议被泄露了,群情激愤,政府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卡涅多也因此被迫离职。

资金缺乏迫使议会通过了征收15%进口税的法令,用以支付工资。这一措施导致了贸易下滑,引起了不满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在

一批外商的煽动下，一场旨在建立独裁制度的军事运动爆发了。一名356韦拉克鲁斯商人依次拜会了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韦拉克鲁斯的圣安纳、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马里亚诺·帕雷德斯-阿里利亚加(Mariano Paredes y Arrillaga)以及墨西哥城的加夫列尔·巴伦西亚(Gabriel Valencia)。1841年8月8日，帕雷德斯将军起兵反对布斯塔曼特政府，呼吁召开立宪大会并取消进口税。而巴伦西亚和圣安纳都支持帕雷德斯的行动，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墨西哥城会师。在墨西哥城城郊的塔库瓦亚(Tacubaya)，他们终止了宪政。军队接着成立了独裁政权，圣安纳为临时总统，直到立宪大会产生新的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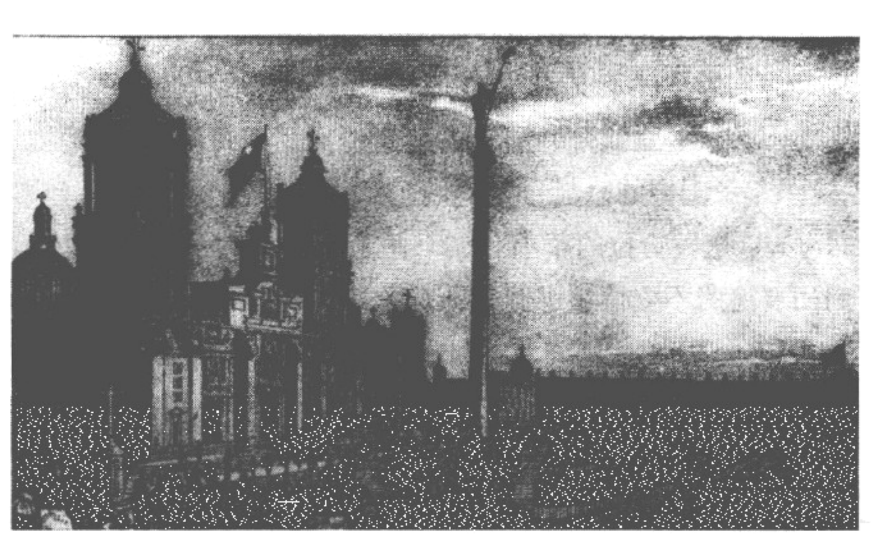
在接二连三地经历了君主制、联邦主义及中央集权主义的失败后，许多人相信，只有独裁才能恢复稳定，解决墨西哥的财政困境。温和派在一开始是支持圣安纳的，但很快他们就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之所以接受独裁，是希望立宪大会可以恢复联邦体制。在这一目标下，他们开始专注于赢得竞选。与此同时，运动的发起者们也得到了实惠：军队地位大大提升，外商享受到了税收减免、置办产业的权利以及矿山开采的优惠政策。独裁政权的蜜月期结束得很快。1842年3月，圣安纳不得不征收新的税种，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人头税，每名市民每年都需缴纳。

军队领导层希望掌控即将展开的选举。联邦主义者赢得了多数选票，从而注定了国会的命运，因为联邦主义不会被独裁者所接受。圣安纳以健康问题为由卸任，并指定尼古拉斯·布拉沃接任总统。不久之后，1842年12月19日，军队组织了针对议会的抗议活动，布拉沃解散了立法机构，并组织了一个“名人委员会”(Council of Notables)起草新宪法。

3名最活跃的议员在通常被称为“基本组织法”的新中央集权主义宪法讨论制订期间被捕入狱。该宪法纠正了“七法全书”中的一些错误，淘汰了专制的保护委员会，增强了行政部门的力量，增加了政府机构中司法部门的分量。该宪法还坚持财政的中央调控，并增加了各省的预算。联邦主义的温和派不赞成这部宪法，但却支持其对独裁政权的法律限制，当1843年6月12日圣安纳宣誓忠于这部宪法时，他们如

释重负。

在通过人为提高支持率赢得总统选举后，圣安纳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尤卡坦和得克萨斯。英国从承认得克萨斯独立之后起，就一直向墨西哥施压，敦促其采取同样做法以避免失去加利福尼亚。另一方面，圣安纳确信，许多得克萨斯人依然忠诚于墨西哥。在 1841 年和 1842 年成功阻止得克萨斯侵袭后，他对北方军的实力充满信心。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并不合理的计划，他要收回得克萨斯并捍卫加利福尼亚，方法是给予两地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萨姆·休斯敦总统正在就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问题进行谈判。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尤卡坦同意接受特殊地位，暂时再次并入墨西哥。　357



1844 年圣安纳的总统就职典礼 。尽管圣安纳在萨姆·休斯敦的手上受了很多羞辱，而且他在胁迫之下还同意让得克萨斯独立，他在对法国的糕点战争期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在国内的声望。在 1838 年法国占领韦拉克鲁斯后发生的战斗中，圣安纳被大炮击中受了伤，右腿膝盖以下全部截肢。他英勇抗击法国的行为和他所受的伤为他重新赢得了政治声望，最终让他当选总统。

圣安纳相信，他将会被选为总统，于是他离开首都返回了庄园，由巴伦丁·卡纳利索（Valentín Canalizo）担任临时总统。1844 年 1 月，圣安纳赢得了竞选，但是他直到 6 月 4 日才返回首都。5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一名代表到圣安纳的庄园

拜会了他,并向他通报了美国兼并得克萨斯的情况。事实上,得克萨斯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协议早在 1844 年 4 月 12 日就签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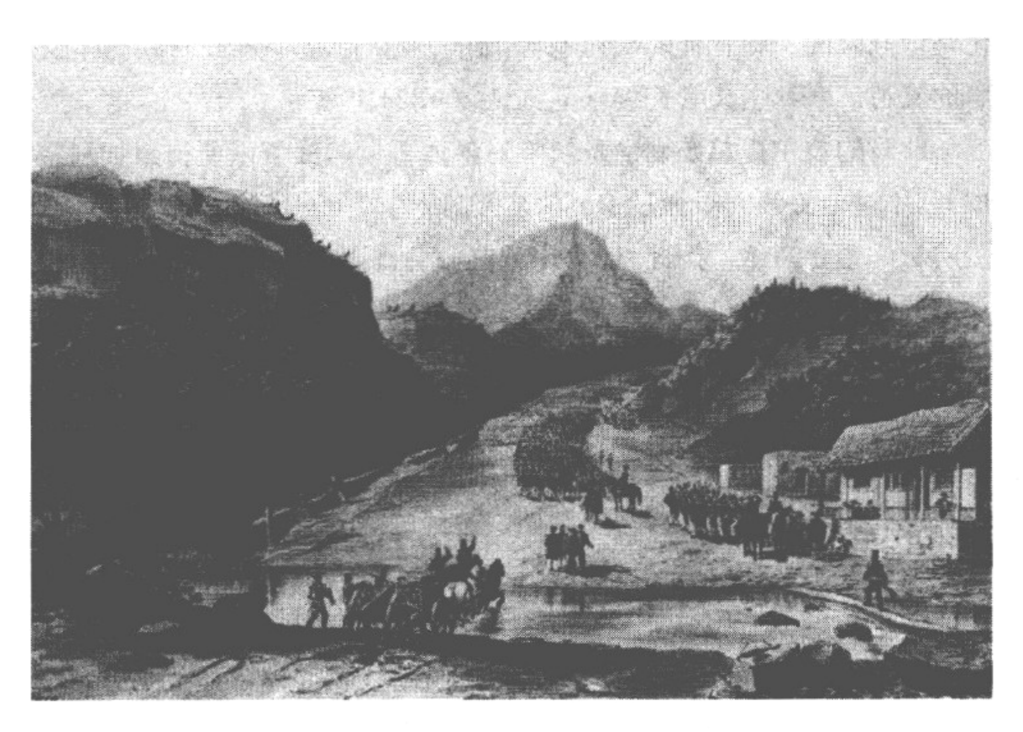
在华盛顿,墨西哥驻美大使胡安·阿尔蒙特曾对卡尔霍恩提出严正抗议,迫使他派出了一名代表进行解释,兼并得克萨斯是为了阻止英国对这一地区的野心。阿尔蒙特于是满怀信心地向墨西哥政府表示,美国参议院不会通过兼并协议。然而墨西哥外交部长何塞·玛丽亚·博卡内格拉(José María Bocanegra)却指示阿尔蒙特,让其知会美国政府,墨西哥将会把兼并看成是宣战行为。

6 月 4 日返回首都后,圣安纳宣誓就职,并筹集资金,准备远征得克萨斯。但他在国会碰了壁。国会已经被联邦主义者把持了,他们认为得克萨斯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圣安纳依法办事。尽管他们不信任圣安纳甚至不认为远征会有用,但还是通过了拨款。当美国参议院驳回合并协议的消息传到墨西哥时,圣安纳推迟了远征,这引起了国会的恐慌,其要求圣安纳退还所有拨款。

11 月,瓜达拉哈拉的军事长官马里亚诺·帕雷德斯-阿里利亚加将军利用普遍的不安情绪进行了针对圣安纳政府的起义。圣安纳组织军队进行镇压,而临时总统卡纳利索及其内阁决定推迟中止宪法并解散国会。这一次,国会拒绝屈服,并组织市民运动抵制有悖宪法的措施。12 月 6 日,在首都司法部门、市议会、卫戍部队以及民众的联合行动下,卡纳利索及其两位部长在"宪法和国会"的呼声中被投入了监狱。随后,国会根据现实情况任命国务会议负责人何塞·华金·德埃雷拉为临时总统。这一做法得到了普遍赞扬并带来了希望。圣安纳在韦拉克鲁斯被逮捕。紧接着,新政府将他流放到了古巴的哈瓦那。

358

埃雷拉政府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很微妙的境地中。没有资源,并且面对一大群急于恢复 1824 年宪法的联邦主义者,同时不得不面对两大威胁:美国的扩张主义和西班牙政府精心策划的复辟阴谋。英国仍继续要求墨西哥为避免失去加利福尼亚而承认得克萨斯,甚至在 1844 年提供了一份英法联合签署的边境保证书作为交换。但圣安纳没有接受,等想接受时则一切都为时已晚。在 1844 年 11 月圣安纳下台之前,



墨西哥军队在里奥弗里奥附近行军。这幅平版印刷画表现了墨西哥军队简陋的装备，他们的马匹数量很少，而且只有一门大炮。不过，士兵们的英勇确实不容置疑。

英国驻墨西哥公使查尔斯·班克黑德已经说服他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通过煽动扩张主义情绪成功胜出。这使他的前任约翰·泰勒(John Tyler)于1845年3月1日签署了美国国会的联合决议，将得克萨斯问题作为国内事务批准兼并得克萨斯。

359

为避免与美国开战，埃雷拉政府已经接受了英法发起的关于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谈判倡议。但这一消息传来，墨西哥政府立刻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决定听从英国的建议避免任何挑衅行为，以使美国没有借口入侵墨西哥，也为关于得克萨斯的谈判提供筹码。墨西哥的做法已经太迟。1845年7月，得克萨斯议会批准了其并入美国。

埃雷拉被选举为墨西哥总统，但他只推动了一些基本改革，扩大地方自治以及增加部门预算。埃雷拉认为，战争条件下，政府体系发生变

化是很危险的。尽管他的决定有理有据,但依然减少了来自联邦主义者的支持。联邦主义者们要求立刻恢复1824年宪法。

此时的波尔克总统则准备冒险对墨西哥发起战争以便得到加利福尼亚,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来实现,因为战争可能会增加美国各政治阶层的紧张情绪。因此,他决定派遣一名代表前往哈瓦那,圣安纳正被流放在那里。波尔克得到情报称,联邦主义者正密谋迎回圣安纳,所以他的代表试图去那里说服圣安纳支持割让加利福尼亚。波尔克还试图说服墨西哥政府接见美国政府专员。由于自身处于弱势,墨西哥外交部长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要求美国派出一名"特派专员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指兼并得克萨斯。曾经的煽动者波尔克总统指派约翰·斯利德尔为全权公使,让他按计划迫使墨西哥偿还贷款,并提出几项购买墨西哥领土的要求。这一安排是挑衅。首先,尽管政府正陷入债务泥潭,但墨西哥一直在按要求还款。此外,这些建议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墨西哥已经中断了同美国的关系。

埃雷拉政府同意接见美国专员的消息传出后,谣言四起,称埃雷拉正计划出售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联邦主义者、君主派(monarchist)以及帕雷德斯将军不约而同地利用谣言所导致的不安氛围展开了反政府的密谋。1845年12月14日,帕雷德斯并没有按命令出兵格兰德河,而是发动了针对埃雷拉政府的兵变,兵发墨西哥城。12月末,驻军墨西哥城的加夫列尔·巴伦西亚将军也参与到了兵变中,埃雷拉除了下台别无选择。1846年1月2日,帕雷德斯进入了墨西哥城。两天后,各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他为临时总统。

在没有立法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帕雷德斯进行了全权统治。通过威逼利诱,他完成了对其反对者的清洗。帕雷德斯宣布选举新的国会以便选择新的政权后,君主派卢卡斯·阿拉曼起草了选举法草案。如1822年国会的情况一样,这一草案将有资格进入国会的人限制在了几个主要的精英团体:矿主、地主、商人、军官、神职人员以及其他专家。

360

西班牙驻墨西哥公使萨尔瓦多·贝穆德斯·德卡斯特罗(Salvador Bermúdez de Castro)资助报纸进一步宣扬君主派的立场。这场论战受

到媒体的猛烈抨击，甚至包括写给帕雷德斯本人的信件中也有对此的不满。虽然帕雷德斯为了掌控权力，运用了埃雷拉没有建立有效的对外防御这样的托词，但他发现自己也专注于不断弱化墨西哥地位的国内政治问题。尽管帕雷德斯以诚实和精干而著称，但这并不能使他解决持续困扰墨西哥的财政问题。

同时，在波尔克的任期内，来自美国的威胁持续存在。约翰·斯利德尔仍然留在墨西哥，他希望新政府可以更好地考虑其关于领土转让的提议，但帕雷德斯并没有会晤他。了解这一情况后，波尔克命令驻军于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扎卡里·泰勒将军发兵格兰德河，直接侵入墨西哥领土。帕雷德斯一直确信美英在俄勒冈问题上的争端会诉诸于武力，这将会减小美国对墨西哥的威胁。他一直指望着来自欧洲的支持，因为君主派设计的方案迎合了法国和英国的胃口。

泰勒于 1846 年 3 月到达格兰德河，并开始在马塔莫罗斯附近构建阵地。与此同时，帕雷德斯正面临着一场因君主派发起的论战而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不得不宣布接受共和制，并允诺政府体系由即将产生的国会而非总统决定。

帕雷德斯的声明没有使任何人安心，4 月 15 日，联邦主义者在阿卡普尔科掀起了一场运动，并蔓延到了马萨特兰和瓜达拉哈拉。他们坚称，帕雷德斯政府是非法的，并要求圣安纳重新执政及恢复 1824 年宪法。帕雷德斯没有平息这场运动，造成了北部防御的弱化。他的失误已经多重化了。在 1 月份的时候，帕雷德斯曾将马里亚诺·阿里斯塔(Mariano Arista)调离了他所指挥的北方军，在换了其他两个岗位之后，又只得将其官复原职。这样的朝令夕改使得部队主要领导人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产生了分化。

两国军队在格兰德河发生了小规模对抗之后，4 月 25 日，泰勒将军告知波尔克总统，“可以认为对抗现在开始了”。紧接着，他命令来自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 5 000 名士兵继续向墨西哥境内进攻。

波尔克在准备同墨西哥的战争的同时，则就俄勒冈争端问题积极寻求与英国对话。英国不想发动战争，所以这使两国在 5 月份达成了

361 一致，将俄勒冈边境线确定为北纬 49 度，即如今的美加边境，尽管扩张主义者一度要求将边境确定为更靠北的 52 度。

与英国谈判成功使得波尔克可以放手入侵其南方的邻居了。5 月 6 日收到泰勒的消息后，波尔克与他的内阁就局势进行了讨论，并着手起草战争檄文。他于 5 月 11 日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国会。他辩称泰勒出现在格兰德河是为了防卫受到威胁的得克萨斯边境。波尔克谴责墨西哥是侵略者，大规模地侵犯美国："在这一消息之前，我们就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但是现在，在反复的威胁之后，墨西哥越过了美国边境，侵占了我们的领土，并且让美国的土地上流淌着美国人的血。"

波尔克进一步宣称，墨西哥方面拒绝会晤全权公使斯利德尔，这使得美国除了战争别无选择。他借此要求提供资源上的支持，众议院很快通过了他的请求。但是在参议院，约翰·卡尔霍恩派试图分辨战争与防御措施，辉格党人反对对墨西哥的谴责。然而，主战派占据了上风，波尔克最终得到了军费支票。

在西部，入侵也已经开始了。从 1845 年 12 月开始，约翰·弗里蒙特(John Fremont)一直驻留在加利福尼亚，他以进行科学考察为由获得了墨西哥的允许，但是很快他就暴露了其推动加利福尼亚独立的真实意图。墨西哥当局威胁要驱逐他，但是在海军将领斯洛特(Sloat)的舰队一直在加利福尼亚沿岸护卫的情况下，1846 年 7 月 4 日，有恃无恐的弗里蒙特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斯洛特不认为这是战争，而认为弗里蒙特的做法完全符合他接到的命令，7 月 7 日他占领了蒙特雷(Monterey)，两天后他占领了旧金山。随后当罗伯特·斯托克顿(Robert Stockton)受命指挥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军队时，他已经能够进军洛杉矶了。在洛杉矶得到美墨开战的消息后，他兼并了加利福尼亚，不过随后将面对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殖民者"加利福尼奥人"(Californios)的反抗。

面对战争的威胁，墨西哥并没有实现团结。第一次战败的消息产生了震惊，政府和军队都觉得难以置信。贝穆德斯·德卡斯特罗迅速暂停了报纸宣传，并且当 7 月 6 日国会重新召开后，没人敢提君主制的方案。议会代表们正式批准由帕雷德斯出任临时总统，并且就宣战展

开了争论。7月6日，一项法令被公布："政府具有国家防御的职责，它将击溃美国发起和支持的针对墨西哥共和国的侵略。"

帕雷德斯没有保卫好国家，也没有压制住联邦主义者，他被孤立了。他意识到他的政府随时可能垮台，他觉得他不得不去指挥军队。他将自己的出征日期一度推迟到了8月4日，但出发时却发现国家军备库的守备部队已经起义了，他们支持1824年宪法并支持迎回圣安纳。不久之后，帕雷德斯被逮捕并流放。

362

恢复1824年宪法的运动使马里亚诺·萨拉(Mariano Sala)将军和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成为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并举行新国会选举。

圣安纳做好了从古巴回归的准备。他明白，他与波尔克的代表所达成的共识将使他可以穿越墨西哥湾的封锁线。尽管他的行为不存在被判叛国罪的可能，但墨西哥政治家们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最高领导人心存高度怀疑，尤其在美国代表造访哈瓦那的消息已经被广而告之之后。这些疑虑减弱了前线的战斗力。

在国内，联邦主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冲突困扰着政府。联邦主义回归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转移了人们对战争的关注。政府更迭、新旧政府混乱的政策措施以及地方自治严重阻碍了国内力量的联合，无法为战争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央政府认识到其对战争负有全责，但它的财政收入却只剩下各州的定额上缴以及关税。一些经济困难的州很难完成它们的定额，而港口的封锁和联邦主义者降低税率的计划则限制了关税的征收。

美墨战争已经开始了。考虑到两个国家实力的明显不对称，结局显而易见。两个国家领土面积相仿，但美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 000万，而墨西哥的刚刚超过700万。墨西哥经济破产、市场萧条，这与其邻居充满活力的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个国家虽都饱受政治分裂和党派之争的困扰，但扩张主义却有助于弥合美国各派的分歧，但却会使墨西哥的前进之路更为崎岖。

两国军队的对比更为明显。墨西哥军队规模较小，缺乏各级别专业军官，并且组织性、纪律性较差，还急需各种资源、给养、武器、机械以

及马匹。由于缺乏正规的后勤人员和卫生服务，战士们的饮食起居由随军的家眷照看，甚至连孩子也带在身边，这大大限制了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部队的火炮老旧不堪且射程较短，弹药有限且有时与武器不匹配。志愿兵缺乏是一个长期积存下来的问题，在北方尤为严重。那里的男人更希望待在家中，保护他们的家人免遭印第安人的袭击。因为弹药的短缺，志愿军士兵的第一次射击往往都是出现在正式的战斗中。后勤服务的缺乏使得大量伤病员被抛弃，而接二连三吃败仗使萎靡情绪在军队中蔓延开来。

与之相比，美国军队具备专业化的军官队伍，拥有成千上万的志愿兵。他们手握大量的资源、现代化的武器以及最为先进的大炮。指挥官们可以命令各种部队和舰艇同时进攻。此外，志愿兵都接受了训练并定期轮换。战场上的胜利及其带来的战利品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战斗热情。

363 到1846年8月底，当泰勒将军已经兵临蒙特雷，而斯蒂芬·卡尼(Stephen Kearny)占领了圣菲时，圣安纳从古巴返回了韦拉克鲁斯。他于9月14日进入墨西哥城，但随即前往圣路易斯波托西组建一支军队。在路上，他得到战报，蒙特雷在被围5天后于9月23日陷落。

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圣安纳一直忙于保障资金、构筑城市防御及训练志愿军。媒体以怯战为由对其展开攻击，迫使他不得不出兵北上，对战泰勒将军。由于缺乏给养及掩体保护，加之持续大范围的恶劣天气，圣安纳如果按兵不动，坐等泰勒来攻会更好，因为那样泰勒的军队需要穿越圣路易斯波托西与萨尔蒂约之间很长的沙漠地带。严酷的冬天使圣安纳损失了很多士兵。在萨尔蒂约，泰勒和约翰·E.沃尔(John E. Wool)将军有大把的时间来选择适当的地方进行防御，圣安纳却没有能隔断泰勒军与萨尔蒂约之间的联络。2月22日和23日，墨西哥军队在布埃纳·维斯塔(Buena Vista)迎来了战争开始以来最艰难的一战。即便借大炮之利，美军也无法阻止墨西哥人在数次交锋中击退他们。墨西哥军队似乎胜利在望，但指挥层却决定撤退到更好的战略位

置上,因为部队缺少水及其他给养。第二天清晨,看到墨西哥军队撤退时,泰勒长出了一口气。他甚至没有试图去追击。墨西哥军队在漫长的撤退过程中也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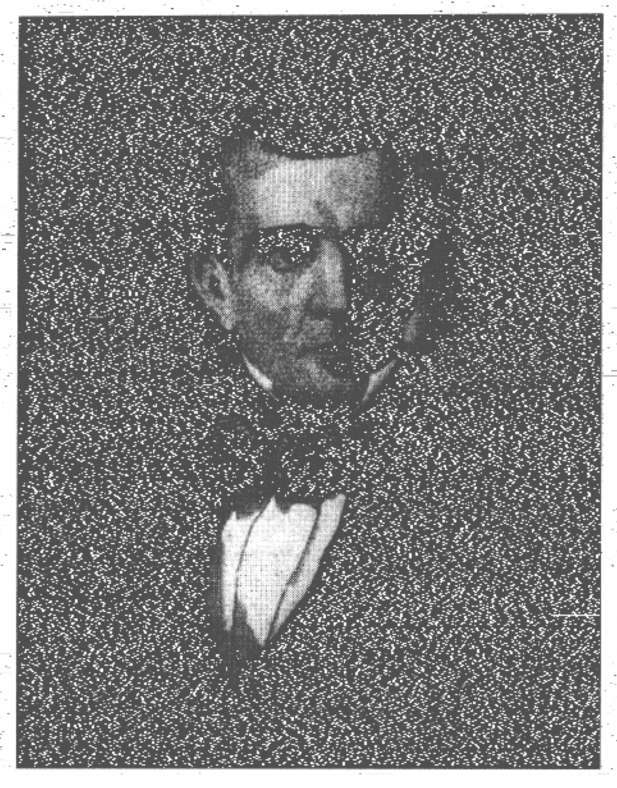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戈麦斯·德法里亚斯被选为总统之后,墨西哥城里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温和派不信任戈麦斯·德法里亚斯,尤其是 1847 年 1 月 15 日他试图生效一项法令之后。这项法令授权出售价值 1 500 万比索的教会财产。教会曾经通过贷款及为私人信贷提供担保而为战争做出了贡献,所以温和派确信,建立有效防御最大的障碍正是戈麦斯·德法里亚斯。这促使温和派成员和一些高级军官开始在首都组织起义,但这场运动不巧,正好发生在圣安纳与泰勒对战于布埃纳维斯塔及斯科特准备在韦拉克鲁斯登陆之时。

当时,墨西哥正在几条线上遭受入侵。被封锁的港口一直被占领到 1848 年年中;北方同样被占领了。仍然与墨西哥本土分离着的尤卡坦宣布,为避免其港口坎佩切(Campeche)和西萨尔(Sisal)被美军占领,其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1848 年,尤卡坦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土著人暴动,心怀不安的克里奥尔人打算与美国或西班牙合并以求自保。

与此同时,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清楚地表明,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征服之战。1846 年 7 月 5 日,卡尼上校和亚历山大·W. 多尼芬(Alexander W. Doniphan)上校率军从密苏里发兵圣菲。新墨西哥缺乏足够的防御力量,而其州长曼努埃尔·阿米霍(Manuel Armijo)事实上则是防御措施实施的障碍。卡尼的军队只碰到少量抵抗就占领了一些主要乡镇。8 月 18 日占领圣菲之后,卡尼宣布,新墨西哥并入美国。并不是所有新墨西哥人都接受被占领的局面,他们组织了起义,但被残酷镇压了。

364

9 月 25 日,美国在新墨西哥成立了新的政府之后,卡尔尼撤离了加利福尼亚;多尼芬则率领 924 人前往奇瓦瓦。奇瓦瓦州州长安赫尔·特里亚斯(Angel Trías)组织了防御力量,但于 12 月在特斯马卡利托斯(Tesmacalitos)被击败。1847 年 2 月,随着墨西哥人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被击溃,美国全面占领了奇瓦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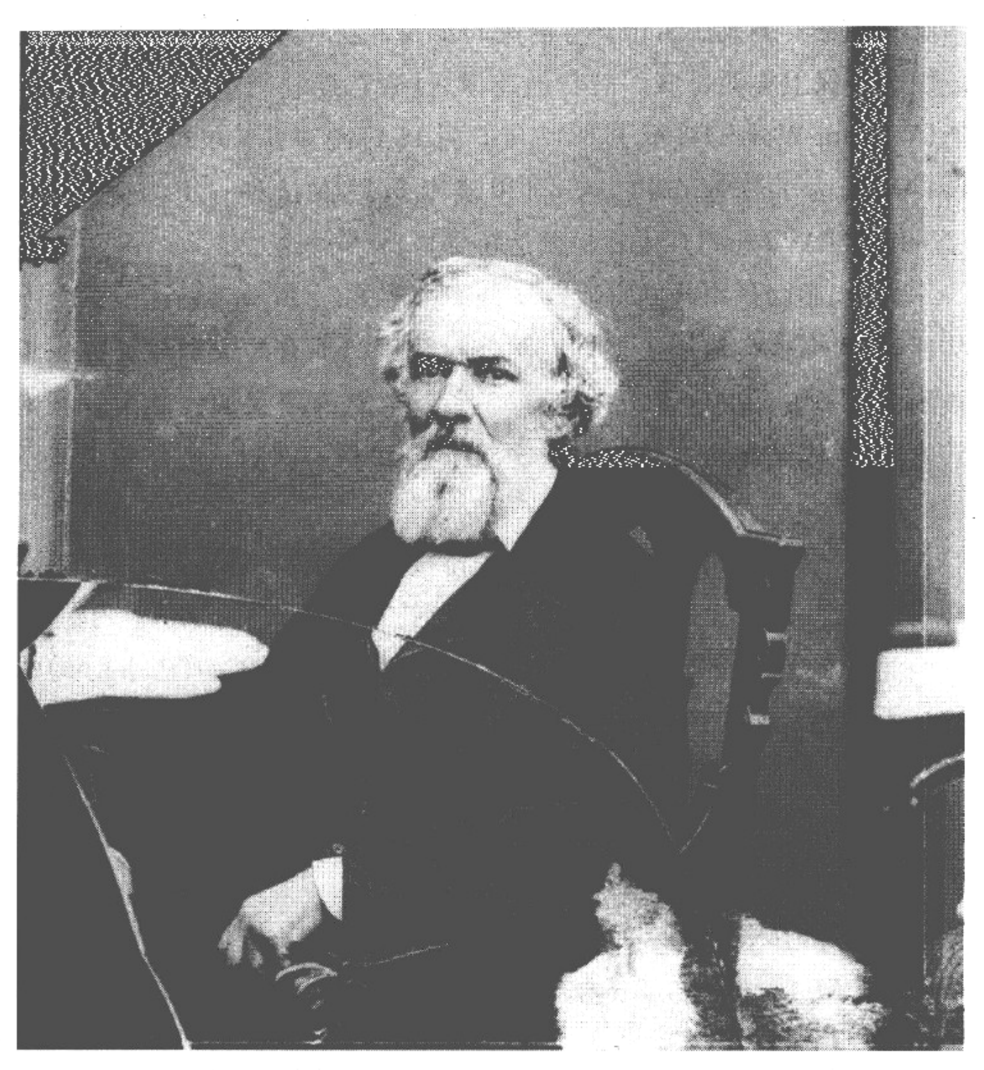
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1844年竞选总统期间明确表示，他打算与不列颠解决俄勒冈的问题，他将这一计划颇具挑衅意味地命名为“54'40或战斗”；还打算吞并得克萨斯，并从墨西哥的手上抢夺加利福尼亚的港口，他把这个计划诠释为“重新兼并得克萨斯”。通过以上举措，波尔克要把美国打造为一个跨越多块大陆的国家。

12月，当美国侵略军正因加利福尼奥人的反抗而处于困难阶段时，卡尼抵达了南加利福尼亚，他的到达犹如神兵突降。他率领的部众大大增强了原有军队的实力，并使他们于1847年1月10日重新夺回了洛杉矶。这场胜利确保了美国对加利福尼亚的兼并。

基于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总统波尔克开始集中精力攻占墨西哥城，他将这一重任委派给了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将军。1847年3月7日，70艘战船抵达了韦拉克鲁斯，两天后开始炮轰港口。尽管由于天气恶劣，登陆计划延迟，但23日他们又开始继续炮轰。四天后，韦拉克鲁斯的民众由于爆炸、大火及食物匮乏而伤亡惨重。到26日，抵抗消失了，第二天，这座城市经谈判后投降。斯科特在圣安纳的庄园建立了司令部，而他的军队则继续往内陆进军，前去处在通往墨西哥城必经之路上的哈拉帕(Jalapa)。

365

圣安纳在布埃纳·维斯塔被击败后，返回了首都。他就任总统，恢复秩序，废除1847年1月15日发布的关于授权出售价值1 500万比



尼古拉斯·特里斯特作为波尔克总统的代表，参加了结束美墨战争的谈判。虽然特里斯特并没有完全从墨西哥那里拿到波尔克总统想要得到的土地，但波尔克总统仍然促使国会通过了谈判的条款，是为《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索的教会财产的法令，并获得了一笔教会贷款。温和派通过修改宪法，包括取消副总统职位等，确保了戈麦斯·德法里亚斯永无出头之日。在圣安纳带领军队前往韦拉克鲁斯阻挡美军的时候，国会任命了一名临时总统。但他选择了戈多山口(Cerro Gordo)构建防御阵地，这并不合适。与之相反，斯科特的部队可以控制两侧，从而切断所有退路。4月18日，斯科特迅速击败了圣安纳。后者试图在奥里萨瓦(Orizaba)整编他的军队，但无奈缺少给养，他不得不撤往普埃布拉，然后返回墨 366

西哥城。圣安纳无法阻止美军前进的步伐,他和他的将军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保卫墨西哥城。沿着他的撤退路线,斯科特麾下的威廉·沃斯(William Worth)将军于1847年5月15日占领了普埃布拉。28日,斯科特抵达了普埃布拉。美国和谈专员尼古拉斯·P.特里斯特(Nicholas P. Trist)几天后也抵达了那里。

如今,墨西哥军队感觉战败已是不可避免,士气非常低迷。国会不信任圣安纳,他们取消了根据宪法使行政部门拥有的议和权。进一步被削弱的圣安纳决定背水一战,捍卫首都。有人建议加强墨西哥城南部的防御,以防斯科特从侧面进攻,但圣安纳再一次对这些经验之谈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斯科特非常低调地等待援军,直到8月7日他才出兵。16日,他的一部分部队在首都以南安营扎寨。四天后,加夫列尔·巴伦西亚将军在阻击美军前往墨西哥城外围城市帕迭尔纳(Padierna)的战斗中失利。同一天,另一支军队袭击了丘鲁武斯科修道院(Convent of Churubusco),那里由佩德罗·玛丽亚·安纳亚(Pedro Maria Anaya)将军和曼努埃尔·林孔(Manuel Rincón)将军带兵驻守,守军中包括了由美国逃兵组成的圣帕特里克营(St. Patrick Battalion),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爱尔兰裔。尽管防卫军一直战斗到了弹尽粮绝,阵地还是失守了,逃兵们被移交军事法庭。他们避免了绞刑,但每个人的脸上都被烙上了字母"D",代表"逃兵"。

墨西哥人在丘鲁比斯科被击败后,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休战。利用这个机会,美国和谈专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向圣安纳政府挑明了和平谈判的条件。由于墨西哥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上签字,而美国的领土要求令墨西哥人出离愤怒,9月6日停火协议中止。

随着9月8日卡萨马塔(Casa Mata)战役和马利诺德尔雷伊(Molino del Rey)战役的展开,双方再次进入敌对状态。13日,最后一场战役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Chapultepec Castle)打响。当天傍晚,进攻墨西哥城中心的战斗开始了。美军在城市的所有入口都派以重兵,断绝了城市继续防守的希望,迫使普通民众要求他们的军队投降,以避

免更多的流血牺牲。

为确保民众安全，市议会与斯科特将军展开了协商，要求保证民众的安全。但是一旦民众意识到美军前进，他们发动了一波抵抗，试图保卫城市。没有武器的民众与装备良好的侵略者之间明显的不平衡造成了两天的流血冲突。斯科特不得不宣布任何袭击其士兵的当地民众将被立即射杀。局面慢慢地平静下来。15 日晚间，随着侵略者的旗帜在墨西哥政府大楼迎风飘舞，美军用音乐和美酒开始庆祝胜利。与此同时，墨西哥城的民众则心若死灰，圣安纳也辞去了总统职务。



美国军队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率领下，在韦拉克鲁斯登陆后一路向内陆行进，并在赛罗戈多山道和马利诺德尔雷伊战役等主要战役及一系列小规模交锋中击败了墨西哥军队。斯科特随后率部进入墨西哥城并在那里停留了十个月，直至美墨双方达成并签署和平条约。

几天之后，占领军结束欢庆开始四处逛。剧院、舞厅、赌场以及台球厅重新开始营业。咖啡屋、酒吧以及夜总会迎来了它们的新客人。一批照相馆出现了，使战士们可以留下他们影像以及墨西哥的景观作为纪念。士兵们口袋里的钱使得当地经济渐渐复苏，英语报纸也开始出现了。

367

在一片沉默的氛围中,9月27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曼努埃尔·德拉培尼亚(Manuel de la Peña)根据宪法规定,在托卢卡(Toluca)就任总统。他在一些士兵及政府官员的追随下,将首都迁往了克雷塔罗(Queretaro)。随后,军方人士、官员及政治家们也去了那里。在当时的形势下,政府履行职能是相当困难的,但温和派却专注于恢复国会和州政府,一部分地方官员已经停止了对临时政府的支持。11月,一些地方官员到达克雷塔罗。议会达到法定人数后,政府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开始着手重建和平。议会于12月休会,次年5月将选举新议会以通过和平条约。

国家的形势令人沮丧。一大部分的领土被占领,收入进入了侵略者们的腰包。一些州出现了暴动和地方起义。激进派和君主派主张战斗至最后一人,并正在进行密谋。部分中产阶级支持斯科特将军的独裁,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彻底地并入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和派维护国家存在的努力显得尤为可贵。

368

墨西哥政府的软弱早就昭示着它将会失去不少的领土,而美军胜利的消息唤起了总统波尔克进一步侵吞领土的野心,并且引发了一场要求彻底吞并墨西哥的运动。结果,波尔克将他的代表特里斯特召回了华盛顿。

特里斯特并没有意识到波尔克的决定,他曾急匆匆地联系英国驻墨公使,表示他已做好了同墨西哥临时政府展开和平谈判的准备。英国公使表示将会指派人员前往。贝尔纳多·库托(Bernardo Couto)、路易斯·G. 奎瓦斯(Luis G. Cuevas)以及米格尔·阿特里斯坦(Miguel Atristain)被选为墨西哥谈判代表,而此时特里斯特恰好接到华盛顿的召回令。因为形势太过微妙,墨西哥政府和英国公使都要求特里斯特留下。特里斯特也心存犹疑,但他确信华盛顿方面是有意于和平的,并且不顾墨西哥当时的困难局面,他决定留下。

1848年1月,困难重重的谈判进程开始了。英国领事作为一名刚刚得到了一份穿越特万特佩克峡谷的铁路建设许可权的商人,试图干扰谈判,但特里斯特设法压服了他。墨西哥方面利用国际法来捍卫墨

西哥的权益。特里斯特处在了一个困难的境地，他认为波尔克的要求有些过分，决定执行最初的计划。他拒绝接受以努埃塞斯河作为边境，也不同意由墨西哥继续控制圣迭戈。他甚至将赔偿金从3 000万美元减到了1 500万美元。要知道，这些钱并不是为了购买被征服的领土，准确地讲，它涵盖了损害赔偿以及墨西哥的全部外债。墨西哥设法保住了下加利福尼亚。此外，第二款是唯一对墨西哥有利的条款，该条款要求确保被占领土上墨西哥人的权利，要求美国防卫墨西哥北部边境不被印第安人袭扰，但这一条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被占领土上墨西哥人的权利常常被侵犯，许多人还失去了财产。

1848年2月2日，条约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镇签署。特里斯特的夫人记录了签字仪式的场景：

> 唐·贝尔纳多·库托对他（特里斯特）说："这是你值得骄傲的一刻；但对我们的羞辱并不比你的骄傲少。"特里斯特先生回应道："我们营造和平，那是我们唯一的想法。"关于这点，他告诉我们，如果那一刻那些墨西哥人能够看到我的内心，他们将知道我作为一名美国人所感到的羞耻，要比他们作为墨西哥人所感到的强烈得多。尽管我不会在那里这样说，但那是每一名精神正常的美国人都会感到羞耻的事，我也对此感到羞耻，真正的极度的羞耻。这曾是我在所有会议上的感觉，尤其他们反对而我却必须要坚持的时候……我本应在所有事情上屈服。没有什么阻止我那么做，除了一点，我们政府绝不会接受这一条约。我一直的目标并非是得到我所能得到的一切，相反的是要让条约尽可能地对墨西哥少一点严苛，以便使其能被国内平静地接受。在这方面，我有两点考虑：一点是战争的不公正，我方滥用武力；另一点则是，协议对墨西哥越不利，那么墨西哥国会反对它的理由就越充分。

369

波尔克总统于2月19日收到了条约。他对特里斯特的自作主张很不满，但由于条约是按照他最初的设想签署的，并且总统竞选即将来

到，波尔克还是将条约递交给了参议院。参议院删除了关于得克萨斯土地的第10款，并于3月10日通过了条约的其他内容。

因为墨西哥政府内部对立严重，其决定接受删除条约第10款。协议的签署使被美国占领的各州得以举行选举。但局面仍很棘手，因为1847年的国会内部分歧很大，而且该条约是由备受质疑的墨西哥行政部门签署的。尽管墨西哥政府一直避免公开协议内容，直到国会重新召开，但激进派和君主派却不停地对协议进行攻击。

在5月7日的就职典礼上，曼努埃尔·德拉培尼亚向新国会呈交了协议。在演讲中，他回顾了其临危受命时的恶劣环境。尽管有些担心，但理智占据了上风，国会批准了协议。5月30日，美国参议员安布罗斯·H. 塞维尔(Ambrose H. Sevier)和总检察长内森·克利福德(Nathan Clifford)抵达克雷塔罗与路易斯·德拉罗萨部长互换已签字通过的协议。总统选举中，何塞·华金·德埃雷拉胜出，等到6月中旬占领军一撤离，他就可以立刻在墨西哥城重新组织其新政府了。

这场战争对两个国家的影响都很重大。美国巩固了其在北美大陆的霸主地位，而墨西哥的命运则与它的北方邻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战争的暴力性和非正义性在墨西哥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疤。与此同时，战争也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民族情绪，为制定更明确的国家政策铺平了道路。等到法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入侵这里时，将会面对一个更为团结的墨西哥。

墨西哥随后成为一些军事冒险者侵略的目标，并且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胁迫，要求其签署所谓的“加兹登购买”协议(Gadsden Purchase)。这一产生于1853年的协议，沿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重新设定了墨西哥边境，并且废除了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签下的协议的第二款，即意图要求美国负责与边境沿线的印第安人保持和平的那一款，虽然它并未起到实际作用。

第十二章　为谁而战？改革时期：1855－1875

保罗 ·凡德伍德(Paul Vanderwood)

371

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使墨西哥丧失了几乎一半的领土——这一结果既给了墨西哥人沉重的心理打击，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他们。该战争揭示了墨西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弱点，暴露了其社会结构存在的缺陷，也引发了对美国进一步入侵其领土的担忧。同时，这场战争激励了专注于墨西哥现代化事业的领导人，也鼓舞了一大批希望为墨西哥的未来尽其所能的普通人。

那些希望平息独立后早期的动荡并推动墨西哥走西方国家路线的人被称为自由派。自由派的政治取向包括真正的激进派到极其温和派的各种派别，而自由派队伍中的分歧迟早会产生争执。但从大体上讲，自由派渴望带领墨西哥走上民主化和世俗化的道路，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家。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自由派都希望尽快地实现自己的愿望。

与自由派对立的那一派被称为保守派，保守派也承认自己一定程度上赞同激进主义的思想，自己的很多想法与对手不谋而合，但他们提倡采取更为稳健的措施。他们担心自由派的计划将引起社会动乱，引发类似于19世纪40年代的农民运动，并也许可能引发包括印第安小

土地所有者在内的种族之战。因此,保守派声称,军队和教会这两个在墨西哥久经时间考验的秩序支柱绝对不可动摇,并应尽量遏制普通公民参政的热情。这些观点在短期内引发了两大派别在公共场合的激烈辩论,但最终这两大派别承认彼此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墨西哥陷入了内战。

372 这场新的冲突的催化剂并不是别人,而是众所周知的知名人物——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1852 年,年近 60 的他,通过军事政变坐上了总统宝座。圣安纳将军称自己为最尊贵的殿下,上台后不久就采取措施想永掌权力:以帝王自居,招募新兵,增加税收以及要求各省对其绝对服从。这位将军及其保守派支持者们试图在墨西哥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取消在墨西哥联邦体制下实行了几十年的地方选举和人民选举。然而,各省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已有的自由权利,许多地方强人和普通民众都被自由派的宣言点燃了心中的火焰。

南部的格雷罗州爆发了最为激烈的反抗圣安纳的政权的运动,当地的领导人胡安·阿尔瓦雷斯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阿尔瓦雷斯帮助当地老百姓从地方政府处争取到了土地,获得了包括减免税收在内的整体上来说更好的待遇。他还坚持承认民众享有国家和州公民的权利,在民众中开展了有意义的投票选举,并鼓励民众发表参政言论。因此,当 1854 年年初,阿尔瓦雷斯公开宣布反对首都新的侵权之举时,他的言论立刻得到了农民的热烈响应。

不久,阿尔瓦雷斯与中央政权及其支持者展开了长达 19 个月的游击战争。当他的部队节节胜利时,他的盟友也接踵而至。相邻的米却肯州、墨西哥州、莫雷洛斯州和瓦哈卡州先后加入了起义的队伍。许多准军事部队加入战斗,这些民兵大多是在美墨战争后期组建起来的,当时,被围困的墨西哥政府下令动员各州兵力(实际上是全国的民兵)来捍卫国家的荣誉,这群民兵只有一小部分在首都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剩下的大多数都没有对入侵者采取行动。因此,战争结束时,伤亡并不严重,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队伍纷纷选举自己的军官,整支队伍充满了团结的气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领土,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因为他们要行使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

最后，起义的战火蔓延到了墨西哥北部的新莱昂州。驻扎于萨卡特卡斯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和首都的军队纷纷公开指责圣安纳。1855年8月，圣安纳流亡国外。三个月后，阿尔瓦雷斯与和他并肩作战过的平托斯(Pintos，这些英勇的战士因在早期战斗时脸上涂满颜料而得名①)带着胜利的喜悦进入墨西哥城。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阿尔瓦雷斯刚在首都开始掌权，自由派组成的联盟就随之开始瓦解。以庞西亚诺·阿里亚加(Ponciano Arriaga)为代表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以贝尼托·华雷斯为代表的其他自由派则主张应将重点放在减少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利方面；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温和派；而阿尔瓦雷斯自己则对如何保护自己在格雷罗州的土地和支持自己的印第安农民方面显得最为热心。面对各类分歧，阿尔瓦雷斯努力在各派之间做调解

373



墨西哥大主教拉萨罗·德拉加萨(Lazaro de la Garza)曾威胁说要开除任何支持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1857年宪法的官员。教皇利奥十三世之后颁布了一条更简单的谕令，旨在推翻贝尼托·华雷斯和自由主义者的政府。

① 平托斯是“杂色的”“花色的”意思。——译者注

工作，以防止自己一手任命的内阁出现危机，但最终他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阿尔瓦雷斯决定放弃，于是他将科蒙福特任命为自己的接班人，自己则带领军队回到了老家，这支强悍有时又带点匪气的队伍已经让首都的精英们感到惴惴不安，但他们走后，首都这些传统的温和派马上就又有了更多的烦心事。

早在墨西哥政府打算召开立宪大会使自身的政权接管合法化之前，改革者们就开始对旧秩序进行攻击。打头阵的是时任阿尔瓦雷斯临时政府司法和宗教事务部长的华雷斯，他颁布了一部被人称为《华雷斯法》的法律，旨在取消军队和教会长期以来拥有的称为"福埃罗"的特权，例如：军队和教会能在民法体系之外建立对自身有利的法律体系这一特权。该法律所体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成为此次改革的标志。不久财政部长米格尔·莱尔多·德特哈达颁布了众所周知的《莱尔多法》，剥夺了教会拥有土地的权利。为了削弱教会的整体实力，同时将教会财产用于生产，该法规定教会今后需将自己拥有的不动产拆分或出售给私人，而针对这类买卖，国家拟开征销售税以补贴墨西哥国库。

此外，该法还提出土著社群拥有的公共土地也将作为社团财产进行分割并分配给个人。自由派希望利用这一契机吸引那些勤劳、理性并致力于保护其家庭利益而忠于国家的独立农民到其政治阵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出色的法律还试图改变墨西哥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仰体系。当然，该法律的内容对于当时的墨西哥人来讲其实并不陌生，早在殖民主义后期，殖民政府尽管有些左右为难，但还是对将印第安人纳入其政治实体这一问题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独立后，很多州制定了实现该目的的法律，但都收效甚微，而现在的改革者们想利用这一契机，将多年的夙愿变成现实。

374

而另一方面，教会、军队、印第安人和现状的捍卫者们自然对这些新法律的实行进行了抵制。但对保守派来讲，更为不详的征兆已经随着改革在各地显现：在普埃布拉州、莫雷洛斯州、墨西哥州和哈利斯科州的广大地区爆发了农民运动。随着改革思想的推进，农民接管了富

人、外商和地主的土地，开始与他们的老板发生冲突，要求更高的工资，并开始关心种族问题，所有这些新现象都可以看作农民坚持维护自己的参政权的举措。

当时墨西哥大多数的动乱都与恢复旧秩序和旧传统，保护传统权利以及反抗改革的新内容有关。但农民的物质需求通常与其土地被他人非法强占有关，他们的口号也表达了明确而强烈的思想——改革者必须兑现之前的承诺，赋予其广泛的代议制政府和州自治权（即联邦主义）。在对待这些问题的立场上，各个村庄间甚至一个村庄内部都并不团结一致，而国民警卫队也会不定期地集合起来为当地的利益而战。同样，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前途着想，这些警卫队也会突然调转矛头另投明主，但部队的每一个士兵基本上都是坚定的保守派，这也自然地激化了这场斗争。但到了 1856 年末，联邦军队，连同各州的军队以及一些私家军，成功地使农村地区变得比较和平（完全和平当然是不可能的），并把各地的代表召至墨西哥城准备共同拟定新宪法。

参加 1856 年立宪大会的有大约 155 名代表，其中的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公证人等，他们参照已颁布的西班牙宪法和美国宪法，行使其在立宪会议上的职责。美国和西班牙的宪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同时通过立法机关的权力维护了主要是联邦制的体系。而墨西哥版宪法同时还重申了之前《莱尔多法》和《华雷斯法》提出的打击特权和社团财产的内容；宪法将总统的任期限定为 4 年，并保证墨西哥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但从根本上说，该宪法是一份消极的文件，因为该宪法罗列了政府无权处理的政务，反映出对中央集权专政的恐惧。宪法只赋予了国家政府极为有限的权力用于立法和实施社会变革。同时，联邦议员还希望约束人民主权，并使上流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享受特权。举个例子，议员们拒绝了陪审团审判和宗教自由的观点，并保留了拿破仑司法系统中的法官制度以及基本仍信仰天主教（虽然未定为官方宗教）。

375

没有人对这部新宪法表示非常满意。教会、军队和他们的保守派支持者们群情激昂地高声反对。墨西哥城的大主教公然誓言将向新宪

法宣誓的公务员逐出教会;自由派们也因为宪法的一些具体规定而四分五裂;一些州的州长怀疑新宪法侵犯了其权利;激进派们认为该文件缺乏时效性,并很快发现新宪法执行的情况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天主教势力强大的中心哈利斯科州和米却肯州认为其宗教受到了威胁并开始起义。1857 年夏天被选为总统的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竭尽全力仍然无法使中央政府中各派的观点一致。于是,同年 12 月,他联合费利克斯·玛丽亚·苏洛亚加将军发动了政变,科蒙福特逮捕了自己的内阁成员,解散了国会,颁布政令,决心制定一部更具可行性的宪法。但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开始为自己之前的决定感到担忧,并对他新的保守派合作伙伴感到不满。于是苏洛亚加将军流放了科蒙福特,自己做了总统。

与此同时,自由派开始在最高法院院长贝尼托·华雷斯的领导下重振旗鼓。因此,依照宪法,自由派要求成立自己的政府。随着科蒙福特的离去,华雷斯理所当然地成了该国首脑,至少在自由派的心目中是如此的。于是,墨西哥便有了两个并列的政权,内战一触即发。

45 岁的苏洛亚加将军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他十几岁的时候在奇瓦瓦州打击阿帕奇人的队伍;他在美国入侵墨西哥时参加了蒙特雷保卫战;他在尤卡坦地区打击过玛雅人,并在 19 世纪 50 年代支持过圣安纳的帝王野心。当他看到国家政府被自由派搞得一团糟时,他又率领军队保卫这个国家。他的行动得到了一些州的州长、教会和金融家(他们的贷款以教会财产抵押)的支持。现在,他已将他的对手赶到了墨西哥北部。1858 年 2 月,一个瓜纳华托州的居民在给他在首都的朋友的信中提道:“一个自称共和国总统的名叫华雷斯的印第安人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是对这个墨西哥传奇人物的极为轻蔑的评价。

贝尼托·华雷斯确实是一名印第安人,这名血统纯正的萨波特克人于 1806 年出生在瓦哈卡州。在神学院经过简短的培训之后,他考入瓦哈卡文理学院,在那里他师从米格尔·门德斯·门德斯是一名政治活动家,温和自由派,逻辑、数学和道德教授。门德斯把华雷斯领上了从政的道路,华雷斯则一路扶摇直上:从瓦哈卡城市议会进到州立法

机关。1834年，华雷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法律学位，并就职于瓦哈卡州法院，时值长期存在的教会特权遭到打击和审查阶段。即使在保守派执政后的十年中，华雷斯仍在该州的法院系统供职。美墨战争期间，华雷斯先后担任了代表瓦哈卡州的联邦议员和州长，任职期间，他显示出自己对个人利益和村镇自治很关注，并严格遵守法律，积极推动印第安人的进步——这些立场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可能导致社会矛盾。

376

在圣安纳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取得短期执政权的时间里，他解散了自由党的领导层，并将华雷斯和其他人流放到了美国的新奥尔良。可是，当他在国外期间，自由派的成员们坚定了其政治理想，当1855年胡安·阿尔瓦雷斯举行起义时，尽管这些自由派在观点上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他们都准备加入这场战斗并夺取政权。1858年，保守派再次威胁到自由主义的事业，但这次他们的对手相比之前更为强大，很难被打败。瓜纳华托州、哈利斯科州、米却肯州、韦拉克鲁斯州和其他州的州长无一例外都是律师，不是军人，他们号召自己的军队随时准备保卫自由主义事业。紧接着，可能是机会主义者但实力强大的科阿韦拉-新莱昂州州长圣迭戈·比道里也加入了支持自由派的队伍。他控制着墨西哥东北部以及该地区利润丰厚的对美商业贸易，这些也注定他要接受自由派和自由贸易的理想。他帮助华雷斯在重镇韦拉克鲁斯建立了权力基地，他们可以从这里发动对首都的攻击。但自由主义者们首先力求通过明确阐述目标来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而教会成了他们此后攻击的首要对象。

内战爆发后，支持华雷斯的激进自由派迫切要求采取更多严厉的措施来反对教会。到1859年中期，温和自由派的华雷斯已再也无法阻止激进自由派的行动。激进自由派认为，教会一旦支持保守派就必须受到惩罚。此外，没收教会财产标志着可流通的地产变多，同时这一行动可以保证共和国政府还清内战时期向美国借的贷款。激进自由派同时又声称自由派应在新的共和国中明确表示教会与政府的彻底分离。1859年7月12日，激进自由派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所有的教会财产（除去教堂）被收归国有——换句话说，教会财产被充公并拍卖，并将拍

卖所得的资金充入国库。当然,这项法令只能在自由派控制的领土范围内实施,也鼓励先宣布没收保守派领土上的教会财产,待自由派胜利后再实际进行拍卖。

新的法律分离了教会与政府的同时也保证人民的宗教自由。此后,政府将保障所有宗教的公开活动。此外,修道院将被关闭,这也意味着修士的生活已走到尽头。女修道院则禁止招募新的修女,不久之后这类机构也将陆续关闭。7 月 28 日,民事登记制度建立,国家将登记所有公民的出生、结婚和死亡。通过这一方式,政府控制了公民一生中最为敏感的几个阶段,从而建立了国家的人口统计系统。

377 两星期后,华雷斯集团出台法令向民众公布了记有各类宗教活动和民间纪念活动的官方庆祝活动日历。该法令还明令禁止公务员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也就是说公务员可以以个人名义,但不得代表国家参加此类活动;诸如游行之类的宗教仪式禁止在教堂以外的地点举行;神职人员不得在教会领地以外穿着宗教服饰;警方将严厉控制教会敲钟的时间;而神职人员也将同其他公民一样缴纳个人赋税。最后,12 月 4 日,自由派首次在墨西哥保证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由的观念开始在墨西哥散播开来。

但事实常常是这样:宣布这样激进的法律是一回事,但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则是另一回事。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观,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废除种族歧视斗争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这些所谓的改革法案的推出与其说是任务的完成,不如说是任务的开始——任务执行过程艰辛曲折,可能最终不能完成,并在很长时间内被人抵制。时至今日,这些法案中的很多部分仍然很难实现,将来很可能也永远不会实现。尽管如此,这些法律的确为宗教的多样性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新教、摩门教、招魂术和其他新的精神活动方式开始进入墨西哥人的视野。而这些新的信条,不管其是否吸引人,都鼓励着它们的信徒们去验证或质疑官方教会的某些信条,以及官方教会人员的工作方式(天主教主教和牧师们实践其职责的方式)。这些法律促进了大众宗教的繁荣。此后,墨

西哥人民可以不需要国家或教会的任何正式批准而选择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宗教信仰。

当然，教会也不会就此而甘拜下风。其主教们对这些新法律的内容提出公开抗议，而神父们则用一些巧妙的方法避开新的法律。当教区居民在家中即将死去并要求做临终祷告时，神父该如何处理？因为新法律规定在教会领地以外地区不准举行宗教仪式。所以神父常常穿上口袋里可能藏着圣餐的普通衣服走到大街上，佯装漫不经心地走入垂死的教徒的家中，随后便在那里举行圣礼。由于神父收取教区税已被法律明令禁止，他们就会要求教区中某些虔诚的教徒代表其完成此项任务。

宗教游行常常在印第安人部落或各地村庄以及周围地区变相地举行。试问新的法律该如何成功地禁止干旱地区的农民祈求下雨的传统仪式？或相反的，感谢神灵赐予丰收的传统仪式？这些是过去与现在人们与他们的神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没有任何一项政府的法令可以切断这种联系。因此，在法律和现实之间就出现了妥协和让步。政府官员会故意避开这些宗教游行，或者以违反法律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象征性的罚款以示履行职务。

378

但有时候，也偶尔会有一个市长或警察局长坚持政府的立场，坚决禁止游行的前进。毕竟，有时候这样的宗教表现形式已不仅仅是宗教的需要，而变成了一种权力的示威。游行充分地展现了在政府和上帝之间，游行者更加服从后者权威，也更拥戴后者所代表的公正。因此，政府代表需要采取措施规避这种对他们权威的挑战，但同时也会引起流血冲突。在墨西哥，这样的冲突持续并恶化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样，新的民事登记制度也经常成为争论的根源。首先，之前人们向神父支付服务费时，他们至少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个精神寄托。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这些钱至少帮他们小镇留住了神父。其次，地方政权可以说是危如累卵，人们不断地质疑自己到底是应该效忠国家，还是效忠教会。由国家委派的登记员往往热衷政治，属于中产阶级(但只是稍稍富裕)，他们渴望更高的威望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钱财。因此他们在履

行职责时通常专断而刻薄。当一个真正穷苦的母亲刚失去了其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几个月大的孩子,而新的登记员却一直紧跟其后要她缴纳丧葬费,她会有何感想?或当一个一贫如洗的父亲在自家的玉米地里偷偷地埋葬了他病死的孩子,却被其仇家向登记员告了密,于是登记员找到了他要他支付触犯法律的罚款,他会有何感想?或当一个有钱的庄园主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家人埋葬在私人领地的私人教堂内,但有一天他被要求报告家人的死亡情况,并向拼命敛财的登记员支付丧葬费,他又会有何感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会选择忽视新的法律。但登记员有法律撑腰,会强力执行法令,于是冲突便会爆发。掌管墨西哥政府的自由派有其自身的理想和目标,但墨西哥各地的人民也会对他们想要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

到了最后,新的法令不但没有给自由派的事业创造很多收入,而且美国官方对以教会财产抵押的贷款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国外潜在的贷款人,不管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不希望获得教会土地。他们早已有了更诱人的目标,比如下加利福尼亚的全部领土或拥有穿越特万特佩克地峡在太平洋和墨西哥湾之间从事运输的权利。1859年,处于严重财政危机中的自由派终于考虑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让步,但该事件最终因美国耽于自己的内战而被搁置了。

保守派也同样面临着经济拮据的问题,但他们已设法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教会财产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之后又得到了来自瑞士和西班牙的支持,资助其向在韦拉克鲁斯的敌人发动军事进攻。1859年2－3月,保守派对自由派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以失败而告终,一年之后,保守派再次进发,但又被自由派捍卫领地的决心赶了回来。保守派的米格尔·米拉蒙(Miguel Miamón)将军已接任了保守派总统费利克斯·苏洛亚加的职务,并退守墨西哥城。在征得墨西哥城大主教的同意之后,他下令收集教会的所有银器,溶化后制为银币,同时他还典当变卖了教会一切值钱的珠宝和黄金。之后,绝望中的他还夺取了英国公使馆支付的一些利息,其中一部分属于英国贷款人。尽管如此,保守派的财政仍是捉襟见肘,国库的储备大量减少,而此时,自由派已加紧

379

了包围首都的步伐。

这两支军队于1860年12月22日在墨西哥城城郊相遇。三天后，也就是在圣诞节，职业记者出身的赫苏斯·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将军带着获胜的自由派军队进入墨西哥城。三周后，贝尼托·华雷斯坐上了国家总统的位置，但此时他的地位并不太稳固。一方面，保守派的余部仍在这片土地上对自由派进行着疯狂的报复，另一方面，定于1861年年初举行的间接选举中华雷斯也有着强劲的对手。

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包括由于内战中的杰出表现而被推到了民族英雄高度的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反对社团财产的《莱尔多法》的作者，才华横溢的激进自由派米格尔·莱尔多·德特哈达，他在墨西哥出现财政危机时出任财政部长一职，成功地使该政府免受破产和政治危机的威胁。而温和自由派华雷斯在之前的时期中体现了他出色的领导才能以及政治和外交技巧的同时，也面临着名不正言不顺就任总统的指控。这一届任期四年的总统选举，各候选人的选票数在春季的这轮选举中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随着3月22日莱尔多去世，他的支持者开始转而支持华雷斯。1861年6月，国会宣布华雷斯为总统。

华雷斯所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按照宪法规定，总统仍是一个权力不大的职位，因此华雷斯通过建立联邦警察来加强中央集权。一支农村的警察部队及时改编成著名的墨西哥骑警队，而将这支骑警队训练成联邦警察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此时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大量的外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贷款人在其政府的支持下纷纷要求墨西哥政府还款，但此时的墨西哥财力已近枯竭。面对这些内忧外患，华雷斯该如何处理？

华雷斯和他的政府基本上没有太多选择。如果在从前，美国可能会贷款给墨西哥，甚至提供人力援助，协助共和党人与欧洲的君主国进行战争，但目前美国也面临内战，仅能表示同情和道义方面的支持。在此之前，墨西哥很好地履行了所承担的国际债务的义务，而墨西哥的大部分国债是欠英国的。事实上，华雷斯政府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港的海关收入还清了其中的2 400万比索（约2 400万美元），但还剩下

8 000多万的巨额债款,其中 6 400 万是英国的。而另一方面,保守派欠下的巨额债务又加剧了危机。米拉蒙总统向著名的瑞士杰克家族银行举了大量债。该银行的重要投资人是法国皇帝同母异父的兄弟莫尔尼公爵。华雷斯拒付保守派的借款,但此举使这位公爵大为不满。他要求不肯负责任的墨西哥人必须偿清欠他的债务,并要为他们的违约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

380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A GENTLEMAN IN A FIX—AN UNNATURAL PARENT.

An old woman by the name of Bull recently played a most cruel hoax upon a gentleman, one Mr. Napoleon, of France. It appear that the woman Bull, by means of her tears and lamentations, induced Mr. Napoleon to aid her in carrying her baby Intervention. No sooner, however, had the gentleman taken up the infant than the unprincipled parent ran away, at the same time denying any relationship to her offspring. She is an old offe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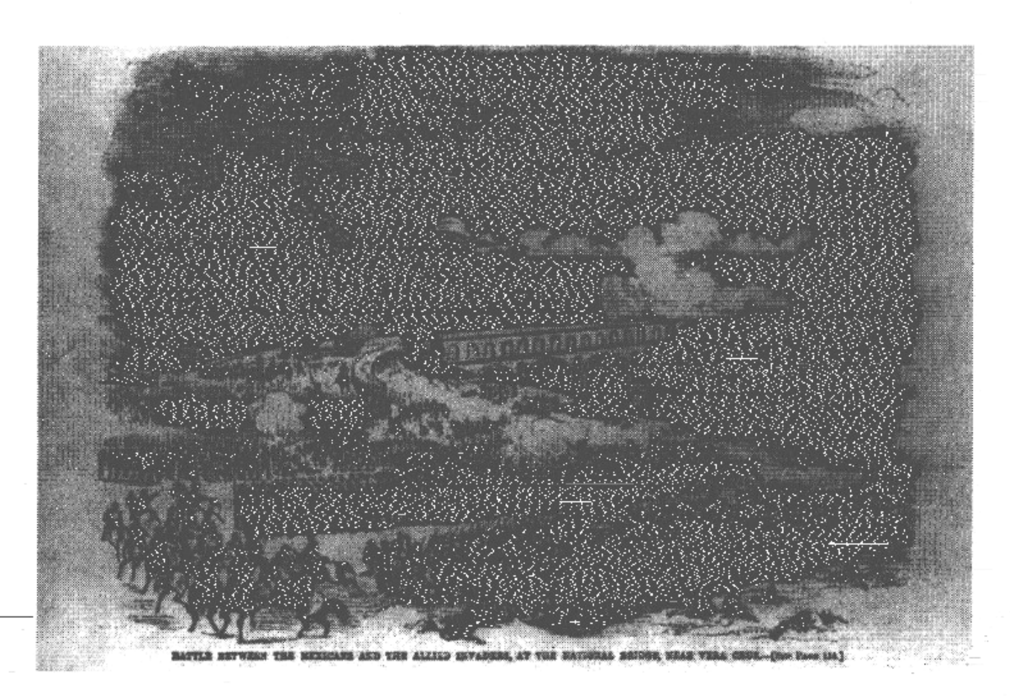
虽然美国内战阻止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这届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美国国内对贝尼托·华雷斯和墨西哥还是存在广泛的同情。这种支持体现在不计其数的报刊的编者按以及杂志的卡通画中,就比如这里的这一幅。画中既嘲讽了法国(以画面近处的拿破仑三世为代表),又嘲讽了英国(以画面中跑走的布尔夫人为代表)。

因此,面对绝境,1861 年 7 月 17 日,华雷斯政府做出了延期两年偿还外国债务的决定。他和他的顾问团队尚不清楚要通过何种方式才能从这几乎破产的国家中取得收入,但他们需要时间来制定相应的战略。但是那些外国债权人可等不了这么久。三个月后,英、法、西班牙等国签订了一个公约,试图通过占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来逼迫墨

西哥政府偿还债务。但此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已相当不耐烦，他已经有了比收取债款更为宏伟的构想。在其野心勃勃的西班牙籍妻子欧仁妮的煽动下，他决定在这个帝国的时代中扩大法国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他梦想（其实很多人在他之前有过类似的想法）挖掘一条运河或建设一条铁路横穿特万特佩克地峡，作为除苏伊士运河外另一条通往东方的航线。

为推销他的计划，拿破仑三世需要找一个代替他掌管墨西哥的傀儡人物，终于，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冯·哈布斯堡进入了他的视线。而拿破仑三世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美国正因为内战耗尽了国家的全部精力，已经无暇顾及强力反对法国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君主国的企图，所以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于是法国召集了据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远征军，一共 2.7 万人，浩浩荡荡地护送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登基。

381



法国军队于 1862 年入侵墨西哥，在向首都进军的途中，他们在民族大桥（图中所示）和其他一些地方轻松获胜。可是 1862 年 5 月 5 日在普埃布拉，骄纵的法国人结结实实地吃了一场败仗，不仅被迫退回到韦拉克鲁斯，还使他们占领墨西哥城的计划不得不延后一年。墨西哥取得的这场胜利此后每年都在“五月五日节”得到庆祝。

当英国和西班牙看清了法国的企图后，便立刻从三国阵营中退了出来。但自信的法国人仍然挥舞着旗帜向他们的目标墨西哥城进发。法国军队的指挥官洛伦塞伯爵夏尔·斐迪南·拉特里耶是一个自大而无能的法国贵族，4 月 25 日，他在给法国陆军大臣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论在种族、组织、道德方面还是在情感方面，相比那些墨西哥人，我们都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因此我请求阁下上奏陛下，只要 6 000 人的部队，我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墨西哥。"

382

面对这样狂妄的言论，墨西哥人并没有感到畏惧，相反，他们已经在伊格纳西奥·萨拉戈萨将军的带领下在普埃布拉市做好了战斗的一切准备。1862 年 5 月 5 日，两军正式交火。当最后硝烟开始散去的时候，墨西哥人获得了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他们彻底打败了自鸣得意的法国军队，让他们向韦拉克鲁斯狼狈逃窜，而这一重大的胜利也让墨西哥人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节日：五月五日节(Cinco de Mayo)。

但首战胜利并没有真正结束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埃利·福雷元帅的率领下，法国集结了更为精锐的部队，占领了首都，并将华雷斯逐往北方。新一轮的攻击也让法国的海外部队风光一时。1863 年 4 月 30 日，大约 60 个执行侦察和警戒任务的法国退伍老兵在韦拉克鲁斯州的小村庄卡马隆外遭遇了 1 000 多人的墨西哥游击队。这群被围困的退伍老兵在他们的指挥官让·当茹上尉的领导和鼓舞下，对游击队进行了将近十个小时英勇的抵抗。当茹是一个独臂军人，他的左手在一次步枪事故中严重受伤，之后便装了一个木制的假肢。之后，当茹身亡，剩下的 5 名士兵(据说属于不同国籍)向游击队投降了，他们在后来的一次战俘交换中获释。这次英勇的行动在法国被称为"卡马隆"(Camerone)，并迅速成了军中流传的传奇。从那时起，每年的 4 月 30 日，各地的军队——包括在残酷的 1954 年越南奠边府战场上，军队士兵们都要"停止战斗"，听他们的长官讲述关于"卡马隆"的故事，而当茹的木制手臂仍被尊为法军最为神圣的遗物。

讲完历史注脚"卡马隆"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回到墨西哥战场，由于夺取墨西哥的首战不利，法国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这给了

华雷斯政府在全国各地动员一切力量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时间，这也意味着几乎是在维克斯堡已被美国联邦军队攻下，葛底斯堡战役已结束一年后，直到1864年的5月，马克西米连才登上墨西哥皇帝的宝座。拿破仑深知他必须在美国内战结束前让自己的势力在墨西哥扎根，因为此时，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军队似乎已经掌控了大局。

法国的士兵在能力卓越的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元帅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将贝尼托·华雷斯及其政府官员们逼到了北部边境。巴赞于1863年7月接替福雷元帅的位置，他从19世纪30年代驻阿尔及利亚的普通军团士兵开始发迹，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荣升为准将。他通晓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而他在非洲积累的反游击战经验在墨西哥很实用。他的军队包括来自北非的轻步兵（着装艳丽的阿尔及利亚步兵）和一些埃及人（对墨西哥热带地区的气候比较适应），还有法国军队的士兵以及墨西哥当地的保守派，共有将近4万人。而巴赞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马克西米连平定墨西哥并将他扶上墨西哥君主的宝座。

但此项任务非常艰巨。各类墨西哥的爱国人士——包括民兵、爱国土匪、普通士兵，在马里亚诺·埃斯科韦多和波菲里奥·迪亚斯等将领的领导下，在墨西哥的每一处进行抵抗。为保证安全，法军必须占领并驻守已拿下的城镇。这场拉锯战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墨西哥的反抗者们被法国当局定为土匪，战败后被送至军事法庭审判和执行枪决；同时法国政府也对那些为华雷斯势力提供金钱、物资、住宿和食物援助的人，以及传播共和党人成功消息却不传播法国战斗佳绩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最后，由帝国控制的城镇和村庄被要求建立自卫队，对不服从命令者进行惩罚。

383

而华雷斯领导的共和党人也有着强硬的态度。他们于1862年1月和10月颁布法令，宣布与外国入侵者合作者为不法分子和叛徒，而所有通敌的墨西哥人都会被判处死刑。但即使有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悬着，大部分墨西哥人还是在效忠法国与效忠共和国之间举棋不定。这些左右摇摆者包括奇瓦瓦州州长路易斯·特拉萨斯和新莱昂州州长圣迭戈·比道里，他们一直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是否会与君主制不一致

而苦思冥想。而另一方面，华雷斯也有足够的理由对某些将军持有怀疑的态度。那些强大的地主们，例如科阿韦拉州的桑切斯·纳瓦罗斯就将他的财富献给了法国。另外，其他很多区域纷争和地方派系之争都显示有些人认为倾向于帝国远比支持共和国要更为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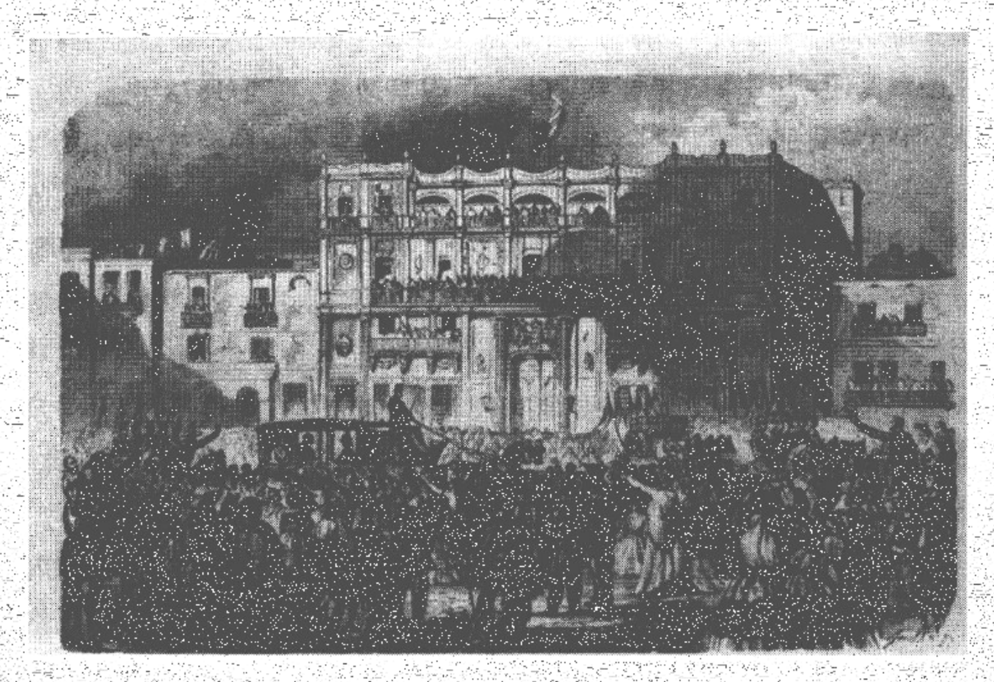
像这样的民族危机往往会促使区域或地方的势力为将来争得更多的利益，而与入侵的外部势力相勾结。当然这种行为对双方都会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在攻击共和党人支持者的领地时往往会敦促当地的反共和派人士加入他们一方，并对当地人民许下可以从法国政府得到救济和奖励的承诺。而地方势力则会被以上的承诺吸引，并开始瞄准在君主制帝国中任何可以晋升的机会，权衡自己的风险和得失，并最终倒向法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些互动与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关，和民族主义更没有联系，这只是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权衡机会的一种方式。

例如，在1865年的春天，当法国军队逼近奇瓦瓦州的首都奇瓦瓦市时，人们呼吁全州公民共同努力，贡献人力财力和武器来保卫共和国。一些公民积极响应，但剩下的人们开始抱怨强制借贷，以抵御土匪为借口保留枪支等。那几年，干旱已经使各地人民的生计举步维艰，这也许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人们犹豫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想为任何政治团体提供任何援助。

到了8月，墨西哥西部帕皮戈奇克河下游的某些城镇开始大肆宣称自己臣服于帝国。这些分布于马德雷山脉第一高峰一带的村落包括特莫桑切克、马塔奇克(Mátachic)、纳米基帕、耶波梅拉和圣托马斯，长久以来就渴望脱离河流上游的诸如格雷罗城之类的更为强大、富有、奢华和盛气凌人的政治实体而实行自治。它们自称为“村庄联盟”。

384

前来的法国军队迫使州长米格尔·奥希纳加流亡外地并在格雷罗市寻求避难。与此同时，河流下游那些主动投诚的君主派打败了前来镇压他们的军队，格雷罗市到处都是亲法叛匪的游行队伍。饱受折磨的州长又从格雷罗市逃到了山区的安全地带，却被亲法者在塔拉胡马拉地区一个名叫阿里斯亚切克(Arisiachic)的印第安人村落中抓个正着。他在一场短暂的枪战中身亡。



法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之后，拿破仑三世很快就安排自己的傀儡：马克西米连皇帝和卡洛塔皇后前往墨西哥实行统治。法国军队的指挥官不顾大多数墨西哥人极力反对欧洲君主统治的情绪，为这对新的皇帝夫妇安排了图中这场欢迎式。

在这动荡的年代，贝尼托·华雷斯竭尽所能地试图保住自己的政权。他将从政敌处没收的财产分给那些支持他的人，尽管有时候他会将同一处产业重复赠给不同的支持者。他还宣布加强联邦政府对那些不支持其政权的地区的控制并实施戒严法。华雷斯总统还坚定地宣称："这是世界的必然趋势——对墨西哥人来说尤为正确，而路易·纳波莱昂本人如果可以亲临墨西哥住上几日，他也会感到吃惊的。墨西哥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任何一个不了解他们的人，同时也是自高自大的人，墨西哥人会用赞赏和恭维使他麻痹，并最终唾弃并摧毁他们。"毋庸置疑，这些话非常勇敢，但法国对墨西哥干涉在此时远未尘埃落定。

1864 年 6 月 10 日，马克西米连大公与夫人卡洛塔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准备登上墨西哥皇帝的宝座。当地的人民并没有给予这对夫妇他们所预期的欢迎，相反，他们遭到一系列的冷遇。这对夫妇的助手深表歉意地解释说，由于该港口城市正在爆发流行疾病，人们全都待在家

中躲避疫情，因此才有如此冷清的景象。拿破仑三世已经通过条约向这
385 位皇帝保证，法国军队将在其领土上保卫其政权，直至 1873 年撤回军队，而相信到那时马克西米连已经在政治上稳坐了其君主制的江山。

从一开始这位新皇帝就明确表示，他的政权将比墨西哥保守派所设想的君主制要更为自由。而事实上，拿破仑本人也主张在墨西哥实行宽容的独裁制。马克西米连非常满足于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一度认为他的对手贝尼托·华雷斯是出任首相的绝佳人选。看来这位奥地利大公完全误解了他的臣民。尽管如此，他仍然下决心要争取到他的政敌。他到底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的、可怜的傻瓜，还是纯粹太迟钝？历史至今仍旧没有对马克西米连这个人盖棺论定。

马克西米连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吸收进自己的内阁。为了平复内战时留下的积怨，他还将手下最突出的两名保守派军官：前总统米格尔·米拉蒙和莱昂纳多·马尔克斯将军安排去欧洲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官职，其目的仅仅是想让他们离开墨西哥。令教会感到懊恼的是，他拒绝归还按改革法律充公的教会财产，并指出土地等教会财产除极少的一部分外，都应被分割并只能出售给穷人；他还宣布，印第安村庄可以拥有公共土地，而对那些没有地产的印第安人，国家应给予土地补偿。在宗教方面，宗教修会没有恢复，学校也没有回到最初受教会监督的状态，因为马克西米连希望把神职人员列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由国家统一支付工资，并取消教会的什一税和收费。

新皇帝还起草了一部著名的新宪法，该宪法的内容与自由派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该宪法提出以信奉天主教的王公施行统治的温和世袭君主制，以及宗教宽容的政治环境。它保证所有墨西哥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拥有自由劳动权；废除了劳务偿债，并严禁体罚工人；限制了童工和工作时间；取消了全国境内超过 10 比索的债务；开放了国内市场，引进国外竞争。当然，马克西米连的这些政治措施都是以吸引任何派别的温和主义者加入到他的阵营为前提的。他试图通过此举寻找某种国家共识。但痛恨他的坚定的保守派和渐渐开始崇敬他的墨西哥普通公民一样多。

这位就是斐迪南德·马克西米连·约瑟夫大公：漂亮的金羊毛骑士团徽章别在他的奥地利海军礼服上，蓝眼睛，皮肤白皙，刚过了而立之年，有着标志性的中分的金色长胡须。当他的兄长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于 1848 年加冕成为哈布斯堡皇帝时，马克西米连是仅次于他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当他的兄长结婚生子(儿子名叫鲁道尔夫，于 1889 年在梅耶林神秘死亡)后，他继位的可能性又降低了。于是马克西米连与兄长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他接受墨西哥的皇位，并声称放弃奥地利的皇位继承权。

386

他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漂亮的女儿，长他 6 岁的妻子卡洛塔(夏洛特)的婚姻非常紧张。马克西米连常常与妓女厮混，而卡洛塔一直担心会感染丈夫身上的梅毒，所以 1860 年以后，这对夫妇就一直没有同床睡过。但马克西米连还把拈花惹草的恶习带到了墨西哥，这也让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支持者们感到厌恶。卡洛塔拒绝与马克西米连同床，也导致了墨西哥的君主制严重的继承问题。但没过多久马克西米连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收养了墨西哥第一位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当皇帝的人)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的孙子，指定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而这一举动也的确安抚了一些人，当然这个孩子的母亲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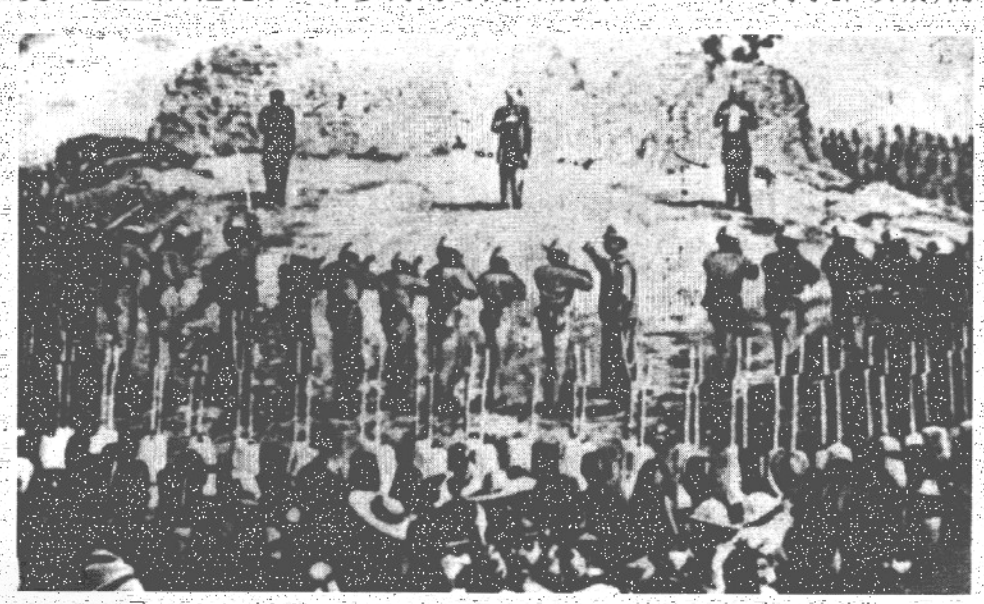
很多墨西哥人对法国人出现在其领土上感到异常气愤。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干涉者在给其家乡的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的确，没有人在这里是受欢迎的，当地人讨厌法国人就像讨厌魔鬼一样，他们对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没有人了解这里的中产阶级，有多么无知。我甚至听到一些很有声望的人问马克西米连是不是也是奥地利的皇帝，或是奥地利皇帝的儿子。总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也什么都不关心。他们似乎完全把政府看成是过渡性的，短暂的，不稳定的。"而事实上，的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将这次干涉看成了"短暂的过渡期"。

尽管人们对帝国毫不热情，但法国的影响却开始悄悄渗入墨西哥社会，特别是在首都地区。箍裙、欧仁妮帽(以拿破仑三世皇后的名字命名)和低领口成为上流社会女性中的时尚。有时在街上甚至出现了光着臂膀的女性，给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同时，法

国的文学作品、钢琴以及其他的乐器、油画和素描也和私立学校教授的法语课一样在墨西哥开始出现。干涉者们还带来了欧洲的歌剧，包括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安吉拉·佩拉尔塔和首席指挥家塞诺比奥·帕尼亚瓜。此外，法国的工程师们开始修建道路，并在农村铺设电报线路。新的管道解决了墨西哥城长期以来的排水问题。最后，这些法国人带来了新的思想，比如科学实证主义思想，并认可了共济会，后者对墨西哥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墨西哥人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还是尝试了干涉者们带来的文化和时尚。

就在这位君主力图吸引温和派墨西哥人到他的阵营，翻新他在查普尔特佩克的豪华寓所，并对墨西哥的本土植物和蝴蝶进行猎奇时，巴赞元帅继续为平息该国境内的纷争而努力。因为马克西米连一直试图阻止(大部分情况下没有成功)这位指挥官带来的腥风血雨，这两人之间相处得并不愉快，并常常为此次干涉的目的和整个干涉过程进行激烈的争论。1864 年 7 月，巴赞元帅挥师南下进攻瓦哈卡市的波菲里奥·迪亚斯，他花了 6 个多月的时间围城，于 1865 年 2 月拿下该城，而

387



马克西米连和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托马斯·梅希亚(Tomas Mejia)及米格尔·米拉蒙(Miguel Miramon)在克雷塔罗战役中被俘，并被判死刑。尽管欧洲各地的各方人士纷纷来说情，但贝尼托·华雷斯总统拒绝赦免这位皇帝。1867 年，自由派军队在克雷塔罗郊外的坎帕纳斯山(钟山)上枪决了这三个人。

该城的陷落也表明，共和党人手上只剩下四个州：中部的格雷罗州，北部的奇瓦瓦州、索诺拉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州。

此时的华雷斯总统已经是背水一战，主要靠分布于塔毛利帕斯州和米却肯州的勇敢而忠诚的游击队员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匪。但是干涉者们也用自己的反游击部队与这些非军事部队进行对抗，而双方都用恐怖手法。臭名昭著的让-夏尔·迪潘(Jean-Charles Dupin)上校被召回法国作军事汇报时，对拿破仑三世说：他对自己下令吊死的墨西哥人一直是非常仁慈的。他解释说，敌方则通常会倒吊俘虏并让他们面朝太阳，直到俘虏们渴死为止。他指责这些墨西哥战士太野蛮。

尽管墨西哥人的这些严酷，甚至很残忍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文明，但在战场上却非常有效。1866 年 3 月 13 日，一位法国官员在给其母亲的信中提到的内容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敌人有着独特的，同时对他们来说非常实用的作战方法。如果是 400 — 500 人的大型兵团根本不可能在野外空旷地遇到这些家伙，就算他们的兵力有可能是我们的 4 — 5 倍。但是他们往往会躲在暗处，并不停用弓箭射向我们，导致我方伤亡惨重，并在我们反应过来之前尽快地逃离出事地点。但是，如果是一支小型的军队，比如一个连或半个连在某处单独执勤，可以肯定每晚我们都会遭到袭击。我们的军队将会非常疲劳，人员大量伤亡，而且根本抓不到他们。在这些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长期不去干扰这些人，让其误以为自己所处的地带或另一个地带非常安全，从而放松警惕，然后我们就将他们完全包围，把他们抓起来捆在一起。而这是逮捕这群乌合之众最简便易行也是最为安全的一种方法。"

战争在墨西哥这片土地上肆虐，但给法国留下的时间却屈指可数了。就在迪亚斯向巴赞投降两个月后，罗伯特·E. 李在托克斯投降了尤利西斯·S. 格兰特，美国南北内战结束了。此后不久，美国以演习给法国干涉者们施加压力。以不得不清除一些顽固的邦联军为借口，格兰特将军命令菲利普·H. 谢里登少将率领 4.2 万人向墨西哥边境进发。这支部队大部分驻扎在布朗斯维尔，直面位于马塔莫罗斯的干

涉者托马斯·梅希亚的驻地。一时间看起来倒有美国军队要代表共和党人出兵墨西哥的架势。随着美国官方否认有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外交方面趋向平静,但美国的威胁却仍然存在。

而拿破仑三世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开始私下为自己介入墨西哥引起的烦恼而担心害怕,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至少有三个地方失算了:其一,他没有料到墨西哥游击队会顽强抵抗;其二,他既没有料到马克西米连在巩固其政权,规范其财务状况方面会失败,也没有料到马克西米连与巴赞元帅之间会有分歧,以及和他皇兄弗朗茨·约瑟夫之间的摩擦;最后,他原以为美国内战的胜方会是南方。而当时,墨西哥战争不但使法国皇室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法国将面临与美国之间的严肃且尴尬关系,而且还将面临来自东边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的威胁。因此,最好的做法便是尽快放弃对墨西哥的干涉。

马克西米连知晓了拿破仑三世的处境后,开始对自己的墨西哥帝国的和平进程感到不耐烦。为什么他的臣民不能认可他的慷慨与仁慈?为什么他们不支持他的自由主张?但是墨西哥人的无动于衷终于使这位沮丧的年轻君王于 1865 年 10 月 3 日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黑色法令:即使自称是爱国者或有政治动机者,任何持有武器或与武装团伙有关系的被捕者都将被立即处死。(名义上这种惩罚是用于土匪而不是政治对手的。)此外,在交战中被捕的俘虏,将由法军战地指挥官对其进行处决。因此,墨西哥将不再有军事法庭的审判,也不能请求宽大处理,或由皇帝进行赦免。而以上所有条款都出自一个试图赢得他的臣民的钦佩和忠诚的皇帝之口。黑色法令让马克西米连的形象在很多墨西哥人的心目中已丑陋不堪,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开始声称此刻才看清此人的真面目。

一星期以后,由于游击队员们开始毁坏被他们杀死的法国士兵尸体,愤怒的巴赞元帅对黑色法令又加了补充:“我指示你(战地指挥官)通知你指挥的部队,我不再允许他们俘虏战俘。以后再也不会有互换战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必须了解他们不该用这种方式对敌人放下武器。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殊死战,是一场终止野蛮与文明之间的争斗的

战争，因此双方的屠杀都在所难免。”巴赞和皇帝首次携手商议对敌大计。而墨西哥的流血事件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升温。

1866年1月15日，就在墨西哥的血战正酣时，拿破仑三世通知马克西米连，说他将逐步撤出在墨西哥的法国军队。第一批9 000名士兵将于当年10月撤离，第二批9 000名士兵会安排在次年的3月撤离，而余下的11 300名士兵会在1867年10月全部撤离。因此，与这一撤退计划相呼应，巴赞元帅开始着手将自己的队伍从偏远地区调回墨西哥城。自由派的势力迅速填补了巴赞部队留下的空间，并继续给撤退中的法国军队制造压力。当1866年夏天，巴赞的军队从奇瓦瓦市撤出后，长期在北部边境的贝尼托·华雷斯迅速带领他的政府占领了该州的首府。随着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和泰然自若的机会主义者)抓住了这次胜利的机会，爱国主义开始席卷整个国家，华雷斯的队伍也日渐扩大。马克西米连一定对此情此景感到十分震惊，但他并没有陷入绝望，因为即便危难越来越近，卡洛塔一直在支持他。事态的发展使这位皇后异常失望和愤怒，她决定用她的力量来挽救君主制度。

389

1866年7月中旬，卡洛塔出现在巴黎的拿破仑宫廷内，斩钉截铁地要求拿破仑履行其诺言。根据《米拉马尔条约》的内容，在确保马克西米连政权稳固后才撤离法国军队。但是拿破仑拒绝对他已定的撤军时间表做任何改动。卡洛塔写信给她的丈夫，并在信中指责拿破仑像个“魔鬼”。在两人建在意大利境内的的里雅斯特城外尚未完工的米拉马尔城堡内稍作休息之后，卡洛塔马不停蹄地赶到罗马，代表她的丈夫寻求教皇的怜悯。后者是否做出了回复，又是如何回复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来自罗马的消息说卡洛塔几乎丧失了理智，几近精神错乱。卡洛塔的兄弟，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坚持要将卡洛塔接到布鲁塞尔附近的泰尔维伦城堡休养调理。卡洛塔的医生在给马克西米连的信中只是提到她病了，但她聪明的丈夫马上知晓了其中的真相。

马克西米连知道其妻不希望他放弃在墨西哥的皇位，但不久以后拿破仑加快了他的撤军计划：所有的部队都将在1867年3月撤离。

这个日期意味着第一批撤离部队的时间比既定推迟了5个月,但是部队的撤完时间却比原来提早了7个月。关于马克西米连将要放弃皇位的谣言在欧洲和美国到处传播,但马克西米连自己却还没有打定主意。1866年11月末,他召集了内阁会议听取建议。10比8的接近的投票结果显示,大部分阁员敦促他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要放弃。尽管只是微弱的优势,但马克西米连准备同墨西哥仍然忠于皇室的人一起,与共和党人一较高下。

1867年2月5日,法国军队撤离了墨西哥城,此时巴赞元帅催促马克西米连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后者没有答应。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皇帝启程前往克雷塔罗并建立了指挥部,以此正式向华雷斯政府宣战。他知道他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执行任务返回的坚定保守派将领梅希亚和米拉蒙等人的身上,但约21 700人的保皇军队与69 700人的共和党军队在人数上相差悬殊,另外,保皇军队的军需物资以及资金都比较短缺。一个月以后,由马里亚诺·埃斯科韦多将军和拉蒙·科罗纳将军麾下的3.5万共和军队将7 000名保皇军团团包围。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于3月16日离开韦拉克鲁斯。此时的墨西哥帝国则正在遭受最后的磨难。

与此同时,波菲里奥·迪亚斯成功地逃脱并开始在墨西哥东部指挥共和军,迅速拿下了奥里萨瓦和科尔多瓦。4月2日,他占领了普埃布拉,并发起了针对保守派的审判,保守军队的指挥官连同74名政府官员被判为卖国贼,处以极刑。4月初,波菲里奥·迪亚斯打败了另一支位于墨西哥城外的保守派军队,并包围了首都。同时,迪亚斯还占领了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并在那里设立了总部,等待北方战事发展的消息。在克雷塔罗(Querétaro),被围困的保皇军队计划于5月15日突出要塞并打破共和军的围攻,但保皇军队的骑兵司令辜负了他的统治者对他的信任,为围攻者们打开了大门,共和军们迅速占领了克雷塔罗,并在一家修道院内活捉了马克西米连。而现在,华雷斯所要担心的事情就只剩下如何处理这位君王以及米拉蒙和梅希亚等人了。

390

1867 年 5 月底，马克西米连得知，根据华雷斯 1862 年 1 月 25 日颁布的法令，由于他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战争，以墨西哥皇帝自居，并试图取消墨西哥的共和制度，他将被以叛国罪论处，而米拉蒙和梅希亚也会以叛国罪论处。6 月 13 日，由 7 位政府官员组成的军事法庭对这三名被告开始进行审判，审判持续了 2 天，并很快得出了审判结果：有罪。6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3 点，也就是在判决下达后的 42 小时内，行刑队将对这三名罪犯执行枪决。

在接受审判期间，颇有手段的辩方律师找到贝尼托·华雷斯，企图为这三名被告开脱罪行，但是都遭到了总统的拒绝。可他还是将执行期延长了 3 天，以确保法律界人士以及旁听的外国外交人员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检察官认为墨西哥人民，尤其是墨西哥军队，都不能容忍自己的领袖让罪恶滔天的敌人逍遥法外。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看到本国政府对马克西米连进行赦免，那么外国政府必定会因此而认为华雷斯政府意志力薄弱；再者，一旦马克西米连获释，他可能有一天会密谋反攻。他们指出以上的各条没有一条在政治上可以接受，也没有一条可以得到宽恕。

同时，外国政府和政要——奥地利、普鲁士、英国、西班牙等国——均恳请华雷斯重新考虑。两位华雷斯总统最为崇拜的国际偶像，维克托·雨果和朱塞佩·加里波第也要求总统宽恕。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则预言："这些无法无天的墨西哥人，当他们知道自己谋杀一个皇帝会激起欧洲人多少愤怒时，他们会停止他们的暴行的。"而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则采取逃避的态度，既没有支持华雷斯政府，也不偏向欧洲各国。当罪犯的辩护律师团就此事向华雷斯总统做最后的请求时，华雷斯做了如下的回答："今天你们也许不能明白此事的严重性，或者这件事的司法依据或动机。只有时间才能让你慢慢看清这件事，并由衷地欣赏我们今天所作出的决定。现在的法律和审判的确无情，但维护公共安全却需要这样的无情，而这也能让我们以后能更加珍惜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的生命，对我来说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对一名与马克西米连有联姻关系的德国王公的妻子的求情，华雷斯回答说："如果

391

欧洲所有的国王和王后都像你这般，我一生都不得消停，并不是我在掌控法律，是人民和法律本身，如果我不履行他们的意愿，那么人民自己将会执行法律。”

1867年6月19日清晨，在克雷塔罗城外的坎帕纳斯山（Cerro de las Campanas，即钟山）上，共和党政府处决了这三名罪犯。但是由于华雷斯政府没有将其尸体交给奥地利官员，马克西米连直到1868年1月中旬才得以下葬。华雷斯政府不仅要求墨西哥医生对其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同时也派军队一直守卫在其遗体旁，以保证大量墨西哥人不会由于对这位逝去皇帝的怀念甚至崇拜，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政府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人中有一定的声望，而这一点死去的皇帝本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也并没有怀疑。但是这种个人崇拜其实离宗教意义上的神灵崇拜只有一步之遥，而皇帝的信徒们相信，即使皇帝已经死去，他也能用自己的神力保护那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墨西哥的执政党不希望马克西米连成为墨西哥人心目中的烈士，但更不希望他成为国人心中的神明。

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指责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孤立政策，华雷斯再一次肯定了对马克西米连的处决是“一次公正的、有必要的、迫切的同时是必然的处决”。他指出：“我们继承了阿兹特克土著民族的血统，并充分享受我们的民族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可以无视外国元首、法官和仲裁者对我们施加的各种压力。”虽然这位血统纯正的萨波特克人赞颂阿兹特克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他的声明表明了其在区域和种族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代议制共和国的决心。这项艰巨的任务也随即开始了。

就在坎帕纳斯山处决两天后，波菲里奥·迪亚斯带领着他的军队进入墨西哥城。7月15日，华雷斯也进入首都加入了人民的狂欢。但此时却乌云密布，自由派内部对其政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仍意见不一。区域和地方冲突仍然不断，长期以来的传统和十多年的内战以及外国列强的入侵，各种强度的争端和冲突在墨西哥到处肆虐。农民们要求土地，各个印第安人村庄要求自由派在之前改革时期所承诺

的地区自治，成千上万的共和国士兵（很多是新近加入的）要求政府对其英勇服役给予奖励，土匪盗贼横行。除了美国仍然比较友好之外，其他外国势力也极力避开这一国家。更为糟糕的是，由摇摇晃晃的税收制度支撑的国库基本已经空虚。

392

另外，华雷斯的总统权力也受到了挑战。因为1857年宪法把总统的任期限为四年，并且不能连任。而此时的华雷斯已经当总统将近十年，尽管国会也承认这是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但是显然现在已经到了遵照宪法进行改选的时刻了。



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抗击法国的战斗中战功卓著，其中就包括领导在普埃布拉取得的五月五日大捷。他觉得自己为抗击法国做出的贡献理应从自由派政府那里获得回报，但华雷斯总统认为国家需要回到文官统治的模式，而不能交给武将。这对曾经的盟友就此转为政治对头。

根据华雷斯以往当总统的经验,此时的他,开始考虑如何加强总统权力的问题,因此他就此事提出了宪法修正案。但在面对一个主要捍卫各州权利的一院制立法机构时,在面对一群对独裁高度警觉的民众时,这一建议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考虑到自己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在一个严重争斗的国会中实现时,华雷斯直接向墨西哥人民宣布了全民公决法案,该法案将在国会以外创建另一个与国会权力相匹敌的立法机关,加强总统的否决权,并确定除最高法院院长外的其他总统继任顺序。然后,华雷斯开始大力扩大自己的选民和支持者群体,他同时还宣布神职人员享有投票权,联邦雇员享有参加国会的权利,同时他还取消了国会议员在其家乡地区居住的要求。显然,这位国家的行政长官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393



贝尼托·华雷斯是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并成为墨西哥抵抗外来入侵和影响的象征。在驱逐了马克西米连之后,他继续致力于实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在"重生的共和国"(1867—1876)期间,他制定的政策帮助创立了一个现代国家。

华雷斯颇有争议的宪法改革与1867年8月的全国选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选举中他轻易击败了自己长期的政治对手和批评者赫苏斯·冈萨雷斯·奥尔特加将军以及年轻的政坛后起之秀,著名的战斗英雄波菲里奥·迪亚斯。至于宪法修正案,随着选举的成功,当政者们决定放弃该法案在全民中的投票表决。但很大程度上,此政治活动仅

在首都开展。首都以外未能享受这种权利。其他地区的人们则忙于在地方上争权夺利。

举个例子，在普埃布拉的历任州长都无法平息山区自由派酋长的势力，而格雷罗州的州长也不能制服本州强大的封建派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兄弟夺取了华雷斯在自己的出生地瓦哈卡州的政治地盘，此外各地印第安农民与政府土地政策相斗争引发的农村动荡也席卷了共和国的中部地区。与此同时，有“纳亚里特(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小州)之虎”之称的曼努埃尔·洛萨达和他的农村信徒们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拿起了武器。墨西哥的政治家和民众为了督促政府履行其改革运动时的承诺而开始采取行动。

394

关于改革承诺的确切性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为了适应其繁复多样的目的，自由派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而自由派只是一个表面的旗号，长期以来内部充满分歧与矛盾。当各种派系、城镇，甚至整个州和大型的区域为从联邦政府那里争取自主权而制造动乱时，华雷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独裁政府或类似的制度，但他们认为如果墨西哥想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良好的秩序和在首都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并建立起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而作为往该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华雷斯政府采取了与其他之前统治者同样的措施：他们招募了当地的土匪强盗，并将他们吸纳为国家警察，允许其在警察和强盗之间自己做出选择。无论如何，就算其形象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墨西哥的乡村骑警队不久就在国际领域中取得了吃苦耐劳且忠于职守的声誉。

与此同时，为吸引外资，政府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取了试验性措施。道路状况得到了改善，电报线路得到了延伸，铁路也从平原地区渐渐延伸到了陡峭的山地。改革者们也没有忽视其在文化方面的规划。他们开始建立世俗小学，并为学龄儿童制定了课程大纲。此外，墨西哥人必须学会自律，努力工作，有责任感，戒掉酗酒等恶习，并主动存款以防不时之需。他们要效忠作为整体的墨西哥共和国，而不是仅仅效忠于自己的传统社区或教会。陈旧的迷信思想必须被丢弃；科学将

作为定义和解释真理的唯一工具。他们还指出,妇女应当像过去一样遵守道德,忠于家庭,照顾家人和病人。政府甚至还小心地叙述了儿童对于家庭,社会和整个国家的责任所在,以使社会化进程有序进行。

此外,这些世俗自由原则还以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式被写到了教学大楼的墙上,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催生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胡安·科尔德罗第一个在墨西哥城国立预备学校的墙上作画,而在其就职仪式上,教育部长说道:"预备学校很有幸在墨西哥的艺术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幅画的作者是这所学校的赞助人之一,他用他的画笔,就像在座的我们用我们的工作和文章一样,贡献着自己对于知识传播的力量。他将与我们一起共享我们的斗争和胜利。"很不幸,科尔德罗的这幅画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的辉煌时期被一扇乏味的彩色玻璃窗所取代。但1910年革命成功后,大量优秀的壁画家,例如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达维德·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迭戈·里比利亚、费尔明·雷韦尔塔斯、让·沙里奥(Jean Chariot, 1898 — 1979)和费尔南多·莱亚尔(Fernando Leal, 1896 — 1964)等都在预备学校的墙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杰作。

395

大多数关于未来墨西哥社会的高层次的理论都属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有人认为,国家的发展趋势,同文明和人类一样,是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之中:从原始阶段到形而上学,再到带来物质成就的科学理性阶段。这种理论很大程度上借用了西方人的著名理论,例如"社会学之父"孔德的学说,查尔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思想,受早期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进化论者斯宾塞的理论,等等。"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物竞天择"等醒目的标语到处可见,宣扬"进步",但很少提及"公正"问题。"向现代化迈进"实际上就意味着不顾社会成本地向美国和西欧靠近。

社会上层宣传的进步之路并不总是(甚至经常)受到较低社会阶层的欢迎的。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当改革结束后,他们也还是保留了很多他们最初的信仰。尽管社会精英们引入了关于

世界运行的科学规律，大多数墨西哥人仍然习惯于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最熟悉和最舒适的宇宙观。他们可能会接近，甚至接受一些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新的思路和做法，但同时他们继续相信奇迹，并相信如果他们触犯了一些人，神灵会降怒于他们，他们还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存有不可知的事物。

他们相信善恶的神灵，甚至巫术，而这也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继续照顾并款待他们可爱而原始的（甚至制作粗糙的）圣像，并将这些木制或石膏制的圣人雕像当成自己的家人。他们祈求这些神灵的庇佑，但也会咒骂那些似乎对他们的祈祷毫无反应的神灵。在这种情况下，贝尼托·华雷斯和他的温和派与天主教会达成了协议：他们会在行动上放宽改革法的推行，但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尽量少说一些关于政府在国家民政和世俗事务方面政策的刻薄话。同时，许多普通民众选择了那些对他们自己最为有利的规则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就像个人、家庭、集团和组织一样，他们常常同意这个方面，调整另一个方面，但一旦有太过恼火的事情发生，他们也会抗议，偶尔还会发生叛乱。

不过，当墨西哥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尽管改革仍不完善，不全面，很多部分的内容仍被争议、协商以及修订，但很明显改革运动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是常常令人印象深刻，具有挑战性，甚至带有胁迫性质的改变。正如很多现代化的内容在早期的改革方案中被扭曲一般，改革没有（也没有能力）彻底根除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政治文化并没有很快与这个新生的国家相融合。不过，虽然口传文学和民间记忆让人们偶尔还会想起或谈起君主制，但是改革者们的确已经让保守党不再得人心，并将君主制打入冷宫。

396

虽然国家的控制力正在增强，改革运动还重申了自由派提出的代议制政府的思想。它赞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让公民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它质疑了天主教在墨西哥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创新、理想、纲要和活动对唤醒大部分墨西哥人雄心壮志并拓宽他们视野的影响。一些近代观察家也怀疑这场改革——尤其是对法国侵略者

的反抗——在墨西哥人的心中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也就是说,人们从那时起开始更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墨西哥人,而不是某个土著部落、地方、区域或其他一些传统场所的一分子。今天,也有人将这个时代定义为梅斯蒂索人渐渐兴起,取代克里奥尔人(美洲出生的白人)统治墨西哥的时期。换句话说,它代表着今日墨西哥的最初形成阶段。

在这个时期,不论政府实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进行更为深刻和长远的试探。它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减少种族冲突,同时它们也没有减少阶级差别。改革运动用真实甚至深刻的方式不停地搅动着整个社会,但同时它们忽视了领导层中存在的显著分歧,因此也没有对此加以变革。改革中的墨西哥与以往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同的。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不断地对这个国家进行着整理。而贝尼托·华雷斯,由于其以自己的方式坚定不移地捍卫祖国,反对外来干涉(尽管他在保卫印第安人和反对保守派时的立场没有如此坚定),他在墨西哥已经成了神话,一个墨西哥英雄。在1871年再一次连任总统后的第二年,华雷斯心脏病发作去世。在随后的继任混战中,波菲里奥·迪亚斯取得了胜利。虽然迪亚斯政权起初并不稳固,但之后他也在墨西哥推进(同时也破坏和歪曲)了改革运动。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6秋意版生成]
书名=墨西哥史 上册=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作者=迈克尔·C
页码=470
ISBN=
SS号=13106144
dxNumber=000007865275
出版时间=2012.04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865275&d=6C9855735FFDD4396CCFC2FFDC35454D&fenlei=11080801#ctop
全文地址=792a639bb121e90f13bacf48501d5e55/img15/768F4B9000A1A7DA6A563AA32D1BCBD8F20BDB82A559054A5513AC0FCFC3A92E5CEAD1A9D8750E399E327684F4327471E6FD8F12A97ADE3D052776F83A78BE2EADB796509C57E7F34F09452A2750268039282C9F452E252C10BE6B1E5FFCCD3895EEEB0C196B385D10A9D1DDF6F2B08E4B4C/b13/qw/